

王晓林
著

顧準和他的時代

九十九堂李銳




GREAT MOUNTAIN CULTURE
大山文化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遽尔长游的
徐志跃弟兄**

**顾准和他的时代
(上)**

王晓林 著

香港 大山文化出版社

作者与作品简介



王晓林，女（1953-）。16岁插队，18岁做工人，20岁就读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进入交通部科学院，任港电实验室工程师。深圳特区最早的建设者和从商者。中国第一批个人电脑与因特网使用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经的

捐赠者和志愿者。2001年退休，著有《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 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一

本书旨在以中国受过一般教育的读者为对象，介绍中国1949年以降的一位、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政治哲学家——顾准先生。

本书并不适合定位于“顾准传”或“顾准评传”。前者对时代背景介绍要有一定限制，这将模糊一个真实人物的轮廓；后者则不是一般人敢于涉足的——无论是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人，也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评论顾准都是一件颇为危险的事情，大概“索引顾准”还算是比较准确的定位，也确实仅仅用EXCEL做顾准年谱和索引，我就用去了大约2年的时间。

眼下被删减隐匿最少的顾准遗稿，非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顾准文存》一套四册莫属，它们包括《顾准日记》（虽依然缺失1957、1958两年）、《顾准自述》（实际上是坦白交代大全，却也有数十处“此处删去XX字、XX段”字样）、《顾准笔记》和《顾准文稿》（同前），但这是一种二维的结构。《顾准和他的时代》试图用三维的结构完成，以其年代为X坐标，其个人经历为Y坐标，其精神高度为Z坐标，尽可能完整地覆盖他一生的三个层面——时代的、个人世俗生活的和精神维度的。

在涉及最后一个层面时，我不得不撰写一些非常困难的段落，尤其是第四部的几个章节，然而这些段落对于准确描述作为思想家——政治哲学家的顾准是必要的。

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像我这样既非专业出身又非学术圈内的人，写作本身就意味着有了一定的立场。

希望能向读者呈现一个合理的、稳妥的、人的形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依赖于引述，包括自述和旁述，并始终在避免偶像化的趋势。



《顾准:1974》 油画 65X80公分 李斌创作于2015年

1974年2月12日，顾准下笔书写《希腊城邦制度》，乔治·格罗托的《希腊史》和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是他最重要的参考书。拖着沉疴病体他翻译了前者“希腊的僭主时代”一章和后者“罗马法和教父们”中的章节。12月3日，顾准离世。

插叙：肖像画《顾准·1974》背后的故事

2014 年秋，我用时五年写就的《顾准和他的时代》接近尾声，却苦于没有一张能传神表达主人公人格风貌的肖像用作扉页或插图。虽然网上有大量的顾准图片，成书过程中也拍摄了许多顾准生前生活、劳改过的独家照片，但前者没有版权，一旦付梓可能成为问题；后者没有人物，无论如何显得单薄。

就在此时，从扬帆先生女儿杨晓朝那里偶然得知，著名旅美油画家李斌先生 2007 年曾作大型油画《上海的早晨》，眼下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画中人物就有顾准。

顾不上脸皮厚薄了，立时三刻得找到这个李斌。

电话惴惴打过去，怯怯问道：“李斌先生在吗？敢问能允许我使用他的油画《上海的早晨》吗？我写了一部关于顾准的书，想用它做扉页。”不成想接电话的正是李斌，他连我的名字也没问就爽朗答道：“当然可以！我的画谁都能用，用得越多我越高兴！”

一时间心花怒放，厚着脸皮加了一句：

“可以不要版权费吗？我不大有钱。”

对方爽朗地笑了：

“怎么会要你版权费？更何况是顾准！我早就准备画一幅新的他呢。”

更加得寸进尺：

“除了《上海的早晨》，您还能为我的书画一幅顾准肖像吗？”

“好，你什么时候要？”

“等我找到出版社！这就把书稿寄给您，请先看看值不值得为它画一幅！”

“没问题！眼下我正忙于曼德拉系列，等结束巡展后就着手。”

放下电话简直要大叫一声才能释放心中的痛快，太棒啦！

可不，何止李斌，凡事只要事关顾准，几乎人人愿意帮忙。老的少的，熟悉的不熟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相求，无一不肯——经济学家、黑格尔专家、古希腊学者、政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从三十多岁的小青年到 100 多岁的耄耋老人，人人如此。而我算个什么？2007 年才知晓“顾准”二字，说“落伍”都有夸大之嫌。算起来我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深明人们为的、图的，想出力、想帮助的不是我而只是这个人——顾准。

很快，李先生的学生就传来了《上海的早晨》，压缩后还有 22M 大小的图片，WIN8 的机子整整下载了半个小时——

“1949 年 5 月解放军占领上海，政权易手。画中年轻的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和财政/税务局长顾准四人英姿勃发，气势如虹。正是这几位秀才的真诚和才学打动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稳固了政权变更后这个世界超级大城的国民经济。可是不久他们一个接一个都被革命母亲吞噬。”

此时我已经从网上弄清了画家来历——何亮亮先生的《开卷八分钟》介绍了一本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的画集，这个画集作者就是李斌，画集名叫《生于 1949—李斌画集》。画集尤以陈丹青先生写的序言精彩——“以红卫兵式的热情，李斌用不折不扣的革命绘画证实自己是一个共和国男孩。这种证实，必须、也只能是‘文革’的美学与图式……（他）全盘肯定‘文革’创作模式并为之骄傲，以‘文革’绘画的肌理组构着新的、属于今天的政治寓言。”他捕捉到了这个“文革和知青画家”的特点：就是这一代人——文革的一代，第一、全盘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教育；第二、自觉地追求 50 年代移植到国内的苏式写实主义，迷恋叙述性、图解性和人物众多的大画面；第三、少年时代目击了文革暴乱，亲历上山下乡，置身于社会底层；第四、政治主题和政治人物决定性地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思维，并且成为了这一代画家毕生难忘的符号资源和图式焦点——毛泽东。

丹青先生的总结可谓十分的到位，十二分的内行。

立

刻上卓越亚马逊和当当去寻找这部画册，却遍寻不见。直到今年他专门为这本书作画动笔前，我去他的画室拜访，才得到他亲笔签名的一本。同时送我的还有他的连环画《枫》。画中无辜死去的小女红卫兵——枫，我真是太喜欢了，因为她像极了那个年月里我们这帮 67、68 届的女生，其中就有这样

死去的小女孩。

《上海的早晨》这幅画我的书是用定了，可更期待的是李斌君答应的下幅画——一副顾准的肖像。此时他已经请我不要再叫他“先生”、“老师”而直呼姓名，大概因为顾准，他已引我为同道。可是我被朋友埋怨：“你知道李斌画作的市价吗？怎么就这样冒冒失失要人家白画？”天！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不懂规矩！忙再打电话过去，战战兢兢地问画肖像一般要收多少钱。这一回画家笑出了声：“我只给你用电子版，又没答应给你原图，当然免费”，弄得我抱赧不已、高兴不已。

今年5月初，从南非巡展大型油画《曼德拉系列》刚刚回国的李斌君，连时差都还没有倒过来就立刻着手《顾准》。他问了我很多关于顾准读书的细节，开始构思。他决定把顾准在五十年前那场狂暴的大动乱初起时写下的唯一一张大字报背后的意境画出来，许多当年人都还清楚地记得那张大字报上仅有的两个字——“读史”。他向我索要四卷本乔治·格罗托《希腊史》的实物照片，准备画一幅1974——就要死去那年的顾准，画中人正是在那年写下了空谷足音的华章——《希腊城邦制度》。顾准当年书写《希腊城邦制度》时阅读的一套格罗托《希腊史》是国图（当年叫北图）1869年英文原版，早已经是孤本典藏，不出借更不外借。幸运的是我两年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一套一模一样的。而另一本他借阅过的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1939年英文原版，也是孤本典藏，也是不出借更不外借，且这书连孔夫子上也没有。是国图典藏馆可爱的馆员小姑娘，一听我的目的，当即“利用职权”调了出来，拍下照片微信给我又即时归库，我一分钟也没有耽误，转手就传给了画家。

谢谢姑娘，谢谢互联网。

五月下旬，李斌传来了被命名为《顾准·1974》的画作电子稿。虽然在电脑上看初稿，我依然被震撼了。保持了李氏一贯的“文革”风格，人物和背景都沉浸在一片赭红中，那是当年“红海洋”的颜色，给人以巨大的记忆和视觉冲击。画中人那一种“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的喜悦和轻松，超脱与安详尽收眼底，呼之欲出——

“1974年2月12日，顾准下笔书写《希腊城邦制度》，乔治·格罗托的《希腊史》和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是其最重要的参考书。拖着沉痾病体，他翻译了前者‘希腊的僭主时代’

一章和后者‘罗马法和教父们’一章。12月3日，顾准离世。”

泪眼模糊中我来不及细看就转给了顾家大姐顾淑林。不到一刻钟淑林姐姐的回信就到了：

“晓林，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震撼。我喜欢这画像，特别喜欢他脸上表达的心灵的丰富和满足。衣服和背景看不大清楚，不过衣服和背景的处理似乎衬托出来了伴随负重中探索的欢乐。我的眼睛被不由自主涌出的泪模糊了。目前提不出什么意见。我很感激画家和你。顾淑林”

而我的眼泪早已在细看中扑簌簌掉个不停，和我与淑林姐姐第一次坐在一起，为她不凡的父亲，为我书中主人公，为中国的顾准流下的热泪一样。

可怜李斌君为画这副肖像真是殚精竭虑。为了赶上书的出版，在先交了初稿后又不间断地修改，从人物的表情、衣物的皱褶到背景的光线、静物的细节，无一处不精益求精，连顾准当年用的到底是何种稿纸都是请我直接向淑林姐姐求证的。到了最后更是被“逼稿”的责任编辑蒙宪君逼得开始“耍赖”，能多拖一天是一天，多拖半天是半天——彼时的顾准，精神上已经达到了无人可比的高度，可肉体却在迅速地衰败，怎样表现这种灵与肉的冲突，画家费尽心思，涂了又涂，改了又改，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毕竟上了年纪，平时十分健康，从未高血压的他竟然一度血压高到150毫米汞柱，要靠吃降压药来减轻头晕。而因为逼稿太凶已经被我尊为“蒙大人”的蒙宪君则因为要不断地跟上这些修改，血压更是一度高达200，虽然他自己没太大感觉，可确实吓坏了医生。为了顾准，大家都有点“豁出去”了。怪不得曾经与顾准共事的老经济学家张卓元先生一见画作的电子版就赞道：“确实很像”。除了“像”，更有那“神似”才是最可贵的。

今年，2015年，恰是顾准100周年诞辰。可偌大一个中国，眼下却无一处能对这位被西方学人毫无恶意地称作“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界稍稍像点样子的”、被本土知识界众口一词称作“为中国读书人挣回了些许尊严”的人物作个小小的纪念或者祭奠。忘却了他，这个国家、这个族群情何以堪？于是由最早探索和研究顾准的六位思想界知名学者发出了如下倡议信：

“XXX先生，您好！

今年7月1日是顾准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画家李斌先生为此创作了油画《顾准·1974》，王晓林即将出版的新书《顾准和他的时代》将首次刊用（见附件）。一个没有纪念的民族如同一个没有

历史的国家，顾准不应该被遗忘。我们倡议以我们大家的名义将此画捐赠给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校史展览室。偌大中国，也就只有立信——顾准 12 岁从那里开始展露天分——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在纪念他。

如果您同意这一倡议，允许将来这幅油画下方的铜牌上镌刻出您的名字，只需回复“同意”二字即可。

祝您平安、健康。

王晓林

2015 年 6 月 1 日”

我同时把这一倡议信传给了近四十位学者，上至 110 岁高龄的老人，近 60 万字的《顾准和他的时代》假如没有他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是无法想象能写得出来的，下至 70 后年轻人，这位可畏后生，顾准死去时她还没有出生，却在 2009 年写下了《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文章，直至今天还被无数的年轻人传颂。这封倡议书得到了绝大多数收信人的回应。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学界赫赫扬扬，许多人的回信除了“同意”还写来了十分感人的文字。一位近百岁老人更为我的书题写了书名——“《顾准和他的时代》 九十九叟 李锐”。而那位可畏后生，因为《顾准和他的时代》封面在责编的建议下用上了她那掷地有声的两个相同汉字、不同标点的句子，仅仅为此我也必须找到她、告诉她。或许还未走出“穹顶之下”的困惑，或许已经对被骂作“逢四逢五就要发疯的‘死妮子’”已经厌倦（“四”者，顾准去世祭年；“五”者，顾准诞辰纪年），可爱的姑娘用下面的微信回复了我拜托联系她的央台小友：

“谢谢您和王老师，我不敢冒昧顾先生，致以沉默的敬意吧，感谢。柴静”

至于其它响应倡议者的具体姓名，借用一个《顾准文存》里编辑们不时用到的词，这里就“故略”了，至于原因，也容我“故略”了吧，你懂的。除了柴静，这里已经没有“妮子”也没有“小子”，但中国的妮子和小子们应该记住、认识、了解和继承这个人。

选中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安置《顾准·1974》，是因为那里有个校史展览室，且今年 7 月将要矗立起一尊中国会计事业的始祖乌潘序伦先生和他最得意的学生顾准的雕像。我早早就将画作传了过去，学院负责人当即回电并用了和淑林姐姐一样的形容词——“震撼”。岂料一周后，在已发出了绝大

部分倡议书并得到了绝大部分“同意”的回复后，校方却突然通知接受这幅画作他们“有难度”，至于“难”在哪里？“请不要问，问也是白问，我们也不会回答”。这和当年顾准六弟陈敏之要出《顾准文集》四处碰壁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模一样。这件艺术品被赋予的重重“政治意义”也和当年那本纯工科书籍，顾准遗作——《会计原理》的遭遇一模一样。

其实将《顾准·1974》安放在上海立信学院是画家的想法，我倒是更愿意将它留在北京，和孙治方先生在一起。这一对中国知识界的“荆棘鸟”、“苦命人”之间的友谊是中国学林中长传不衰的佳话。两个一生的朋友、诤友、挚友，仅仅差了四个月不能相揖而别——顾准死去四个月后孙治方才走出秦城监狱，令人顿足扼腕。死前的顾准斩钉截铁判断“老孙出狱后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出狱后的孙治方则日日徘徊在收留了顾准骨灰的小小三里河畔。这才是男子汉之间金子一样的友谊，一场真正的“高山流水”。现在如果能让他俩四十一年后重新相聚，该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感谢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他们一口答应接受《顾准·1974》，理事长一锤定音——就和孙治方的雕像放在一起。

就在顾准冥诞 100 年的前一天，蒙蒙细雨中“他”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北京月坛北小街 2 号院。从 1974 年他离开经济所住进协和医院并在那里离世，倏忽间 41 年过去了。

孙治方先生，顾准先生，你们又相见了，又可以讨论、争论、辩论，又可以你 Refer（参考）我，我 Refer 你啦。

其余的故事就不多说了，到《顾准和他的时代》中去读吧。此书上册扉页是《顾准·1974》，下册是《上海的早晨》，时间顺序有点颠倒，请亲爱的读者见仁见智。

王晓林

2015-7-1

目录（上）

插叙：肖像画《顾准·1974》背后的故事·····	i
自序·····	I

第一部 人的命运（1915-1952）

第一章 家国时代

1. 顾家宅·····	1
2. 双五·····	3
3. 小姑私塾·····	6

4. 救国！救家！	9
5. 始自十二岁的“社会职业生涯”	13
6. 小安那其主义者	15
7. 数字天才	19
8. 来得太早的成功	24

第二章 浪漫与革命

1. 秩师、娜拉及其他	29
2. 救亡、革命与浪漫	35
3. 结社找党	38
4. 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	40
5. “职业革命家”（上）	44
6. 林里夫	47
7. “职业革命家”（下）	51

第三章 革命远不是浪漫的

1. 分裂分子、叛徒等等	56
2. “业余革命家”	58
3. 刘长胜	61
4. 初遇孙冶方，读史初念及其他	65
5. 委身革命	69

第四章 毕竟是书生

1. 没有马的戎马书生·····	73
2. 从自信尽失到身价陡增·····	77
3. 管理党产、运筹财政和接管上海·····	84
4. 大上海总税吏的履职苦旅（上）·····	88
5. 大上海总税吏的履职苦旅（下）·····	100

第二部 受判之徒（1952-1962）

第五章 老虎、罪孽、堕落与逻辑

1. 遍地罪孽·····	105
2. 政治老虎·····	110
3. “思想堕落”由逻辑论证始（上）·····	114
4. “思想堕落”由逻辑论证始（下）·····	119

第六章 你如此肯定的东西是真的吗？

1. 党校、屋檐·····	127
2. 圣者与圣经·····	131
3. 初识黑格尔·····	136
4. 从信仰式寄托到事变式变化·····	142
5. 从“一点体会”到“一篇劄记”到“一篇大毒草”·····	150

第七章 事情正在起变化

1. 无字的 1957·····	156
2. 截流之坝，蓄洪之坝 ·····	162
3. 从幻灭到泯灭 ·····	168
4. 我的社会观只能是人本主义的 ·····	173
5. 母体，或者模子 ·····	179

第八章 《试论》

1. 试述《试论》(上)·····	183
2. 试述《试论》(中)兼述“故事与数据”的故事·····	186
3. 试述《试论》(下)并再述娜拉出走·····	193

第九章 事情已经变化

1. 一定有字的 1958 ·····	198
2. 雪线 ·····	203
3. 三个问题 ·····	210
4. 灵性的愉悦 ·····	215

第十章 1959 之殇

1. 地土多润湿，丰收有希望 ·····	219
2. 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 ·····	224
3. 商城-殇城·····	230
4. 勒索与人质 ·····	232
5. 商城日记 ·····	237

第十一章 饥饿大地

1. 商城日记(1) - 劳动队	240
2. 商城日记(2) - 劳作与饥饿	249
3. 商城日记(3) - 纯粹的饥饿	255
4. 商城日记(4) - 饥饿中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262
5. 商城日记(5) - 自由了, 依然饥饿	267
6. 商城日记(6) - 饥饿令人下流	273
7. 商城日记(7) - 回家	278

第十二章 惯于长夜

1. 顾准名单	281
2. 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289
3. 妻子和孩子们	293
4. 一个雏形	298
5. 坚定不移地卑微下去	304

自序

王晓林

作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多年志愿者，2007年我下笔撰写处女作《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 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在遍寻孙冶方经济思想精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时，才第一次听到“顾准”二字。

时至二十一世纪才知道顾准已是落伍不堪，“读顾”之后忽然发现“写孙”竟是无法写下去了则

更是难堪——写孙冶方绕不开顾准，中国老经济学人皆知，可对于工科出身的我却是崭新题目。顾准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座大山，不是高山仰止的山，是一座想绕却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山。

开读顾准是在飞机上，那天空餐吃得不好。震惊之下几回掩卷呆坐，大脑一片空白，和少年时节读《九三年》、《双城记》相似。每逢至此必下意识翻到文章末页，一次次看清 1972、1973 的字样，才能接着读下去。那是何样年份？我辈那时在想什么、做什么？我们的父一辈、祖一辈在想什么、做什么？用顾准作标准，不敬地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想、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是想了也没有做——像他那样在血汗里、饥饿中和棍棒下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给中国留下一点非物质遗产，给中国人留下一点人的尊严，给中国读书人留下一点可怜的体面。还有最坏的，就是我们做了，做了无数侮辱同类也侮辱自己之举，却什么都没有去想。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没有故事的文字令我流泪，读顾准是第一次。

学者朱学勤提出过一个很尖锐的疑问：“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即使顾准确是天才，他和我们以及我们的父辈一样，成长过程大部分也是在“母体”内完成的。到他四十岁左右从“母体”中被排出，按照中国式逻辑，也是“被人误解”、“遭人陷害”，就像父辈们很多人身上发生过的故事一样，被殇情滥情的多，被分析推理的少，被逻辑思考的几乎没有。

汉民族是个最惧怕孤独的民族，百姓和读书人要的都是“摩肩接踵”的热闹、“十万人家”的扎堆，惧怕“天苍苍，野茫茫”的苍凉和“羌笛杨柳”的孤独，许多人至死都不能明白“灵魂只能独行”这样一个简单到极致的常识。顾准却是这个族群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异类。

过于出众的他没有生逢一个崇尚“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的民族和年代，恰恰相反，他生在一个好同恶异，最推崇“齐斩斩”的族群和只允许“万众一心”加“万众一声”的年代，其“行”又过于突出，即使在眼下这个已经大大进步了的年代，这位很喜欢用“睥睨”二字的读书人被“摧之”、“湮之”和“非之”也几乎是难免的，时至今日依然还能听到人们对他“持才傲物”的评价。顾准的不幸在东方几乎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那个汉民族的民族性中猥琐的成分被最大限度放大的年代。

顾准的职业生涯开始得非常早，多彩而辉煌到了夺目的地步。他的成功来得太早，这样的人生在激情和理智两方面往往很难平衡。抛开他为人熟知的青少年时期神童般的经历——中国会计学大师不谈，也不谈他 1949 年前自认为是职业革命家却被他后来的同志们所不屑的“业余革命家”历史，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作者马太一样，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仅仅止于税吏——他的党的税吏，之后就从小上海总税吏迅速沦为劳改营的一员并险些成为饿殍。

和孙冶方一样，顾准也是中国史官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分子。只因为他俩有一个异于同时代大多数读书人的特点——都精通于一种非母语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俄语，而且两人都通晓日语，这就比别人少了一道桎梏的藩篱，多了一条探索的绳索。但是孙、顾两人又都是母体内的官员，和所有的中国读书人一样，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别无他途。在这一母体内，做官就是服从，独立思考绝无可能，特立独行不啻自毁，洁身自好则一事无成，同流合污理想又成泡影。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对于顾、孙这样的读书人最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纵有顾准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以鱼死网破的勇气向这可憎的宿命一头撞了过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你仍处处可见他们的无奈和妥协。

1952 年，做大上海“总税吏”还不到三年的顾准，因为反对“全国采用民主评议方式征税”——这种在今天看来过于不可思议的“人治”手法，坚持所有企业都应依法、依率征税而被撤销职务。这个大知识分子在落入“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的屈辱境地后开始学习数学和几何学。他把这两门最容易让人掌握逻辑推理方法的学问作为研究经济的基础课一头扎了进去。不愧天才的称谓，未几他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不过很快，他就跨出了对数字和图形的迷恋——“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一步就从圆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神秘丛林跨入了历史的广袤平原，从读史，研史开始，一步步向解史——以历史解读现实进发。

看顾准读史，研史，解史的过程，就像看一个人怎样把自己脑子里的酱糊一勺一勺挖出、倒掉，腾出一块清清爽爽的地盘来接纳真和善的过程，又怎一个“美”字了得！读顾准，首先从美的角度上你就会被征服了——美的思想、美的文字、美的魂灵、美的人格，美不胜收，而他对人性的追问又是其中最美的部分。

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你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你只看到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辩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在罪恶面前桀骜而警醒并苦苦追问人性的悲悯者。

自幼即接触西方基督教文化，未及弱冠就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基督教“爱人”的氛围中，刚刚成年又任教于3所教会大学，无论从哪种角度讲，顾准都是一位很纯粹的人道主义者。他并非出身基督教家庭，从现有资料看，也未“成为”过基督徒。他的文章每每提到基督徒还会调侃地将他们唤作“愚夫愚妇”。他也曾直白地宣称自己“不喜欢基督教”。但只要你认真读过顾准，一定会留下强烈的印象就是他对基督教独特和深刻的理解。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轨迹都没有离开过对人性、人道、自然法则、自然权利——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追求和探寻，这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寻，探索，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人类大同。他认为“用野蛮的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是“多么不能满足啊”。他对社会的终极愿望是“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的、成熟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反人道、反社会行为导致的饿殍遍野、人相食的真相面前，他“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向地球宣战的战役”而立志“要做一个历史观察家”，他断言“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然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代替目前的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使命”；

面对各种各样的阶级斗争，他毫不犹豫地论断“人性最少阶级性最多就是兽性”；

直视人性被彻底泯灭的恐怖，他多次在心底、在日记中痛苦不堪地咆哮“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来审判啊”；

在剧烈的饥饿逼得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要偷东西吃的境况中，离开九死一生的劳改营，他不是额手称庆而是被“一种悲恻的情绪浸透了”；

刚从劳改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面对挂着虚缈的“人民”二字的巍巍北京大会堂发出了最锥

心泣血的哀鸣——“我永远也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这成了顾准最著名的反革命言论，也成就了的这个全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官方正式定为右派的右派。

50年代初遭受无端猜忌打击时，有人传说他走入教堂祈祷，还有人说他到寺庙去烧香拜佛求平安。所有有关顾准的传记文章都十分避讳却又不愿完全不涉及这一传说。我不敢采信“祈祷”一词，但绝不采信“烧香拜佛求平安”一句，这与顾准一生的行为模式无疑相悖太多了。但是他去这些地方感受宗教氛围却不能轻易排除，从他日后写出的关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及儒教，道教（假如你一定要把孔子学说和老子学说归入宗教的话）的精彩文字看，他不但可能去了人们传说的基督堂和佛庙，甚至还可能去过清真寺，道观或其他宗教场所。对“一神教”持极其鲜明肯定态度的顾准，绝不可能在身处逆境时临上轿扎耳朵眼般慌张到要各处去买“平安保险”，他到这些宗教场所（若确有其事的话），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去做历史的探索、宗教的探索和知识的探索。这绝非当年的人们可以理解，也不是现在的人们能轻易理解的。

几十年前基督教在中国已近寂灭，他不惜冒险以戴罪之身四处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仔细研读；在受尽屈辱与逼迫，本该“鸟将亡其鸣也哀”的1974年，他却咳着，喘着，笑着，最后是吐着血翻译了西方著名学者乔治·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一书中论述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章节“罗马法与教父们”；

他推崇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鲍尔丁的主旨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既要成为经济人又要成为道德人。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不行，没有道德调节和政府干预也不行。而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有宗教意识的，这种意识的顶尖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对生命和存在的感悟——信仰。”；

他写于1971年6月10日的日记，强烈质疑赫胥黎的《天演论》，将好听点叫“激情万丈”，难听点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定胜天”说，释为“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非仅人事，特为自然”，并斥为：“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柢悉在此”。说到此处他还嫌不过瘾，接着大加嘲讽：“此义极精，可与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又可与《实践论》中思想改造——共产主

义论相比较。”

这篇如果按照当时的“政治敌情”标准衡量，本应属于“最本质上反动”的文字，混杂在被某位后人评论为“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分肯定斗批改”的顾准文字中，当年如漏网之鱼，侥幸没有被查出和销毁，却成了今天洞察顾准世界观，价值观的最好入口。尽管顾准从未受洗成为基督徒，然遍读顾准，我还是无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思维方式和精神根基最接近的还是基督教精神，是“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过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的一种特别的，比普罗大众对基督教教义的朴素理解更加深入一步的思维和解析。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思维和解析的能力反倒可能妨碍了人对基督的接近。但往往持有此种能力的人，在肉体生命接近结束的时段所有“妨碍”会突然消失，而从前的思维和解析却一点都没有浪费——他们甚至比普通的基督徒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和祂无尽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自然和人文科学家，在肉体的生命行将终结时会不约而同地在“神圣的必然”面前，在“第一推动力”面前，在“有意义的永生”面前，在“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面前俯伏了下来。

顾准的后半生多半都是活在此非人化气氛中，社会、人群对他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就没有停止过。没有遮雨的屋檐——家早就散了，没有避风的港湾——爱人已经自戕，更没有桃花源，除非你把他最后的寄身处——风雨飘渺的经济所和自身难保的孙冶方计算在内。读他的《商城日记》，你能明白什么叫“苦难造人”；读他的《坦白交代材料》，你能明白人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难；读他的《文集》，你能明白人能将苦难转换为思想的潜力有多大。

然而他的后半生却绝不是绝望的。

他有信心，相信自己正在无限地接近真理，其思想如即将成熟的庄稼，开镰收割指日可待；他有盼望，盼望一个“以文明的方式实现文明”的“神武景气”国度和一个善意社会的出现；他有足够的爱，足够到既能爱那些爱他的人，也能爱那些嫌恶他，鄙薄他和加害他的人；他也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虽然看上去生活是那样不公平，生命是那样脆弱；他原谅和宽恕一切人，虽然有那么多的人对不起他；他不惧怕死亡，当死亡猝不及防劈面而至时，他直视它，勇敢地迎接它的到来。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顾准对承受苦难已经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须知他不是苦行僧，不是受虐狂而是一位翩翩才子，一位真正的绅士。惟其如此，这个文弱书生才堪比二千年前身陷古罗马斗兽场，伟岸挺拔的色雷斯贵族斯巴达克斯——同样深重的苦难，同样高贵的尊严，同样悲壮的事业，同样瑰丽的传奇，只是斯巴达克斯面对的是饥饿到要立刻吃人的野兽，顾准面对的是蒙昧到不可理喻的要吃人的人。

基督教并非仅仅是一个宗教或一套哲学，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一整套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大多不能迎合人的本性，它是反潮流的，罕有的，也是很难实践的。我的主人公在“头破血流”、“唾面自干”的苦难中，忍耐生成了；在忍耐中，一种生活方式生成了；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种罕见的品格生成了，它使最易滋生仇恨的土壤挺拔出最绚丽的人性之花，使最非人化的熔炉锻造出人最应该具有的形状——基督自己的形状。

很难说这不是一种信仰的胜利。

有人判断晚年顾准其实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我不敢，也无意下这样的判断。

“是一位基督徒”和“做一位基督徒”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眼下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言而喻，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懂得。顾准最终是否“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不重要，他“做了还是没有做”一名基督徒，比之前者要重要得多，前者仅仅关乎“宗教”，后者才真正关乎“信仰”。

现代神学家汉斯·孔对基督徒下过一个定义——“任何人，只要他拒绝专制，只要他指责神学家或教会头目的傲慢自大，只要他批评教会专制，批评教会与国家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假如从这个定义出发，顾准何止仅仅在晚年“成为了”基督徒，从读史，论史，纪史，解史开始并竭尽生命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知识，追求美，追求真理的他，其后半生就已经在“做”基督徒了，否则那些关于“契约”，“宽恕”，“罪愆”，“诫律”，“审判”，“悲悯”，“反偶像”，“反专制”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年轻的央视主持人柴静在《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的文章里写道：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顾准）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非常钦佩在这样的年代、在央视这样的地方还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我依然无法完全赞同柴静的提法。在人文，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知识”必是要有一个宽广度标准的，这意味着你要具有对文明进行比较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种或几种文明的知识。你不仅要知道现代文明，而且还要知道古代文明，不仅要知道东方文明，还要知道西方文明，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的原点，使你能从具象的“知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取舍，也就是“逻辑”，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否则凌乱的“知识”真的就会是“风暴中的石子”（柴静的形容太贴切了），试想，在“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风暴中，小小的石子如何能让人“扣住”而“不被吹走”，甚至“不被沾染”？更遑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知识”，许许多多“逻辑学家”和他们的“逻辑”自身就已成为了风暴的一部分，以飞沙走石的方式助纣为虐。

从“知识”和“逻辑”两个词汇辞源本源的词义上说，你还真不能将这些“石子”统统归为“假货”，不能说那个年代中国一点真正的知识和逻辑都没有。无论如何，虽没有阿姆斯特朗那样的登月，总还有上了天的“东方红一号”；虽有1959-1961年滔天人祸造成的大饥荒，总算还没有弄出1974年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那样、以屠杀三分之一国民的途径搭建起一个“猿的社会”的事情。

顾准在风暴中扣住的，决不是两颗“石子”而是两块“磐石”——宽广的“比较知识”和有原点的“逻辑思维”，而这两块磐石又都是“大山”的一部分，这座大山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换句话说，顾准的“知识”和“逻辑”之原点就是信仰的元点。

柴静也提到学者朱学勤的判断——“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大限何在？“逻辑”为何乏力？难道在这个领域顾准是唯一的天才？难道他占有了比别人多的资料或文献？难道他掌握外语的水平无人能够企及？难道那时的史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希腊和罗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两河和海上文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那还能称为史学家吗？

难道那时的哲学和社会学家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拒绝研究经验主义、唯理主义、西方哲学和逻辑学？那么中国各大学还开办那么多的哲学系干什么？抑或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都是错误或片面的，而唯有顾准当年“完全根据 XXX 宣传部给出的资料和文献”所得出的理解才是准确的？撇开被顾准刻薄了又刻薄，贬损了又贬损的郭沫若，范文澜，李亚农不谈，难道十年里就没有一位青年学子像他那样掌握了“知识”和推理了“逻辑”？难道只有他拥有一个“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保留下他这些日后直教人惊心动魄的文字？须知这是个当时有着近十万万人口的国度啊！

这些无法成立的原因，正在于这些“知识”和“逻辑”是没有元点和凌乱的。而顾准，这位幸运的、“被历史格外青睐的中国人”^{易中天语}，找到、咬定并彰显了这个元点。

这，才是“顾准交响乐”的定音鼓。

旅居海外的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在看过我最初写就的《顾准》一文后，给我打过一次很长的电话

“王晓林，你绕过梅里雪山吗？你想过人们为什么要绕，而不是翻越吗？”

“应该是‘敬’和‘畏’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就是这个意思吧”。

“你注意到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许多都是基督徒吗？”

“我注意到了。且何止是经济学家，文学艺术家、学问教育家不也是吗？但这是为什么呢？容我静下来认真想一想呵。”

对于我，读顾准不仅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精神跋涉，也是一次改变生命形态的历程。读过顾准和未读顾准，你可能会感觉到是不一样的。人，假如你还在看书，请今天就开始读顾准吧。

黑体字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版《顾准文存》。

第一部 人的命运

1915-1952

每一个瞬间，都是四万年结出的果实。

- 托马斯·伍尔夫

浪漫主义所指的个人是一种全面的个人，其独特和多面的能力仅仅能够在未来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这一未来社会已经实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价值规范。

- 戴维·麦克莱伦

第一章 家国时代

1. 顾家宅

儿时，他的天地不是很大。

曾经是 2300 年前的漂亮人物——楚国春申君的封邑、名为“申”的这块土地已经没有了地平线。他初睁的双眼中既没有无垠的大地，也没有无际的天穹，只是 70 多年前的“上海镇”、“扈读村”的渔村旧貌水乡本色还在，大大小小的湾湾汊汊，沟沟豁豁都还在，人们叫它们做“浜”或者“泾”。

他的家在申地上海之南陆家浜畔。

陆家浜，西起斜桥，东入黄浦江，算是条大浜，长虽不过 5 华里，却是原来的渔村上海，后来的县城上海，再后来的大都市上海南郊一条重要的交通干道。他出生那年，陆家浜还是条真正的“浜”——约莫二三丈宽，日夜都有油成黝色的船，撻声欸乃，静静道来又静静地去，水氤氲的双岸不经

意间就生出来参差十万人家。随着十来座青色白色的小石桥渐次拱起，水，岸，船，屋，人就渐渐成了气候，是为人间烟火，成了人居领地——上海的一部分。

陆家浜和它周围星罗棋布的浜、泾、浦、汊，汇一样，像一纸用去上百年光阴慢慢涸涸开来的中国画，既无波澜又不壮阔，满纸都是盎然的生意和精巧的生趣。

陆家浜畔有个顾家宅。

40多年后当他作“历史交代”时写到自己的家事，说自己的出生地是“陆家浜的顾家湾”，这和事实也许有些出入。

从1910年商务印书馆绘制的上海县地图到2012年上海市测绘院编制的最新城区图看，座城市里叫“宅”，“弄”，“浜”，“泾”或“港”，“浦”，“塘”，“汇”的居多，叫“湾”的甚少。眼下已是城市中的城市，中心区的中心的陆家浜，就算在他出生的那年也已经繁华不堪，而绘制于1910年的地图上，陆家浜一带就都是宅、弄、浜、泾、港、浦、塘、汇而无湾，5年后更不会改成“湾”了。他之所以把“宅”写成了“湾”，有一种可能是他青年时在苏南苏北呆过不短的时间，那里的“湾”可就太多了，他也就想当然把“宅”记成了“湾”，不过还有另一种更大些的可能性：

假如他在“历史坦白交代”中写上“顾家宅”三个字，那是很危险的——既然你出生在“宅门”里，且是你的本姓之宅——顾家宅，那你的家庭铁定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是在朝阶级的敌人，你就

注：本书凡无前文说明或注明出处的黑体字，均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版《顾准文存·自述篇》；凡有上标字“年·月·日”者摘自同版《顾准文存·日记篇》，凡有上标字“笔记”和“文稿”及页码者摘自同版《顾准文存·笔记篇》和《顾准文存·文稿篇》。后不赘述。

是敌人的后代。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要命的是你从前在一切表格上“出身”一栏填写的“城市小手工业者”一项，都是在“欺骗组织欺骗党”，罪莫大焉。至于那时的上海就是个在从渔村演变为都市的过程初期，就像今天的“翠花”还没来得及改名“薇薇安”一样，是个遍布“某家宅”土气名号的都市，这种情况是没有人会去考证和理会的。命令他写和看他写成的“坦白交代”的人也很少有上海人，其文化和

文明的程度和他相比，都是无法望其项背者。或者即使是上海人，也不会为他这样的“阶级敌人”去费心思取证，更不会去考证此“顾”是否彼“顾”，否则岂不是在“阶级觉悟”的程度上与他同流合污了？出生在“顾家宅”本身就够倒霉的了，偏巧自己又姓顾，在那个“泥腿子”地位远远高于“书呆子”的年代，纵使你浑身长出一千张嘴来，也绝然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

而“顾家湾”就大大地不同了。

这是个极易令人联想到“贫农”，“贫民”的名词，如同北京的龙须沟、二里沟两侧的居民，那是最有可能成为领导阶级的人群。“宅”或“湾”，在那个特别暴戾怪异和莫名其妙的年份，有着非同小可的区别。他把“宅”弄成了“湾”，也符合他“不怕事但不找事”的性格——犯不着为一个根本和对方无法厘清的，无意义的字眼去纠缠，浪费大好的生命时光。

在那个无利可趋，却有无数的害在前，人人、时时都必需去避的年代，“湾”或“宅”孰轻孰重，孰利孰害，大家都明白。他的出生，应该是在“顾家宅”而不是“顾家湾”。

他出生时，上海已经很不简单，中国之最终被书写历史者定性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怎么也得有一大半拜上海所赐，且这些书写者也大部分出自上海，书写于上海，成就于上海。只是他出生时，这些书写者都还非常年轻，这个书写也还没有开始。

他生于1915年7月1日，这很宿命。

当然那时中国还没有7月1日这个节日。6年后，一个“党”在距他的顾家宅不足3华里处的一座李家宅诞生。13岁上他认识了这个党，他与她缠绵纠结了一生——19岁“被征求”入党，37岁被党排出母体，43岁被党彻底开除。直到他59岁离开人世，党也没有再对他转过脸来，他也从未起过再投入党的怀抱的念头。就算最后无缘于党、“自绝”于党的16年，他与这个党的缠绵纠结依然未断绝，只不是在一般人理解的一般意义之上，而是在科学，史学，人学，党学，哲学，宗教学的意义之上。这种缠绵和纠结被后人或品评、或论断、或思索了二十多年，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仍有许多的未解之谜。

话说回来。虽然党的诞生肯定不是从7月1日开始的，就算最新的《党史》也没有这样的描述，

但因为党的最终“成就者”的最高领袖在17年后的一句话——“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就决定了这个日子将成为全体中国人的节日。而他出生在7月1日却是如假包换的。

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具有“子嗣”资格、可传宗接代的男孩，却可惜不是“嫡出”。父亲一方已经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儿一女和他同母，男孩出生就夭折了，他是父亲一方第八个孩子，第七个活下来的孩子，第五个男孩子，母亲一方第三个孩子，第二个活下来的孩子，第一个男孩子。

一落生他就被唤作“双五”，包含着“两房兼祧之第五子”的信息。

母亲一方坚持要这个头生子随自己姓顾。此事陈、顾两家有“君子协定”在先——陈家大房是他的亲姨母，长他的母亲6岁，两人原是顾家的一双姐妹花，姐姐是明媒正娶的正房，而妹妹生他时却连个“侧室”的正式名分都还没有，顾家明显是吃了亏的。为弥补这一亏欠，妹妹的头胎男孩必须姓顾，不容商量。陈家纵有一百个不愿意，无奈是后于顾家从“乡下”苏州迁至“城里”上海、没啥根基的“农转非”，也就算是刚刚混上个“书香门第”的名分，加上没孩子时承诺在先，现在反悔岂不是要背上“言而无信”的黑锅？

吵吵嚷嚷中，孩子必须姓“顾”的声音渐高，陈家终于屈服了。

再平常不过的上海陆家浜顾家宅，多了条再平常不过，连姓什么都不好确定的小生命。

2. 双五

娶下这对姐妹花的男人名叫陈庆华，字文纬，苏州人，父亲陈仰峰是个染坊工人，40多岁就死于吸食鸦片，丢下妻子和包括庆华在内的两儿两女。父亲死后，刚刚成人的大儿陈蓉生顺理成章成为家庭生死存亡的决定者。“不是闯，就是死”，他选择了前者。

凭着年轻，陈蓉生一头撞进“隔壁”同样年轻的大城，跟着稔熟于棉花生意的苏州乡亲前辈做起苏沪之间的棉花转贩生意。他算是踩上了命运和弦上升的拍节，棉花转贩生意迅速成功，不仅自己很

快安身立命，还有能力从苏州乡下将一大家子人——寡母和弟弟妹妹们接入大上海城里同住。更甚者，他还有能力策划弟妹们的未来人生。

他让弟弟陈庆华和自己一起做棉花生意，却一手把两个妹妹都送进了沪上最著名的基督教教会学校——清心书院。他的视野之开阔，已不可与父祖辈们同日而语，仅仅是“送女孩子读书”、“读教会学校”这两条，这一步的跨越有多大，稍微懂得点中国的人都咂摸得出来。

上海开埠于 1843 年。专制统治根深蒂固的中华帝国版图上崛起的这样一个“非我族类”的资本主义野小子，已经把惊世骇俗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连“大清朝”对它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大概除了传统之说——“腐朽清廷对帝国主义的惧怕”之外，更不能排除的还是“腐朽清廷”上上下下对它打心眼深处，说不出口的喜欢。芸芸众生对它的趋之若鹜就更不用说，陈蓉生不过是鹜中一只罢了。他们的父辈们仅仅接受了开埠带来的鸦片烟就纷纷为此丧了命，他们却头脑清醒地远离鸦片，同时占尽大清国门初次洞开吹进的一切清气香氛并从此结束了几千年祖祖辈辈做井底之蛙的宿命。

马克思先生说，“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革命先哲对东方伟大华夏帝国的这一论断虽有些不敬，倒是很贴切。陈蓉生们就是从“世袭的愚蠢”朦胧中初醒过来的第一代。他们接受了比鸦片高明得多的精神产品——农商、工商文明规则，还有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女子问题上，她们不再是“无才便是德”的赔钱货，只要她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洋文，通晓西方文化，能和西人打交道，就也是“光宗耀祖”的宝贝。虽然日后许多陈蓉生们也哀叹夷人收获了坚船利炮得不到的东西——人心，却并不妨碍那时、后来和现在的他们争先恐后把女儿、妹妹们纷纷送进教会中学、教会大学进而送出中国，让夷人再接再厉地以“学战”之术接着去俘获这最要紧的战利品。

天下万事关联，万事有定时，每一个瞬间，都是四万年结出的果实，陈蓉生——他命定要做一位名叫“顾准”的人的伯父——在 1890 年前后把两个妹妹送入清心书院，这个“瞬间”会结出何等果实，至此还无法预知，弟弟庆华还小，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子嗣，谈何侄子。

但侄子终归是会来，而且已经来了，他就是双五——顾准，在母家的坚持下，父家唯一妥协随

了母姓，同时被读书人父亲赋予了一个大气响亮名字的男孩子。顾准的出世有一点点传奇的味道，虽然在传奇实在是太多的大上海简直就算不上传奇，但说说也无妨。

略显不敬，首先我得说这孩子确实是爱情的产物，这就是“有一点点传奇味道”的意思。既不是包办、强迫婚姻，因情而生的孩子又不“野”，这在彼时的中国不能算不稀罕。

陈庆华于1900年在27岁上娶了顾家21岁的大女儿为妻，是时小女儿顾庆莲还是个情窦未开15岁的“小姨子”。5年后，姐姐已经诞下两个儿子。一天，妹妹在探望姐姐时突发急病躺倒在姐姐家里，得到谙熟黄岐之术的姐夫陈庆华的医治和照料。已经20岁还未出嫁的庆莲情愫暗生，爱上了这位大她12岁的姐夫。

彼时的上海再“异类”，还异类不到实行日耳曼民族那样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他们顺理成章地同居了，姐姐不反对，岳父岳母也不反对，条件仅仅是“生了男孩要姓顾”和“要为无嗣的岳父母送终”。这样的条件对恋爱中的男子何成其为问题！只是热恋中小姨子的身份连个“侧室”都忘了立，两家倒也不在乎。就这样直到五年后庆莲第一次怀了孕，这才想起把她“非正式地纳为侧室”。

男孩生下来就夭折了，连姓陈姓顾都来不及处置。次年生了个女孩，天经地义姓了陈。

他们依然相亲相爱，却也并不妨碍正房的顾家大姐接二连三地又生下二男一女。直到又过了三年，双五——顾准出生，顾庆莲才算是正式嫁给陈志庆成为侧室。双五无疑成了辖制陈家明媒正娶顾家次女的砝码。

可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顾准出生前后几年，陈家出了一连串的坏事：先是大房顾母因一次意外，受惊吓而亡；继而陈家经济的顶梁柱、伯父陈蓉生因棉花生意过于劳累和棉绒对肺部的侵害而故；紧接着已经出嫁的陈家大姑母亡故。

半成人的哥哥们把这些灾难都记在了顾准父母婚姻的头上——是他们“名不正言不顺”的婚姻给家庭招灾致祸，弄得家道败落。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姐夫跟小姨（子）的恋爱。小时候父母亲吵架，父亲跟我们说过，什么母亲生病，父亲为她治病的事也许这就是他们结合的开始。看来外祖父母知道后，木已成舟，母亲就正式成了父亲的侧室，但订下了条件：（一）为外祖父母养老；（二）顾家无后，母亲生下的男

孩子一律姓顾……我的弟弟们因为陈家的异义，不按原条件姓顾，一律姓了陈……这是一个互相埋怨，纠纷无穷的家庭，我的哥哥们指责我母亲和父亲的婚姻，说我大母是因为我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忧郁而死的，指责外祖母，母亲和母亲所生的孩子们吃穷了这一家……家愈穷，纠纷和吵架也愈加无穷无尽。”

顾准写这段“历史交代”是1968年。在一个有着“为亲者讳”和“家丑不可外扬”传统的族群，多少大户人家的子女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指认是“小老婆”生的。顾准的“坦白”真是太天真太坦白了。他确实是“小老婆”生的，但却是成熟的（父亲42岁，母亲30岁）有爱的父母诞下的宁馨儿。他的聪明也许得之于此，但他的智慧却不一定得之于此。

很难否认，世间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其智慧具有“天赋”的特性。英文中对“天才”一词有“Talent”和“Genius”之分。有一位曾和顾准有过长期接触并精通英语的朋友曾这样讲到顾准——“他无疑是个‘Genius’，其天分是上苍的‘Gift（礼物）’而不是靠后天努力而达到的‘Talent（才干）’。少数人的这种资质是芸芸众生很难企及的。”

天赋，古希腊人称之为“健全的智力”，是一种超凡的特质。拥有这种特质的人，不需要艰苦的训练，成功轻而易举。顾准日后在天赐般的启示下形成的激情和理性以及在无意识中将这种天赐视为责任，注定了他生命历程的异常艰辛和光荣，他也因此具有某些先知者的特性。直到今天，人们谈到他时，“先知”依然是个用得相当频繁的名词。

3. 小姑私塾

小双五——顾准在5岁上被送入“姑母私塾”启蒙。这位姑母塾师，正是被颇有远见的大伯陈蓉生在近30年前送去清心女中的小妹妹——陈庆志。

清心女中衍生于1860年由北美长老会派遣中国的四位传道士创建的清心堂。“清心”二字受启发于《新约·马太福音5: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最初的堂址就在陆家浜的娄理瑞牧师家中。1860年2月的第一个礼拜日，三位美国长老会信徒和一位华裔信徒正式立约，

创立了“上海长老会第一会堂”，这就是清心堂。

建堂之初，这里收留、收养流离失所的青少年，以耕种园圃、缝纫纺织来解决自用衣食，半工半读。后来开始聘请教员编制课程，清心堂也由此改名为清新院，即后来清心男中、清心女中之始。书院当年9月开学并有了自己的第一座礼拜堂。第一名注册的学生名叫朱祝三。

从各种顾准年表推算，顾准的两个姑姑被送入清心女中是在1892年左右，是时清心已创建三十多年，是上海名望极高的教会学校，姐妹俩入学年龄应在14-17岁之间。虽然顾准自己说姑母们只是“非正规地”在清心女中上过两年学，但从她们日后双双嫁给最早把基督教文明引入中国的明末大学士徐光启第二十三代嫡孙、清末民初开办洋务的徐徵山、徐仰山两兄弟，从姑姑们有能力独立开设私塾看，她们的“学历”应该远不止此。

小姑母庆志到底在清心呆了多久，实在因为事件横跨3个世纪而很难查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她和姐姐在清心一定接受过基督教教育并成为了基督徒。据1936年夏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当年即在清心堂受洗并开始侍奉，直到1994年才退休的陈蓉生老牧师《清心堂沿革》一文记载：

“清心堂自1860年成立之日起，学校与教会因人事兼职，几乎不分彼此。书院逐渐发展，后改名为清心实业学校，注重半工半读，特别注重培训印刷人才……后又改名为两级中学，分男，女校，在陆家浜道桥畔……信徒先后收录二百数十人。……从清心书院女子部到清心女中，逐渐成为沪上的一所贵族式学校。据不完全统计，自1890年到1910年的20年中，男校的毕业生共240人，其中受洗信徒有147人，而女校在此20年中，也有109人成为清心堂的信徒，在后来的岁月中受洗的学生相应地就更多了。”

由此看来，他的两个姑母不大可能“仅仅在校读书，并未成为教徒”，更何况顾准的小姑父徐仰山至死都是一位基督徒。

1920年，5岁的小顾准被父母“依照旧规”送到小姑陈庆志处的“小姑私塾”。

既然是“依照旧规”，此私塾存在时间肯定已经不短。到了小顾准被送到“姑母私塾”的1920年，小姑母庆志大约是40岁左右，推算该私塾至少已经办了15-20年。教会学校毕业生办西学私塾，在中国还是个无人考证的题目。有本《顾准全传》说到“姑母私塾”的课程表，除了教会

文化、西方文化、算术、地理、英文等，还想当然地列上“必读的儒学启蒙读物”，却一字不提《圣经》知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历史知识。这与事实不符。

“姑母私塾”的课程既有教会知识必先有圣经知识，既有西方文化必先有基督教文化，这是常识。而以开讲西学启蒙的学校，尤其是由基督徒创办的学校，教授国学有可能，但以“儒家学说启蒙”就比较可疑了，因为这是两种差异巨大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仅仅“性善说”和“性恶说”就无法调和，耶孔同堂用于儿童启蒙教育，可能性微乎其微。

与各种记述顾准的传记文字相反，在清心堂侍奉了一生的陈蓉生老牧师在他全部的回忆录里，只字未提清心女中那些著名的基督徒毕业生，如参与创建中国第一所儿童医院的留美儿科专家、儿童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苏祖斐，和宋美龄为美国卫斯理女子大学同学，后长期任其秘书的张霭真，著名艺术家霍希贤，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高芝兰等，而是反复提到众多不知名的教友，尤其是男女青年们——他们的受洗皈依和各种团契、事工，提到他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还提到清心堂和“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的、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鲍咸恩和鲍咸亨三兄弟之父鲍华甫就是早期清心堂的义工教师和传道人。1910年为纪念他，儿子们捐资在清心堂旁边建立了第二座礼拜堂——思鲍堂。商务印书馆也是中国最早开印和发行《圣经》的出版机构，1895年印刷了《新约圣经》，由中国基督教妇女呈献给慈禧太后。

清心堂信徒中出了很多人才，尤其在印刷业，出版业，教育业和文化业上为中国贡献了一批可圈可点的人才。

一个如此成熟的教会学校——“清心女中”，其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庆志姑妈”会有何样的信仰和文化基础，可想而知。由这样的“姑母”灌输给5-7岁的小侄儿顾准何样的信仰和文化基础，可联想而知。看到“私塾”二字就断定必会教授“之乎者也”者，未免有望文生义，你看清心女中起初不也被叫做“清心女塾”吗？

小顾准被送去“启蒙”的年龄段是5-7岁，这个年龄段所接受的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会起到

什么作用，用不着请教幼儿教育家，看看自家的孩子，普通人就能明白。顾准在这里学到的，不会是什么“日后必读的儒学启蒙读物”，也不会仅仅是初级的算数和地理，而他必定会接触的，则一定有《圣经》，有基督教教义，有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按照当时此类学校的一般规律，小顾准的课程表至少应该包括：背诵《圣经》片段和章节，教理问答，赞美诗和诗歌等，凡了解基督教常识和教会学校常识的人都明白，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小姑私塾还有一项极为重要、对顾准一生作用非同小可的课程，那就是英文。

纵观顾准一生，算上这两年“小姑私塾”的启蒙，五年“留云小学”、两年“中华商科学学校”的正规学校教育，他没有再接受过其他科班训练，除非你一定要把1943-1945年延安的“半工半读”——一边做“延安整风”（后文均简称为“延整”）中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一边做陕甘宁边区的会计，以及1955年-1956年他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已无任何公职的“脱产学习”算作是科班教育的话。而后两者在“外语教学”上肯定为“零”是不必赘言的。

顾准一生全凭自学所达到的英语水平非常人可比，它相当完美，且不是专于一门而是涉及多门学科——至少在经济学，数学和历史学三门学科上。这三门学科他不但在母语上而且在英语上做到了融汇贯通。晚年顾准曾不无得意地宣称，他，“是可以拿三个博士学位的”，指的就是这三门。

顾准的早慧和天才固然不能排除，但他英文童子功练就于小姑私塾却是不容置疑的。从他10岁即从小学跳级考入商科学学校，12岁入职中国首创的会计师事务所——潘序伦事务所，13岁操持事务所夜校杂务，15岁站上夜校讲台，17岁任事务所“校务部”主任，19岁作为主要作者与老板潘序伦以及其他同事合作出版中国第一套会计学丛书，同年出任三所教会大学会计学教授来看，他的英语基础一定非常扎实。

小顾准在他的“小姑私塾”仅仅呆了两年，和他五十九年的生命长度相比很短，却非常关键。顾准和这位庆志小姑母有着非同一般、超乎姑侄亲情的关系，他们精神始基上的一致或相似，是有据可考的。

顾准写于 1968 年的坦白交代材料——《我的家庭关系和少年时代大家庭生活——历史交代

(一)》之 VIII——“附带交代一下全部亲戚关系”中这样写道：

“……（很久以来）顾家在苏州的亲戚简直断绝了往来……父亲弟兄姐妹四人，伯父死后……伯母住在苏州，和我家绝少往来……伯父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 1934 年后就毫无往来……。另一个……简直没有往来……。1949 年我回上海后，这位堂姐来过我家一次，我未回访，以后也无往来……。大姑父续娶后很少往来……”

但说到小姑母庆志，他却一反常态：

“……1940 年我离开上海前，一直来往……小姑母只有一个女儿，表妹夫是医生张秀彬，现在苏州医学院，1949 年回上海后和她们还来往。1953 年我来北京后无往来，……1962 年我出差上海时去苏州他们家探望过小姑母。”

1962 年正是顾准精神上最为苦闷的岁月——国家刚刚经历人祸浩劫，无数生灵涂炭，自己被开除出党，劳动改造，差一点在劳改营成为饿殍，妻子不相信不理解，儿女叛离，母亲埋怨，百事不成。作为一个人在最应该消沉的时候，他却在年纪至少已过 85 岁的庆志小姑母那里找到了倾诉的对象。他和姑母，堂妹以及姑母那同样被打成右派的女婿抵膝执手谈至深夜，直到低吼出“老和尚不出来做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当事人口述}这样足以被取命，对爹妈老婆都绝不能出口的“极端反动”声音，把小姑母一家人吓得半死。

还有一个细节也比较耐人寻味：

1935 年 10 月，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顾准奉命携妻子汪璧火速离开上海，流亡北平。按照中共地下党的铁纪，这是“上不能告父母，下不得传子孙”的党的秘密，除了已经“在党”的六弟陈敏之，他守口如瓶，连潘序伦那里也没有露出半点口风，弄得潘老板满腹狐疑，甚是不悦。可偏偏，他俩要去向“二级亲属关系”的小姑庆志辞行。

深夜，顾准汪璧来到小姑家中，不慎吵醒了未满十岁的小表妹徐文娟。虽然听不懂他们和妈妈都说了些什么，可两人一身电影明星才子佳人的装扮却令小姑娘惊喜不已，终生难忘。

颇早就开始探索顾准的学者林贤治先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谈到死后的顾准：

“对于他，人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光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

用去这许多笔墨考证清心女中，姑母私塾和小姑母庆志，目的在于寻找顾准五十九年另类生命历程那簇“初燃的纯净的蓝焰”，或者干脆不如说，他的“病根”。是为“人有病，天知否？”

4. “救国”！“救家”！

顾准的童年和许多日后“革命了”的中国读书人的童年十分相似，但又和他们有较大的不同。在5-7岁这个人生关键时区，顾准接受了一种在中国不多见的、博爱的教育——基督教文明的教育。不过这一点也没什么过于与众不同——和他同时代的革命书生们也有很多毕业于教会中学或教会大学。真正与众不同的是，由于他罕见的心智和天赋，令这种文明所包涵的信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不自觉地保存了下来，而大部分和他有相同经历的同辈，在接受新政治信仰的热情中，因为要表明和旧时的一切决绝而将这文明所包涵的信息不自觉地匆匆否弃，或自觉地、弃如敝履地彻底抛弃。

“我于1920年在小姑母的私塾读一、二年级，1922年转入留云小学上三年级……五年级时越级考取中华职业学校的初中商科，那时正好十岁。”

顾准的幼、少年期，中国不大像一个主权国家。北方墙头不停变幻的大王旗和南方街头纠纠缠待发的革命军，都令这座蜂巢般的大都市惴惴不安。昨天孩子们还在对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唱“亚东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今天就得对着“红黄蓝白黑”改唱“卿云烂兮，紉纁纁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而明天可能又得唱回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好在中国人早就熟悉和惯于这样的生存环境，惴惴归惴惴，生活总还是要继续。

1919年，以一个符号——“五四”所框定并被定义为“启蒙”的中国文化运动在双城北京、上海同时兴起。

在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师夷之长到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再到推翻异族皇朝的辛亥革命，中国知识阶层在几十年的迷茫后，好像又看到了新的出路。欧洲流传已久的各种主要社会思潮，给中国带来了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倒是八年前刚刚立下的“国策”——三民主义

显得不大摩登，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在朝”之故，摩登人物是不屑于“在朝”之物的。不过这也无可厚非，“抗衡在朝”原本就是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

春夏之交，救亡，启蒙和文艺复兴的呐喊声交汇轰鸣到了最高潮，旧的政治组织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政治主张纷纷出现，这令无数青年读书人兴奋莫名，热血喷张。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各擎大旗，“德”、“赛”两大先生终于以两千五百多岁的高龄（以古希腊雅典民主与拉丁文 Scio 为其父计）在中国首次登场，热闹非凡，之后则是长至今日的对“五四”符号所代表的“问题还是主义”，“文化还是政治”，“救亡还是革命”，“启蒙还是倒退”……无休止的争吵。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

“（至少）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千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

这未免过于具象。思想家殷海光先生说：

“那个时代是‘大动乱的时代’，动乱源于文化冲突，中国文化传统已经连根摇撼，外来思想文化狂风暴雨般袭来，使得知识分子目眩神摇，无所适从。”

这未免有些悲观。革命家毛泽东先生说：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未免有牵强、夸大其词、煞有介事之嫌。反革命家蒋介石先生则说：

“五四运动造成共产党做大，最后政府只好退到台湾。”

这未免同样有牵强、夸大其词并推诿之嫌。

“五四”和小双五确实差不多同龄。有文章说小双五“诞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最精彩的一个阶段”，甚至将他称作“五四之子”，不能不说也有上述“未免有夸大其词和煞有介事之嫌”。来看看小双五自己的陈述：

“五四运动的曙光还没有透进中小学的课堂，小学里国文教师殷亚华（他后来是同情掩护我们的地下活动的）还以《非非孝》（即非难五四运动中反对孔老二的孝道即“非孝”的主张）为题要我们写作文。”

这是 40 多年后顾准在他的“坦白交代里”谈到“五四”的仅有的一处文字。

八、九岁的小顾准反“五四”的《非非孝》写得怎么样不得而知，但两大“先生”在他心目中是怎样树立起来的，遍读他的文稿文存，能直接和“五四”连接得上的还真是难觅。关于民主与科学的思考结论，大部分还是他在被“排出母体”后精心，静心观察社会，发愤读史、独立探索的过程中得到、并且几如天赐地达到了在科学（包括政治科学）、哲学（包括政治哲学）与宗教学（包括政治宗教学）上惊人的融汇贯通，达到了在这个闭塞国家和那个闭塞时代无人企及的高度。

1946 年，胡适在北大讲演时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并进一步解释说，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依然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反对五四”的“五四之父”这番话，倒是解读顾准的一条通幽小径。

接着是另一个符号——“五卅”的出现。

1925 年，顾准已经 10 岁，比起“非非孝”时的懵懂，他已经有了参与生命的意识。

“五卅运动中我们曾经拿着竹筒，扛着旗帜，为罢工工人捐过款，但是五卅的枪声我们没有听到（我家住在南市的南面），五卅以后的大罢工也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到法租界上去，家里还点煤油灯），当时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竟没有在我这个孩子的脑袋中留下过什么印象。”

无独有偶，是时上海街头扛着红旗拿着竹筒的人群中还有一位英俊的无锡少年——孙冶方。这位刚满 17 岁却已经做了两年无锡国、共双党党支部书记的老革命是否邂逅过稚气未脱的小顾准，无法得知，可从两人 14 年后在上海“孤岛”相遇开始直到四十九年后顾准离世才结束的友谊，却是中国学苑书林经久不衰的传奇。

孙冶方们募到了几大木箱的铜圆，小顾准的竹筒多半也会盛满的。他的小脑袋估计还装不进诸如“反帝救国”这样抽象的东西。

竹筒，红旗，人群虽然具象，可还有更具象的东西要他操心，那就是家庭愈演愈烈的贫穷困

窘。父亲陈庆华已经没有任何途径从外部获得物质上的支持，精神已经垮了。顾家从宽敞的“顾家宅”搬进价贱的南市南边，房子狭窄了，包车没有了，“父亲经常整天不出门要我和二哥拿东西上当铺，然后要我们去买酒，喝了酒和母亲吵架。”

愈来愈无宁日的家成了互相埋怨，纠纷无穷的渊藪。这给少年顾准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他很爱自己的这些同父异母哥哥，尤其是三哥陈怀德，他几乎是崇拜他。可就连怀德，也并不尊重小顾准的亲生母亲——顾庆莲。到顾准同父同母的弟弟出生，陈家已经决绝地背弃了“生男姓顾”的诺言，六弟只好起名陈怀如（后来自行改名陈敏之），好与哥哥们整齐地排行。

小双五——顾准，成了陈家唯一姓顾的孩子。从家庭细胞开始，这孩子就是个异类。

上年，一家之主陈庆华在哥哥扶持下所开的棉花行宣告彻底破产。随着陈家三个最主要成员的离世和最后一个小儿子陈吉士的出生，他再也维持不下去拥有十个子女的大家庭了。这个男人选择了离家出走，一甩手躲进寺庙，做起悬壶济世，积德行善的居士，任妻子和孩子们自生自灭。

这也是许多中国男人们除自杀之外能够选择的最好出路。陈庆华是个倒霉的丈夫但却是个幸运的父亲。多舛的命运和困窘的生活没有把他的孩子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相反却促使他们个个知发愤，争图强。从 1902 年出生的长子陈怀农到 1926 年出生的幼子陈吉士，十个孩子，无一例外，也包括他那唯一随了母姓的小双五——顾准。孩子们对追求新知的巨大热情和超出常人的悟性，不能说没有父亲的一份遗传，这也是顾准一生为之骄傲的，虽然他要在这层骄傲上涂上种种今人已经不大看得懂的“保护色”，但“精英”意识的“马脚”往往还是因为涂抹得不甚干净而漏了出来：

“……因为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的纠纷，使我在家庭中处于卑微的地位，这是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因素。然而这种家庭环境，截然不同于深受压迫的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庭环境，这决定了我内心深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所有的亲戚都是机关，学校，部队的工作人员，按其性质全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革命彻底性比我高得多，但对我本人来说，‘全部都是知识分子’这一客观事实在我思想上确实助长了轻视体力劳动，助长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的作用。”

要说时年已经 53 岁的顾准先生写下上面这段“历史交代”是出于发自内心的自卑或自鄙，

诚难令人置信。

孩子们的出息，往往是从“救家”开始的，尚且不懂救国为何物的顾准，早早就知道了要救家。放下红旗竹筒拿起算盘、笔筒，10岁的他连跳两级考入中华职业学校。接下来的两年他随时顶着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威胁，靠着母亲和姐姐无日无夜的辛劳和珍惜他的老师倾囊相助，小小的职校生居然在两年后又破格考入中国最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从月薪12元，端茶送水倒痰盂的小练习生做起，3年之内做到事务所附属夜校的主任，是时顾准年仅15岁。

38年后的1965年，顾准六弟陈敏之曾有

“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
为觅衣与食，独立负重荷。
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护。”

之句，感怀五哥救家、救母、救弟妹的恩情。“国”救不救得成姑且不论，小顾准终于可以“救家”了。

5. 始自十二岁的“社会职业生活”

“1927年7月中旬，我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正好12岁。”

从学徒开始的人生，古今中外都算不上稀奇。看中国老革命谭震林、老反革命杜月笙，看俄国的高尔基、英国的法拉第，都是学徒出身。可像顾准这样把“学徒生涯”称作“社会职业生活”且从12岁开始，还真不多见。上面这段话，摘自他四十一年后写就的“历史交代”，题目是《1927-1934年的社会职业生活》。须知1927年开始“职业生涯”时，他连十二岁都还未满。

顾准的东家、掌柜的可不是个一般人物，他是中国会计的始祖鸟，中国现代会计学百年第一人。潘序伦，江苏宜兴人。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被保送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会计学，两年后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1924年以经济学博士衔被

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暨南大学聘为教授。1920-30 年代，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批完全不同于农耕文明产生的流通型商人，也不同于洋务运动产生的“红顶商人”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上海、天津、江浙、四川一带出现了。在中国这个“几千年来志不在此，不仅不能生产，而且一向无意于生产，即使上溯一千年也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新旧之间不能衔接，所有因素都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黄仁宇语}的国度里，他们创建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新式生产联合体——冶铁，盐碱，棉纱，桑蚕，纺织，面粉，电话，轮船，化工，火柴，水泥，煤矿……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很西化的名字——企业。

面对如此日渐复杂的经济活动，长袍马褂瓜皮帽，眼镜算盘长指甲的“钱粮师爷”、“账房先生”们早已无法适应，迅速发展的民族工商业迫切需要新式的会计人才。潘序伦独具慧眼看到了这种历史发展的需要，于 1927 年辞去两所大学的教席创立了中国第一间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刚满 12 岁的顾准由他的老师，潘序伦好友王志莘的推荐，被潘老板第一批雇用。

仅仅读了两年职业学校，中途还一度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这个 12 岁男孩，把进入事务所当学徒看作是“救家”无可推脱的责任。世道不会给他这样的孩子任何淘气和任性的机会，进入“立信”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家，还求什么？

端茶倒水，扫地抹桌倒痰盂，给东家到夜壶，他都干了。这原是做学徒的本分，人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可几十年后他把这一段称作“社会职业生活”，是否有点夸张呢？

你可再来看他干完了这些还干了些什么，就知道他是不是吹牛了：

“除当练习生应做的给客人倒茶，到银行送款等杂役外，有些公司注册和商业登记的正式业务也让我办……抄写，跑腿……中文打字，英文打字……当过本所会计员，查账助理员……抄刻钢板讲义，专任编辑助理……联系出版，跑印刷所，校对……编写（夜校）‘习题详解’……做函授教员……”

顾准的早慧是惊人的。潘老板早就看出，把这个小家伙单纯当茶房用绝对可惜了。除了像所有的东家对学徒一样交下来数不清的杂役之外，他还给了他学习的机会。

13 岁读了半年的簿记，小家伙的名字居然上了“本校职员通讯录”，虽是叨陪末座，且是唯一一个既无通讯地址也无电话号码的“职员”。可他毕竟才 13 岁呀。

14岁，他上了掌柜的台盘——被潘序伦“破格擢升”为事务所所办夜校的“助教”。除了不敢让这么个小东西直接上夜校讲台去给成年人上课，其他什么事务潘老板都敢放手让他去干：银行业务，注册商标，商业登记，税务，夜校教务，编译印刷……几乎事务所所有的核心业务小东西都有参与。

真真是“人小鬼大”。不敢上讲台，那就做函授教员，不见面，谁能知道他多大？小东西“屈尊”教了一年函授——编教材，出试题，改卷子，打分数……谁也不知道他们的“顾老师”是个什么模样，学生们乖乖地在老师的带领下完成作业，循序渐进。

15岁，小东西通过“竞选”当上了“立信同学会”的负责人。潘老板和他自己都觉得可以“出台亮相”了。可当他第一次自信满满从函授的幕后走上讲台，立即被学生们轰了下来：

“凭什么弄这么个小孩子给我们讲课？个儿还没讲台高！阿拉出钱上夜校，就拿个这么个小孩子哄人？！”

16岁，他长高了。挺挺胸壮壮胆，他又一次站上讲台并下定决心，任学生们再起哄也绝不下来。一张嘴，大他许多岁，高他一个头的学生们服了气，此“顾老师”可不就是彼“顾老师”吗？再起哄未免太“拎不清”了。

他稳稳地站上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夜校”的讲台。不仅如此，他还拒绝照本宣科讲别人的东西——在这个领域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需要有人创新，他赶上了，就要做创新者——他使用自己编写的讲义！

两年后这本讲义正式列为立信会计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印行，次年出版。这就是顾准的第一部大著——《银行会计》，精装4元，简装2.8元，再版多次。如今你还能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它1934年的再版。

拜他始自12岁的“职业生涯”所赐，除了足够养活自己，还足以改善他那个庞大复杂家庭的经济状况。举个例子，到了他16岁那年，除了每月固定60元的工资之外，他还有半年一次且超越工资额的分红和近千元的版权收入。

根据《上海物价月报 民国19年1月 第六卷第1号》中的趸售指数计算，顾准这一年的收入足

以购入二号粳米 160 石 (将近 12.5 吨), 或猪肉 4 吨 , 或鲜鸡蛋 8.3 万个。

顾准的“社会职业生活”端地开始得好生精彩。

6. 小“安那其主义”者

我的传主开始他“社会职业生活”的 1927 年，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颇不安分，颇有故事。1 月，一支 1.6 万人的英国军团火速进驻上海，保护这座国际城市里的 4 万英侨。这一年汉口，九江，南京相继出现反英暴乱，苦力造反（“反英暴乱”，“苦力造反”二词，各类大陆史料沿用至今，非作者自定义），夺取英租界，攻击外国机构，打死金陵大学美籍校长，抢劫英国侨民，乱象丛生。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军事行动。

3 月，蒋介石的北伐军兵临上海城下。在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80 万人第三次暴动（上年 10 月 26 日的第一次和本年 2 月 22 日的第二次均告失败）里应外合的配合下，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上海。

陆家浜畔的少年顾准目睹了事件的全部过程——北伐军到达前高挂在大街上示众的“党人”头颅，着长袍挎红带端长枪，高呼“党军到！”即占领旧政府警察局的工人纠察队员，黄浦江边沙包工事里纠纠然的北伐军人……。

和女孩子不同，血腥和暴力在一个半懂事半不懂事男孩子的心中引起天性反感的同时往往也会出生依稀的浪漫和参与自己同情一方的愿望。顾准也未免俗，和哥哥一起跑到沙包工事里，向兵哥们要求“哪怕当个勤务兵”，被北伐革命军一口拒绝。

由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以及所谓的北洋上海政府不堪一击，军人缴械，警察投降，五六千枝枪支流落到了民间。这令凯旋进城的北伐军政府伤透脑筋，原本纠缠不清的党争派斗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愈发狂乱和无理性，这五六千枝枪械成了执政者一块大心病。新政府甫一上台，第一道命令就是收缴民间枪支，解散民间武装。这也是古今中外每一个专制政权无例外，无奈何的选择。却谈何容易。

仅仅十来天，又一个新的历史符号出现了，那就是被沿用至今，标识着“政变”、“背叛”、“屠杀”、“血泊”、“党同伐异”和“罪恶”的所谓“四·一二”。

比较奇怪的是，敏感的少年顾准却称（对它）“根本不知道”：

“……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前，军阀孙传芳在上海的爪牙李宝璋大肆逮捕党人，把捕到的党人砍下头来放在木笼里挂在大街上示众，我看见过；3月下旬，第三次武装暴动中的工人纠察队进占我家附近一个警察所，我亲眼看到挂红布标帜的工人走到警察所门口，夺下门岗手中的枪，脱下警察戴的帽子，直入警察所内部缴枪，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一幅情景……。在董家渡江滨的沙包工事中看架在那里的重机关枪，和驻守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谈话，曾要求他们收留我们（他和三哥陈怀德）做勤务兵……。但是对当时的政治事变，如最初成立的以宋庆龄为首的上海市政府，四一二屠杀，强迫解散总工会，张定璠任市长等等，有的根本不知道，有的听到了也不了解其意义，也没有对我的思想发展投下过什么波澜……”

假如按照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观点：“至于（4.12）清党终在上海展开者，乃因当地工会组织纠察队五千人，在孙传芳，张宗昌部队退出上海地区时，获得枪械数千支，至此成为严重问题。3月杪蒋介石与白崇禧已发出通令，此等半军事机构务必将兵器交出。如谓4月12日事件出于突然，工会人物全无预感，只在懵懂之中被出卖，甚难置信。”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许多当年身在其境的上海居民，包括少年顾准并未看到，甚至并未听说如国人被告知了90年的“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的情景，就是情有可原的了。

毕竟只有12岁，童年的这一经历对顾准未来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决定性的意义很难判断，但人间心灵秩序的混乱和专制政府的残酷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哲学性的思考也开始萌芽。很快，他成为一个小小“安那其主义”者。

这个新奇怪异的名头其实就是人人熟悉的“无政府主义”英文Anarchism的音译，起源于希腊语单词 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没有统治者。在顾准的年代，它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工团主义”……一样，都是充满新奇、西方和摩登气息的名词，对青年人的吸引和诱惑是不言而喻的。

“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甘绩瑞1927年进了劳动大学……学校里有共产党，但无政府主义思潮流行，甘绩瑞那时也信从无政府主义。我从甘那里借读了李蒂甘（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攻

略》等书以后，热烈地信从无政府主义起来了。”

将“巴金”的名字沿用至死的李芾甘先生，当年是和鲁迅，郭沫若，矛盾齐名的文学家，青年人的偶像。而俄国小贵族(军功贵族)，“无政府主义先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和俄国大贵族(世袭贵族)，“无政府主义王子”——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则更是偶像们的偶像。巴金即巴枯宁加上克鲁泡特金两个名字的头尾。李先生也一直默认着这样的解释，直到1966年，早就被烙上反马克思黥记的巴枯宁之“巴”字，才被赋予了另外的一种相当牵强，非常无奈的解释注。

当年崇“巴”拜“金”的是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刘师培、张静江、褚民谊、吴稚晖、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国近代人物都曾经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员。刚刚从“帝制”下走出却又未能进入“共和”的年轻人，很难不被“安那其主义”如此这般的“宣言”所动：

“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员！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纲常！无婚姻！无家庭！无私有财产！无货币！无职业！无种界！”

“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做人力轿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做陆海军人、不奉宗教。”

……

实际上在西方，反对一切政府体制、统治形式和权威，提倡个体间自助的“安那其主义”，早在19世纪末叶已经日渐式微。以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的一个分支——“无政府共产主义”，更是被革命先哲马克思“痛打”得体无完肤。但是在完全没有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家的20世纪初叶的中国，它们都曾风靡一时。

1930年署名芾甘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由上海江湾自由书店初版。56年后，当李芾甘先生的《全集》将要出版时，年过80的老者却任责任编辑者怎么劝说，也不肯将其收入。此书没有在中国大陆再版过，却在2009年被香港一家出版社不知出于何样考量，限量一千册再版。当年的小顾准受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很深，朦胧中他觉得和它似曾相识——小姑私塾时期熟读的《圣经》和眼下生吞活剥的“巴”与“金”纠缠在一起：

“爱人如己”——“互助的本能”

“贪财是万恶之根” —— “取消资本！消灭私有财产！”

“共享生活” —— “消费共产主义”

“凡物公用” —— “集产”

……

契合实在太多，区别却还无力。

“我们热烈吸收的是（书）那里对资本剥削劳动的激情控诉。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有过对革命生活的憧憬，对于当时的职业生活，认为是在给资本家的走狗当奴才。但是究竟怎样革命，革命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却又十分朦胧。”

当时一首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歌曲《杜歇斯内神父之歌》中这样唱到：

“如果你想要快乐，

他妈的！

去吊死你的雇主！”

雇主？天生有一个——“掌柜的”潘序伦不就在眼前吗？！

吊死他？NO！

从小熟知“十诫”的他一生也没有开过这一诫，更何况眼下他还是个孩子。可这并不妨碍小孩子顾准照“主义”、“攻略”的模板把他的老板定义为“资本家的走狗”，把自己的“社会职业生活”定义为“做奴才”，也就是“走狗的走狗”。所以当他听说潘老板的家乡宜兴起了暴动时，兴奋得无可无不可，不知轻重地对事务所宜兴籍和非宜兴籍的同事们宣称“我热烈赞成暴动！”，“我也要扛起红旗来！”

红旗是什么符号，暴动意味着什么，这个小安那其还想不了那么多，但政府的可恶，独裁和专制的可恶已经在他心中埋下了厌恶、拒绝和抵抗的种子。

宜兴籍地主书香家庭出身的潘序伦并没有把这个黄口小儿和他的口无遮拦当回事。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应该、可能和正在成为革命的对象，暴虐的目标。

还好，宜兴暴动从占领到撤出仅仅不到三天，24岁的暴动领袖万益未经审判即被处决，从起事到平息不过20天，潘序伦的家庭可能未受任何波及。满腹西学经纶的这位会计学大师是年正值34

岁壮年，他一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正如日中天，他心中的“神圣”是新式会计学，是中国的“问题”。“主义”在他，是不屑一顾的东西。

他继续重用顾准，不是当做“奴才”而是当做“重臣”。

7. 数字天才

“家庭负担的生活现实，压下了少年时代的革命激情。1927-1929年的革命憧憬是不结果实的……无政府主义的书也只读了那么二三本……。收入较多后，（开始）读汉代金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说，读宋词元曲，订阅沈雁冰的小说月报，赵景深的文学月报，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一些创造大概都读过，还在晚间跑到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东方图书馆去读书。记得1930-1932年读过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陈寿的《三国志》，粗读过《论语》、《孟子》甚至还读过几页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读过一些康德派哲学的书。没有师系……”

小安那其主义者的政治热情很快无疾而终，他的心思又收回到了事务所。

14-19岁之间的顾准在没有学校、没有课堂、无教材、无师系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职业向上期”。天然地，他有一种对数字罕见的兴趣、敏感和天分。1924年，以中国第一位哈佛商学院MBA、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身份海归的潘序伦，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间现代意义上的会计师事务所。潘因此被称为“中国会计业第一人”，而顾准有幸成为这个“中国第一”的最早成员。潘序伦也很幸运，他无意中雇用了一名数字天才。

会计学，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是一支十分枯燥的学问分支。尤其在中国这个从不重视数目字的国度，会计学被叫做“计学”，高雅一点是为“勤笔免思”之法，通俗一点是为“好脑袋不如烂笔头”，既无传统也无师承，更无“学理”。即使有很少的执笔著书之士，亦绝不情愿以宝贵之光阴牺牲于锱铢必较之事。总而言之，这是门“俗务”，有志之士是不屑搭理的。故中国计学者既无专师授业也无专书问世，自清代始，师爷们口传心授保留下来了简易的复式记帐法——“龙门帐”和“四脚帐”，但是这些比较先进的方法不仅未笔之于书，而且未推行于世，无论是管理“国库”的财政大员还是管理“地库”的钱粮师爷、账房先生，其职业行为只受伦理道德的约束，仅仅依靠他们“自觉地”

规范自身行为，会计业务处理过程无规可依，无章可循，以德治、人治，无法制，几乎完全无法套用现代意义上“管理”二字。

这就是以中国伦理文化支撑的中式会计文化。

1930年代，中国工商界起了一场关于中式簿记的“改革与改良”之争。彼时“西学东渐”之风甚盛。某些纯属“填补空白”的西学，例如近代物理、近代化学等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孤独求败式的西学分支，推行起来很容易；而那些原已在中国存在对应物的领域，例如会计学，则无论优劣，总会对西学先起排挤之心，后发较量之力。中西学间的冲突，清朝以降就是个大难题，其主旋律一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它和历朝历代诸多“政策”用语一样，很难从词义、数据或标准上体现其可执行性，只能从每个不同的人的角度“体察上情，为体为用”。

潘序伦的归来在中国商海掀起了波涛，“海龟”与“土鳖”之争不可避免，这就是会计学界津津乐道至今的“潘徐之争”。

徐是徐永祚，中式簿记改良派领袖。

徐的主张是：尽管中式簿记存在许多问题，但都可以参照西方复式簿记原理加以改良，仍应保留收付为记账符号以及中式账簿记账方式等传统做法。以“收”“付”作为记账符号符合国人的习惯，且改良中式簿记以现金收付为记账基础，突出了现金是最可宝贵之物。尤其是中式簿记中传统的“四柱结算法”，是中国对会计学的一大贡献，其“效用之大，罕与伦比，西式簿记尚未有此结算法”。四柱结算法与西式试算表，在检查会计记录以及计算方面有无错误是完全一致的，且“四柱结算法可以表现一个期间收什数额进行比较以及经过和结果”，比仅反映一个期间借贷结果的试算表要优越。徐永祚进而主张“不仅中式簿记有保留使用之必要，即西式簿记亦有仿行之价值”。

“改革派”亦称“西化派”，以潘序伦博士为代表。

改革派并不全盘否认改良派的成果，但指出即使是改良后的中式簿记，依然达不到西式簿记那样科学完善的程度。改良后的四柱结算法实际上是西式试算表的变形，但统辖的总分类账中不设现金账户，这是严重不完整的。改良派过分夸大了四柱结算法的作用，是一种短视行为。从长远来看，排斥

借贷理论，另立一种收付理论是不合理，不正确的。中式簿记以现会为记账基础，对于非现金或转账交易的处理以及观众反方向过账，既无理论依据，实际上也令人费解，它比借贷要复杂得多。旧式簿记直写不便于多栏式登记，也不方便合计和过账，改良簿记对账簿的分割不胜其烦，不符合“经济”原则，易重复，不便查阅，一旦交易，难以在账簿中得到整体表现。

潘氏改革派的结论是：中式簿记是不科学的，只有借贷复式记账法（西式簿记）才是科学的、进步的。从发展趋势看，中式簿记必然被西式簿记所取代。收付记账法不是一种科学的簿记方法，中式簿记法应予废除，实行借贷会计。潘序伦进一步预言，簿记这一经济管理的工具，必然要走世界共同一致的道路，中国不可能用独异的方法。

潘徐之争的实质，是中国会计学要不要和世界接轨，中国的工商文明要不要在数目字上和西方的工商文明相通和相容。

数字文明是工商文明的基础。人类从结绳记事，到指头，石头，竹节，木枝的“筹”，从西方的“格子算法”，计算尺到东方的“珠算”和算盘，从潘徐时代才刚刚出现的“计算机概念”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数字文明无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文明的进步无不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推动力。很难想象人类在数字管理上不使用共同的概念而能做到真正的沟通。因此当年的潘徐之争不仅仅是学术之争，也是东西方工商观念之争，社会发展观念之争。

就在这场学界重量级人物的学术较量中，年纪刚及负笈的少年顾准俨然已是力主改革的西学派——立信派主将之一。

当潘序伦在《会计杂志》上先后发表《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批评徐永祚的改良大纲 10 条》和《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等文之时，顾准也发表了《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用西方会计理论审视中式簿记的缺陷，直指改良中式簿记已经不适用于社会发展到目前状态下的经济活动。接着对比中式簿记和西式簿记的优劣，力倡借贷理论的普及，否则“会计理论不能昌明，会计学术进步难期”。其观点的尖锐和批判的勇气既让人感叹“初生之犊不怕虎”又不得不钦佩折服。

15岁的小小少年敢于如此挑战前辈和权威是有底气的。

顾准一生都很推崇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鼓吹现代化最力，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他最早读到的有关复式簿记的书就是福泽谕吉翻译成日文介绍到中国来的。而以反对人文科学中的价值取向，主张“价值中立”著称的德国经济学和社会学家沃纳·桑巴特，则更是把复式簿记的发明看作是可与血液循环的发现比肩的伟大创举。

与潘序伦一起挑战改良派是顾准学术生涯的起始，这篇文章就是其开篇之作，也可以将其看做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其参考文献就是福泽谕吉和桑巴特，他当时读到的很可能都是原文，至少也是英文版。潘老板的激赏自不必说，此文不但为他一生在会计学界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的后半生定下了“尊崇数字，尊崇价值”的基调。

这是一场多少少年都被会计学界津津乐道的学术之争。人们除了乐道以潘氏“西学派”的完胜告终这一结果，还乐道潘、徐二人在争论中十足的绅士派头，他们相互间的尊重，他们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竞争），“泼赖”进行中和“泼赖”结束后的友谊以及他们此后的命运。

这场争论的最大成果就是 被当代西方最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尊为“资本主义实践高耸的纪念塔”的复式簿记从此正式引进中国并被沿用至今。

会计学在中国很快成为显学，会计师、会计员成为抢手的职业。

彼时中国，尤其上海，知识界对才能的重视大异于今天的等级尊卑意识。人们不拼资历，不拼年龄，不拼原有成就，更不会“拼爹”，拼的是创新和进取的能力，顺带也拼一点西洋学历，否则也就不会有方鸿渐“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的故事了。潘序伦所拥有的，那可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哈商”和“哥大”的文凭，金字招牌是不发愁的。而他放手培养、起用15岁的顾准，这孩子3年前还在给他到夜壶，两年前还在黄口小儿不知深浅地要“扛起红旗”造他的反，他都忘记或者完全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这孩子非凡的进取能力和那份对数目字的天然热情。

1929年，潘序伦与另一位会计学家吴君实合著了《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作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夜校的教材。这也是中国第一批正式成书成册的会计学教科书。小学徒顾准先是在工余的夜间刻

钢板，印讲义。当然不是白干，每夜能刻两张，潘老板付给“劳务费”大洋两毛五分钱。以后成书出版进入后期时，他被提拔为专职编辑助理，负责习题集出题和答案的编纂。那些大他许多的夜校生们，既不知道弄得自己抓耳挠腮的习题出自这个小东西之手，也不知道给他们批改打分，弄得他们一时欢喜一时愁的也是这个小东西，否则非气疯了不可。

小东西实足年龄还不到十四，正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时候，仅仅从刻钢板的过程中他就记下了无数会计学术语，而编题和答题给他的教益就更大了。在事务所里，无论从什么杂活中他都能看到学问，都愿意和有兴趣去学去深究，当然除了给潘老板倒夜壶之外。不过潘老板早就免了他这项杂役啦，人才成本太高了嘛。难得这么个对数字天生过敏的孩子，万军好找，一将难求，能端茶递水倒夜壶的人可太多了。

上年小家伙曾考取持志大学缮写员的职位，半工半读，不仅不收学费还给工钱。可这精明孩子掐指一算，上大学不如在潘老板手下做徒弟，工资既高，学到的东西也不比大学少，还是留在这里“救家”和“向上”的好，就推荐自己三哥怀德去了，自己则继续在立信过他的“社会职业生活”。

到了十五岁，更无人能小觑他了。潘老板一手“擢升”他出任立信函授学校校长，工资也涨了不少，每月二十块大洋。对一个十五岁的半大小子来讲，这个数额的工钱实在是够吹吹牛皮的了，尤其是当着全家人的面，当啷当啷响着全数交到操劳得鬓角都开始斑白的母亲手中时，那一份自豪和喜悦真难为一个孩子怎么掩饰得住。

顾准愈加勤奋了。

在为老板的《高级商业簿记》编写的《习题详解》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徒弟的“副册”与老板的“正册”已是堂堂正正地并列，后来再版时才有了独立的书名——《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顾准为第一署名人，是为立信会计丛书中的一本。

不久，他又以第二署名人的资格和潘老板共同出版了《政府会计》。此时潘序伦 37 岁，他连第一署名人一半的年纪都不到，才十五岁。

此书四年后的再版，如今还能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找到。

潘老板自忖小东西长了个子，肚子里的东西早已够用，应该“拿得上台盘”了，就放胆让他上了夜校的讲台。没成想，如前所述，被学生一通起哄轰了下来，还连累潘老板背上“拿个小孩子来哄我们”的骂名。

又过了一年。有天晚上，他豁出去了——“今晚我就要站上讲台上做你们的老师，除非你们把我拖下来！”

他们没有把他拖下来。小顾老师甫一开口，夜校的学生们，无论是年过三十的“老会计”们还是刚刚入行的“小会计”们统统安静了下来——到立信夜校来，听这种老师的课，从时间和金钱两个方面讲都非常值得，干吗要在乎他多大岁数，多高个子？能学到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而顾老师确实能让他们“学到东西”，这些“上海人”，尤其还是“上海会计师”们，哪里会这么“拎不清”？

十六岁的小老师顾准所授是银行会计课程。他不但“自演”还要“自编”，从教材、讲义到习题、解答都是他亲力亲为。和数字博弈，看它们在自己手下成序并驯服，他“忙，并快乐着”，简直不亦乐乎。

在讲了两年，编了两年之后，这些东西被顺理成章后交给鼎鼎大名的商务印书馆，顾准的第一本独立著作——《银行会计》出版，几年后书名改为《中华银行会计制度》再版，由同样大名鼎鼎的王云五做总发行人，潘序伦作序。

潘老板写道：

“顾君准前著《银行会计》一书，复将其节编为《银行会计教科书》一书，出版以来，国内之银行实务家及大中学校学生，几无不奉为唯一参考书及教本。惟顾君以该二书系属教科书体裁，对于我国各银行之会计制度，限于篇幅，不能详加讨论，顾复出其心得，著为《中华银行会计制度》一书，都凡四十万言。余为校读一过，觉其研究之精详，编制之适当，实可称为银行会计一科空前之佳著。从此国内学者，对于此科，得此晚辈之参考资料，其于我国银行会计之改良，必当有莫大之助力也，不禁跂于望之也。”

无论是老板对伙计，师傅对徒弟还是老师对弟子的角度，潘序伦对顾准的赞赏都溢于言表，连“避亲”、“溢美”之嫌都顾不上了。

此书是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第一部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这倒是时至今日也无人提

出质疑的。

此间他当选立信同学会负责人，同学会创办的《立信会计月刊》是中国现代会计学第一块争鸣的园地，他担任了若干期的主编。

顾准成了立信的台柱子，约稿不断，兼课不断。不经意间他成了 1930 年代上海最高产的会计作家之一。这位对数目字以及排列它们的逻辑有着一份天生喜爱和激情的少年，可不就是个成色十足的“数字天才”！

8. 来得太早的成功

1934 年，19 岁的顾准与潘序伦再次联合署名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这是又一本被会计学界学子们奉为圭臬的教科书。两三年来，青年顾准在上海学界名声鹊起，除了老板潘序伦、立信系统和整个上海会计界的激赏不算，当年夜校的学生，立信的同事们以及会计界外的青年们对他的推崇以致崇拜可能更厉害。比如有位和他同年的立信夜校学生丁苏民先生这样形容他的老师顾准：

“他教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同学欢迎。当时这些同学大都是银行界小职员，练习生，与顾准同志相处甚欢，气氛非常活跃。顾准同志年轻有为，学识渊博，同事和同学们都非常爱戴他，也是我平生最敬佩的人。”

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文字，虽然“八股”了些，人物形象是清楚的。再比如有位大他六岁的立信同事，和他一起执教夜校的李鸿寿先生，在回忆未满十六岁（1931 年初）的顾准时这样写到：

“……穿一件布长衫，拿一把洋伞，夹一本书，朴实无华，好学不倦……白天，我们两人的写字台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比较多，他不仅专攻会计，而且知识面广，对于国内外大事，娓娓而谈，他比我小六岁，我认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将一位十六岁的孩子称作“良师益友”，确有些令人吃惊。

假如你认为是时因为顾准“出名”了，这些都是人们对他的溢美之词，那就再看看当年的一位中学生，一生也未涉足会计界的学者李慎之先生对他的描述：

“最早听说顾准的名字是在 30 年代末的上海。当时我有亲戚在立信会计学校上学，说起那里有

一位杰出的教师，年纪只有二十上下，却已当上了教授，而且最得学生的崇敬。‘立信’并不是北大、清华那样的‘最高学府’，但是其专业训练之严格却是全国闻名的，等闲之辈是上不了讲坛的。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吧，这个名字从此就永远地因在我这个中学生的脑子里了。”

名声大到连中学生都知道，而且是在一个绝对“非流行”的领域，其成就可想而知。到了1934年，顾准在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历练”了7个寒暑，潘序伦决定放他单飞。

是时正值各大学争相设置“银行会计学”一门课程，沪上三家教会大学争先恐后投名到立信门下，向西式会计学的祖师爷潘序伦“坐等要人”。潘老板也是个有胸怀的人，爱才有道，每次都不假思索就推荐了自己最得意的门生顾准，唯一的条件是此人授课之余必须留任立信。在这场小小的人才争夺战中，有个插曲很有趣：

之江大学的华人名誉校长李恩培在听完潘序伦先生“顾准只是个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介绍后，满腹狐疑，眉头紧皱，沉默不语，惹得潘老板甚是不悦，端茶送客，发飙道：

“李校长既然看不起，那就听你另请高明吧。”

岂料之大李校长前脚刚快快而退，后脚圣约翰大学美籍副校长跟着就迈了进来，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老校友潘序伦对爱徒一成不变的推荐，当场下聘，一言而定。李校长后悔不迭，也顾不上“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面子问题了，立即把顾老师的聘书送了过来。沪江大学风闻此讯自是不甘心落后，由法学院院长亲自登门将兼职教授的大红聘书直接送到立信事务所顾准先生手中。

除了无出其右的专业水平，眼下已能操一口流利英语，日语也能读能写的顾准，是足以胜任这三所“进了大门就得说英语”的教会大学了。

顾准的英语是无师自通的。这和他正在编写《银行会计》一书的过程中需要大量阅读银行学，货币学，银行实务和经济学书籍，而这些书籍大部分是英文读物不无关系。加上上海话，不知是因为开埠最早还是碰巧了，其发音方式、语调和语气都是中国方言里最接近英语的，再加上有潘序伦这样的留美师傅，英语估计说得像钱钟书《围城》里的赵辛楣——“滚过来滚过去地隆隆作响”，十来岁的顾准又是如此的早慧，成天介耳闻目染，想不学都难。但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小姑私塾”时的那点英文童子功起了作用，反正顾准的英语就这么不经意间无师自通了。

除了专业书籍，他和三哥陈怀德还不断阅读英文杂志和书刊，例如美国人艾萨克斯·H·R 在共产国际资助下创办的《中国论坛》，常常刊载介绍共产党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状况的文章，怀德定期到发行外文书刊的外商书店——别发洋行购买，兄弟俩轮换着看。此杂志对顾准日后的“急剧左倾”有很大的助力。

除了英语，他还学了日语。据他自己说日语是“粗通”，可已经能看河上肇原文的《经济学大纲》和唯物论辩证法一类的书籍，无论如何“粗通”还是自谦了些。河上肇的书是他“急剧左倾”的又一助力，仅仅“粗通”是做不到的。

两种非母语的掌握使顾准的思维方式常常有别于大多数同时代人，这是他的幸，也是他的不幸，后面再说，先说说顾准任教的三所大学。

圣约翰大学 (**Saint John's University**) 始创于 1870 年，是上海乃至全中国的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早了“京师大学堂”差不多 30 年，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西洋人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她的校友名单灿若星河，令人眼花缭乱：即包括了如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林语堂、贝聿铭这些在中国根本无需介绍的名字，也包括了如邹文怀（香港电影教父，一手打造出李小龙和成龙两位最能代表中国的世界顶级明星及无数天王巨星、香港嘉禾集团创始人及主席）、史久镛（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大法官）、经叔平（老上海商业巨子、民生银行创始人、原全国工商联主席）、吴肇光（中国外科医学奠基人）、孙学悟（中国基础化学奠基人）、颜福庆（中华医学会创始人）、周有光（汉语拼音创始人）、黄嘉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顾震隆（中国复合材料研究奠基人）、刘鸿生（老上海实业大王）、严家淦（政治家，原中华民国总统）、吴宓（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等等需要略作介绍的名字。这些人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的政治、外交、金融、商业、法学、建筑、医学、文学、电影、新闻、物理、化学等诸多领域的历史，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重要影响。

说圣约翰足以媲美燕京（北大），应不算过言。

之江大学 (**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 则是另一所始创于 1914 年，杭州的教会大学。她

的校友名单虽远不如圣约翰那般辉煌，但提起莎士比亚的译者朱生豪，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眼下司空见惯的毕业典礼上的学士帽和礼服，也由此大学从西方首次引进。在日本侵华的战火中，之江大学法学院由杭州迁往上海英租界。

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的历史比较短，离顾准受聘进校仅仅 28 年。原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浸信会大学，由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颁发学位证书。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是一间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同时兼办社会福利的教育机构。大学 1929 年才向中国政府申报立案，校名也从上海学院（Shanghai College）改为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 岁的顾准同时被三所沪上名校争相聘请，如此“社会职业生涯”的成功，的确罕见。

是时中国，银行会计学实在可称“显学”。有三种职业在那时被民间看做“铁饭碗”——银行，邮局和海关。会计业又是三只“铁饭碗”都离不开的，会计学就成了“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是学成后能捧上“金饭碗”的学问。因此各大学争相开办此专业，选修它的学生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奇了。

教会大学，尤其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几乎个个是自命精英的“刺头”，要他们轻易就说哪个好老师的好话，绝不在他或她的课堂上恶作剧，那是“NO WAY（没门儿）”的事情。可这些难缠的家伙们，其中很多人在年龄上还大过老师，却无一不“臣服”在顾老师的教鞭下，因为还没有见到老师前，顾准这个名字就已经“如雷贯耳”，况且此人是被他们的校长、院长，其中有中人也西人，三顾茅庐请来的，想捣乱或者不听话不服气，那只能自讨没趣。

三年前还因为岁数小，个子矮，连“立信夜校”的讲坛都站不住的他，如今堂堂正正走进了名牌大学的校门，威风凛凛地站在了最高学府的讲坛上。每当顾老师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持一支根本用不着的“司的克”，夹一叠讲义，绅士派头十足地走进三所教会大学的大门，用英语频频和门房，学生，同侪打招呼，同时接受他们恭敬的回应，每当他大部分用英文，偶尔也用中文侃侃而言地讲课，娓娓道来地答疑，无数崇敬中夹杂着惊讶的目光就一直如影相随地跟着他。

顾准，再矜持也毕竟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让他掩饰自己的欣喜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也不屑去掩饰。顾准和自己的伯父陈蓉生一样，踩上了“命运和弦上升的节拍”。后者因为 40 多年前参与了刚

刚兴起的棉花贩运生意而致家道兴旺，前者则因为“西式簿记”的会计方式在中国普及而致大器早成。

然而他的成功来得太早了。这种辉煌到了“夺目”地步的成功，使得人生在激情和理智两个方面很难平衡。才华出众的人往往有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产生独立意识的倾向，有渴望与众不同的倾向。如若生逢一个崇尚“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的时代和族群，他们已经“与众不同”的才华会滋生得更加“出众”，因为族群的共识是“本社会需要这样的才华”。反之，才华反倒常常成为不幸的根源，尤其是在东方，在中国，在汉民族这个族群中，在“无知”要革“知识”的命，“愚昧”要革“文化”的命的时代。和伯父陈蓉生因为“棉花”而成功也因为“棉花”而丧命——死于生意过度兴隆带来的疲累和棉绒对肺部的侵害不同，侄儿顾准则被天赋般的才华带来的太早和太过炫目的成功所累，生出不可救药的“知识优越”和“知识菁英”情结，造成一生世俗生活的不幸。更遗憾的是，就连家人也被由其衍生出的强大“气场”连累和伤害，伤口至今不能愈合。

第二章 浪漫与革命

1. 秩师，娜拉及其他

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是不是有趣，要看他一生中身边出现过的人是不是有趣。顾准的生命故事不仅有“趣”的更是有“启示”的，这就不是芸芸众生可能拥有的人生了。

潘序伦，这是顾准身边出现最早的一位有趣人物。

许多相关文字提到潘序伦和顾准，用到最多，还是“良师益友”，“亦师亦友”，“伯乐与千里马”等溢美之词，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两人间最重要的“雇用”和“买卖”关系，而这一点是不是少年顾准“我也要扛起红旗”的革命念头，青年顾准“绝不作潘序伦第二”的革命决心最初的萌芽，是不是顾准第一次“出走”的原因，少有顾准研究者和民间“顾迷”起过这样的疑问。

“从 1927/VII 到 1940/VII，除 1935 年的上半年而外，整整 13 年，我一直是潘序伦的雇员。”

大多顾准探索者在寻踪顾准走向革命的始因时，都认为他对“家”的“背离感”和对“国”的“绝望感”是导致这样一个被当时的社会不仅仅是“见容”甚至是“推崇”的人物走向革命的精神起因。这或许有些偏颇。

幼年顾准对家庭的“厌恶感”确实存在过。父亲前后两房夫人，十个孩子，加上为夫的无能，弄得家道败落，家无宁日，这是无争的事实。可如此状况在当年，甚至眼下的中国都是个常态，极具中国特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况且家庭的矛盾并未造成家庭成员的堕落，如前章所述，倒是促使儿女个个出息，坏事变了好事。

从顾准留下并面世的文字看，他对家的“厌恶”远少于“依恋”反倒是显然的。

比如说到几个同父异母哥哥，姐姐，特别是三哥陈怀德，四哥陈怀良，说到和自己一母所生的兄弟姊妹，特别是二姐陈佩珍和六弟陈怀如（陈敏之），无不一派温情。说到母亲顾庆莲，母子两人之间“舐犊”和“反哺”之情更是跃然纸上。顾准从未因母亲是“小老婆”而轻看她，也从未因自己的“庶出”而自卑过。顾准的父亲陈庆华，说到头也就是个鬼使神差不幸从了商的读书人——不能干，不练达，还有些不负责任，却是个多情的种子。他在破产后也就是一甩手住到庙里“悬壶济世”去了，大不了算“出了家”，既没有死在下等的烟花巷，如骆驼祥子，也没有殁于自家的大烟榻，如顾准的祖父陈仰峰。加之他老人家死得早，所以成人后的儿子顾准对父亲也少有微词。

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顾准和小姑陈庆志的亲情。

这对姑侄之间的特殊亲情，从一些他自己和他的探索者的文字细节中，很可以看出些端倪。前一章已经讲到：

1935 年 10 月，顾准和汪璧按照武卫会林里夫的指示秘密流亡北平的前夜，一身典型的秘密工作者夫妇打扮，专程深夜上门到小姑母庆志家辞行，吵醒了小表妹徐文娟，令这个当年未满十岁的小姑娘又惊又喜，至死难忘。这肯定是相悖于“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孙”的秘密工作原则的，他却偏偏不背着一位姑母；以及，作为一个被开除出党，一个全国知名右派，刚刚亲历“人相食”的大

饥荒，妻儿疏离，亲人敬鬼神而远之，精神最为苦闷的 1962 年，本应是人生最消沉之际，他却
在难得的上海出差之机，毫无顾忌地登门拜访年已耄耋的庆志小姑母。47 岁的侄儿和 85 岁的老
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他和小姑母同样打成右派的女婿，自己的表妹夫，苏州医学院的
内科教授张秀彬抵膝执手谈至深夜，直至发出“老和尚不出来做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当事人口}
述这样足够“杀头”的狂怒低吼。

顾准的家庭并不“可恶”，是上世纪初一个很普通，很典型，甚至可以说是个比较“优秀”的中
国家庭，他也没有“背离”它，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家庭中的卑微感早就随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小学徒的出息而消失了，他早早就成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支柱。几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也都没有被他记恨，
他和大姐陈秉真，三哥陈怀德之间的故事后边还要讲到，那一份既普通又温馨的亲情令人过目难忘。

几十年来，顾准家庭成员的状况不是令他“愤恨”和“蒙羞”，而是一种难以掩饰，却又令人（令
他“坦白交代”的人）很难挑剔的自豪。刨去“历史交代”中他不得不说的假话、套话、空话成分，
“家庭”——这个“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顾准既不同于《家·春·秋》中的觉新或觉民，更不同于《白毛女》中的大春，他从立信的台柱子和
数所教会大学的兼职教授这样常人很难企及的社会身份高度和经济生活高度上“出走”，走向革命，
走向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出于对家庭的背离，也不是出于对社会的绝望。若是先将在国家存亡关头“对
国民党的失望”这一最显著，最无争议的因素放下不谈，假如一定要有一个比喻，那就只有易普生《玩
偶之家》中的娜拉。

“娜拉走后怎样？”

1923 年的鲁迅和 1973 年的顾准发出了同一声“追问”，相隔恰巧 50 年。

大先生风趣幽默，举重若轻，讲的，是妇女问题，问的，也是妇女问题，只是“将娜拉当做一个
普通人而说的”，就算稍有引申也很有限，因为“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
并且，关于“娜拉走后怎样？”，他和易普生态度一样——“不负解答的责任”。

顾准的追问则严肃宏大得多，沉重得多。他问的是人类的问题，且倾其后半生，拼了性命地要负

起“解答的责任”。

连易卜生自己都不承认是一出“社会剧”而仅仅是“诗”的《玩偶之家》，竟会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生成这样一句“天问”，尤其是读书人的“天问”，恐怕连这句“天问”的原创者周树人先生自己也始料未及。

青年顾准的第一次“出走”（谁说娜拉只出走过一次？）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楼下传来砰的一响关大门的声音”，这是《玩偶之家》剧本的最后一行字。

在顾准，如解放与自由之钟的这“碰的一声”，响在1933年初春。他出走了，算不上义无反顾（娜拉也不一定啊，毕竟她有三个孩子留在家里），他走了。体面的社会地位，受尊重并有兴趣的职业，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还绰绰有裕的收入——“海尔茂”如此这般的“安乐窝”，“娜拉”为何出走？谁又是顾准的“海尔茂”？

“……我虽然在1927—1928年痛恨过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不满意潘序伦甘心当资本家走狗的行为，可是当潘序伦的‘事业’因大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一度抬头而兴旺起来，从而我也有机会职业向上的时候，我那种缺乏基础的革命要求也就收了起来。真正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九一八以后的民族危机，是挽救中国危亡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朦胧前景两者的结合，其中共产主义觉悟的程度是极低的。”

顾准写于1969年1月的“历史交代（七）——我和潘序伦的关系”，是一篇值得细读的“坦白”。虽然此文写于中国文字狱最盛的年头，无法令人相信全部出于书写人的真实意思，但对于探究顾准革命“念头”的起源，还是有裨益的。

前文提到12岁的顾准初到立信，甚至干过给潘序伦倒马桶的杂役。

毕竟还是孩子，且是个男孩子，12岁正是贪玩和调皮捣蛋的“大好年华”，顾准日后再出色，大概这个“俗窠”还是躲不过去。头半年他在事务所的工作，潘老板是“不满意”的，还通过推荐人之口“特别警告”过小家伙，想来应该是“再不好好干，我就不要你了”之类大人教训小孩子的老话。

顾准这样一个超级聪明又急于“救家”的早慧少年，小家伙是不会没有想法的。

而后，顾准又亲见潘老板在所有的账目案件业务中“无一例外站在资本家一方”，“偏袒资方”，

彼时正热烈接受“安那其主义”的小孩子不禁“强烈地同情工人，厌恶资本家”起来，“对于潘的这类做资本家走狗的行径很不满意，常在同事中说些‘过激’的言论”——譬如“我也要扛起红旗来”之类。

再后来，当顾准完全凭着超人的天赋自学成才，写就中国会计学头几本专业书籍时，潘序伦又趁青年人与“革命”初恋时，除了浪漫不顾一切和急需“革命本钱”的状态，或者“插上一脚”，硬要做第一署名人，或者干脆将其“赎买”，成为自己的作品，连署名权都不留给真正的作者。更过分的，甚至说服顾准将自己著作的署名权让给完全不相干的人，只因为他们帮他翻译了一些西方会计学书籍，他无以回报，要借花献佛。顾准的版税也常常被列入“公帐”，由潘老板按照自己的“标准”和“心情”发给顾准。

终于有一天徒弟忍无可忍，和老板两人在办公室里大吵了一架。

从潘序伦身上，顾准自己说，算是首次亲眼见到了什么叫做“资本主义”。冒着“大不韪”，我得说，如果真有个“海尔茂”，他很可能是老板潘序伦。

潘序伦号秩四，立信事务所建立之初，因同事多数是他在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暨南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都叫他“秩师”。12岁进所的小学徒顾准，估计至少在第二年念了半年立信夜校之后才敢这样称呼老板。

潘序伦是一位完全西化了的中国读书人。他不问政治（虽然在朋友王云五的游说下做过一任国府财政次长），也远离政治、主义（虽然他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作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会计师第一人”，只要对他的会计事业有益，无论什么党派人士，持何等政治信仰，他都毫不介意。他也从不演“武大郎开店”那套东方剧目，不以个人好恶取人，大胆擢升年轻人，就算他们一时名声大噪甚至超过了自己，如顾准，他也从无起过嫉贤妒能之心，反倒是高兴和自豪还来不及呢——“店里”有如此“店员”，好到被人“挖墙脚”，他觉得这是老板的光荣与骄傲。他也有本事既放了这些年轻人“单飞”，又手里攥着风筝线，使自己身边总簇拥着一群出色的专业人才。

从商务出版社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全套“立信会计业丛书”作者名单，就可以看出潘序伦的

包容力——其中的著述者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也有今天还“在”这个党明天又“在”那个党，后天又什么党都不“在”了的人物。用起人来他也是“混不吝”，只要手艺好，我才不管你下了班去干什么呢，反正敢到“立信”头上动土的人还真不多，你自己小心点就是了，给我好好干活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人们只知道顾准在会计学上的多才多艺，殊不知那时整整一“店”的人都不是庸碌之才，几乎个个有著述，人人有文字留世。

话说回来，会计学本身就是为资本服务的，没有资本，没有剩余价值，谈何“会计”！顾准在日后的“坦白交代”中举过数个潘序伦自己或他“助纣为虐”，协助老板“站在资本家一方，偏袒资方”的体例，用当下的眼光看还真是说服力不大强，例如赈灾款去向的审计，劳资纠纷的审计等。除了“时代的烙印”即偏见外，不排除他幼时对潘序伦不满的遗痕。

“……不仅如此，他还确实自居为我的恩人，这有事实为证。大约 1934 年进社组织起来前不久，有一次我在事务所里公然跟他大吵了一架（具体经过可惜已经记不起来了），我斥责他待我刻薄，他说‘我比你老子对你还厚’。真的，在他看来，一个十二岁的穷孩子，到他那里当练习生，他既给工资，又不次拔擢，有了一定的地位，当然是大有恩惠于我而且恩惠胜于我的‘老子’……”

这倒是真的。血气方刚的青年顾准确实猖狂得可以，能逼得那般西化的秩师喊出“我比你老子对你还厚！”这等中式语言（其实顾准的亲老子对儿子顾准还真不算太“厚”）。可秩师依然爱才如命，不计前嫌，钱照发，人照拔擢和推荐，书照出，当然署名也照署——“我不跟你小孩子一般见识”。

“1930——1932 年，他大胆“提拔”我负责函授学校和学校部，大胆“提拔”我在十分年青的时候当他的会计夜校的教师。1934——1937，他不但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而还敢用我，还给我一些方便的机会——到外地查账，当他的所外编辑人员——让我躲避追捕，同时则和我建立了拿钱买我所写的书的版税权和著作人名义权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买卖，它和书店拿钱买稿子不一样，因为当时他并不直接经营书店，而书店买稿子也并不同时收买著作人名义权。”

在这段话的后面，顾准加了一条长长的注，在他全部已面世文字中算得上是比较长的一条注，可见他多么在意：

“① 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内的伦理范畴，如果我是在潘的指导下写书，书的内容、观点、体例，潘有一套完整的意见，或者，即使指导意见不完整，我给他补充上几点，但指导意见基本上是他提出的，我则任搜集资料，写作初稿，由他审稿定稿，这样写成的书，出版后版权归他所得，

著作人名义是他，就不算‘拿钱收买版税权和著作人名义权’了。事实是，我写什么书，当然是潘规定的，除此而外他没有任何指导，一任我写。写完后他看稿，有的书他自己动手修改（例如《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像这样的情况，他最多有权自称为‘校订者’或‘审订者’，根本无权自称为著者。有的，他根本不修改（例如《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因为著作人名义权仅是用来酬报他欠下别人的‘著作人名义权’，不以他为著作人的名义出版的。按照这种情形，即使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内，也确实可以叫做‘他拿钱买我所写的书的版税权和著作人名义权’。”

这段注解，在他写下的当年（而不是事情出现的当年），中国正处于极端的“文化革命”既极端的文化愚昧中，党和人民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这一段毫不起眼的文字，非常容易被忽略过去的。可现在读来，谁都能掂量出其中的份量，说得难听点，搞到方舟子那去都绰绰有余。

秩师潘序伦，就他犯下的错误（或者罪过）而言也是“西式”的——并非直接从“钱”上剥削，而是侵犯知识产权。顾准认为“秩师”潘序伦对自己在“知识产权”上的侵犯和剥削是不能容忍的，这和娜拉之轻蔑海尔茂的“虚伪”如出一辙。

在顾准“半因危险，半因浪漫”躲进租界亭子间，革命之余为潘序伦修改《所得税原理与务实》一书出版前，潘序伦读他的改稿时简直就是一击三唱，一唱三叹——“这个小家伙，写的东西愈来愈好了”。后来，在顾准又“简直没有保留原稿什么东西”地修改了将要以潘序伦名义出版的《公司会计》后，弄得潘老板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扭扭捏捏将书名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才出了版。

“潘以后自诩为‘公司法专家’，也许和此书不无关系”，他说。

成功后的顾准对人们说他“师承潘序伦”一直不服，但是“秩师”的称呼他却从未改过口。即使在新政权时期，这个称呼被“群众”检举揭发并推断为他和资产阶级分子同流合污的铁证，麻烦不断，他却始终坚持这样称呼过去的师傅和老板一直到1969年他写这篇“交代材料”，是时他甚至以为“秩师”已经死了。原因就在于人性——潘序伦的仁厚大度与顾准的知恩懂感激。

1940年他只身赴苏北新四军工作，留下因流产以及孩子早殇的悲痛而身体非常虚弱的妻子汪璧和一大家子老小。潘序伦凭着他的声望和面子，将汪璧介绍到华懋饭店做会计，每月可有百余元的收入，足以暂时维持他在沪家庭、母亲、兄弟的使用；1941年，潘老板接到由重庆周公馆转来的弟子顾准信函，“说他已去延安，生活当然十分艰苦，希望我可以汇些钱给他补充衣食之用。我随即托周

公馆代我设法汇给他已经相当贬值的旧‘法币’一万元” 潘序伦《顾准和我的一段史实》。

潘序伦对顾准一生的影响是重大的。无论顾准怎样“调皮捣蛋”，两人的相互“玉成”都是不争的事实。潘序伦与称自己“倾心西方文明” 文稿 P423 的顾准至少在“颜色”偏好上是相近的。这一老一少读书人除了惺惺相惜，更难能可贵的是潘序伦脱尽“东方式嫉妒”的爱才、惜才之心——在“出走”后的弟子情势危难时帮助他躲避追捕，经济窘困时主动伸出援手，再后来在爱徒“一败涂地”时绝不落井下石。得知顾准去世，年近耄耋的他伤痛不已，老泪纵横。

但“秩师”是促使“娜拉”走出安乐窝，走向革命江湖的海尔茂先生，又是很显然的。再说，谁又说过娜拉女士出走后对海尔茂先生就恨之入骨，再见面就要“白进红出”呢？大家道不合不与相谋罢了。就算秩师于顾准和海尔茂于娜拉有相似之处又如何？这是人性，无关什么劳什子“阶级性”。只是和中国许许多多事情一样，自有了鲁迅的名篇，又被人夸大其词和煞有介事到了无趣罢了。娜拉是走向“个性化”的“个性出走”，顾准则是走向“群体化”的“个性出走”，两者很难同日而语，和日后顾准——娜拉的“第二次出走”更难同日而语。这第二次的“娜拉出走”，顾准甚至扯上了考斯基：

“论到夺取政权，Kautsky 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Kautsky 对了。” 文稿 P387

非同小可，非同小可！

和中国千千万万读书人彼时奔向革命，奔向中国共产党一样，顾准出走更重要的原因，是救亡，是由救亡生出的罗曼蒂克情结；是革命，是由革命生出的“朦胧的憧憬”，是一颗平凡、可爱、美丽、健康的革命浪漫主义硕果。

2. 救亡，革命与浪漫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是为9.18事变。

9.18改变了中国和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它断送了中国曾经有过的“走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已

经发生的一百年”之路的希望——以工商文明取代动乱和暴乱、暴政和暴民、战争和阶级斗争，但同样达到小康、同时走向宪政之路的希望。而且，这何止仅仅是一个“希望”，它其实已经萌芽、吐蕊，并且在顾准尚在“小姑私塾”接受基督教教育时就进入了一段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的好时光。只是这段“好时光”实在是太短促了，短到完全来不及孳生一种力量，一个阶层并强大到足以阻止这场异族的入侵。我的传主，就成长在这个“黄金时代”。假如没有这一场灾难，他本应是这个阶层的一员，这个时代的中坚。

如果说 9.18 事件因为距离上海还远，上海人民还没有被侵略者的暴行彻底激怒，那么 1932 年 1 月 28 日的 1.28 事件就不同了。28 日午夜 11 点 30 分，日军海军陆战队 2300 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的每一条支路——虬江路，横滨路等向西占领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1.28 事件爆发。

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正式复出，制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对日方针并接受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5 月 5 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政府的软弱给民众造成的影响是恶劣的，它不啻给原本就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兜头浇上了一瓢滚油，也是令成千上万个“顾准”出走的原因。

“真正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九一八以后的民族危机，是挽救中国危亡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朦胧前景两者的结合……。”

顾准和他的同志们对“国”的失望、绝望是他们决心“出走”的最重要原因。

如果说《家》中觉新的“出走”，原因是下决心要背叛家庭，《白毛女》中大春的“出走”，原因是被社会逼迫过甚，那么这两者都不是顾准“出走”的原因。顾准和当年中国大多数知性青年一样，他们的出走是“救亡”+“革命”+“浪漫”=“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产物，无论他们走向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1932 年，未满 17 岁的顾准在精读银行学，货币学，银行务实以及普通经济学等专业书籍的同时，也开始阅读日本经济学家津村秀松的《国民经济学原论》、日本最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以及他介绍辩证法、唯物论、剩余价值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論的各种书籍。为

了能从日本人那里直接吸取马克思主义精华，他开始自学日文并很快到达阅读原文的程度。这又比同时代人尚且还没有中文马克思可读的状态超前了许多，也是他持续一生的哲学思辨的开端。

此外，英文版的《中国论坛》上苏区和红军的消息，《读书月刊》上中国社会史论战，《生活周刊》上的福特主义，“许多描写苏联十月革命、内战、建设的苏联小说”等等也都在他的阅读范围内。比起那些还沉迷于张恨水，秦瘦鸥的同龄人，顾准的思想更是超前和深刻了不知多少倍。

未满 18 岁，他就判断自己已经“跨过启蒙期”。不久前才刚从安那其主义的狂热回归平静的他“思想再度急剧左倾”，热烈地信仰起共产主义来。

刚刚看过的由法国人巴比赛撰写的斯大林传记——《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在他眼前树起了一个活生生的“革命者”并且是“职业革命者”的高、大、全形象——勇敢，坚毅，果断，智慧，沉着，英俊，挺拔，圣洁。七次被捕，六次流放，五次逃出的传奇更是为他陡添无限的神秘和浪漫。斯大林符合了少年心中有关“英雄”的一切标准。

“30 年代初我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苏联的影响，斯大林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描绘斯大林巨大形象的巴比赛（当时著名的法国作家）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许多描绘苏联十月革命、内战、建设的苏联小说却出版的不少，所以苏联和斯大林的形象，对于我多少是圣洁的。”

这个代表着新的世界、新的人类、新生活方式的新人，令他心醉神迷。这才是他希望成为的人，而不是潘序伦那样西服革履，公文包，黄包车，满嘴洋文，一副“资本家走狗”的模样。这才是他憧憬的生命，而不是十里洋场，几间斗室，整日介狗苟蝇营，月末领那折腰的“五斗米”回家的猥琐。

上海滩芸芸众生的公事房，怎么和彼得格勒热血沸腾的街头相比？

爱多亚路上算盘噼啪的庸碌，怎么和西伯利亚铁镣叮当的高尚相比？

《会计季刊》、《会计学报》，怎么和《斗争报》、《真理报》相比？

《簿记》、《题解》、《务实》这些劳什子怎么和《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相比？

……

哪个少年郎没有过把“浪漫”当面包的时候？更何况在民族危亡关头！在如此的高尚、圣洁和浪

漫面前，顾准下决心“绝不作潘序伦第二”。

正在此时，刚回到上海的好朋友夏增寿向顾准说起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并且还被捕过的经历，这令已经被浪漫充满的17岁少年心更加波涛汹涌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就站在眼前，虽不像斯大林那样高大伟岸，可好歹也被当局“军法审判坐了几日牢”，出狱后才回到上海。未经沧海未经水的顾准立即把他看做导师，忙不及地“向他请教许多问题”。

此时的顾准，已经“把我党（中共）看做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和“中国唯一的前途和希望”，同时也立下了“我必须投身其中”，做一个像斯大林那样的“职业革命家”的志向。

虽有如此的早熟，毕竟此时的顾准还是个17岁的少年郎，17岁少年郎的全部浪漫他一样都不缺。在为革命的戏剧性效果激情燃烧的同时，他也会“走过店铺陈列的维纳斯雕像的最粗劣的仿制品的时候，实在禁不住目迷神眩”^{文稿 P229}。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专属于少年人的浪漫，谁又能说后者不具有和前者同样的真挚和纯洁？

当两种浪漫相遇，会有何等的激情迸发和何等的力量产生就不难想象了。

1933年，18岁的顾准朋友圈中开始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他们谈哲学，谈中国共产党和她的组织，谈民主集中制，谈唯物论、辩证法，谈马克思，谈斯大林……。没有场地，他们就围着上海南市的老城厢一圈圈地走。他们交谈着，争论着，憧憬着，一圈、两圈，直到东方既白也毫无睡意。

和所有少年人一样——此时的顾准和他的同伴们充满了“归属”和“分享”的快乐，这也许是人类在聚合时最愉快，最幸福的感觉。除此之外，这群少年还充满了“浪漫感”——充满幻想，富有诗意，和《斯大林传》中传主“革命的浪漫主义”多么相似，差只差在我们只是“坐而谈”，那么好吧，让我们“起而行”！

3. 结社找党

已经完全不能满足于“坐而谈”的小伙子们，凭着直觉感到“起而行”的前提是必须“结社”。

这群年青人中有被顾准仰视为革命志士，自己政治上的启蒙者的夏增寿，三哥陈怀德，立信的青年同事，立信夜校中他的学生，还有一位立信同学会的创始人——李建模——三十多年后“革命第一夫人”的“革命样板戏”中“革命主角”郭建光的原型，只是此刻“建模”还远没有“建光”那么高大伟岸，身为一介布商，是常熟梅李镇的陆同福布号上海分号的经理，有时会到闽浙赣一带卖布收账。李建模的第一次到会就给社员们带来红军反围剿的消息，令小伙子们惊叹不已。

社名很快就有了，就叫“进社”，取前进、进取、进步之意，召集人——社长就是顾准。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社长是李建模。这也难怪，李比顾要大七八岁，又是第一届立信同学会主席，做社长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不过顾准从来在“长者”面前是不犯怵的，别说二十几岁的李建模了，就是面对大自己一倍的老板潘序伦又如何？所以更大的可能性是，进社的核心人物就是李建模和顾准，无所谓社不社长，顾准也只是说自己是召集人嘛。

没有上级领导，没有组织章程，没有行动纲领，就“是一些决心遵照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从事革命运动的年轻人，在没有找到党组织的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的一个革命团体”——进社，就像当年无数自发的抗日救亡和革命的秘密团体一样诞生了。社址就在南市小南门外南仓街仓基弄4号顾准的家里。

“对我个人来说，进社成立之时，就是我青年时代从跟随旧社会的方式生活下去，转变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思想转变过程的结束。”

这里位于城市贫民居住区，老式石库门风格，他一家住一个楼厢房，有间独立的厨房，社员们进出无需经过大门。“社址”就在这个灶间，每周聚会一次，大家谈读书心得，讨论时局，争论中国社会的性质。家中只有自己母亲这一支的亲人——母亲和未成年的弟妹们。作为家里的“顶梁柱”，顾准有相当的话语权可以在家里“自由结社”而不用顾忌家人，更何况母亲从来对这个儿子是言听计从的，三个幼年的弟妹又都是“五哥”的崇拜者。“谈论往往是极其热烈的”。

这些“极其热烈的谈论”内容，从顾准写于1960年代末的“历史交代”看，中国社会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了很大部分。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曾经有过一次中国社会性质和史观的大论战。其时陶希圣的“宗法

封建结构论”，顾孟余的“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论”，梅思平的“商业资本主义论”，李立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论”，严灵峰，任曙的“资本主义社会论”纷纷出台，托洛斯基甚至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已‘无条件地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郭沫若“有着重大革命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闪亮登场。这一曲雄壮非凡的“学术”、“革命”交响乐拉开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式引入中国的序幕。

是时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并不多，且大部分是日文和俄文的二手资料。面对“马克思主义”如此庞大、繁复的一个思想体系，中国的信仰者们最需要的是准确而数量足够的母语译本。可遗憾的是，最是一丝不苟的德文在这里碰上了最是大写意的中文。西方的哲学、逻辑、思想、思辨经典原就和中文的语言体系差异巨大，即便是译成了汉语，也不意味着中国人就有了解读的能力。加上汉译家的缺如和水平低下，令饥渴的信仰者无法消化，这才给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之类的“大力丸”在中国畅销的机会。

中国的信仰者们接受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摸索顾准留世并已面世的少量文字，他应该是在首先接受日本人河上肇偏重于“历史的经济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不是“基于阶级关系对社会的驱动，即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做哲学思辨的。这和极端地倾向于阶级斗争，“听见‘造反’两个字就高兴”，能把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的道理压缩为一颗造反有理牌“大力丸”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巨大的差别。加之进社初期的社员们几乎都是立信或立信夜校这架经济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且包括顾准在内，多能阅读至少德文英译的马克思。由此推测，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极可能会更加接近前者而不是后者，即“经济的”而非“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顾准多年后能从史学、哲学、逻辑学、人学等多角度思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出其中的同异与反差、精彩与谬误、逻辑的破绽与实证的缺失，和他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接受和偏重的角度有着重大关系。

初创期的“灶间结社”只有八名二十岁上下的男性青年，最大的李建模二十六岁，顾准还未满十

九。三个月后，一位女性加入了进来，她是立信夜校顾准的学生，比自己小一岁，是年二十岁。

她就是后来成了顾准妻子的方采秀——汪璧。

她是18岁的顾准心目中“圣女贞德”与“白雪公主”的结合体。勇敢少年横刀立马，轻取“情敌”，很快俘获了这颗同样浪漫的少女心。然而从第一次踏进灶间的一瞬起，这个女子的命运就注定了——她将得到一位才华横溢的爱人——浪漫，温情，智慧，勇敢，挺拔，高贵，集几乎所有男子汉能够具有的优点于一身，却也要接受因为他的天赋秉异和“将天才视为责任”的不可救药的性格而带来的另类人生和一个凄苦不堪的生命终点。嗟乎，又一颗“四万年结出的果实”。

下一步，进社社员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千方百计地找党。

小伙子们以自己的眼光猜测、判断着“谁是共产党员”，而后就找上门去，要求加入。陶行知的山海工学团，胡乔木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联）及下属中国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中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联）都被他们找到，却不得其门而入。

1931年后的中国尤其上海和江浙一带，自发或由各种党派领导，操控的革命团体、抗日队伍多如繁星，情况极为复杂。仅顾准的“历史交代”就“交代”了不计其数的党、派、团体、队伍、委员会、联盟——“武卫会”，“救国会”，“读书会”，“文委”，“临委”，“教联”，“社联”，“语联”，“洋联”……，洋洋大观，各有传奇。这里既有李建模置身其中的“进社”，也有“郭建光”英勇抵抗的“忠义救国军”。仅仅李建模——“郭建光”就堪称传奇人物：进社的组织者——某“自首宣言”的领衔人——跑单帮的买卖人——“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即“人抗”创始人——中共常熟县委书记——苏南新四军的“理财能手”——新四军北撤时沉船事故中的烈士。还有曾被顾准“仰视”过的夏增寿，不久就因疾病加上失业而迅速消沉，连当年的“仰视者”顾准也对其“一个党员被捕出狱，重新有机会找到党的关系时却缺乏热情”颇有微词。

顾准和他的同伴们在茫茫人海中一遍一遍地找党，直至找到隶属于由基督徒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下的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会议同盟（远反）。

“远反决定和进社保持领导关系，进社组织保存下去并要发展”。

很快，远反就派人来指导他们起草《进社纲领》，“内容参照社会史论战中中共新思潮派的观点，指出中国现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是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是社会主义。”除此之外，上级还指导他们出一个油印内部刊物《前卫》，选出一个干事会性质的机构作为领导机关。

进社立即被要求“全体社员都参加当时正在筹备、不日开班的青年会读书会”。

顾准和他的同志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要开始了。

4. 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

在顾准若干年后的“历史交代”中出现的这个“青年会读书会”，其全名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当年他省略了“基督教”三个字是很容易理解的——不找事，不给人“节外生枝”的机会，这是生存之道，无可厚非。

以《圣经·马可福音》“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为会训的基督教青年会，1844年创建于英国伦敦，从一个对个别青年施加影响逐渐扩大成对整个社会推行改良、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督教外围团体，也是全球性的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总部设在日内瓦。中国最早建立的青年会是福州英华书院和河北通州潞河书院的青年会。1900年1月6日，上海基督教中国青年会成立。1915年11月召开了青年会第七次全国大会，改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一直沿用至今。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论及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改革的影响时，提到对中国的西方教育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就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从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1885年到中国直到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创建概述》。

这里也是一块有神论和无神论者，基督和反基督势力激烈争夺中国青年的滩头阵地。早在1927年于3月莫斯科召开的共产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决

议”，其中第九项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为“团对于基督教青年会及反基督教运动之任务”：

- “甲、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因对于中国民众宣传美帝国主义为职志，其对于学界宣传尤甚，该团（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者注）应公开反对。团应联络青年，使对于基督教会员表示同情，其往来该会俱乐部、学校运动场之青年工人，尤应格外殷勤招致，并需认定此等事件为团一种重要任务。勿论如何，不宜将此等招致之可能和必要，视为虚假，仅奉行故事，即为已足。
- 乙、团应尽力提倡革命主义，使基督教青年会之青年均起而反对帝国主义，对反对帝国主义之青年及攻击基督教会青年会之团体，团应竭力设法助其进行；并将其大多数青年之劳工渐次招致入团，使其脱离基督教青年会之关系。遇基督教青年会中有反对该会运动时，团应立即设法为事实上之指导。
- 丙、团为实行上项任务起见，应在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中，设法组织国民党左派分部，及其他研究政治之各项团体。
- 丁、所有上项计划，必须使反宗教运动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时方可实行。”

有神论与无神论者，基督与反基督势力对这块原本就是前者领地的争夺，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进社接受刚刚找到的上级——“远反”的第一个指示，就是将进社成员分到读书会第一期甲、乙两个等级的五个班中去，尽快掌握所在班级的领导权。这一种行动方式，若干年后有个现成的名词叫做“掺沙子”，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远反指示进社到读书会“掺沙子”，就是要他们在阵地的最前沿执行共产青年国际的决议。

正在热烈拥抱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已经“把我党看做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中国唯一的前途和希望”的顾准，对于上级指示是否还有一些因幼时所受基督教文化教育而生出的踟蹰，从他面世的文字看不出来，却也绝然找不到相反的文字。按照文革时代检查交代常用语，说到此处扯上一段自己当年如何不但抛弃了“帝国主义精神鸦片”还“打进敌人内部战而胜之”，还是大有益处的。但这样的顾准文字，至少时至今日，从未出现过，除了“捣徐家汇天主堂，很好，上海这个硬块就得好好整一下才行”^{55.9.19}那一句很可能事出有因的狠话。后文将会说到。

很快，“掌握领导权”一项，除汪璧之外，小伙子们都做到了。毕竟是已经进入社会并拥有较多

见识的青年，比起读书会中尚还在校读书的少年人，他们成熟和老练得多，在竞选班级领导人时占据了很大的优势。汪璧的失败则很可能是败在她的性别上，毕竟是时中国还是毋庸置疑的男性社会，尤其是在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团体中。

“青年会读书会是由《读书生活》的李公朴，柳辰夫发起和组织的，读书会第一期（1934/V—VII）的实际主持人也是李柳两人。也许因为基督教的招牌可以掩护读书会的左倾面目，所以活动由青年会出面来办……又基督教青年会的后台美帝国主义和妄图吞并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也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满，这大概就是上海青年会乐于承当这次读书会主办者名义的原因。确实，这次青年会只以承当主办人名义为满足，它从来没有企图在读书会中宣传‘福音’。”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上海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基督教文明日益兴盛。19世纪以降上海集中了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在英、美等国留过学，或由西方传教士在上海所办的教会学校中受过系统教育，这给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造就了一批基督教界的领袖人物，使上海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中心。李公朴，柳湜以及若干其他读书会的“导师”很多是留英留美归国学者，他们对青年的授课与指导即使刻意去基督教化，西方的民主、自由、共和色彩也绝不会少。

读书会五个班级总共大约二百五十名左右的会员，“各按本班会员要求选定题目，预读有关书籍，集会时座谈读书心得，进行讨论”。

十分可惜，顾准留下并面世的文字里虽然大量讲到这个读书会，却单单缺了“读什么书”的内容。他仅提到讨论的中心往往是“中国往何处去”，“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并形容读书会实际上“成了公开宣称马列主义和我党政治纲领的讲台”，“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没有回手的机会”。他分析这“也许碍于基督教青年会有美帝为后台，害怕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没有采取强制解散的镇压手段”。除了在一份“叛徒主办的下流政治刊物《社会新闻》上，大骂读书会‘卡尔·马克思操耶稣基督的屁股’而外，它对读书会‘放任自流’的”。

可见读书会至少在第一期，马克思著作应该是主要读物。

顾准记录下的第一期读书会的高潮，是8月中旬自己在结业式上以领导者的姿态宣读刚刚成立的，以宋庆龄为主席“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武卫会）”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到会的二百多人一致拥护这个纲领，并当场决定成立“公开的武装自卫群众组织”。顾准也就此暴露了自己“共产党”的身份，虽然彼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

遗憾的是“公开的武装自卫群众组织……终究因为没有群众救亡运动的高潮”而无果。

读书会结束了，顾准和他的“进社”却和上级领导——远反的刘丹失去了联系，半个月前的一天，他失踪于一次流产的飞行集会，可能是被捕了。顾准也因此自我“流亡”，搬到租界的亭子间暂住以躲避危险。此时他所在读书会甲班的另一名干事孙化新将他带到了一位名叫林里夫的人面前，此人大顾准七岁，是以宋庆龄为名义主席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的中共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

林里夫，他是顾准的生命中的又一位有趣人物，不能不在后面单列一个章节叙述。顾准在青年会读书会上慷慨激昂地宣读《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就是遵照刚刚“接上头”的武卫会林里夫的指示而行，会后进社即遵照林里夫的指示解散，“社员愿意参加其他革命组织的各自决定，其他成员一律转入武卫会会员”。

“青年读书会是在1932年1.28战争中的抗日高潮以后，1935/XII/24大示威及其后的救亡运动之间时期内，极其罕有的一次公开集合革命群众的力量。”

读书会是在顾准第一次以一个革命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舞台，是他一生的骄傲，他也因此对读书会留下带有感情色彩的回忆，在多年后的“历史交代”中以很大的篇幅做了生动的描述。与他大部分“检讨式”的冷静文字相比，这部分文字甚至给人留下“自夸”的感觉。在那个“批完右倾批左倾，批完左倾批右倾，左右都是罪过”的年代，这样写“交代”还真是需要勇气的。

顾准认为“1934/IX——1935/VII 武卫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第一期青年会读书会各班中的积极分子为其骨干的”。

这些“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的话语，日后曾引起林里夫先生的不满和反感。同样年轻、血气

方刚和才华横溢的顾、林之间也有过不小的纠葛，以致“推迟”了顾准的入党时间。几十年后，这一双革命的儿女先后被自己的革命母亲吞噬（林里夫还不止被吞噬过一次，其遭遇用“死去活来”形容绝不过分），他们前嫌尽释并在顾准生命的最后时光演绎了一场让人潸然泪下的人性正剧。

5. “职业革命家”（上）

青年会读书会结业式上出现的顾准，已经初具“革命家”的雏形——勇敢，激昂，自信，沉着。距离真正的理想——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又近了一步，他无比兴奋。

眼下的他正在“流亡”中。半个月前那次“飞行集会”不明原因的流产，是他认为必须搬离结社的“灶间”而住到租界亭子间的原因。进社成立五个月后就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近二十名代表代表着上海和常熟分社的二十七位社员，由远反的刘丹同志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会上还作出了一项又庄严又勇敢的决议——数天后的八月一日在南京路外滩举行一次“飞行集会”。

飞行集会——又一个充满浪漫诱惑的名词，革命者们呼啸而聚，高呼口号，慷慨讲演，飞洒传单，又呼啸而散，三五分钟，来无踪去无影，光是想象一下就能让人热血沸腾。却不料事到临头由于组织者的无踪无影无疾而终。

飞行集会后来被视为“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1930年代后期就销声匿迹了。我的传主第一次参与飞行集会就没有成功。在无法做出准确情势判断的情况下，顾准立即决定“自我流亡”——离开立信事务所，也不回家而是住到租界的亭子间去。虽然他明知警察局很容易就能查到进社的活动地点，失踪的领导者也知道其他进社社员的姓名和地址，可“再做其他安全措施已经没有经济力量”，情急之下，也只好如此。好在有惊无险，进社和它的干事长顾准都“丝毫未受影响”。

此时的进社社员已全数打入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掺沙子”并“除汪璧而外”全部取得了班级的领导权，因而才有“林里夫要求在结业式上开这一炮（宣读《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时候，决定由我（顾准）来担当这个任务”。一是顾准已经身在租界“流亡”，基督教青年会也在租界中的四川中路

上,他没有被追捕的危险;二是很可能二十五岁的林里夫已经将十九岁的顾准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职业革命家”了。

职业革命家——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俄文),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英文), 无论你操何种语言,它都是一个十分顿挫铿锵的称谓,一种罗曼蒂克的极致,也是青年顾准,青年林里夫,青年李建模们的最高理想。

这个称谓诞生于二十世纪头几年的俄罗斯,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先生所赐。当他还在东西伯利亚流放地考虑建党问题的时候就想到,党应该是一个形成严密结构的、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组织。这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是一些“不仅能够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够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是有领导者身份(且这种身份相对稳固)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工作具有秘密性。他们是集权的,责任是“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一经选出,他们即被赋予因势而变的全权,由十多个(不超过二十个)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实行集权体制。列宁的这种关于“职业革命家”的理论和具体做法并未得到党内的认可,也是导致他与托洛斯基先生分道扬镳的最重大原则分歧之一。托氏和国际著名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例如罗莎·卢森堡、列夫·马尔托夫(孟什维克领导人)认为,“职业革命家”的产生必将导致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卢森堡更直接批评职业革命家是集权的组织,并将列宁的这种主张形容为涅恰耶夫主义、波拿巴主义、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集成,却独独不是马克思主义。

但是在1930年代的中国,共产国际关于“职业革命家”争论的声音非常微弱,完全被淹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托派”呼声中。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的“革命海归”陈绍禹(王明)眼下正掌握着中共领导权。7年前,他亲身参加过莫斯科红场上发生在斯大林鼻子底下的那场中国人的斗殴,那是一场活活打出了一个“托派”并把托洛斯基“打出”了联共的撕打,此人也因此成为联共中央炙手可热的红人和最坚决的“反托派”,同时在联共支持下成为一名标准的职业革命家。而斯大林,从1903年7月25日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总督接到彼得堡“将十六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置于警察直接监视之下”的一刻起,名单上排在第十一位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先生就成了职业革命家,

尽管那时宪兵当局在成百上千个流放犯中根本就没有把这位“高加索乡下人”当做一个什么重要的革命人物。

从《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中认识斯大林的成千上万中国青年，其中也有我的传主，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高大、圣洁的形象，看不到的是这个形象后面“集权”，“专制”，“独裁”，“暴政”，“奴役”……的意味。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终其一生也不能或不愿思辨这一对“形式”和“内容”双生体的意义，但我的传主，多年以后痛定思痛，把它们思辨了个天翻地覆，更难能的是这些思辨变成了铅字，把中国学界震了个地覆天翻。

这是后话，还是先来看十九岁的他和他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吧。

“30年代初期我思想开始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苏联的影响，斯大林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

读书会结业式上公开了共产党身份的顾准已经把自己视作职业革命家了——他已经是共产党，但还不是共产党员，这多少有些遗憾。

从1934年2月进社成立到1935年2月被广东海南岛人老何“征求入党”，顾准入党的“延时”过程和原因相当值得“顾迷”们去探索。

有关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所有史料和文字都众口一致地肯定是在1935年由林里夫介绍入党，林里夫老人自己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是这样叙述的。但这和顾准自己的叙述相差很大。他在“历史交代”中这样说：

“代表总会来领导沪东区委的是党团组织部长广东海南岛人老何。1935/II老何征求我入党，在举行简单入党仪式后不久，（我）就调离沪东区委，转任总会宣传部副部长。”

无论是林里夫自述还是别人的他述，顾准在1935年入党的月份都语焉不详，远不如顾准自述中斩钉截铁的“1935/II老何征求我入党”来得痛快。入党介绍人是谁，这并不是很重要，蹊跷的是“征求”这个动词，和人们熟知的“申请”一词在词义和词意上都有着巨大差别。这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坦率一点说吧，顾准的入党是被动的“被征求”而不是主动的“去申请”。

从1934年2月到1935年2月这一年的时间里，他曾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和思索这个“党”，思索自己要不要加入，而不是盲目地立即要求“入党”。在那一年的时间里，他随时都是可以申请“入党”的。作为一个横跨工商、金融、银行、教育界的天之骄子，他是一个榜样，一种号召力，恐怕不会有什么党，什么派会将之置之门外。但是他没有，而是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读书和行动的过程中考察了这个党。一年后在依然没有考虑得太成熟的情况下，囿于革命环境的变化和做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需要，他最终接受了“广东海南岛人老何”的“征求”，正式加入了这个党。没有“介绍人”，没有党证，没有预备期，只有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至于是否“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宣誓”，顾准没有记录。

广东海南岛人“老何”实际上是当时的武卫会组织部长兼中共党团书记李定南，“老何”是秘密工作的假名还是顾准的记忆误差，已经很难判断。多年后林里夫的回忆录里却又出现“1935年介绍顾准入党”的情节，顾准自己也说：

“进社这一伙人参加武卫会后，林把我调到沪东区，确是为了把我和原进社的主要部分隔离开来。林说他不知道我们这一伙到底是些什么人，把我调开，直接了解下面的人员，当他认为李建模、杨仁祺等人都是可靠的，把李扬等人发展入党以后，才吸收我入党。7月份成立市分会，等于把这一摊‘还给我’云云。”

看来在顾准的入党问题上，“老何征求”在前，林里夫“吸收”在后。这个细节非常有趣，既可以解释为上级党对他的青睐，又可以解释为上级党对他的考验。日后的几十年，这种“青睐和考验”的爱恨交替一直跟随着我的传主，如影相伴，从未间断，一直到他被“排出母体”。

读书会结业式会后，顾准依然回到了租界的亭子间，也不再爱多亚路上的立信事务所上班了。当老板潘序伦请求他继续留在事务所工作时，被他“半因……危险，半因憧憬多年的‘职业革命家’生活现在才亲身体会，浪漫主义式地拒绝”了，却“留了一条资本主义尾巴”——在亭子间里续编未完成的《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毕竟职业革命家也是人，柴米油盐不能没有，像顾准这样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个体的革命家也不可能得到共产国际或者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费支持，上海滩上又不能打土豪分浮财，所以他只得“答应潘在所外给他写《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论字数给稿费”。

如前所述，此书被潘老板有商有量地从他手里“夺”了版权，转手当做人情酬报送给了帮他翻译并以他的名义出版的《成本会计》的两位立信职员译者。此前当潘序伦试探着和他商量此事时，他“慨然同意”，他说他“志不在此”。出版后的稿费当然又入了潘老板的“公帐”，他倒也不以仅仅只得了三四百元稿费为忤。

这年年底，顾准和汪璧结婚。没有婚礼，也没有同居，一直到八个月后的1935年夏，他们才开始像真正的夫妻那样生活在一起。

6. 林里夫

林里夫，顾准生命中的又一个有趣人物，恕我不敬，和顾准一样也是一位“未成器的职业革命家”，而且他和顾准之间生命线的交错纠缠延绵了许多年，不能不写。这位顾准的上级党领导，也是一位才子，1927年考入奉系军阀以“京师大学堂”悍然替之的北京大学，亲历了刚刚失去李大钊教授的沙滩、红楼之痛。1929年愤然退学东渡日本，因为那里是“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最多，马克思主义学说流传最广的国家”《林里夫集》，而他，和顾准相似，热衷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十几岁上就爱上了《剩余价值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类书籍。同年9月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日特别支部一员。2天后即因参加纪念国际青年节的游行被捕，关押一年三个月后于次年1月出狱，3月回到北平。1932年上半年在上海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常委研究部长，下半年在北平任中共北平市文化委员会书记，1933年在天津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1934——1936年在上海任以宋庆龄为名义主席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的中共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

正是此时林、顾相遇，林25岁，顾19岁。

通晓英、俄、日、德四国文字的林里夫，不但已经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并且是一位走南闯北，老练的职业革命家了。遇上顾准这样正在“锻炼”自己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的小青年，除了英雄间惺惺相

惜外，双方也免不了“三岔口”式的互相试探。

林里夫起初对顾准就不信任。

1934年8月初两人第一次会面，顾准的才华、锋芒、锐气和傲气就令林里夫吃惊不小——好一个凛凛然的小伙子，手下还带着这么一帮几乎个个都是知识分子的青年，和他在日本，北平，上海，天津接触的人群都有些不大一样，感觉也不大一样。他有点发懵，闹不清他们的来历。

除了指示顾准在不久后的青年会读书会第一期结业式上“亮相”，宣读《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外，出于多年地下工作者的本能，他几乎是立即提出“解散进社，进社社员除愿意参加其他革命团体者而外，全部参加武卫会”，作为考验这帮人的第一个举措。

“这段时间内，林里夫直接参加进社的会议，和李建模、童志培等人有接触，和杨仁祺也有直接接触。8月底或9月初，林里夫告诉我武卫会决定成立区委，要我去当沪东区委的总务。进社原有人员和读书会中发展起来的人员，主要部分不在沪东……”。

这相当于把顾准和他的进社隔离开了。

如上一节所述，林里夫当年先发展了进社的李建模等加入共产党，次年2月代表总会来领导沪东区的党团组织部长广东海南岛人老何才“征求”顾准入了党。换句话说，林里夫并未在第一时间“发展”顾准入党。

顾准的“历史交代”里所有谈到上级林里夫的文字都非常冷静，只陈述事实，不做评论。但即使如此，细心人仍能从中看到这个傲气的年轻人对这位上级是不服气的。

例如他说，“第二期读书会上的理论斗争是在林里夫领导之下进行的，当时进社已经决定解散还未解散，进社的几个领导成中，参加了第二期的是李建模。不久，因为在国民党控制下的读书会进行理论斗争既无意义，又太危险，我们就全面撤退了。从此读书会就毫无生气，第二期是怎样结束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第三期当然是没有的了。”

再例如，他说“1934/XI——1935/VII 武卫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第一期青年会读书会各班中的积极分子为其骨干的。”而各班中的骨干又都是进社社员，言下之意，武卫会的发展完全是靠进社在支撑。

再例如，他说“武卫会下面的组织显然都是在进社——青年会读书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因 1934/IX 以后我和整个组织一直是隔绝的……”，意思也很清楚——我和我的同志们发展起来的进社——青年读书会支撑了武卫会的几乎全部基础，我却被隔离了开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

在顾准写于 1960 年代末的“历史交代——1934-1940 年的上海地下工作”中，涉及林里夫的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且颇多微词。而林里夫写于 1980 年代有关武卫会的自述，全文一万五千字，提到宣传部副部长，“小青年”顾准的却只有一处，寥寥数语，二三十个字而已。

这些文字，一个是年过“知天命”的人做自己 19 岁时的回忆，一个是耄耋老人做自己 25 岁时的回忆，虽然都没了稚气只剩下成熟和老练，但细心人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闻到当年青涩的气味。林里夫很有可能是顾准推迟入党的原因——这位上级和他在《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里看到的职业革命家有着相当的差距，难道顾准就不可能起过“林某是共产党，我得再观察观察”之念吗？

但是毕竟林里夫是他第一个“接上头”的共产党员和党的上级，顾准自己不也说在某年某月前他对林里夫是“无限信任的”吗？这个某年某月就是 1935 年 7 月，顾准入党 5 个月后。

出于非常非常复杂的原因，例如内部分裂（连顾准都说过“我对武卫会实行过坚决的分裂，然而分裂不是由我开始的”）、被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案牵连、“叛徒”的出卖以及国民党政府的破坏等等等等，武卫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军事部长李国章，上海分会会长李建模等被当局逮捕，“广东何由林里夫决定回海南岛老家，此后即不知此人下落。总会干部，遣送他去的，据林里夫说还有……等人。7 月以后，总会领导机构实际已不复存在”。而宣传部副部长顾准遵照上级林里夫的决定，“立即转去北平工作”。

从日后所有面世的史料以及当事人自己留下的文字看，当时除了林里夫自己，谁也不知道武卫会已经和上级失去了联系，一切决定都是林里夫自己做出的，但在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所有的叙述都不一致。这段历史也是“宋庆龄史”上语焉不详，忌讳莫深的一段，竟至未出现在 1980 年孙夫人去世后的悼词里。

此刻的顾准已经完全不信任林里夫了，他认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是出于对职业革命家的

铁纪——下级服从上级的严格遵守，他依然服从他，比如接纳他和太太在顾家避难；听从他的指示辞去一切社会职务，专职做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按照他的指示和妻子汪璧一起“流亡”北平，又按照他的指示4个月后返回上海。

1934年8月27日、28日，上海各主要报刊刊出以武卫会名义向国民党当局归顺的“自首宣言”，如前所述，其“领衔人王顺芝就是李建模”。这又是一段至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罗生门”故事。就因为这次变故，林里夫一生吃尽了苦头。上级的责难，同志的怨怼（也包括顾准），多少年被党排除在外都不算，仅仅一个延安整风就差点要了他的命——在刑官康生的刑讯室里，他被打得死去活来，受到的酷刑曾被他形容“疼得头上都要长出角来”。可这条东北汉子硬是挺了过来，不但没有死，还凭着他少年时就打下的童子功日后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

延整之后，他坐了整整7年延安的监狱，之后虽然留着一个“保留再次被追究历史问题可能性”的尾巴恢复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但职业革命家的理想是彻底破裂了。凭着掌握多国语言的能力，他转而开始做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工作和党的经济工作，逐渐成为中共经济学家并在若干年后和老同志，老下级顾准相会在孙冶方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

李建模-王顺芝-郭建光-革命烈士，林里夫-职业革命家-叛徒嫌疑人-经济学家，顾准-职业革命家-分裂分子-大右派、反革命-思想英雄……这样的个人史在革命时代原是寻常事，但在林里夫因1935-1936年的种种不当受到严厉审查之际，顾准的两次表白却给人留下了不寻常的印象：

一次是1944年，延整末期，“林里夫虽然还住在保安处，已能出来访友，此后我还见过他几次。我根据‘林绝不是武卫会破坏的祸首’的信念，同情他长期受审查的遭遇，见面后根本不谈我自己的‘他在此次破坏负有政治上的责任’的看法，只是尽量安慰他，组织上对他的审查必能如实地弄清楚问题，不要性急等等，还在假日请他在南区合作社饭店里吃过一二顿。”

另一次是多年后54岁的顾准在自己的“历史交代”中轻描淡写的总结：“进社-武卫会和第一期读书会，对于1935年底开始的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总还应该做出肯定的评价”。

再看他三十多年后一口拒绝“外调人员”要他把林里夫证实为叛徒的要求，你就能理解这个人的不寻常之处。那时正是某些当政者不知出于何等心理在全国上下疯狂地大抓“叛徒”的时候，你顾准

本来就是老右派了，随便再做个伪证证明谁谁谁是个叛徒，对自己肯定有益，至少能证明你自己暂时还不是叛徒。但是顾准拒绝了。

顾准常常，尤其是在晚年，哀叹中华文明中没有“不可作伪证”这样一条道德戒律。这是他从“小姑私塾”时期就烂熟于心的一条律法，他的一生也都在小心翼翼地恪守着这条律法。无论是上海时期，新四军时期，延整时期，党校时期，干校时期还是文革时期，他从未触犯过它，既不为事物作伪证，更不为人物作伪证。这也是他文革中多吃许多苦头，多挨许多打的原因。要他证实林里夫的“叛徒问题”只是其中一桩罢了。他当然拒绝了，以他最招人恨的标准“顾准式睥睨”拒绝了。

对他而言，这不过是出于人性本能的自然反应，不值一提。

7. “职业革命家”（下）

先把林里夫先生暂时放下，接着叙述顾准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转眼，顾准已经在租界的亭子间住了半年。虽然明知危险早已解除，但他还是无意回到南市自己家中居住和到立信事务所正常上班。用他自己的话说，“流亡生活过了半年，还无意变更生活方式”，看来他已经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小小的亭子间依稀给他一种神圣的感觉，非常美好。这种感觉可能就叫做浪漫。

顾准的“历史交代”中说到此处，两次用了“半因危险，半因浪漫”形容，可谁都能看出“浪漫”所占比例绝不止百分之五十。尤其在连他自己也承认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还不肯回到正常的生存环境，还要继续“逃亡”，浪漫成分的比例可就接近百分之百了。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做了他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该做的所有事情：

他和同志们办了一份名叫《小职员》的刊物。

“这是一份 32 开本的小期刊，除读者来稿的通信报道外，无非是由当时十分年轻的进社社员供稿……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不过几个月就被迫停刊了”。

小期刊的发行人就是被他横刀夺爱，“曾公开声言‘顾某是共产党，我就永不参加共产党’”的那位年轻人，一家皮鞋厂的小开。他也确实因为顾准“永远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也从未伤害顾准和他的同志们。解放前夕，他是民主建国会的活动分子，晚年的顾准曾和他在上海相会，欢然道故。

《小职员》在上海当年数不清的抗日报刊中实在是微不足道，连顾准自己都快要忘记了。不料30多年后，“竟有一起外调同志详细询问该刊内容、办理经过，原因是，他们的调查对象当时是店员，是这份刊物的读者，据说这份刊物曾影响他的思想转变。由此推想，这份刊物因其富于店员的针对性，也曾在革命宣传中起过十分微薄的作用”。

看来这份当年不起眼的地下刊物还是推动了当年革命的，这给晚年顾准带来一丝欣慰。

他还在“进社成员加入武卫会后，奉总会之命，到常熟的梅李、浒浦去‘巡视’过”。当时的顾准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代表的仅仅是抗日力量的一支——武卫会，而非中国共产党。他在常熟阳澄湖一带了解到，浒浦是长江上一个小口子，是江湖好汉和盐贩子出没之地，形形色色的抗日武装也都在此啸聚。若不以成王败寇论英雄，郭建光的“人抗”、“民抗”，也好，胡传魁的“忠义救国军”也好，都是在抗日这面大旗下的中国人。顾准去“巡视”的时候，梅李镇和浒浦镇各有一个进社的分社，三年后的1937年，8.13中日淞沪之战后，这两个分社成员成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人抗）的骨干成员，也造就了李建模-郭建光这个抗日英雄形象。

在“巡视”的过程中，顾准听说“浒浦这个地方可以买到枪支，心里曾经动过一下”，他“还没有想过要搞农村的武装斗争，不过觉得能够买到枪，也许有用而已”。但是幸亏，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否则多年后他可就无法坦然地伸出双手对人们说：“我的手上没有血”^{当事人口述了}，而这正是晚年顾准最著名的表白。

1935年2月顾准正式入党并被调入武卫会总会任宣传部副部长，接手“编印一份油印刊物《宣传资料》，同时不定期地针对当时的政治事变印发传单，揭露南京政府层出不穷的卖国行为，做激烈的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这些传单印刷量有时高达万份，经过基层组织散发出去”。

总会宣传部部长由林里夫兼任。说是宣传部，实际上就是顾准和林里夫两个家庭。“四哥陈怀良负责刻写钢板和印刷工作，印刷工作有相当部分是母亲干的，当时还幼小的三妹陈枫（陈棣珍）七

弟陈吉士（陈怀安）也都帮帮忙。印成的宣传品由三哥等人送到发行机关……林里夫的前妻陈碧如是总会的总务部长，常代表林来我家联系”。

1935年7月武卫会，一如上节所述，受到重创而停止一切活动，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亭子间的顾准，革命之余尊潘序伦嘱继续编写《簿记商业初阶教科书》。这位资产阶级老板真是又仗义又狡黠，明知顾准是共产党，还是人照用，薪照发，署名权当然也是照要。好在顾准“志不在此”，“经费”相对来说更加重要，于是两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倒也相安无事。不久他还被中国银行挖了墙角，“跳浜”去了中行总账室并兼任上海中学商科的教员，潘老板倒也都不在乎。

累的是顾准。夜里他要开足了马力，大量阅读汪精卫南京临时政权的《中华日报》，日文的《大阪每日新闻》和《东洋经济新报》等报纸杂志，大量搜集日蒋汪的信息，然后编写成中文文稿，秘密油印出版《宣传材料》，然后散发。除此之外还要参加党的各种会议和频繁的“碰头”，白天上班因此常常迟到，曾遭到坐等他进办公室的上司“委婉的训斥”。

在高涨的革命热情中，顾准对他的社会职业生活开始厌倦了。

“整天6小时就是拨算盘，实在乏味”，他常常把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拿到办公室去完成，老板、同事都对这位年轻“大爷”睁只眼闭只眼，谁让他算盘能打“双飞（两手并用），账目从不出错呢。

10月，林里夫指示顾准携爱人汪璧“流亡”北平。

一听林里夫要他辞去一切社会工作专心一志干革命，顾准当场就“毫不犹豫地照办了”。赶紧回过头去找潘老板解决“停薪留职”的问题，被潘序伦一口答应，“欣然同意我还在所外给他写书”。

流亡！这正中顾准下怀，太浪漫了！他和汪璧决定立即动身。

打扮成一对新婚的才子佳人的顾氏夫妇，仅仅向小姑母庆志深夜辞行后即“取道海路，乘海船到天津转北平。这是我第一次坐海船，海上风光，觉得着实迷人”。哦，何止是迷人，这是地地道道的、集爱情、危险与理想于一身的浪漫。

顾准和汪璧在北平时，爆发了12.9学生运动。虽然“我们考虑以后在北平要做秘密工作，

无意参加游行”，但后来顾准一手起草了南下学生宣传团的宣言。北平方面曾希望他们留在北平并表示可以帮助他们接上党的关系，但顾准决定“恪守秘密工作的纪律，还是等候上海的消息”。

“流亡”生活的开销很大，失去生活来源，又没有一分钱党的经费支援，不得已他们卖掉汪璧心爱的戒指以维持日常开支，但这不是流亡中的革命者最通常的做法吗？

每天顾准除了还债似的编写立信的会计书籍，其他时间就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从日文报纸上辑录东北义勇军的消息供给北平和上海的同志们。

几十年后，他对“因为那时脑袋中不存在急切求解的问题，竟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读些书”深感后悔。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五十多岁的他再一次天天跑北京图书馆，三天借一次，一次借三本书的日子，脑子里已经满是“急切求解”的问题，急不可待。对于他，这些书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世间的一切，偌大的北图，海一般的藏书，他依然嫌太少，尤其是英文的新书太少。用如饥似渴来形容那时的他对书的需要，一点都不过分。尤其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读书已近“吃书”的状态，只能用“饕餮”来形容。

“1936年一二八前夕，接到家里来信，知道林里夫要我回上海……1936/11回上海后，因为1934/VIII青年会读书会内公开提出武装自卫六大纲领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估计危险已经过去……”，顾准和汪璧按照林里夫的指示回到上海。

回沪后顾准立刻正式回到立信所上班，做主办查账人员，也叫稽核员。其间出于防备危险的考虑他曾两次离开上海到南京和淮南去查账，这些安排都是在老板潘序伦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对此，顾准一生对潘序伦都心怀感激。

1936年12月的一天，真正的危险来了。

这天，一名穿大衣戴呢帽的人手持顾准写的《银行会计》来到爱多亚路上的立信事务所，堵着门指名要找顾准。这个细节描写是顾准全部文字里最镜头化的一段，特务怎样出现，他怎样甩掉尾巴，怎样逃出事务所，怎样开始又一次的流亡，栩栩如生，颇具传奇色彩——

“事情发生在1936年12月下旬或1937年1月。那天去中国国货银行查帐，中午回河南路宁波路吉祥里立信饭堂（那是立信补习学校的校址，也是饭堂）吃饭。这是三开间两厢房的中式二层楼

房，大门里面有一个不大的天井，客堂里摆二桌饭。我走进大门，并未注意门口有什么人，进门后，脱掉帽子，放下公文包，坐在客堂靠里面的饭桌上，面向外地坐下，拿起碗筷正想吃饭时，坐在旁边的唐荣山低声对我说，“哲云兄（在立信时我有一个号叫哲云），大门口站着那个人，拿了你写的《银行会计》指明要找你”，我说“你开玩笑”，他说，“你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我向大门口一看，真有一个穿大衣戴呢帽的人站在那里。我镇静地站起来，走向厢房里转了一下，闪到后门向外走。后门没有人，这个胡同通马路只有一个出口，胡同口也没有人。走出胡同口，到北京路搭乘公共汽车到北京西路福田邨汪璧的姨母汪琇珍家，等姨夫韩昌明回来，弄清楚没有尾巴，请他们通知汪璧，我则到老师殷亚华在治疗肺病的嘉兴一家私人小医院去住下来了。”

“这一次为了躲避追捕，直到八一三战争爆发为止，再也没有到立信去上班。”

浪漫啊，无比的浪漫。

1936年底“双十二事变”发生，它在中国人引起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和理解——国民党的和共产党的。1937年年头，《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撰文，用了“拆烂污，开后门的手段”这样激烈的言辞，而顾准则以吴绛枫为笔名投稿和王总编“商榷”，解释西安事变“非出于共产党预谋而是东北军青年军官激于民族义愤所为”笔调和平但逻辑犀利。虽然当时被江苏省党的负责人责怪，斥其不明真相，轻率无纪律，但后来文章被延安电讯转引，也就是被上面肯定了。

有了这样的经历，21岁的顾准已经完全把自己看作是职业革命家了。

“我认为，1934年以后我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我那时的处理社会职业，无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以党的工作的利益为准据。我同样认为，1934年以后社会职业地位的向上，和1934年出版的《银行会计》一书有关系，可是此书写作后期，我已投身地下工作，此书出版时，我已丢掉职业，过‘流亡生活’了，因此我更有理由认为我是职业革命家。”

细读顾准的“历史交代”有个小小的发现，就是他常常用引号把那些最激动人心，最浪漫的字眼框起来，例如“流亡”、“流亡生活”，例如“接头”、“上面”、“下面”，例如“盯梢”、“调查”、“巡视”甚至“职业革命家”等等。

不能不说这是年过“知天命”的顾准对自己年轻时过于看重的东西的一种温和调侃，自己也好笑当年幼稚了一些，过于“煞有介事”了一些。可是谁没有过青春？谁没有过激情和痴迷？谁又没有过把浪漫看得比性命还要重要的时刻？

第三章 革命远不是浪漫的

1. 分裂分子、叛徒等等

1936年2月从“流亡地”北平回到上海的顾准，开始尝到革命不大浪漫的另一面的味道。

先是“北平来回，费用浩繁，收入微小，家庭经济困窘”，接着是“汪璧流产血崩，住进南市的瞿直甫医院”，而先前外祖母和二姐陈佩珍的去世已将他不多的积蓄花费殆尽。到了他们夫妻从北平回到上海时，身上已经所剩无几，却要面对老母和幼弟、幼妹一家数口都要靠他养活的重担。更要命的是还得有经费才能继续革命下去——办刊物，油印，发行，交通，接济危险的同志和家属……哪一样缺得了钱？

但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他可以立即返回立信上班，潘序伦对这个“游子”的回归随时都是欢迎的，工资不会降反会升，这点他是有把握的。加上书还在写，拼着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写快点，多写点好了。潘老板那边，除了要个署名权，钱还是给得不算少的，就算他干脆把著作权买断了，那又如何？反正他“志不在此”，写书不过是个“糊口的手段”而已。当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写书这件事上无论如何他也是绝不会马虎的，不管以谁的名义出版，自己的尊严和名誉在其中，而他是个把尊严和名誉看得极重之人。

大问题在于：他突然感觉，革命不是他当初他想象的那么单纯浪漫而是一件特别繁复、特别混乱且很难厘清的事情。

顾准是数不清的革命者中通读并数次通读过《资本论》的凤毛麟角者之一，加上对数字、逻辑的天然敏感，他绝难臣服“大胡子画像一挂就是天地君亲师”。“社会职业生涯”上已经达到了巅峰的他在武卫会却成了“分裂分子”，大胡子挂像下并非高尚圣洁的众生相让他困惑。

从北平回沪的顾准，除了带回振奋人心的东北义勇军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消息，也带回来北方党机关报的精神。

“我看到其中的气味和我一年来从林里夫那里学到的党的路线精神不一样，对他表示过怀疑”。

而上级林里夫的“释疑”却使顾准的怀疑和不臣服更加重了。

“他一反过去把我从公开职业拉到地下的态度，鼓励我争取社会地位。他力求扩大武卫会组织，要我把XXX来回来，甚至想把来历不明的XXX拉到武卫会来，又使我对他的组织路线前后太不一致怀有‘竞选省委’的疑虑，所以回沪约一周后，即对他提出了一些疑问。林解答了这些疑问，但没有说服我。”

顾准看到内部争斗的激烈早已远远超越了外部当局的重压。武卫会内一时叛徒帽子满天飞，“上海本土的老叛徒”，“山西来的新叛徒”，“最坏的叛徒”，“比较温和的叛徒”，自动叛变投敌的“自动叛徒”、略加刑讯立即叛变的“被动叛徒”……五花八门。还有“告密者”，“变节者”，“摇身一变即为特务者”，“分裂者”……不一而足。人人看着人人都像叛徒而惶惑不已，而顾准，几乎是在倏忽之间就成了“分裂分子”，都来不及说清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严格意义上说，他也是个叛徒，背叛的是武卫会、林里夫。

“我对武卫会实行过坚决的分裂，然而分裂不是由我开始的。事实上。1936/II 我由北平返沪以前，武卫会已经出现过严重的分裂了。”

顾准回沪前武卫会的“分裂”这里就不说了，单说他个人的“分裂行为”——须知那既不是分裂到了国民党一方，也不是分裂到了汪精卫一方，他是“分裂”到了中共党员胡乔木领导的“文化界救国委员会”，也就是说分裂归分裂，可还是在一个共产党内，没有叛党，更没有叛国！

此时的顾准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和接受林里夫严重排斥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进步文化人士的狭隘作风，尤其是他对《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签名者之一章乃器的排挤，引起了顾准极大的反感。林里夫“汲汲乎追求的不是利用上层关系来打开局面，冲破白色恐怖，使抗日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却是在小天地中和章乃器争夺领导权”。

这叫本身就崇尚自由主义的顾准如何接受？他义无反顾地公开“分裂”到胡乔木领导的“文化界救国委员会（文委）”去就不奇怪了。“1936/II-III 我采取的分裂行动，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分裂，

是对武卫会士气影响最大的一次分裂”，顾准毫不隐晦。

文委接纳了他但却并不信任他，仅派“左联”的邓洁和他单线联系，根本不允许他见到周扬，胡乔木这些“真神”。在任命他到“职员救国委员会（职救）”任党团书记的同时，邓洁指示他身在“文委”但依然要在“武会”内展开针对林里夫的路线斗争，顾准也照办了。可他说什么也绝料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这一从“武”到“文”的、被他认为是光明磊落的行为，由于“文”“武”老前辈们的恩怨情仇夹缠不清，而被定义为“内奸”活动，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弄得他有一段时间“想一想就心头绞得发疼”，想死的心都有。

党内如此复杂的派系纷争，老革命，老党员，老同志们的狭隘、刚愎、不宽容，工作上凭着一时的激情就做决定，朝三暮四的方法，对“地盘”、“兵力”、“权力”的争夺……，这一切在顾准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幻象上投下了浓重的阴霾，从他“历史交代”的字里行间，时不时就能感受到它重重叠叠的魅影。

革命远不是浪漫的，而浪漫，绝对不是革命。

2. “业余革命家”

青年顾准肯定是一位革命家，不过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就很难定义了。

这个问题读者看着也许很可笑，但对于我的传主却是件天大的事：

“我认为，1934年以后，我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尤其是）我已丢掉职业，过‘流亡生活’了，因此，我更有理由认为我是职业革命家。”

但是多年后，顾准对自己年轻时的定位——职业革命家成为人们的笑柄。无情的讥笑和嘲弄，令年过五十的他写下下面这段屈辱不堪的文字：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冷静地分析、回忆这一段历史，深深感到长期来保持的这种想法（自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 - 作者注）是错误的。因为即使1934-1940年我主观上并未追求职业地位的向上，到1940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实实在在是一个会计作家，讲师和教授，我搞的那些东西，实实在在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参加地下工作，主观上存心做一个职业革命家虽然是事实，然

而这是那时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何况那时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其实际组织工作，还属于民主革命阶段，参加这一民主革命，并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并不足以洗刷、而是每日每时还在沾染周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

今天学界对顾准的研究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是只有一个顾准”还是“有两个顾准”。上面这段文字应该也是“两个顾准”观点的有力证据——作为思想者的他，也曾因为不可救药地因为染上“猩红热”而显得俗不可耐。

这个只要说到顾准就无法回避的命题先放一放，先看看这段话里的一句——“然而这（革命）是那时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句话可惜是不通的。顾准的“职业革命家”生涯是没有党的一分钱经费支援的。但是仅仅“党的印刷机关就设在我家”，就需要一笔可观的开销，更别说他还必须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接济同志以及至少维持自己“活着”并且活得稍微体面一点的费用。难道他必须把全部的社会职业，例如会计师，会计作者，教授讲师等等都辞掉，在全家人包括他自己餐风饮露，得道成仙的情况下干革命，才算得上是位“职业革命家”吗？

多年后顾准自己交待说“上海地下工作时期我虽然自命为职业革命家，其实我那时还过着社会职业生活和地下工作生活这种‘双重生活’，所以，我那时到底还是一个业余革命家，因为在这种‘双重生活’中，党内工作上的变化和生活中的变化并不一致”。

他自己都认账了，谁好再说什么呢？

2002年，日本有一位岩间一弘先生，是东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层的生活情况》。这篇论文获得“松下国际财团”1999年度亚洲奖学金资助，原文发表在《东洋学报》第48卷第1号上。

如今也过了不惑之年的一弘先生，不知还记不记得论文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名字——顾准。

一弘先生的论文写道：

“在中国，最初想要对职员阶层的实际情况进行认识和掌握的，是1930年代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194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也着手了这种工作。但是，中国共产党职员运动委员会的认识，主要是以参与观察为基础得来的。相对而言，工部局工业社会处对生活水平进行了标本调查和统计解析。”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12月，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被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

了被称作“孤岛”的政治上孤立的地区。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以职员为对象两个调查报告。一个是23岁的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指导下的职员运动委员会的书记的顾准所作的《上海职员与职员运动》，载于《职业生活》第1卷第1——4期（1939年4月15日——5月6日）；另一个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业社会处于1941年末实施调查的报告书。前者是中国在最早发表的关于职员阶层的观察记录，后者是中国最早的以职员阶层为明确的调查对象的正式的调查报告。”

论文中提到的“职员运动委员会”就是上海职员救国会委员会，简称职救。

开埠后的上海，自1850年代开始，以洋行雇员为首，银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和新式学堂的教员等大批出现，加上被新兴的民间企业雇用的从事精神和脑力劳动的工薪一族，人数与资本家和工人一起增加，相对于“旧中间阶层”——以经营商店和饮食店等比较小规模商业的自主营业者为中心的阶层，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中间阶层——上海职员阶层。

这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的雏形。岩间一弘先生接着写道：

“基于在中华职业学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执过教鞭的各大学会计专业以及上海中国银行工作时所积累的知识，顾准形成了自己对上海职业界的观念。面对如何把金融、保险业、洋行、海关、百货店等的职员、店员组织起来这一课题时，顾准不是去利用救国会、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等既存的社会团体，而是着眼于联谊会、俱乐部等新式的大众组织。在当时的上海租界，陆续成立了上海市银钱业业作联谊会、益友社、上海华联同乐会、上海市保险业业作联谊会、中国妇女俱乐部等为加深各界业职员之间的亲睦而组织的文化、娱乐团体。为了动员职员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可以利用这些团体。从1939年初开始，职员运动委员会组织了银行工作委员会、百货公司委员会、洋行工作委员会、益友社支部、保联支部、绸布业支部、海关支部、电台支部、职妇支部等，下部再设置了各企业的支部。据说，顾准的这些方针虽然作为“联谊会路线”饱受批评，但是，它在加深党与职员的联系方面取得了成果。”

顾准二十三岁发表的文章能在六十多年后成为日本名校、名系博士生的专题研究对象，还因此而成为优秀论文并获得奖学金，说它传奇都不为过。这一次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个人英雄主义的味道更浓烈。

顾准3月“分裂”到职救，4月份就又被“取代了”，因为他必须“逃难”（引号是顾准自己加的），由潘序伦安排他到南京和淮南去查账以防不测。

9月他回到上海，“工作从被动转到主动”，“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36

年9月到1939年7月，将近三年的时间 and 全中国独一无二的上海职员群体，给了顾准一个极好的舞台，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导演出了一台有声有色的大戏，以致被外国的历史社会学博士写进论文，载入史册。

这出大戏的名字就叫做“联谊会路线”，其内容岩间一弘先生都说得很清楚了，无需重复。不过一弘先生也说到“它饱受批评”，批评的内容他没有写到，也无法写，因为他根本无法理解。发生在1930年代后期的、中国中产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有组织，有领导的形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这段小历史，从未见诸过官方的中国革命史、抗战史和中共党史。中国各大学无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的博士生们，亦无一人拿它当回事写出自己的毕业论文。反倒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它跑到日本人的论文里去，还让作者拿了个不大不小的奖。

“顾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职员运动委员会认为，上海的职员阶层与工人阶级有一致的立场和利害关系，也要让职员阶层与工人阶级一样具有爱国、民族意识，希望他们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部分。因此，顾准对上海职业界的主要关心趋向于生活状况接近于工人阶级的中、初级职员的薪水和意识。中、初级职员通过联谊会、俱乐部等亲睦团体和《职业青年》等刊物，把自己等同于“职员”这一社会阶层，在上海社会以及国际形势中重新加以理解，进一步促进了与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岩间一弘《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层的生活情况》

顾准在自己的“历史交代”中描述的联谊会活动要比岩间一弘先生更生动一些：

“（职救）决定在职救外面成立公开的文化娱乐团体。它要收取汇费会费，租赁会址，组织话剧、京剧、歌咏、读书会、图书馆、篮球、排球等活动；它基本上应该是行业性质的；它应该争取本行业上层分子的赞助，尽可能争取他们当理事，以便使它获得完全合法的外貌。这类团体应该开展多方面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其中一部分应该利用来进行抗日救亡和马列主义宣传，以便发现、团结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

组织联谊会一时竟成了上海的社会时尚，1938年更成了“联谊会时期”，银联（银行）、洋联（洋行）、华联（百货）、妇联（妇女）、学联（学生）、职协（职员）、保联（保险）、海支（海关）、电支（电台）、绸支（绸布）……不计其数，人员达数万。联谊会路线团结了一大批社会中间层力量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这和顾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非常大的关系。他的社会职业生涯已达到巅峰状态，是各行业青年职员的样板，其号召力和凝聚力无法小觑。一次一位上级党代表见到顾准，

知道他是进社的，开口便问“知道进社的顾某吗？”他回答得还算谦虚“在下便是”，其知名度可见一斑。

可联谊会路线很快变成了“顾准路线”，多年后这个“路线”全部成了他的罪状——“个人英雄主义”，“分裂分子”，“内奸”，“独立发展党组织”，“提倡‘国防文学’”，“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哪一顶帽子都压得死人。好在那时顾准早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老右派，倒也能“坦然面对，彻底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这些还都不是他最受不了的，他最受不了的是同志们对他认为自己那时是“职业革命家”的讥笑和嘲讽。

在写下那段“到1940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实实在在是一个会计作家，讲师和教授，我搞的那些东西，实实在在是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的文字时他的精神状态，要么是羞耻而无奈的妥协，要么是骄傲而狡黠的不屑，要么是它们的混合体。凡在顾准身上发生的故事，都不会像发生在常人身上那么简单。

3. 刘长胜

“顾准路线”的由来说来还真是不简单——它是受王明启发，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千万别当这是谁的胡编乱造，谁也开不起这样的玩笑。这是顾准自己总结的：

“1944年在延安，刘宁一在一次谈话中特别问我，‘联谊会路线’在我脑袋里的思想渊源。我回答说，受了《巴黎救国时报》上王明的启发……1935/VIII的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曾经痛彻地批判了共产党员在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气味，就中特别指出，希特勒的上台，曾经充分利用凡尔赛合约后德国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的深刻不满，曾经充分利用青年群众爱好集体活、盛大仪式等特点来进行蛊惑性的法西斯宣传。希特勒这样做，在和德国共产党争夺群众中占了不少便宜。季米特洛夫总结了这一痛苦的历史教训，他的报告译成中文，刊登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此后不久，《巴黎救国时报》刊载了王明的文章，号召共产党员在中间群众中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以便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在受到季米特洛夫号召的启发下，我还曾留意有关二十年代德国社会

状态报道的文献，曾发现并读了一本德国某女作家写的《动乱时代》的中译本……记述作者亲身经历的凡尔赛合约后德国一代青年的政治情绪……20年代德国青年特别爱好集体活动，在盛大的野营、游览、体育比赛中，在千百人齐声的高歌中吐露他们对政治现实的深刻不满。这本形象化的历史记录，使我对季米特洛夫的总结和号召幽深一层的体会，也深深感到抗战前夕的中国和凡尔赛和约后的德国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青年群众对政治现实的深刻不满却是类似的。尤其是以生活环境而论，上海职员群众比学生群众更少集体活动的机会，通过我们党的艰苦工作，组织职员群众以自己的集体力量来创造集体活动的环境，仅以这一点而言，就足以大大增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何况只要造成某种集体生活环境，其中绝不会缺少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政治主张的机会！”

这就是顾准“联谊会路线”的出处。

1936-1938年他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这种鼓动群众的方法。这两年多的革命工作对与顾准来说，既与他的革命理想契合，又顺应他的性格特征，可谓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1937-1939这两年，我在工作上的系统思考和独立见解逐渐发展了，与之俱来的则是‘自我实现’式的个人主义也逐渐发展了。”

然而这样的“独立见解”和“个人实现”能否长期的见容于党和党的同志们，尤其是那些和自己生长在环境，生活际遇，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同志们，年轻气盛的顾准肯定是想也没有想过。虽然经历了武卫会的“路线斗争”，可毕竟他和林里夫之间的龃龉并没有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双方都没有对对方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感”，再说上级党也明确了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虽然多年后此事又不断地被“翻烧饼”），他和林里夫之间已没有什么个人恩怨。

但这次不同，顾准充满了资产阶级情调的“联谊会路线”和毫不隐晦“自我实现”意识，大大地惹恼了一个人。

此人大顾准整整一轮，是位真正可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一分子。他1903年生于山东海阳，早年随舅父来到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久的苏联，先后做过小贩、学徒、皮匠、店员。相比十九岁就做了三所教会大学讲师的顾准，十九岁的他正在海参崴码头做搬运工人。他1927年加入联共，1933年赴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回国，在延安出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1937年赴上海恢复和建设党的地下组织，和刘晓搭档组建江苏省委。顾准与他相遇就在此际。

他，就是后来在新政权做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刘长胜。刘先生是顾准生命中又一个有趣人物，两人的劈面相遇是顾准的“劫数”，又一颗“四万年结出的果实”。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很不愉快。他“先天”地不喜欢他。

面对这个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党龄不过两年的小青年，刘先生无缘由地上火。他厌恶他凛凛然的气质和掩都掩不住的“绅士派头”，也不喜欢他那过于文雅却又斩钉截铁的谈吐，甚至连同他脸上的眼镜他都一起厌恶。这和他在海参崴，莫斯科，陕甘宁见过的人群都不一样。他和自己谈话时始终是平视的状态，丝毫没有对自己崇敬有加的样子，而他的经历是应当被人崇敬有加的。

二十二岁的顾准对眼前的这位革命老前辈却“印象很好”。于是他大谈他的联谊会，如何的轰轰烈烈，如何的有声有色，如何的受年轻人欢迎等等等等，然后期待着老前辈的指导，当然也不排除期待这位严肃上级一点小小赞扬的虚荣。

但是，没有指导，更没有赞扬，他只是把职委将隶属江苏省委群委（群众工作委员会）的党的决定告诉他，“这就是说，当时新建立的省委，把职员工作看做工人、学生两个群众活动基干部分以外比较次要的群众运动部分”。

多少有些悻悻然的顾准并没有沮丧，年轻人的盛气丝毫没有减弱，他依然精神抖擞地干了下去。有了延安派来的党的正式领导，与前几年武委会的经历相比，他反而更踏实了。

1938-1939年，职委领导的“联谊会运动”愈来愈精彩纷呈。各类团体从人员数量和质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广泛凝聚了上、中、下三个职员阶层，职员运动成了职工运动（“职员”和“工人”二者合一统称）的主力，省委这才重视起来，撤消了群委，派原来仅负责工运的省委二号人物刘长胜直接领导顾准的职委，职员和工人运动正式合并成为“职工运动”。

“1939年上半年，职委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属各单位基本上都能独立作战的体系大致建成了。对此我有些洋洋自得——一句话，我对我对这个十分渺小的成就有点骄傲起来了。”

骄傲，这是中共党内大忌，常常大到甚至投降或者叛变。“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党内并非励志名句而是一条金科玉律，可顾准到老都不放在眼里——五十多岁的他还对年轻人宣称“骄傲使人进步”徐方《两代人的良师益友》，更不用说二十来岁的时候了。

实际上顾准对这位工运老前辈是信服和尊重的。“他确实有比较丰富的中共运动经验，他对职委工作做过不少及时正确的指导。1938年上半年，团体工作大发展之后，‘企业化’口号的及时提出，是在刘长胜指导之下作出来的”。可惜的是他对他，没有一般人在同样状况下应有的表情和话语，而这种叫做“谦虚”的表情和话语是一个中国人的标准美德，顾准恰恰在这点上十分欠缺。说实话这太难为他了，从小到老，他从不在明明知道自己很出色时违心地谦虚一下，除非他知错。他将要和正在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加上，刘长胜不喜欢他的“联谊会运动”。

唱唱跳跳，跑跑闹闹叫什么革命？这些人再“对现实不满”，他们至少还能养家活口，男人至少有份工作，女人至少不用去操神女生涯，孩子至少不会饿死或者被卖掉。真正的革命力量蕴藏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杨树浦，外高桥的码头上，在“公大”、“内外棉”的车间里，在满上海大街小巷狂奔的黄包车前边。对这些都亲身经历过的东西，他才充满着感情和同情。

于是他们开始有了争执。

刘批评顾“留恋团体”，顾反驳道“将来联谊会可能转变成为阶级性的职工会”，刘非常不以为然，“联谊会的理事会中有不少上中层人物，他们是资本家或资方代理人，既然联谊会的领导成分杂有这样一些人物，认为联谊会可以转变成阶级性的职员会就是阶级投降主义”。

他们从争执到争论，从争论到争吵，刘长胜终于沉下脸来。

顾准以为对于党的领导，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也可以像和老板潘序伦那样，当面锣对面鼓大吵一架，双方发泄了也就了事了。可在这位老革命眼中，独立见解就是不听话，而自我实现更是令人发指的个人英雄主义、出风头、骄傲自满的表现，是“党所坚决（和最）不能容忍”的无党性的表现。仅从个体、个人的角度度量，顾准简直就不应该是革命的主体而应该是革命的对象。

“1938-1939年，我对刘长胜的印象是很好的……就我这方面而论，这一年中我并未察觉刘长胜对我的工作、思想、作风有什么严重的不满，更没有察觉出他对我怀有根深蒂固的嫌恶之感……。他对我的成见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我当然无法知道。不过从他以后用人行政来推测，他大概先天地喜欢沉着的、“听话”的干部，像我这样锋芒毕露，一触即跳的人，即使他看得清楚除严重缺点而外也还有点滴长处，他总是无法容忍的。”

他“天生”地不能容忍他。

顾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劈头遭遇了“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冲突不可避免。

“7月，刘长胜把我调离职委，并背着我在职委内部开展了清算顾准路线的斗争”。

还好，仅仅是调离，远不如十四年后他晴天霹雳般亲自宣布顾准“政治生命的结束”那样残酷。当时两人并排坐在主席台上，顾准对自己几秒钟后的噩运一无所知。又过了十四年，他被自己的革命母亲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半年后被肉体吞噬。而此时，“老冤家”顾准却正坐在中科院民族所“幽静之极的办公楼内”写下这篇“历史交代”。他甚至不知道刘长胜已经死去，笔下也无怨怼之情流出，甚至还在为他开脱：

“刘长胜所以要把我赶出职委，除了他先天地无法容忍我这个人之外，1939年的政治局势……上海工作环境急剧恶化的不可避免，是不是也使他不放心我这个鲁莽而不沉着的人继续负责职委？”

“顾准词典”中压根就没有“恨”这个字。

4. 初遇孙治方

好，现在顾准生命中最有趣的人物要出场了。

1939年8月，顾准被毫无先兆地从自己一手组建的职业救国委员会赶了出来，调到租界孤岛的上海“文化救国委员会”任副书记，他的顶头上司——正书记，就是他一生最宝贵，最真挚的朋友、诤友、同志、难友——孙治方。

孙治方，1908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大顾准七岁。1923年加入中共，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1930年回国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因被捕，按照党纪自动脱党。1934年因“福建事件”被迫流亡日本，1935年回到上海，1937年重新入党并任中国江苏省委文化委员会书记。

孙顾第一次相逢正是此时。

接受上两次见面就招人厌烦的教训，顾准收起一大半锋芒，冷眼观察这位党的新上级。

首先，他不服膺他，这和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共产党”林里夫以及第一次见到“搞工运的老革命”刘长胜的感觉都不同，说白了，更糟糕。他知道此人曾是留苏学生，中国“农村派”的经济学家，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的中译者，但这并未引起他的敬佩。他对这位单线联系的上级是这样评价的：

- “1. 是一个并不熟悉实际经济情况的经济学家。
2. 对文化工作各部门的领导拿不出什么深刻的主意，领导一般化；
3. 但不拿架子，平易近人，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根据嘛，无需多，一条就够——“因为《帝国主义论》中说到许多英美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其中多数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各取有中国化的名称，例如美孚油公司，亚细亚油公司，大通银行，卜内门洋碱公司等，可孙冶方译名都取直译（例如美孚油公司译成“标准油公司”等），而不著明中国人熟悉的中文名字，由此断定他对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实际情况是所知无多的。”

看，这就是顾准。你习惯了音译而人家喜欢直译，根据这么点东西就判断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好吧。对孙是个“乡建派”，他也不以为然。不就是个改良派吗？和革命不大沾边。青年会读书会那会儿，“记得有一次一个梁漱溟乡建派先生发言宣传乡建派纲领，反击发言的主张就是（我们进社的）孙化新。辩论结果，这位先生完全被击败了，只好哑口无言，狼狈退席”，我顾某当时可是拍手称快哩。还好后面还有个第三条评论——“不拿架子，平易近人，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有这一条从他嘴里说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一条，的确很不容易、极不容易。孙冶方被顾准评价的这一条，用一位五四老前辈的话说，是比自由更要紧的东西——宽容。顾准的一生，从外人那里能够得到的最少的东西就是——容忍、宽容，孙冶方从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他。这份礼物有多珍贵，大概只有收受礼物的人自己才能数算得清楚。顾准收下了最初的这份礼物，今后的日子里他还要从他那里收到很多份，他甚至已经习惯了收受它们，这才有二十八年后，当他听到孙冶方突然入狱的消息，一时连站都站不稳，脸色苍白，几近虚脱的一幕。因为他知道今后再也不会有人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了，他将活得更加艰难，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尤其是前者。

孤岛文委时期对于孙冶方，是一段生命的华彩乐章。

莫斯科中山大学残酷的党内斗争，回国后与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政治较量，两年流亡日本的经验，

作为“乡村建设派”跟随陈翰笙先生作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村田野调查的经验，已经把还不满三十岁的孙冶方锻炼得异常沉着冷静同时又极具亲和力。他“慈祥”得甚至被刚刚入党，尚未结婚的小青年们称作“妈妈”（王元化语）。

现在身边又来了一个结了婚的大龄青年，自己的副手顾准，才华出众，激情四溢，又是这帮小青年们的“偶像”，这样的搭配的“班子”令孙冶方非常满意。虽然他也明知，这位很喜欢用“睥睨”二字的副手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睥睨自己一把，但他不在意。他自己不是也睥睨过盛气凌人的同学陈绍禹（王明）吗？略微有些骄傲的人在他眼里好像显得更正常一些。他也被“整”过，被扣上过“资产阶级情调”、“经院学派”、“成立秘密组织，妄图分裂党”、“托派”……等等能吓死人的帽子，在莫斯科甚至差点被“枪毙掉”。他是背着联共（布）一个“严重警告”处分从苏联回国的。饱尝过“斗争”滋味的孙冶方，其后的一辈子也不愿意把这种滋味再强加给别人，尤其是比自己还年轻的人，譬如顾准。

在四周都是沦陷区的租界孤岛里，文委的成员们——孙冶方、夏衍、田汉、钱俊瑞、曹荻秋、巴人、梅益……（当然还有顾准）等共产党员和爱国文人、报人一起，高举抗日大旗，办起《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学习》、《求知丛刊》、《内地通讯》等一大批进步抗日报纸，同时也把抗日的文学，戏剧创作搞得异常活跃。

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上海孤岛文化运动”。

“孤岛”时期是那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生命中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郭大力、王亚南“十年一剑”的《资本论》宣告译完，梅益译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斯诺出版了中文版《西行漫记》，于伶排出了《夜上海》，巴金写出了《家》《春》《秋》……

除了组织工作，孙冶方积淀已久的政治经济学功底混合着革命的热情，如火山岩浆一般喷涌出来。他不断在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社论，评论，例如《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论日军进攻华北》，《抗战建国的好榜样》，《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进步的一年》等，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政策，分析世界经济情势，论述民族的解放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提倡抗战建国。上海的各个报刊

杂志几乎每周甚至每天都有他的文章。

相比孙冶方，相比“联谊会时期”的有声有色，不敬地说，我的传主有些乏善可陈。

从1939年8月调到文委到1940年7月离开上海去苏南解放区，孙顾两人在文委分别任正副书记11个月。这一时期用顾准自己的话来说，是“并未全神贯注的”，“不认真的”并且事后是“感到内疚的”，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是“闹着情绪的”——二十四岁上就被人“清算”了一把“路线”，无论如何是过于夸张和煞有介事了些。离开他组建和熟悉的职委，到他并不佩服的人手下干革命，他不无沮丧，干革命更“业余”了，倒是很有可能。

无论是顾准自己还是孙冶方抑或其他人的回忆文章，对于顾准在孤岛期工作时作为个体的人做了些什么，都没有真材实料的记载，令人只看到“故事中的人们”而不是“故事中的人”，很少个性的展露。

谈到孤岛时期的顾准，一篇王元化先生的采访录就算是最具个性的叙述了：一件是，他来组织开会，还拎来四大包点心水果，和大家一边开会一边吃，人人都很开心；另一件是：为了给这位上级写“秘密报告”，基督徒家庭出身的王元化先生（王元化这个十二笔画的名字就寓意十二使徒）还给顾准起了个“王开道牧师”的化名。可为什么是下级给上级起化名，为什么叫他“牧师”，谁也不明白，元化先生也不作说明。

关于顾准的这一段历史，任何记载都远不如日本人岩间一弘先生论及“联谊会路线”的论文来的精准和凿实。顾准本人在他的“历史交代”中对这一段更是敷衍塞责得可以——“文委工作经过，大体见于《孙顾关系是反革命思想联盟》……再也没有兴致把这段历史写得完整一些……”，可等你查阅他的《反革命思想联盟》，却仅仅只有本章开头那几行他对上级孙冶方的评价，真是让写他的人恼火。

“1939/VII-1940/VII 文委工作期间，并未全神贯注在工作上，还逐渐产生了到解放区工作的想法。后来我对这一期间工作的不认真常感内疚。多年以后，梦中还常出现过，实际生活中并未发生过的，跟下面同志约好了关系，到时候不去的景象。这一时期，因为工作“少”（其实是自己工作不认真），曾想有系统地读一些历史。可是开始读史不久，因我多次请求，省委决定调我到江南东路特

委去了，离沪是在 1940/VIII。”

他是有情绪的，“离开职委时‘惋惜’和‘失败’的感觉”搅扰着他的心境。孙冶方很好，孤岛文化和文委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但让这个充满创造欲的“英雄主义者”^{徐雪寒语}作个只是来“吃现成饭”的，他很苦恼。

从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可至今还没有用任何方法去证实它是真理的和唯一的，既无法用物理、化学、天文或地理的方法，也无法用他最熟悉的数学的方法去证实或者证伪。这一直是个隐约困扰着他的问题——那么小姑庆志从小告诉他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吗？可为什么我却总是无法把它们从头脑中彻底扫除干净呢？为什么我在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上宣读《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毫无畏惧，却不能在公众面前做“反基督”，“反宗教”的宣传，像共产青年国际要求的那样？我的“革命”总是出问题，是这些东西在作祟吗？那么只有去触摸这势同水火的两者的源头，才有可能弄清楚它们，把握它们，也把握自己。而触摸和把握它们的办法只有一个——去读史，去探索历史。

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萌生“系统读史”的念头。

此时的顾准已满二十四岁，作为一位天天要和数目字打交道的理科类学者，“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已经成为他思维方式的常态。在常人更看重“行动”的年龄，早熟的他已生出了“思考”、“思想”的萌芽。非常可惜的是，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留下他为什么此时开始“想有系统地读一些历史”并且“开始读史”的原因，难道真如他自己“交代”的，仅仅是“因为工作‘少’（其实是自己工作不认真）”，为了解闷吗？

二十七年后，在全中国的人都发了疯，好像准备把自蔡伦造纸以来所有的纸张都用来写大字报的非典型岁月里，我的传主也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只有两个字——“读史”。但这并不是他真正“系统读史”的开始，这个“开始”早就开始了啊，至少已经三十年了。读史令他的内心变得无比强大，这是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而在他读史、解史——用历史来解读现实，预测未来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最大的支持者、保护者就是这位孤岛初遇的，哥哥一样的孙冶方。

顾准和孙冶方的故事，重头戏在后面，1939年这个序幕，仅仅从顾准的“身段”上看，坦率地

讲，不是太精彩。

5. 委身革命

此时的顾准心已不在上海，他要到党的根据地，到解放区去，到抗日第一线去革命，去从戎，去做一名真正的“职业革命家”。

顾家大家庭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兄弟们都自立了，因流产和二个孩子早夭的悲痛而身体衰弱的妻子，因为潘序伦的关照进入华懋饭店做会计，身体和精神状态也渐渐好了起来，足以承担起赡养顾准的母亲、幼妹以及她自己家庭的经济担子。8.13后全家都逃难到租界上来，被追捕的威胁也不复存在了。

此时的他可以不再负担全副“救家”的重责，可国家却正处在被外族入侵蹂躏的惨状中，“匹夫有责”四字早就在他心头翻滚了。只是党说“孤岛上的斗争也是没有硝烟的战斗”，这个热血青年才没有立刻投笔从戎。

眼下他认为是时候了。

“La liberté? Son carnage les rues; Pays? Il se sacrifier armée ! (自由发生了问题？他喋血街头；国家发生了问题？他捐躯行伍)”，十二岁时和少年同伴一起用法语背诵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名句中那铿锵的韵律，“和三哥二人在董家渡江滨的沙包工事中看架在那里的（北伐军的 - 著者注）重机关枪，和驻守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谈话，听他们说部队里也有小孩子，是勤务兵时，曾要求他们收留我们当勤务兵”时有声有色的一幕，都是他难忘的。又一个十二年过去了，那声音，那场景依然历历在耳，栩栩在目。既然“喋血街头”实现不了，“捐躯行伍”还是可能的。他要离开上海，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纵横驰骋。

上海人也许是中国最热爱家乡故土的人群。“阿拉上海人”是他们一种很无厘头、无来由的骄傲，哪怕彼时已经十分西化，十分繁华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个暴富的小鱼港罢

了。出了杨树浦、外高桥，在上海人眼里统统是乡下，连南京，北平也不例外。可上海人顾准将要去的，先是“乡下”苏南，后是上海人最瞧不起的“缸巴（江北）”——苏北。一个前途无量的高级会计师，著名的会计作家，教授，放弃数百大洋的月薪、分红、津贴、稿费版权费，到据说仅有每月4元法币津贴的艰苦乡村去革命，除了坚定的政治信仰，你能排除那个致命的因子——浪漫吗？

“我做业余革命家的条件是优越的。在上海的物质生活比在根据地安定得多，也优裕得多……然而一个人的生活和思想，终究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我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影响到我的生活方式，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比上海艰苦得多，一旦离开，也就毫不留恋了。”

当年多少年轻人从北平、上海、从广州、从重庆、西安、香港甚至从美国、加拿大走向延安，走向乡村，走向他们不了解，不熟悉也不可知的地方去工作，去斗争，去牺牲。但顾准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他对上海党的精神、纲领、行动方式，尤其是领导人的作风、方法以及人格起了疑心，甚至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共产党。

比如他在北平“流亡”期间，“孙化新给我看过北方党的机关报，我看到一年来从林里夫那里学到的党的路线精神不一样，对他表示过怀疑的意思”；

比如他“以救国会为例”，质疑“林里夫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我们的活动限于秘密小组的状况下，汲汲乎追求的不是利用上层关系来打开局面，冲破白色恐怖，使抗日运动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却是在小天地中和章乃器争夺领导权，这正是典型的关门主义。”

再比如“联谊会路线”期间，“职妇”主席茅丽瑛被汪系特务暗杀，但“此次汪伪的暗杀活动，是因为职妇的‘义卖’，使汪伪特工误认职妇是蒋记国民党领导的团体，事后他们还向我道歉，说误会了，对不起云云。我党和‘七十六号’的丁默村，李士群以致汪精卫有某种反蒋的谅解和联系，确系事实……”，“由此看来，违背主席关于白区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的，不是我，而是刘长胜”，等等。

这些怀疑时时困扰着他，和他内心深处的不知一个什么东西总是磕磕碰碰，不和谐，不一致，弄得他常常“拎不清”。他不再相信上海党的“正宗性”和“正确性”，和他从北方党文件中读到的，从书本中看到的以及自己希望接受的，上海党不一样，很不一样。还好，对于他的第三任领导孙冶方，除了还是有点“睥睨”之外，总算能够接受，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宽容，这很难能。

从进社初期就听到的有关红军在数次反围剿斗争中的英勇故事，从《西行漫记》中看到的毛泽东的长征和延安的传奇令他产生了新的神往。

《西行漫记》是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一本书。多少年轻人怀揣着它千辛万苦奔赴延安，当他们第一眼看见宝塔山时那种要倒地“膜拜”的心情，连我们这些做后代的都熟悉了。它当然也影响了青年顾准，更何况它最初的中译本就出自孤岛的复社，孙冶方和顾准就是它的第一批读者。

“也许这个人才是中国的斯大林，是中国和中国人解放和救赎的希望，从这个人身上也许我能看到我希望的新世界。”

新的浪漫加上旧的质疑，他几乎急不可待了。

“这一年工作全无创造，精神也不振作。后期开始读历史，一面积极求去。1940/VII 离沪去苏南东路。”

这是顾准写于文革十年、三十三万字“历史交代”的最后一行字。

经过他多次申请，也由于他的“不乖不听话”和“不好领导”但又确是个人才，党组织终于批准他离开上海到苏南工作，就连宽容到了“慈祥”地步的“妈妈”孙冶方也没能留住他。

“1940/VII 离开社会职业生活，是我彻底离开旧的生活方式的开始，在此以后，我才真正不再是业余革命家，而自1940/VII以后，也从来没有再想回到业余革命家的生活方式中去。”

在顾准的文字中，“业余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两个短语被他提到过许多许多次，令人惊讶他居然这样在意两者之间的差别。顾准痛恨别人把他看作前者，却又“连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后者”。从读徐懋庸译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鲁迅译的《毁灭》、《铁流》，董秋斯、蔡泳裳译的《士敏土》，苏曼殊译的《悲惨世界》以及许多苏俄、法国的革命书籍、小说中获得的“职业革命家”的形象给他留下的印记实在是太深了。他要过他们那种生活，激情、危险、牺牲，还有最重要的——浪漫。他太向往了。

如今没有了家庭拖累，没有了精神羁绊，尤其是党也批准了他的请求，可以全力以赴去做后者了，他怎么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临行，他“社会职业生活”中的朋友们，老东家潘序伦，之江大学名誉校长李培恩，美国人校长

明慕义在冠生园为他践行。他们原都以为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是要到陪都重庆发展，但在顾准表明了他并非去重庆而是要去艰苦的苏南参加新四军时，大家沉默了下来，事先怀着的一点在饯行宴上挽留他的希望也破灭了。

潘序伦对顾准的离去更是惆怅万分，他原是有意要这个合作了十三年的青年人做自己的合伙人、接班人，成为“潘序伦第二”的。这时的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好比受了雷轰电击，心中痛苦，不知所云”。为顾准的离去，他甚至流下了男儿泪。

这个曾经要“扛起红旗造他的反”，曾经和他“大吵一架”，曾经多次“不认师傅”，曾经“睥睨”过他的小不点，小少年，小青年如今真正长大成人了。十三年如父如兄，亦师亦友的回忆令他动了感情，他的泪既为别离也为事业，流了下来。

其实潘序伦这些人同样是极有事业心的，可惜他们的事业——改良，改革，改进相距青年顾准的事业——革命太远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分手不可避免。他主动提出要照顾准留下的大家庭，明确表示立信随时都欢迎他的归来。两位之江校长也明里暗里提示顾准，大学的门也永远为他保留着，敞开着。

“不，我不会回来了，永远。”

二十四岁的顾准斩断了一切可能的回头路，义无反顾地走了，为了他浪漫而高贵的信仰——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博爱的地上天国，他要去做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家，委身革命，以她为一切，为家为业，为生为命。

他走向了一条光荣的、不可知也不可回头的荆棘路。这一次娜拉不仅仅是出走，她将远行，再也不会会有“海尔茂先生”的“留门”，也不会有“克里斯蒂娜”的“留宿”了。她不仅仅离开了奥斯陆，还离开了挪威，因为挪威没有“妇女解放委员会”。她也许去了法国，也许去了俄国，谁知道呢？娜拉走后怎样？更是千古之谜，茫茫人海，大千世界，什么可能性都有，谁也说不清楚。但“出走”是娜拉的宿命，她别无选择。

上海爱多亚路上从此不见了那个硕长挺拔的年轻身影，而“密迹上海”的苏南澄锡虞（江阴，无

锡、常熟)的平原、河汊、芦荡中则多了一位戴眼镜，穿草鞋，着灰布戎装的书生。

第四章 毕竟是书生

1. “没有马”的戎马书生

顾准在苏南的一年，苏北的三年，延安的两年，加上1947-1949在山东的两年半（1949年2月后以胜利者身份挺进大上海将另节叙述），一共是八年七个月。这是他自认为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心无旁骛，全心全意革命的时期。这八年多的时间里虽因性格使然，革命行伍中的他依然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动辄得咎，麻烦不断，但俯仰天地他问心无愧。最要的是，他再也不被“业余革命家”的梦魇缠绕了。

纵观顾准一生，其革命志向的不同寻常是个非常明显异于同时代革命人的印记。他不是要做一名革命者而是革命家，一名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情结”困扰了他几乎全部的青春期和一部分成年期，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他对“革命”二字产生最初的怀疑。

从他的“历史交代”看，这八年多的时间里，党内对他的批评，批判，斗争、整风、抢救……比起上海时期来一点也不少，但和彼时拉帮结派的鬼崇猥琐相比，他认为要光明磊落得多。“……不过究竟这还是我当年要过的‘革命关’……”。这些年对他来说那可真是过“关”，虽亦步亦趋，步步为营，仍处处出错，动辄得咎。八年多的时间，占他生命七分之一，过“关”是其主旋律。“关”这边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那边是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过得去也要过，过不去也要过。到底，他还是过来了。

比起上海时期，二十五岁的顾准少了青涩，多了成熟且能自觉自愿地接受种种磨难。这些磨难有肉体上的、却也正是他渴望拥有的“职业革命家”经历的——物质的匮乏，环境的艰苦，被暗杀的

危险等等，这对二十多岁的青年顾准来说都不在话下，多多益善。但更多的、精神上的磨难——不见容于上级，同级和下级，许多人无法把他引为同类，有对他敬而远之的，有老想要“整他一下”的，有嫌他“政治上不成熟”的，甚至还有指称他“资敌”的……却令他始料不及。

他慢慢学会了不再“一触就跳”，“被触”后总是先冷静地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在作祟，很想要努力地“克服”它们，以便尽快地融入这个人群。他把这些都看做是革命洗礼中不可缺少的仪式，总想要做出些“像样子”的事情来证实自己的忠诚。但是不幸，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得“像个样子”，尤其是碰到和“小姑私塾”时期燃起在他幼年心灵中的那簇微小蓝焰相对抗的事情时，更是一塌糊涂。

就拿“和于玲（女）在陆家桥捉到暗杀党嫌疑分子刑讯，无果，全部释放”这件事为例。

苏南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忠义救国军”的老巢，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按说都是中国人，都是抗日，应该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可“忠救”和“江抗”就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忠救有个“暗杀党”，专门暗杀共产党人和与共产党合作的地方乡绅，成为江抗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先生的心腹大患，遂下令工委（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顾准“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抓住一个刑讯一个，务求一网打尽。

暗杀党还真抓到了，而且不止一个，就在他们活动最为猖獗的陆家桥镇。于是“刑求”一事就必须有人来干，作为工委书记的顾准和祝塘办事处副主任的于玲女士就义不容辞了。

刑讯？至少也得吊起来拿鞭子抽吧？我们这代人可从《红岩》里见识过不少呢。就顾准予玲？前者就别提了，光看看女子于玲就可知谭震林先生是多么的“用人不当”！

于玲，又名 Christina Yu，女，基督教家庭出身，善钢琴，毕业于江阴头牌教会学校南菁高中，在学校就参加了革命，与顾准一道合击暗杀党时二十三岁。

革命竟需要顾准和于玲这样的人干“刑讯”的工作，这简直比刑讯本身更恐怖，无论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也更具戏剧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二位“刑讯”的结果可想而知——一无所获。受刑人放的放，逃的逃，这还不算，逃掉的还给顾准写来“感谢信”，称他“懂道理”。

顾准的“交代”写到此也甚觉“惭愧”，解释他们被释放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他们“越狱”的责任则全由他包了下来，称自己“疏忽实在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可联系到多年后他多次说过的“我手上没有血”这句话，你怎么看？藏在他心灵深处的那簇蓝焰在非常脆弱的同时是不是又非常强大，强大到令他无法去做和一位“职业革命家”身份相符的事情？

于玲女士的回忆录则只字未提这桩陈年旧事。另一个例子：

1948年，顾准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兼财办主任，统管财政、粮食、建设、工商、银行、兵工，权力可谓大矣。可他未经党委同意，擅自允许民间输出部分粮食到国民党敌占区，换回百姓民生急需的染料和茶叶，被批判为“资敌”，他却在工商干部会议，粮食干部会议上以“民生”为由为自己辩护，“说了不少不恰当的话，反映了我的严重右倾情绪……按其性质来说是很严重的”。

同样或类似的事情他还做了不少。

例如刚从上海到苏南，他就反对上级制定的“民运包办（一个上海来的学生、工人或职员包办一个村镇的减租减息运动）”政策，认为这样做是党、政、民权力集于一身，是一种小型的“集权”和“专制”。未经批准，他就擅自在《江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段引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作为反证，正好撞在批判“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枪口上。被激怒的上级痛斥他是“洋教条”，不过还好，没太跟他过不去。

再例如1941年调任东路特委委员兼任第二区专员，他的任务本来是搭建一级政权机构，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可他“在各级政权机构和党委的工作关系上，过分强调政府机构的作用，有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又）不恰当地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斯大林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为例，来强调政权机构的作用”。

好嘛，70多年前就提出党政分家的概念，可举证却又不大恰当。

此时的顾准按说应该算是个“老”党员了，可对“党性”却相当的没有概念。也是在苏南，他擅自修改党的高级干部将要发表在《东进报》上纵论国际形势的文章，大胆指出其中基础经济学上的硬伤——“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而造成的经济恐慌，和和平时时期因生产过剩而造成

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还坚持认为“改正这种说法显然是必要的”。在他看来事情对错远重于身份高低，这是他常常“未敢翻身已碰头”的原因却不自知。幸亏这位党的高级干部心胸开阔，“大人不计小人过”，特委开了几次顾准的斗争批评会，事情也就算是过去了，没有上升到“目无领导”、“篡改”、“张狂”等吓人的高度。

可此时顾准的顶头上司感到他实在是“领导”不了这家伙了，无奈中他建议上级将他调开。党批准了，他就被调到了“不负实际责任的”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的职位上，任务是收集敌伪清乡部署的信息和具体的办法，上报上级以便部署军事上的反击措施。

他很快从敌伪报刊上看到了日寇清乡的公开信息，发现他们要“延河筑篱，分割根据地”。可他认为这个事情又不需要特殊的才干，报纸是公开的，大家都看得到，我报不报，早报晚报都意义不大。可偏偏就因为他的“迟报”，军情被延误了，日伪军提前我方反清乡部署一天沿河筑了篱，各桥头布了岗，形成了封锁线。

事后他内疚得要命，上级也快被他气疯了。除了开会批评斗争，决定立即将他调去离上海更远的苏北，另行分配工作，并在调令中注明“此人在江南犯了错误被撤职”。

他怀揣调令惶惶速速奉命赴职，完全不知调令的内容。由于充当批评斗争对象已成常态，以致到了后来他对批评、批判、斗争会已经习以为常了。幸亏彼时“斗争”这一从北方引进的新词汇远没有后来愈来愈多地包含着致命的恶意在内，针对顾准的批斗会应该也仅仅是“触及灵魂”而不触及皮肉。常常被他气得暴跳如雷的上级，尤其是谭震林先生，也真算得上心胸开阔，一般也就是把他调开，不见心不烦了事。

到了苏北，还没等好好开始戴罪立功，他又先被一本书给吸引了，那就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极其叹赏”，像当年老板潘序伦看他的《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一样，一击三叹，一叹三唱。这是一本“尖锐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的小册子，就算他已经对过火的党内斗争习以为常了，这本书依然对“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述 P87}。不过他又对书中“如此频繁地引用孔孟语录”以及“尖锐地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同上}难于接受，推推敲敲，老想找个机会和作

者切磋切磋，可惜他一辈子也没有遇上这样的机会，不像老友孙冶方，曾和作者做文字交流并成为中共文献。

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和“党内斗争”的厌恶，可谓顾准一辈子的分明爱憎，可这位戎马书生在苏南苏北，凡是涉及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却无法立马横刀地做个“个人英雄”，几乎回回是个失败者。他没有用过枪，没有打过仗，没有杀过人，甚至很可能——没有打过人。

顾准骑没骑过马，虽然他从未提起，但估计马还是有的。党虽然常常“呵斥”他，却也深知这样一个财会人才的宝贵和可遇不可求，所以他每次被“撤职查办”后都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是调开了事，职务还都不低，配匹马，配个警卫员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马”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他的“历史交代”谈到苏南苏北这几年，处处是“失败”、“彻底失败”、“完全失败”、“无可推诿”、“内疚”、“不可容忍的错误”、“可耻”……的字眼，让读它的人也看着窝囊——你说让他搞民运吧，他心软手软，根本弄不了“红色恐怖”那一套东西；让他搭建一级政权吧，没经验不说还向党闹独立；让他做财经吧，他对顶头上司“根本看不起，认为他不学无术，能力薄弱，作风又不正派”，对同级又嫌人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歪风不亚于我”；让他办银行吧，恰恰遇上日寇清乡，发生挤兑，淮海券和银行一起垮了台，光是烧那一屋子刚印出来的票子就烧了整整大半夜；让他反扫荡吧，又做了“逃兵”……。反正一无是处，以至于即使作为副职也不能固定在一处长久地待下去，正职们要么嫌他夸夸其谈，谁都跟不上他那些“洋教条”，要么觉得他“不服管”，无法领导，要么认为他无经验（“无能”的礼貌说法），都希望他调到别处去。

可这样一个佼佼读书人，一名会计专家，党的稀缺资源，既然进入革命队伍，横竖不能打发他回家种地去。就算不怕他回上海万一投了国民党或者汪伪对根据地的威胁，革命队伍也绝不能开这种先例。省委也曾考虑过送他回上海做地下工作，但“因为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打消了此种想法”。

他琢磨过来琢磨过去，不知道党说的这个“脾气”指的是什么，难道是怕我“一走了事”吗？同志们，这怎么可能？！“无论省委所指的‘脾气’是什么，我当时确实没有动过回复业余革命家的念头”。

看，这要命的“职业”、“业余”情结又上来了。

他是这样总结自己在苏南苏北干革命的三年的：

“这三年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全是失败的，走上去延安的征途时心情抑郁，由此，在延安整风达到了全盘否定自己的结论。”

无奈的上级最后终于为他找到了一处最合适的去处——

“二月下旬，李一氓通知，区党委决定我去延安学习……。我对我自己……感到无限羞愧，所以我对（他们的）冷漠态度和冷言冷语根本没发生过什么强烈的反感。李一氓在告诉我去延安时，加上一句‘没有马’。此后三千里征途上，即使有机会找到牲口，我也没有骑过一里路。”

是的，亲爱的同志，没有马，你好自为之。

2. 从自信尽失到身价陡增

1943年3月，“没有马”的顾准和另两位很可能本就应该没有马的同志一起踏上了赴圣城延安之路。

他的心情非常抑郁。一个在革命行伍中毫无建树的人，一个失败者，对于从十二岁开始“职业生涯”那一天起连“落在人后”的滋味也从未尝过的他，格外苦涩。

按照革命行伍的规矩，顾准真要赴延安的话，原本至少应该是“有马”的。好歹他也算是个“营级”干部吧，加上还是位知识分子，一般来讲，党对这样的干部还是爱护有加的。一些和他同状态的同志们赴延安参加整风，要么是先辗转几个城市，或旱路或水路或空路到西安或者重庆，然后再以较低级的交通工具，例如卡车，马车什么的到达延安；要么至少也有马或者别的牲口——或骡或驴甚至担架，在“交通”同志的护送下到达延安。

比如顾准在孤岛时的顶头上司——文委书记孙冶方就是从上海辗转香港、广西、重庆奔赴延安的，还携夫人洪克平女士同行。只因为重庆到延安的最后一班飞机实在是没有座位了，才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返回苏南。孙冶方也因此没有参加延安整风，逃过一劫（他是被“勒令”到延安去“说清楚”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账的。倘若到了延安，落在“刑官”康生的手里，照他的秉性，后果很难设想）。

其实顾准也逃过了一劫，只是他不自知而已。逃过的原因正是因为——“没有马”。

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大戏，到了1943年上半年还在重头戏——“抢救运动”上。以“出鞘的利剑（毛泽东语）”，“刑官（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语）”康生先生为最佳配角的这一幕正演进得如火如荼，如痴如醉，高潮迭起——学习高潮，坦白高潮，自贱高潮，揭发高潮，刑求高潮，自杀高潮……把个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看得目瞪口呆，用日记的形式留下一本《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等到人们能够看到它的一天，“角儿们”都已故去，后人们目瞪口呆的程度却不逊于日记的主人。

上海时期顾准遇见的第一位党的上级——林里夫先生，已经在这高潮中打了好几个滚了。这位“延整”大戏从始至终的参与者曾数次走进康生先生的刑房又数次被抬了出来，几天几夜的挂大吊（四肢反绑吊在梁上），砸血管（用带棱的木棍专打胳膊血管处），以致晚年因病需要输液时，护士们无论如何找不到可以下针的血管。用他对小辈们的原话说，那种疼是“……恨不得头上长出角来”的、求死不得的疼痛。

大概只有过来人，才会这样形容酷刑。十年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整肃“AB团”的旧折子戏在延安新戏中又重演了一把，林里夫不幸成为其中一个小角色。

“共产党这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底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致对它轻蔑和冷淡，因为它构成对自己份子蔑视，也就轻贱蔑视了它本身！这是可悲的！……他们将要把这被给予的‘不自尊’带向人民中间去吧？人民也将从这‘不自尊’的介体来不对这个党有所尊重和珍贵了，可悲呀！”《萧军延安日记》

目睹了延安整风全过程的党外人士萧军一语成讖。二十多年后的文革哪里是什么“史无前例”，它史有前例，前例有史，延安整风就是它的前例、它的史。这‘不自尊’至今还是国人身上的痼疾，很难愈合，无法根治。

没有马的顾准，在赴圣城的路上历经7个月，中间还差点“光荣”了。可这7个月的延宕却很

可能救了他一命。

顾准研究者蒋贤斌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1942年夏秋之际，整风运动又开始了审干、反奸的试点工作。对于这些信息，苏北根据地的领导人应该是知晓的。长期在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工作，他们也应该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延安正在开展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把犯了‘错误’的顾准惩罚性地送到那里去‘学习改造’，那么其惩罚的期望值的边界在哪里呢？我们难以推测和想象。”蒋贤斌《出走 顾准思想研究》

我原来对蒋先生这样写有些不以为然——送顾准去延安，应该是出于领导很难安排这么个烫手山芋的无奈和帮助同志进步的好意，无非像日后将棘手的同志们送进党校罢了。而1942年延安的残酷是因为交通和通讯的不发达，令他们无从知晓，不明就里。尤其是这位领导，在许多人心目中都是文将军加武才子的形象，怎好这样测度人家？

但是等我查到这位领导人的履历，就不能不悻悻然倾向于蒋先生的“恶性预期”了。

如是所闻，他确是位饱学之士，毕业于顾准曾经任教的沪江大学。中共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参与发起上海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即顾准“联谊会路线”时期的“社联”），转译过《马恩合传》、《哲学之贫困》等，参加过长征并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再看他日后长长的履历，无不显示着一位“腹有文章气自华”的儒将形象。

但是，有一段履历却极为删繁就简、一笔带过，那就是他在1933年的瑞金城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这个在当时“具有直接拘捕和处决反革命分子的的特权——‘紧急处决权’，囊括公安，检查，法院的权力于一身……”龚春英 朱云平《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机关中的地位》的职位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看他晚年自传性回忆录的题目，从极具个性的《模糊的荧屏》改为毫无个性的《回忆录》，就更令人浮想联翩。“从1932年5月开始，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杀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但这还算是‘总的工作比较平稳’的阶段”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曾任“执行部长”的这位先生，如何会对党内斗争之残酷“无从知晓，不明就里”？

“没有马”三个字就是从这位先生嘴里冷冷说出的，但也很可能就是这三个字救了顾准一命。

没有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也没有马，顾准到达延安用了整整7个月的时间。等他看见宝塔山，喝上延

河水时，整风已经趋于平缓，治病救人的审干和惩前毖后的抢救都已经接近尾声，能抢救的都抢救过来了，抢救不过来的也都送太平间了，奸已基本除净，剩下的就是最壮观的压轴戏——“红太阳冉冉升起”的尾声，大幕就要拉开了。

“我们到达延安较晚，延安的一期整风（包括1943年夏的抢救运动）已经结束，我们这批‘来自前方’的人的整风，已经是二期整风了。”

他的“没有马”，他的迟到，谁能说不是又一颗“四万年结出的果实”？

顾准到延安后立即开始了“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

“学习一开始，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上触动最深的当然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文件中尖锐指出的：读书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杀猪猪会跑，读书，怎么读都行；以及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比狗屎还不如……对我震动很大，因为这打中了我的要害。”

这是顾准“历史交代”中特别叫人气促的文字之一。虽然二十多年后我们这代人又亲耳听过一遍同样的蠢话，可毕竟事过快五十年，都快要忘记了。

中共延整是时，莱茵河畔的“亨克尔”（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已经问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ENIAC”（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即将问世，橡树岭的“胖男孩”（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也已胎动母腹……来延安前，他已经从每天都要阅读的敌人报纸上隐隐嗅到了这些知识产物的味道。对于这些东西他向来极为敏感，就因为它们满含数字，而他对于数字，比猎犬对于猎物的嗅觉还要灵敏。这从多年后，在他已经成为“狗屎”的日月里不胜其烦地记录下来的许多“关他屁事”的东西——西方，北方和自己东方关于工业、农业、科技业，关于钢铁，粮食，石油，化肥，关于世界的合理生产组织，联合集团……的文字，你就能知道他对这些东西的兴趣度和灵敏度。

眼下他还尚未变成“狗屎”，可他从中获取一切的书却已不如“屎”——读书人读进去书连“人屎”都拉不出，狗都不吃，狗屎还可以肥田，读书人吃到肚子里的书……。

他追求的“满腹经纶”，他擅长的“引经据典”早已成为人们耻笑的笑柄，而言辞粗鲁，读书少或从不读书变为大家恭维的德行。数字神童，会计天才，讲师教授，著书立说，读万卷书，懂几国语言……在这里都已一钱不值。他的世界，他立足的基石动摇了，嘎嘎作响。

“夜不能寐，起到户外，月光如水，徘徊自问，你究竟有什么知识？……生平第一次，我否定我自己。我的整风，也就是这样开始的。”

“延安整风曾一度彻底地否定自己。”

他的整风开始于对自己的全面、彻底否定。起初，他认为自己革命“革”不好的原因，“答案本来不难找到，（是）‘不服气’阻碍我做出正确的答复”^{自述 P103}。可现在，他自信尽失，“心里对于自己究竟有多少知识，又所谓知识究竟是什么东西，实在已经没有确信了”。

可怜年轻的顾准，读过的书还是不够多，还不能像他中年后那样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自我显灵”的时代，这原就是每一次、每一个“造神运动”必要的序曲——先将“旧人”原有的一切——知识、信念、意志、个性统统打个稀烂，打成泥淖，然后“再捏一个你，再捏一群你们”。打碎和重捏你和你们的，就是神。

他来圣城也太晚，没有亲耳聆听“延讲”，也不知道还有一出与整台大戏主旋律完全不着调的“野百合花”插曲，更不知道曲中最高亢的一句歌词——“你是不是对？大人物”^{王实味《野百合花》}，也不知道唱出它的歌者就关押在离自己不远处的地方，更不知道四年后它将为这支歌而身首异处。

但是即使他知道又如何？只有审判和判决，没有辩护更没有抗辩，即便是顾准，也一定会迷失在群体中。再加上如今他真心实意认为自己在苏区是个失败者，是个逃兵，噩运何时降临令他时时惶恐不安。自己还不满三十岁，还有许多时间改正缺点，为党工作。因此他没有如被告知的那样，在他的“二部十二支”上“畅所欲言”，他没有意见，也不申诉，不像老友林里夫那样“不认罪”，“持续申诉”，被刑官康生称为“一贯好在党内打官司，向党作斗争”^{林里夫《林里夫文集》}，一次次被打个死去活来。

这一次，“神”又有新的发明——把这些“你、你们、他、他们”的所谓“小辫子”都攥在手里，不听话我就拽，再不听话，好，咱们中国有拽着辫子斩人的传统，又方便又利索，很好，实在是太好了。

根据顾准的统计，是时“党校校部和各部的学员和教工人员在三千人以上”。这样大规模人群的、长时间的“集体催眠术”，大概只有在宗教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可是相比于二十多年后发生于中国

的，规模大上千千万万倍的“集体催眠术”，它又太小巫见大巫了，仅仅算得上是“史无前例”的前例或演习而已。

“集体催眠术”一词出自自我的好友王克明之口。这是一位如假包换的“延讲”、“延整”之子——母亲是鲁艺学员，给延安人演平剧（也就是京剧，彼时北京叫北平），有“延安小梅兰芳”的美称。父亲是鲁艺培养出的导演，导出过极峰最喜欢的“三打祝家庄”。他们亲历延安整风，虽无资格亲聆“延讲”但都听过即时的传达并亲历“坦白”、“抢救”。克明有个叫“王延风”的哥哥，有个叫“孙维世”的表姐和一位叫“孙泱”的表哥，还有两位分别叫“孙炳文”和“冯友兰”的姨夫……

延整七十年后的克明也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他在写母亲的口述历史《我这九十年》时，尽管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因要求政治的透明和理性而被排出“母体”，尽管早已读过高华教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他依然被“整风”的蒙昧和无理性震惊了。用了“延安之子”的种种便利，他搜集了大量当年公开的报纸，资料和文献，写出一篇足以经受后人推敲的中篇文章——《整风和〈讲话〉前后的延安文艺》，而“讲话”正是“整风”的开篇和序幕。

来看看克明收集的数据。《讲话》前后。因为整风：

74%的文艺社团消失；100%的文艺刊物停刊；抗日宣传从58%降为11%；传统秧歌保留率为0.3%；陕甘宁所有报纸杂志统统停刊，仅剩一份《解放日报》。

再看由数据“算出”的结果：

动员抗日全面转向动员内战；革命文艺运动迅速变为革命政治运动；鲁艺从创演艺术作品改为投身政治宣传；文艺从繁荣转为凋零，创作从自由变为政治第一。

在如此的万众一声中，加上“抢救”的刑房和杀人的河滩，实施“集体催眠术”是毫不困难的。还有就是那么多“大知识分子”都先被震慑了，乖了，驯了，顾准这样的小人物，小知识分子——真是小，年纪才二十八，级别都拿不上台盘，何况还有“辫子”在手，还在话下吗？

“整风就是要改造每一个党员，摧毁传统的道德观念，建立一个新的伦理与行为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要将人性改造为党性。” 罗博·C·斯诺 《莫斯科与中共》

战战兢兢中，顾准记住了“党性”这个名词，到他“人性”——“党性”——“奴性”的联想

和推理还需要十多年的功夫。

他在延安老老实实地“学”了下去。

是时延安物质极度匮乏，但延整的学员们生活还是不错的，“从事开荒种地的次数很少，被服发得充足，伙食吃中灶，全吃细粮（小米和白面），住处也宽敞，一个大窑洞不过住四个人，冬季还发烤火木炭，抽烟的发烟草。学员利用空闲时间种屋前小块空地，收获全归个人所得……”。虽比不上上海，但比起苏南苏北还是安逸多了。物质上，他和大家一样——心满意足。

1944年春，组织认为要“人尽其才”，遂将他调到党校的校务部做会计，秋天又被陈云发现其人确实是个会计奇才，遂要到自己手下做会计教员。顾准回到“志不在此”的本行心情如何，他没有记载，我也不敢妄揣。但是他记录了1944年4月学习主席《学习和时局》时的激动心情，“在延安听主席这个报告的传达时的激动心情，虽然事隔二十五年，还如身历其境”，只因为主席说“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

头上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兴许不会掉下来了？

果然，新四军军长找他谈话来了。先是问他今后工作的意向，他说“我在淮海扫荡中当了逃兵，犯了严重错误，今后做什么工作，悉听党的分配”。不料军长话还没等他说完，就一口“完全解除了我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不仅如此，还批评“淮海负责人麻痹大意，未作反扫荡部署”。

这大出顾准意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从前他也常有过满足的感觉，可那都是对自己努力的满足。这一次他生出的，却是对别人恩赐的满足，还有感激。好消息还有呢。

不久上海“联谊会路线”时期的江苏省委书记也到了延安。在一次闲谈中，他好似无意地对顾准“解释”说“1939年省委把[你]调离职委，当时正值他去重庆向总理汇报工作，是刘长胜负责决定的”。言下之意，此事并非党委而是刘长胜个人好恶造成的。可他作为当事人就居然没听懂，一直到事过二十多年，才在写这篇“历史交代”时把这一连串的事由联想在一起，得出如下结论：

“陈毅同志找我谈话，解除我在淮海扫荡中逃兵行为的责任，表示希望我仍回华中去，正在刘

晓（那位省委书记）向我‘解释’此事前后。二十余年以后的今天，把从前不知道的事情连缀起来推想，也许陈毅同志也是在主席在（听取刘晓）汇报中对上海职员工作作了肯定评价之后，才找我作了这次谈话。根据这几件事情，我感激地相信，主席对于刘长胜和我在 1936-1939 年上海职员工作中方式特殊的一次争论中支持了我，……”

满足感更强烈了，一种陌生的、对别人“赐予恩惠”的感恩戴德的感情。最重要的是“恐惧”没有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1945 年 4 月，中共七大召开。没有代表资格的顾准仍积极参加了“路线学习”，全部都是“主席的光辉著作”。他“开始领悟我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已是一个将要胜利的党”。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皖变”后不久曾又一次度携手的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面前终于彻底撕破了脸。国民党拒绝在合法政府内给共产党一席之地，共产党则马上从民族解放“转成长”为劳工解放，摩擦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升级成了战争，即使有 1945 年的“双十”协定和 1946 年 1 月的停战令发布，加上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召开，也都无济于事，两党的再一次兵戎相见已经拉开架势，双方的前线都急需忠诚的战士和将领，延安整风几乎在一瞬间就结束了。

“开始领悟到我党已是一个将要胜利的党”的顾准非常兴奋，想立即回到第一线的岗位上去。他“肯定地表示我愿意再度回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并且在“1945 年 8 月我就是列为回上海的干部离开延安的”。他开始了从延安回苏北的返程。

四个月队伍到达淮阴。顾准惊见母亲、妻子汪璧和临行延安时才三个月大、如今都快三岁的女儿耒头都在这里。组织决定他不要回上海，就留此工作。“说这番话用的是商量口吻，其实已经是传达组织决定，我对此当然表示同意……”，看来延安整风提高了顾准的党性是无疑的。

党决定他负责苏中“党产”的创建和管理，随即他启程到苏中各处调研。

见到近三年不见的老友们，顾准惭愧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可他惊诧而“突出地感觉到，我犯了很大错误到延安去学习，回来时不论是熟人还是才认识的同志，对我都十分热诚，似乎我的身价突然提高了很多……”，连那位送他去延安并告诉他“没有马”的高级领导，对于他的种种建议（他又开始“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了）“似乎也认为可以加以考虑……。地下工作的老上级孙冶方、徐雪寒，对我也热情相待。”

他有点“受宠若惊”，却又摸不着头脑，秉性使然，更张不开口向人去问个究竟。

“我当时相信这是党给我这个犯了错误，决心改正的干部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好好为党工作。而回忆在苏南淮海时期的许多错误，对此既十分感激，有十分惭愧。最近我相信，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主席对上海职员工作的肯定评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仅这一段时间，而且自此以后，一直到1952年为止，党才放手使用我，使我能够在解放战争和上海解放初期做一些工作。”

“蠢头”顾准，这么重要的“政治信息”他当年竟然就不去细想，更没有深究，直到近三十年后，党早就对他拉下脸，背过身多年了，命他写“历史交代”时他才算“开了窍”，才“最近我相信”云云，其“政治上的不成熟”是多么可观。

3. 管理党产、运筹财政和接管上海

顾准真正在革命中发挥作用，还是延安整风结束回到苏中后、大反攻时期在山东以及接管上海后，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而体现的。不论他“志”在不在此，这些才是党真正需要他干的革命事业和担任的革命职业。从此后不足七年的时间里，他才成为了一名名符其实的“职业革命家”——党的职业经济、财政、税务、金融、管理、会计家和企业家。

从延安回到苏中淮阴的顾准接受的第一件任务，是“在华中财委内负责‘党产’工作。（因为）和平实现后国共两党经费都要独立于国家和地方财政之外。为了应付未来时期党的经费，需要在这个过渡时期内建立一些名义上私营，实际上是我党所有的企业”。

“党经费”必须独立于国家和地方财政，这既是个政治常识也是国共谈判的基本条件。派顾准去搞“党产”、“党经费”是利党的不错安排。苏北最重要的物产是棉和盐，所以顾准就成了“党产”——利丰棉业公司和汇通盐号，后来又加上一个高邮面粉厂的老板。公司公开宣传，公开招股，还为此在淮阴设立了一个“党产总机构”，除了上述三个公司，理论上还负责一个羽毛猪鬃公司，一个鸿济外贸公司。这些公司的经营权分属新四军和华中局不同的部门，例如华中联络部、新四军七师、华中行署货管处等等。实际上“党产总机构”除了顾准，“只有汪璧一个人管账”，用眼下的术语，

就是个“夫妻店”，名头很大而已，理论上也统一不了所有党产。

党产工作很不顺利。

首先是利丰棉业公司流产——公司成立在2月，收购季节已过，新棉上市要等到9月以后，而9月中共放弃淮阴，公司自然消亡。其他几个公司命运也都不比利丰好到哪去，“淮阴放弃以前，苏皖边区贸易机构林立……又都要资金，资金又无非取给于财政收入或华中银行的发钞。机构愈多，所占资金愈大，财政——发行愈难平衡，华中券币值愈难维持……。党产部门独立存在，只会增加支援战争的困难”。

经同志们提醒，也根据他的经济学知识，顾准向上级建议终结“党产”。上级一直拖到淮阴放弃才采纳他的建议，好在“党产”不庞大，损失也不“巨”。

然后就是国共内战的第一大战役——苏中战役。出于战略考虑，中共七战七捷后放弃了淮阴。淮阴放弃，顾准汪璧夫妇随军北撤山东。途中顾准接上级指示，命他单身转进苏中寻找新成立的苏中区党委协办财政。此时的汪璧已有九个月的身孕，作为丈夫他原应在侧照顾，可是一来军令如山倒，二来淮海区扫荡时期“做逃兵”的耻辱，虽然在延安时就已经被上级的上级一笔“解除”了，可他依然耿耿于怀——那时的行为确实是“因为恐惧”嘛，耻辱岂能靠别人“解除”，那是要靠自己“雪洗”的！他一直在找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上级要他单兵作战，只身前往，这是对他的信任和，岂能放过！丢下临产的妻子，他转身就走。

在苏中东台的潘家墩，顾准找到了新成立的苏中区党委。他立即上任行署货管处处长，任务是在物资上“支持本军分区坚持本地区的游击战”以及“尽可能把留在苏中的、足以支援野战军的军需物资北运，并继续由上海运进军需物资”。

此刻身在胶东的妻子汪璧诞下他们“活下来的”第二个孩子——“小米”顾逸东。

顾准在苏中，任务完成得不错。次年，1947年7月，上级又一道命令将他从苏中调回山东。是时正值中共华东首脑机关因国民党军队向山东中共发动重点进攻而有步骤地从胶东撤退，大批非战斗人员撤往大连，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和母亲。

这一次，有人建议他随妻儿老小一起撤往大连，可他“仍率山东工商总局坚持不走”。他认为上

一次的“只身前往苏中”和这一次的“坚持不走”都“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最低限度的责任，我并不认为这已足以洗刷我的耻辱”。“雪耻”大事未竟，他怎肯随非战斗人员撤退？坚持留在山东的他被任命为山东工商总局副局长，率领局机关随华东局行动，“机关保全得完整一些，少撤走一些人，局面好转后恢复工作即多一份便利”。

他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8年2月，华东局任命顾准为渤海区行署副主任兼财办主任，“统管该地财政、粮食、建设、工商、银行，照顾兵工生产，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当前的战争”。

这次发生了一点问题。

先是顾主任在看到征来的公粮已经足够满足军需时，擅自决定“允许民间输出一部分粮食到敌占区换回老百姓急需的染料和茶叶，同时也充裕我税收（出入解放区的货物通过税）收入”，却不料“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他们认为输出粮食是资敌，是错误的。……”。

后有顾主任在工商干部会议和粮食干部会议上颇多带有“严重右倾情绪的不适当的话”，引起了同志们的不满和投诉，不外乎“政治上不成熟”，多了点人性少了点党性的胡说八道，就是那种当时看还不算很严重，多年后至少够送你一顶右派帽子的言论。

是时正值大反攻前夜，大军渡江在即，需要大量干部到新区工作，所以“我这些错误在当时还不明显”，但“按其性质来说是很严重的”。

9月，大反攻已成高屋建瓴之势，财政工作已不仅仅限于供应军需，而是涉及到综合平衡的计划工作。这正是顾准主任的强项！他立刻向上级建议：

1. 健全财政工作机构；
2. 建立铁路和工业恢复与发展资金循环；
3. 全省统一预算，统一收入，使财政成为有计划和平衡的；
4. 税收从“过路税”转为“工商税”开征；
5. 立即筹建独立于工商系统的税务系统；

6. 建立直属财政厅的盐务局；

这些建议都是令华东局辖属经济区域由战时财政向政府财政过度的必要措施，也是即将诞生的新政权一次成功的财政预演，勾勒了新政在财政上的雏形。

10月，济南政权易手——解放。为培养准备接管大城市财政系统的干部，济南成立了“商专”，顾准任校长。此时的他已忙得不可开交，实际教学工作根本顾不上管，连济南城都不大去，以致上级不得不命令他务必到场去向学生们讲一次话。

顾校长“事前搜集了学生的思想动态，着重说明我党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对于后悔没有早去解放区的学生，则偏重于鼓励”。和顾校长同行的还有一位姓李的历史学家，负责向学生们讲解历史唯物主义。他就是几十年后被顾准骂做“数典忘祖”的李亚农先生，这是后话。

从延安整风后的1946年2月到1949年2月，顾准在苏北、山东总计三年。他感觉“总的来说是顺利的”，原因有三，一是延整回来还算谦虚谨慎；二是因延整后的“身价陡增”而得到领导上的“放手使用”；三是革命形势如迅风疾雷般发展，环境远非抗日时期根据地的艰苦局面可比，工作要容易得多。

转过1949年，中共胜势已定。华东局开始着手准备接管上海，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投于此。近两千人组成的接收班子，包括财政，工业，轻工业，银行，商业，公用事业等等大队，在山东潍坊附近的青州城成立了“青州总队”，顾准任总队长，随大军延津浦铁路南下，浩浩荡荡，直取上海。

4月21日大军渡江，23日南京政权易手——解放。顾准的青州总队继续南下，经扬州，过镇江，移驻丹阳附近，作接收上海的具体部署。“青州总队”建制撤销改为直属华东财委，顾准被任命为新政权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处处长。

5月27日，上海市中心区已无国民党政府踪影，顾准和他的战友们长驱直入国民政府财政局大楼。上海宣告政权易手——解放。

全盘的接收计划已在丹阳制定，新政权开始按部就班接管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财政局、地政局、

货物税局、直接税局、公债处、会计处、审计处以及中央财政部驻沪办事处。没有抵抗，也没有直接的留用，新的财政人员奇缺成了最要命的事。

顾处长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原地下党上海市委十万火急催要干部。凭着他十多年前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的关系和面子很快要到了能够负责货物税局和公债、会计处的专业人士。但直接税务局的负责人可就难找了。这也是他最不放心的部门。直接税的征收牵扯到非常复杂的会计计算，只有十分的内行才能胜任。他推荐了一个原来的立信同事，被上海市委否决了，原因很简单：不可靠。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这个局的工作最复杂，1950-1952年上海税收工作中……（省略号为顾准‘历史交代’原有 - 著者注）的争论，以及我在上海税收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都属于所谓直接税的范围**”。

顾处长最不放心的地方，三年后果然出了大事。

其他部门干部安排都还顺利，基本按照顾准的推荐（毕竟他是上海滩财会“老人”）配齐了办事人员，但从他日后的“历史交代”看，这样的安排可能也是“祸根”的分支，你看他交代说：

“从上面几个人的情形看来，可见我所网罗的是资本家、资方代理人、资产阶级教授这一流人物。但建处当时，华东财委是支持的……虽然如此，这一工作的严重政治责任，完全是应该由我承担的。”

彼时彼“处”关系到中国轻工业和私营工业最集中，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据着巨大比例的上海几十万纳税户如何纳税，关系到新政权新国家的国库收入，建制延宕一天后果就严重一级，恁谁都付不起这个责任。

建立上海市新的税收系统，顾准忙得不可开交。他“擅自”做出了一项“重估资本”的决定，在他看来这仅仅是以常识为基础和依据的一项普通工作条例而已，谈不上什么“决定”、“决议”，至多算得上是一项“规定”罢了。直接税务局立即公布了这一规定，“**允许私营企业按照当时人民币物价重估全部财产价值，从而改正账面资本额，使之接近实际情况**”。

此规定一经颁布，大受上海资产界，尤其是会计界人士欢迎。隐约之间，顾准感到有些“不对劲”，不是方法和技术上的而是“氛围”上的，却又找不到具体错在哪里，加上忙，他就忘掉了，但也可以说他是“陶醉于胜利，忘乎所以”了。

不久，顾准被新政权正式任命为上海市财政-税务双料局长，是年三十四岁。

“我不甘上海财经工作的落后，干了这样又干那样，干部不足，工作深入不下去，实在显得是孤军作战。”

此刻他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

根据山东工作的经验，他“痛感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想在这方面摸索一些经验”。他认为“资本重估”后的上海税收工作已经进入秩序，匆匆做了安排转头就“通过我的个人关系，网络了一批‘懂得企业经营管理’、‘懂得企业会计’的‘进步人士’共约二三十人，建立了这个处（国营企业财务管理处 - 著者注）”，他更心切的是“国营企业”的扩张和管理——工业、轻工、铁路、航运、农林、水产……，它们才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的主梁，是财政“开源”的正道，也是他的志向所在。

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准备在现代会计学的基础上建立新政权的新财税体制之际，遇上了迎头一击——中财部严厉指责他对上海的税收“放任自流”，尤其是“重估资本”，“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并对。

他不得不仓皇“回逃”到上海税收上去。从此顾准再也没有离开过新政权上海总税务官员的位置，即使他的正职是上海市财政局长，还有一个短时期兼任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但大部分工作内容还是税务，从核定税种、制定政策、规范方法到税务仲裁无一不在他职位范畴之内。他在大上海“总税吏”的位置上一作到他职业革命家生涯的最后一天。

4. 大上海总税吏的履职苦旅（上）

这两节将比较“专业”，也很枯燥，但假如不这样写，非专业人士读者对顾准 1952 年轰然下台的原因就很难做出自己的判断。

虽然中共上海市委对顾准一案早在 1985 就以“撤销 1952 年 2 月 29 日市委负责同志在全市负责干部会议上代表市委宣布的撤销顾准同志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恢复顾准同志的政

治名誉”这样不成体统的措辞为其“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但时至今日，关于他的下台原因依然是众说杂陈，慷慨激昂的、窃窃私语的、撇嘴不屑的都大有人在。而这一点对于我的传主至为关键，至为重要，更是其人是否值得书写的大事。

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倒下，头上戴着“恶劣分子”的帽子离开上海，从中共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他的官场生涯，也可以说是“职业革命家”生涯骤停时的形象一直是扭曲、并且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暧昧的。

著名经济学类作家吴晓波2010年2月版的《吴敬琏传》，非常肯定地将顾准一生悲剧的开端——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被中共撤职，归因于在这期间顾准表现得非常激进和左倾，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以“坚决反对左倾，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理由突然拿下，对顾准人生悲剧的开端下了至少在今天看来相当负面的结论。

探索顾准颇深的蒋贤斌先生也持相同观点，他的结论是，彼时顾准因为对资产阶级有“过左”的“想头”和行为而被“纠偏”的上级果断拿下。蒋先生引用史料，列出顾准下台前的1952年1月底到2月19日一个月里（原文如此，应该是二十天左右）上海工商界因“五反”而自杀者就有多少多少人，未遂多少多少人，其中“五反”运动发动起来后，即从2月12—15日不过4天时间，自杀的就有多少多少人，整个2月份自杀死亡的又有多少多少人……，以及“起先自杀者还是小企业主，随著运动的继续，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家也走上了自杀之路”……“五反”运动搞跨了资本家和店主，工厂企业商店也随之停工歇业，工人店员没有饭吃。据统计，2月中旬，大约有13万职工失业……云云，残酷而血腥。

设若吴、蒋二位先生的观点成立，顾准作为“人”的形象不能不大打折扣，且何止是“打折”，“腰斩”也不为过——一个一贯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推崇者，一个数度向人告白“我手上没有血”的人，为了自己所属的政权和体制对本该保护的人民狂征暴敛，造成众多企业主自杀，大批工人失业，最后以“拍马屁拍到马蹄上”的耻辱原因被自己的党的自己人撤职查办。谁能说这不是一个活脱脱双手沾满鲜血的酷吏和奴才形象！就算和他日后出产的巨大精神产品相比，这些可以算

作稀世玉石上的“瑕疵”而忽略不计，可在今日一代新人眼中却是无法饶恕的，他所谓的“手上没有血”也成了谎言，此人值不值得书写大成问题。

弄清楚顾准被“排出母体”的原因是探究顾准的关隘，这个关隘过不去，很多东西压根就无从谈起。想要过这个“险关”，就非得把他从1949年5月27日随大军进入上海那天起，到1952年2月29日，那个闰年闰月闰日，他被自己党、自己人从显赫的大上海“总税吏”位置上一把拽下台为止的过程弄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

既然顾准上海时期所触犯的所有“禁忌”也就是错误都在税务上，其中又百分之九十九触犯在“直接税”上。那就从直接税说起。

直接税，用今天的术语就是营业税和所得税，极简单的一个税种，就是纳税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或提高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一个彼时专为区别于间接税（货物税）——产品的出厂税，流通税，还有原来解放区、根据地的过路税等等而启用的、眼下不大常用的税务和会计术语。

“进入上海后，货物税照（国民党政府）旧章征收，没有什么困难。营业税，所得税两者是否用民主评议办法，一开始我就持有疑问。”

顾准“栽”就栽在直接税的“民主评议”上。“民主评议”四字看似他后半生不幸的起源，他却从未，哪怕在口头上，真正承认过它是正确的。然而事情远非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简单。

现在就来追本溯源。

1. “民主评议”的起源：

随着1948年开始的大反攻，济南，石家庄，徐州、蚌埠、无锡等较小的工商业城市相继解放。和后来的上海一样，它们立即出现了税款征收技术上的困难。作为解决之道，行政者首先将货物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统一为“工商业税”，并以如下方法开始征收：

- ⊙ 确定某一周期，例如每月或每两月或每季的全市应缴总额；
- ⊙ 由税务机关会同工商联将此税额分摊到各行业；

③ 再会同同业公会分摊到各商户。

④ 分摊采取自报公议，简称“民主评议”。

“民主评议”是一种古老的税赋征收制度——包税制的变形，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罗马、古波斯时代，就是把租税征收包给承办商人。明清之际也曾出现在工商业很不发达的东方中国，具有浓厚的民间江湖色彩，与现代资本主义毫无共通之处。在多年后的政治哲学笔记里，顾准提到——

“共和末期和帝国时代的罗马，有金铸币，有高利贷的合股企业，要包税制度，有发达的对外贸易。这是一种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金融资本制度，只在这种情形下，才谈得到奴隶市场，奴隶价格；也只是因为征服停止，这种畸形的金融资本的城市的经济不可能再维持下去，才转向庄园制度。”

笔记 P74

他对在上海这样大都市实行“民主评议”的主张嗤之以鼻，对这种和现代化工商业格格不入的“包税制”的抵制，也是他日后判断“中国永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大陆的地区隔离、颯口的小农经济、东方专制主义及其重本抑末政策，使中国永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尽管松江棉布甚至行销潼关以西。要知道，资本主义到底并不仅仅是家庭手工业和包卖商，资本主义只能从蒸汽机和动力纺纱机开始……就这点来说，我很喜欢用现代化这个名词，免得人们把松江的纱布、景德镇的陶瓷、聚众开矿，甚至罗马以包税为基础的金融业都说成资本主义而和近代型的资本主义相混淆。” 笔记 P310

在工商业都极为发达的大上海实行“包税制”他认为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2. 是时上海的经济情势和顾准对“民主评议”的态度：

“中央关于接受上海后的税收政策，明确规定自进城之日起暂时按照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税法征税，税法改革要逐步实行。”

旧税法的间接与直接两个税种是严格分开的。上海大厂商、大商户集全中国之最，小商小户也集全中国最多，既有“接近垄断规模的申新，永安之类的大企业，也有无数贩卖纸烟火柴的夫妻店”，是个典型的现代城市工商业结构体系，从前解放区、根据地的那一套财政方法，已经完全无法适应其规模的庞大和结构的复杂。尤其是大商户，账册健全，早在旧政权开征所得税的三十年代起，资本家

们也几乎立即开始学习在税法范围内和政府博弈的学问。顾准早前为潘序伦修改的《所得税原理与实务》，正是教授他们如何“合理避税”的经典之作。假如实行所谓“民主评议”，作为地道行家的顾准，岂有不知它软肋所在之理？

“这种税收方法因其必然完全脱离税法规定”定会给可以操控同业公会的大资本家“占尽便宜”，而中小商户则因没有话语权，只能乖乖接受“摊派”。

从一个资深会计学的角度，顾准一眼看出“民主评议”若在上海实行必定适得其反，不仅毫无“民主”可言，还会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这不符合他心目中的民主政治原则，也不符合他的党七届二中全会“使税收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实行）限制的斗争武器”。

为此，顾准对“民主评议”自始至终坚决反对，拒不执行。他甚至认为“事实上上海所得税从未采用过民主评议”，它根本就是个“乌龙”。

3. 顾准有哪些“擅自”或者叫做“和中央分庭抗礼”的举动：

① 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

接受旧政府“逃税愈多，税率愈高；税率愈高，逃税愈厉害”的教训，直接税局上报市委批准后，在旧税率基础上降低税率 30%-50%，以此作为过渡时期临时办法，争取税务改造的时间。此法大获成功。头两个月，同期新税绩高出旧税绩好几倍，以致他都以为可以放手税务而转向“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了。不料第三个月税绩就开始下降，大概是纳税户摸到了“自报”和“重罚”的分寸和路数，又找到了和政府博弈之道。按常理，纳税户和政府博弈是一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政府面对的常态，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顾准却因此被党认为对上海税务工作“犯了放任自流的严重错误”而“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顾准此举曾得到饶漱石的支持和上海市委批准。日后饶漱石成了敌人，顾准与其“勾结成奸”尚且说得过去，而何以成了“擅自”，却还有待深究。

② “擅聘” 特约查账员：

根据世界通行惯例，政府注册的会计师可以代表私营企业办理纳税是个常识。在多年前那场“中式簿记改良还是改革”论战中败在潘序伦和顾准手下的改良派首领徐永祚，现在是华东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他向当年的学术“小对手”，如今的“接收大员”顾准先生建议，从上海公开执业的会计师中遴选一二十人作为直接税局的特约查账员，税局可以根据他们的公信力采信其查账结果，但不做一旦再查出“偷漏”不予处罚的保证。此法被顾准采纳，且事前得到市长陈毅的口头同意，效果也相当不错。徐永祚先生的建议，无非与眼下“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球查账一模一样，是会计业的本行和本能，日后却成了顾准“把某种国家机关的职能完全地赋予了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奴婢的会计师，是一种阶级投降主义的行为”的罪行以及“这一批被聘为特约查账员的会计师大约生意兴隆，上海资产阶级知道我是立信的人，也许立信还特别占了不少光”的徇私舞弊的嫌疑。

③ 擅自决定对私营企业“重估资本”：

根据税务常识——按照资本利润累进征收的所得税，纳税人账面资本愈小，同数利润按资本计算的利润就愈大，税率就愈高。上海连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致使币值严重下降，许多企业的账面资本额已经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真要以此计算，大家就都要按照最高税率征税，这显然不合理。

顾准接管直接税局后四个月就颁布了“按照人民币物价重估企业全部资产，改正账面资本使之接近实际状况的”政府令，深受上海资产阶级，尤其是会计界欢迎。

但很快，他就受到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谓之“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顾准又一次陷入无法申辩的境地——“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标准的必要技术措施，也并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常识性的说理，也大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放肆”之嫌。这样碰壁他也不是碰上一次两次了，已经懒于“说理”或者已经失去了“秀才和兵说理”的能力。

④ 向“师傅”学来，“师傅”却不认账的“专户专管”：

1949年10月，“受到中央严厉批评”的顾准匆匆回到税务岗位上。面对庞大的直接税税收的工作量，中央又不肯采纳他提出的一系列基于经济学、税务学和会计学基础上的措施，他向中央打报告请示解决办法。“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中央财政部的答案简单明确：民主评议”。不仅如此，“中央财政部随即通过各种途径（其中主要的一项是‘登报’）对上海税务工作做了严厉的批评，批评中着重指出，不用民主评议方法而用‘自报实交，轻税重罚’方法是错误的”。

在党内，中央对地方不用内部文件或者“内参”而采取公开登报方式，指名道姓（上海税务）批评的做法，除了日后自“海瑞罢官”时兴起的“不指名道姓却世人皆知”法，恶批一级地方党政机关的方式，还真是不多见。

但他依然拒不执行中央财政部关于“民主评议解决问题”的指示。

彼时正值苏联市政工作专家团在上海访问。其中一位阿尔希波夫同志是位苏维埃老财政，十月革命时从一个村苏维埃财政委员做起，一直做到列宁格勒州的财政厅长。顾准迫不及待地向他请教苏联城市中税收工作的组织方法。他诚恳地向中国同志传授他们那里实行的“专户专管”办法，即一个财政工作人员专管几户，这就是苏联对纳税企业的“专管专户制度”。他还说，“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用专管专户的方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是啊是啊，即使在非常时期非常地域，没有“律”至少还有“率”吧？依率征税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更何况在执政后的和平年代。“民主评议”，用在“村苏维埃”都尚且可疑，谈何在上海这样的经济巨人面前，那真叫是“见了鬼”了！

大受启发的中国同志顾准立即组织几个税务主要负责人酝酿讨论“我们应该怎样做”。在俄国老师传授的基础上，他们发展出“专管、查账、店员协税”一套税收方法，立即向市委和市府党组呈上，同时提出建议——“全市要组织若干区分局，每一个区分局下要按地段建立稽征组（现在改为税务所），稽征组的每一个税务员专管若干个纳税户”。

不幸，茅塞顿开的顾准在兴奋之余又犯了一个错误——在向市委市政府报告的同时，不知深浅地

向中央财政部递交了同一份报告。

这个建议看来市委市政府（至少市委书记兼市长陈毅）同意了，不过人人举棋不定，谁也不敢拍板，原因很简单——中央财政部坚决不同意。顾准的“师傅”阿尔希波夫也**“突然应召去北京一次，回到上海就改变了态度，严厉指责我不执行中财部关于征税方法的指示……”**

“无组织无纪律”，“个人英雄主义”小辫子已经被攥在别人手里的顾准，自己毫无知觉。

⑤ 公债、税收运动中的“命令主义”

1950年1月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会议，责令上海**“要在1950年3月份内，通过公债、税收各三千亿来征集一大笔现金（具体数字可能不确切），以此平衡财政，稳定币值”**。

2月6日，上海遭受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最猛烈的一次空袭，发电厂被炸毁，工业供电全部中断，工厂停产，失业增加，大上海自顾不暇。在此情况下，顾准建议市委致电中央报告这一情况，请求考虑上海的公债、税收任务。市委立即责成顾准起草报告，当即发出。**“一两天后来了复电，措辞十分严厉，大意是空防问题中央自有对付方法，公债税收任务绝对不可以改变”**。顾准又一次撞在枪口上，只是没有史料证明复电是针对上海市委还是仅仅针对顾准的。

1950年春是中共当政的第一个春天，也正是征收1949年财政年度所得税的月份。百废待兴的国家哪里不需要钱？可内战的阴影还未消除，空袭的恐慌又起，企业利润很低，前一段**“自报实交”**的**“放任自流恶果”**又不是一下子挽救得过来的。此时又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入川和蒋介石白崇禧、胡宗南部作战，大军政委邓小平亲赴上海，坐地向华东财委主任曾山要钱。

钱！钱！！钱！！！！

大上海“总税吏”顾准在明的“各三千亿”和暗的“军援”的重压下有些犯晕了。怎么办？

强征？不可以！那新中国新在哪里？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政府和企业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强征税赋是专制国家最恶略的行径之一，万不能在我顾准手上开先例。

那好吧，既然“自报实交”诸位摸出了门路，那么对不起，顾某就不得不从“轻税重罚”上做文

章了。这一招也不是我顾某的发明，是各现代国家，特别是民主国家都会采用的带有“普世价值”的一种征税手段，早年顾某跟着师傅潘某学的就是这一手，现在不得不用在诸位身上了。他将直接税局检查室全员派出查账，“查出问题，从严解释税法，从重科处罚金”。

其实他也心虚。明知“这种逃税处罚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这是一种“非常征税”，极有可能把逃税户弄得倾家荡产，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是任何税务部门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为之的下策——税赋将纳税户压破了产，不啻杀鸡取卵，无论如何是个双输的局面。

可是头顶上的“各三千亿”又怎么办？

无论如何这些逃税户还是“逃了”税，“不逃”的，不罚的还是大多数嘛，而“各三千亿”关乎全中国的财政平衡，币值稳定，民众生活和国家发展，孰重孰轻？孰能孰不能？更何况“‘非常征税’也并非没有根据，根据来自上面……”。

他的税务员们把上海滩查了个底朝天，罚了个鸡飞蛋打狗跳墙。

这回顾准可是惹了众怒，除了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他还收到了两颗子弹，以致公安局专为他配了两名警卫员。

其实轻税重罚的持续时间还不到一个月，一次小型的整风运动就开始了。这次整的是“命令主义和骄傲自满”，就好似专门冲着顾准这样“老革命遇上新问题”的人来的。到了4月份“即着重于处理处罚不当的案例”，顾准就算是因为秉持轻税重罚原则而犯了“命令主义和骄傲自满”的错误，持续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一个月，时间是1950年2月到3月，就算它一个月吧。让我们记住这个时间，它非常重要。

⑥ “民主评议”的最后结果

1950年2月中财部对顾准抗拒“民评”忍无可忍，遂调部属税务总局副局长兼天津税务局长王楠秋到上海任税务局长，顾准专任财务局长，明令不许他兼管税务。王是在天津的“民评”中做出了

成绩的，他来上海就是要按照天津经验在上海强行推行“民评”。不料这一干部调整却遭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许多负责人的抵制，结果是顾准继续负责上海税收，王改任华东局税务局长。中财部异常恼火，派人赴沪“检查工作”三个月之久，不依不饶地要求上海必须转回“民评”的路子。检查组写出了“检查报告”，要求顾准确认签字。顾准签字前不得不写下“声明保留意见”书附在其后，日后这份附件成了他“对抗中央”的铁证。

1950年3月，中财部部长薄一波亲到上海。虽然他对上海该月的税收实绩表示满意，但依然不承认上海税收工作的成绩；虽然中财部从此不再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或派检查组来上海了，但成见和恶意已经掩都掩不住了。

是时顾准也考虑过一拍屁股走人，不受这个夹板气。但如果这样做了，“等于坐观王楠秋的工作失败，我则退居批评者的地位，是对党不负责任，对人民不负责任”。他百分百断定，任何人在上海搞“民评”都会失败，别说你是天津来的，就算是莫斯科来的，共产国际来的，火星上来的也一样。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最怕被别人看作是个“逃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淮海区大扫荡时期做了“逃兵”的羞耻，即使组织上早就为他“解除”了，他自己也多次“雪洗”了，可阴影一直留在心里挥之不去。这次要是他真的离开别人认为他“摔了跟头”的税务岗位，等于又做了一次逃兵。这个，他受不了。

其实在这个期间顾准还是做了一些妥协的，一度曾表示同意改用“民评”做为征税办法，税务局甚至一度还搞了一个“改良型民评”的模式——即把交给各个同业公会评议的办法变为交给各个纳税互助组评议，并吸收店员职工参加。可顾准的妥协态度又受到华东局和市委“你顾准不敢坚持正确意见”暗示的压力，弄得他左右为难，索性心一横，坚持己见——我就是不搞民评了，你们要怎样便怎样吧。

关于“民评”的争论到了1950年7月，实质上已经提高到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反右倾投降主义斗争”的吓人高度。可正在此时，天助顾准，上海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结束内战后的国家

很快平稳，水陆交通的恢复大大扩大了市场，货币趋于稳定，市场恢复，生产正常，加上抗美援朝开始，军需采购在上海数量愈来愈大……这一切都要求现代的税赋征收制度来维持。

顾准用会计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直接计算出开工率不足和全率开工时资本、营业额、利润、应缴税额、税后利润等数值的巨大差异，明确指出在此状态下若采用“民评”方式征税几与玩笑无异，大量的合法逃税一定会出现，国家财政一定会蒙受浩大的损失。

这是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结果而非“一时激情”、“权宜之举”或任何个人意气之物，而“在数目字上实行管理”却正是中国历朝历代最缺乏的观念。

实际上到了1950年8月，顾准的“专管”已全面推行，而中财部的“民评”已流于形式，日渐式微，到了最后已经完全是“为了照顾他们的“面子”，民主评议委员会的牌子还留着，民主评议名义上不予废除，但把评议内容改为协商解决税法应用的疑点……”了。

“民评”与“专管”之争嘎然而止于1951年12月。

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主席还亲自肯定了陈云同志的这一意见，……至此以后，税收方法的争论才最后结束。”

一锤定音，顾准的“专管”胜利了，可是祸根也种下了。

4. 顾准被删去的文字包含了什么信息？

顾准的上海时期——1949年5月27日-1952年2月29日一共是一千天左右。顾准“当做自传”来写的“历史交代”一共有二十七篇，加上各种收入《顾准自述》的“思想汇报”、“补充交代”和“坦白交代”等等，一共是三十三篇。关于他在这一千天中的经历，是其中的第十六至第二十二篇，大约五万字。

但是这七篇“历史交代”中，有些很关键的段落被删除了。这些至今没有面世的文字，从其上、下文看是包含着很多信息的，尤其是关于顾准的被撤职，谜底极可能就在这些被删除的文字里。只好单列这样一节——“那些年顾准无法查明、无法证实的‘想头’和‘举动’”，以待后人查证。

试举两个例子：

① “上海税收工作，1949/V-1951/III——历史交代（十七）”，在谈到当年公开出版的内部刊物《税务通讯》时，突然被删去了两个大的段落，共计七百余字。

顾准作为上海总税官，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并且“自1950年3月至1951年10月前为止，上海税务工作的大概过程在这个刊物上可以大体反映出来”。

1951年10月，市府党组书记潘汉年“同意”该刊停刊。“同意”二字在此用得很蹊跷，不知潘汉年同意的是谁。很多关于顾准的文字都不厌其烦地提到顾准曾和潘汉年发生过的一次“激烈的争吵”，都认为起因是顾准顽固抗拒“民评”和坚持“轻税重罚”。实际情况可能很不一样。

第一，顾准和潘汉年是常常争吵的。这些争吵看上去更像是同志之间不可避免的、没有恶意的工
作争论；第二，潘对顾一向诸多忍让。小顾因“民评”吃亏时老潘想为其分担，可这家伙并不领情，还找上门去咄咄逼人地质问，老潘也真就嗫嚅着不敢回答小顾。不信来看看顾准自己的文字：

“从1946年起，潘汉年一直是我的直接上级，接触频繁。1950年他对调整税收抓得很紧，在税收方法上和他有过严重争论，经过见交代（十七）篇。（恰恰他的“交代（十七）篇”谈到潘汉年处被删去两个大段，七百多字。通篇只能找到他和潘汉年在陈毅家里“言辞激烈地争吵起来”寥寥数语。

- 作者注）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我对潘的态度常常很不好，1952年2月前他却从未有意打击过我，他还表扬过我：大概在1950年某次市人民政府的局长会议上，他在说到工作和经费问题时，他说“财政局长长袖善舞，经费是不成问题的”。在调整税收时期，他对财务局长的反命令主义抓得很紧，但是他也转述盛康年（一个资本家副市长盛丕华的儿子，在协商委员会当秘书）反应资本家的话：“顾某风度很好”，意思是我改正命令主义有决心，并不文过饰非……1951年夏季以后，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市府秘书长一职）最好我来干，我说我德才不孚，干不了。1951年12月，上海三反运动开始，潘在市人民政府作的检查报告中，说我的工作是他建议的，并且自承他建议不当，任用非人。会上听到这样的检查后，我曾到他家去问他这番话的意思，他含糊其辞地回答，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还弄不清楚，我实际担任过的哪一项工作是他建议的。因为我任财政-税务局长，经过1950年3月调王楠秋到上海这一番故事，显然和他无关。我任市财委副主任……似乎也并非出自他的直接建议。至于他要我当市府秘书长，我是明确地推辞了的。”

潘汉年大顾准9岁，是他原来的老板潘序伦的乡党，上海时期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任文化委员会书

记，也就是孙冶方、顾准这一对文委正副书记的前辈。顾准虽然延安时期才认识他，但他们之间的稔熟和气场上的相投是不需怀疑的。顾准对待潘汉年的大大咧咧和对待原来的老板潘序伦十分相像，不像是下级对上级而像是非要和大哥平起平坐的小弟——他们是平视的。很难相信潘顾会因为主张或反对“民评”，保护或扼杀民族资产阶级而大争大吵，更合理的推断是那时两人都被“各三千亿”压昏了头，趁着共同的上级陈毅在场，借着“民主评议”和“轻税重罚”的题目，索性大吵一架发泄发泄，而且主要是顾准在发泄并且得到了陈毅的全力支持——“（陈毅）毫无保留地指出要废除民主评议，采用自报、查账、店员协税的方式”，只是批评他对潘汉年的态度不好。

这被删去的七百多字很可能记录了潘汉年和顾准对中财部一致的不满——“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这般“甘蔗两头甜”的便宜事？

◎ “上海税收工作，1949/V-1951/III——历史交代（十七）”，在谈到华东局饶漱石专门召开讨论税收方法的会议上，顾准原已经准备妥协，同意“民评”，但又被陈毅“直率地责备我没有勇气坚持我过去的主张”时，再次“戛然而止”没了下文——“此处删去一段，约近五百字 - 编者”！

顾准此处，很可能说到的，是自己最大、最坚强的后盾就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陈毅。然而这二位，日后一个成了人民公敌，一个上调中央做了国务院副总理，眼下（1969年）的日子也比自己好不到哪去。前者，他当年尊重，现在也不能落井下石；后者，他当年尊重，现在也不能胡说八道，恐怕误伤了他。1969年的顾准已经54岁，愣头青已经变成小老头，再有性格也不会像当年那样口无遮拦，有一说一了，更何况保护他们是出于他的人格和本性。

结论：

1. “民主评议”就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波斯时代并在中国民间江湖流行甚久的“摊捐摊税法”，将它用于中国最大的城市和世界大都市之一——上海是极为荒谬的，于收税人纳税人——政府和商家都百害而无一利；

2. 顾准1952年的灭顶之灾，祸根在于他坚决，彻底地不屑，不执行“民主评议”而坚持现代

化征税方式，大大驳了中财部的“面子”。更伤领导自尊的是，照这小子的章法收税居然还被他收得不错，1950 财务年度（1951 年 3 月征收完毕）的税绩居然是上年的三倍，以致最高当局一锤定音判这小子为“胜方”，这真叫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1952 年的顾准悲剧不过是无数个“因妒生恨”型中国故事中的一个罢了，什么“思想恶劣阻碍三反”，什么“功高震主自以为是”，什么“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什么“代人受过替罪羊”，什么“极左”、“极右”……都是人造的表象，顾准他缺乏党性，不懂事，不乖，不听话，不跪才是根本。

3. 顾准在上海的税收问题上完全是站在他的党和他的国家和政府的立场上考虑的。在“各三千亿”重压下做出“重罚”的决策是他权衡再三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而绝不是想“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蒋贤斌《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撤职的原因》。退一万步说，即使他有此“想头”，敢问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让他如何为之？

4. 是时中国有两个财政首脑部门，一个是政务院辖下财政部（简称中财部），一个是中共中央辖下中央财政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政出多门，政令不一。再看党内，就一个上海市，党的首脑机关就有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两个，面对“一个皇上一道令”局面的人们该听谁的？别说党外人士，就连顾准这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也常常陷入八卦阵，不知跟哪个人、哪条路线才对、才好。

5. 顾准并未伤害大中小工商户，他犯“命令主义”错误在 1950 年 2 月到 3 月之间不到三十天的时间。蒋贤斌先生文中提到的“大、小工商业者、资本家受到了冲击，据资料显示，从 1 月底到 2 月 19 日一个月里，上海工商界因‘五反’而自杀者，就有 49 人（未遂 16 人）。其中，五反运动发动起来后，即从 2 月 12—15 日不过 4 天时间，就有 22 人自杀。整个 2 月份自杀死亡的有 73 人，而 1 月份自杀死亡仅有 3 人。此时自杀者还是小企业主，但随著运动的继续，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家也走上了自杀之路”蒋贤斌《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撤职的原因》……

这一切都发生在 1952 年，与顾准何干？难道顾准下台前一秒钟自戕的人们，都是被顾准的税收手段威逼至死的？敢问是年“中国船王”卢作孚，中国“纺织大王”荣德生均死于非命，难道责任也都在四川的顾准，江苏的顾准头上？

6. 上海的资产阶级并未因顾准的下台欢欣鼓舞，额手称庆，恰恰相反，他们哀叹中共内部罕见的“懂事体，懂道理”的人物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他的自己人搞下了台，“很可惜”，上海工商业界的日子只怕会愈来愈难过。不久后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太有道理了——顾准下台后一年两个月后才龙卷风般骤起的“公私合营”运动才是他们真正的末日。这个曾被人不知天高地厚地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此概念由列宁发明）”的“中国创举”，以“强制放弃，公开没收”的手段彻底埋葬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连哀叹的时间都没有留给他们。是时自戕的人数又有多少？谁统计过？

世上最无趣的事情莫过于无视常识。

就算这一切都不谈，撇开繁杂的专业分析，撇开“各三千亿”是不是“苛政”、顾准是不是酷吏不谈，仅仅1950年代初能在上海施行“查账征税”就是个了不起的壮举——图谋以现代会计手段建立新的财税制度，进而建立新的预算制度和公共财政体系。首先是依查账而征税，视企业、纳税人和政府法律上平等，政府要征税就必须有法律依据，企业和纳税人不是只能服从政府而是能依据账目和法律与政府“讲理”。这一步真正能体现新政权之“新”的进化，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做到，可六十多年前的顾准做到了，虽然只有一瞬的时间。

V. 大上海总税吏的履职苦旅（下）

1951年初，中财部召开城市财政会议，到会者为各大军政区首府城市如济南，武汉，广州等和北京、上海、天津等共十个城市的财政局长。顾准作为上海市财政局长参加会议。

新成立的国家急需平衡财政，稳定币值。上年2月，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中央财政统一体制，确立了国家财务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国策。中央仅授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统一全区财政收入，各省、市均无财政，无预算，连办公经费都需向军政委员会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地方财政完全被取消。

和平时期采用这样的财政体系，顾准认为不可思议，无法接受。这是典型的战时财政手段，现在

全国都解放了，作为和平时期的、全国最大的、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毫无自己的财政权连维持都困难，谈何发展？他带头摆出了抵制的架势，以标准的“顾准姿势”。

首先，他在市府各局征寻赞同者，立刻就得到市委和市府党组的支持。接着他代表上海市向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提出了“上海市要求划分收入，在市收入范围内统筹全市经营”的“哀的美敦书”，华东局居然同意了。

顾局长的“抗上”是有底气的。在这一财政年度中，他狠抓了两项税收，为他的“全市统筹”夯实了基础：

一项是向租界征收“从价地价税”——利用 1945 国民党政府以孙中山遗教“平均地权”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租界）按照估定地价比例征税，非租界则属于国有土地，当然不须征收。这在税法法理上完全站得住脚。严格征收的结果，凡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地价税。到了 1951 年初，租界上的外国人几乎全部把房地产抵缴欠税溜之大吉，如今的和平饭店、锦江饭店就是当年沙逊屋和华懋饭店的遗留物。这项税收不但对新政权初期上海财政的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以站得住脚的法律手段，不费口舌更不用刀枪就收回了租界，因此大得人心。

另一项是设立“公用事业市政建设捐”——利用国民党政府时期因租界对市区划分造成的电价高低不一的状态征收“电费平衡税”——略微压低高电费区电费率，维持低电费区电费率不变，但加征“电费平衡税”。这些原来的低电费区都在各租界和公共租界上。这样一来不仅划一了全市电价，征得一大宗税收，而且促使工厂、住宅在租界上畸形集中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宗平衡税顾准起名为“公用事业市政建设捐”，是一宗数额巨大而毫无征收费用的市政收入，由于它在市政平衡上的巨大作用，以致一直沿用了三十多年，直到 1980 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停止征收。

“这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巨大的，在充分供应一切经费之后还有盈余。”

就是这两项税收，令上海财政兼税务局长顾准底气十足。它们是上海市率先实行独立预算，独立财政的基础，也是顾准敢向中央财政统一体制挑战的利器。

在本章开篇讲到的十城市财政局长会议上，顾局长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上海坚持保留独立的市预

算，满足各单位事业经费的经验。兴奋的他又一次忘记了“谦虚谨慎”的古训，发言时的姿势和口气都有些不大对头，很可能又出现了“睥睨”的情形，日后成为他“傲慢”的一个旁证。但他的发言很大一部分被写进会议总结发至全国各大城市财政厅局，也是不争的事实。很快，国家取消了中央统一财政体制，大大调动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推动了城市改造的进程。

顾准又一次在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却也又一次作了“出头鸟”。

这一年上海市财政月月盈余，积累盈余越来越大，几乎占去全年预算20%以上。这一年也是朝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一年，前方吃紧，军需急迫。两难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要投入资金进行市政基本建设和作国营企业投资，抑或是全部上缴中央国库支援战争？顾准选择了前者。

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上海以致全国现有工业设备都开工不足，城市中还有大量失业的工人，民生与战争，至少应该等量考虑，经历了数十年外侵内战的国民也该有个休养生息的档口了。为了不让财政盈余收入国库，顾局长煞费苦心，竭力寻找“投资”的出路。他约时任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冶方去考察闵行的通用机器厂，准备共同投资扩建；他购买新裕第一纱厂、光中染织厂、永新化工厂、关勒铭金笔厂等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国营企业；他提出要实行“赤字财政”，尽量多投资，使财政没有盈余，最好还要有赤字……

眼看着上海工业和轻工业趋于稳定的发展，失业人数减少，他又有些忘乎所以，浑然不知两顶很重的帽子——“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正向他压了下来。

这期间他还做错了几件事情，也是在浑然不觉中。说顾准的“政治敏感度”几乎为零可能都不为过。他从不会，也不屑于看人脸色，对任何人都没有权威感，能尊重你就很不错了。要说他能纳头便拜的，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一件事物，那就是数字。

第一件错事是，1951年春夏，公债、税收运动虽然早已过去，上海高级消费品市场依然不振，员工人心浮动，而这个市场曾是支撑上海经济的重要板块。看在顾准是老上海，职工运动老前辈的份上，有关领导，也是顾准上海地下时期的老下级和小辈，请他去向百货公司的店员们做一次报告，希望他能安抚职工，稳定人心。不料顾局长事前也不和人家商量讲些什么，甫一上台，开口就号召年轻

人走他曾经走过的革命道路，到外地去，到东北去，那里是广阔天地，你们将大有作为，而上海商业从业人员过多了，你们呆在上海是没有出路的，快走吧。

顾准是位罕见的没有地域歧视的上海人，从来没把上海滩看得比别处高贵。当年从最繁华的爱多亚路一个猛子扎了苏北，连眼都没眨一下，可你不能要求人人都像你呀。他的动员报告把个区委书记老下级恨得牙痒痒，背着他找到市委常委，上海总工会主席，顾准的老上级刘长胜，恨恨地告了一状。

刘长胜先生，十几年前和顾准结下的疙瘩还没解开呢，你现在又往我枪口上撞——一个财政局长你管得着我辖下职工往哪去吗？刘先生借北京会见陈云之机当面请教这位中财委主任——上海的商业职工是否人数太多了？身在京城的陈主任哪里搞得清上海的楚河汉界，不明就里的他也就是春秋笔法云山雾罩地回答了一下，没成想这鸡毛回到上海就变成了令箭，刘长胜先生以此为据到处表达他的不满，弄得彼时的顾准一头雾水，不知哪里得罪了他。直到多年后，大右派分子顾准做“历史交代”时想起来才猛吃一惊——“……刘长胜对此尤为不满……至于他带回陈云同志的意见后，是否在……工会内对我那次讲话开展了背对背的批判，我不知道”。

这会子才联想起 1939 年那次“背对背清理顾准路线”的故事，真是愚钝得可爱。紧接着他又做了第二件错上加错的事情。

这年夏秋，上海建筑企业民主改革运动广泛开展，工人强烈要求废除“包工头”制度，这样势必得有某种机构取代它。刘长胜先生辖下的上海总工会建筑分会此时站出来要取而代之，即由工会代替包工头，甚至代替工程公司来承包大小工程并且已经开始实施。身为市财委负责人的顾准一听就急了，这样做不但超越了工会工作的范围，而且工会直接管理企业势必使企业无法成为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工会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代国家来直接管理全民所有制企业，这又是个常识嘛，岂能乱来？他立即向市委提出意见，同时建议在市财委下成立建筑工程处接管建筑工会已经承包下来的建筑工程业务，他的建议几乎立即被采纳了。

“蠢头”顾准这次算是把刘长胜先生得罪到底了，可他依然是懵懵懂懂，还以为自己“之所以直率地讲话和建议，内心里是出于‘亲工会’的感情。对于刘长胜本人，1945年在延安和1948年在山东所知道的‘清理顾准路线’我早不介怀，而1938-1939年间他在领导职委工作期间，我对他的领

导是深有好感的……”。

你对人家有好感，却不管人家对你是什么感觉，你“早不介怀”，却不管人家对你介不介怀。我的传主，要么是太“蠢”了，要么就是个超级“虚伪者”，他当然是前者，因为他的“政治成熟度”就那么高，想做后者他也做不到。盛产“灵光人”的上海为何会出了个顾准这么个“拎不清”的主儿，集河北人纪晓岚的博学，福建人辜鸿铭的猖狂，湖南人谭嗣同的倔强于一身，就是没有上海人那点“柔韧”的优点。

顾准第三件不招人待见的事情，是他坚决抵制搞“机关生产”。

1950年朱德先生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各单位发展解放区时代行之有效的机关生产。顾准却认为绝不可以执行。第一，“机关”现在城里，不可能搞农业而只能搞工业和商业；第二，工商业范围内的机关生产，按照他淮阴时代搞利丰公司的经验，不可能不带上浓厚的资本主义味道。他将“机关生产”说成是“是干部的腐蚀剂”，万万搞不得。市委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件事情上他得罪了多少人我不敢说，但有一个人他好像是应该得罪而没有得罪，那就是潘汉年。

1951年潘汉年把顾准用“从价地价税”方法从英资华懋地产公司收回的“沙逊屋”改成锦江饭店，对外是私营名义，实际是市营，也就是机关生产的别称。据潘的说法是公安情报工作需要这样的饭店云云，顾准很不以为然，却没有追究下去，难得顾局长高抬了一次贵手，是否徇私有待后人深究。

顾准这一千天时间里，好像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个遍，然而再看他的政绩：

1. 1949年财政年度（1950年3月止）上海税绩为等值三千万元人民币
2. 1950年财政年度（1951年3月止）上海税绩为一亿八千万元人民币
3. 1951年财政年度（1952年3月止）上海税绩为三亿元人民币

这个烫手的山药，实在是让人又爱又恨到了极点。

1951年12月，在中共和国家机关内部展开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顾准的财政——税务局因为次年3月要征收1951财政年度的所得税而申请暂时推迟开展运动，市委批准了。顾准仅作为兼职的市财委副主任身份在会议上检查了一下“赤字财政”的错误思想和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算是过了关。

仅仅一个月后，又开始了面向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展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华东局责令顾准负责上海市五反运动，从各省调来近二十位地、县委干部集合到财政——税务局顾准那里，集议运动步骤。

这是顾准在大上海总税吏位置上的最后一次履职。两天后他的命运中一个极剧的转折点就要到了，从1949年5月27日他朝气蓬勃，风尘仆仆跨进旧政权财政局大厅那一天起，这个魔影其实已经如影相随，一千天以后，它如期而至。除了当事者，它并不令人意外。

这一千天里，顾准的性格特征：聪慧、博学、热情、猖狂、高傲、倔强表现得淋漓尽致。身在一个体制内，他却不得该体制的任何要领，不懂它的等级体系，话语体系、关系体系和规则体系，一言以蔽之，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听话。

一个老子训斥儿子的声音已经发出，他却浑然不知：

“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 薄一波语

第二部 受判之徒

1952-1962

……一个艺术满足于乱涂乱抹、到野兽的运动那里寻求灵感的时代；一个对正义和政邦（State）毫无感觉，肤浅的无政府状态的时代；一个共产主义伦理的、有着最愚蠢历史观、对历史作唯物解释的时代；一个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一个历史，生活和科学靠政治经济和技术性指导的时代；一个把天才视作一种疯癫形式的时代；一个没有伟大艺术家和伟大哲学家的时代；一个没有创造却对创造有着最愚蠢瘾头的时代。

- 奥托·魏宁格

……事情确也十分复杂。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被过去的宣传过分肯定了的‘信仰式的寄托’，如今变（成）了事变式的变化。

- 顾准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 《圣经 新约 马太福音 9:12》

第五章 老虎、罪孽与逻辑

1. 遍地罪孽

1952年，壬辰龙年，上海开埠第109年的冬末春初。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

有件事情，一直是打进北京城已经两年多的毛泽东的心病，就是害怕共产党重蹈三百年前那场农民革命的覆辙——在短短二十多天时间里，从紫禁城中光荣的胜利者变为山海关下耻辱的失败者。

为此，进入五十年代后他特意把郭沫若写于1944年的《甲申三百年祭》印成小册子，发给每位够级

别的党政干部，人手一册，全党阅读，以史为鉴。

上年，在北方的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十分猛烈，形势严峻。政治局在研究有关朝鲜战局时，依据毛泽东“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确定了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

1. 节约兵力，整编部队；
2. 精减机关，精减人员；
3. 收缩开支，清查资财；
4. 提倡节约，严禁浪费；
5. 组训民兵，实行义务兵役制。

至少在 1951 年的下半年，毛泽东还没有起过搞什么“三反五反”运动的念头，只是被建国初期的民生状态和抗美援朝的战时财政困扰，正苦苦寻找着出路。

11 月，他收到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的一份报告。

东北局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也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报告列举沈阳市揭发出 3629 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坦白的赃款达 5 亿（五万）人民币，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等等问题。毛泽东深感忧虑。

无独有偶，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贪污 6.4 亿元以上、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非法所得 23 亿元以上、天津地委现任和前任书记张子善、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事实等报告也先后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各地出现的刘宗敏式人物——居功自傲，跋扈腐化，低俗下流，令毛泽东极为焦虑和厌恶。他立即给送来张、刘贪污情况报告的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作了如下批示：

“华北天津地委前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这个批示投下了张、刘二人的死牌。至于刘、张是否冤案，是个人贪污还是把公帑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投资于顾准最反对的“机关生产”，至今无定论，此处也不做讨论。

一个职权为指导全国三反运动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中节委）”即刻成立，薄一波任主任。“毛主席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薄先生晚年不无得意地回忆道。

1951年除夕，冰天雪地的北京，银装素裹的“海子”里，薄一波正按惯例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进展。当他说到资本家常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党的干部和国营企业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怒不可遏：“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要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三反”是中共自家关起门来“整风”，外人趁火打劫真是分外可恶。那就家里家外一起搞！“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紧跟在“三反”之后就此开始。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令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要在二月上旬同时进入五反战斗。北京城里，他先后启动了党政内部的“三反”和党政外部的“五反”两驾战车。

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中山公园设临时法庭，公审薛昆山、宋德贵、雷亚卿、孙建国、王丕业、夏茂如、杭效祖七人。沈钧儒任审判长，当场宣判，当场执行。宋德贵、薛昆山以贪污罪被就地处决。

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在保定以同样的形式公审、宣判、处决。

这些属于“三反”范围。

2月2日，上海大康西药房经理王康年以制假贩、假罪、腐蚀、贿赂、投机、诈骗罪被逮捕，次年被处决。2月8日，一代船王卢作孚在重庆自戕，一代纺织业大王荣德生在无锡病吓而亡。

这些属于“五反”范围。

毛泽东“三、五反”的初衷是：既要削弱资产阶级又不能消灭它；既要打它几个月又不能打死它；即恨它“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而盛气凌人”又怕搞死它出现不可收拾的后果。新旧政权更迭之际，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2%，其中民营工业的比重占15%左右，即民营工业占去原有工业基础的三分之二，商业方面更是占去十之八九，这是无论什么政权都不得不依赖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一旦被搞死，必然导致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推迟。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新中国将毫无“新”意可言，这是最不能容忍的。

两驾已经同时开始狂奔的战车他都必须亲手驾驭，不能左也不能右，否则都有翻车的可能。从此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和指示。别的不说，仅仅1952年2-4月，仅仅对上海“三、五反”的策略、部署和经验，他就作了十八次批示、指示、指令、批评和表扬。

1月24日的政治局“三反”会议上，他说“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一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上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对那些数字大、比例大的报告他明显地格外欣赏。

1月26日，他批示各大城市“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可到了2月初，他在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的‘五反’报告》批示时又语气坚决地指示“(三、五反)尤其要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3月更批示“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

‘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

驾驭如此狂奔的一双战车，驭手已经乱了阵脚。

正因为如此之多“不确定因素”和投鼠要忌器，忌器还得投鼠的焦虑，加上以中文语言表达、传达上的不精确，各地方官员常常很难领会最高当局的意图，以致产生了一种匪夷所思的中国式“运动数字化管理”。到了1951年，全国的“三、五反”运动都进入了这个“数字化管理系统”：

各大区、各省市以及各厅局、各地县务必打出额定数目的“老虎”；

“老虎”务必达到人群的额定比例；

大、中、小“老虎”务必达到全部“老虎”的额定比例；

严惩时，处决、死缓、无期、有期务必达到额定比例；

宽大时，违法金额压缩核算务必达到额定比例；

违法户、基本守法户、半违法半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守法户务必各占额定比例……

这一切均为预算而不是决算，均以领袖、领导们一时的激情和好恶制定计划，额定数目，额定比例，额定性质，额定人的命运。

1952年1月，上海“打虎”一幕正式拉开，“三”、“五”反都未如顾准所愿——因“财政年度税收月即将开始”而“稍作推迟”。

中共上海市委组成由第三书记刘长胜、第二书记潘汉年任正副总指挥的“打虎大队”，各区委组织打虎中队，设立打虎指挥部。市委订立了大、中、小老虎标准，确定了打虎战役时间表——

第一战役从2月9日至15日，发动群众，明确任务；

第二战役从16日至29日，先打“思想老虎”，揭露贪污分子，撤职不力干部；

第三战役从19日至29日，攻心斗智，内外夹攻，上下夹击，把老虎打出洞穴而歼之；

第四战役从3月1日至7日，总结经验，收集材料，以利再战；

第五战役从3月8日至15日，打虎务尽，力求从此山中无老虎。

乍暖还寒的上海一时成了满街老虎，遍地罪孽的魑魅之地，早春二月成了罪的二月。

2月18日，“第三战役”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也是上海市五反负责人顾准的文章——《坚决打退上海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的猖狂进攻》。文章说：

“解放以来，上海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工作的进攻，和在其他问题上是一样的猖狂、一样的严重的……这种猖狂进攻首先表现在偷税漏税上。将近三年来，上海市税务人员和店员职工组织查账缉私，查获逃税漏税额二千六百多亿元……实际上上海资产阶级逃税漏税的数目应当几倍于被查获的。”

接着是顾局长列举的逃税手法：设置假账、营业额不入账“飞过海”、抽调资金，坐贾化名行商、分散隐藏存货等等，它们又和走私、套汇、逃避资金、进攻职工、贿赂税务人员等一套配合使用并一再得手。这些不法者往往借口旧政权时“原就如此”，新政权时间还短，归并账目不齐，政府应该原谅等等。

顾局长愤而质问，那我给你们重估财产调整资本的机会和时间，总是账外财产入账的好机会了吧？可你们的账外经营依然如故，账外财产依然如故。许多工厂和商行是依靠国家委托加工和定货发展起来的，甚至是依靠供应抗美援朝所需物资发展起来的，你们也故意不设账册，在所得税报缴中千方百计列入标准纯益率户，逃避应纳的所得税。为了偷税漏税，你们花大价钱去聘请所谓“会计专家”来跟人民政府“合法斗争”。这些“专家”们，我自己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还能不清楚吗？不就是税法顾问，逃税专家！

顾局长接着质问，你们说这是不明税法加上解放前旧习惯尚未完全改过来，那么好吧，1949、1950年可以这样说，到了1951年，新税法公布已久，按税法纳税已久，关于税务的宣传已经普遍，你们人人都能讲一套国家税收重要性的大道理，还能说不明税法，旧习惯未改吗？请问你们的旧习惯到什么时候才能改呢？

顾局长接下来的文字就更有趣了。

他说，一方面许多资本家经常在偷税漏税，另一方面，市工商业联合会中若干私营企业代表却采取各种办法来阻挠税收管理的进一步加强，阻挠店员职工动员起来协助税收工作，客观上形成有组织

地掩护偷税漏税。例如 1951 年 4 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团来上海检查税收工作，指示上海应该改变民主评议办法，即把从前交给各个同业公会评议的办法变为交给各个纳税互助组实行评议，并指示这样的评议应该吸收店员职工参加。上海市税务局根据这一指示，起草了办法提交有关方面讨论时，市工商业联合会中若干私营企业代表人物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并且居然表示这个办法没有他们同意就不能实行。事实很明白，他们之所以反对这个办法，就因为评议范围划小了，评议有了店员职工参加之后，大量的偷税漏税就要变得困难或者不可能了。

这是顾准在全国性的大媒体上提到“民评”的一篇文章，却不大见于史料和论及顾准的文字，可能无论臧否，这篇文章都不大能说明什么问题。可是文中“把从前交给各个同业公会评议的办法变为交给各个纳税互助组实行评议，并吸收店员职工参加”，恰恰就是顾准搞的“改良型民评”，是他一度与中财部妥协的结果，但他把“功劳”归在中财部头上，也算得上是煞费苦心。

文章最后说：“勇敢坚决投入目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坚决打退上海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工作的猖狂进攻，这是目前全上海店员职工和全市广大人民的斗争任务。”

这个结束语非常“口号”式，却是身为五反负责人的顾准必须要喊出来的。他喊得也并不违心。五反的第二反——“反偷税漏税”本身就是他的职责和本分，在办公室是喊，在报纸上喊也是喊。多年后有人找出这篇文章，称它“在严厉斥责了上海资本家之后，把矛头从资本家个体上升为阶级，无疑是那场“五反”运动的集结号声”，继而惊呼“这位声色俱厉、上纲上线文章的作者居然是顾准。没错，就是那个顾准！”

可是同志，只要你花点时间翻翻六十多年前各大报刊有关“三、五反”的文章，你就知道彼时的顾局长是左还是右了。

顾准和资本家们，本身就是税务局长和纳税人的关系，是“婆媳一样的天敌”，你“在商言商”，我“在税言税”，“婆婆”喊两声岂不是很正常？顾准再不凡，首先也是个凡人，他发表于 1952 年

2月的18日的，很典型的“税吏与纳税户博弈”的说理文章，既无血腥味道又无暴力言辞，已属不易，难道你让他全文发表他的《所得税原理与务实》才算是没有“左倾激进”不成？

此文发表十一天后，顾准就突然没顶于上海二月的罪海里，从显赫的大上海总税吏位置上轰然倒下，从“五反”负责人变为“三反”对象、恶劣分子，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和警示。

2. 政治老虎

1952年2月29日，闰年闰月闰日，是晚。

他的轿车开在直通外滩的福州路上。早春时节，潮湿的东南风中黄浦江的气味他熟极了。路两旁林立着的许多大银行、大商行，大洋行，都曾经是立信的老主顾，老客户，如今该走的都走了，该留的也都留下了。霓虹灯陆续亮了起来，比起那时稀疏了许多，但勉强还算能撑得住上海滩的门面。

从十二岁懵懵懂懂跑街的小学徒，到十九岁玉树临风的青年教授，再到二十多岁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家，再到胜利者中的一员、大上海的总税吏，他对这条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今晚不过是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例行公事——作为上海市财政兼税务局长，出席上海市委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这种会议这半年来几乎每晚都有。都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可人们从顾局长身上看到的却是“会也多多，税也多多”。

福州路上的市府大礼堂灯火通明。到会者大半都熟稔，一路招呼着，说笑着走进会场。

大家都不大清楚会议的具体议题，却也都知道肯定三句话离不开“三、五反”，无非有些“新精神”、“新指示”、“新意思”要传达，有些“新措施”、“新方法”要贯彻罢了。

顾准2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没有什么太醒目之处，引起的反响也不大。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才子，写这样的文章不过小菜一碟。反倒是昨天，2月28日《解放日报》上头版头条刊载的兼局长顾准签发“沪税业直（52）字第九九零号”、“沪税办秘（52）字第四三号”两个税务公

告更引人注目。公告内容为“一切税款必须由纳税人自行负责直接向指定公库缴纳，不得委托税务或其他人员代办，否则出现的一切侵占挪用，税款不能及时入库的责任均由纳税人负责缴清”。

这相当于对税务公职人员的“三反”又紧了一扣。

在市民们拿到报纸阅读公告时，兼局长已经又匆匆赶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市委去做有关“五反”的广播讲话了。

再往前两天，2月26日，他出席陈毅市长召开的华东局部队和地方干部联席会议，遇见了专程来上海指导“三、五反”的中央大员。上海是五反的主战场，他是来部署“战役”，做“前敌总指挥”的。

顾准对这位中央大员，中财部部长，说难听一点，确有些“不敬”，前面已经说过不少。“不敬”不在于对“人”而在于对“事”，有些类似他对刘长胜先生的态度——对人是尊重的，特别是对他们的革命经历，他由衷地敬佩，但是对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往往不能接受，尤其是在他擅长的知识领域，如经济学、会计学、税务学等领域内，他更是“唯识”不“唯上”，这个“识”有两个含义，一是知识，二是常识，还有个第三“识”——胆识，有了它，他才能和他们探讨前两个“识”。

此刻正处在人生创造力最活跃时段的顾准，从语言到做派都与众不同，给周围人以紧张感和压迫感，不但同级和下级，就是上级，例如潘汉年，不也常常被他弄得下不来台？他嫌市委第二书记刘晓“领导无力”，幸好人家不和你拆烂污告病回家去了，否则还不知要和他淘多少气；他和潘汉年的副手——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市财委副主任许涤新更是“三天不吵一架都算是稀罕的”。加上更出格的——在上海这一亩三分地上坚决、彻底地不搞民主评议，一个小小的地方税吏置喙国家财政体系，带头抵制中央统一财政……，这“不懂规矩”的一切为他后半生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此刻他面对的中央大员，那句“再不听话，饭也不给他吃”之语就出自于他。事后顾准却只记得两人曾相逢一笑，于他，没有谈笑但也绝无“恩仇”，更不知道自己就要“吃生活”、就要“没饭吃”了。

就在“相逢一笑”的第二天，2月27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克服右倾思想，灵活运用战术，上海打虎战局开始改观”的本报讯，正式提出“打倒各式各样思想老虎”的口号，为两天后对一窝老虎的突然袭击埋下了伏笔，打下了理论和舆论基础。

此刻，福州路上这座原叫做天蟾舞台、现在叫做市府大礼堂的巨大建筑里，人已经坐满并且安静下来了，换句话说，老虎和武松们都已就坐，就等开戏的锣鼓了。就像看惊悚小说，现在恐怖的是，谁是老虎，谁是武松，谁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此时此刻没有几个人知道。

第四书记陈丕显主持大会，这就是说，至少今天，他还不是老虎。

第三书记刘长胜走到舞台中央，带上花镜，展开稿纸，嘘响麦克风。这就是说，至少今天，他还不是老虎。眼下的刘先生已近五十，当年海参崴码头工人的粗犷和豪爽已踪迹全无，代之以党内高级干部的庄重威严。

“同志们，为了迅速地，坚决地，热烈地搞好三反运动，回答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上海市委已经从高级干部中捉出八只大老虎，黎玉名列第一，顾准名列第二……”

全场愕然，万马齐喑。

“……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无组织……歪曲党的政策方针……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市委决定并经华东局批准……决定撤销党内外本兼各职……责令反省错误……以观后效……”

“顾准是孟什维克，潘汉年是布尔什维克……”

三拳两脚都不用，八只大老虎就齐齐倒在武松们的脚下了。思想老虎，政治老虎，经济老虎、官僚老虎、腐败老虎、人品老虎，混合老虎……哪里是打老虎，分明是拍棉被！

连一点悬念也没有的这一幕“武松打虎”，无趣的后面是无尽的恐怖。顾准懵了，一时搞不清楚自己属于哪类老虎，除了愕然还是愕然。怎么啦？这是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啦？从前也有过这样的场面，可是没有这样突然，这样耻辱，这样痛……

“这次宣布，对我是完全突然的……”

多年后，他写“历史交代”到这一环节时，耻辱感和痛感都差不多消失殆尽了，剩下的只有对这种无谓的“突然袭击”的厌恶，它的恶意、无聊和无趣让他恶心。除了恶心他还有一点骄傲（他总是有各种骄傲的理由，有时很孩子气），自己是只政治老虎而不是经济老虎。

事后顾准的行为好像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写检查、申诉应该是主旋律。但有几个细节却与众不同，很有趣：

一是市委按照例行公事要他写检查，他很为难，写不写“民主评议”呢？不写吧，他这只政治老虎犯事就犯在“民评”上，“不检查民主评议岂不是避重就轻了？”，可就在写检查的三月这个财政月份，上海市的入库税收额竟达到三个亿！

“民主评议能达到这样的数字吗？”他又骄傲了。

这个当口，写，还是不写，对于他成了个巨大的纠结。写吧，明摆着是羞辱“民评”大师、中央大员；不写吧，自己这个老虎不是白当了？又明摆着羞辱了打虎的众武松。

二是犯事人顾准按照例行公事是要到各处去做检查的，市委也已经通知他准备了。他“表示一定执行市委的决定”，也“作了准备，专候通知”。岂料通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后来从市委的运动简报（我一直保存了这份简报，现存革命同志处）上读到，检查还是作了，是由接替我工作的宋季文作的，内容还是三反运动最初阶段我所做检查报告中提到的‘赤字财政’等几个问题。由接替工作的人代撤了职的前任做检查，是极其罕见的事例。发生这样怪事的却是原因究竟何在，我至今还弄不清楚。”

别说“蠢头”顾准弄不清楚，多少灵光人也弄不清楚。是怕他心、口都不服，检讨会上胡说八道？不会呀，检查稿不可能事先不经组织审阅；是怕他临场发挥？嗯，有点，他做得出来，到那时还真有点不好下台；不过最可能的，倒是众武松们觉得有点对不住这老虎，尤其是市委书记兼市长陈毅先生，在后来的各种场合，他都表达过对如此处理顾准的不满。可就算他这样文能诗词歌赋，武能率兵十万，难得入了顾某人法眼的上级，要他扛住“三、五反”压下的铁闸，怕也是力不从心，弄得不好就得和顾准一起被压瘪了。

第三件怪事，众口一词都把“武松打虎”一幕说成是2月29日，3月2日的《解放日报》更是铁证。可当事人自己的记忆，在“历史交代”中却是2月28日。应该没齿不忘的日子，当事人自己竟然记不清楚？还是他压根就没把它当做“没齿之耻”，而只当它作是自己无数次“被搞”中最戏剧性的一次而已？

从1952到他写“历史交代”的1969年，十七年过去了。我的传主早已“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对政治斗兽场上的节目见怪不怪久矣。三年前开始的又一次“大运动”，比起“三、五反”不知大了多少倍，大到连发动者自己也深感无趣，不知如何收场。而十几年前的各路“老冤家”们，刘长胜、潘汉年、陈毅、薄一波、陈丕显、谭震林……没有一个不在这场运动中翻滚沉浮，遍体鳞伤，九死一生。武松和老虎的转换也就是一瞬间的事，他们甚至连老虎也不是，这种动物太高贵了，他们不配！他们不过是熊罴、豺狼、妖怪、老鼠、臭虫、跳蚤……罢了。

“刘长胜已经故世了，丝毫没有和他算账的意思”，“这件事，在半个世纪以来党的及其丰富复杂的斗争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即使它在党的工作的一个小局部上曾经取得过某种成效，它在党的漫长历史中只占有如此之小的地位，以致事隔二十余年的现在，它已经被彻底地遗忘了，新一代已经不认为有必要回顾这段历史，它对于今后党的斗争已经不再会起任何启迪作用了。把它写下来，不过是使我这份补篇补充得完整一些，而这份补篇，现在只是个人兴趣向相关的东西了。”

1969年仲秋某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北京，建国门外中国科学院经济科学研究所，某个楼梯间改成的“单身宿舍”里，鰥夫顾准平静地写下这样一行字。

是呀，比起刘长胜两年前的惨死，我的“当场撤职”算得了什么呢？在中国“政治”的斗兽场上，我绝算不上是最惨的一个。我们并未被“扒皮剔肉取虎骨”，组织上把我们集中在饭店里，整日介好吃好喝伺候着，下棋打牌消遣时光，也无人顾得上改造我们的学习，不过是等待着命运下一步的安排而已。

但组织上说我们是罪人，有罪于人民有罪于党，却是铁定的。

3. “思想堕落”由逻辑论证始（上）

但是顾准很难适应这种无所事事又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日子。他一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悠闲过，也没有像这样度日如年过。和延安整风只是个人意识的被否定和自我否定、自信心的被击碎与自我击碎相比，现在的他很难再次由衷地“自我”做些什么改造自我的事情。假如你一定要他“自我”怎样怎样，他也只能自我肯定和自我解脱——我没有做错什么，我不必羞愧，也不必感到耻辱，哪怕仅仅从“现世报”似的三月税绩看，被羞辱的也不是我而是知识和常识，但她们坚实若水，哪里是羞辱得了的？羞辱她们只能自取其辱。

闲呆在沧州饭店的死老虎们依然被允许看报纸。从3月2日顾准这一窝八只老虎被歼灭的消息见报后，上海陆陆续续又捉住、打死若干只大老虎，有上海虎，也有华东虎，有些老虎还是北京当朝钦点要打的。市委第二书记比较聪明，早早就告病回家，幸免于虎难，日后被第一书记陈毅带进京城，持节出塞，做了相对安全得多的驻苏大使。

顾准越发感到没有什么好自轻自贱的。

有时自我解脱不大顺利时他也郁闷、烦躁，也愤怒，可最出格的行为也就是当着孩子们的面摔了一只茶杯。他立刻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控制住情绪后，他和妻子汪璧郑重商定，父亲的这次政治灾难要千方百计瞒住孩子，他们太小太可爱，也太单纯，一定要保护他们小小的心灵不受玷污和损害。

夫妻俩与随他们生活的母亲顾庆莲商量好，一切都要瞒着孩子们，闲言碎语怎样解释，冷眼冷脸怎样躲开，他们什么都计划好了，奢望用家庭之爱能把孩子们——从十岁的嵇头到两岁的五五，加上最小的还在襁褓中的小弟保护起来，自以为这样一来孩子们对爸爸的突然变故就没有知觉了。他们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孩子们终有长大的一天，终有需要独立思考身旁发生的一切事物的一天，终有诘问的一天，也终有面对噩运的一天。

实际上未满10岁的嵇头凭着女孩子的直觉几乎立刻就感到了异样。终于有一次那对小鹿般的眼睛逮住了爸爸不安的双眸。爸爸的手按住她的双肩，只说了一句话“女儿，爸爸这样，对你们只有好

处”顾淑林口述就转身走开，从此再未说过一字。这句话嵇头没有告诉弟弟妹妹们，更没有去问奶奶、妈妈，却放在心里琢磨了一生，少女到老媪。

顾家夫妇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他们精心设计的这一套瞒天过海的计划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是顾准一生中犯下的真正的、很难饶恕的罪过。这一决定酿成的大祸，比起“虎灾”本身，其灾情以及灾后影响不知严重和深远了多少倍。这是后话，慢慢讲。

三周后，闲得忍无可忍的他“找到几本初等几何开始学习数学”。这个举动并非顾准心血来潮，而是他多年希望去做而无法去做的一件事情。

顾准是一位典型的“数字天才”。自总角之年及至弱冠，他对数字的敏感度都超过常人。从十二岁开始的“社会职业生涯”一把把他推进数字王国后，他就开始兴高采烈地攀登一座座应用数学的城堡——会计学、银行学、货币学、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兴高采烈地抱得一个个数字美人归。十多年根据地时期和上海时期的经济学、税务学实践，令他对数字越发的敏感，对数理、数学越发的有兴趣。很可能他一时忘记了曾说过的“志不在此”之类黄口小儿之语，青春时节立下的做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志向，看起来也并非是想做“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武将军，而是要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文元帅。党让他做大上海总税吏，如果没有这场“虎灾”，也算是一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职业即兴趣，胜任愉快的乐事。

顾准又是那种逻辑思维能力强大人群中的一个，这群人具有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同时具有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这是一种抽象思维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不同，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这种人往往敢于质疑却又坚守常识，就是坚守普通、平常但又持久、经常起作用的知识。他们往往藉着天真的经验与现实相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是富有诗意的。可惜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这个人群造得非常非常小，顾准很幸运（也可以说很不幸）地被选中，成为其中的一员。

1952年的“虎灾”令他有一种“混沌”、“混乱”的感觉，和参加革命后每一次的动辄得咎

都不同。那时他对于“革命”有一种神圣的敬畏感，坚信革命集真诚、善良、美丽和浪漫于一身，并因敬畏而谦卑，常常竭力地否定自己去顺应“革命的要求”。看他拍摄于苏北根据地的一张照片就能理解他的努力——明明来自大上海的翩翩绅士，青年教授，却要竭力做出特别工农兵的样子——臃肿的服装，土到无以复加的一片瓦发型，一条腿蹲在长条凳上为同志们提壶续水。美中不足是那副在工农兵眼中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眼镜还挂在脸上去不掉，给人有趣又有些酸楚的深刻印象。

可这一次不同，他不愿再次把自己放进一个无形的模子，去适应它而扭曲自己了。他第一次对“革命”起了疑。1952年的这一次“革命”，毫无美感、毫不浪漫，却充满了无聊、无趣和无知，还有深深的恶意。

他也检讨，可煞费苦心艰难写出的东西他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他也申辩，但无人愿意带着去政治，纯专业的心情先倾听他从常理出发陈述的理由，也无人有能力和耐心从逻辑、常识的角度分析和判断他理由的真伪。他感到深深的“不真诚”、“不真实”。一切都失了序，连革命本身看上去也失了序，没有了美，没有了真，只剩下一个善，但又不知谁能掌握，谁在掌握，谁有权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渊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创世纪。很久都没有读这本小书了。还是“小姑私塾”时候的东西。差不多三年前回到上海后，他偶然在原来南市仓基弄年久失修的旧家里又一次看见了它，就带回到他按供给制分配的愚园路82号的新家里。除了母亲，他从未让任何人看见过它，包括妻子和孩子们。二十多年了，他没有把它带在身边，却也从未想到要扔掉或者烧掉它。这几句从小就背得烂熟的句子，原是无需翻书的。

“难道真的是祂创立了秩序？”

“难道真的只有祂掌握着‘善’？”

合上书，他把它重新放回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压在一堆不常用的文牍下面，再小心翼翼地合上抽屉、落锁。桌面上还有几本翻箱倒柜找出来的旧书，是立信事务所时期的旧物——从勾股定律开始的《初等几何》，那是他十九岁站上三所教会大学会计学讲台时买下的。

“书到用时方恨少”，已经掌握的、偏重于应用的数学知识，例如函数，微积分，指数等等已经不够用了。从编写讲义，课堂讲学到课下答疑时被学生追问，都让他感到自己的数学知识还差得很，尤其是基础数学——初等几何、三角等，因为和会计学相距甚远，他很少接触。在它们面前他感到尴尬。

他很早就认为这是一门值得花费一生的时间去追求的学问。

除此之外，少年时节囫圇吞枣似的看过的那些辩证法、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籍频繁提到的一个词汇——逻辑，就蕴含在数学中，蕴含在数字中。老板潘序伦曾告诉他，数学，是最不可能弄虚作假的学问，也是一切学问的基石，他听进去了。可潘老板后面那句“多做点学问，少谈点主义”就显得多余，让他反感。那时他就立志要开始他的数学遨游，只是被更加吸引他的“做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理想阻断了。现在有了空闲，有了机会，他迫不及待地要把十多年前立下的志愿重新实施起来。

“其实一切决定于数字，那崇高的思想也决定于数字的。” 60.01.05

八年后他日记中的这句话充满了哲学的味道，也正是他此刻拿起《初等几何》的动力。他决心丢开一切实用的目的，从纯粹的数字、数学、数理中去寻求世间的秩序。直觉告诉他，什么检讨、检查、申辩、申诉都只会加深混沌、无序、虚假和丑陋的程度，只有从逻辑上摸到事物的脉络，才能一劳永逸地跳出无序的泥淖。

他决心从数字开始，把自己从泥沼中一点一点地拯救出来。他放松了一些。

“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和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天色欲晓，他悄悄地跨出家门，走上愚园路。

仲春三月上海的佛晓，风清气爽。天色尚早，加上是礼拜日，街上没有行人，街灯都还亮着，只有清洁工人大扫把的刷刷声和头班电车驶过的叮当声音，让他知道这是上海今天的开始，而不是还留在昨天，而今天和昨天已经大不一样。

站在第一个十字街口，他有些发懵，不大清楚要往哪里去，就顺着人行道向右拐了下去。路两旁的英国梧桐在柔润的东风中泛着深浓的绿意，鳞次栉比，高低参差的老洋房有些还亮着前厅灯和草坪灯，不过也都在陆陆续续熄灭了。晨光熹微中的这条马路异国风情十足，一派雍容华贵。哦，是华山路。

他只是觉得这样走下去好舒服，一种久违的放松感让他索性信马由缰地走了下去。不知走了多久，忽然，一阵天籁般的声音飘了过来，伴随着清亮的钟声，如此的空灵，如此的美也如此的熟悉。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沿着华山路走到了徐家汇天主教堂，晨祷刚刚开始，修女们在唱赞美诗。

徐家汇原是蒲汇塘、肇家浜和法华泾三水汇合处，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曾在这里建农庄从事农业实验，他的十多家后裔都居住于此，故名徐家汇。徐光启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徐家汇遂成为耶稣会的基地。1847年3月，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圣依纳爵堂在此建成，包括礼拜堂，修道院、修女院、博物院、藏书楼，天文台、圣母院、育婴堂等，成为中国江南天主教的传道中心。1896年耶稣会在这里重新建造了一座新的大教堂——“圣母为天主之母之堂”。教堂座西朝东，平面呈十字架形，法国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红墙白柱青瓦，两座钟楼南北对峙，高耸入云。徐家汇天主教堂以其规模巨大、造型美观、工艺精湛，在当时被誉为上海的第一建筑。

顾准幼时时常到这里来。

毕业于清心女中的两个姑母，常常带着她俩最喜欢的小外甥双五，到陆家浜顾家宅附近的基督教清心堂去做礼拜。庆志姐俩都在少女时代就被哥哥陈蓉生送进清新堂下的清心书院读书并在此受洗成为基督徒。毕业后她们创办了“小姑私塾”，顾准在“小姑私塾”的两年中跟着她们去教堂做礼拜，听布道，唱诗，祈祷，领圣餐，是很日常化的事情。姐俩分别嫁给了徐光启后裔的兄弟两人——徐徵山和徐仰山，徐家人大部分住在徐家汇，小顾准跟了来在姑姑的婆家小住，就在徐家汇天主堂的附

近。小孩子家，不懂、也不会在意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巍峨的教堂、庄严的十字架、肃穆的唱诗班、厚厚的《圣经》、直入人心的赞美诗歌，不用上学的礼拜日……，对于一个小孩子的小心灵，这些才是更深刻、更难抹去的印象。

反正这天清晨，已经三十七岁的他鬼使神差下又来到了这里。

“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圣经》 马太福音 7:8

起小就懂得这个“规矩”的顾准，毫不踟蹰就叩了门，有人为他开门，他就走了进去。在教堂的长椅上坐下，他聆听那四个声部的美妙声音。多少年没有听到过了？恍若隔世啊。多么安详和清灵，多么熟悉多么美。

教堂能为激情提供一个环境却不会干扰激情。来到教堂的人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低垂下平日高昂着的头，触碰到面前那厚厚的《圣经》上，也常常会冷不防就被一个巨大的、从心底涌向喉头的呜咽吓住。顾准也不例外。

正是这个呜咽提醒了他——这里难道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无神论者应该来的地方吗？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他有些慌乱，没等布道开始就匆匆离开了。依然是那位守门人为他拉开大门，一点也没有要问他为什么早早离去的意思。

回到家已经过了早餐时间。警卫员和秘书都已撤消，老母亲默默为儿子端上简单的早餐，他默默吃下，站在窗边望了一会儿楼下草坪上欢快嬉戏的孩子们，默默走向书桌，坐下，翻开最上面的一本《初等几何》，从第一行字读了下去。

他的数学遨游就从这天开始。

“……自此以后，直到 1955 年进中央高级党校为止，除工房工程处和洛阳工程局两段又朝夕投入工作外，业余时间全用在学习数学上……我从几何学中发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方法，觉得除阶级斗争、政治工作而外也还‘别有天地’……在家严寒夜读，竟弄成一场肺炎……。

“学习数学不是坏事，可是对于我却是思想堕落的开端。学习数学中的客观主义开始发生极其恶劣的作用，为我滚向修正主义的堕落过程开辟了道路。”

顾准“从逻辑论证开始的思想堕落”开始了。

4. “思想堕落” 由逻辑论证始（下）

被撤职的顾准，秘书、警卫员、汽车和司机都没有了，但每月的工资并没有减少一分，一家老小也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水平。

一头扎进计算尺、三角尺和圆规世界里已经两个多月的他，差不多能算“入门”了。智商极高的顾准从来都是靠自学拿下一门门学问的。他有本事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一门有问题，答案可能在另一门里头——几何学里搞不懂的，可能会在哲学里找到出路，反之亦然；计算尺拉不出来的答案，可能会在经济学里突然令他恍然大悟，反之亦然；三角尺、圆规画不出的图形可能会让他猛然想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康德、黑格尔说过的什么话而彻底改变思路，迅速找到新的路径，反之亦然……。这些都常常让他有一阵小小的狂喜而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包括自己多舛的时运。

“请师师为主”向来不是他的“范儿”。从垂髫时的《非非孝》到弱冠时的《中国银行会计》，再到而立后各种学问——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税务学、经济学、金融学……的汲取，他少有“拜师”，多为“偷艺”。就连大名鼎鼎的潘序伦，你看他什么时候心悦诚服，认祖归宗似的膜拜过？不惟不拜，该吵他就要吵，该跳他就要跳，该走更是抬腿就走人，留都留不住。他唯一一次向苏联老大哥拜师学艺，学了一招“专户专管”，还被“上头”连老师带学生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不得不自认透顶倒霉并从此再也没有“虚心求教”过谁。

在这个问题上，他和上海孤岛时期的老上司，日后最知音的挚友孙冶方很不相同。

孙冶方和顾准一样，一辈子都在经济学的海洋中摸爬滚打，也和顾准一样深知没有坚实的数学基础成不了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可不同于顾准的是，他是位比较典型的学院派——早年就读于无锡荣家开办的商科学校，之后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主攻社会主义经济学，三十年代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从事农村经济学研究，中共胜利后在华东局任工业部副部长，后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算上七年整天沉溺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里的秦城囹圄生活，以及中国新时

期重新获得尊重、外人看上去十分荣耀的最后几年，他这一生和数字，数学的纠结缠绵可一点不比顾准少。在华东局（机关在上海）任职期间，他更是“利用职务之便”，先是请了一位白俄老太太帮助提高俄语精读程度，以便能精读俄译的《资本论》（他从来不相信中译本，德文又来不及学），后是请了中国著名数学家顾毓琇给他上高等数学课，从微积分学起（真可谓“杀鸡用牛刀”）以便去理解《资本论》。他曾对自己的侄女，中国微生物专家薛禹谷先生说“不懂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是个次品”。

顾准哪里是个能做“次品”之人！别的不提，就冲着老友孙冶方的“进步”，他也绝不会自甘落后。再说如果能在既无“白俄老太太”，又无顾毓琇的情况下赶上孙同学，他那颗骄傲的心当然会有加倍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沉迷于数学的顾准有一天忽然抬起头来，上海已经“入梅”了。菲菲梅雨中他有些焦躁。怎么好就这样坐在家里拿干薪？我才三十七岁，“挂甲”太早，“归田”不甘，我也懒得琢磨那什么大隐、中隐、小隐的劳什子，只是总得干点什么才对劲，起码得对得起这点工资吧？我倒是想学成个数学家，可那怎么也得个几年上十年的功夫，估计党和国家不能白养活我这么久。再说还有这么一大家子需要我养活，横竖不能光靠妻子的力量，我是个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经天纬地是不行了，刍蕘之献当还可能，路还长的很，我连“不惑”都还未到，摔倒一下很正常，又不是第一次摔，这次摔得重些罢了，何况和前人比可能连摔跤也算不上，翘起了一下而已，更何况这还不是我的错。他再次释然。

自从成为政治老虎，从上海财、税总管的位置上被撤下来，顾准听到许多风言风语。他和妻子汪璧都习惯了，懒得去理会。可有两条传言弄得他异常恼火却有口难辩，相当窝囊。

一条是有人言之凿凿证明顾准说过“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的狂言，正是“狼子野心不小”，而“野心”是当朝者最忌讳的。这种一无本证，二无旁证的道听途说，当年曾是很普遍、很常用的定罪依据。“谁主张，谁举证”，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谁否认，谁举证”，也就是说基本上“无法举证”才是正理，你越解释越黑，顾准就索性不解释。

另一条就是那天清晨他鬼使神差般走进徐家汇天主堂。虽然仅仅听完赞美诗就出来了。却不料当

天在场的信徒中有人认出了他。当事人应该是毫无恶意，可话传出来就难听了，“顾准撤职后到教堂去祈祷了”，还有更离奇的，“顾准还去佛寺烧香了”。

这个顾准受不了，太低级、太功利，也太猥琐。

顾准对“猥琐”这个词颇青睐，日后曾在他明知自己“非常的与众不同”时称呼自己是“我这样一个猥琐人物”^{71.3.29}，在更高的层面上骄傲了一把。可见你要真把他和“猥琐”联系起来，对他是多么大的侮辱——

我听赞美诗的感受怎么能和你们讲得清楚？就算我说破了天，你们能理解吗？你们认为人只要进了教堂佛庙清真寺，不是下跪烧香，就是磕头祷告，求平安，求子孙，求升官，求发财，求这求那求一切，免得对不起那点香火钱。和你们谈宗教，谈信仰，谈我心目中“哲学的上帝”岂不是对牛弹琴？

顾准有个很“中国”的毛病，就是士大夫情节，或者说绅士情节相当严重，“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有时都到了孩子气的地步。比如在右派改造的河南商城，他饿得都快成殍了，离开时被要求大队全队照相。他还“我站在高处，还自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神情。——不，高傲而沉思。”^{60.01.16}

像高贵的名马，顾准这种人很难驯服。三个月过去了，多少骏马、瘸马、烈马、杂毛马都驯服了，这头狮子骢也该老实了吧。可你想不到这匹该死的狮子骢被关在马厩里这么久，却既没有嚼着草料低头思过，也没拧着马颈怨天尤人，而是整天和计算尺、圆规、对数表较劲。顾准1955年的日记，在追忆下台后开始的系统数学学习时写到，“看看以前，浅薄得实在厉害。发奋读书而能在基础方面有所补益，也不过是三四年的事”^{55.12.1}，和他“十年期间”写下的“历史交代”——“学习数学中的客观主义开始发生极其恶劣的作用，为我滚向修正主义的堕落过程开辟了道路”相映成趣，令人哑然、黯然。

6月，新的任命下来了，顾准被降职调任华东局建设部住房工程处主任。人人都知道他是块用于开拓的好材料，可遇而不可求，不用太可惜了。

新工作地点还在上海，但组织关系从此离开了上海市。短短半年后，连工作地点也离开了上海，

从此直到二十二年后他去世，顾准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上海工作过，他五十九岁的生命，二十八年在上海，三十一年在上海以外的“乡下”。这点顾准确实很不“上海人”，倒是很有些福建人或者四川人那种“四海为家”的德性，从早年由上海奔向上海人最不放在眼里的苏南苏北，到延整后有回上海的机会而回，到动员人家刘长胜先生的人马离开上海去东北，到欣喜不已地打算在河南洛阳安家落户，到将来他和他的全家永久性离开上海到北京“乡下”高就，无不让人感叹他“不像个上海人”——既不像上海人眼中的上海人，也不像非上海人眼中的上海人。他是中国人中的另类，更是中国上海人中的另类。至少，再骄傲的他却没有一般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观念，仅仅这点就很不凡。

他的新工作是在上海五个点修建二万户工人住宅。这五个点分别是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日晖新村、真如新村和天山新村。

1952年的巨额税收加上五反运动轧出的巨额赔款，上海市下半年出现了严重的通缩，急需政府投放购买力，同时也急须解决居民住房的严重不足，这是工房工程处成立的两大原因。

工程处辖下职工多达两万人，既有传统建筑工人，也有中央指定的六个解放军师组成的建筑部队，完全属于基本建设项目，其艰苦不言而喻。顾准的履职都是在工地的工棚里，上海的气候夏天闷热，秋天湿闷，冬天阴冷，好在那时国家年轻，人也年轻，政治老虎顾准也就三十七岁，却辖制着差不多一个军编制的两万人马，营造着差不多顶上一座小城市的两万户工房。

他的兴致和“逻辑”又上来了，什么老虎不老虎，降级不降级的，活得有意义就行！“带领一批人马，做一个建设工程的领导工作”^{56.3.11.}，他何止是愿意，简直就是称心如意。

半年中“进行了和技术要求相一致的大规模组织工作……除此以外，我也努力学习，方向是工程知识”。凡有新知可以学习的，顾准从来不放过，从来是兴致勃勃。“愈是向这方面钻，愈觉得缺乏物理学基础知识，愈想读一些物理学知识，愈觉得数学基础不足。”他计划把他的工程知识程度迅速提高到工程师的水平。顾准历来从骨子里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自己首先是绝不肯做那种令人厌恶、不懂装懂，刚愎自用的外行领导的。

他“利用职权”，不断地从工程师们那里学艺，有时谦虚地问，有时不大谦虚地追问，有时命令

式地逼问。工程师们倒都很乐意和他交流，认为是棋逢对手，兵遇良将，很专业，很过瘾，也很开心。再说都是工程、技术和管理问题，也没什么忌讳和担心，大家都愿意把自己所长传授给他。

可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向工人学习”，这就有点那个了。有一次，一位姓陆的工程师（亏他好记性）告诉顾准，自己向一位老工人请教有什么简易的办法可以给锅炉除垢。这位老工人说加大火力可以把水垢烧掉。顾准笑了，“我说水烧到一百度变成蒸汽跑掉了，怎能提高锅炉水管的温度？这位陆工程师回过脸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加大火力，水可以‘过热’，这就表示这位老工人的建议是可取的。”

顾准的“历史交代”和日记里常常有这样“你怎么理解都可以”的句子，就像上面这段话，你很难判断他是在检讨自己“看不起工农兵实践经验”的错误，还是在无情地嘲讽“无法成为理论的”所谓“知识”。你需要看下文：

“我是工程‘指挥员’，我依靠的是工程师，我汲取的是‘成为理论’的知识。”

上海是标准一个大气压的海拔高度，锅炉是普通的烧饮用水的不加压锅炉，水不可能通过加大火力达到“过热”，不可能因过热而除垢，哪种“知识”是“能成为理论”的知识，顾准到底是在否定自己还是在肯定自己，读者，您自己判断吧。

“这个时期的工作，也暴露了我在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问题上，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完全合拍的见解……”

刘少奇也搞过企业管理？可不是！百度上赫然一篇《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刘少奇在中央苏区的企业管理思想初探》。苏区时期就搞过如此修正主义的东西，那岂不是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要老资格？顾准和他一脉相承，要求完全的“内行领导外行”，怎么可能有好下场？果然，年末华东局就派了大员来工程处，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民主改革运动。

顾准很不解，“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企业秩序的工房工程处，民主改革运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要真正了解这一点，一直要经过整整十七年……”。这几句你很好理解，可下面，他就什么“鞍钢宪法”、“光辉思想”、“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清算自己”、“接受再教育”……

云山雾罩说了一大堆，让人弄不清他顾准到底“想”说些什么和“在”说些什么。可这就是当时的标准语境和语言艺术。

“当施工队伍的架子初步搭起来，工程完成大体已经有了保证的时候，我这个“政治老虎”不应该在工房处留下来，我应该离开这个单位了。其实我不仅应该离开工房工程处，也应该离开上海了”。这倒是句大实话，是顾准从华东局派来领导民主改革运动的大员脸上、眼中和口中读到的极为明确的信息。

你以为倒霉的他又一次遭遇“卸磨杀驴”的背运会又一次“夜不成寐”吗？错了。如今他不但已经“惯于长夜”，而且已经惯于“享受长夜”了。因为忙于组建工程处而放下多日的数学课本，他就早在想念，加上工程处几个月来的实践，令他对具有高度客观主义特征的“高等数学”更加迷恋。被“驱逐”正好又给他一次充电的时间，何乐不为？他抬腿就回了家，扑向书桌，捧起书本一头扎了进去。

恰在此时，中央新组建的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到上海招徕财政人才。一听有这么个宝贝正闲置着，二话没说立即从中央人事部要来令箭，着令顾准、汪璧两口子立即进京到部，顾准出任财务司长，汪璧随后安排。

你以为顾准会对这样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你又错了，对这份“御差”他不但不领情还颇多烦言，故意延宕上任时间。刚刚移交完工程处事务，他正沉迷于“高等数学”呢，没日没夜地苦读，连吃带啃。数学的美妙引起了不可遏制的求知欲望，他哪里还分得出半点神来关注官场杂戏。正值深冬最冷的时节，上海又没有暖气，“严寒夜读，竟弄成一场肺炎”，他不得不住进医院近一个月。这次肺炎是他二十多年后死于肺癌的发端也说不定。

“……一个月中，我不和建工部联系，只是利用时机和汪璧两人游览故宫、天坛，并蛰居在招待所内埋头读数学。”十八年前和汪璧“流亡”北平的一幕，即宛如昨日又恍若隔世，亦真亦幻，难取难舍。那时两人一门心思在革命上，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欣赏历朝古都北京的风貌。这一次他们补上了这一课，夫妻俩都觉得非常值得和舒心。他们租住在东单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孩子们还都在上海，难得这样温馨的两人世界，比起十八年前的激昂和神秘，又是一种别样的浪漫。

可惜神仙夫妻的日子只有短短的一个月，4月，他必须到建工部财务司报到上班了。

对于新的工作，他真是情绪全无——不也就是一名“部吏”，和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无甚二致，既不能有主见，又不能有主观能动性，与工房工程处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实际工作相比，真是没意思透顶。再看看这“工部”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人际关系繁杂，“志不在此”四个字再一次冲上脑海：

“……建工部财务司没有必要设置庞大的机构，但是这个时候我在工作上不再操持上海时代的主动权，以‘精简上层，充实下层’来代替大机关主义这种主张不会得到司内同志和部领导的同意，我也就采取了妥协态度……出于‘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工作消极。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从他的逻辑出发，他又看到了新工作环境中的“无逻辑”处。可这次，他变得“老练”和“识趣”，闭口不语，消极怠工，“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作”，他也学会了“混”。

关于顾准在建工部的一年半时间，其“历史交代”被删去了两段，九百余字，是在讲到 he 带领好几个司局干部参加一个综合调查组到东北，在沈阳、哈尔滨、鞍山调研时遭斩截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自己还是尽可能挤时间学数学”。这些被删去的内容在很大的可能性上应该与数学、逻辑、规律以及中国工业现实有关系，又肯定不止于此。从他临终前，也是他生命最后成熟期的一篇极漂亮的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实际上是他写给六弟陈敏之的通信之一）中，他谈到“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文稿 P339。初读《资本论》才是占去他最多时间和精力的一件事，早在彼时他就已经开始对马克思定义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劳动异化”等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对“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文稿 P339 产生了最初的怀疑。他日后写下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的最初观点，坦率而激烈，不宜面世，即使到了出版《顾准日记》的1992年，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主旋律”不和谐。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的文字涉及了“高、饶反党集团”，这是浑浊至今的“大酱缸”，谁碰它就是自找麻烦。

最后一种比较小的可能性，就是他批评了鞍钢，批评了它的“技术组织”和“现代化施工”方式。

这是顾某人的强项，也是他最喜欢“置喙”之处，一次次被教训，一次次不接受教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既然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那么凡是被删去的，一定有它被删去的理由。罢了，不去猜了。

1954年仲夏，部党组给了他一个月到庐山避暑疗养的假期，作为中组部驳回他再次申诉的一个小小安抚。

从庐山回到北京，建工部已经换了几位部长。副部长万里正在组建一个班子到河南洛阳筹备洛阳拖拉机厂等三个大工厂的施工，顾准受到热情邀约，一起到洛阳做了调研，副部长问他愿不愿意留在即将建立的“洛阳工程局”工作。他当然愿意！

刚刚在庐山疗养院读过苏联卡达耶夫的小说《时间啊，前进！》，他正在为呆在京城做“部吏”发愁呢，有这样的机会，真太好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机会战斗在建设第一线是光荣的，我满腔热情地同意留在洛阳工作”。

原以为年届不惑已不再浪漫了呢，哪知还是这么不经诱惑。他到老也不大明白，革命是浪漫的，可凡是革命胜利了的地方却都是不可能再容忍“浪漫”的。顾准担任洛阳工程局第一副局长的时间不足一年，命运和两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局面打开了，你也该走人了。

起先，顾准认为自己既是第一副局长，负责指挥施工天经地义。仗着两年前的工地经验，他很快忘乎所以地大干起来。在他的主张下，动用了建筑部队的一个团，当年年底就建成了厂区道路，然后是大张旗鼓的“五通一平”——通电，通水，通电话，通道路，通排水，平整土地，再其后就是搭建职工宿舍。

这些看上去非常符合基建项目基本秩序的行为，不料又触怒了别人。

先是苏联专家大发雷霆——“我还没有设计好，你就敢施工，还施工完毕！还挺好用！！那还要我干吗？你这不是诚心要我好看吗？！”

后是“先置窝后治坡”还是“先治坡后置窝”——先安置好职工生活再战天斗地还是先“枕地

盖天”凑合着、干起来再说之争。顾准当然赞同前者，大概又是从他的“逻辑”而不是“政治”出发。

苏联专家的震怒，他倒不是特别在意——又不是没见过，有意见你我可以讨论嘛，谁怕谁？

可怕的是自己人旁观的冷眼，那一道道寒光让他心惊。

来洛阳时副部长的原意是要他担任洛阳工程局正职的，他识趣地拒绝了，只答应担任副职。可即便如此，人们对这只来自上海的“政治老虎”第一副局长依然是侧目而视，尤其是对他那么高的积极性，那么大的干劲，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果不出所料，新上任部长刘秀峰到洛阳视察，“用半是嘲讽，半是质问的口吻对我说：‘你来洛阳，原来大概是打算有所作为的’，按他的口吻来说，我不宜积极有所作为，不合时宜……”，“我没有清醒地估计我当时的政治处境不宜积极有所作为，我同意万里要我留在洛阳工程局工作的提议，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

这一次顾准终于看懂了“脸色”，算是个进步吧。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工程局在新部长的指示下终于定了他一个“擅自做主，把路修得太宽”的罪名，加上一次“草帘子事件”——因为顾准属下一位部队转业干部的调度主任对业务的不熟悉，在购买防冻草帘子时数目后面多加了一个0而导致的浪费，又一次勒令他写检讨，接着就是处分、撤职。

他受够了。

毕竟是凡人，这一次他没那么洒脱。当新部长冷冷地要他“呆在洛阳检讨完了等待处分”时，“眼前一阵漆黑，几乎栽倒”。

第六章 你如此肯定的东西是真的吗？

1. 党校-屋檐

“我提出进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刘秀峰同意了。”

1955年9月，做事情做一桩成一桩，却又“百事不成”的文人顾准进入中央高级党校。

党校——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词，每位国人耳熟能详。可“耳熟”却未必“能详”。

此名词从未收入《不列颠百科全书》，纯中国（且仅限大陆）特色。1933年3月13日创办，时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5年改称中央党校，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1966年停办，1977年复校并恢复1935年名称至今，全部办校经费由国家财政负担。

先考证一下顾准的党校学历。

在他入学的1955年，并未有人大通过决议允许动用国库公帑将党校经费编列入政府预算，党校国办，至今于法无据，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没有“党校”二字，可见就算根据党章，党校这一事物也无章法可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顾准1955年的党校学历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但这样追索未免矫情。顾准作为共产党员被送进党校，彼时和此时都天经地义。党校除了“培养、训练、轮训党的干部”以担当党更重要的职位和任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收容那些党性不强，不乖，不听话，不懂事，不好用，不服用，但又没有触犯党纪国法的党员干部，先送他们进党校，“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甄别堪用和不堪用之才，加以“改造”，再行处理。

党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某种运动狂飙般兴起时，又是一座保存、保护干部以避免过于无谓的伤害和牺牲的“逃城”。在这种意义上，党校即是锻造炉又是淬火池，即是象牙塔又是保护伞，顾准更是干脆管它叫“屋檐”——“在屋檐底下躲避暴风雨，这是无论如何必要的，躲过去，并且要趁此机会好好读些书”^{55.12.11}。

中央党校，省部级党校，地县级党校，莫不如此。

党校人员中既有无法调教的狮子骥、乌骓、赤兔，也有“由来识途久”的“老马”，还有“再寻商岭路”的“劣马”和各类无法安置，甚至无法分类的“马”们。他们的身份大部分是学生，也有些是教员。

例如顾准同学日记里提到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张心一先生（官方的28.5名单上却并无此人）就是党史教研组的主任。校长杨献珍不知出于何等考量，竟让“王明的人”讲党史。好在短暂做过毛泽东秘书并首创了“毛泽东思想”表述方式的这位张主任相当聪明，“这门课所占时间极少，也没有印发讲义”。口说无凭，白纸黑字将来就难说了。

还有一位主讲辩证法的孙定国先生，原是阎锡山晋军训教总队长，后加入中共，在“再寻商岭路”——批判胡适、梁漱溟的战斗中成为著名哲学理论家。顾准同学恶习不改，课下和同学非议老师讲课的凌乱和知识面的狭窄，还不怀好意地“都笑了一阵”^{55.9.29}，好生无礼。

孙先生不幸九年后因非常屈辱的原因自杀于党校西南角人工湖的冰窟里。

校长杨献珍常亲自下课堂主讲“唯物论”。对校长，顾同学照样非议——杨校长您既然主张只读“经典”，可首先没包括“毛著”而只限于马恩列斯，其次您的马恩列斯又不包括哲学，没有哲学成何“马恩列斯”？“也许因为他实在不懂马克思的哲学”，“听他的讲，读他的讲稿，其实远不如读列宁原著”。连校长也这么议论，该学生又好生可恶。

还有曾被毛泽东先称为“一位真正的好人”的，主讲“历史唯物主义”的艾思奇先生，彼时颇有名望，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驱人物。艾先生原名李生萱，“艾思奇”三字据称是“爱马克思和伊里奇”的含义，可惜积劳成疾，五十四岁就英年早逝了。

主讲“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也就是《资本论》的，是龚士其先生，龚先生后来做到中国《资本论》学会的副会长。顾同学对龚先生倒是评价颇高，说“感谢他的讲课，推动我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也是我系统地读马恩著作的开始”。

还有一位范若愚先生是“联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但范先生不讲课，只是“经常到课堂来照料”。有意思，无论如何顾准和同学们都是成人了，课堂纪律应该是没问题的，不知为何要范主任“经常来照料”。一种可能大概是因为主讲“外教”是位俄国人，恐怕大家有语言上的困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怕班上的刺头们难为他，对老大哥不敬。其实联共党史由联共党员来讲，可谓顺理成章，天经地义，至少顾同学少有聒噪。

还有一门“世界通史”，是顾同学非常喜欢的一门课程，由一位名叫尼基普洛夫的苏联年青人主讲，从古希腊罗马讲起，讲到哪算哪。顾同学听课嫌慢，先通读一遍他的讲义，“古代史与中世纪史部分，看到倒是很不错的东西”^{55.9.24}。可惜尼老师很少涉及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更没有中国近、现代史。

这令顾准同学深感遗憾。党校根本不设中国史这门功课，他甚是不解。1939年在上海孤岛，他就立下了“读史”的宏愿，中、西史都要读，要深读。如今党校的“史课”安排得如此吝啬，西史一点点，中史等于零，至于党史，除了张心一老师那一点点“口述历史”之外，只有许邦仪先生任教研室主任的“党的建设”课程，可教材却都是联共的“建设”，驴唇不对马嘴，令他好生郁闷。

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课程，也是一位苏联外教主讲。这门课对顾同学可没起什么好作用，“听讲课时随时摘记了一些对讲课的疑问，后来有些成为写我的毒草《试论》时‘原料’的一部分”。

顾准的同学们就更是来自五湖四海。“普通班 二支部”的同学们大体有这么几位：

支部书记刘建华是江西赣南区党委书记，后来享受正省级待遇；同学申建，后来是驻古巴大使，中联部副部长；同学金城，后来是统战部副部长；同学邵井蛙，后来是中纪委委员；同学韩直飞，后来是张家口市副市长；同学张双城，黑龙江省的一个县长，和顾准同学好像颇投契。顾准就是和他一起背后笑话孙定国老师的辩证法课程的。张双城同学后来没了音讯，和顾准如此合拍，估计张同学也不会有太高的党性以及太好的下场；还有江苏的杜同学，铁道部的萧同学，四川省某区专员李同学，还有一位女生汪同学。

党校第一课，开宗明义就是宣布学校当局的声明：“本校不接受学员提出的任何问题申诉”——这是学校，不是中组部，同学们你们要先搞清楚。顾准同学很明白这一点，上个月灰头土脸地从洛阳回到北京，他就下决心“冤死不告状”。两次申诉无果，他已经死了心，加上“肃反”、“镇反”开始，“胡风”案起，上头忙得脚打后脑勺，哪里顾得上这些“死老虎”们。顾准乐得在党校深深的“学术空气”中修生养息。

好些年都没有在这样清新的“氧气”中呼吸了，党校除了大大满足了他“静下心来好好读点书”

的宿愿，更是令他躲过了一场场重大的“运动”灾难。

“1955-1956年，是发生了许多重大革命变革的一年：肃反运动，胡风反革命案件，农业合作化高潮私营工商业的全面合营等等”。

此时的他非常明白，假如人不在党校，照其秉性很难躲得过去这些东西。对某些课程的设置和老师有看法，那是每个做学生的常态，顾同学也不例外。和“上学”这件事本身的幸福相比，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才有他1955年12月11日的日记：

“在屋檐下躲避暴风雨，这是无论如何必要的。一定要躲过去，并且要趁此机会好好读些书。”

55.12.11

顾准总算是学了些“乖”，懂了些“事”。

除此之外，他和他的同学们还能听钱伟长讲物理学的基本知识，王淦昌讲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看好莱坞电影《居里夫人》，苏联电影《第四十一》、《士兵之歌》、《蜻蜓姑娘》、《忠实的朋友》，印度电影《两亩地》，读高尔基《克里木·萨姆进的一生》，狄更斯的《古玩店》、《双城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崩溃》……

《古玩店》令他读得掉泪，而《大卫·科波菲尔》因为“写得极其温柔”而触动了他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里藏着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双城记》中断头台一幕让他震颤——“足音永逝（告别革命）的那一天会到来吗？”

《双城记》和《九三年》让他模模糊糊感到“二种类型的革命”——法国式的和苏维埃式的，都不尽人意。“将来能不能有第三种，即从芬奥这一类中立国家……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像西班牙或捷克的方式……像在缅甸这些国家……或者再加上假如实现了中立化以后的德国……因而争到人民民主的前途。如果如此，战争最后就会避免了”^{55.11.02}。

比较左拉、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他更喜欢狄更斯。狄更斯的人性、温柔和悲天悯人都与自己内心那簇下意识燃着的蓝焰丝丝相扣，虽然他说书中“有很多庸人气息和宗教气味”^{55.11.22}，但读起来他依然是爱不释手。比起年轻时读雨果时的激动，狄更斯给他更多的是人性的感动。

下一步要读莎士比亚，朱生豪译的全集刚刚上市，得赶快去买，再晚就买不到了。

“料想不到在进入四十岁以后，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艺，懂得爱孩子。” 55.11.16

顾准同学常常知足得要感谢上帝。党校的氧气多得他都快要“醉氧”了，夫复何求！

刚入学，他还抱着要深钻数学的愿望。导数、函数与极限、单变及多变量微分、定与不定积分、级数等等他都已经入了门，只希望能有个深造的机会。他甚至幻想成为一名数学家，为这门学问献上一生也是值得的。可是数学太完美，创新也太难，党校也不是理工科大学，他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但就他目前的水平，用于经济学是差不多够了，不满足也只好靠今后在实践中深钻。

“今后”？我还有今后吗？这也是他常常自己问自己的问题。

“有，一定有！”他也常常这样回答自己。

年轻时立下的做一名“职业革命家”的壮志并未泯灭，纵观他一生的言行和文字，他真正想要做的是一名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虽然这句话他从未说出口。他不说，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这个理想（或者愿望）距离一个大大的贬义词——“野心家”太近了，近到几乎可以划等号。凯恩斯说：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是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凯恩斯的这句话倒是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在中国如此可怕。可这里不是他们的胡佛塔下、卡内基湖畔和史德林纪念图书馆，那里脱颖而出的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们哪里懂得什么叫“野心家”和“阴谋家”，扣在他们头上倒常常是学术王国的桂冠。

顾准至死都相信中国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日后他有那么多关于国事、世事、天下事的文字，有些如今看来几乎犹如“先知的语言”留给我们，留给他的中国，却从未享受过哪怕一天胡佛塔下的安宁，卡内基湖畔的静谧和纪念图书馆的善意。那上百万玑珠般的文字都是在唾面自干的污秽和饥饿血汗的泥淖中留下的。1955年的党校就是他的胡佛塔、卡内基湖和纪念图书馆，中国有顾准，海淀西山麓、颐和园林旁的这片土地，功不可没。

党校的第一年是他一生中最享受的读书时光。他拼命读书，像拥抱情人一样拥抱着历史，逻辑，数学，经济学，马恩，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狄更斯，雨果，左拉，高尔基……。

党校，可爱的屋檐。

2. 圣者与圣经

“……今天又读了《资本论》的四、五、六章……真好啊……这几天简直是拼命地读《资本论》……把《资本论》的第一卷读完了，开始读第二卷……第二卷与第三卷总共 1800 页，设法在月底前读了她。可能的话，还要……做些摘记。”^{55.12.1.}

顾准同学在党校最先迷上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圣经”——《资本论》。

第一次读《资本论》是在 1933 年 18 岁的时候，那时他就“在《资本论》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实际斗争的行列”^{文稿 P326}。那代青年人开始干革命的时候，其理论水平要远远高于生于 1949 年以后的人们。从读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读马克思、河上肇开始认识革命的他们，比起从《大众哲学》或者干脆从“造反有理”开始的人们，深刻了不知多少倍。

但是顾准真正通读，细读，深读和反复读《资本论》是从四十岁进党校才开始的，为此他甚至放下了数学。

“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憎恨与对工人阶级的爱，对铁的法则的科学的冷静的态度，渊博的知识，美丽的文章（不很好地读，还看不出文章的美丽），真是使资本论是政治宣言，科学著作，与艺术作品。而由于他对第一卷曾经费去那么多的劳动，比之他生前来不及校正再写完成的，第二卷、第三卷，更是精妙绝伦。”^{55.12.1.}

顾准读书的速度是神奇的。比如他读三卷本的《大卫·科波菲尔》只用了两周睡觉前的时间。读《资本论》，他用一周的时间读完了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并做了大部分的摘记，“此外，图书馆有斯密与李嘉图的译本……，都是准备今后大大致力一番的”^{55.12.11.}——他同时阅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将马克思和这两位学者的“劳动价值”、“交换价值”、“货币数量”各论点相比较，首先提出的是对人民币是“金的代用物”还是纯粹的管理货币的疑问，以及苏联规定货币含金量原因的疑问——

“三十多年的实践，使它们要规定货币含金量，原因是什么？是对外关系以示巩固呢？还是整个货币的机能（国内与国外）要求如此做呢？”^{55.12.1.}

他一口气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四、五、六章，惊艳于她的“精美绝伦”——“这几天简直拼命地读资本论……已经读到第一卷的第十七章，已到 676 页”。他对她相见恨晚，叹道“很奇怪的是，怎么以前不读这样一部好书”^{55.12.5}。顾准同学可能忘记了自己十八岁就和这位“美女”相识，可惜太年轻，未经沧海不识水，直到今天才看出她是如此之美。

12 月，他已经读完了第二卷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货币论、地租论再生产论“大致都有了头绪”。转年 1 月，他开始读社会主义部分，同时阅读《剩余价值学说史》。此书原是《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恩格斯曾计划把它编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最后考茨基将它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书名单独出版，作为权威版本沿袭了下来。他还同时阅读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Keynes 的公共工程，集体浪费，不能说不投入若干阴影在我的经济思想上”^{55.12.11}。

这段话在十几年后的“历史交代”中他又重复了一次。凯恩斯“公共工程”和“集体浪费”两个概念留给他深刻印象，令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类的“公共工程”不计成本的、疯狂的对人、财、物的“集体浪费”深恶痛绝。

紧接着，他开始阅读第三卷。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把原始积累作为经济史来读，把再生产理论与积累理论联在一起探究，再读亚当·斯密、李嘉图和凯恩斯，并且要学会批判。

这样读书，他感觉太过瘾了——这才真叫是读书，原来那样满足于读些“报章杂志之学”是多么浅薄和可笑啊。12 月 16 日的日记，他写了很大一篇，记录了自己读书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忧虑——

“大规模建设”与解决失业遥遥无期的矛盾；

批判马尔萨斯理论与提倡节育的矛盾；

工业不发达与大量轻工业设备闲置的矛盾；

大批市民与农民依然处在中世纪状态；

集中国家财力进行重点建设却发生货弃于地的情况；

深山探宝探出名堂却没有配套交通随后；

设计赶不上施工变成全国范围的普遍规律；

发展教育，结果中小学毕业生据说又嫌太多……

“归总到底，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适合。”^{55.12.16}他总结道，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要解放和发挥中国独有的、“神话一般”^{55.12.16}的力量——农村劳动力；工业建设必须使用现代技术，绝不能靠农业的落后吃饭；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建设要在自己国土上生长起来而不是靠输入；不能单纯追求高效率，首先要发挥农业劳动效率，保障充分就业，提高国民收入。

“认识这些问题本来不能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去认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我们自己确实无经验，不能不借鉴他国。从思维运动的规律来说，从认识的片面到全面……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客观实际再提高起来，全面化起来，路径是不能不这样走的。”^{55.12.16}

在马克思和《资本论》面前，顾准生平第一次“自惭形秽”——我算什么？“其实是停留在 Clerk（记账员、会计员）的水平上，庸俗的白领子工人，事务所职员，只配实用主义哲学”^{55.12.16}。比起他在延整时候的自我否定，这一次他要心服口服得多，而且不需要别人的训斥和教诲，是无声的马克思和《资本论》直接在训斥和教诲他。“真是高超的圣者”，他叹道，“我们只是白领工人，可是也得取法乎上，仅得乎下呀！”^{55.12.16}

顾准对马克思崇敬和尊重的感情是从党校时期真正建立的。他从此尊马克思为师，直到生命終了。日后他在政治哲学上的各种无情追索、尖锐批判和热嘲冷讽很少直接针对马克思过，别的权威和威权们可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即使在“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的极端境况下，他也常常为“吾师”开脱。纵观他面世的全部文字，他对马克思最不敬的情况大概只发生过一次，本书第四部中“西奈山的上帝”将有详述。

在二支部的课后讨论上，顾准的发言常常引起激烈的讨论和反对，这对于他的“改造”是不利的。“昨天的小组讨论，居然因为我的发言而引起争论。今后当考虑除掉准备发言稿外，是否说话”^{55.9.28}，不久他就觉出“有所感而不去轻易表示意见是完全对的”^{55.12.14}。可是他很难做到有感而不发。他的胆识——有胆去识、有识更胆，是无法压抑的个性，也正是萌芽思想的土壤。

带着“悟道”般的愉悦，他回家度周末，兴高采烈地把这篇日记读给妻子听，也告诉她小组讨论

的激烈场面。妻子静静地听完，叹了口气。望着比自己小一岁，结婚二十一年，共同哺育了五个孩子的丈夫，她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她深爱他，无比珍惜他，可也知道自己永远也驾驭不了他。他太出色了，出色到很难有人能真正理解他，除了她。可是仅仅她的理解又能给他多少支撑和帮助呢？

“唉，我永远也长不大的亲人，你怎么从来都闻不到近在咫尺的危险味道呢？你什么时候才能学到保护自己，而谁又能保护你呢？”

“采秀！采秀！你为什么要感觉寂寞？你不是告诉我马克思怎样引了笃伯格勒的话吗？” 55.12.16

彼时被译作“笃伯格勒”的，就是法国百科全书代表人物德尼·狄德罗——马克思最喜爱的文学、哲学家。他和列宁都喜欢引用其人的名句，例如“你最喜欢的……？”、“你最厌恶的……？”、“你最能容忍的……？”、“你最不能容忍的……？”等等，然后改换成自己的自白。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为欣赏他的一部著作——《拉摩的侄儿》，前者称之为“无与伦比的作品”，后者称之为“辩证法的杰作”。书中的一句话：“忍受孤寂或者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贫困不过是降低人的身份，但是孤寂就会败坏人的性格。”被秀抄录下来给他看。

秀啊，快振作起来，不要感觉孤寂，有我，有孩子们，还有书呢。

此时此刻的“大孩子”顾准，读得懂《资本论》，读得懂斯密李嘉图、黑格尔、考茨基，却完全看不懂妻子心中的孤寂。兴奋莫名的他，正跟孩子们闹成一团，滚作一团——

“稻头，咱们明天就去买冰鞋！一定要拉上妈妈一起去！”

“小米，高粱，五五，咱们都去，爸爸除了给姐姐买冰鞋，还要给你们买巧克力，买新手帕，有条件哦——必须带上小弟，还不能让他哭，不可以要妈妈抱他，你们要轮流背他。回来咱们比赛羽毛球，谁输了就得交出自己那份巧克力，谁赢了就吃双份！”

这是顾家在北京第一次逛王府井。孩子们和奶奶刚从上海搬来北京，看来上海人顾准要和他这一大家子人扎根“乡下”北京了。北京的一切，奶奶和孩子们都喜欢，可最喜欢的还是儿子和爸爸的眉头不再紧锁这件事。

望着五个可爱极了的孩子和这个可爱极了的“大孩子”，妻子终于微笑了。

“就让他随自己的性格生活吧，他值得我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去爱，去支持，去帮助。可若是我不在了呢？”她的心口又痛起来。

这样的周末让顾准又疲倦又高兴，“深感我有这样好的一个家庭，我的生活如此稳定幸福”^{55.12.16}。许久以前那本小书上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吗？身体胜于衣裳吗？”《圣经 马太福音 6:25》现在想起来真是有道理，我在享受生命，享受生活，我没有任何必要怨天尤人。为明天凄惶，那才真的是傻瓜呢。

可一回到党校他又后悔，深感惋惜——呀，又少读了一天书，“下星期日（我得）把《哲学之贫困》带回去，再（对秀）朗诵一遍马克思对普鲁东所作的结论”^{55.12.18}，“必须把假期也补充进去，否则没有办法完成工作”^{55.9.24}。

妻子和孩子们实际上是在和马克思、普鲁东、亚当·斯密、李嘉图们抢夺丈夫和父亲呢。

他太喜欢党校的学习环境了，“阳历年假这二天，痛痛快快地玩一下。阴历年，带些历史书，当小说一样去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学校里的安静环境的”^{55.12.18}。你看他阳历年还没过就忧虑着阴历年离开学校的环境，怎样安静读书的事情了，孩子们和书们的“争夺战”怎么打得赢？

1955年的最后几天，他攻读“积累法则”和“积累之史的考察”，包括（资本论）第三卷的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部分，还和凯恩斯的“就业论”对照来读。抽空，他上街去买了一本刚刚创刊的《经济研究》，发现有老友林里夫的一篇文章。读罢，他哑然失笑——全是谬论嘛，“此公思想方法实在蹩扭”^{55.12.20}。

看，他又不谦虚了。可是“我们的思想确实是贫乏的”^{55.9.23}，在深读过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后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学问不是用来卖弄而是用来产生思想，产生指导人类进步的精神的，我就是这样认为。至于别人怎么想，那不关我的事，我也没功夫，没兴趣代替别人思考问题。但既然生在中国，我多少要听秀（妻子汪璧）的话，收敛一点，“近日来情绪又上来袭来一股逆流。话说得太多，非其时，非其地，成为一股骄气的表现，今天在家，秀责备我是对的。”^{55.12.25}

他同时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他对列宁论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工资、工人运动

史以及第二国际的妥协历史，“总还觉不足”，就去查找从1900年到列宁死后的1929年英法美德诸国工人工资提高的情况，悟到“而这正是革命中心转移到俄国，转移到东方的原因”^{55.12.8}。

他同时也读考茨基的《土地问题》。这位被列宁无情地称作“叛徒”的马克思主义权威，改良主义者，却受到顾准同学的露骨追捧——

“历史就是这样，无论如何是继承性的。被表彰的，比起实在的内容来，总是表彰的多些。被批评的，却往往有些灿烂的珍珠，未被承认而确被使用着。完整的历史观点本来也确实不易啊！”^{56.1.5}

农历小年那天，他第一遍粗读完《资本论》，包括考茨基编辑的“第四卷”，用时大约是二十天左右。

好怀念当年爱多亚路上潘老板事务所里随便喝的咖啡，那是太能提神醒脑了。眼下他不大敢带这种“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到党校当着大家的面啜饮，就只好拼命抽烟。顾准原是不抽烟的，上海财税时期工作太繁重了，他学会了抽烟。可抽得最凶的一次却并非因为工作，而是那个闰年闰月闰日的夜晚，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室抽了整整的一夜。这几年他戒烟戒了许多次。这次为了马克思，为了《资本论》，他又开戒了，但感觉很值得。

抽烟可能是他在五十九岁上就死于肺癌的原因之一，他最后一次戒烟是在临终前半年。

到了年底，他下定决心：1956年绝不再抽烟！捻灭最后一支烟头，他“不抽烟已经二昼夜了，这回是用汕头蜜桔代替。有效无效不管，反正是吃糖好。——这回一定戒掉，说什么也不改变决心了”^{55.12.29}。

吃掉二元钱的蜜桔后，终于“现在橘子也已无须再吃了”^{56.1.3}。

二元人民币在1955年是一笔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财富”的款子，可是相比于顾准同学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重新认识了圣者马克思，通读了圣经《资本论》，那真是太合算了。

3. 初识黑格尔

顾准同学在党校和卡尔·马克思先生同时邂逅的，还有另一位世界级重量人物——格奥尔格·威

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先生。仅仅入学第二周，他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除开马、恩、列、斯不算，最重的一项，就是读黑格尔的《小逻辑》。作出计划的当晚他就开卷了：

“昨夜起读逻辑……逻辑一书，读得极有兴趣，最近期间，包括假期在内，准备读完此书，并做一定的摘记”^{55.9.28}；“愈向后，愈感觉不能没有逻辑知识。四时往后一口气读逻辑，今天还准备读她，并且也做了一些笔记”^{55.9.29}；“瓦因斯坦的介绍黑格尔，思想上给开了很重要的窍……不读形式逻辑，不会知道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思维规律的规定”^{日记 55.10.5}；“改造思想，以逻辑代灵感，反对以感想代政策”^{55.12.18……}

顾准的文字有个非常有趣的习惯——凡是他喜欢的、非人物的东西，他都用人物代词——“她”来带替，不喜欢的或者无所谓喜欢不喜欢的则都用“它”。对于黑格尔的《小逻辑》他最经常用到“她”，其特别的喜爱之心非常显见。

孩子们，完了，你们对爸爸的争夺战中又多出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黑格尔先生，你们的胜算更小了。

10月，孙定国先生的辩证法课程最后一讲，传达了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谢·斯·吉谢辽夫专门针对中共中央党校唯物辩证法教研室所做的“关于黑格尔辩证法三定律的第三定律——‘否定之否定’”的报告。顾准被这个报告“大大地振奋了”^{56.10.11}。

“否定之否定”命题在中国不知从何时开始，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东西，在马列主义理论界几乎可以形容为“不围铁丝网的禁区”。

这一著名的概念和理论，是黑格尔总结欧洲哲学史后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他用“否定之否定”来描述“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并用此作为构造其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

但是中国向来主流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的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却只提其前两条定律——“对立统一”和“从量变到质变”，很少甚至根本不提第三条——否定之否定。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先生在世时就要求哲学界必须坚决彻底地将“否定之否定”摒弃在辩证法之外。斯大林自己并不创造自己的辩证法，他只是阉割黑格尔，把‘否定之

否定’当做黑格尔的“糟粕遗迹”加以摒弃。其实用不着绕来绕去搞得这么复杂，一句话——他和他的主义只可以“去”否定，不可以“被”否定，就这么简单。原因之二是毛泽东先生承袭了这一理论王道和话语霸权，却又不如斯大林坦率，并未留下文字的东西，例如文件、指示、文章来确认对黑格尔这一“糟粕”的杀伐，只是讲到辩证法时尽量不提“否定之否定”五个字，均以“新陈代谢”，“辩证否定”，“扬弃”等等中西合璧的术语替代。

1965年毛泽东先生在《哲学批注集》中批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有如下一段批注：“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面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指黑格尔辩证法）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

中国的常态是，“解释”和“发挥”远比“原创”权威，从时至今日无论政府还是企业，要发布个什么告示都要在末尾严正声明自己保留“解释权”可见一斑。

“上有恶者，下必甚之”。

中国哲学界立刻三缄其口，从此谁也不敢再提“否定之否定”这个怪怪的词组，偶然提起，必曰“旧哲学之唯心主义辩证法”。“人民”在“解释”和“发挥”中开始的大规模“学哲学用哲学群众运动”，当然也可怜只有学上三分之二个辩证法，认识三分之二个黑格尔的缘分。顾准可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不好哄。要“解释”，要“发挥”，他也要自己的一套解释和发挥，但前提一定是不能妨碍对原著的理解。顾同学的“被振奋”基于以下三点：

“（一）确认了新旧之间中断而又继承的关系，这样即便由于实际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有暂时的宣传上对某一方面的强调，它终将走上彻底的历史的科学的真理论上去。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著作中伟大的基本思想，不会发生“是否暂时有所修改”的错觉。”^{55.10.11}

仅仅这第一条，就很可能是列、斯的苏俄和毛的中国忌讳“否定之否定”的原因。

不久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就要展开，“否定之否定”正是革命导师列宁先生所指的“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始祖——伯恩斯坦的理论依据。顾准对“修改是错觉”的振奋，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具备了“修正主义”元素。而“修”这个汉字曾是个可怕的字眼——三年后的1958年，毛泽东先生在谈及修正主义时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毛泽东1964年8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

“修”即是罪，每个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了解这个字的意义。顾准的许多文字，要么就不要示人，要想示人而不被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是不可能的。好在他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也就不存在“假共产党”的问题，但是“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这一条，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

接着看顾同学的“被振奋”：

“(二)……新东西之不可战胜，是由于吸收了旧东西的一切积极因素，又加上新的东西。这样的无限发展，这样的“否定之否定”（实际上这是发展了恩格斯，更不用说黑格尔了），自然而然地达到了历史的乐观主义。”^{55.10.11}

顾准一生都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这和他亲近黑格尔，亲近“否定之否定”原理大有关系。在多少高贵都被蹂躏和打碎的年代，他情愿“瓦全”也不学老舍、翦伯赞、傅雷夫妇那样“玉碎”，就因为他是历史的和乐观主义者。在那个特别混沌无序的十年（他只经历了八年）中，他相信的既不是名存实亡的“党和政府”，也不是虚无缥缈、呼啸来去的“人民”，而是历史。他相信迟早会有“我们历史上见”^{加缪语}的那一天。正是“无序到了头一定会走向有序”的历史乐观主义，让高贵、高傲的他活了下来，而没有像他的秀那样，连“先倒下来再说”都没能坚持住，自己先就了断了自己。

“这样的历史乐观主义，丝毫也没有那种（‘建立起人工的纪念碑’来纪念一代的丰功伟绩，即使不是公开声称‘达到顶点’，至少也是‘相当高度’，并且也不反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颂声）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勉强的符合的感觉。”^{55.10.11}

顾准这篇日记写于 1955 年 10 月 11 日，正是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动工之日。他对这些“人工的纪念碑”极为反感。几年后，当他从易子相食的河南商城回到北京，更是杜鹃啼血地发出“我永远也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的悲嚎。这些东西不就是那本书中的“金牛犊”和“力巴”吗？人造的它们真能不朽？真能万岁？深谙英美政治史的顾准对这些东西深恶痛绝，厌烦透顶，光是愚昧就令他恶心——“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东方某些国家也一样，你对那一套阿谀崇拜不觉得恶心吗？”（文稿 P392）。

顾准“振奋原因”的第三条是——

“再次确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允许以黑格尔式的三段论套到客观事物上去作为普遍规律”

55.10.11。

这一条，顾准很多年都放不下，直到 1959 年，他还在日记中写到：

“无论如何，辩证法作为认识过程的描绘与认识规律则可，作为世界图式则不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公布对恩格斯本人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那里充满着黑格尔的图式向自然界头上套下去的片断。80 年代前恩格斯曾有此企图，无论如何，费尔巴哈论以后，他是一直没有理睬那些片断旧稿，而那些片断旧稿的观点，与费尔巴哈论也是不符合的。”（59.3.5）

自认识黑格尔以来，他又兴奋又懊丧。最让他懊丧和无法接受的就是黑氏的那个“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或曰绝对意志，终极灵性）——“Absolutely Geist”——“Absolute Spirit”，这不就是神性，不就是神在世间最高体现吗？当神在人类精神中完全展现自己的时候，必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如果神是精神，而世界又是神的产物，那么很显然，世界也就是精神的产物。这种“精神”是独立于所有人，甚至独立于所有事物的。它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就存在着的一种精神性的本原。

这是和唯物论多么不可调和的唯心论，他一时很难接受。

可是他又很多年摆脱不了迷惑甚至迷恋的感觉。一直到 1960 年代后期，尤其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最后几年，顾准在哲学和政治哲学上对自己有很多“修正”，包括对黑格尔哲学思想“接受或抵抗”的修正。这个放在后面慢慢讲，话还是说回到黑氏辩证法的第三定律上来。

这一天顾同学因为“否定之否定”，激动得午觉都不想睡，和张双城同学“卧谈”不止。不过“因为愉快的兴奋，倒也很快入睡了”^{55.10.11}。起床后又是理发又是沐浴，孩子般无法表达的兴高采烈。

在真理面前，他可不就是个孩子。其实我们不都是孩子吗？只是我们大多不愿做孩子。有些人甚至想象着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就是“绝对精神”和“上帝”本身。许多年后顾准在读书笔记中狠狠地讽刺了这群人中最典型的一位，虽然至死他都崇敬他——

“XXX 在这里站得多高呀！所摘引的 Hegel（黑格尔）的话，其实是 XXX 自己从西奈山上发出的雷鸣。” 笔记 P438

从西奈山上发出雷鸣，除了上帝还会有谁呢？这种自我神化，自我显灵的想法是如此地具有暴虐意味，不能不使他产生厌恶的感觉。先卖个小关子，不提 XXX 是谁，把这个有趣的谜底留到最后。

除了读《小逻辑》，他也读狄慈根的《辩证逻辑》，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致赞许狄慈根的东西，他必须了解是为什么。此时初读，他对《辩证逻辑》中“全篇大谈上帝”^{文稿 P241}还非常不解。一直要到多年后，在他经历了更多，更深重的苦难，尤其是犹如“信仰洗礼”般的商城经历后，他才——“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或者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方懂得这并不奇怪”同上。

有了“哲学上的上帝”概念，他才有一种“悟道”的感觉，虽然这个上帝和那本小书中的“神”是不一样的，可是不知在哪一点上，它们又极端地重合。他开始有“序”的感觉，至少有了秩序的原点和标准，虽然还比较模糊。

12月中，中共中央召开了以“反保守主义”为重点的工作会议。

听过会议的传达，联系《资本论》和《小逻辑》，他有点起急——会议只“提示了方向，只是开端，具体的方案，连提都没有提起呢”^{55.12.16}。“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严整性的。问题实在还多着呢”^{56.3.3}。皇帝不急，太监先急了。

除了着急，他也“不免有怅惘之意”和“寂寞之感”，只得不断提醒自己“目前就是要好好读书”，不要像在延安时那样“闻捷则不安”。可现在他的不安不是因为“闻捷”而是因为“闻蠢”呀。

顾准从未因为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起过任何“恨意”，无论是对他的党还是对他的同志和身边人。这种对人不怀妒忌和怨恨的人是少见的，他们通常是在离群索居和沉思默想了一生，最终达到了精神上完美的境界之后，能抵御把别人看作是可能的对手的诱惑，因而也不把任何人看做是他潜在的敌人，而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并很难抵御这种诱惑。

至于动辄争论，一触就跳则是他的性格。正因为“恨”这个字不在他的人生字典内，形成了他对人不设防，动辄争论，一触就跳的性格，但这不是“恶意”。从他一生的言行、文字直到他的临终遗言——“我原谅一切人，也求一切人的原谅”，都有一种令顾准之所以成为顾准的、很难言说的高贵。特别是对他的国家，顾准明知她贫穷，落后，民众教育水平低下，传统粗陋，苦难深重，却依然无条件地热爱她。即使他如今只是党校一名“普通支部”（既然有普通，一定有不普通，我的一位朋友就在顾准的母校上过不普通的“市长班” - 作者注）的普通学员，他依然关心着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特别是在读《资本论》和初识黑格尔的过程中，他感到需要提醒和建议当权者、行政者之处太多了，多到他心急火燎。

还有“公私合营”，他也觉出有些不对劲——

“报上还在宣传上海资本家加入了房地产一起合营，还有一家拿出了495两黄金。房地产是丢包袱，拿出黄金一事就比较奇怪。需要观察一下，今后如何解决私有制问题”^{55.1.9.}

前几天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他做中心发言，“就拿已准备好的稿子拿去敷衍充数”，不料还是和大家唱了“对台戏”。他又有些忧郁起来——看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是假，连半假半真的也不能说。只要我一发言，一定会引起争论，接着就是扣帽子和大批判。

“这几天是1949年以来最热闹的全民的日子，北京打头，上海跟上，全部社会主义化了。我有些寂寞之感，批判过自己，但总无法遏止。那是一种下坡道的感觉。”^{55.1.23.}

他又有些摸不着逻辑的脉搏找不着北，连呆在党校读书也这么不消停。前几个月对党校安静的读书环境的感激之情在消退，他有些想走——我不需要正经上学，也从来没有正经上过学，书就是最好的老师，而读书的门道我已经摸出来了，直接向马克思、黑格尔老师求教岂不大家省心省事？还用不着参加这些劳什子的“讨论”，受些鸟气。

他一边开始“探听设法离开的可能性”，一边又拿否定之否定开导自己——“应该使自己更为心平气和一些，正如听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时一样，应该努力提到这个境地”^{55.2.22}。

恰在此时，老朋友孙冶方来看他。

眼下老孙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分管综合平衡，劳动工资和农业统计。这位上海孤岛时期的顶头上司和自己一直意气相投，苏北，淮海和1949年后的上海时期也时常见面。二人一谈起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就更是没完没了。总有话题，总有争论，争到面红耳赤是常事，赢家还常是老顾，可老孙从没舍得送过他一顶“帽子”，争完吵罢你爽快、我尽兴，两相宜。

在这位老哥（老孙比老顾大七岁）面前，顾准好生肆无忌惮——狷也狷过，狂也狂过，睥睨也睥睨过，可人家老孙根本不看——我喜欢和关注的是你的想法和见识，至于你做什么嘴脸，那是你的事，我没兴趣看。你这些毛病我也不是没提醒过你，你自己不改，那是你活该。可顾准这号的还就拿孙冶方没办法——你越是不在意、不在乎，我还就越是没办法狷狂和睥睨了，只好收起“嘴脸”，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讨论学问。

今天老孙来看老顾可不是没有目的的。

作为中国目前屈指可数、出身“科班”的理论经济学家，他已经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全本照抄苏联”的中国经济大盘上存在着巨大的谬误和危险，开始认真思考“价值规律”，并计划按照价值规律制定管理报表的办法。眼下各省递上来的数据统计，说句不好听的话，老弟，跟赵姨娘一样没有可信性。

可不是！咱们报纸上说“到1962年止要铺轨五万公里，我计算最后几年的铺轨要超过一万公里，因而认为不——可——能！因为如果铺轨一万公里，全年需要钢轨将达76X15000，即一百二十万吨左右……可惜关于这一点，手头缺乏资料”^{55.1.9}。

“我有！我们一起来搞！我也不当这个官了，你也快点毕业吧，我们一起搞经济学研究你看好不好？”

他们一拍即合。顾准心中也早就有了同样的想法和思路，只是被马克思、黑格尔、亚当·斯密、

李嘉图缠住了手脚，还没有静下心来落笔成文。一听老孙的建议，他高兴得无可无不可。别看人家老孙是个老“海龟”，莫斯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班出身，可他从来没有睥睨过我这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土鳖”，反倒是我常常睥睨人家“是一个不熟悉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拿不出什么深刻的主意，领导一般化”。唉，老孙，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容我慢慢改正缺点吧。

两个人都兴奋不已。只是老孙有点发愁——自己肝病老是不好，只怕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老顾则有点惆怅——谁知道党安不安排和怎么安排我呢？

4. 从信仰式寄托到事变式变化

党校也放寒暑假，1956年的寒假在2月，从上旬到下旬。

顾准的寒假读书计划是读史——中世纪史和新编近代史，前者来自尼基普洛夫讲义，后者是周谷城的《中国通史》，还要读苏联通史。至于列宁文选和斯大林全集的八至十三卷，那是学校要求必读的，特别是“地租编”，还一定要精读。对于列宁文选，他没有确定的目标，打算仅仅浏览一番。

顾准的书斋很安静。孩子们都知道爸爸读书的时候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他的注意力非常容易集中却非常不容易分散。这个时候谁要是打岔，那是不明智的。

可这个冬天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却很不安静。北方发生了巨大的事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先生做了震惊世界的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这个被所有中国人叫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东西其实完全不秘密。

二十大2月24日结束，赫先生的报告25日凌晨“出笼”，26日就将俄文本交给了中国代表团。它之所以成了“秘密报告”是因为赫先生作报告时未邀请任何外国兄弟代表团进入现场。但事到如今我们依然将它唤作“秘密报告”就有些不妥了，保密的不是人家，而是咱自己——《纽约时报》、路透社、法新社早就在3月初就全文发表了，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国家也早已尽人皆知，只有中国还煞有介事地保持沉默，连中共中央党校也要拖到4月5日才传达。

2月22日，中国报纸发表了米高扬先生在二十大上的发言，而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的发言前一天就发表了。

顾准闻到了异样的味道，但并不难闻，很清新。这一天他匆匆读了阿·托尔斯泰《彼得大帝》的第二部和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950）》。

“近在当时和远去几十年，历史常常要重写，而且一定是愈写愈近于客观的真实。争论的问题内容，归根结底还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所论述的真理的‘相对性’这一段。独断、绝对，当时常常不免，事过境迁，也就会发现正确之中有自己的界限，错误之中有一定的道理的。”^{56.2.22.}

直觉告诉他，“老大哥”那边出事了。但是此刻，他还估计不出事情的严重程度和对中国兄弟有多大的影响。

23日，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发言也发表了。老大哥那边还没有怎么样，中国兄弟之间倒开始“闯墙”，许多人声称“不解”，情绪激动。教室外，顾同学和岁数大他许多的“一个老头子”^{56.2.23.}——郑同学起了争执。两人怫然，不欢而散。人人都还不明就里，“不解”，“不能接受”和“反对”的呼声就占了上风，理由头头是道，言辞咄咄逼人。

他很后悔上午的争执——又忘了秀的话，和这些人争执“也许是多余的”^{同上}，可他总得有个倾诉的地方，秀刚出差去西安，要一个月才回来。他憋屈郁闷得不行。

“与张双城谈得稍多了一些，或许是太多了一些。”^{同上}“议论纷纷自然是在继续中，我还是说得太多，昨天开始刹车。”^{同上}

“日记不会出卖我”，他想（唉，顾同学，还没有到那一天呢）。这一天他写了很长很长的日记：“长期以来，在个人崇拜气氛下宣传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偶像观念……去年听……讲哲学课时，再三地说要读经典著作……说过去我们读经是读孔孟之作，而现在是读马恩列斯毛著作云云……孔孟之书几千年来在中国，实在是随各家注释，许多学说以释经、经注名义发表，这是一种畸形现象……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陈腐教条，实际则在提倡以读经的态度来读马列著作。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阶段，则一切对当前经济的研究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应用，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于僧侣主义何异！”

“但是偶像主义对于懒汉来说是十分适宜的。要获得对一个问题的系统了解——从历史的以致逻辑的，是要花力气的，而无条件遵循一种教条则是省事的。为什么封建主义总是表现为‘经典主

义’？因为文化不普及……因此偶像主义自然是有市场的。米高扬发言之所以被许多同志所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偶像，使他们精神有所寄托，还是方便而廉价之故也。

“其实历史地来看，这又是不足为奇的……四十年来，赖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才取得了胜利。这种组织性与纪律性，从1903年反对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之类时起，到时而容纳八月联盟的托洛斯基，到1920年党的统一决议，到清党，哲学联盟，以致到处以‘狂妄自大’的森严铁罩，把一切即属于学术性的，然而不合‘钦定规律’的意见格杀勿论为止……”

“正确的东西，发展到顶点，僵化了，在加特力教（天主教—作者注）就产生 Calvin（加尔文）、Luther（路德）、Huss（胡斯）的反动……历史自身一定是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前进的，这是无可置疑的……事情总会一步一步走向必然应该走去的方向的。”^{同上}

这篇日记，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党校“秘密宣读”之前整整50天写下的。

顾准并不是个先知。苏俄的事情他一直在关注，除了那个人（三年前他已死于中风）之外，赫鲁晓夫，贝利亚，日丹诺夫，还有哥穆尔卡，纳吉，季米特洛夫，铁托，斯兰斯基……，他都在关注，他料到迟早会有事情发生。

现在事情终于发生了，性质在意料之中，速度在意料之外。可是中国到现在还是“不动声色”，所有关于这个“秘密报告”的消息都不是来自正常途径，有外文报刊的，有道听途说的，有窃窃私语的。3月底，《参考消息》才刊登了波兰、意大利、捷克等诸国的评论，“据说外国通讯社有一种谣言传布，说各国享有斯大林式威望的领袖，只有一个中国，因而不公布材料云云”^{56.3.30}。这令他心烦意乱。

顾准已经结束了他的第一遍《资本论》通读，准备复习与考试。他又开始抽烟，但绝非因为考试，纸头上的东西对他来说实在太小把戏了。他处在一种亢奋与消沉交替出现的压抑中，糖和蜜饯橘子都解决不了问题。

三年前，这个人蹒跚着“下场”了。他曾是他少年时代的偶像，英雄，榜样和力量。自打从那本至今还留在手边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中认识他，他就下定决心，做人就要做他那样的人——仁慈、高尚，圣洁。他放弃了已经得到的一切，头也不回地追随了他和他的主义。二十四年了，他是他和许许多多中国人精神上“信仰式”的寄托甚至灵性上的支柱。可今天却眼睁睁看着发生了“事

变式”的变化——祭台崩裂，支柱倾倒，这尊高大镀金的雕塑就要难看又难堪地灰飞烟灭，泯灭了他对他的一切想象。残酷、卑鄙、邪恶取代了仁慈，高尚，圣洁。他难过极了。

三年前，当这个人死去的消息传来时他也曾难过，但那只是一次正常的死亡，人总是要死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次不同，这次是偶像的坍塌，金字塔的崩裂。虽然四十不惑的他早已不再有任何偶像，但他依然是他的英雄，也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孩子们的，也是秀的偶像和英雄——三年前秀不是还因为他的去世掉下过眼泪吗？

没有一位中国人知道彼时在苏联、在俄罗斯、在每一座“古拉格岛”上发生着什么，也没有一位中国人知道会有一位叫“索尔仁尼琴”的人在一本书中记录下了这一刻，日后这本书成为了俄罗斯文学中能 and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齐名的瑰宝：

“这是我的朋友和我曾经盼望的时刻……这是身在古拉格的每一个犯人都在祈盼的时刻！他死了，亚洲的独裁者死了，这个恶人蜷曲着死去了！啊，在这个特殊劳改营中，将会发出怎样毫不掩饰的欢呼声啊！可是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俄罗斯的女孩子们、学校的教师们却在大声痛哭……他们失去了一个挚爱的父亲……我真想用扩音器在那里幸福地大叫，甚至还想跳一支狂热的快步舞！但是，唉！历史长河的水缓慢地流淌着。我的脸已经练就了应付各种场合的本领，它立刻装出一副悲哀的表情。眼下我必须装假，就像以前一样继续装假。” 索尔仁尼琴 《古拉格群岛》

彼时的顾准还没有学会这种熟练的装假本事，因为他还没有被送进过“古拉格群岛”，那还要等到六年以后。到那时他不但必须学会并且很快学会了，比索氏还更进一步——他能做到“唾面自干”后还可以“笑靥迎人”并且习以为常。这是后话。

他没有像女人们那样流泪，只是又沮丧又亢奋，急切地等待着“变化”的发生——北方的变化可能会引起的东方的变化。

和北边苏联老大哥们有过许多接触的顾准，很不喜欢他们。这些人大都粗鲁、傲慢，有些甚至酗酒、色情，特别是那些“专家”们，他真看不大出来他们“专”在哪里，却专横和跋扈得厉害，在上海和洛阳，他都吃过他们的亏。在和东北的同志们接触时，有些风言风语他一直半信半疑，比如关于苏联红军哥萨克式的野蛮作风，比如那个忌讳莫深的“张莘夫事件”，尤其是对朝鲜战场斯大林引得

中国和联合国军迎头相撞。他一直有一种受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感觉。

这些年出于职业习惯，他非常关注“老大哥”的经济状况和他们公布的经济数据。从数字上，他断定他们的国民生活状态是处于停滞状态的，1954-1955年的苏联粮食总产量甚至低于沙俄时代。虽然老大哥在军事上相当鼎盛，能和二战暴发户美国一争高下，却是以牺牲国民生活质量为代价的。日后他将他们偏好的这种战时经济称之为“竭泽而渔”。

这令他吃惊、失望和愤怒。

“近年来苏联的实际情况：农业、工业的技术改进，建筑业的反对人工纪念碑，修改工资标准，

注1：**张莘夫事件**：张莘夫（1898年——1946年1月16日），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1946年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张莘夫时年48岁。张莘夫的被害曾引发中国全国性反俄运动，重庆，上海，南昌，北平，南京，青岛，汉口，杭州等中国各大城市发生示威大游行，要求“赤色帝国主义”（苏联）如约撤军。

——摘自《维基百科》

克服人力流动现象，多方面加强核算，加强价值规律的作用，重新强调重工业，反对共产主义的空论，学习外国等等，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注定要垮台的。”^{56.4.11.}

现在，他可以把说不出口的想法、问不出口的问题说出来、问出来了，可是从中共对待苏共二十大沉默、阴冷、迟缓的态度上，他立刻断定出——前途无法乐观。

“个人崇拜问题好解决，法治问题不好解决。帝俄与中国一样，是一个极端野蛮落后的国家。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三十年。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但发展助长了粗暴的统治，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活方式与准则。这些方式与准则，提供了一个发展斯大林式统治的沃壤，思想上则是绝对主义代替了辩证法。现在绝对主义推翻了，对于西欧革命无疑是取消了一大障碍，在中国呢？”^{56.3.29.}

他急切地盼望着“秘密报告”的传达，非常激动，吃不好睡不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有时抽得咳嗽起来，止都止不住。现在他已经管他叫“杀人凶手”^{56.3.31.}了，是他的“反阶级斗争熄灭论”同上杀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甚至怀疑三反五反也是在斯大林的唆使下搞的，“与斯兰斯基案件同时的三反五反运动，也会与这个杀人凶手有关系”同上。

“这个人将会变成有功的同时也是一个万恶的人”^{同上}

他作了一个在那个年头暂时可以被容忍的判断。但是对另一个人的怀疑和判断就非常的“出格”了——就在许多人还在为斯大林辩护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对列宁产生了怀疑。实际上，他对列宁的怀疑早在“秘密报告”的消息飞长流短之前就开始了。

“其实，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何曾仅止批评了斯大林。只要是打开大门，放进清新空气来，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价。例如，关于第二国际的整个历史评价，1939年近代史教程，是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教训”，可是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哥达纲领与爱尔福特的批评，从恩格斯1895年给法兰西阶级斗争所作序言来看，前后不完全是一致的……考虑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初期活动，起码是反对民粹主义的活动不仅从马恩的理论得到了力量，也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得到了力量（参阅左派幼稚病），那么第二国际，以及倍倍尔、考茨基等人的功过，其估价也应该有历史的，公允的结论。历史的发展自然已经毫无疑问的证实了列宁的伟大功绩，但只要我们承认‘历史的继承性’这一原则，承认相对真理到达绝对真理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天才独立完成的，承认历史上许多人投了一些‘小粒子’到宝库中来。对‘成功’的人，做绝对肯定的估价，与对‘不成功’的人作绝对否定的估价是同样不正确的，那只对于小学生才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简单，好记……童话的市场是在缩小中的。谁还要企图以只手掩盖天下耳目，并且企图甚至在身前把纪念碑、历史、传记全部钦定好，那真是天大的笑话！”^{56.3.4.}

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还满怀崇敬地沉浸在列宁诗一般的语言——“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和斯大林同志一样，只要有一点强过他，那就是较为耐心，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病重时口述中的时候，顾准已经开始怀疑他了。

从第二国际历史开始，从此人对卡尔·考茨基和奥古斯丁·倍倍尔的排斥和否定开始，如今又从他最终依然选择、支持了斯大林的上台开始，顾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列宁的遗嘱也公布了。斯大林的‘反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还没有人将它与列宁遗嘱连在一起评论”^{56.3.31.}

他结论道：“公平地说，我看应该是一件事（斯大林和列宁 - 作者注），否则杀戮异己又如何会取得一个理论根据呢？”^{同上}。

这两个月，顾准被强烈的幻灭感和颓丧感折磨得很厉害。一忽儿，他觉得自己最好的年华也已随

着这尊偶像的坍塌而逝去，“还是看清楚自己，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庐黄山拉倒了吧”^{56.3.13.}，一忽儿“又是梦中惊醒，情绪凄凉。激愤、凄凉，真的许会把我毁了的”^{56.4.2.}。即使在1952年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如此凄惶和愤怒过，那时的他决不打算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可这一次呢？这又是谁的错误？谁之过？谁之罪呢？

“1952年以来，已经冷静了整整四年了。那些痛苦……现在都已逐渐解决——很痛苦地解决了……那时还没有到达不惑之年，现在已经没有惑，已经到达不惑之年，却真正失去今后残年的方向了。”^{56.2.27.}

有两次，他竟忍不住胸中块垒的压迫啜泣起来，却即无声音也无眼泪。他想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地哭号一场，却没有力气。他感到窒息，肺里没有氧气，好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推到墙角，无路可走。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圣经》马太福音 9:12

那本书上他从小背熟的句子像篆刻在金石上一样清楚地浮上脑海。我是纯洁无暇的吗？我难道不是罪人吗？

“1949年以来，自己以为是有定见，有主张的，但仔细想起来也荒唐。现在我热烈反对教条主义，1949年以后在上海的一些主张，又何曾没有教条主义的成分？我这样一个人，何尝能够是大智大慧的？回顾一生，有几件事算是创造了些什么？当然，我还能观察人家一些空子，但如果很不冷静对待自己的本领，不是认真的，只好追踪屈原于地下——而且是一个极劣等的三闾大夫，跳窗口的三闾大夫。”^{56.3.13.}（重点线是顾准日记上原有的 - 作者注）

信仰崩溃的痛苦很多人都经历过，但对于我的传主这样敏感和聪慧的人，这杯苦酒格外苦涩。这些日子他常常欲哭无泪，手足无措。

“……事情确也十分复杂。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被过去的宣传过分肯定了的‘信仰式的寄托’，如今变了，在思想上简直是事变式的变化。透彻地解释这件事是必要的。”^{56.2.25}

他迫切地希望有人来给他“解释一下”，也试图从“辩证法”，尤其是“否定之否定”那里寻求“安慰”，于是又捧起《小逻辑》一头扎了进去，却又一次被“三段论”卡住，烦躁不堪。

秀总算回来了。妻子的倾听和安抚，仅仅是那口轻柔的吴侬软语也能使他慢慢安静下来。秀在，

就过得去。每个周六，她都为他准备一本和周围的混乱截然不沾边的书。她深知这个亲爱的“大孩子”看书如吃书，你不给他准备些清新的“小点心”，他就又会一头扎进滚油沸汤的大部头里去，那些书太耗精力，她必须让他换一换口味，换一换心情。

这个周末，她为他准备的是《安徒生童话选集》。为他挑书，她比为孩子们挑书还用心。看到他拿起来，翻开，读下去时的微笑，她也微笑了。

“公路上有一个兵在开步走——一，二！一，二！他背着一个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因为他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战争，现在要回家去……”安徒生《火柴匣》

是呀，我也要回家去，我也累了。有秀在的家是多么好啊。

4月25日，他盼了很久，又恐惧了很久的“传达”，终于来了。

这一天非常冗长，冗长得连日记都懒得写——“报告”加上列宁遗嘱，足足五个小时的传达。他疲惫不堪。那位专门挑选出来的、不知姓名的党校工作人员，就是站在那读、读、读，没有表情，没有手势，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人们就是屏住呼吸听、听、听，反正心的战栗谁也听不见，有些人的手在颤抖。

没有会后讨论的要求，也没有批判的要求，就是一声——“散会”，人就散了。走出礼堂的人们，鸦雀无声，万马齐喑。

顾准也没有一句话。他疲倦极了，也厌倦极了，只想早一分钟回到家，看到秀那张清秀、安详的脸。可今天是星期五，还要等上整整一天。第二天星期六，“听克里木科的讲课，觉得十分不耐烦，‘表现不好’……内心的激动实在非常厉害”^{56.4.6}。

顾准日记写到此处，忽然就出现了我已经很熟悉的字样——〔此处缺页 -编者〕。

缺页就缺页吧，他已经告诉了我这么多，加上还有他十三年后的“历史交代”作注解：

“这个极端反动的秘密报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份反动报告把我向堕落道路上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总的‘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法治’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于是，我就转到了怀疑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反动立场上去……我也把我国广大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信仰无限崇拜，诬蔑为‘神化’毛主席，是一种‘宗教现象’……我党各级党委，实际上实行的是政治委员制度，第一书记就是政委，党内民主是绝对缺乏的……。”

有如此注释，没有正文也凑合能懂了。

“缺页”中还有可能记录了他的噩梦——有几个人听罢“传达”能不做噩梦？也可能还有和秀的交流 and 秀对他的“劝诫”和“警告”。但是更多的，恐怕不是这些东西。看看“缺页”处的上下文就知道，大都是在他要发出极不符合主旋律的或者是“先知”式的声音时，文字必戛然而止。比如：

1956/IV/12 星期四——“这个思想体系（以不变的教条：列宁关于国家是专政的工具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竞争与无政府状态来看待一切中国现存的情况，而对大量存在的事实闭目不看，充耳不闻，深闭固拒 - 作者根据上文注），与以道德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在哲学体系上是一贯的，这是独断主义式的唯心主义，如果说这是教条主义是不公平的，不，这些人怎么会看不到事实？他们到底不是高呼皇帝万岁的人，而是掌握了大量材料的人，其……”

56.4.12 （此处缺页 -编者）

再比如：

1956/IV/25 星期三——“斯大林有无过左的地方？驱逐富农，以致二、三年间农业生产低落，可否改成另外一个样子？在布哈林、李可夫等的主张中有没有可以采取的地方？显然这里还存在着问题。至于斯大林对古比雪夫的暗示来反对托姆斯基，谩骂式的而不是说理式的争论，那就更多了，目前关于右派的问……” 56.4.25 （此处缺页 -编者）

他居然提到“右派问题”，此刻距离中国的反右和右派一词的流行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样的例子在全部的《顾准文存》中，尤其是《顾准日记》和《顾准自述》中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

“中国是否会有新的变化，是否冲击力只是到现在为止，且再看。大概看来，不会有什么新的重要的发展，恐怕就是到此为止的了。” 56.4.17.

“中国还是会变，虽然会变得慢一些。” 56.4.11.

他希望“变”，却又不抱什么希望。

他又在做先知式的、“胡说八道”式的预测，但事情也确如他所料。

5. 从“一点体会”到“一篇割记”到“一株大毒草”

1956年4月，毛泽东先生以苏联教训为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次重要的讲话，就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本人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同时提出要“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并称这一说法“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从题目、目录到详细内容、遣词用句，都迎合和鼓舞了中国知识界。千千万万读书人，尤其是读经济和读文艺的读书人，同声惊呼“久旱逢甘露，枯木终迎春”，刚刚平息了一阵的山呼万岁之声又平地骤起，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956年夏季学期将要结束时，主席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我不记得学校当局是否传达了，我只记得从同学那里抄了报告的全文，并且再三学习了这一报告。”

这段话摘自顾准写于1969年5月的“历史交代（二四）——从进入高级党校学习到堕落成为右派，1955/IX-1958/V”。可是顾准1956年的日记对《论十大关系》竟只字未提。

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到迄今为止最完整的《顾准文存》，包括《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文稿》和《顾准自述》四本。

四本文存中的《自述》，严格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从讲述者讲述时状况看，它既不是“自述”更不是“自传”，而是一份“文革、历史交代大全”，是介于“叙事”和“口供”之间的一份笔录。“自述”二字，是事隔近三十年后编辑们在万般无奈下，苦思冥想起的书名。

但《日记》却是至今有真迹留在后代手中，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文本。《笔记》和《文存》虽然有编辑者分类和冠名的痕迹，却毫无疑问也全都是顾准的文字，从少许的错误和笔误也都保留了下来，可见一斑。

非常遗憾的是还有他的一部分文字，包括日记、笔记、自述、文稿，从前后文推理应该是很珍贵，也许是最珍贵的，时至今日仍未面世。原因很复杂也很悲哀。但毕竟这些文字，尤其“日记”，都是个人信息，而保护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即保护隐私权，又是顾准最推崇的人权之一，所以遗憾只能留给时间去解决了。

但是假如你读《顾准文存》时能仔细把实时记录——《顾准日记》和事后的口供加口述——《顾

准自述》对照起来看，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除了真阳春白雪和假下里巴人间可笑的反差，两者间的互解、互补以及互相诠释更令你眼界大开——“原来如此！”

2002 版的《顾准日记》，仅“党校日记 1955/IX-1956/VII”部分就“此处缺页”多达十处。常常在你认为马上要看出“端倪”时，文字戛然而止，让你忿忿然，悻悻然，书空咄咄。遇上这种情况，不妨试试到《顾准自述》中去碰碰运气，很可能会有斩获——它们的互补，会将一件不连贯事情连贯起来。反过来也一样，若是你在《顾准自述》中看到太过不像顾准的言辞，也可以倒着找出他当年当月、当月当日的日记来，立刻就能分辨出哪个是真顾准，哪个是穿上了迷彩服的顾准，哪个是迷彩服穿得不太好的顾准，那个是“赤裸裸”的顾准，百试不爽。

上一章讲述的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故事就是个上佳例子：“交代”怎么讲，“日记”怎么说，“日记”怎么讲，“交代”怎么说，你只要对照一下，“删去”的就删不去了，“缺页”的也就不缺页了。但你也不要希望这样一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因为《顾准自述》也有无数“缺页”，还不止是“缺页”，编者干脆直接就标明“此处删去一段，约近九百字”，“XIII，XIV 两部分计七百余字，删去”，“这部分内容计二段，900 余字，删去”……等等，简直就是被人随心所欲地阉割和肢解，令你更加沮丧。

这些“缺页”，我倒是情愿相信它们是在逼迫过甚时被顾准自己撕掉的，但从他一贯的行为方式看又实在说不过去。再说从常识的角度这个说法也不通——你撕掉几页就能隐瞒反革命言论了？与其撕页，不如把它们全部销毁，岂不干净省心？况且按照“破罐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国粹，他好像也不必出此一举。因此“删去”就更明显是出版时编者干的了，但又绝不可能是责任编辑干的，倒是更像是后人在为顾准或别的什么人“避讳”着什么，很像顾准的母亲和妻子当年为这个不安分的儿子和丈夫刀劈斧剁，火烧水冲了很大一部分文稿一样，事隔虽已半个世纪，时间已是 21 世纪，依然被巨大的恐惧笼罩着。

好在这一章将要写到的“大毒草”，情况属于前者。顾准的迷彩服这回相当“劣质”，他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暴露”着，不光能在《自述》和《日记》中找到互补和差异，还能让你很容易就能

看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论十大关系》的出台，是1949年后中国全体读书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么大的事情，顾准的日记中居然只字未提。反倒是在4月底的某日（具体时间因“缺页”而不清，《论十大关系》已经出台）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八条，他逐条点评，最后顾学生替毛先生总结出的结论是：“Stalin（斯大林）功大过大？功大于过。”^{56.4.25}他猜测“中国是否会有新的变化，是否冲击力只是到现在为止”，他将“且再看”，可旋即又哀叹“大概看来，不会有什么新的重要的发展，恐怕就是到此为止的了。”^{56.4.17}。

这个判断是先知性的，与将要发生的，完全一致。

此时《论十大关系》已在党内悄然传播，身在党校的顾准大约是没有聆听正式传达的资格的，但显然他已经听见、看见并且立刻手抄了下来。《论十大关系》并非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也并非毛泽东的正式著作。此文正式发表，是在二十年后著者的第一个冥诞——1976年12月26日，媒介是《人民日报》，而正式收入《毛选》还更晚。《论十大关系》仅仅是毛先生的一个口头讲话，但是让口头讲话成为经典文献，在毛泽东那里本是寻常事，也是他习惯和擅长的工作和领导方法。党校学员顾准同学既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传达，却将这一万三千多字全文手抄了下来，可见彼时他是多么看重这件事情。

但他当年的日记却对此事一字不提！

不提也罢了，可他以学习这篇文章的体会写出了一篇和原文字数几乎相等的“读后感”——《学习毛泽东同志“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告中经济部分的几点体会》，这就有点意思了。

写个“体会”也就罢了，反正是党校布置的作业，大家都得写。可紧接着，他又把这篇“体会”扩写成了三万多字的“一个割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问题》，这就很有意思了。

到了1957年，顾准同学已经从党校顺利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经济研究所，他又把这篇割记改写扩写成洋洋四万字的一篇长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顾准日后一系列精彩思想产品生产线上第一件完美下线的成品，是开篇之作，开山之

作，当年就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日后更是备受推崇。这篇文章对他的老上司，老朋友孙冶方更是起了“惊蛰”的作用。老孙此刻正坐在“中国首席经济师”的位置上，看罢此文，如遭雷击，不顾死活地喊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学也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历史性声音，孙、顾也从此被“绑在同一架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生前到身后。

这就太有意思了。

“《体会》企图阐述国家在农产品收购中贯彻等价交换政策的必要性，探讨农产品收购中流入农村的购买力，怎样形成工业产品的最大市场，以及它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来阐述主席关于多发展一些轻工业，整个工业发展速度不会放慢，只会更快的指示。”

从上述“交代”看，顾准同学起初确实是在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写一篇命题作文，试图将导师的教导吸收为自己的知识，不是被动地死记硬背、生吞活剥，而是主动地汲取，消化和应用。可是顾同学发挥得太淋漓尽致，不是“跑了题”，而是“破了题”，破了天，把导师略略提到的一个小命题——“等价交换”演绎成逆天的“必然客观规律”——价值规律，并且“把它片面地扩大起来，写成了《试论》。结果《试论》就成了一篇宣扬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顾准真的是由于偶尔的心血来潮，不小心而因言获罪吗？看他当年的日记：

“昨天起，提了约计四千五百字的疑问，关于价值论的……摘录了资本论与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证，提八个问题……有趣的是，现在才懂得，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来是专门用来反马克思的。大概从1947年反世界主义以来，苏联经济学界恐怕也是在强调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感，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五章则成为拦路虎，这就需要有人出来打虎，斯大林就来担任大户的任务，可是实在这“编”不成一个体系。”^{56.4.11}

同一天日记——“苏联也正在解放思想的时候，我……就这么干起来了，现在反正已写成信，并且已经干脆送走了（这封信，很可能是顾准同学向《经济研究》杂志的投稿，但找不到证据，也很可能被退稿了 - 作者注）。要继续弄下去，就牵扯到一系列问题，小问题有货币论，大问题有道德规范式的理论系列……还牵扯到哲学方面……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恐怕要重新定一个计划，读经济学……”^{同上}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会“弄出毛病”，他哪里是“不小心”，他是早就“处心积虑”！

此时“赫氏秘密报告”尚未正式宣读，但早已在学员中流传，顾准同学肯定也已经知道近一个月，思考近一个月了。

“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人的尊严’”、‘社会主义法制’，陶里亚蒂的‘阶级专政怎样变成党的专政，党的专政怎样充数成个人专政’，艾德礼的‘没有两党制就没有民主’等等反动谬论……唤醒了我本来还未达到明确自觉的民主个人主义，使我急速地滚回到 1934 年以前的世界观方面去了。我认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强调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民主。我强调民主如此强烈，达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以致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经济问题上，他曾经压抑了很久的、“潜意识间认为是永恒的，无法替代的”市场体系、价格机制、企业内部的成本利润计算这一套秩序，如今形成了“有意识”的思想，“把从前强调的市场体系、价格体制、经济核算、物质刺激这一套秩序系统化起来”。至此，捋清思路书写成文，成了他迫不及待要去做的事。

如今不是倒了一个暴君，应不应该趁此机会为自己“洗冤”，“不是听了骂倒一个斯大林感觉痛快的时候，（而是）需要冷静认真地考虑一下问题”^{56.4.12}的关口。是的，问题这么多，这么尖锐，都是颠覆性的，颠覆了理想、偶像，也颠覆了自己。政治、经济、思想、精神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又无法和他人交流，他又痛苦又亢奋。

“问题还应提得尖锐一些。对西欧来说，议会稳定的多数是否意味着对列宁主义的背弃？”^{56.4.17}

“一百五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文化的普及，生活的提高，个人的觉醒与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初期的残酷野蛮的统治（后），在民主政治，国家调节经济生活（方面有了）长期发展，这算不算是社会民主党理论？…… 1895 年恩格斯对德国党的议会活动做出了与他们 1848 年不同的结论”同上，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不是说的好好的——“每个共产党员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吗？”可是每一次问过后什么都没有好结果？

“中国是否会有新的变化？是否冲击力这是到现在为止，切再看。大概看来，不会有什么新的重要的发展，恐怕就是到此为止的了。”^{56.4 月中旬某日}

问题太多，却很可能又不许问了。

到了5月份，他下决心先放下其他东西来读经济学，“至少把晚上的时间安排来读经济学”^{56.4.23}，从经济向政治推演，先看看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里。明知“这个时候读经济学，未免十分不合时宜”^{同上}，毕竟现在人人面临着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可他安慰自己“读这些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练习自己来判断事物。说起来也可笑，自诩为能判断事物的，可是实际上还不是跟着——无条件跟着跑。不应该这样。样样事情都要自己学习去判断。这就是读历史的好处”^{同上}。

他首先捧起来的，居然是《斯大林全集》。

“斯大林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是把自己30年前那一段“产品”绝对化了，教条化了，以致贻害了40年代与50年代初期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东欧各国的苦……”^{56.5.7}。（此处缺页—编者）

毛先生既然这次提出不要束缚思想，要有创造性，说苏共二十次大会使党走向正常，要破除迷信，对任何人迷信都要不得，虽然顾同学深表怀疑——“但这不是一句空话就能解决的。过去弥漫上下的空气，愈来愈严重地走上谨慎与肃杀之气，谁来创造？”^{56.4.29}；“怎样防止堕入盲从与官僚主义的世界里去？我们的孩子，应该防止掉到这样的坑坑里去的。而目前的儿童读物，又是再也超不过这个水平的。”^{56.5.27}但他同时也认为毛泽东“运用了马列主义，拒绝了斯大林的粗暴干涉”，只是“应该有一个希望，就是曾经跟过斯大林主义一小段，或者曾经自我陶醉过几天，希望今后永远不要再有”^{56.6.14}。

于是有一天在党校的课余，他铺开稿纸，开始落笔《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唱响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悲歌的序曲。

对《十大关系》一字未著的顾准日记，实际上在4月末以后常常提到它，而“不小心”写出的大毒草《试论》的前身——“体会”和“劄记”，更是在“事变式变化”的“秘密报告”之前就有了“预谋”并在之后有了成熟的思路：

“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问题实在还多着呢。”^{56.3.3}

“今天上午讨论价值规律……说了一下，似乎大家都不敢讨论的样子……拉了一阵算了。”^{56.3.28}

“我们的财政，现在是偿债而不是举债……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应该举债而不是偿债。” 56.5.7.

“轻重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军政费与建设费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提出……显然跟新的经济高涨有连带关系的……（它们）促成物资与财政的紧张，就必须使用一切现有力量，从沿海城市的工业潜力，到军事生产的向和平工业转变，全部动员起来……依托东方，开发西方。” 56.5.7.

“评 1955 经建公报……思想总结不做了，要写心得，就写这一段。” 56.6.15.

“下死劲写完那篇文章，聊度岁月。” 56.7.3.

“那篇文章已写起了……历史上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通篇看来，还不满意……所以费这样大的劲有三个原因，第一是问题太大，第二是水平不高，第三是现在的研究态度。” 56.7.13

最后这段话中顾准同学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真实的，第二个是谦虚但更是真诚的，第三个是现实而苦恼的——这是个禁区，更是个雷区。这一次，他是真的感到了自己的“薄学少才”，也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勇气。

“《试论》的写作前后经历约一年，直到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的后期才定稿。每一次改稿都扩大了论题的范围，更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和主席关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也就是和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指示相对立而止。”

大毒草《试论》最晚也在 1956 年 2-3 月间就开始酝酿了，且越写越长，越写越深，越写越勇。《试论》是顾准对世界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状况作了长期细致的观察，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积累了浩瀚的数据与知识后的一次爆发。这株大毒草并非如彼时那个毫无逻辑性的句式——“出笼”，而是由他精心“种”出来的，其萌生土壤是厚积薄发的知识，阳光雨露是关注民生的良心，助长肥料就是那个“又臭又长”的“秘密报告”。

第七章 事情正在起变化

I. 无字的 1957

随着〔此处缺页，党校时期日记到此完。 -编者〕字样的出现，顾准已面世的日记文字到 1956 年的 7 月 13 日告一段落，再见面已经是一年零七个月后的 1959 年的 2 月 23 日。

十九个月，时间能做多少事情？中国发生了多少故事？

仅仅人们现在已知的就有那么多——

中共召开八大、城市全面的公私合营、农村 96.3%人口加入高级农业社、增产节约运动、首届广交会召开、百万干部下放劳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开始、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并立即遭厄运、少数民族也开始整风、大跃进口号出台、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除四害、赫鲁晓夫出任联共第一书记兼苏联总理、英美核聚变试验成功、炮轰金门开始、中央电视台开播、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全国人民公社化、郑州会议、西藏“平叛”、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还有许多至今未解密的。顾准的事情，他的故事，也在其中，却缺了他一定写过，现在一定还在世，却无法出版，无法面世的 1957、1958 两年的日记！

1956 年 9 月，顾准同学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顺利毕业，需要按照党校历来的毕业分配方案——哪来哪去，回到建工部。他放下臭架子，求张三拜李四，再三设法，总算离开了“工部衙门”——中央建筑工程部，来到“翰林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这是他和老孙早就约定好了的事情，他急切地想来经济所“做和尚”，老孙却是急切地想要他来做“方丈”。

孙冶方 1956 年开始做经济所所长，从职位的角度看就是国家的首席经济师，而他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反倒成了辅业，是任他纵观国家经济局势的“大沙盘”、“气象站”、“数据库”以及培养年轻经济人才的“博士点”。可就算这样，他也早就不安于位，和老顾一样，一心一意想“出家”到经济所这座庙里来，安安静静地打坐读经做学问。

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先生先和“刚分配来的学生”顾准谈话，要他做经济所的副所长。顾学生坚决不干，说自己目前正处在“思想危机”中，只适合做悄悄读经的“和尚”，不适合做领导众僧的“方

丈”，张劲夫拿他没办法。

其实顾准对自己进经济所早有计划：

第一，“我对研究机关怀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神圣殿堂”的敬畏之念，在这里，不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还‘怕教授’”。所以副院长，您还是饶了我吧。

第二，《试论》正写得如火如荼，初稿还没有完成。我的计划是“要把价值规律从农产品收购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这是个大题目，这个当口怎么可以分心？

这第二条很实诚，可是人家开始却以为他嫌副所长的地位低了才不愿意去，弄得他哭笑不得，不得不再三解释，再三拒绝才算是说清楚；

第三，我反对“骆耕漠[当时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兼金融物价局长]当时倡导，不久还见于实行的生产资料降价措施……在我看来，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正确地站在阐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立场上……”，它“是‘违背价值规律’的，也是不合时宜的”。我的《试论》一朝写出，就是最有力的反证。

这第三条“最顾准”——他总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国家献“策”——提供经济上的方法，而且总喜欢用“刍蕘之献”来形容。这个在顾准文字中多次出现的成语，是他所有用过的词汇当中最中国、最谦虚的语言。

张副院长拿他没办法。就这样，顾准兴高采烈地走进了经济所——这座日后被康生先生叫做“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小庙”，做了个“长住”的和尚，日后又成为这个“浅池子”里三只最大的“王八”之一。

此时经济所实际责任所长是狄超白先生，又一位不受待见的中共经济学家。1949年前主编过《中国经济年鉴》，1955年主持创办了《经济研究》杂志，1956年主持制定了《经济科学研究十二年（1956-1967）远景规划》，眼下正需要精兵强将，集体作战。狄所长对顾准的到来非常高兴，久闻此人大名——会计学，财政学和税务学专家，不可多得的精英级将才。不过他也知道，此人不说天不怕地不怕吧，也是个天不服地不服的“铜豌豆”，相当不好领导。可是他要不是领导谁，而是要

他手下的“军机”、“章京”们把智慧加在一起，向更科学、理性和人性的经济学高峰攀登，向执政者们提供更准确的民情和更高明的国策。至于你是铜豌豆还是铁蚕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的能力只能是给你提供个尽量好点的“竹筒”来装你。所以“狄超白优待我，给我一个人占一间办公室，成天只是闭门读书，并且开始写作《试论》。到后期，狄超白一定要我担任财政组组长……”。

中科院院部也为他的家庭提供了彼时北京算得上“豪宅”的专家楼，就在如今寸土寸金的中国硅谷——中关村。

除了孙治方、狄超白，还有一个人对顾准的到来大为高兴，那就是顾准最“老”的老领导林里夫先生。林里夫九死一生从延整中活了下来，背着个“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包袱也到经济所来了，现在担任《经济研究》副主编兼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组长。老朋友，老冤家殊途同归，两人都不胜唏嘘。林里夫拿出一套自己正在使用的英文版《资本论》慷慨相送作为重逢的大礼，顾准欣然接受——这是一件不轻的礼物，不在其价值而在其附加物——志向的相同，学识的相近和对话的平等上，有“尺幅鲛绡劳解赠”之妙。

此时经济所正在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几个年轻人和党支部领导——狄超白，林里夫等人之间起了一场关于“青年人是应该先从做好老科学家助手做起，再发展自己的特长，还是老年人、青年人各人发展个人的？青年人也有权利争取做副博士，副博士不是老人的专利”之争。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审视，这个题目相当幼稚和可笑——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嘛，你是天才能无师自通，你就去发展你自己好了；你不是天才需要师傅引进门，你就去拜师学艺，然后再“修行靠个人”好了。至于“副博士”一词，先是当年剑桥牛津设的一个学位，相当于眼下的研究生衔，后来是苏联教育体系设的学位，相当于眼下的博士衔，而博士则是眼下的博士后，谁拿得出响当当的论文，还能被别人一遍遍引用，谁就去申请好了，年龄不是个问题，没有什么可斗可争的。可眼下看着不是“事儿”的事，当年却一直闹到《中国青年报》，闹到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那里。那是个“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年代，人人充满“斗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

如此口号中，人与人之间怎么可能充满爱和善意！于是青年人要打倒老年人，新人要打倒老人，老年人看不惯青年人，老人瞧不起新人，闹了个不亦乐乎，连胡耀邦先生也劝不住。

新老经济学家，青年人老年人（老年人也就四十来岁吧）都希望新来的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年人（顾准当年四十二岁，已足够老）老人（大会计学家，当然算得老人）表个态，支持谁，反对谁。顾老人没有表示态度。

从内心讲，他比较同情青年人，当年自己不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可他也甚觉乏味，人与人之间怎么就不会“讲道理”而只会“斗争”呢？有这个必要吗？这一次我那“敢说敢做，敢笑敢骂”的传主坚决地闭上嘴巴不表态——除了没意思，也没功夫，自打革命以后，他经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厌倦透了。这次他总算是做了件“对”的事情。

这事后来愈闹愈大，狄超白、林里夫两个 1930 年代的老党员居然就因为这么个破事被“搞”成了“狄林反党集团”，还牵连了一批老年人青年人，有些人为此一生没得到安宁。

他懒得理会，埋头在《试论》里，其乐无穷。

从“体会”到“割记”，从“割记”到《试论》，现在就要杀青了。像个待产的准母亲，他又兴奋又担心——孩子生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发表嘛，当然就在里夫的《经济研究》，她是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术刊物了。可是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他却没有任何把握——反响一定会有而且小不了，可反响是正是反就很难说了，后者的可能性要比前者大得多。反正我把要说的、该说的和很可能不该说的都说了，我的责任也就尽到了，剩下的，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也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他常常把这样的事情天然地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匹夫有“责”的责。这种现象在类似顾准这样高智商的人物身上好像是一种特质——姑且把它叫做“天才之为责任”。在探索顾准的过程中屡屡发现这种特质或者现象，是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除了扩写和改写《试论》，他也参加了一两次所里召开的、有所外的经济学家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去年毛先生倡导的“双百方针”。这回他可没闭嘴，“关于双百政策，发表过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歪曲这一方针的意见”。在和罗马尼亚经济学家们讨论他们国家的经济生活时，对于这个社会主义兄弟

国家至今还在厚待工人薄待农民，重工轻农的做法表示了明显的惊讶。这些都让也是“老运动员”的所长狄超白深感不安，为他捏一把汗——这颗铜豌豆又在铮铮作响，使眼色他不看，打岔打不开，又不能上去捂住他的嘴，真叫人后怕。事后顾准自己也嘀咕，嗨，幸亏我没当什么副所长，“这时候，我的右倾倾向已经随时有所表露，那时如果真由我负责经济所的领导工作，一定会造成工作上极大的损失”，还说不定怎么不可收拾呢。

恰好此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成立了一个“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是著名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科学家，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副主任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彼时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搭班子”，都需要组建成即有非党员科学家也有党内高级干部的统一模式，但由于一是195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后，理论上知识分子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入党的人很多，二是1949年后的各次运动中知识分子认识到不管地位多高，没有政治保护还是危险的，而“共产党员”就是最好的保护色，三是共产党要积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尽量吸收大知识分子进入党内，所以弄得到了综考会成立的1957年，非党的高级科学家供不应求，以致不得不由政府总理周恩来出面恳请大家留在党外，以备不时之需。

竺可桢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一直到1962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劲夫副院长再一次挑中了顾准，不料此人又一次摆出“不愿意”的嘴脸。这一回张院长不客气了——“你愿不愿意事小，党的任务你接还是不接，自己看着办好了”。

这一次他没了辙，再拒绝未免太矫情，也让张副院长下不了台，只好提了一个“你们院部必须保留我经济所研究员名额”的强硬要求，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乖乖上任去了，时间是在1957年岁末。

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由杜润生先生主笔，“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起草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草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当中来了。这个规划后来被许多中国读书人称作1949年以来影响最大最好的规划。

综合考察委员会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远景规划而成立的。综考会的任务，首先是调查中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治理与保护的科学方

案，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具体的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1956—1957年，中科院先后建立了6支综合考察队，分别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此外还有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参加的单位达100多个，1万多人次。

顾准亲身参与的综合考察项目一共就两项：1. 海南岛和雷州半岛橡胶垦殖成果和前景；2. 中苏联合黑龙江考察。中间插上了一起到新疆队的短差则纯属政治任务——协调汉维两族干部关系，维护团结，可以略去不说。

竺、顾两位主任的合作是愉快和谐的，但顾副主任在其他方面却又犯了大错误，何止是错误，简直就是“永世不得翻身”的罪过。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此话用在顾准身上非常精确。这“冤家”，上海时期遇见过，洛阳时期遇见过，这次综合考察又遇上了。上两次，他吃他们的亏，可还算不上伤筋动骨，这一次他可被他们害惨了。他们，就是所谓苏联专家。

先来看看事情的始末：综考会成立伊始，竺、顾两位主任就都认为“把综合考察委员会扩大到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规模是不现实的”，那是个极为庞大的考察、研究和决策机构，中科院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与之相比。两位主任一致主张综考会不建大机构，一是中国还穷，建大机构劳民伤财；二是综考会的任务不过是组织考察队分项工作，只用把考察报告送到部、委、办机构，让他们利用考察所得资料就行了。参加考察的研究人员自会抓紧工作，综考会无需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有一个办公室也就够了”。这让原以为顾副主任到职后要大肆扩大机构的综考会管理资金的副秘书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顾准随竺可桢行程的第一站是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考察项目是两岛1953年以来的橡胶垦殖成果。

是时新国家的“老大哥”——苏联与“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的军备竞赛正烈火烹油般不可开交，老大哥的军、重工业急需大量橡胶。可这种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偌大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却没有适合种植它的土地，而北大西洋公约国对华沙条约国绝对禁运此物。“大哥”的战略眼光自认而然

地盯上了刚刚建国的“小弟”——中国。早在斯大林还在世时期，苏联政府就决定贷款一亿卢布给中国政府搞橡胶垦殖，两国在斯大林时代后期，也就是新政权建立之初就签订了合作经营华南橡胶垦殖协定。根据协定，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必须以毁掉大片水田、荔枝林、香蕉林、椰林、原始森林为代价，大规模、强行推广种植橡胶。此协定深得斯大林之心，他甚至将中苏共同发展橡胶业与志愿军付朝参战相提并论，高度赞扬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巨大支援。

可是中国华南根本不适宜种植橡胶。“这两个地区种胶除小块地区外其他都是失败的”。作为世界一流的物候学专家，竺可桢早就警示过这一点。这一次竺可桢就是希望通过联合考察使苏联权威认识到这一点，为此他特别邀请对方一位九十高龄的植物学家参加这次考察，就是希望他能支持自己不再在华南发展橡胶垦殖业的主张。人上九十，倒过来算应该是沙俄时代已经开始植物学研究的老科学家，去政治，纯专业的倾向可能会大一些，竺主任可谓煞费苦心。

加上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政府已经片面毁约，我方经营此项事业的巨大损失早已成为既成事实，这次考察，充其量只剩下一个植物地理学的争论问题有待于解决”罢了。两位主任在否定华南橡胶垦殖问题上高度一致。

实际上顾副主任这会子还随身带着他那宝贝《试论》，准备在考察的途中进一步完善并彻底截稿。假如考察中遇上的新情况能让自己有新见解加进去，那就更好了。

两岛考察结果与竺可桢早前的判断一模一样——植被严重毁损，胶树却基本上无法生长，我方损失巨大。顾准坚定地鼓励和支持他以人大常委委员的身份，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份如实反映情况的报告。通过阅读和交谈，顾准已经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气愤至极。

竺可桢的报告递上去了，顾准因为并非人大代表，是没有资格签字的，但他事先一定看过并明确表示过他的看法。可惜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央并未理睬这份报告，至少海南岛的橡胶业一直搞到1970年代，最晚的甚至到了新时期才最后罢手。从1952年初中央军委下令从华南抽调近三个师的军队现职和复转军人赴两岛热带雨林开发，到1958-1962年又陆续从东北、新疆抽调大批复转军人赴海南

岛种植橡胶林，到1968年大批广州知识青年的下放，这一切错误的国策给海南岛大林莽的原生态和原住民，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如瑶族、黎族、僮族、畲族、苗族、京族……，带来了巨大的人文和生态灾难。

请允许在这里说一点我自己的家事，因为它和这一次“海南综考”关系太密切了：

我的姨夫吴子玉就是跟着王震将军，1961年2月从中国的东北角——北大荒“转战”到海南岛文昌县的橡胶林，在一个叫做“东路农场”的橡胶种植基地做了五年的党委书记。1968年2月8日深夜，他被残酷地枪杀在海南岛清澜港的紫贝岭，身中十六枪。那一个恐怖的夜晚，海南岛全岛同时枪杀了一百四十多名南下干部，都是汉族。1985年我曾陪着我的小姨，拿着王震先生的亲笔批示，到文昌县寻找姨夫的遗骨，一无所获。枪杀他的凶手还活着，1980年代初期坐了三年牢已经放了出来。他也已经是个老人，姓符，典型的海南岛土著之姓。那时我恨透了凶手，不知为什么政府对他那样宽大。现在我不恨他。了解了这一段历史，我能体会当年他们祖祖辈辈千辛万苦种出的香蕉林，荔枝林被推土机强行推平，在妻子和孩子们厉声哭号声中，他是什么心情。仇恨的种子那时就已经在他的心里播下了，十年之后，又是你们这些“大陆人”要搞什么“文化革命”，要打倒这些书记场长们，我们不趁乱杀掉你们更待何时？我那十四岁就参加革命，大尉军衔专业军垦，又英俊又慷慨的姨夫就这样惨死在远离他河北家乡的天涯海角，尸骨无存，时年三十八岁。

人们，假如你们当年听了竺可桢先生的一句话，假如你们相信一点你们自己派到综考会去的“党内高干”顾准先生的话，我的姨夫今年应该整整八十六岁。

顾准对海南岛、雷州半岛之行至今尚无实时的文字面世，人们写这一段，大都是从《竺可桢日记》入手。但我坚定地相信顾准也是有“综考会日记”的，且震撼力不在他的“商城日记”之下。

“1956年上半年，在苏共二十大逆流的袭击下我在哪些问题上堕落到了修正主义泥坑里去，已说明于上面第二节（关于“秘密报告”一节 - 作者注），这些反动思想在海南考察途中，在同行的党员同志面前有所流露，主要还是发泄……不满和牢骚”。

又是这些该死的省略号！除了“缺页”，除了“删去”，省略号也是探索顾准的大敌。这些无趣的点点有几个是顾准自己打上去的？你看《顾准文稿》和《顾准笔记》，他最不喜欢用的，用的最少的

标点符号就是省略号——这个所有标点符号中最不坦率，最诡异的一个。可历史岂是能被这些点点省略掉的？“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绝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 文稿 P249

2. 截流之坝，蓄洪之坝

3月下旬，两岛考察完毕，顾准回到北京。

他立刻发现北京的气氛与一个多月前离开时很不相同。一时间，人们怎么什么话都敢说了？万马齐喑几乎变成了“万马齐嘶”，你不“嘶”还不行，哪怕就是提一条“某书记太不注意保重身体”，“党支部应该多组织大家搞卫生”，“门前的水沟要淘一淘了”之类的淡话都行，就是不能不提，不提就完不成“任务”。

党号召全民都来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和提高，什么意见都行，党自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国的读书人向来不大聪明，给个棒槌就当针（真），还真就提起意见来。令顾准大吃一惊事小，让提倡提意见的人大吃一惊，这事儿就闹大了。

上年与《论十大关系》同时就出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简称“百百长互”。顾准没太当真，被“对革命的幻灭感”折磨得正苦的他，情愿去“体会”价值规律也无心去体会这个什么“双百方针”，“百百长互”，他认为它们是艺术界的东西，和他的经济学不搭界。可现在是怎么了？

就在他随竺可桢参加综合考察的这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先是2月27日毛泽东先生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用纯意识形态的哲学语言将他“在心中积累了很久”的话语说了出来。他解释国内外的种种问题，给党提供指导方针。关于“香花和毒草”就是在这个讲话里提出的一个譬喻——“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好一派大国盛世之君的满满自信和煌煌大度！

几天后，意犹未尽的他下令中宣部长陆定一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工作会议，史无前例地邀请了一百六十多位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界的非党人士参加，约占会议参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会议上他首次提出“党内整风要党外人士参加”。

这次会议在中国读书人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且全部是正面的。储安平、傅雷、马寅初、冯友兰、罗隆基、章伯钧、徐铸成、费孝通……除中共外的各党各派无一不是兴奋不已，众口一词拥护毛的讲话。

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真正认出并完全不相信这一套“匠心巨手，叹观止矣”，对“百百双互”不置一词，不发一言而终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安逝在自家床榻上的，就只有一个人——孙冶方的亲哥哥——薛明剑先生。这位前国民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1949年婉拒了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党派请他“出来问事，服役人民”的邀约，1957年又坚拒了“向党提意见”的好意，才得了这么一个“好死”。他在1957年5月12日的日记中白纸黑字地写道“虑不仅是怕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真高人也。

可惜顾准，在这种危险面前总是迟钝和弱智的，且屡教不改。回到北京，他像刚刚跋涉过大沙漠，又渴又饿的骆驼，一头扎进文字的水囊和草料里，大批量地阅读了各种报刊杂志——党内的，党外的，还千方百计查阅国外的。等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已经差不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立刻决定了自己的行为方式：

“我对于报纸上发表的许多右派言论，诸如诋毁肃反运动、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设计院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同情”。但，“我绝未在公开的会议上，或用文字参加过以‘大鸣大放’为名的向党进攻，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在和党员同志的闲谈中流露的”。

就在顾准呆在北京的短短两个月时间中，仅供党和国家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的前身——《参考资料》全文连载了南斯拉夫人密洛凡·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顾准迫不及待地别人那里借阅了它。这个东西对顾准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从他已经面世的文字看，《新阶级》是继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将他“地上天堂”——共产主义的“幻灭”彻底变为“泯灭”的最后一击。他从来没有读过如此一针见血地分析共产主义制

度的作品。

德热拉斯曾是铁托重要的助手，南斯拉夫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1954年因主张多党制和议会改革而被开除出党，接着是多年的牢狱生涯。

和单纯地站在政权的对立面批判不同，《新阶级》以德热拉斯自身的特殊经历对共产主义制度作了极为透彻的分析。本书写于1957年，即使今天来看，也不得不佩服作者惊人的预见性。此书的主要结论是，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并不会真正地建立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而是将运用恐怖和暴力维持一个垄断权力和社会的新阶级。任何共产主义国家，无论自称奉行何等意识形态，只要垄断权力的新阶级没有消失，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顾准一向就对进城后的许多老干部们以功臣自居，不工作，不学习，高官厚禄，压制或妨碍新生力量的成长深恶痛绝。虽然他自己也是个“老干部”，却主张对他们“赎买”——你们拿一份干薪回家抱孙子好了，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但这些都没有上升到德热拉斯那样的高度去认知和分析。当年毛泽东提倡全党读《甲申三百年祭》，他也是有感触的，但他对郭沫若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观一向质疑，除了肯定郭氏甲骨文研究成果以及基本同意他“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外，其余的，他都持不信任态度并准备在有时间、有机会系统读史后再做批判。所以他对此文并未像其他党内人士那样特别重视。

现在《新阶级》摆在他的面前。德热拉斯从哲学，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秩序的角度对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论”的分析、批判，比起《甲》文对闯王李自成进京后立即崩溃原因的分析，不知要高明深刻多少倍。

早就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出现的一个想法——对一种“要将一种生活方式强加在所有人头上”的东西的怀疑，现在慢慢明晰起来了。但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它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它是怎样发展和强大起来并且强大到可以奴役一切人的呢？

北京的气氛令他一时静不下心来思考。

他公开对人宣称“对林希翎、谭天荣之类的疯狂的反动言论有些是同情的，至少认为这些年青人有胆量”，对毛泽东的什么“阳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引蛇出洞——好打”的手段则十

分厌恶和抵触，“甚至模仿储安平的口吻，恶毒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

幸亏，北京和新疆的工作很快结束了，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大放厥词”。7月，顾准又一次跟随竺可桢，开始了中苏水利资源黑龙江联合考察。

这一次，苏方领队人叫涅姆钦诺夫，是个经济学家。此人比竺可桢还小几岁，却常常对竺先生流露出一种老子教训儿子的口吻，令顾准大为反感。但这不算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考察进行到要为中苏合建的水利工程选址时，中苏双方因为坝址选择问题起了剧烈冲突。

中俄两国因黑龙江水源争夺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即使大家后来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成了兄弟，可老大哥依然不允许小兄弟从黑龙江取水灌溉。这一次从黑河(瑗琿)开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为止的联合科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拦河筑坝，让哥哥和弟弟都有水喝。

以涅姆钦诺夫为首的苏方坚持要求将坝址选在黑龙江上游的海兰泡，而竺可桢则含蓄地表示黑龙江下游的太平沟才是一个对于中方来说最好的坝址。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国家利益在前，谁也不会胳膊肘朝外扭。

竺可桢主任希望能得到作为党内负责干部顾准副主任的支持。顾准当然支持！

对于竺可桢这样的“老教授”他本来就比较“怕”。此教授的专业程度他早已了解透彻，加上自己这几个月“临上轿扎耳朵眼”式的对水力学书籍生吞活剥的阅读，即使仅仅从常识出发，他也知道竺可桢的建议是对中方最有利的。顾准当即向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作了紧急报告，取得了他十分明确的支持，接下来就是双方各自为了本国利益的艰难谈判。

顾准和涅姆钦诺夫就在此时起了剧烈的冲突。

老科学家竺可桢，温文尔雅，温良恭俭了一辈子并已年近七十。让老人撕破脸皮去和苏方争执是不合适的，顾副主任义不容辞地冲了上去。他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从数据、逻辑、经济、效益、民生、发展这几个他的强项上撕开口子，咬了下去，死不松口。

作为两个国家的谈判对手，各自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坦率地讲，苏方也没

有太多可指责的。只是他们遇上这么一个谈判对手，真算是倒霉透了。

道理上讲不过他，他们就打算从气势上压倒他。涅姆钦诺夫把顾准叫进自己的包厢，本想像教训其他中国人那样好好呵斥他一顿。谁知这回他算是自找倒霉，碰上对手了——你讲专业他陪你讲专业，你谈历史他陪你谈历史，你说理论他陪你说理论，你操英文正中他下怀，你回到俄文他有最好的翻译，你还要不要操法文或者日文试试？他肯定奉陪到底！

顾准早就看不上他们那种不知打哪来的傲慢和优越感，又不是没见过，不过如此嘛。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是平等的，你要从道理上说得过我，我就服你。想凭大国势力压人？真要做大哥，让中国兄弟戴上俄国镣铐跳舞？休想！

“我和他谈话时，在这种傲慢态度面前绝未表现出丝毫的恭顺之意，反右斗争中也有人把这当作右派罪行加以揭发，我认为不是我错了，而是揭发者自己错了。”

涅姆钦诺夫暴跳如雷，操起一顶大“帽子”向顾准头上扣去——你，反苏！

其实涅、顾二人从考察开始就有成见。涅一直希望能受到邀请到古都北京去开个会，借机逛上一圈，这个讨厌的中国人以经费无预算为由就是不同意。某位中国植物学家同志想买几把十块钱一把的鲜花献给老大哥，他死活就是不批——十快一把？一个北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八块！

“你，你们中国共产党，怎么能留这样的人在党内？！”

倒霉的涅先生只看到顾准此时的倔强和别扭，哪里想得到正是他们的格鲁吉亚大叔在此人心中引起的痛苦和幻灭感，才是他老涅今天触霉头的最大原因。

不过公平而论，除了得理不让人，顾准确实是在迁怒。他不光是迁到老涅身上，你看看下面他十几年后，都在作“历史交代”了，提起当年的俄国人依然是不依不饶，怒火中烧，怒不可遏。而迁怒的对象是谁？你连想都想不到：

“黑龙江考察的苏方领队人是涅姆钦诺夫，从最近大字报的揭发中，知道他就是 1958 年在北京，1959 年以后在莫斯科，孙冶方几次向他乞求指导经济所工作方针，特别是平衡组建组方针的那个苏联经济学家……我却料不到孙冶方会如此彻底地实行张闻天的所谓‘拿来主义’，在他负责经济所工作的开始就去乞求这个傲慢以极的人为他‘定策’，向他‘取’数理经济学的‘经’。其实在数理经济学方面，涅姆钦诺夫也不过贩运西方的东西。应当坦白交代，如果那个时候我这个修正主义者当

所长，我要搞数理经济学，我绝不会向涅姆钦诺夫卑躬屈膝地去取经，我会要巫宝三，关淑庄这些人来翻译介绍西方的东西，也组织人翻译西方的东西，哪怕是搞修正主义，我也还要取两者之长，走自己的路哩！”

真是恨屋及乌啊。

顾准写上面这段话，时间已经到了1969年，老友孙冶方正蹲在北京的秦城大牢里，罪行嘛，也是因为“疯狂叫嚣价值论”，和他老顾基本相同。本应同病相怜的顾准写到此处，虽事过多年依然是余怒未消，大骂没出息的老孙，恨铁不成钢。落难中的老孙，人都坐在牢里了还被你骂成这个样子，到底还是有些不厚道。

就连受了涅姆钦诺夫不少窝囊气，顾准为之狠狠出了口恶气的竺可桢老先生，也被顾准的怒火吓着了——“我也觉得（顾准）自由主义太重，主观深”，他在日记中写到。

即使时至1957年，“反苏”依然是一桩非同小可的罪行，离中苏彻底撕破脸皮的1960年代还远，更要命的是有位中国黑龙江省的陈同志一直站在涅先生一方。这位同志一封信把顾副主任告到了中科院，除了他对苏联专家的恶劣态度，还有考察途中的各种右派言论，例如他在北京期间听到和读到的各种极右言论，加上该同志自己的诠释，例如到处宣讲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例如关于对苏问题如国界、领土、拆迁、汇率、华南垦殖、贸易等等各方面的非议……最严重的是他把毛主席一口一个“老和尚”叫了一路。就连那几把没买成的鲜花也成了顾准“对老大哥大不敬”的罪行。

一向大度的顾准对此人也不宽容，文革时写过一篇《揭发陈剑飞》，还巴巴另加上了一篇《关于揭发陈剑飞的补充》之类的东西。比起好几桩他对待其它要他“揭发”的人和事，情愿被打死也不肯作伪证的案例，比起他能少连累一个人就少连累一个人，情愿自己多受精神上、皮肉上的苦也绝不咬上别人，他这次确实俗了一点，虽然揭发的都是事实。

可你要说顾准一路上都在找老大哥的别扭，招黑龙江同志的不高兴，那就又错了。

就在北京呆着的最后几天，他终于把《试论》截了稿，投给了《经济研究》。老友里夫也不含糊，六月号就刊载了。顾准拿了多少稿费现在查不出来，但应该不低，毕竟三万七千多字，又是一流的稿子，一流的写手。他现在正兴奋地等待着反响，又兴奋，又紧张。

而此时，贴着八分钱邮票的告状信也已经截稿、发出并很快起效了。8月——

“当黑龙江考察途程结束，在哈尔滨开学术讨论会的时候，谢鑫鹤（综考会副秘书长）有信给赵峰（综考会临时党支部负责人）催促我们尽早回京，但是我心里就有点嘀咕，为什么这样的信不直接写给我？”这一回顾准总算是事前就嗅出点危险的气味，也算是历练出来了一点初级的“政治功夫”。

太平沟大坝终因中苏很快分裂而弃建。

太平沟大坝最终没有建成，却在顾准的政治生命河流上筑起了截流大坝，一下子就彻底截断了这条原就曲折、崎岖、坎坷的河，涓滴不剩。

可上帝是公平的，他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顾准的“太平沟大坝”截流了，可与此同时他的生命之河却因着“太平沟”的截流开始关闸蓄水。待到开闸的一天，大水将携雷裹电排山倒海般倾泻而下，发出无法计数的能量，照亮千千万万颗人的心。

顾准自己生前没有看到这一天，他早已随这一泓清澈的生命之水流进大海，融入永恒。

3. 从幻灭到泯灭

8月底，顾准回到北京，立刻感到情况不妙。“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毛泽东反右的初衷很可能并不像薛明剑先生预测的那样，真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从政治、历史、哲学、逻辑和常识的角度看，在一个新国家正逐渐走向兴旺，人民情绪还算安定，在野人士还算安生的情况下搞这样一场运动，无论对共产党还是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无谓的和得不偿失的。1957年冬春之际毛先生想要“整”的，很可能还是他党内的“同志们”——他们的居功自傲，刚愎自用，卖弄学识，头头是道，自以为是，喋喋不休，早已令他从厌倦到嫌恶，从嫌恶到憎恶。苏联，匈牙利和波兰的“事变式变化”和对斯大林“物伤其类”之感的日益加重，令他烦躁不堪。于是才有了2月27日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将他“在心中积累了很久”的话语用“纯意识形态的哲学语言”说了出来，成为一纸在党内开展一轮新整风的动员令（这一讲话和日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有很大区别的，请读者注意）。接着才有

中宣部长陆定一召开的大规模宣传工作会议，邀请了几乎全部显赫的非中共人士参加，他在会上首次提出“党内整风要党外人士参加”。

“外人介入家事”，本就不是个好事，这个道理连村夫村妇都懂。但是毛先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看见成千上万人围着高喊“万岁”就以为一切都会在自己巨手的掌控之中，风何时起，雨何时住都是挥手之间的事情，眼下不过用“外人”整一整“家人”，使他们听话些，乖巧些也就罢了，而家，是决不能乱的，更不能让“外人”当了家，这才是最大最大的“大是大非”。

于是就有了“大鸣大放”——让外人骂骂家人，让家人知道自己在家算老几。

许多过来人，无论是否右派，是否受到过“反右”的逼迫，提到1957年，都说那是一个“最让人心情舒畅”的年头，他们所指都是该年上半年“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毛泽东要“借助外人整家人”的短暂时日，是“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正普降甘露的日子，满打满算不足半年。

此处“家人”，并非指全体共产党员，而是一部分被毛所憎恶的党的高、中、低级干部，前者是他“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僚，后两者则是他听取汇报和推想“必然如是”的人群。

岂料人算不如天算，鸣放过程的难堪就不提了，除了“外人”的穷凶极恶让他始料不及、大吃一惊之外，家人的“叛家投外”更让他恼羞成怒——这还得了，外人起哄，家人架秧子，竟然一起“搞”起“家长”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事情”就这样“起了变化”。

毛泽东先生立刻清醒过来：御外还得亲兄弟，护家仍需父子兵，家人终归是家人，外人终归是外人——家人可以日后“关起门来打狗”，先把堵上门来要“帮着家长整家风”的外人痛击回去才是刻不容缓。

至此，反右不得不为之。薛明剑先生的“先见之明”不过是歪打正着罢了。

从1956年，已执政七年的“极峰”顾准语下同出现了最初的对高级同僚的猜疑，妒忌和不满，这令他发动了“外人”整“家人”的“双百运动”，继而马上又感觉不对劲，又发动“家人”整“外人”，全民整“外人”的“反右运动”。之后，他在依靠“家人”或依靠“外人”的选择上反反复复，用顾

准的话叫“匠心巨手，叹观止矣”，但也可能是不得已的下策。老人家一直折腾到1976年9月才算正式谢幕，彻底消停下来，离反右正好二十年，离延整三十四年。除了他的人格特质导致中国这种极特殊的现象外，也和新政权的执政者们因为几乎个个都在基业未成时跟着“北方吹来的风”在朝左暮右，暮左朝右的“意识形态”中摸爬滚打，对左右斗争形成了“心因性成瘾”，有着直接的关系。

回到北京的顾准没有慌张。

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也是摸爬滚打过的，但几乎次次都是因为“右”（包括上海时期那次，虽然眼下又被说成是“左”）。比起那些初见世面的人，他的心里要平静和坦然得多。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左”和“右”是能被随意摆布的“条件性概念”，它表达不出实质性的东西。他也从不拿左、右说事。

先是张劲夫副院长听取综考会竺可桢主任和顾准副主任的汇报。对太平沟-海兰泡之争，副主任未置一词，只叹了口气。预感更坏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综考会秘书长就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批判“老运动员”顾准的新右派言行。这样的小会开了二三次之后，最后一次由张劲夫主持，“明确点出我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这实际上已是宣布我被划为右派了”。

恰巧（不如说是不巧），《经济研究》1957年第三期发表了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文不仅在经济所而且在全中科院、全国经济学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并在倏忽之间就成了大毒草，陷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境地。

关于《试论》，因为过于专业，将单列一篇，尽作者能力通俗、细细地讲来。这里先略过。9月，

“经过一二次中型的揭发会议，立即转入批判斗争我的右派罪行的大会，召开大会前，科学院党组分发了《党内右派分子顾准的右派言论》这本小册子，推测起来调查搜集这些材料的工作，在小会开始时或开始前已在进行之中了”。

这本小册子里已经包括对了《试论》第一轮的批判文章。连续四五次批判大会之后，顾准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一天的批判大会格外隆重——时间选在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地点选在中山公园里的中山纪念堂，人物是中科院党组全体成员出席，“革命群众”则有一千多人。顾准对于这样的安排

还是“相当满意”的。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都要求要“做得像个样子”，最讨厌“婢学夫人”式的不伦不类。

是时中国，遍地右派。批判会、斗争会白天开，夜里开，天天开，时时开，数不胜数，可像批判右派分子顾准大会这样规模和档次的还真不多。再说经济所大部分他看得上眼的人物，除了孙冶方，很多都已经是右派了，狄超白、林里夫、章良酉、章有仁……再多个自己也算不上个事儿。再说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钱伟长、章乃器、沙文汉、丁玲、吴文藻……，这些让我“怕教授”的真正的教授们都是右派，和他们排在一起还真不丢人。

“主角”顾准的登台亮相也比较精彩：红红白白的大字标语，震天动地的革命口号加上各位领导的正襟危坐，在典型的中国京剧式主角即将登场的热烈气氛中，顾准稳稳地从舞台一侧走了出来，整洁的中山装，宽边眼镜，紧抿的嘴唇，睥睨的眼神，一上场就是个“碰头彩”——好一个大右派，“打倒……严惩……”，革命群众的革命口号喊得更加惊天动地了。

人们一个个上台去发言。这又有一点点像西方芭蕾的剧式——配角亮相，拿出自己最精彩的身段，完了再退至台侧。除了揭发、批判，群众们还要加上质问：

“你说你要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你是不是要取代周总理？”

“你在上海，为什么反对民主评议？”

“你为什么反对苏联老大哥？为什么多次在华南和黑龙江难为人家？”

“你恶毒攻击毛主席，管他老人家叫‘老和尚’，居心何在？”

“你为什么同情葛佩琪、雷宗海这帮大右派？”

“你为什么同情林希翎，谭天荣这帮小杂种？”

……

随着一位位群众代表的或揭发，或批判，或质问，或仅仅表示一下自己的愤怒，顾准索性把嘴抿得更紧一些，身子站得更直一些。四十二岁的他正当壮年，只要不上“武斗”手段，问题还是不大的。除了有些人指着他的鼻子质问，不小心愤怒的唾沫星子飞上他的脸上略感恶心之外，其他还都承受得

起。他深知如此场合，如此气氛，你纵有一万张嘴最好也别为自己辩护，那只会让你得不偿失。你现在不是被告而是罪人，记住，不要奢望申诉和辩护的权力。

他早就“肯定地”认识到了自己一个最大的错误：

“我只在一个问题上肯定我是‘错’了：三反撤职以后我不放弃，累次提出申诉，愈是这样，我愈‘倒霉’，从此以后我绝不再申诉，党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

从综考会回到北京那天，他就开始读史了。

“读史”对于他，永远是一剂最好的镇痛和安慰剂，也是他次次在批判会上都能身杆笔直的支撑——1939 被撤职并“清算顾准路线”时，1952 年被撤职并“接受党和群众的批判”时，1955 年在洛阳时，1956 年在中央党校时，他都用读史来度过最艰难的时期。读史给他的精神力量从某个角度看要远远超过家庭和妻子给他的安慰和支持。特别是在他被彻底排出“母体”后，在外人很难想象的残酷环境中，在妻子因不堪重压自戕后，在五个孩子都对他背过脸去后，他都靠读史“苟活”了下来，而他自己也创造了历史。

眼下，已经没有“班”好给他上，到了 9 月，连“职”也正式撤了，他就等着停薪了。他知道这一招是必然要来的，倒也不慌，不在其位，不食其禄，他和妻子已经准备好。

“我闭门家居，除在宿舍房前开一小片土地种蔬菜外，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读已出版的马恩列斯的著作，读了一批西方历史的书籍”。

他又一次进入 1952 年被撤职后的状态中，精神上感到极度的干渴，强烈需要补水——攫取新的知识，从知识中获得力量。那一次他拿起的第一本书是《几何初步》，因为彼时最感困惑的是混沌和无序，他渴望触摸逻辑，循着逻辑去摸索事物的“原点”或“起点”，弄清楚“我”到底错没错？错，错在哪里？没错，没错在哪里？中国好像就从未有过真正的数学和逻辑学，而这，是不是她经常性地处于混沌和无序的原因呢？

那一次他从几何入手，未几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后来在上海和洛阳的建筑业工作中他都没有间断数学的学习。在党校，他先是将数学和马书（马克思书），亚书（亚里士多德书）、黑书（黑格尔书）放在一起读，读出许多别人很难体会的新意。但当他一旦

意识到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后，立刻就跨出了对数字和图形的迷恋，一步从圆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丛林跨入了历史的平原。他贪婪地阅读一切能够到手的历史书籍，差只差一个正式的读史和研史的详细规划，因为醉心于《试论》，因为综合考察而没有去制定和实施。

这一次他要正式规划了。从历史下手，从中到外，从东到西，从古到今，由此触摸这个世界和他所属的这个物种——人类，找出秩序和规律。

“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目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目前没有萌芽的。” 57.03.08

他深信今天的历史昨天一定发生过，明天，太阳也绝不是新的，只是重新升起罢了。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就是秩序，就是规律和逻辑，就是“道”。

他下决心做一个历史的观察者和探索者。没有同行的伴侣，更没有团队，他也无心、无力呼朋唤友以壮声势和胆量，他只能是一个孤独守望的观察者，单兵掘进的探索者。他立志做“独行侠”的想法并非出于无奈而更像是有意识地要远离一种什么东西。假如不是“独行”，这个东西就会如影相随，它会妨碍、阻拦直到毁掉他读史、研史、解史，前瞻的进程计划。

他警醒着，不让它靠近。

“我要‘独自探索’，表明我离党愈来愈远了。思想上与党离心离德，只保持一个组织上的服从……。” 自述 P250

几年来他总是感到身处一种类似“模子”的东西里面，这种感觉已经很久了，“痛”感愈来愈尖锐却很难言说明白。起初他将它当成是革命的磨练，是打碎“旧我”塑造“新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痛苦。可是越往后他越感觉不对。

撇开自己的遭遇不谈，1952年的“统购统销，梁黄叫嚣”、1953年梁漱溟的“笔杆子杀人”、1954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到1957年的反右……，尤其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他听说有个县的农民每个人的后背都订上一个阿拉伯数字，取消姓名，按号叫人派工，他惊悟了。这个模子似的东西，就是专制者泯灭每个自然人个性和特质的工具。它要将一个个不同的“人”挤压成一个个无个性的被治者，一个个号码。这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人人都是自由和尊严的”地上天堂——共产主义何止是格格不入，分明是背道而驰。

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让他的思路更加明晰起来——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它要根绝“人的意识”，将人放入被告知“无害”的模框里，并告诉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天堂，万不可企图跳出来，因为就连通向地狱的路也是好意铺成的——

“他们想出了最反人道的口号——‘根绝人的意识’，而且他们就依照这句话去做，好像是在根除树根与莠草，而不是在对待人类的思想。” 密洛凡·德热拉斯 《新阶级》

他不能忍受这种从肉体到精神彻底的奴役。他要挣脱出来，肉体不可能也要从精神上挣脱出来，无论如何，在所不惜，否则，毋宁死。为此而读史、研史和解史早已不是什么兴趣或者爱好而是钳碎模框、冲破牢笼的斧钺。

他还需要时间，现在上帝给了他时间。右派的身份使他即刻丧失了工作的权力——不可以做研究也不可以写文章或翻译文章，更不要想什么“刍蕘之献”、“策论”之类的东西，他没有了工资却有了大片的空白时间。

实际上到了国庆节那次大型批判会前，他已经做好了一个读史计划并开始实施。除了读书，他还大量地读报，“其中有关反右、双反（反浪费，反保守 - 作者注）运动和经济问题的报道社论等等，还摘抄了一些卡片”。他的心更踏实了，“并没有引起 1952 年三反撤职和 1965 年再度戴上右派帽子时的那种激动心情和悲观情绪”。

到了秋凉 11 月，批判会也就渐渐没了新鲜感，没了气氛，未鸣金就草草收了兵。此时的顾准，幻灭感已然平复，甚至连泯灭感也没有了。尘埃落定，一片清凉。

“那时候心情所以比较‘平静’是因为……我对这些问题还要探索”，“我感到‘幻灭’的总是比较抽象的问题，由此我决心要‘进行探索’，而不是躺倒不干了”。

幻灭-泯灭之后下定决心要去“探索”的顾准，“事情”也已经“起了变化”——根本的变化，是那种蛻蛹化蝶的递嬗和蛻变。借用一个辩证法术语，“量变”已经“质变”。

4. 我的社会观只能是人本主义的

顾准在 1950 年代的一系列被批被整和 1957 年的打成右派，彼时中国根本就算不上是回事儿，只除了一点点——非常小又非常刺目的一点点——在这些揭发、批判他的人的名字中，有些被人们十分熟悉和敬重的名字。例如侯外庐。

侯外庐，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史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资本论》德文中译第一人。他著作等身，仅看书目就令人肃然起敬——《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宋明理学史》……。侯先生还被称作学术研究中最少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社会发展史方面，他首先和最重要的一条学术思想是“研究社会史从研究经济学入手”，这和顾准“研究经济学从研究历史入手”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侯外庐来批判顾准的世界观，可谓“用人得当”。侯先生对顾准的批判从世界观下手，可谓一矢中的，可惜顾准对侯外庐的批判评价颇低：

“1957 年反右斗争中历次会议上对我的批判斗争，批判了我反对毛主席和反党的言论，也批判了我的反苏言论和对 1952 年三反撤职的不满情绪……指出我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只有一个侯外庐……侯外庐的批判虽然十分软弱无力，当时也曾使我有触动。”

很可能侯外庐先生的发言是唯一能使顾准“有所触动”的批判，毕竟它点中了顾准的“要害”——世界观。顾准这次不好太难睨，毕竟侯先生问到了点子上。顾准对侯先生的批判可能不是“评价颇低”，而是唯一评价了的一篇，其他的，他连提也懒得提——他们可以成为探究对象，无法成为对话者。

顾准的世界观是什么？

“我的社会观只能是人本主义的。”^{59.3.5} 他坚称。

“社会观”者，离世界观不甚远，这是他的日记文字。再看他的“坦白交代”文字：“民主个人

主义还是我的根本世界观，斗争形势要求暂时放弃它，斗争的目的却是要实现它。”

这是顾准写于 1969 年的“坦白交代”，没有丝毫隐讳，连目的、手段、前因后果都“交代”了——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民主个人主义”的实现，为此甚至不惜暂时放弃她。当然，上面两者都不是他当场给予侯外庐先生的回答。再骄傲的人到了 1957 年也知道在批斗台上说出真话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这是他在日记和“历史交代”中宣称的。

他一直有一个疑问，从党校时期就开始了，但苦于无人可以讨论——为什么马恩最著名的著作之一、《神圣家族》的前身、1932 才被发掘出来并当年既以德文出版，直到 1956 年才有了俄译本和中译本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经济学哲学批判》（也做《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或《1844 年手稿》），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一直无声无臭，很少被人提起。即使提起，“迄今为止，人们还只敢提到其中否定的辩证法，不敢提到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二重的禁忌：一是马克思-费尔巴哈的关系，妨碍马克思的神化；一是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与阶级性的对立。陆定一还说人的本质就是阶级性哪！”

59.2.24

这部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光辉起点”的马克思早期作品，引起了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转向，逐渐从政治学 and 经济学转向哲学，将被神话成无产阶级上帝的马克思先生逐渐还原成他当之无愧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促使了所谓西方革命的新思想——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956 年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首次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中文并出版，顾准在党校时期读了此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异化”理论，但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1957 年顾准从内部读物全文阅读了南斯拉夫“最大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此书首次使用“异化”概念论述取得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如何走向自己的反面——原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异化”为官僚特权的“新阶级”。

此书对顾准震动极大。“德热拉斯的大读草《新阶级》，对我起到极其恶劣的作用”，他第一次注目“异化”一词和异化问题，大量相关论述将出现在他 1960 年代的文字中。

哲学术语——“异化”由黑格尔原创，意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并支配自己的东西，例如造“神”又被“神”压迫，造出“观念”又被“观念”控制等现象。异化的典型表现是

非理性、反科学和唯科学主义。

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大人物都头疼不已的这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论述“异化”集大成之作。在研究“人”的基础上，他提出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明显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

费尔巴哈是要把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把天国生活还原为现实生活，要人们相信自己，为追求现实生活而斗争。他是德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的、公开的同基督教决裂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指出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

但自从恩格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于1888年出版，以及它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创立的基本标志后，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思想截然对立就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铁律——马克思是“神”而费尔巴哈是人且是错误的人，马克思著作将成为和基督教《圣经》一样几千年不能改动一个字的绝对真理，至于马克思临终前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微弱声音，是无人听见，即使听见也是无人会去理会的。

但是有些人不会被这套东西迷惑，例如德国人马克斯·韦伯，例如奥地利人艾瑞克·沃格林，例如中国人顾准。

顾准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相信已经“变成铅字”的文字的人。他要观察这些东西变成铅字前的背景、状况，它们的前生今世，来龙去脉。为此他会比较各种版本，排列出版时间，挑出其中的变化、取舍，问上一个或多个“为什么”，最后才决定相信，还是不相信。而这些变化、取舍往往十分微妙，很难被人发现。

他这样读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

“读费尔巴哈论及提纲。1845年的提纲与手稿基本一致，其中还没有唯物史观的因素，只是实践哲学而已。其中还有一系列的中间媒介。再读一些东西就会知道。”^{59.2.25}

仅仅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他就读了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1845年手稿和1888年被恩格

斯命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为自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而公开出版的读本。

他反覆地比较它们，发现“基本一致”，但其中“还有一系列的中间媒介”^{59.2.25.}，他要把这些中介统统“旁路”掉，直接攫住马克思的本意。

“《手稿》全称《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本世纪 30 年代才被发掘出来，列宁未及见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生前从未发表，查苏利奇（？）等俄国革命家曾指名想读此手稿，恩格斯不给（参见《回忆马恩》一书）。《费尔巴哈论纲》十一条，一直到 1888 年《费尔巴哈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发表时才附在篇末发表。可是，恩格斯写《费尔巴哈论》的时候，真可以说竭尽了一切力量来遮盖“逻辑=神学”的性质，简直把辩证法写成了进化论，把 Hegel 写成 Marx+Darwin（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 - 作者注），把 Marx（马克思）写成“反对不可知论的培根”了。” 文稿 P439

不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有几人曾经注意过《手稿》这叵测幻化的。马克思的《论纲》和恩格斯的《论》为何存异？两篇著作对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区别何在？大人物们为何拒斥《手稿》？恩格斯的论点前后为何不一？人本主义与阶级性相悖在哪里？

“甚至你把《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作极粗糙的对比，你也能发现这一点。比如说‘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在《反杜林论》中特别着重，在《费尔巴哈论》中，不仅没有这样明示的文字，连这样的精神，都不可能在《费尔巴哈论》的字里行间找出来，唯有极其细心地读《费尔巴哈论》，体会那里论“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篇章，才可以知道那里在反对不可知论，亦即在十分委婉地主张唯理主义。” 文稿 P439

那么“异化”、《手稿》、《论纲》和《论》、《新阶级》……，它们究竟相关在何处？

读书不唯书，尤其不唯它最后约定俗成的版本，是顾准的标准做派。请看他的党校早期日记，彼时“秘密报告”尚未“出笼”，《手稿》尚无中译本，“异化”一词还没有几位中国人听说过：

“这几天曾经怀疑为什么有些文件如此绝对，又如此富有“套”的意义？……辩证法本来是否定教条的，辩证唯物主义绝对肯定的东西只是根本问题与反映论观点，只是认识的相对性及其无限发展的可能，一切独断主义是别人加上去的東西，不能由他们负责。看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之间的取舍（发表哪些，不发表哪些），就看得出其郑重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令我极其愉快的。”^{55.10.5.}

“极其愉快”？是的，极其愉快！因为他的怀疑被证实，困惑他已久的问题被部分解答，追问和探索从此开始了。他怀疑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很可能并非马克思的真意和一贯的思想，而是后人，甚至同时代人强加给他的。如此读书已臻炉火纯青，再看不出歧义、破绽和相关，那才叫怪了。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确确实实是“千条万绪”。本来马先生就是位记者，写字是他赖以谋生的职业。同时他也是位哲学家和思想家，这是他的“天职”（和顾准相似）。他的文字千条万绪，汗牛充栋毫不奇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一套凡六十册，就算马克思的文字仅仅占去一半，但除了专业人士，有几位中国人曾经通读过，哪怕就一遍？

从马克思先生的中学作文、考试卷子和博士毕业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起，到1882年他去世的前一年写下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序言》止，谁能、怎么就能肯定五十年间他所有的精神产品都是稳态不变，且都是一贯正确，且都是顺应了历史的进步？再看：

“列宁因为是一个实践家，所以坚持恐怖主义——专政这个方面，他对马克思学说的推崇超过接近马克思的人，其实各方面是列宁主义，非复马克思主义了。” 59.2.25

顾准对列宁主义的怀疑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党校期间经历了苏共二十大的重大变故，了解了斯大林体制的生前身后，他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应该同罪。前面提到他对“一系列中间媒介”的怀疑和排斥，除了针对恩格斯，更强烈的还是针对列宁。

“我接受马克思人本主义=自然主义这个方面，罗素说这个方面是与工具主义相符合的，我就接受工具主义。” 59.3.8.

紧接着这段话的后面，就是他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名篇奠基式的句子：

“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天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目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目前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的对未来的预言。” 59.3.8.

顾准的社会观就是相信自然，相信人类，相信人类的经验。

除了顾准“人本主义”社会观之外，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顾准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的。

“人们既身处于历史过程之中，又各以自己的哲学语言反映了对历史的态度。各人有各人的哲学，却都假一个已成思想体系之名来进行争论，孔夫子对中国，基督教对欧洲，黑格尔对德国，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者，事同一例，又何必深责呢？”^{59.2.23}

这段话极其精彩，摘自他 1959 年 2 月 23 日刚刚续上的日记开篇。这几十个字以中国式语言，简练地、彻底地否定了“意识形态”概念，将人，至少将他自己，从那个他“一看到就头痛”的“绝对”中解放了出来，从那个他深恶痛绝的“模子”中挣脱了出来。

与顾准同时代（1900-1985），1938 年从纳粹铁蹄下的维也纳九死一生侥幸逃亡美国，后来成为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奥地利裔美国人艾瑞克·沃格林先生，在他的《自传性反思》一书中这样说：

“有些人原本不那么愚蠢的，在其日常事务中也拥有相当诚实这种次级美德，但为何他们一接触到科学，就会沉浸于知性上的不诚实。毋庸置疑，意识形态是知性上不诚实的现象，因为，种种意识形态终究无法反驳批评，而任意阅读文献的人都知道，它们是站不住脚的以及为何站不住脚。如果一个人仍信奉意识形态，显然可以认为，他在知性上不诚实。知性不诚实这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愿意沉浸于这样的不诚实。”^{自传性反思 P45}

沃格林对于将“知性的不诚实”公然强加给别人极为反感，导致他“反对任何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或者任何什么主义的”，因为在理性分析批判的意义上，各种意识形态都与科学水火不容。他认为任何人，只要他是一个意识形态分子，就不会是个称职的社会科学家。顾准用温和的中式语言和沃格林用激烈的西式语言所表达的对“意识形态”的憎恶，从语义和语意两个方面都极其相近。

“我的社会观只能是人本主义的”^{59.3.5}。我信仰人类。“信仰人类可以允许建立学派，宗教式的信仰，就要建立异教裁判所了”^{同上}。

他就这样回答了侯外庐先生以及所有人提出的那个问题——你的世界观是哪种意识形态的？——这就是我自己的“意识形态”，我的社会观，也是我的世界观。而既然仅仅是我自己的，那就不如干脆把“形态”两个字去掉——这就是我自己的意识！

1950 年代后叶，尚未经历炼狱——商城劳改队的顾准还是个不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换句

话说，不是个“彻底的，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极笔语）。这一点从他对德国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那部“全篇大谈上帝的”的《辩证法逻辑》从质疑：“狄慈根公开把辩证法等同于神学，但是未受“斥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文稿 P347 到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方懂得这并不可怪”文稿 P241 可见

一斑。他信仰自然，信仰人类的世界观与其人道主义的精神始基有高度的一致性，以致到了后来，崇尚“人道”成为他最大的罪过，仅仅在商城劳改队就被批斗了无数次，到息县干校劳改依然不肯放过，怎么检讨也无法过关。他索性破罐子破摔，直接怒骂“人间何世？”^{59.12.8}、“狗道主义！”^{70.8.6}，宣泄他的愤怒和不耐烦。

“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在英文中原是个相同的单词——“Humanism”。顾准在这一点上倒是和中国的另一个“罪人”——鲁迅的亲兄弟周作人有着相同之处。周作人先生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也许是关于顾准世界观——民主个人主义和社会观——民主社会主义的最简单和明确的解释。

假如你能接受这一点，那顾准花那么大的力气，拼命要弄懂出现在马克思、费尔巴哈和狄慈根著作中，恩格斯却又竭力要掩盖的“人本主义”思想，还有他在 1960 年代对两个少不更事，在自己就读的清华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外甥所说的：“与其研究共产主义，不如研究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本主义。”^{当事人口述}就不难理解了。

无论是人道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是专制制度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敌，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在他的时代连小学生也明白这个道理，也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人物们拒斥“异化”，拒斥《手稿》的真正原因。然而顾准在他生命之树最成熟时期所追寻，探索，领悟和向往的，早已不是人们被教诲的、作为国家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为万物尺度的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

除了艰难的哲学思辨结果，顾准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还有一个世俗因素：

“我在潘序论那里过了十三年的社会职业生活，所做的工作，是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工具

的会计。潘序伦的社会联系是多方面的——他是美国留学生……他的主要政治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我在潘序伦那里的十三年，正是我思想定型的年代——从 12 岁到 25 岁，弥漫在“立信”这个机构内的，表面上含混、并未以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能不对我产生异常深刻的影响。”

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本质是什么？就是将“个人生命中适当的道德目的定为追求自身的幸福或曰‘合理的自利’”，就是尊崇“唯一与该道德观吻合的社会系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这个主义的哲学是将人类当成英雄一般，以其幸福作为生命中的道德目的，以其建设性行为高尚的目标，以理性为唯一的原则。

如上的认识和表达，无论如何，1957 年的顾准还做不到，而它却是个政治学上的常识。

5. 母体，或者模子

讲到顾准的世界观，讲到他 1957 年的故事，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那就是综考会的党外人士主任——竺可桢先生。虽然在综考期间，每当竺主任为了中方的利益和苏方产生分歧时，副主任顾准都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对他的评价并不太高。来看一则竺可桢日记：

“……（顾准）到去年来院时常批评党，说共产党做事如猴子种葡萄，种下后又一下拔起……我也觉得（他）自由主义太重，主观深……” 竺可桢日记 57.9.5.

竺先生对顾准因被人告状“反苏”而成为右派深感不安，但也并未挺身而出，为“两岛橡胶垦殖”与“太平沟-海兰泡筑坝”事件中顾准奋起为国争利的行为辩屈，事后在顾准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也没有为这位副手开脱哪怕半句。

那年那月，竺可桢先生自己也陷在痛苦中，且自身难保。

他的长子竺津，1937 年十六岁时即由父亲亲自送上抗日的前线，却在 21 年后和顾准一样被打成右派分子，外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因为少年的他抗日时参加的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国民政府军。他也几乎和顾准同时被送入血吸虫肆虐之地的劳改营，死于这种“华佗无奈”的小虫。竺先生多年挚友、浙江大学物理系一级教授、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也没有逃脱这场政治灾难，只因 1944

年被国民党重庆军令部技术研究室借聘，研制并研制成功了中国首部雷达！

可就算是这样的丧子、丧友之痛，也没有阻止竺可桢先生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周恩来先生请其“留在党外”的劝说无果，经过党“多年考验”，1962年竺先生终于入党并在1974年得以党旗覆盖遗体离世，享年84岁。小他25岁的顾准同年去世。

顾准曾在给陈敏之的信中谈到竺可桢先生和他的一次对话：

“竺可桢有一次对我说，他去美二三次，美国现在道德水平下降了，这是因为宗教精神衰落了。事实上，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教呢。” 文稿 P248

竺先生谈及的“现在”，当然是和他当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哈佛大学做学生时的比较，他的叹息当然是惋惜而不是庆幸。竺、顾谈话不过是五年前的综考途中，一个人世界观的转变真的会如此的轻易和彻底？假如不是，那有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能把一付付曾经的铮铮铁骨挤压得如此不堪且形状一模一样？

任何人写顾准、探索顾准、评价顾准，都不应该在赞扬他的同时贬低他周围的人们，况且顾准身边出现过的人，无论有趣还是无趣，都不是青面獠牙、无知无识的草莽人物，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社会和人群中的佼佼者或比较出色者，他们和顾准、和你我一样是凡人，有同样善、恶两面的人性。可是顾准为什么总是在人群当中显得鹤立鸡群，有时更是和人群格格不入？除了他的出类拔萃和孤傲狷介，还有别的原因吗？

“批判必须继续，批判而不入于杨必入于墨是不好的，勉强地（而）不是以一个自觉的思想为基础的不入于墨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身在掌权的势力圈内，不有贰心是容易的。身处群众之中，不在势力圈内，既批判。而又保持坚定不移的立场，这是不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确是比什么都重要。能够达到这一点，自然是一件高兴的事。” 59.2.23

这是顾准在被开除党籍十个月后写下的日记。

如果说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年他还说不大明确的，那种像“模子”一样令他痛苦，怎么努力也无法“格格而入”的东西，现在他对它已经慢慢认识了。在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之前，他姑且用“杨朱”之说暂时代之。如果说顾准革命的早期是一直在努力去格格而入它，那么到了1950年代

的后期，他的努力已彻底翻转，变作了一种竭尽全力去挣脱它的努力，“以一个自觉的思想为基础”

59.2.23，像脱蛹前的蝴蝶，拼了命地挣扎，要出离茧壳。

他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早了几十年意识到这个类似“模子”的东西的存在。早在党校时期，他叫它做“铁罩”——“到处以狂妄自大的森严铁罩，把一切即使属于学术性的，然而不合‘钦定规律’的意见格杀勿论为止”^{56.2.23}。其实这个东西有个现成的，由西方哲学家起的名字，叫 Ideology，中译众口铄金叫做“意识形态”。

Ideology，工艺家可以叫它“模具”或者“模子”；数学家很专业地叫它“模型”或者“矩阵”；医学家偶尔叫它“子宫”；生物学家喜欢叫它“基质”；社会学家不大确定地叫它“制度”或者“体制”；哲学家严肃地叫它“观念”；革命家们则兴高采烈地把它叫做“意识形态”。

特别是从马克思 1845 年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始，这四个字简直成了专制国家的“宝典”和“秘诀”，后来竟成了某种公职，一种纳入国家行政编制，行使政府职能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职业——“管理意识形态者”，例如德国的戈培尔，苏联的日丹诺夫。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至今都有“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文革就不去说它了，那十年反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很难看到哪位意识形态大总管清晰的身影。到了 19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个身影的轮廓就比较清楚了。只是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还没有一人的知名度能够达到戈培尔或日丹诺夫的高度而已。

殊不知这个来自西方的词汇原是个贬义词，远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的思想，近可查阅拿破仑把他不喜欢的哲学家叫做“意识形态家”的轶事。这个东西最方便以君临的姿态笼罩住所有人类的社会生活，令绝大多数人产生恐惧并因此而臣服，只有极少数的人对这个东西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并深怀警醒。例如希特勒时期“白玫瑰小组”的索尔兄妹、斯大林时期的索尔仁尼琴、英国人统治下印度的甘地、种族主义泛滥时期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

再例如，中国的顾准。

这些人的可贵并不在于他们天生的真善美比别人多，而是他们有意识或下意识地保护着心底最深处的那簇蓝焰——人性不被它的强势泯灭，但也可能反之，是那簇蓝焰保护了他们至少在人的高度上不被装进那个“模子”而永远地被它桎梏和奴役。

顾准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早了几十年意识到这个“模子”的存在，为了剥离出来，他不惜“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并在血、汗和泪水中把这种“剥离”的过程记录下来，用文字对抗它，痛击它。

顾准熟读并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边沁”主义代表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篇《论自由》。篇中穆勒如是说：“如果等到生活已经被压成差不多一样的模子再来抵抗，那一切不同于这个模子的差异就会被看成邪恶，不道德，甚至乖戾，违反自然。人类只要在一定时间内不常看见多样性，就会连多样性这一概念也飞快忘记了。”

就如西方人后来那个特别、特别不礼貌的提问——“你们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究竟有没有哪怕稍微像点样子的人物？”里隐喻的——面对模子的强暴和奴役，中国的读书人休提“反抗”，连“稍微像点样子”的自卫也做不到，就这样慢慢或者迅速地“死于习惯”。顾准并非完人，只是因此显得比众生洁净一些罢了。

第八章 《试论》

1. 试述《试论》（上）

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章节，叙述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是这篇长文令顾准在中国经济学界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也是他“到底是非跟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分手？还是仍旧可以服从这个基调？”^{56.2.27}至少从逻辑学和经济学的角度上选择了前者的真正发轫，是他陷入极右派泥淖的第一步，也是他成为出走的娜拉，从此踏上单兵挺进、绝无回头路之路的开端。

吴敬琏先生将他的老师顾准称为“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也是基于这篇长文。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个不轻的头衔，《试论》的出世在中国近代经济学史上也的确算得上是件不小的事情。

《试论》的“出笼”经过前章已经讲述了——1957年6月号的《经济研究》全文登载了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毒草至此正式出笼。

这株大毒草向人们呈上了一种从未嗅到过的味道——“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有商品生产。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价格。既然有价格就必然有价值决定——价值规律。既然有价值决定——价值规律，就要遵循价值规律”的、新鲜而异常的味道。

今天的人们早已像习惯空气一样习惯的名词——“商品”、“价值”、“价格”、“价值规律”，六十年前却是一种真正的大逆不道。就算时间都到了距今不过三十多年的1979年，人们提到一个最常用的经济概念——由劳动产生出来的、将被交换的物品时，还只能用“产品”而不可以用“商品”称呼，前者是社会主义的，后者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个绝不容小觑的、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去问每一个那个年代过来的经济学家，无人不晓。

许多普通人都知道马列主义名句中两个最著名的句式：1.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2.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前者是眼前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后者是不久的将来——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

到了1950年代初，在将所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统统赶走后，中国名正言顺地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实行第一个句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时候了。可是旗帜好打，口号易喊，实行就难了。“各尽所能”还好办，大家日夜不休，加班加点就是，可“按劳分配”就比较难了——怎么个分配法？谁来分配？以什么标准分配？是回到古人桃花源式的以物易物，还是以中介物，例如货币或者劳动券，形成以它们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流通体系？那么这些商品和中介物的价值又有何样可循的规律的？

这是个无传统可继承，无前例可借鉴，无章法可遵循的崭新问题。唯一可以参考的是苏联老大哥的前车之鉴，而大哥所拥有的无非斯大林的一整套所谓“新经济政策”，早已被顾准视为毫无学习与

借鉴价值的垃圾，咻咻然弃如敝履了。这也是他的“天问”——“到底是非跟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分手？还是仍旧可以服从这个基调？”^{59.2.27}最初的萌芽《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这只萌芽上的第一片叶鞘。

就像基督教的基础建立在“爱”与“复活”之上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剩余价值论”和“生产关系的异化”之上的。

“马克思所以采取这样的定义（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 - 《共产党宣言》），显然是因为他悲叹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的劳动所异化了——这是他的根本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 文稿 P339

《试论》正式“出笼”于1957年6月，但他思考它至少在1956年年初就开始了。下面是他1956年身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两则日记：

“读哲学之贫困。对价值问题写了一些前后毫不连贯的疑问与自以为是（真的是自以为是）的解答，准备读完若干著作以后（哲学之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与利润等等）把它整理一下，珍藏起来。同时这件事大大引起了读古典派经济学，剩余的价值学说史与 Keynes（凯恩斯）之类著作的兴趣……其实八十年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多少新的现象了呀，我们的问题是科学地论证这些新现象，而不是深闭固拒地不加理睬。”^{56.3.22}

“要继续弄下去，就牵涉到一系列问题，小问题有货币论，大问题有道德规范式的理论系列：（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马克思的论证被丢掉了，大概是因为那里过于强调了价值规律，跟社会主义划不清界限，而马克思则是强调残迹，母斑的；（二）“基本经济规律”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离开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理论（那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规律），与价值规律（这实在还是多方面起作用，而基本方面则是劳动报酬方面）的空东西、道德规范。其实问题还牵涉到哲学方面。把那些独树一帜的“要求”性质的规律去掉了，哲学家岂不是在论证规律的客观性质时要省事一些。理论水平之低，其情况实在是足以惊人的。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56.4.11}

冰雪聪明的顾准明知“再弄要出毛病的”，可他实在是受不了“理论水平低得惊人”的人去误导领袖和“人民”。到了1957年，他管不了那么多了，决定先“捅出去再说”。于是《试论》面世，他“捅出去”的，就是和马克思主义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关系和价值范畴”的计划经济原则

唱反调的“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原则。

顾研究员捅的可是个大“娄子”，相当于在中国历史的整只大脚已经全都套进“历史唯物主义”五段论的“水晶鞋”上生生捣了个窟窿。关于这只“水晶鞋”将会在后面的章节详述，还是先说《试论》。

首先《试论》指出，至今为止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济问题的结症所在，是废除了市场制度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应该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的市场经济。作者使用了在普通人看来过于繁多的经济学术语来论证他的这一主张：

1. 中国两种所有制——全民和集体并存的社会主义并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可以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2. 在国民收入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不能用实物凭证式的劳动券代替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唯一分配手段；
3. 社会主义经济毫无疑问地必须进行经济核算，其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办法是“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紧密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
4. 根据劳动时间确定货币工资率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5. 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使社会主义经济形成的体系，马恩并未全部预见到，他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生产资料将为全社会所占有，商品生产将被取消”的预言是落空的，不能苛责但也不能再依赖，必须突破；
6. “所有权”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不是经济关系，此概念的长期混淆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理解。对“交换”的注意和研究应放在经济关系上而不是“从谁的手中转到谁的手中”上；
7. 否定“将一部分社会产品定义为商品，另一部分定义为非商品”的划分方法，认为其中的“商品之生产的特征是流通过程（买卖交换过程）的存在和产品所有权的转移的观点”，是可疑的；
8. 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但不是绝对指令性计划，而是用经济核算来补足。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制的矛盾统一体，强调任何一方都会否定另一方；

9. 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计划经济，出现价值与价格是不可避免的；

10. 剩余价值也完全服从于价值规律；

.....

总而言之，《试论》以非常的谦恭与温和，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中完全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实行经济核算，也有价值规律”^{孙冶方语}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现实、也是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针的。

这不啻于基督徒批判《圣经》。可是此人居然找出了“圣经”中前后矛盾的地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拿了去“惊蛰”孙冶方的《资本论》中的那个“孤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决定就仍然在这样的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资本论》），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1115—1116页）”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价值决定依然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一样对社会劳动时间和劳动在不同类型的生产之间的分配上起着支配作用，而与此种分配相关的簿记（会计）甚至比以前（例如资本主义时代）显得更为重要。

这段话几乎完全否定了马、恩在他们浩瀚的政治经济学文库中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的所有论述。假如不是通读、熟读、烂熟于胸《资本论》，谁又能发现如此“鸡立鹤群”的孤证，或者，换句话说，一个“破绽”？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试论》文稿 P96

可既然找到了，顾准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以此为据，他大胆指出斯大林与马克思在“价值规律”命题上是相悖的、对立的：

“斯大林认为不正确的论断‘价值规律调节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的分配’……，我们若认为，上述斯大林的论断与马克思的论断是直接互相反对的，也许不是没有根据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

值规律的问题》文稿 P29，即使如此委婉的表达，他仍不是十分有把握，就捧着《资本论》第三卷，翻到第

七卷《各种收入和它们的源泉》，第四十九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的最后一页，敲开了所长孙冶方办公室的门。

2. 试述《试论》(中)兼述“故事与数据”的故事

“我拿这段论证去请教孙冶方时，他似乎很‘震动’……也许这段论证他从前没有想过，此时在苏共 20 大逆流的影响下，抽芽盟长，蠢蠢欲动，(论证)对他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

正苦苦思索着“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不要遵循价值规律”的孙冶方，面对着手捧《资本论》推门而入的顾老弟，欣喜不言而喻——浩瀚如沧海“圣经”中的这“一粟”，和自己大力推崇的“价值规律说”竟然不谋而合！作为“首席宫廷经济师”，他的被“惊蛰”可想而知，这相当于为“价值论”找到了最经典、最权威、最可靠的理论基础。

然而不幸，马克思的这段话真的就是个“孤证”，“圣经”文献中再也找不到类似话语，而中国出版的所有节选节译本，提纲本，研究本，学习本……无一选录这一段话。也就是这个所谓“孤证”从此将顾准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带给孙冶方的更是七年的牢狱之灾。但是，就算没有这个“孤证”，孙、顾二人的命运又会怎样呢？不知道。历史无假设。

“我这样引证马克思，其实是在歪曲马克思。因为我引证的，马克思肯定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还要起作用的那段引文是‘孤证’，我对它的解释也是和马克思的本意相违反的。除此以外，《资本论》各卷论价值之处，《哥达纲领批判》，以至后来我读的浩瀚的马克思的著作，都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价值范畴。”

这段顾准的“贱己”文字写于文革如火如荼的 1969 年。可紧接着这段“贱己”文字之后，他写到：“到 1957 年春，我所读的马克思的著作虽然还比较狭隘，大体上我已肯定了上述看法，并且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价值范畴，是和他的根本哲学思想相关联的。”

这是他日后苦寻马克思痛恨“市民社会”(即公民社会)的哲学思想根基的起因。

可说着说着，他从极严肃的哲学话题一下子跳到了“滑稽戏”式的独白：

“1957 年春，和孙冶方在电话中谈哲学，我所说的主旨就是如此……我在《试论》中引证马克

思，实际上歪曲了马克思……我认为，孙冶方引马克思，无一处不歪曲马克思，可是直到现在，他对此还是完全不理解的。”

好有趣的黑色幽默——顾准一记左勾拳就打向了老朋友孙冶方的右脸。表面上打的是你“政治上不正确”，实际上打的却是你的“笨拙”——到现在你都还是“完全不理解”，真是笨死了。

孙冶方确实是“笨”，至今人们还没有发现他写下的任何坦白，交代，检讨之类的文字。在那个凡有书写能力的人都必须写出各式各样的检讨书、坦白书、交待材料、认罪书之类无趣文字的反常识年代，从国家主席到工农一员，从耄耋白首到黄口小儿，写这类文字已经被人们视作常态，成为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中国的帝王们历来在最无奈的状况下有“罪己”的传统，那么中国的庶人们则在“史无前例”中建立了这种“贱己”传统。顾准就写下了无数的“贱己”文字，且常常“贱”到无可再“贱”的程度，被“恨铁不成钢”，忍无可忍的后人称作“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猩红热’”、是“雅努斯”现象等等。可孙冶方从不买这个账。

从他1956年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并引起争议开始，到1964年在经济所和张闻天、顾准一起被“小”批判，到1966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被“大”批判，到1968年因此而被关进秦城监狱，到1975年出狱监管，孙冶方除了解释、说明、辩护，绝不坦白交代，绝不低头认罪，更不用说像顾准那样用上一大堆“贱己”之言，让后人哭笑不得。

孙冶方的不“贱己”在1960-70年代的“大革命”中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奇迹，他到死都坚持自己的经济观点，坚持价值规律，坚持价值论，真叫是“死不悔改”。

就在顾准捧着《资本论》来找他前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算下来应该顾准还在中央党校没有毕业，两人就已经接触频繁了。碰在一起，他们话题只有一个——价值论，包括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其他都是扯淡。

从顾准党校毕业来到经济所，到离开去了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前后不足三个月，他俩的接触一直没有中断。每次回到北京，顾准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孙冶方。要说孙、顾传奇式的友谊是建立在“价值”两个字上的，真是一点都不奇怪——两人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就是建立在“价值论”上面的。

有位民间经济学家告诉我：“价值关系是一切人类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价值论是市场经济的基

础。市场经济是以普世价值和契约精神为本的人类社会关系模式。否定普世价值就否定了效用价值，也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孙冶方、顾准不过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价值规律’的传承者。说顾准是中国的哈耶克有些过了，但基本意思不错。” 宁波清华子

可惜当年，作为同时代人的顾准和那位奥地利裔英国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连神交的可能性都没有。至今没有史料显示顾准曾经读过哈耶克，尤其是那本最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

彼时的顾准，除了孙冶方真是没有第二个可以交流的人了。经济所其他的经济学家，要么死抱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点不放，倡导生产资料降价措施（这个措施不久即在全国实行）和重工轻农的经济政策，要么保持沉默，即使有自己的观点也绝不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更不用说和苏联经济政策和经济观点唱反调的文章。对前者，两人私下里“大加非议”，对后者则又无限惋惜。

顾、孙交流的后果相当严重。1957年两人先后发表了三篇在经济学界及至学术界都出了名的“反党文章”——顾准的《试论》，孙冶方的《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经济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正是这几篇文章为日后的“孙顾反革命思想联盟”奠了基。

“我拿这段论证去请教孙冶方时，他似乎很‘震动’……也许这段论证他从前没有想过，此时在苏共20大逆流的影响下，抽芽盟长，蠢蠢欲动，（论证）对他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我们）炮制出来的毒草，在我是《试论》，在孙冶方是《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推动我写《试论》的实际经济问题是农业问题，尤其是几十年来苏联农业停滞不前这一可惊的教训。孙冶方的议论中心则是固定资产问题，他对‘只准复旧，不准革新’这一可怪事实（颇有微词）……”

到了1957这个特殊的年头，《试论》已经绝不会被单纯地看作是一篇纯学术论文了。既然动了计划经济的“奶酪”，也就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相当于在中国历史唯物主义“水晶鞋”的社会主义部位捅了个窟窿，破坏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恼怒了。本来就是“三反分子”的顾准，居然在反右当年发表《试论》，此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大字报立刻铺天盖地而来，《顾准右派言行》被印成小册子散发，除了那些“三年当市长，五年做总理”的陈芝麻烂谷子，新罪行的主要成分就是《试论》内容。孙冶方也没有逃过这一劫，他也压

根没打算逃，早就准备好了和顾准一起被摆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祭坛上去。

“我的《试论》，批判文章都发表出来了，深深感到《试论》所陈述的观点是违背大跃进方向的……以后在《经济研究》上读到孙冶方的《价值论》，很惊诧何以这个时候（他）会公然（唱）出这样严重的反对大跃进的‘反调’，尤其不理解我的‘老朋友’怎么会在我已划为右派，我的《试论》已经公开批判后还公然出来继续唱他的反调。”

顾准这里有点不老实，他怎么可能不理解老朋友唱的反调？他绝对理解！只是被“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氛围中老朋友的“赤膊上阵”吓了一跳罢了，他没有料到这位尚在位上，应该有所顾忌的老哥，胆量和勇气居然比自己这个“二次戴帽”，“开水死猪”还大，这着实让他高兴之余吃了一惊。

“那时曾动念写信劝告他以我为‘前车之鉴’，当心一点。后来想想我是右派，和他通信不好，就放下了。”

哎呀，幸亏老顾没写。倘若他真写了“劝降”信，老孙一定会跟他翻脸——“怎么？真理只能靠你坚持不成？”。

孙、顾在1957年的遭遇还与一件他们必须自认倒霉的事情有关，那就是“极峰”、“极笔”毛泽东先生对经济学的半通不通以及正是由于这种半通不通而起的厌恶。

毛泽东先生和数字无缘，和数据无缘，必然连带他和经济学无缘。他喜欢从外形到内涵都极尽华丽的中国字，喜欢用中国字排列出的大写意的文章，从诗词歌赋、言谈话语、笔下华章到执政方针、行政政策、政府报告，无一例外。前者是个人爱好，作为苍生一员、文章家和诗人当然无可非议。可他是一位大国的最高执政者，这就比较麻烦了，尤其是一个专制国家的最高执政者。

毛先生不喜欢精确的东西，尤其不喜欢数字，除非是他希望听到的数字——假的数字，大写意的数字。顾准最欣赏的修正主义分子德热拉斯曾经的同僚，南斯拉夫部长会议主席大卫·卡德尔先生在跟毛先生打交道后对媒体说，“数字对于他是不必死扣的。比方说他说‘要两百年时间，或者四十年’”。

另一位苏联经济学家阿尔希波夫，希望读者还能记得他，就是那位从一个村的苏维埃财政委员一直做到列宁格勒州的财政厅长，曾教给彼时上海税务局长顾准“专户专管”秘诀宝典，事后又不认账的“老大哥”，曾这样哀叹毛泽东的不懂经济——“完全不懂，一窍不通”。

毛泽东喜欢文字和故事，憎恶数据和数字，继承了他帝王前辈们的好恶观及“所有因素都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黄仁宇语}的陋习。由于统治者个人的这一好恶，中国的经济、经济学、经济学家，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备受困扰，备受摧残。

国语中有一句最浪漫和大写意的话，叫做“治大国如烹小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大国小鲜”论是这样诠释的：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毛泽东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发言

顾准写《试论》的最初冲动就是在这“羊肉、板鸭、火腿”的激励下产生的，可是当他提出如何将这些“小鲜”烹好，烹得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至少不亚于资本主义——顾某人可是知道资本主义的羊肉板鸭火腿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这锅“小鲜”已经被倒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锅“大鲜”就要上灶了。尔后这一锅“大鲜”又没烹好，可怜至少三千万条人命就这样“肉烂在锅里”，一起被倒掉了，“大厨”却没有受到任何谴责和惩罚。

毛先生对经济是外行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薄一波先生晚年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形容1957年的毛泽东：

“毛那时要听管经济的部位汇报，但听得非常吃力。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具体那次是听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先生的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累的原因是‘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毛紧皱眉头，抬起头来说，这是使他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周恩来某次检讨说，他给毛的报告是材料数字一大堆，没有故事性。”

他曾批评国家计委送上来的“官样文章”是“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质问他们“哪一年（能）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微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

毛泽东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

可见数字已被他视作催命符一样的不祥物。可经济学偏偏是离了这道“催命符”就活不成的学问，

是门绝不可以大写意的学问，再说得难听点，是一门毫无诗意的学问。这就怪不得经济学家们不受待见了。

而马克思，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他是个大经济学家，其最宏大的经济学著作莫过于《资本论》。被尊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先生读过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有可能读过，但绝不是通读和精读，和顾准读《资本论》居然能从中看到美，看到“渊博的知识，美丽的文章（不很好地读，还看不出文章的美丽），真是使资本论是政治宣言，科学著作，与艺术作品”^{55.12.1}，看出著者呕心沥血写成的第一卷和后边纷杂的两卷不可同日而语的读法——“由于他对第一卷曾经费去那么多的劳动，比之他生前来不及校正再写完成的第二、第三卷，更是精美绝伦”^{55.12.1}，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读法。

中国的经济科学曾在新政权体制下受到过致命的摧残，甚至可以说曾经有过一段“没有经济学”的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他都是异端邪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由谁来诠释、定义、解释、制定标准，除了北方的那一套，又没有任何自己的规则，一时奉为圭臬，一时斥为教条，谁有“解释”权谁就是“真理”，加上“极峰”对经济学的不喜不爱，有时连汇报都懒得听，身处这种时代环境的经济学家们，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说毛泽东先生对经济之学避之若浼也肯定是错误的。顾准在坦白交代中多次提到的《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笔记》就是个有力的佐证。

“读了一些例如《政治经济学笔记》这样重要的主席的光辉著作，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获得了从前未曾达到的体会”；“1964年所内“四清运动”开始，我不知道孙冶方对抗主席《政治经济学笔记》这一辉煌著作，尽心竭力为刘少奇的黑党纲准备经济理论的基础，以及他的一系列里通外国的滔天罪行。他是运动的首要对象，我‘同情’这个‘老朋友’”。

毛泽东的这个《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就是他从1952年到1958年三次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改版）》的批注、谈话纪要。这本教科书恰恰就是出过大毒草《试论》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编译和整理的，只是此时大毒草的炮制者顾准还在河南商城右派劳改营中，与蚀骨噬心的饥饿作殊死的苦斗，什么也不

知道。读这两本书是 1959 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拟定的十九个问题的第一个。他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组员包括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看上去重视非常。

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他老人家“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龚育之《毛泽东读书生活》。先读书，后实践，结果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他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 同上，而试验的材料是三千万条生命和时至今日无法恢复的生态。

顾准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不足以解释全部历史，比如中国大跃进的动机它就无法解释”^{59.3.5}，而西方人士则根本不用什么主义、什么公式，刻薄地评论中国的大跃进“穷是动力”，毛泽东却十分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龚育之《毛泽东读书生活》，倒是和黑格尔先生“恶是发展原动力”说不谋而合。穷则革命富则修，宁穷勿修才可能不断革命，这才是毛氏经济的根本所在——国要强，政权要强而民不可富，可恰恰是顾准的“鲋口经济”和“白薯共产主义”将这一经济观点作了最浅显和通俗的注释。

从理论上讲，毛氏好像也并不否认商品生产。就在他读斯大林和苏联教科书的过程中，1959 年 3 月 30 日在一个批示中提出“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并在其读书笔记中作了重申，弄得孙冶方一帮经济学家们又惊又喜，又疑又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仅仅这样一句话有任何意义吗？“大跃进”是否符合价值法则和经济规律早已由历史作了无情的结论和严厉的惩罚，而真正“客观存在”和“价值法则”大学校教授级人物顾准和孙冶方，一个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个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夫复何言？

1957 年“出笼”的《试论》是加倍的生不逢时——右派+数字+诘屈聱牙的修正主义理论，双倍的不爽，三倍的厌恶，活该顾某倒霉。孙冶方、顾准笔下充满了“若花岗之岩，玄冰之冻”的数字、数据，哪里有日产钢铁 X 万吨，亩产小麦 X 万斤，年修水库 X 万座的故事好听。看来历史学家黄仁

宇先生所说中国的历朝历代“所有因素都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还是如此。毛泽东先生终其一生也没有一部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论著问世，这一点他不如斯大林，后者至少在去世前不久口授、发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出版了纯斯氏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前者在经济学上要么大赞，要么大骂，故事与数据，颠顽与尖锐，没有制约的机制，没有制衡的人群，如何调和？

“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57年孙冶方、顾准的处境就是如此，他们东突西撞，却找不到出路，思想碰撞擦出的火花先就重重地灼伤了他们自己。

3. 试述《试论》（下）并再述娜拉出走

“民主个人主义还是我的根本世界观，斗争形势要求暂时放弃它，斗争的目的却是要实现它。”

顾准写于1969年的“坦白交代”中这段话坦率、直白，毫无隐讳地将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目的、手段、因果关系“交代”得一清二楚，其题目是《我的反动世界观和反动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初步清算》。“清算”了没有暂且不论，“交代”倒真是彻底。

任何一种世界观，说到底是对世界-社会-人-神所构成的共同体之运行秩序的认知经验总括，是对精神、意识，或者干脆直接说——灵魂秩序的认知经验总括。世界观的形成多半发生在人参与生存过程的早期——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顾准的这个时段恰恰是在“立信”浓厚民主个人主义氛围的环境下度过的，“那里的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培养‘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而我又在这个环境中成了‘名’，成了‘家’，（因此）其根本精神是反对集体主义，是典型的民主个人主义”的。

顾准在晚年的“坦白交代”中坦承，在他的潜意识中，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价格机制，企业内部的成本利润计算这一套秩序天然合理，它是永恒的和无可替代的。这种理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萌芽于“立信”，肇生于苏南苏北时期、上海时期和洛阳时期，形成意识于党校时期。到了1957年《试论》完成，已臻成熟。他一生世俗生活的坎坷都和这一秩序——世界观——价值观的与众不同有关。

从他开始系统研究经济理论和写作《试论》的 1957 年，潜意识就已变成了有意识——即使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私有制而代之以国营经济，这一套秩序还将因为其天然的合理性而存在，社会主义依然要实行经济核算，市场体系和价格机制。这秩序强调的普世的物质性深深契合了他的民主个人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只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允许个人的收入因着才能的不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有巨大的差别，“这（才）真正是民主个人主义的乐园”，而纯粹的计划经济却是窒息一切个人主义的牢笼。一旦价值规律对经济计划不再有制约性，国家实行彻底的物资分配制度，社会成员的一生都将被“国家生产局”或者类似机构“计划”，这意味着人的信仰、个性、技能、特长、职业、工资以致生命都被计划，不是被每个人自己，而是被社会，被强人计划。

这就是奴役，计划经济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布后，他的这种信念更坚定了——反对个人崇拜，保护每个人的尊严，推崇社会法制，才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个人主义的铁则。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同时公开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阶级专政怎样变成党的专政，党的专政怎样变为个人专政”说，英国工党政治家，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的“没有两党制就没有民主”说，都对他影响至深，加上“1952 年以来长期滋长的不满情绪，唤醒了我不本来还未达到明确自觉的民主个人主义，使我急速地流滚回到 1934 年以前的世界观方面去了。我认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强调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民主。我强调民主如此强烈，达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以致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如此世界观的指导下，完全出自一种使命感，他决定把在他看来几近完美的这套经济学观念系统化，体系化起来。

“从前没有经验过国家计划，现在经验过了，也加以考虑了，所得的结论，表面上是二元论的，实际上是否定国家计划作用的。我强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我说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是不能持久的。”

他用了“经验”——这两个他后半生深信的字，也相当狡黠地表述了自己根据“经验”得出的结论——“表面上是二元论的，实际上是否定国家计划作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我已根据经验

全盘否定，但我期待你拿出好过市场经济体制的东西，只要能说服我，我一定接受，否则我将不得不坚持那一套“天然合理”的秩序。他解释所谓“行政方法”就是“经济方法”以外的一切方法，包括什么“政治挂帅”、“计划第一”、“经济战线的群众运动”、以及马上要出台的三面红旗、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等等噱头。这些东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造成政治的、经济的和精神上的无序和混乱。

“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

此话堪称“先知之声”。

从1957年《试论》问世算起，二三十年后，中国果然实现了“高度的经济发达”，只是经验主义者顾准的理想——民主社会主义，依然“山在虚无缥缈间”。而这二三十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诸如反右、三面红旗、大饥荒、庐山会议、反修、四清、文革，给中国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至今都无法消除，紧随它们而来到的“高度的经济发达”从某种角度看很像是过度压抑后畸形的“反弹”——物质主义压倒了一切，玛门（财富）崇拜替代了偶像崇拜，实质上还是偶像崇拜。

顾准预测了将要在几十年后出现的“拜玛门”现象。

在经历了1959-1960年大饥荒、恐怖的商城劳改，经历了日日宗教仪式般的学习、批判，经历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说谎，告密，道德败坏，“人相食，卖质，说谎，拍马，害人自肥”^{60.1.15}后，他在日记中写到：“若说这是历史必然，付出的代价也够重大的。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与物质的补偿！”^{60.1.15}。

一语成谶。

《试论》是顾准瓜熟蒂落的精神产品，是他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次显露，而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德热拉斯，陶里亚蒂，艾德礼，还有《论十大关系》等等都不过是催熟剂罢了。今天因为这篇《试论》，人们称他为中国的哈耶克，只能说哈氏和顾氏在某种精神始基上碰巧契合了。人类社会发展有一定地步，这种契合是经常会发生的，七千年前，五千年前会发生，两千年前和今天也会发生，今后必然还会发生。

思想家不同于凡人的，往往在于他不必亲身经历就可以总结出人类的经验，尤其是人类的苦难经验。哈耶克并没有在他所谓“通往奴役之路”的体制下生活的经历，但他预见到了生活在计划经济专制下的俄国人民的不幸命运，极有可能也预见到了将要在中国发生的相同悲剧，至少在他因《通往奴役之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顾准死去的1974年，他一定看完了整场悲剧的始末，只是他令人遗憾地未发一言。而他的中国同行、同道，亲历了整场剧目的顾准先生，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记录下了一切。学术上，顾准可能达不到哈耶克那样的高度，但就其勇气、人格魅力评价，谁能肯定后者不会对前者高山仰止呢？

今天的人们喜欢用“娜拉出走”来形容顾准，喜欢引用他“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文稿 P384}，但他最决绝的“出走”，与其说是1930年代受救亡激情与革命浪漫的推动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如说是1957年他这篇温柔到十二万分的“出走留言”，或曰“出走宣言”——《试论》的面世。前者是感性的产物，后者才是理性的力量，也惟其如此，后者要比前者强大得多。

来看看顾准怎样谈“娜拉出走”并对比他自己的“出走”：

“我们也可效法鲁迅‘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Robespierre（罗伯斯皮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 Robespierre 自己会变成拿破仑。”^{文稿 P380}

中国的罗伯斯皮尔果然变成了拿破仑，所有历史的先声、曾经的承诺都变成了空头支票。

“Democracy（民主政治）是一种公认的，大家被迫不能不遵守的共处规则。只有‘我必须（只好）和这个狗养的在一起’，‘保护少数’才不再成为 Lip-service（空头支票），容忍才能付诸实行。事实上，听凭一个人任性而为，世界上就永远没有容忍这回事。”^{笔记 P327}

娜拉走后怎样？可能找到了出路，独立了而且生活得很好，但也可能自己变成了海茂尔——虚伪的暴君。

“论到夺取政权，Kautsky（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Kautsky 对了。”^{文稿 P387}

考茨基在革命胜利后要“告别革命”，指出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走上了追求独裁的歧途。他追求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顾准也是。

“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样？’；1789-1870

-1917，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1789-1870-1917，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文稿 P394

那“另一股潮流”——自由与民主、进步与发展，不就是出走后的娜拉——革命胜利后的人们光明的坦途吗？但这可不是什么“终极目的”而依然只是道路，人类依然“在路上”——“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文稿 P392。

从 1950 年代中期就开始“终极目的”思考的顾准，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得出的结论是：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文稿 P392

至于他自己的“出走”——“贾宝玉不做禄蠹，只好出家。我又要问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出家以后怎样？如果活下去，而且还要维持一种清高的生活，怎么办？” 文稿 P420

当“娜拉”发现“丈夫”所有“民主社会主义”的面孔都是虚伪的假面，骨子里依然是几千年不变的“东方专制主义”时，出走是必然和决绝的。骨子里就是个“娜拉”而不是“祥林嫂”的顾准用自己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出走后的娜拉要活下来，再艰辛也要维持其清高和清白。“‘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文稿 P432。娜拉，她没有后悔也没有屈服，从未回到，更未徘徊在丈夫安乐窝的门前檐下。她也许走向各各他，他也是。

但各各他之路不也是复活和永生之路吗？

第九章 事情已经变化

1. 一定有字的 1958

1958，又一个没有只言片语顾准文字面世的年头。

从19岁与潘序伦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到临终遗言，顾准一生的文字，包括日记，笔记，割记，文稿，检讨，交代，坦白，心得、体会、发言、卡片，摘记，信函……以千万为单位计数是毫不夸张的。今天人们读到的顾准，充其量有十分之一就算不错了。

根据如是：

1. 他亲爱的秀——妻子汪璧，自戕前留下的只有一句话的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这是汪璧1964年在家中帮助顾准烧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在文革中被揭发后发生的惨剧。这次被销毁的字纸估计数量浩瀚，至少销毁时的烟雾、碎屑或其他东西给揭发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否则不会在两年后还“记忆犹新”地去揭发批判，致她死地。假如数量小则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发现。

2. 六弟陈敏之在多年后的《顾准文集·序》中写到：

“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似乎依然不大安分，写下过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未见过，不清楚。不过确实知道这些东西又惹下了祸，原因是文革前夕把这些东西都毁了。为什么要毁掉，显然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个罪名是难以申辩和推脱的。我母亲也参与了毁灭“罪证”的活动……用“水浸法”，把纸张放在水中浸透，揉烂，然后放进抽水马桶抽掉，抽水马桶都堵塞了……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写下的一些东西全毁掉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空白。”

这又是一批巨量的文字。

3. 他的第三子高粱，日后以经济学研究生的身份到经济所工作。有一天在全所大扫除时有人叫住他，说这里有你父亲一大堆材料，你要不要，不要我们就处理给废品收购站了。高粱拿回一大包父亲的文字，至今还没有整理完毕，也因此至今还没有面世。

4. 顾准写于1969年4月的某日的读书笔记，摘录并旁注关于“绝对贫困化学说的根据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性”时，有过这样一段奇怪的旁注：“绝对贫困化。然而这里的绝对贫困化是哲学。所以，1958年我写道：对于他，经济学是服从于哲学的。”^{第P489}

暂且不论这段话是什么含义以及顾准对“从人的绝对贫困化到哲学的绝对贫困化”的思考过程，仅仅从“所以，1958年我写道”几个字，就可知他在1958年曾经写过多少东西。如此宏大的话题，

又哪里是几百字、几千字能够打住的？而相似的话题，在 1958 年又会有多少？但是如今却没有任何他 1958 年的文字，例如日记、读书笔记、卡片或者文稿面世。

5. 顾准自己也在不断地烧掉自己的文字，他倒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如“收拾屋子”一样地大扫除。

“一个个问题突击是艰苦的，但很愉快地烧掉几百张稿子是痛快的。” 59.02.23

“准备八个月时间，又可以弄三十至五十万字回来，充实我的稿库。” 59.3.10.

他突击一次问题就会烧掉一批手稿，把一大堆深奥的推理过程和文献线索抛在脑后，以保持大脑内存足够的容量和条理整齐的排列。他还居然号称还有一座“稿库”，那三五十万字在其中肯定就是不值一提的小数……。

6. 1960 年的商城日记一篇说到“……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传统影响，Refer（参见）1958.12 日记” 60.1.15。

顾准 1958 年有日记存在，这就是铁证。

7. 妻子秀——汪璧是写日记的，至少从 1936 年就有日记，六弟陈敏之曾经在无意中看到过，但至今也是片字未留。妻子写日记往往能带动丈夫，何况他们那么恩爱。顾准既然在恐怖大饥荒的商城，人饿得打哆嗦的时候都有日记，1958 年没有只言片语，于情于理，于逻辑于常识都无可能。

8. 1960 年代读《马恩全集》的笔记所作“恩格斯的哥达批判”只有（一）、（四）、（五），至少不见了（二）、（三）。

9. 1960 年 2 月 3 日的日记中，顾准写道“……写铁佛寺水库记录，II/2 写完” 60.2.3.，II/2 也就是该日记的前一天。从他 1 月 19 日回到北京就开始写的这部《铁佛寺水库记录》，在分量上可能要超过他的《商城日记》，毕竟《商城日记》是日记体，而《水库记录》一定是纪实体，且很可能包含了解释他首创的“糊口经济”一词的确切含义，而“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以强力来打破糊口经济，代替圈地、代替羊子吃人的，是在饥饿状态下上山炼铁与 7000 万人的大兴水利，而且还要在政治上给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称号” 60.1.11 的、连糊口经济也不允许存在的行政行为，会不会在他

的铁“佛寺水库记录”中被引申到类似 20 年后，亲历本国 1943 年大饥荒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经济学，人们只能单凭它的商城日记去猜想了，可能性非常大，但没有凭证，因为这个东西不在他已经面世的文字里，最大可能是已被妻子采秀销毁。

.....

还能举出很多例证，后面会一条一条加进来。

因此 1958 年不但顾准一定有字留下，而且还应该是字数特别多的年份。先看看 1958 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过什么大事：

国内：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开始炮轰金门；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全民大炼钢铁；全面开始农村“公共食堂化”；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全国“除四害”；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中央电视台试播；浙江景宁县实现全县人民公社化……

国际：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成立；英美完成核聚变试验；美国发射人造卫星；赫鲁晓夫任苏联总理和苏共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成立；科威特创建巴解运动法塔赫……

向来喜欢对局势作出评论和判断的顾准，绝不会住笔。这是其一；从他已经面世的 1959 年 2-3 月间的日记看，“混乱的思想已经整理成为系统，初步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现在不是思想的基本体系问题，而是它的完整化”^{59.2.23.}，可见上一年已有数量巨大而又比较杂乱的文字问世，否则他怎么敢随随便便就把它称为“系统”？这是其二。还有他的“自述”——坦白交代材料，关于 1958 年的叙述信息量巨大：

“1958 年 4 月下旬，综考会支部大会宣布我划为右派，已经上级组织批准，宣布我开除出党。这次支部大会我也到会，这是我参加我生活其间达 22 年之久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的最后一次。”

在被开除出党的前几天，综考会党支部组织委员来通知顾准，党对他的处理定为监督劳动，除每月发放五十元生活费外，工资停发，劳动地点为河北省赞皇县，不日出发。他终于被排出了“母体”，“妈”松了一口气，“孩子”也松了一口气。“1958/V 下乡劳动，自此以后，直到

1962/111 一直在农村。”此事在他不是灾难而是解脱，是乌烟瘴气后的尘埃落定和一大堆“不确定因素”后的确定，也又一次给了他读书的时间和心境，以及对历史与现实观察和探索的机会。

有位作家在长篇大论地谈到顾准时，说了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顾准太被历史青睐”
易中天语，可细想想，有道理。

“为什么是顾准？”人们常问。

一个思想，一位思想家被接受与否，不仅和他示人的表达其思想内容的文本(Text)本身相关联，而且也同其产生思想时所处的历史语境(Context)相关联。顾准经历的历史过程虽然数亿人都经历过，在经历中思考的也绝不止顾准一人，但真正能够从东西方历史、现实和未来展望的开阔度上进行思维，且能将思维的过程真正用文本在是时的历史语境中表达了出来的，至少到今天还没有找到第二人。“顾准太被历史青睐”和“为什么是顾准”两句话巧妙地互释了。

回顾他的一生，历史总是让他站在既往中最尖锐和激烈之处——在火山口上、地震中心，在熔岩边、洪水中，却又没有让他立即葬身，反倒是给了他各种取样的条件和工具，参照的资料和分析的仪器，直到他记录下发生过的一切，留下宝贵的历史“地质”资料——哪里危险，如何躲避；哪里安全，可以安家之后，才让他在无边的爱海中遽尔长行，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回忆、思念和遐想。

即使是令人们扼腕遗憾的他的早逝，也依然是一种“青睐”。试想从深海中打捞出的维纳斯假如是完整的，她还能带给人们那独一无二的缺憾美吗？试想假如顾准活到今天，他还能特立独行而不被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吗？

还是回到1958年5月，河北省，赞皇县，土门村、野草湾和干根村，顾准身处茫茫的右派人海中。这里是中科院右派的集中地。去年年底就已经去了一批下放干部，“5月下旬下乡的共二十余人，绝大多数是各所的右派分子”，由一名下放干部专门回京带领他们下去。先稍稍探究一下“下放干部”和“右派分子”的区别。

“下放干部”是“调到下层机构去工作或送到农村、工厂、矿山去锻炼”的公职人员。“右派分子”是政治上不正确，“意识形态”上与在朝者对立的敌人。这两种人与在朝者之间假如有矛盾，

则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是“敌我矛盾”。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顾准当然是后者，他是康生先生——虽不如戈培尔或日丹诺夫显赫，却是那个时代中国意识形态总管理者——钦定的右派。康先生在中科院送来的准右派名单上“圈阅”时，重重地在“顾准”二字上打上了红圈并愤愤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还有谁是右派？”

顾准所属的这支右派团队包括徐懋庸、李泽厚、汪国训、李明等。徐懋庸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的首译者，引领顾准走向“职业革命家”之路的正是这本书。

这是顾准第一次真正参加体力劳动。四十三岁的他因为常年伏案工作，腰腿都已不是很灵活——“我生长城市，在解放区的九年，虽然生活在农村环境中，其实还是呆在机关里，除延安时期开过一、二次荒而外，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河北农村锄地一般用小锄，我腰腿发硬，不能长时间蹲着干，有时干脆就跪在地下干。”

这算不了什么，“也只有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才真正有机会学习我国农村经济这一门功课”，他又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且不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他是真把它当做课堂和功课了。既然是功课，他一定认真做，于是他就插手高级社的合作食堂，按照他的经济理论提出一整套“按合作原则办食堂的”的记账法。千根村社主任李同志兴高采烈地采纳了这位曾经是中国数一数二会计大师的建议。只可惜好景不长——

“我是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按照合作原则办公共食堂的建议……没有通过下放干部分队长 XXX 所提原则，也没有得到她的同意……已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对我来说更是不认罪服罪，不服从群众监督的极端恶劣行为。千根分队曾经召开会议对我这一罪行进行批判斗争……我在会上承认了错误，但因为没狠挖错误的原因，不久在土门又犯了其他罪行”。

看来“下放干部”的政治身份要远远高于“右派分子”。虽然两者之间不过就隔着一张窗户纸，但前者在后者面前的优越感却常常是巨大的。

比起擅自置喙高级社的经济管理，他在土门的罪行就比较严重了——恶毒攻击“大办钢铁”运动：

“9 月份，原驻千根村的下放劳动人员全部调到土门参加土法炼铁，我也随同到了那里……我曾借机大发牢骚，诋毁土法炼铁为‘得不偿失’”。

他认为全民大炼钢铁是一种完全无法理喻的愚蠢，是专制者为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而强行为之的“即兴之作”——一种“不正常激情”的产物。这些言论让他付出的代价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十年文革，成了他特大罪行之一，不得不在1968年9月10日专门为此写出一篇罪行交代，可惜已经遗失。

10月他又回到农活上，泛善可陈。

11月下旬全队回到赞皇县城，学习总结。人们又要他当了一把队部的伙食会计，因为粮食供应已经非常紧张，不论是城里下放的干部还是劳改的右派，大家都得定量吃饭，缴纳粮票，吃饱为止的大锅饭好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顾准这才不得不再被重用了一回。

半年多的劳动改造令他性情大变，往日的所谓绅士风度已经被农民“大口吃饭”，“大声说话”和“大动作手势”替代，所谓的“腹有文章气自华”已经变为“一肚子臭狗屎”，只好抛掉，若不如是，他很难在劳动队立足，也很难生存下去。

“我这种态度也许有其积极的一面，显然不是正确地对待监督劳动的态度，因为重点没有放在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彻底在劳动中把自己改造为新人上面。千根时期也有同志（记得是李泽厚）对我提出过这个问题。”

大概也只有当年的青年才俊李泽厚先生这样同时具有美学与哲学功底的眼光，才能测度顾准的心思。

12月初他回到北京。

在乡下就已经接到秀的信——中关村的房子是政府按照顾准原来的级别分配的，现在他成了右派，秀不愿受人家找上门来要她退房的羞辱，就主动退掉了这套专家公寓，按照她自己的级别搬到了百万庄的建工部宿舍。顾准坐卡车回到中科院集散地，又好不容易寻找到百万庄，摸到新房子的门。又饿又累的他按照乡下的习惯猛烈地拍门。

“我还记得父亲从赞皇农村回来，是1958年的冬季”，是年10岁的次子高粱回忆说，“一阵猛烈的敲门声突然传来，紧接着去劳改的父亲出现了。他穿着一身破烂而肮脏的棉衣裤，一团烂棉花从裤裆旁边的大破洞里露出来，样子十分狼狈。他的神色显得忧郁和凶狠，和他下放以前文质彬

彬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显然在劳改地吃了不少苦。他后来陆陆续续对我们说了一些那里的可怕情况……”

能把一位绅士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改造”得如同乞丐，其力量之巨大和可怕已不言而喻。但赞皇的改造比起3个月后开始的河南商城的改造，那可就不值一提了。

顾准的“商城日记”日后成为了中国政治学、社会学、政治哲学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及紧随其后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最重要的标本之一，能与其比肩的大约只有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和杨显惠先生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两部纪实文学作品，但后两者并非亲历。纪实文学和亲历日记，无论如何两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可是他的“赞皇日记”又在哪里呢？

2. 雪线

1959年2月23日，《顾准日记》在这里又重新起了头。

自1957年7月13日和《顾准日记》相揖而别，十九个月过去了，我只能从他的“历史交代”，从旁人的叙述中去Puzzle（拼图）他的这一年半。十九个月“不见”，顾准在知识上的积累、思辨上的进展和表达上的提高，都让人刮目相看，而情绪上，他不仅没有消沉，反是一派“得道成仙”的轻松愉快、自如洒脱。

开篇第一天，“II/23 1959”（让我用他最喜欢的罗马式记日方式。他是从1955年10月7日开始使用这种方式的，一直到用到商城劳改营的1959最后一天，从1960年元旦开始改回中国式的记日形式。其间在这两种记日法之间变化了多次，直到1972年的10月13日即“北京日记”后一直到临终前最后一天1974年10月17日的日，均使用罗马数字记日），这一天他的日记长达两千多字。

“很愉快地把四年来的工作做了一个小结，把混乱的政治思想也做了一个小结。”^{53.02.23}

顾准并非真正长时间停止日记，而是前文被人隐匿了许多的续笔。因此他的“很愉快”只能去揣

摩，根据就是这一天的日记。

一个满腹经纶的、曾经的“高干”和学者，一个大右派，罪人，去作了八个月农民以求生存，期间好不容易当了几天不脱产的“队干部”，还又被讥讽嘲弄，揭发批斗，回到北京的家里已经“脱形”得连孩子都认不出的人，他为什么“愉快”？他凭什么“愉快”？可他就是愉快。

十九个月的时间里，他又读了多少书，结识了多少智者，思考了多少问题，得了多少安慰和喜乐，你又怎么能知道，怎么能理解呢？谁拿度量普通人情态的标准去猜度顾准都一定会吃亏。初读顾准，我就吃过这样的亏。当时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顾准居然能够“苟活”到五十九岁。

无论什么样的过程吧，他好歹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而不像老舍、范长江、吴晗、邓拓、翦伯赞、严凤英、容国团、熊十力、傅雷、顾圣婴……这些人，他们因高贵而脆弱，因脆弱而玉碎，在强暴面前大有“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之意，又凄美又壮美。顾准却“瓦全”了，终是不如“玉碎”来得完美和壮丽，更何况他曾是那么浪漫和绅士的一个男人。

但你能说司马迁不完美吗？出了蚕室的太史公为了《史记》，在“诟莫大于宫刑”的耻辱中活了下来，名垂青史。可是我的传主，除了一个亲爱的六弟陈敏之，其手稿，其文字，其思想无人可托，无人能继，更无人能传。六弟陈敏之仅仅比五哥顾准小五岁，既不是他的学生，也不能时常跟随左右。说到底，他绝无要写出什么“传世之作”的念头，从他很多精彩至极的文字居然就用铅笔随随便便写在“破旧的本子（顾准语）”上，可见一斑。

他的牺牲在当时看，几乎完全不可能有“回报”，别说名垂青史，连自己的孩子们都不可能理解和继承他，哪里可能被别人传承和纪念。顾准，用他的一生诠释了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那个著名的开篇：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的长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它自己也不解释，只是把自己冻僵后又

被风干的身体摆上，像一个祭品。多年前曾有一本顾准的传记——《拆下肋骨当火把》，书名出奇

制胜，引用了泰戈尔的名句，令人联想到脱衣跳涯，以身饲虎的摩珂王子和背负十字架向各各他行走的耶稣。然而纵观顾准的全部著述，你既看不到要唤醒民众的鼓动家，也看不到要普度众生的传道士。你只看到了一位苦难造就的学者，史家和思辩家，一个一把火把自身传统的奴性烧了个精光的民族另类，一个追问人性的悲悯者和一个在罪恶面前始终警醒和桀骜不驯的人，一头要到“鄂阿奇—鄂阿伊”去寻找它的上帝或者天堂的孤独的豹子。

天地间有一种叫做“**Righteousness**”或者“**Justice**”的东西，中文翻译也特别好，叫做“公义”、“完美品格的塑造”或者“慈恩”，文天祥形容得也好，叫“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顾准是幸运的，他得到了这种东西并且自己也融入了其中，其他的，那都是身外之物，他早就无所谓了。

这就是信念。在一个除了马恩列斯毛不可以有其他信仰的时代，姑且称它做“信念”吧。

话说回来。十九个月不见的顾准真个是神采奕奕。来看看这六百多天的时间里，他又读了多少书，从而结识或重新结识了多少伟大的或者是有趣的灵魂，这些“**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黑格尔语——

Bernstein（英文为顾准原稿，后同）——**爱德华·伯恩斯坦**，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修正主义（进化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如放弃资本主义经济即将崩溃的思想）的第一批社会主义者中的一个，设想将个人的创新精神与社会的改革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民主的模式；

医生 Keynes——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之父”、“资本主义的救世主”。顾准则仅仅称他为“医生”且是个“**并未解决问题**”^{59.2.23}的医生，倒像他一贯的孤傲做派；

Plekhanov——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将马克思成熟思想表述为辩证唯物主义第一人，著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坚决反对他认为无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并痛心疾首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为时过早并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联共（孟）的祖师爷；

Zdanov——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后控制苏联意识形态达14年，试着建构一个新的艺术哲学，主张大量减少该域的文化，改以简单、

科学性的图表或符号来象征某些道德价值。被称作日丹诺夫主义，是苏联特有的文化产物；

Adam Smith——亚当·斯密，顾准的“老朋友”，经济学的创立者，所著《国富论》是全世界经济学界所发行过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使经济学成为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第一人；

Oskar Lange——奥斯卡·兰格，波兰经济学家，货币和经济均衡理论家。1957年正在撰写《试论》的顾准是把他的《论政治经济学》当教科书来读的。初识兰格，他的“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曾令中国同行顾准大吃一惊，“当时我像触了电，这表示我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大，但还没有完全理解其意义”^{70.1.2.}。这位不知足的同行话题一转，又埋怨人家“其实 Lange（兰格）不过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没有展开和解决这个问题”^{70.1.2.}；

Andrew Ure——安德鲁·尤尔，世界上第一个从理论和技术上在大学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教育者，开管理教育先河，被《资本论》的作者称作“天真而正确地说出了机器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但坚定地站在工厂主的立场上”；

哥穆尔卡——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年时代曾一度因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被免去总书记职位并遭到迫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恢复名誉，重新成为波兰党和国家的领袖。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维护了波兰的独立；

Russell——伯特兰·罗素，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创建了分析哲学。他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有着巨大的影响；

汪奠基——中国逻辑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逻辑研究室顾问。著有《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中国逻辑思想史》等；

康福斯——莫里斯·康福斯，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经企图把杜威、罗素哲学打上帝国主义的印记”^{文稿 P359}。在他的 1956 年出版的俄文版《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说：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特殊性概念“作了现时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最完备的探讨”。康福斯的该书唯物辩证法部分曾九次引证《矛盾论》，在认识部分十二次引用《实践论》；

斯宾诺莎——巴鲁赫·斯宾诺莎，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最伟大的著作是《几何伦理学》(简称《伦理学》)。行而上学体系创始者，认为“神即自然”。伦理上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主张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杜威——约翰·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实用主义神圣实用主义神圣家族的家长”。胡适的导师。著作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Thomas More——托马斯·摩尔，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个圣人也是个作家，1516 年用拉丁文写成《乌托邦》一书。1523 年当选国会下院议长，1525 年受命为兰开斯特公国首相。1525 年被任命为英国大法官，1535 年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

考茨基——卡尔·考茨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别领袖之一。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代表作《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者；

Rosa Luxemburg——罗莎·卢森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1916 年与李普克内西一起建立德国共产党，1919 年被捕遇害。曾被列宁称为“革命之鹰”；

黑格尔——不用介绍，老朋友啦，接头暗号嘛，还是那本《小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就更不用介绍啦。

这里就不——罗列顾准和这些新老朋友接头时，手持的是他们的哪一本著作了，否则这一章就会像一大张图书馆的书目登记单，难免冗长枯燥。

站在这些人中间，有这些书垫底，“腹有文章气自华”的他神采奕奕。就从“重逢”后的第一篇日记说起。一篇日记，他写了两千多字，一口气论述了三个极具原创性、时下中国还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充满了政治哲学气息。

顾准的文字功夫十分深厚，看他日后在中科院经济所相对比较安静和安全的环境下写出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希腊城邦制度》两部文稿，前者是由他读书笔记、随笔和与六弟陈敏之的通信汇编而成的文集，后者则是他读不同作者，不同版本的《希腊史》所做的笔记，两者思维的开阔，文笔的优美和表达的精准在同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顾准文存》中最吸引读者的地方。而他的日记因为是实时写下的文字，其随意性的痕迹就很重，尤其是所谓的“新生日记”，其文笔的隐蔽、晦涩、大量的曲笔，肉麻的夸张，初看上去真让人心酸。但只要你肯下工夫垫上浓重的时代背景细看，其信息量一点不亚于他的“党校日记”或“商城日记”，而有趣的程度则超过它们，简直就是一本时代的高级黑色幽默读本。这个放在日记被写下的时段来叙述。

说到他的自述——“坦白交代大全”，那就更加需要“解读”了。在这个方面他不如老朋友孙治方。十年文革，老孙就愣是一个字的检查不写。“文革中他根本不检查！”——这是他的养女李昭女士亲口告诉我的。可老顾写，“反正他们也不让我干什么正经事，让我写我就写，坦白交代当自传写好了”当事人口述。可这样写出来的《自传》可不能仅仅去“读”而是要“解读”。

这也是他留下的文字“不规范”、“不学术”的原因。日间艰辛的、超出他力所能及的劳动重压，夜间大量笔记、卡片的摘录，大量文稿的撰写，加上这些文字必须千方百计地藏匿和保存，最重要的是要时时提防在被偷看、抄查时人们由文字的断章取义对他更加严厉地“定罪”，他写作环境的严酷是眼下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很难想象的，许多文字的不精确，不打磨也因此是应该被原谅的。读顾准也需要有一点读《红楼梦》的能耐，在“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中看背后的东西，尤以“日记”和“自述”为最。“读顾”，最好横着看一遍再竖着看一遍——按时间顺序看一遍，再按事件脉络看一遍。

有人总结顾准一生经历了三次思想高峰，分别是1956年斯大林主义倒台后的反思、1963-1964年接触西方经济学思想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反思和临终前1973-1974年对人类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辉煌的总体反思。这是有道理的，但可惜遗漏了1959年这个高峰。

1959年的他和1955-1956年党校时期的他相比，已是大大地不同。

假如用攀登雪山，例如珠穆朗玛峰，乞力马扎罗峰作譬喻，用登顶作为他最后的思想高度，那么1956年他从党校毕业时还处在无装备，无经验，无向导的“三无状态”，仅仅靠一对“勇气”和“逻辑”的登山杖就开始攀登。到1957年他已经有了攀登的经验，有了登顶的地图并已攀登到了雪线下的大本营。到了1959年他已有了专业的“氧气瓶”和“食物”并攀登到雪线前了。

“To be or not to be?”

这句“世界名问”中文至今找不到一个公认的译句。大家比较偏爱的还是约定俗成的“生存，还是毁灭？”但语义立刻就窄了很多，而“是，还是不是？”语义就更混乱了，基本上没人敢用。可我的传主在1959年就发出了类似的“天问”，不是屈原挟雷携电式的“问天”而是哈姆雷特喃喃自语式的“问己”：

“到底是非跟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分手？还是仍旧可以服从这个基调？” 59.2.27.

这就是“雪线”，迷蒙、危险、无法预测。他已经攀越了多次，依然无法越过——气促，胆怯，不得不折回到大本营补充“给养”和“装备”。

从上年底回到北京已经快两个月了。在秀细心的调理下，他精神和体力都渐渐复原。吓坏了小高梁的凶恶的眼神柔顺了，“裤裆旁边的大破洞里露出一大团烂棉花”的棉裤也被秀处理了。换上穿惯了的吊带西装裤和洁白的衬衫，他几乎完全恢复了从前的绅士派头，只除了一件事——吃。他吃饭吃得很多，但比起“吃”书就小巫见大巫了。

赞皇七个月，他饿坏了，在胃和大脑两个器官。

从1955年“统购统销”开始使用粮票，顾家一大家子——三个“吃死老子”的半大小子，两个正在发育的女孩，奶奶、爸爸、妈妈一共八口，全靠奶奶和妈妈的精打细算，到了1959年初还没有让孩子们尝到饥饿的滋味，好歹能吃个半饱。现在爸爸回来了，在妈妈的号召下，孩子们都悄悄地少添一口饭，先让爸爸吃饱。这个，谁都没有意见。

可另一件事情就不大妙了，他“吃”书吃得简直是穷凶极恶。

读书时谁要是打扰了他，轻则会遭他“狺狺”两声，重则他根本就像看不见你，你在他眼中根本

就是个“隐身人”，他有本事能透过你去审视书架上的某本书，连母亲和秀也不例外。母亲早就习惯了这个不凡的儿子，秀也早就理解他从书中得到的欢乐很难与她分享，熟悉了丈夫的这种“如入无人之境”的状态，很少去打扰他。可孩子们不能理解。

从老大稻头到老幺小弟，五个孩子无一不以能得到爸爸的注视和夸赞而自豪，他是多么渊博，多么强大。但他对书的挚爱令他们醋意横生，尤其是爸爸读书过程中偶尔不得不面对他们时的那种空洞眼神，令他们黯然神伤，以致到了晚年依然不能释怀。

“先读哲学。从1月29日起，开始这个工作到现在是二十四天。二十四天中几乎废寝忘食，一个一个问题那么突击。具体的论点是小事，重要的是思想上解决了几个大问题。”^{59.2.23}

胃是补过来了，大脑还是饿，不，不仅仅是饿，是饥饿。

1959年1月，如乞丐般回到北京的顾准一经回复到习惯的生活环境，攀登就又开始了。每隔两天他就要跑一趟北京图书馆。熟门熟路了，二十四年前和秀一起流亡北平，他就把这儿当成半个家，既要为改写潘序伦的《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找资料，又要从日文、英文报纸上摘录全国抗战的信息交给上海党，他熟悉了她的各个角落。如今她变大了，书也多了，可他最希望寻找的书依然是没有，例如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出版物，经济学的最新论点以及处在经济发展最前沿的英美各国的经济类刊物，经济学家的新书等等。他只能另外一趟趟跑中科院的图书馆，从外文部借阅。

他完全不在乎人们看他的眼光，也不惮于和熟人打招呼。好在这些眼光大多是善意和同情，也有些是怜悯。他不需要怜悯，有点烦，就拿“夏瑜看华老栓”的眼光回敬了过去，反倒令对方无地自容。

每次夹着一臂弯的中外文大部头穿过各种各样的一道道目光，他都坦坦荡荡，从不在意别人议论他什么。有次完成秀交下来的任务，带着小高粱到理发室剃头，那时理发一般都要排队的，他也捧着本厚厚的《资本论》吭哧吭哧地“吃”，丝毫不理会周围惊诧的目光和小高粱的尴尬。

既然已经到了“雪线”跟前，他就下决心跨过去——穷追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预言到底还有多少是“**没有实现**”的，是错误的，马和恩、马和列到底是不是一体，他们的思想有没有差异，假如有，在哪里？到底是应该和他的“主义”分手，只把他当

做一位可敬的思想家来对话和求教，还是应该继续追随“没有他的他的主义”或者是别人冒充的他的主义？

这是雪线，也是生死线。

选择了前者他就必须跨过去，前边立刻就是雪崩区，冰川区，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就像那些僵坐着怒视峰顶的先驱们。选择了后者，那就可以打道回府了，至少还有个温暖的家，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们。凭着他全国数一数二会计学家的本事，全家人吃饱穿暖是毫无问题的，至多不再和这些填不饱肚子的政治、哲学劳什子打交道罢了。

可他好像根本就没有起过任何选择的念头就跨了过去。

雪线之上从未见过的壮美，令他“常如触电一样被震动”^{59.2.24.}，雪崩每一秒钟都可能发生，处处劈面高耸的冰川更令人战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他是幸运的。一路上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向导来带领他，鼓舞他，装备他——老的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亚当·斯密，少的有李嘉图、黑格尔、福泽谕吉、凯恩斯、罗素、杜威……就连马克思这位被质疑者也一刻没有抛弃他，不时用“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的话语来激励他。

“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

背起行囊，独自旅行，做一个孤独的散步者。

悲观的头脑，乐观的意志。

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只有那些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处的人，才会没有出头之日。

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

给自己一个希望和勇气。大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慷慨地说句‘大不了就是一死’！

嘿，哥们，我说，嘿，哥们，我说，没有意义的怎么可能存在。

世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

密涅瓦的猫头鹰（隐喻哲学家）在黄昏起飞。

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

……”

这是黑格尔的歌声，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絮絮叨叨，让他有些烦，就像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出色的学生偶尔也烦自己的导师一样。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顶峰的敬畏，对导师们的感激会令他很快谦卑下来。在他们面前他不迷信，不盲从但也不敢癫狂，因为他服膺。

他是那种让老师又爱又怕又绝不愿放弃的学生。在陡峭山路上他们陪着他攀登，整整一个团队在和他一起行进。他不如他们老练，但配得上与他们为伍。

意气风发，一路高歌，这个“独行侠”的好戏还在后头。

3. 三个问题

还是回到顾准 1959 年 2 月 23 日的日记，看看他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问题。”^{59.02.23} 开明宗义。

“政治-哲学”或者干脆取消中间那个破折号——“政治哲学”，不但在顾准的年代，即使在新时期开放后到世纪末的九十年代，“在中国一直是沉寂的，学术界很少有人使用‘政治哲学’这一术语，几乎没有人自觉地以政治哲学视野来处理和研究问题。这个沉寂状态直到新世纪初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刘擎《关于当代思想史的经验研究》顾准提出这个命题在 1959 年，也就是前述“根本性变化”开始前至少四十一年。

“不能对资本主义用预料的 Catastrophe（大灾变）期望它迅速灭亡，马克思的预言第一个失败是在英国，第二个失败是在德国，Bernstein（伯恩斯坦）原是道出了真相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将是和平的转变。历史违反了马克思的预言。”^{59.02.23}

直到 1960 年代后期，在所有思想家中，顾准对马克思的敬重和推崇一直非常特殊。他看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破绽，道出了他的预言在多处失验的地方，可还是为他辩解——“这是不能责备他的……那不是他的本意……他不想做人类与自然界全宇宙的创世主”^{59.2.23}。他敬重他，通读了好几遍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极尽赞叹。但这都是马克思在生命和思想都处于成熟期时候的著作。

可是难道，他高中的毕业论文也要算作他的“主义”？难道他早期的，例如二十几岁时写下的东西，这世界上半的人就应该奉为圭臬，照章革命，照章杀人？他和恩格斯关于一件相同事物的论点，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人们要故意地弘扬这个，隐匿那个，夸张这个，弱化那个，引申这个，斩断那个……这又是为什么？“意识”有固定的“形态”吗？如果有，那么“变化”和“进步又算什么呢？……”

“绝对主义的统治，确实存在过。自由主义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圣经。对比下来，反而社会主义是独断的、黑暗的了。” 59.2.23

从1956年开始的强烈的幻灭感，使他“由失望而偏向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几乎消失，” 59.2.23，现在逐渐地转了过来。“然而”，他说，“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即就其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是不完全的。物质利益的自由主义必然走向世纪末的肉欲与颓废”。 59.2.23

距离“世纪末”还有整整四十一年，他竟做了一次如此肯定的预言，却不幸一语成讖。

他并不提倡和向往资本主义，但是人类到底该怎样前进呢？

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求经济以“大跃进”的速度发展，“九三年”的罗伯斯庇尔式恐怖主义是没有了，可社会主义的罗伯斯庇尔恐怖生命力还强得很，尤其在中国，在中国农村，“对农村中的恐怖主义统治，不能低估其物质上的作用” 59.3.3。他已经在这样称呼所谓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硬搬教条和不伦不类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罗伯斯庇尔式恐怖主义的、普遍的农奴制。

顾准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恐怖主义”的人。

“无论如何，辩证法作为认识过程的描绘与认识规律则可，作为世界图式则不可……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不足以解释全部历史，比如中国大跃进的动力它就无法解释” 59.3.5。

不错，“大跃进”——以强行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为目的，在人文学上很难定义的这次社会性疯狂“痉挛”，其动力不但顾准一时找不出来，就算马克思再世，找出其原动力恐怕也难。能稍微“靠点谱”的解释说不定还是顾准前年和章乃器长谈时说过的一句话：“前人之失，大半由于发即兴之作。”

即兴之作，旋兴旋废，用霍布斯《利维坦》中对人类行为所下的定义——“不正常的激情（癫狂）——一般所谓的智慧之德的缺陷”也许比较靠谱。不过半年后，身处劳改营的顾准自认为找到了

答案，而这个答案哪怕放在今天看，也极其惊世骇俗：

“上帝明鉴，若四年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扎实实的提高一些产量，全国平均商品率达到 40%，毛先生就大功告成了。”^{60.1.16}

这很难让人苟同。仅仅两年前，毛先生才搞臭了马寅初先生，大力提倡人口无节制繁殖，表彰一口气生上七八个、十来个孩子的妇女，称她们作“母亲英雄”。虽说他老人家喜欢翻云覆雨，可怎么也不至于这么个“翻”、“覆”吧。

不过毛泽东先生的即兴之作是很多的，随心情，随情绪，随个人好恶，甚至随昨夜“睡得好不好”、今早“拉得好不好”而定，把老祖宗一句“治大国如烹小鲜”用到极致。至于“天子一怒，血流漂杵”，那是不要紧的，虽然他口口声声将“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其实作为个体的“人”在他眼中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不过蜚蜉蝼蚁而已。

顾准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并极为反感。就在论及“大跃进的动力无法解释”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到了后人探索顾准的一把“钥匙”之语：

“我的社会观只能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是人本主义者，所以如果说他有信仰，至多不过是信仰人类。信仰人类可以允许建立学派。宗教式的信仰，就要建立异教裁判所了。”^{59.3.5}

顾准尊崇人性和人道，憎恶漠视生命的政治游戏。不久后他的两个小外甥——两名清华大学学生，在罗伯斯庇尔式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 1960 年，公然组织清华大学一批孩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不知利害地向右派五舅舅顾准请教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对他们说：“你们与其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如研究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人本主义”^{宋家弟兄口述}。

顾准对马克思有一份特殊的尊重和推崇，常常不惜在扬弃他某些基本“论调”的同时又为他辩护。他和马克思始终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在他的时代，人们面对大人物以及代表他们的符号，例如著作、肖像、观念、思想等，要么是“仰视”——万岁、奉旨，要么是“俯视”——批判、斗争，很少能有“平视”的讨论。他却是常常要和马克思“讨论”问题的，大有“僭越”的意味。使处在那个时代，“人被造平等”^{美国《人权宣言》首句}的概念还是根深蒂固地深植在他的心中，这是三十年前爱多亚路上的英文教材，它留下的“母斑”很难消除。

相对于他对马克思的情感，顾准对列宁和列宁主义则很早就开始不客气和不以为然。早在党校时期，他就认为列宁是应该和斯大林一起受到谴责的。他无情地质问——

“列宁的遗嘱也公布了。斯大林的‘反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还没有人将它与列宁遗嘱连在一起评论，公平地说，我看应该是一件事，否则杀戮异己又如何会取得一个理论根据呢？”^{56.3.31}

请注意顾准在这里将“列宁遗嘱”称作“它”，与他将黑格尔的《小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称作“她”相比，情感色彩十分浓烈。

顾准认为列宁仅仅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所以坚持恐怖主义——专政这个方面，他对马恩学说的推崇超过接近马克思的人，其实各方面都是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了”^{59.2.25}。

断然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分割开来，这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语录》首条的国度无异亵渎，非议列宁则是大逆不道。可顾准认定，马就是马，列就是列，两人压根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尤其在辩证法方面，列宁“实在是无知的”^{59.2.23}。

再看他三年前的一篇党校日记：

“如果说，恩格斯……说明了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容纳在它的狭隘的生产关系中，面对着目前资本主义国内的实践与理论，怎能以一个不变的教条：列宁关于国家是专政的工具，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与无政府状态，而对这些大量存在的事实，闭目不看，充耳不闻，深闭固拒呢？”^{56.4.12}

说他狂妄也好，说他僭越也好，他就是不喜欢列宁。在“列宁遗著”公布后，他更认为列宁对斯大林的犯下的罪恶有无法推脱的责任。他无法与这位大人物平等对话，他的“睥睨”这一次用在了“伟大的导师”列宁身上。

顾准的读书书目、摘抄笔记、卡片中很少有列宁的东西，除非是党校课程表上硬性规定必读的著作，还有就是别人对列宁批判的著作摘录。例如他从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发展经济学》中摘录了许多有关列宁“现代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以少数人为基础，用无产阶级的名义取得政权，违反历史潮流以行”的论述^{笔记 P324-326}，“列宁就是根据一国内实行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工作的……通过使用武力镇压党内可能是多数派的叛变，决定在警察国家独裁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统治”^{同上}的独裁者。他读

马、读恩，读毛，也读斯，例如在“秘密报告”之后捧起《斯大林全集》狂读，但是一直到1959年，都没有看到过他通读列宁的文字记录。相反他谴责列宁的东西倒是常常看见，虽然有时写得十分夹缠。

再看顾准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问题。马克思对英国有过期望，恩格斯对德国有过期望。然而英德既然现代化了，否定现代化了的资本主义就不是1848年的纲领所能做成的了。1848年的纲领是反对野蛮化的资本主义的纲领，他们只能在野蛮化的资本主义上升早期实现。” 59.2.23.

“1848年的纲领”指的什么？非常明显就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最主线的马恩一系列关于“反对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或者干脆可以说就是《共产党宣言》。顾准很可能自己也吓着了，用了这样一个比较隐晦的名称来代替那个尽人皆知的响亮名号。

1848年，马克思先生三十岁，恩格斯先生二十八岁。

“马恩形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时间太早，来不及看见——后来虽然看见了，对暮年的马恩而言，已来不及改变他们的思想体系了。他们指出了问题的结症所在，却看错了历史的进程。结果，学说是在落后国家开了花，结了果。因为混合了经济发展规律的自觉掌握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主义二个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只在落后国家才产生了巨大的生命力，并收到了‘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 59.2.23.

至此，顾准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定了位——一种“混合了经济发展规律的自觉掌握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主义二个因素” 59.2.23 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强力推行的理论与主张或学说，但到了20世纪，它们已经过时了。

这篇日记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看错了历史的进程”，其理论只适合于低级和落后的社会且是恐怖主义的。

“第三个问题，最不重要的问题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切繁琐的争论都丢开，一件事倒是新发现：人类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调剂是可能的。然而初期只能服从必然。提纲（顾准在1958年曾经写过一个“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提纲”，是和孙冶方合作还是独立完成，因为1958年没有他只言片语面世不得而知。——作者注）在这方面强调了必然。” 59.2.23.

“调剂”——“必然”？

对！调剂——市场经济，必然——计划经济。当人类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经济稳固了，

罗伯斯庇尔的方法将一去不复返”^{59.3.12}。顾准预测了一个为期二十——三十年的全球性生产力的猛烈竞争，他预言“在这个竞争中甚至印度都会露出一手来的”^{59.3.12}。接着他又做了一个七年的预测

“苏联为了强烈地影响西方，七年内，七年后，政治上还将有极大变化。到1965年为止，斯大林时代的人都换掉了，新起来的人，出发点是赫鲁晓夫主义，终结点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肯定的是，民主主义必将出现，考茨基所说的，一个阶级不一定由一个政党来代表，至少将出现萌芽。”^{同上}

他从“最不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上}又转回到了政治哲学问题。

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发生与发展——否定的辩证法——发生与发展的辩证法——进化论，这才是他最为醉心探索的东西：

“关于否定的辩证法，与发生发展的问题，其关系究竟如何？否定的辩证法与进化论相背，发生与发展的辩证法与进化论是否相背？”^{59.2.23}

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是在党校学习期间才接触到的。“读物种起源。实在是深刻的东西”^{55.10.5}。现在他把它与“否定的辩证法”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并列比较，这比德国人特奥多·阿多尔诺1966年以《否定的辩证法》为代表作提出此概念，整整早了七年。阿多尔诺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的杰出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建筑师。

“这三个月的成就超过过去那八个月。写就了一个提纲，涉及到哲学的奥秘之处，弄清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把愤慨转为观察，失望转为希望。再下乡几个月，去观察活生生的生活，比之过去那个时期之还缺乏一定看法的情形是不相同了。”^{59.3.10}

他好有成就感。

4. 灵性的愉悦

就在顾准写下这些充满了政治哲学味道的、预言性日记的当口，继续劳改的通知下达了。

“今天采秀接到电话，准备出发去河南了” 59.3.10.

丈夫要去劳改，通知发给妻子，他连接收“单位”通知的资格都没有，成了彻底的贱民。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天，接到通知，反倒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不用再去那个赞皇，换一个地方就多一个观察点，取样更精确，他甚至有点高兴。“地点改为河南，不知是河南南部还是北部。若是南部山区，将更合我意。豫西山区也好，那个地方我不熟悉” 59.3.10。他哪里像个要去劳改的人，倒像是个挑选实验基地的教授。

“不想带什么书去。农村不是读书的地方，而是观察与记录的地方。观察还要细致一些，记录还要勤恳一些。不是愤慨而是观察，可以观察和记录的东西就多。” 59.3.10

观察，观察，观察，观察。短短一段话他用了四次“观察”一词，哈，这“教授”太专业啦！

从怀疑到质疑，从质疑到思辨，从思辨到归纳，从归纳到判断，顾准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愉悦。这是一种无法道于外人知的灵性上的愉悦。眼下就是要进一步论证自己的判断，观察“菌株”的变幻，一步步小心地求证。

“准备八个月的时间，又可以弄三十至五十万字回来，充实我的稿库。” 59.3.10.

他居然已经有了个稿库！劳改地成了他的“庄稼地”，家里屯了一库庄稼还不够，还要去收获且对收成信心爆满！

“一个个问题突击是艰苦的，但很愉快地烧掉几百张稿子是愉快的。” 59.2.23

1959年的中国还没有大兴文字狱，他这样做并不是在“销毁罪证”，而是认为这些从党校开始的探索如今有了结果，保存它们的痕迹已无太大的必要。这是个喜欢整洁和有序的人，深谙文字的“舍得”之道，凌乱的文牍和拖泥带水的文字是他深恶痛绝的。文字被烧掉，撕毁或者“冲下马桶”是件平常事，重要的是留下的东西，无论已经示人或尚未示人或永不示人的，其精确、干净必须保持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这个功夫是需要磨练的，从“潘序伦的年代”开始，他已经磨练了很多年。再说，他的家已经从原来以他“高干”名份分配的中关村高级干部宿舍搬到了以汪璧普通干部名份分配的百万庄建工部宿舍，工资已从九级干部二百六十元的高薪降为右派分子五十元的生活费。妻子能为他保

留一间小小的书房已属不易，探索阶段的稿纸，烧掉也罢。

但这都不是他愉快和痛快的主要原因。重要的是，独行侠顾准在攀登雪峰的苦旅中，忽然看见了一处舒适的雪洞，钻进去，心能安一安，气能喘一喘了，连肉体都是愉悦的——探索的方向没有错，烧掉来时的踪迹就是破釜沉舟——“我将不再回头”。

“雪洞”里的他打开氧气瓶，吸上几口。身心都更舒服了。

就在“花一元钱（买书挡 - 作者注），主要的书都立起来了”^{59.3.3}孩子般高兴中，他又一次开始读《小逻辑》，上次粗读还是4年前在党校，

“前天开始读小逻辑，昨天极粗地读了 Russell: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罗素：哲学的科学方法）。又翻逻辑，汪奠基的现代逻辑，康福斯的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等书。晚上三时左右才入睡。”^{59.3.5}

伯特兰·罗素的《哲学的科学方法》全名是《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哲学上科学方法应用的一个领域》，是这位“对爱情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简单而又强烈的感情支配了我一生”的西方现代数学、哲学和逻辑学家最著名的著述。

汪奠基先生则是顾准在中科院的同事，哲学所研究员，逻辑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主要从事西洋和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

《小逻辑》上次读还是四年前在党校的时候。再读，还是有新鲜感，但也依然和四年前一样和黑格尔的图式说犯别扭。

“历史唯物主义隐含着一个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这个必然规律向着共产主义的完成。我接受经济学的分析，但拒绝黑格尔式的图式。黑格尔的图式实际是未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以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这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前门拒绝形而上学，却从后门把形而上学的范畴——偷运进来。”^{59.3.5}

他判断：

“斯宾诺莎是泛神论，黑格尔是有神论，而普列汉诺夫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有信仰的。马克思是人本主义者，所以如说他有信仰，至多不过是信仰人类。”^{59.3.5}

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下了前面已多次提到的有关他世界观的一句话：

“我的社会观只能是人本主义的。”^{59.3.5.}，假如你非要说这就是工具主义，“我就接受工具主义。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视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天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须肇始目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目前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的对未来的预言”^{59.3.8.}。

这段话也是日后顾准写成集丛《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萌芽。

“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在英文中都是 humanitarianism，前者更加关注人的基本价值，比如生命和基本生存状况；后者则思考人的成长和发展价值。显然，此时的顾准受罗素的人本主义影响——“人是万物的尺度”很深。罗素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由专制而民主，由愚昧而启蒙，由残暴而宽容，由迷信而科学。罗素历史哲学思想的这个基调得自他反思的信念，而不是从某种思想体系或逻辑分析推导出来的结论。他的历史哲学也因此被称作是“反思的历史哲学。”

顾准再次重读罗素的《自由与组织》（顾准错写成“自然与组织”）一文，击掌称快：“明快清晰，极愜我意”^{59.3.8.}。他还同时读约翰·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极有意思。苦我问题极深者，不图于此公处获得解决。”^{59.3.7.}

苦他极深者，无非黑格尔“未脱离宗教气味”的绝对精神，并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这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无法从黑氏那里找到哲学的解答，“我看到那个绝对就头痛”^{59.3.8.}，于是就到杜威先生那里找些头痛粉之类的东西。

至少在1959年，顾准对黑格尔的图式说、目的论和形而上学还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他对黑格尔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就是在对《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的追索过程中，他发现“君临”中国的黑格尔哲学被中国的理论权威们追随者俄国人模式化、偶像化、工具化，成了号称马克思传承者们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真刀真枪“玩儿命”的事情。至此，顾准在依然不接受黑格尔绝对精神图式说的同时悟到“黑格尔哲学其实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文稿 P384}，而“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文稿 P242}。这和他早期只是单纯地拒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图式有着本质的差别，也是他精神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黑格尔的逻辑学一直是他的“葵花宝典”，和“那本书”一起，从未被他丢下过。

顾准的攀登在 1959 年 1 月到 3 月上旬这七十多天的时间里有一个极漂亮的冲刺，他在灵性和知性上的愉悦很难道与外人知，无人可以分享，连秀也不行。这是一个无序世界中罕见的有序灵魂。

第十章 1959 之殇

1. 地土多润湿，丰收有希望！

“通知已来，明晚 12:30 走。

“意外的是临走之前，还有幸知道有过一次会议，II/27-III/5（1959 年 2 月 27 日-3 月 5 日，郑州会议 - 作者注）。现在承认失败了。

“现在承认，1958 年刮了一阵共产之风；

“现在承认，大兵团作战是不行的；

“现在承认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

“没有说到废除供给制，这不过是为了避免与决议抵制而已。既承认按劳分配了，既说是要以生产队为核算与分配的基础了，就是说要废除供给制了。

“……总而言之，承认这是一阵痉挛。

“说到公开做自我批评，好呀！毛先生还从来没有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呐！

* * *

“这个时候下去是好极了的。去年我看了痉挛的发作，今年又有幸去看修正主义了。

“地土多润湿！丰收有希望。春播之前改变政策还来得及，迟了就不行了。” 59.03.12

这是顾准再次劳改出发前一天的日记，即不是勇敢，也不是“故作勇敢”的勇气，文字散发的是
一种真正的、灵与肉双重的愉悦，几无任何“伤别离”掺杂其中。

1959 年，仲春 3 月。

中原大地，华北大地，江南大地，华南大地，西南大地，西北大地……，上年被莫名其妙的人群疯狂蹂躏过的地土，在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秩序里顽强地苏醒了过来。又是一年惊蛰时，风是调的，雨是顺的，几千年来都以生存本身参与存在、具有无限包容能力的中国农民，心田也随之复活——“皇上”常常会发疯，上年发了疯，今年也许会平静下来。无序是暂时，有序是永恒，中国老百姓最是尊重常识传统，这就是“道”嘛。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

眼见党同农民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中共开始修正“一平二调三收款”，既平均主义的人民公社供给制和食堂制（一平），对生产队以及农民个人的财产和劳力无偿调拨（二调），把银行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三收款）这样毫无理性可言的苛政。会议在讨论中形成了《郑州会议记录》，并很快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四六骈文形式公诸于世：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就要被遣送劳改的顾准，临走前“有幸知道了”这次会议。

“有幸”，大半原因可能是拜汪璧“传达”所赐。他对他的党从未幸灾乐祸过，对他的国家遭遇如此浩劫更是痛心疾首。看到自己预言成谶，他惊喜参半。惊的是事情的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喜的是党意识到了，没有一意孤行下去的打算，苍生还有救，地土还有救，1958年的“痉挛”不能再延续到1959年了！现在修正还来得及！他对这个国家依然抱有巨大的希望：

“1960年工业生产总产值可以达到3000-3500亿，国民收入可以达到1500-2000亿，作为一个平衡而高速度发展的起点是大致可以的了。但1961-1965必将是一个收尾重于开始，整顿重于发展，农业重于工业的五年计划。”^{59.3.12.}

假如再不修正，就迟了！

二月郑州会议给芸芸众生带来的，仅仅是不再饥饿的盼望，是人的本能——活下去的盼望，给顾准带来的，除了这些还有他的中国，他曾经“在”过的党能够“痊愈”的盼望：既然在医学上“痉挛”、“抽风”、“癫痫”都是短暂发作的重症，按照常识，在社会学上也并不会长久。面对“远看青青近

却无”的大地，他四十四岁的心也随着地土的润湿而润湿起来，从心底里发出对大自然造化的一声咏叹：

“地土多润湿！丰收有希望……明天什么也不写，一切等车上再开始” 59.3.12

明天，是他去劳改的日子。

“劳改”——劳动改造的缩写，起源于1951年5月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的决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罪犯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劳改”制度来源并模仿苏联的“古拉格”（Гулаг——苏联劳动改造营总局缩写）。《牛津简明英汉词典》和《牛津成语和寓言词典》同时收入了Gulag（字音罗马化的古拉格）和Laogai（劳改）两个名词并做了基本相同的解释。中国右派被“送去”劳改营劳动改造，是中国小老弟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一门政治技术课——“古拉格”制度。与当年沙俄时代的政治犯被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苏维埃时代的“人民的敌人”被送进古拉格劳动惩戒一样，中国的异见者先被定义为右派，再被送入劳改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已经不是“人民”，更不是公民，而是犯人，政治犯、贱民。

命运的不可知、不确定往往最令人惊惧，甚至甚于确定性的死亡。有些人赴劳改营前自杀了，有些疯了，有些人先托孤再走，也有些人先离婚再走。“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是没有的，“十二月党人”式踏上流放之路的浪漫是没有的，有的，尽是耻辱，恐惧，无奈和茫然。这些右派们没有一个不是读书人，“读书”本身就是他们最大的罪过。

赴劳改营的旅程被选在午夜与凌晨交界处开始，无论当局是什么打算，“加增一层恐惧”的心理作用肯定是起到了。可在顾准，你看他的日记，不亚于明天要去登山，去郊游，去踏青的心情。他竟有些盼望那个午夜零点半开始的启程。

从赞皇回到今天，他是愉悦的，因为书，因为悟，还有就是“郑州会议”带来的消息。他确信他是一个胜利者——所有预测都应验了，虽然无力阻止，但他尽了责任和努力。就像一位地质工程师提前很久准确地预报了一次八级地震，即使自己也丧身在震中，临终前一瞬依然是骄傲的一样。

“胜利的人，不准骄傲，此去屁话不说，找一切机会去做实际工作，也许，这回下去可以做做

会计，可以干一些什么了。我还要歌功颂德，还要维护主席威信呐！” 59.03.12

可以不骄傲，可你挡不住他的嘲讽。2月底，他决定给自己放几天假不读书，为家人做几件实事。一是跑到银行去“对公债号码”取出一些现金，安排今后若干年他不再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家庭的预算。这些公债还是他和秀1953年购买的“建设公债”。那时虽然“下台”了，可他俩的工资相加还有四五百元，养活五个孩子和老母亲绰绰有裕。他们买下了不少公债。可如今，工资已经被惩罚性地砍掉了五分之四多，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有秀这一处工资来源。自己劳改，照理没有花钱的地方，可总得备个“不时之需”吧。老母亲上个月不慎摔伤，自己要去劳改，秀无法请假，只好将上海的大姐秉真接来北京照顾。这些都需要钱。

二是整理了自己和秀的藏书。

“花一元钱买了几个书挡，所有的书都立起来了……书真不少了。中关村阶段增加得最多，属我自己专业的书与杂志，足够占满两个五层的书架了。” 59.3.3

几个书挡就能带给他很大的愉快。生活上，他是非常容易满足的。

秀给他的零用钱都用来买了书，反正也没有别的开销，烟早就戒了，其他的，秀都安排得好好的。除了五十元生活费，他已经被停薪，秀对此从来都没有过一句怨言。

三是给亲友们复信、寄书。

给六弟敏之的信，是和他辩论“辩证法是否可以作为世界图式来套用世间的一切事物”，“六弟来信，辩难结果，他不能不服输” 59.3.5。

六弟常常服输，服得口服心服，让五哥得意得很。

给表妹夫秀彬也写了信。秀彬是庆志姑妈最喜欢的女婿，苏州的一名医生，这次也成了右派，是顾准这个表大舅子认为可以交流、讨论的伙伴，“臭味相投”。但是可惜，“写得慷慨激昂，采秀不准发” 59.2.27。看来秀的“书信检查”是够法西斯的，直接检查，信封都不要进。审过了你就发，审不过你就自行销毁吧，没什么好商量的。他也真听话，审就审，毁就毁，“老太婆做的事总是对的”，他常拿安徒生这篇童话里的这句话回答秀的种种吩咐，乖得很。确实，秀什么时候都是对的。

她比自己懂得外面的“风声”和“分寸”，而自己对这些东西总是那么迟钝，那么不设防。虽然眼下和过去比已经“进步”不少，可还是管不住这张嘴，不是要炫耀，而是很多话不说出来，不写出来好像是对不起什么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对不起谁，好像是对不起自己心底深处的一些什么。

秀大他一岁。从认识她那天起，他就被她身上水一般的安详降服了。他太浪漫也太容易躁动，却被她身上这种他最缺少的气质深深吸引。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无论是他显赫时还是倒霉时，激昂时还是消沉时，都是这一泓静水令他平复下来。他常常暗自惊叹，“哦，上善若水就是这样的啊。”

她即是妻子又是姐姐，他很依赖他，也很依恋她。她总是从容的，只除了这次。有个猛兽一样的东西眼看已经对孩子们张开血口，露出利齿。

高粱、五五、小弟已经被人骂过“小右派”了，稻头明年要考大学，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小米、高粱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都从不向妈妈诉苦，他们已经是小男子汉。但他们的眼睛瞒不住妈妈，毕竟一个十三岁，一个才十岁。恐惧感常常一下子就攫住了她，就是猛兽嗅到危险正在悄悄临近，就要吞噬小兽的那种感觉。她竭力掩盖着，可还是让他发现了。

他拧亮两张对面而放的写字台上那盏翠绿玻璃罩的双头台灯。这台灯算得上是他家的一件奢侈品——日本展览会上买下来的，价值不菲，但非常值得。漂亮还在其次，两人每个晚上都能脸对脸地在它温柔的灯光下读书和写字，抬眼就能看见对方，这才是最浪漫的。开关是双控的，秀通常要在他前边关灯，先一步为他准备洗漱的汤汤水水，展开被子，要么就是去看看孩子们和奶奶睡得好不好。她坚持要把台灯放在丈夫左手边的位置，却不顾自己写字的时候“影手”。

他在对面坐了下来，两人四目相望。

“秀，会过去的，依勿要惊慌。明朝是星期天，又是三八妇女节，阿拉一家好好过一天。孩子们会长大的，稻头都十七了，小弟也快上学咯。再过个十来年他们就都要飞咯。让孩子们在新疆、西藏和青海，让老头老太婆去看看他们，也看看建设起来的新地区，就是对阿拉最好的报酬咯。”

他和秀之间永远是吴依软语。不是熟人很难看出他是个上海人，除了这一点之外。

她慢慢平静了下来，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安详。这安详他曾百看不厌。往日都是她安慰他，现在反

了过来。她的不安比任何不安都令他不安。

几乎家家都不安生。

里夫早就是铁定的右派，好在老伙计和自己一样是个老运动员，大概已经千锤百炼得道成仙了。老孙弄了个“右倾”，他也不怕，反正也没孩子拖累，这老哥要是倔劲上来也够那些人喝一壶的。德藩，大姐秉真的长子，清华毕业的高材生，这次也成了右派，才二十多岁，还是个孩子，怎么也成了专政的对象？他们怎么会这样不自信，不宽容？

“3月8日是星期天，五虎上将麇集，棣妹与小苹齐来……孩子们极快乐，小米甚至打羽毛球忘掉了去学校的事。匆匆吃二碗泡饭而去。”^{59.3.8}

不安中，一家人都快乐着。奶奶，妈妈也快乐着。

不知怎地，他忽然就想起在党校时看过的两部苏联电影，不禁暗自笑了。一部是“秘密报告”公布前的《忠实的朋友》，滑稽片。他从头笑到尾，还记下了“这些欢乐应该拿到西欧去，去影响一下欧洲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快活不起来的”^{55.11.2}这样的日记，如今想想，可笑可叹。另一部是“秘密报告”公布后的《蜻蜓姑娘》，那天他记下的是“那个苏联电影把农村美化到什么程度哟！别墅式的住宅，城市式的居民点可以修建百万卢布的文化宫，动物园式的养鸡场。一年只能获得四五百亿卢布现金收入的苏联农村，决然做不到这一点”^{56.4.23}。

两篇日记相隔不足半年，但他已经不再相信他们，“思考”替代了“偶像”——怪不得那本书把“拜偶像”看得那么严重，列为人类“第一诫”。两天后的日记里，他就预测了“目前关于右派的问题……”^{56.4.25}，此时离“反右”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又做了一次“先知”。当全国人民都在跟着蜻蜓姑娘高唱“阿布溜溜溜地亢，阿布溜溜溜地亢，阿布溜溜溜地溜溜溜地亢……”时，他已经作为“主角”站在了揭批、斗争右派的大舞台上。

孩子们看见爸爸笑就更高兴，闹得更欢了。

五天后就要离开家，不是去出差，是去劳改。可他还是不顾小弟失望的眼神，放下羽毛球拍走回写字台，擦干净眼镜，翻开书，拿起笔。每当至此，妻子、老母和孩子们都知道，外边世界的一切就都与他无关了。

对于顾准，天伦之乐实在是一种奢侈。后人多有指责是“天伦”离弃了他，可他在“天伦”之中却浑然不知，顿失之时却倔强任性，失却之际却不懂挽回，也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罕见高度的全神贯注，是一个天才的重要特质，却也往往因此而下意识地摒弃了天伦，顾准即如是。

很多人想要思考。想要思考是一回事，而有思考的才能是另一回事。顾准有思考的才能，甚至是思考的天才，而他把自己的这种才能（或者天才）当做了责任，当做了使命。在中国，这种“天才之为责任”的情态通常被称作“野心”，而汉语词典中“野心”一词的解释——“对领土、权力或名利大而非分的欲望”反倒不被重视。连顾准自己不也说：还是“怡然自处，把野心烧成枯木死灰算了”^{56.3.15}吗？可顾准到底对“领土”、“权力”或“名利”，哪一项有“大而非分”的欲望呢？

“户口转好，行李打好，一切都弄好。0:30走，已算是明天了。”^{59.3.13}

他今天就写下了明天的日记。等你再见到他，已经是在他那最具震撼力的“商城日记”里了。

2. 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

“1959年3月，第二次下乡劳动，地点在河南省商城县……商城县属于信阳专区，到达信阳后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顾准等一行六个右派，四男两女，随中科院下放干部先乘火车从北京到信阳。

正值信阳地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某次重要会议精神，下放干部可以参加，六名右派被拒之门外不允许参加，一来更显得煞有介事地重要，二来要你再次加重概念——你已不是“人民”，已经没有如此“政治待遇”。

他早就知道此会无非是传达“郑州会议”精神，在北京他就从秀那里听过“传达”，兴奋劲都过去了。他要的是信息，不是“待遇”，但眼下还是要作出渴望、遗憾、羞愧的表情，否则就是“抵触”改造。这一套，在秀的帮助下他已经有点入门了。

承蒙领导看得起，要他这个原干部级别最高，右派级别也最高的人主持六个右派在大会隔壁的小间里开讨论会，主题是“对本人右派罪行的认识和下乡劳动的态度”，倒不是什么偏题、难题，他在

赞皇就轻车熟路了。

两个女右派都是中科院心理所的，搞心理学的不懂“政治心理”，被钓了鱼，打了蛇，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丈夫守不守得住空房，老人扛不扛得住，孩子们怎么办，全是事儿，凄惶得要命。

四个男右派，除了顾准，两个历史所的，一个语言所的。历史所的不懂“政治历史”，语言所的不懂“政治语言”，打你个右派，说实话也不大亏。

最可怜那位语言所的彭先生，更是个对“政治语言”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的主——原是位马来西亚华侨，一直嚷嚷着他有马来西亚国籍，中国政府无权这样对待他，多次用中文哀嚎“我是外国人哪！”，要求回大马去。组长顾准劝他稍安勿躁，劝君再莫谈什么权力不权力的，你既然回来了，就是要干革命的，越抵触你越干不了革命，越干不了革命你就越回不去大马。他又谆谆告诫组内各位男女，要好好改造自己，抵触情绪只会障碍自己的改造。

估计六个右派中顾准就是最老的一个了，无论从年龄上、右的资格上、见识上、学识上说，他的话大家还算都听得进去。只不知老顾你自己能不能现身说个法，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不“抵触”，怎样才能“改造”得好？怎样才能“永远不再犯错误”？

在县城呆了几天，讨论了几天的“改造”和“抵触”的辩证法，他们被分配到西大畷的县国营农场劳动。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中国农村，国营农场和真正的乡下农村都有着巨大差别。农场干部和农工都是工薪制，这就等于旱涝保收；耕作机械化程度较之农村的“零”，什么时候都等于无穷大。顾准一行来到农场时，“农场工人吃饭还不限量，而生产队里粮食定量一般已远低于一斤（劳动力人均日定量 - 作者注）”。

顾准在这里第一次见识了双轮双铧犁。这个东西当年名气非凡，农业部曾在浙江省黄岩县召开双轮双铧犁耕作现场会，毛泽东先生亲自撰文大力赞扬，全国推广。但是农民不待见不喜欢。顾准在他1957年的《试论》中就质问过：

“（一）凡是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它的生产与流通是不受价值规律调节的么？为什么国家花了这样大的劲，供应农村的双轮双铧犁大量退销？”

（二）为什么许多国营工厂堆积了大量的机械工具没有投入生产？那些生产工具不是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的么？认真严肃地考虑这两件事，我们将不仅在政策上获得有益的结论，也将在理论上获得有益的结论。” 文稿 P121

现在顾准总算见识到这大名鼎鼎的农具了。在十年后的“历史交代”中，他没话找话写下看到它而“懂得了犁地工具和牵引力的关系”这样“淡出鸟来”的体会，不再问上那么多令人心烦意乱的为什么，他是真学“乖”了。不间断地攫取着世界重大经济信息的他，怎么会不知道 1959 年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乃至苏联、东欧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可除了这样的低级白痴（或高级幽默）语言，你又能让他在“坦白交代”中说点什么？真无法想象他是怎么能在相同的时间里，既写这种连“下里巴人”看着都难受的“扯谈”，又写下《希腊城邦制度》的阳春白雪的。

他还“领会到田间选种的重要性”，更是“扯谈”得紧。

在领会“犁地工具和牵引力的关系”以及“田间选种的重要性”之余，顾准“观察”和“取样”的手眼可没有闲着。听到农场会计透露的某生产队虚报存量，被查出“粮屯面层有一层稻谷，底下全是糠粃云云” 自述 P257，加上先前看到农场“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的大锅饭现象，他断定“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前，即 1958 年商城县的工作中，恐怕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了”。

从中科院劳动队到达商城那天起，商城县委就坚决要求把这六个右派集中监管，送到劳动最艰苦的铁佛寺水库去。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

第一，白捡几个不给钱的劳动力。到了 1959 年 6 月，不付一分钱工资，等于服徭役的几千民工从工地上大批逃跑，头年开始施建时数千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五百人左右。县委将流放商城劳动改造的右派，包括本城的，信阳地区的，省会郑州的，首都北京的，也是五百人左右统统做了徭役人员，以革命的名义坚决地把他们送到最艰苦的水库工地，集中劳动改造。第二，要说北京中科院的这六个右派男女也指不上他们能干多少活，他们的价值更在于物以稀为贵，来自北京，高干、高知，不是反右派，我们哪里会见到你们？你们又哪里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把你们交到人民手里，那是伟大领袖的信任。我们必须好好改造你们并好好展示你们，也就展示了这种信任，展示了我们的重要。另外我们县城自己也弄出了几百个右派，加上信阳、郑州送来的，你们正好“物以类聚”，也便于我们集中管

理。再说，你们在农场呆着，大锅饭的负担也太重，下放干部就不说了，你右派凭什么吃那么饱？少一张嘴就少一份嚼谷不是？

“1958年6月中旬，我们这个劳动队伍中的六个右派分子，集中到县委直接领导的铁佛寺劳动队去劳动。”

离京前，中科院党委指示带队的下放干部，原则上不要让这六个右派离开中科院的劳动队伍。他们也知道这些人假如真的到了社会最底层，弄不好会闹出人命来。顾准一行六名右派这才得以在西大畷农场呆了三个月，吃了三个月饱饭。比起赞皇时的饥饿和狼狈，顾准很知足。可命运的喉咙那里是自己能“扼住”的，尤其是右派分子的命运。

6月，院部派来一位巡视大员到商城“看望”同志们，几经磋商同意了县委坚持要把这六人转走的要求。一个基层县委按常理是不能置喙中央大机关内部事务的，可现在商城是人家的地盘，县委书记、县长一生也没有过如此“管理中央事务”的机会，加上本来“原则上要”或者“原则上不要”都是地道中国式话语，原则上事情是可以灵活处理或者反着处理的，巡视大员犯不着为了几个右派分子和地方同志较劲。六个右派就这样被别人商议着决定了何去何从。他们心里都清楚，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法与西大畷相比的糟糕状况，当他们到了水库劳改队时将会无限怀念地想起西大畷，就像是回想一个黄金时代。

“6月12，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 60.1.12.

顾准一行六个右派是6月12日步行来到铁佛寺水库工地的。从西大畷国营农场到铁佛寺水库大约不到三公里，六个人的行李，两架架子车加上一个担子，他们上了路。自中科院方面和工地方面人员办了交接，六个人就算是和科学院没关系了，跟着“那边”的人走就行了，前方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最好不要问。

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改造好。如果真有回到从前生活环境的一天（生活方式是想都不用想了）他也一定是最后一个。想早一天回北京，办法倒是有的——把迷彩服穿穿好，眉低些，眼顺些，嘴闭起来，脸收起来，把秀苦口婆心教他的那些话说起来，脑子暂时冷冻起来……凭着他的智商，都不是难事。但是他做不到，不是做不到，是不屑去做。所以比起那五位，他澹定得多，日后也让管理

右派者恼怒得多。

他们就跟着“那边”的人一路车拉担挑走到了工地。好在都还不算岁数太大，最老的顾准也才四十四岁。

走上一面高坡，铁佛寺水库工地蓦然呈现在眼底。六个人愣住了。

“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这句话不是我的传主随手写下的。假如这样来打标点符号——“到劳动队时（才）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读者就会清楚这里出现的场景对这六个人有什么样的心理震撼。它不但超出了心理所、历史所、语言所男女右派们的想象，也超出了综考会右派顾准的想象。

从俄罗斯小说、苏联小说中，从《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中，他都见识过这种地方，加上《罗马史》以及乔万尼奥里的小说《斯巴达克斯》。这种地方自古就有，彼时叫奴隶营，现在叫集中营。类似监狱的大型关押地，用于隔离，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敌侨、以及属于某一特定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团体的成员，使他们与外界隔绝。集中营与监狱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押的人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或行为，往往不经过正常、公正的法律判决即遭拘压，没有确定的拘压期限。

水库工地十分壮观，如一只巨大无比的盆子，以高地为其边沿，突然就凹了下去。“盆子”里是数不清的人，蚂蚁一样的人，车拉肩挑，沿着一条条为减轻坡道陡峭度而不断折返蜿蜒的狭窄车道，从盆子里往外搬运土石方。

正值气温日升的6月中旬，又是太阳当顶的中午，酷热难当，人群着衣尽量地少。男人都光着膀子，下身是条缅甸的裤头。还有不少女人，要紧处总算还有衣裤遮挡，缅甸裤也稍长一些。所谓“缅甸”就是把长长的裤腰在腰部掖紧后翻过来以保持不掉，因为要干活，外边再加条绳子束紧。

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如锅底，不是健康的黝黑，是一种很难形容的腐质的暗黑。其次就是消瘦，骨瘦如柴，却干着蚂蚁搬家一样沉重的活计，而且，居然也还干得动。男人女人不近看是分辨不出来的，就像蚂蚁不拿到显微镜下分辨不出雌雄一样。

顾准脑子里早就有“蚂蚁窝”这个概念，但依然被眼前真正看到的“蚂蚁窝”震慑了。“这就是

人民”，他想。

很早，他就开始琢磨“人民”这个概念。党校时期读《法兰西内战》，他对马克思如此肯定巴黎公社就有些不以为然。人民是什么？人民不就是一个个渔父桑娘，牧者田丁，贩夫走卒吗？虽然经济学就是为这些人的生存谋划，可他们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就如眼前的男女，他们肯定是“人民”，可是他们能决定什么？如此奴隶般的劳作难道就是在创造历史吗？他们能实现“直接民主”吗？真要能实现，他们的第一项要求岂不就是停止这样的劳作吗？

“盆子”里连一样带有机械性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吊车，挖土机，铲车，推土机，统统没有，“人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这些玩意儿，全部的“机械”就在于他们的肌肉，心脏和血液，还有骨骼，还有那口“气”。

两个女右派先战栗起来，男人们则下意识地双眼上抬。幸亏，六人多是“四眼儿”，镜片后面的水雾不大容易被人发现。搞心理的，心理先崩溃了；搞历史的，这回算是见识了什么叫真实的历史；搞语言的，已经没有什么语言好说，只有搞“综考”的顾准，他还要“综合考察”。

“难道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乐生’？这样的劳动就是他说的‘乐生的第一要素’？”如今既然上帝安排我进了这个“蚂蚁窝”，那么我就有了考察它的义务和责任，虽然这种义务和责任是如此沉重，沉重到我不知道能不能扛得起。

肯定了自己身处的是一处集中营，他反倒踏实下来。

自己本就是一名“劳改犯”，三个月来混迹于“下放干部”中间，虽然取消了一切“政治待遇”，可这个待遇本身就够高的。想想出发前自己还“豫北”、“豫西”、“豫南”地筹划，他有些好笑。现在他来到的就是当初“更合我意”的豫南山区，本应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前三个月的西大畷农场也确如他的想象。今天来到离西大畷仅仅几公里的铁佛寺，呈现眼前的却是如此炼狱般的景象。顾准思想准备再充足，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想。

这“盆子”显然不是大自然的造化而是悖逆的人在“与天奋斗”。1958年3月，商城县委书记王某就凭着“我来了”的激情，巨手一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决定了要在铁佛寺山和培山之间修

筑大坝，拦河蓄水，修建铁佛寺水库。

这是个典型的大跃进工程，没有勘探、没有设计、没有图纸、没有规划、没有工程师更没有总工程师。书记三月激情燃烧，六月就开了工，首长们亲自督战，火速从各个区，镇，村抽调了几千民工下手修筑大坝，各种“大跃进”手法都用上了。查阅商城县志办公室收藏的一本油印本口述历史文档——《商城水利志》中关于铁佛寺水库的专篇，其防洪、泄洪、疏浚、承压……等等筑库常识均不在考量范围之内，施工的唯一标准就是“多、快、好、省”——又一个毫无逻辑的中国式“原创”，为一年后必然的大坝垮塌，“人或为鱼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垮坝前已经回北京的顾准，其实是个幸存者，只是现在的他什么也不知道罢了。

看着眼前这只“大盆”，看着盆里的“蚂蚁窝”，眼下的他明白真正的“严酷”这才算是刚刚开头。但即使顾准，也没有想到这种“严酷”和沉重最后会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就算他是先知，也超出了他的预知能力。

几乎立刻，顾准就成了蚂蚁窝中的一只“工蚁”，但时间不长。

“到劳动队之初，我参加了几天修筑大坝的运料工作，以后一直在自给菜园”。

菜园劳动，顾名思义也比盆子里的“工蚁”劳动强度要小。他为何受到如此优渥？这需要追问。是劳动队怕出人命。

谁也不愿、不敢和这位四十四岁的老右派搭班推拉一辆架子车，坡陡车重，半道上泄了劲那是要出大事的。让他自己推独轮车更不可能，连小右派们都搞不成这活儿，他一个半老头要了他的老命也枉然。挑担吧，没几天他右腿就瘸了，再让他挑，疼死他事小，挡了大家的道事大。对这样的老混蛋还真没办法，只好调到菜园组去。菜园组就在“盆沿”下边，以种菜自给自足，有多余也卖一些给工地民工。

从此顾准就成了“菜园顾”，人们都这样唤他。比起监狱的叫号，多少感觉好受一些。

让一个人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熟悉和习惯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啻是致命的伤害。当年对待右派的的惩罚就是这种方式——彻底改变你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

方式，还要你承认这不是“惩罚”而是“改造”，要你去掉脑子里自己的意识，顺应统治者的思路。可是惩罚肉体好办，意识怎样惩罚、改造？那就只有一法——洗脑。劳改——洗脑，在政治学和哲学、动物学和生物学上的意义是相近的。

人们都熟悉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 1948 年的政治幻想小说《1984》，如今这本薄薄的小书竖立在许许多多中国家庭的书架上。此书最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老大哥”集团对外围党员温斯特的“洗脑”过程，从狂轰滥炸的宣传、灌输到惩罚性劳动，到拷打，到老鼠（温斯特最恐惧之物）的出现，读来令人窒息。

可是鲜有人知顾准的“商城日记”——一部非虚构、非预言，亲历者的记录，一个洗脑全过程程序目录，其鬼魅、恐怖和惊悚，不在《1984》之下。

3. 商城-殇城

商城隶属河南省信阳专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大别山北麓，隋名殷城，北宋改商城，“殷”、“商”都占了。1932 年还因河南省第一个苏维埃县级组织在此成立改名“赤城”，据说著名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出自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不过 1937 年又复名商城，可能是白军复辟了，后来就没有再改来改去的。抗日时期，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四军曾在此和日军周旋多年，牺牲将士万人以上。《新华日报》著名记者章汉夫，革命诗人臧克家等领导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电影艺术家王莹、金山领导的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都曾云集于此。商城也是 1947 年 8 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根据地，邓小平的“前指”就曾设立在顾准日记中多次提到的长竹园。

到了 1950 年代，商城全县耕地面积在 65 万亩左右，全县人口大约 42 万人，虽说是大别山区，人均耕地也超过了 1.5 亩，加上山清水秀，林业资源和水资源都丰富，在全省范围内算的上是个相当富裕的县份。

1958 年 6 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信阳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 2105 斤、第一生产大队平均亩产 3530.75 斤、西平县城关公社小麦亩产 7320 斤的消息，在全国首次放了“卫星”。

1959 年信阳大旱，春播时滴雨未下，地委却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8 月，庐山会议精神

传达到信阳。在向中央预报粮食产量时，九名常委中有 8 名认为 1959 年一定比 1958 年更丰收。既然 1958 年是 56 亿斤，1959 年就预估了 72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数字将征购任务定为 9.6 亿斤，最后确定数额时地委又向各县追加 20%——1.6 亿斤，这是连农民的口粮、种子都算了进去。

信阳也是“全民大办钢铁”的先驱和先烈。

1958 年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 30% 的 120 万人被迫参与所谓“大办钢铁”，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 6000 吨的“超级卫星”，还有 50 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滚珠轴承”原是最普通的机械零件，本应由专业工厂或作坊批量生产，却不知触动了哪位领导的那根筋，成为“全民大办”的东西，其质量、精密度和可用性可想而知。商城的“大办”还惊动了中央，冶金部曾在商城召开现场会向全国宣传。

还有个更要命的“大兴水利”。

商城县 1958 年夏开始兴建铁佛寺水库，全凭书记、县长吃饱喝足后激发出来的革命豪情，巨手一挥就开了工，无勘探，无设计，无图纸，无规划，无论证，无工程技术人员……。是时信阳地区各水利工地上的 200 万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肚皮吃饱了，领导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兴头上自不必说，百姓也在兴头上，以为共产主义也就是明年后年的事儿了。但是到了 1959 年夏，农民嗅到了危险的味道——饥饿——大饥荒——大恐怖近在眼前的味道。

去年的“青壮炼铁去”尚还有“收禾童与姑”，今年则连“谷撒地，薯叶枯”的景象也没有了，却还在强征“青壮”修水库，分文不给，还要自带干粮。几年前就许偌下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无望了，“水利带来大丰收”是无望了，“全国都来支援”是无望了，“万不得已政府也会补助”是无望了……，一切都是瞎话。

一切“无望”都不打紧，最令他们颤栗的是因为没有“春种”，怎么可能有“秋收”！凭借着千年万年的本能，农民们终于意识到大饥荒就在眼前——和 17 年前的 1942 年完全一样甚至更加可怕的饥荒，就像猛兽已经蹲守在家家户户的门口，张开血盆大口，准备着残暴的吞噬。轻信而迟钝的农民开始恐慌。他们竭力藏匿起一点口粮，希望能熬到第二年春末，至少能收获些瓜果果腹以求不死，却遭到“反瞒产私分”的血腥镇压。全地区因被搜出私藏口粮而遭毒打酷刑致死的有六万七千人，加上自杀的，人数已超过八万《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1962.7.10。

从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信阳地区因饥饿死亡总数 436,882 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 8,042,097 人的 5.92%。一万多个村庄全村死绝，其中商城占去 453 个，全地区人相食事件几十起，顾准日记中记录了其中发生在商城的两起。这一次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超过 1942 年同一地区的另一

次大饥荒，其中人为的残酷和暴烈更远甚于后者。

两次大饥荒时间仅仅相隔十七年。

“这也是本部农民的厄运。若说 1959 年灾荒，他们必将倒下一批人，但 1958 年上半年，丰收年成的一个春季，他们的厄运已经开始了。若说 1959 年是灾荒，但 1960 年即使是丰收年，即使丰收年继续一个时期，他们的状况也改变不了多少。产量已被夸大到远离实际，以后还要每年加 10%，农业，商品率已被提高到首位，情况哪能改善呢？”^{60.1.11.}

这是已经逃离铁佛寺水库回到商城县城，马上要回北京的顾准写下的日记，他的预言都应验了——中原农民苦，信阳农民苦，商城农民苦，苦不堪言。

和大饥荒同时出现的，还有个右派劳改。

四十万人的商城县，不足两万人的城关镇，“参加运动”人数也就是“读书人”——县机关干部、小学教员、县医院医生护士、商业工作者等等不足三千人，打出的右派就高达 464 人，所占比例高达 17.1%，也算是“放卫星”吧。他们中间最小的 18 岁，最大的 66 岁，最高职位为副县级、区长级，大半是小学教员，因为彼时商城连个中学也没有。他们全部被送到铁佛寺水库劳动改造。

至于他们的“罪行”，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顾准日记”里提到过三次的张保秀，女，1957 年划为右派时二十三岁，到 1959 年和顾准在铁佛寺水库工地相遇时二十五岁。其全部罪行是“双百”的时候在会上说了一句“现在的教育系统有点混乱”，就被自己某位小学同学，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城关小学的共产党员政治校长，一手送进了右派队伍。拿今天已经八十岁的张保秀老人自己的话说——“年年五一，十一我穿着漂亮的布拉吉带着学生们游行联欢时，他都在城门口卖豆腐，后来也不知怎地就做了我们的校长。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惹着他了，大概他看不惯我。”

1959 年 3 月被发配劳动改造的顾准，面对和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信阳，这样一个商城，这样一个人群。

1959，中国一个普通的、紧接着丰收年成的上年并以风调雨顺、地土润湿开始的年份，却以哀鸿遍野，饿殍盈街，人相食结尾，其恐怖和吊诡至今还后无来者。

1959 的恐怖是一个国家的恐怖，一个民族的恐怖，也是人类的恐怖。信阳是其中最恐怖的中心之一，是震惊世界的“信阳事件”发生地，其中也包括了顾准劳改所在的商城。

商城，一座名副其实的殇城。

4. 勒索与人质

被水库工地“猿的社会”景象震惊并被从“盆子”里被淘汰出来的顾准很快镇定下来。

菜园组的活依然很重，但还是他负得起的轭。劳作很艰辛，但可以吃饱，工伤的概率和程度和“盆子”里常常死人相比要低得多，活下去还是问题不大的。菜园组的出产供应劳动队自己，是谓“自给自足”。

“自给菜园所生产的蔬菜，凡供给本队食用的不计价，借以节省队员的伙食费。供应本队队员私人消费的瓜果（西瓜、菜瓜、黄瓜、西红柿）由队员出价购买”。

如今他只有五十元生活费，可比起当地的右派却是笔巨款，甚至大大超过他们未作右派之前原本的工资，更别说眼下的一无所有了。他的生活费每月发到北京秀的手上，秀知道他苦，不时寄些钱给他。他是菜园组的财主，也是右派劳动队的财主，加上他天性慷慨，对钱也没什么概念，就常常请大家的客吃瓜果，自己也大饱口福。加上他又开始抽烟，有时就花超了支。

“这一段生活过得去，劳动强度不高。分的饭吃不完，大啖瓜果……实际过得比农场（还）好，消费不受清教徒式的生活戒律所限制。伙食也好，粮多，初期菜多，后来大吃南瓜，花钱多，慷慨，请客” 60.1.16。

一直到7月份，劳动时间还算正常，也就是十个小时左右，他撑得住。可是他很快就惊恐地发现有个巨大的问题——大脑进入了一种无法开动、思路“短路”，思维“锈住”的状况：

“这一段时间的心理上的特征是觉得日子过得昏昏沉沉的……确实单纯……然而只能这样过。据劳动队其他人们诉说，大致都有着一段。不过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有人说‘不习惯’，或者像沈所说，叫做‘没有接上头’等等。” 60.1.16

紧接着是一个恐怖期。

他被要求穿上胶鞋，下到粪池子的底部，用铁锹和手把大粪弄到粪筐里，然后挑上一百多斤的粪肥走上二三里路到菜园，浇水，浇粪，除草，间苗。到了盛夏，一天劳动时间已经延长到了十五六个

小时。白天在烈日下，他也学会了和农民一样用湿手巾包住头部以防中暑倒下；夜里，菜园要巡视以防人偷菜，午夜十二点要起来巡夜，第二天白天得照常整天劳动。

“然后是恐怖与屈服。” 60.1.16

几个月过去人们已经分辨不出他到底是个当地老农还是个北京城里下放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了，除了那副眼镜。到了后来，他索性连眼镜也不戴，反正活计看不见也能干下去。

“正是在劳动队，我才算把知识分子架子和官架子真正、完全、彻底、干净地放下来了。”比起他自参加革命后从未间断过的每一次磨难，这一次不仅仅是“触及了灵魂”还“触及了皮肉”，真正、完全、彻底、干净地触及，不，不是触及，是鞭答！

他一次次被告知：“脏”的，不是粪尿，是你的灵魂；“苦”的，不是活计本身而是你的皮肉；“累”的，不是你的肌体而是你的坏思想。能让你来这里改造，那是党认为你还有救，否则就算枪毙了你，你又能怎样？枪毙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你不都看见了吗？

混混沌沌中，他有时竟有些相信了，就像有人在施催眠术——又是一次群体的催眠。

他不想死在这里。才四十四岁，有家庭，有孩子，还有那么艰苦建设起来的一个“稿库”，他舍不得。最最重要的是，还有秀。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搞了这么多恐怖在勒索什么呢？他们想要何样的赎金？他们的“人质”又是什么呢？

“‘摘帽子’的刺激，对恐怖到屈服的人来说，产生大跃进的效应是一种常态……我，恰逢其会，碰到摘帽子这一次政治勒索，于是精神振奋，劳动积极，负病干活，思想活跃，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一句话，‘变好了’。” 60.1.16.

于是我的传主真的“变好了”。先看看我的传主怎样“变好了”。面对他心知肚明的“政治勒索”，他怎样交出赎金，他想要赎回些什么。

“昨晚，‘写笔记’时接秀信，语句公式化，吾心所深知，却不免有所波动。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幸床铺是单置的，未为人所知。” 59.10.17.

这是我读顾准中第一次看到他的眼泪。

有一句中国古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曾被极峰（有时他也叫他‘极笔’）

改成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离婚时”，离婚，确是右派们的切肤之痛，无论男女。多年后，秀和顾准相隔六年先后离世。孩子们在痛定思痛时一致认为，母亲在世时难于分享父亲探索的欢乐和分担他思辨的痛苦，是造成她玉碎的主因。

细想，不然。

顾准、汪璧，这对夫妻的相亲相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谁更爱谁，需要追究一下这个比较无聊的问题才能找到他们的分手和秀的玉碎的真正原因。假如说他们相互间爱的分量难分仲伯，那么谁更依赖谁却是一目了然的——顾准更加依赖、依恋汪璧。

秀，才是顾准最软的软肋。

如果说《1984》中温斯特最不堪一击的软肋是极端恐惧于老鼠的近身和啃噬，那么顾准的“老鼠”就是秀，虽然这个比喻很不敬，但没有比它再贴切的了。结婚二十六年了，他依然像个孩子似的离不开她。对于他，秀是个姐姐加母亲的妻子，前边已经讲到过很多细节，最温馨的莫过于在他最烦躁不安的理想幻灭期——1956年，她每个周末都要精心挑选一本文艺书籍为他分心解闷。有一个星期六竟然是一本《安徒生童话集》。

这世上在孩子床头放上一本《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的母亲何止千万，可有几个做妻子的能像秀那样为自己已经四十一岁的、犯了错误撤了职、焦躁不安的丈夫挑选一本同样的童话书的？顾准魔王般的渊博中怎么见得就没有秀的一瓢弱水？从秀给他准备的床头书书目中，怎么可能看不出这个温柔的南国女子那颗精致的心——《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双城记》、《金钱》、《小酒店》、《高老头》、《小裁缝》……？

你再看四十一岁的顾准在日记中怎样倾诉对妻子的依恋。注意是依恋，不是爱，但满含着爱：

“那本书（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 作者注），有很多庸人习气和宗教气味，但写得极其温柔，因而也使我想到了我有这样好的一个家庭。7月以来，我的生活如此稳定幸福，实在是一生所未有的。”^{55.11.22}

“倒是发现采秀也是有些忧郁的，自然也引起我的忧郁。出来时我跟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55.12.11}

“采秀之去西安，要分别一个多月，不免使我若有所失……” 56.2.27

“……现在就是盼望她早日回来。” 56.3.4.

“又过了一个假日。秀不在家，悒悒寡欢。” 56.3.11.

“采秀未回，这一星期未来信。实在希望她早回。” 日记 56.3.18.

“……内心的激动实在非常厉害。采秀出去一个多月中，热切盼望……” 56.4.6.

……

这哪像是一位结婚二十几年，共同抚养了五个孩子的、四十多岁的丈夫为思念小别的、四十多岁的妻子而写下的日记，分明是个在暗中急切盼着情人到来的初恋小伙子。

你再看那两张脸对脸并排而放的写字台，看到那盏在顾准的左边、秀的右边的漂亮的绿玻璃罩双头台灯了吗？它能告诉你多少故事！她是他的妻子，姐姐，母亲加爱人。她爱他，他对她则是爱加依恋，他是他的精神支柱。他们现在绑架了要勒索他的，就是她啊。

临来商城，他已经发现她有些异样，就是那种母兽嗅到危险正在悄悄临近，就要吞噬小兽的浸入骨髓的恐惧。“小兽”们个个都可爱，都是他的骄傲。可是在他眼里，秀才是第一位的，孩子们永远是第二位的。他们都会长大，会离开老头子和老太婆远走高飞，他自己不是十三岁就挑起了养活一大家子人的重担了吗？有苗不怕不成树，老太婆才是唯一最宝贵的。

可他完全不懂一个有着五个孩子的女人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从赞皇回北京后，他和稻头有过一次严重的冲突。已经十七岁的大女儿对爸爸说出的某些话极为反感，这和她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完全不是一回事，南辕北辙。她和小米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了爸爸是个犯了错误又坚持不改的人，是个右派。他们又怕又厌恶，又无法完全抵消他们从小就固有的对爸爸的热爱和敬佩，非常煎熬。

这一次，秀站在了稻头一边。而从前他总以为他才是秀生活的中心，他爱她，她也爱他，这就够了。直到商城劳改结束前他还认为“除掉采秀，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听到我的真心话” 60.1.11.。

就像一个人，一生就只有两件珍宝，人们却恰恰要褫夺其中的一件而勒索那一件。现在他们要勒

索他的思想而绑架的人质正是那另一件珍宝——她——秀！

绑架和勒索的程序在“模子”中已经启动，正稳步运行。他们已经开始在信上吵架了。

“15日向秀要钱，二十一日信，更前一些还有一信，担心我改造不好。” 59.10.23.

秀要的是丈夫的平安，一个完整的而不是遍体鳞伤的丈夫。她不愿随他去跨越那道雪线。和一个平安的丈夫，五个平安的孩子相比，那雪线，那顶峰都不足道。我要你回来，回到雪线之下，回到大本营，回到北京，回到我们百万庄的建工部宿舍。你没有工资，我还有，我们省吃俭用绝对活得下去，你没有工作，可以去读读书，钓钓鱼，只要太阳下山时我能看到你，孩子们能看到爸爸，我们一家完完整整的就行。我不要先驱和勇士，我要一个全须全尾的丈夫，孩子们要一个全须全尾的父亲。

“你好好改造了吗？否则我不会寄钱给你。”

可秀并不知道，他的胫骨已经压坏了，要钱是去看医生啊。像个倔强任性的大孩子，顾准越来越不讲理了：

“昨晚复信给秀，有‘生活本有各种方式，一切由你决定好了（的字样）’……没有钱，不敢到医院去，对秀的意见愈来愈多了。” 59.10.24.

秀马上寄了钱过来。

“秀寄三十元来。决定不再吃零食，计划储蓄二十元。秀说我昧于形势，埋怨太多。告她劳动、笔记、节省计划的情形。” 59.10.31

秀看了他的汇报，感觉这个不省心的大孩子，勉强总还算是有点进步吧。

“要对得起院领导，还要对得起爱人哪！” 59.11.23

大孩子总算还知道个好歹。

“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59.12.22. **“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子，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59.12.8。

可我还是必须得装个孬头样子把这该死的帽子摘了，“还要留一条老命回去” 59.11.22，为了秀。

可是秀，你为什么那么轻信他们呢？“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求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式的空想。” 59.12.8.

顾准这样的人绝不是什麼狗屁“摘帽子”就能让他交出“赎金”的，得有重量级的人质。这人质

就是秀。他交出了被勒索的款子，但是，都是假钞。

“我这个变好了是实际没有变好，但说好的成分一点没有也不见得。那是一种双重生活，但也有表现，那就是反复，‘好好乖乖’。”^{60.1.16}

许许多多的人们就是从那时起有了“好好乖乖”式的双重人格，并且有把这种人格特质传给了子孙。顾准交出的是假钞，很多人交出的却是真金白银——人格，完整的人格。而顾准为他的“假钞”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秀终于还是被“撕票”了，并且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失去了她。

震慑——麻木——恐怖——政治勒索——屈服，一整套和《1984》如出一辙的洗脑程序。前四项都货真价实，第五项则很可疑。但是即使坚韧如顾准，依然会有真正的屈服。

真正的恐惧始于1959年10月底，他已经非常非常恐惧，眼看就要屈服了。

现在可以来看他的《商城日记》了。

5. 商城日记

已经面世的顾准“商城日记”起头于1959年的10月4日。

从七个多月前3月13日13时的最后一行字“下午准备好好睡觉”^{59.3.13}后，日记又一次戛然而止，连前一日所记“明天什么也不写，一切等车上再在开始”^{59.3.12}的“开始”也不见踪影。一直到10月4日，日记才又接了上来，中间的空白是整整的二百零五天。

正因为1959年二、三月份这十几天的日记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更增加了后面这二百零五天空缺的突兀感。他不可能不写，写的不可能不精彩。否则只有下述两种可能：

1. 顾准在探索的路上停了步。但越过“雪线”后停止攀登，从逻辑和常识两个方面都不可能。假若他停下，只有返回雪线之下或是冻死在雪线之上两种可能，但他两者都不是。从他日后那些美不胜收的文集文稿，谁都能看出他到底攀登了有多高，这个高度远在雪线之上。他也没有牺牲，十五年后五十九岁时死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

2. 他暂时休息了。雪线之上，休息就是死亡，攀登者没有不知道这个常识的。精神死亡了还哪里来的顾准呢？

唯一的可能又是：他有字，但毁了。或者又是：不方便面世！只好又用老伎俩——Puzzle 他。可这次，连 Puzzle 都不好用，因为从 3 月 14 日到 6 月 12 日这三个月，日记是空白，历史交代几乎也是空白。万幸的是到了 1960 年 1 月 16 日，我的传主不知出于何等考量，突然做了一个“劳动队六个月的追忆”^{日记 60.1.16}，令人大喜过望——总算是“接上头了”——借用一句“商城日记”中的大人物——共产党员沈万山同志的话说。

“6 月 12，到劳动队时，肯定了这是一个集中营。”^{60.1.16}

读者请记住，顾准日记中最震撼的部分——“商城日记”其开端应该是这里，而不是起始于 10 月 14 日的“X/14 晨四时 [1959]年 菜园所种白菜（畦菜）”^{59.10.14}并且还因为那天日记是用铅笔写成的，因受磨损字迹不清，被编者“故略”了。

“这是一个右派分子集中劳动的队伍，全队人数一百余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商城本县的右派分子。另有河南省各机关下放商城劳动的右派分子十余人，以及科学院的六个右派。商城本县的右派分子，大部分来自区级干部（副区长，区秘书等）和小学教师，也有来自县人委各局的。劳动队的劳动任务是参加修筑铁佛寺水库的大坝，修筑大坝的主力是民工，人数不详，恐怕有好几千人。”

顾准日记中的数据可能不大准确。劳动队——右派分子集中劳动的队伍，其人数远远高于“一百余”。从商城县志办公室保存着的一本油印《商城水利志》中我找到了这样一段口述记录，记录于 1987 年 4 月 23 日中午十一点，口述人就是当时尚在人世的熊县长，熊满银，一个虽然逝去多年却仍能在谷歌、百度上搜索到的人物，只要你打的关键字是“信阳事件”：

“我们当时处在 1959 年，我自己亲自向各公社要民工，就是要不上来。大坝合龙后，民工参加施工的有 500 多人，右派有 500 多人，施工力量不够。我说的是 1959 年 6、7 月份有这多人。”

也就是说，顾准一行到水库时，民工已经跑掉了一大半，剩下的施工力量，右派占了整整一半。民工可以往家跑，你很难把他们一个个抓回来，而右派，当然不能跑，也无处可跑。你看熊县长自己说：

“……当时虽说有千把人，一者跑的多，只剩下二百多人，（访谈人插话：当时在水库的五百来名右派

也有跑的吗？)右派当然没有人跑.....” 商城水利志

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他们能跑到哪里去呢？

“这六个月，真正经历了一场严格的锻炼。”

“历史交代”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需要到他实时写下的“日记”中去找出全部的注释。

多年后，人们把他1959年3月到1960年1月的十个月日记编纂成《商城日记》，没有一字改动，除了数处因“不便于公之于众”的缘故而删去的之外，基本上可以当做原生态日记阅读。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唯一面世并正式出版的、亲历者写于1959年中国大饥荒中的日记。

请君不要轻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断语，因为写日记者在写它们之时，最大的欲望（这里用愿望二字未免轻飘）绝非是要去“识”庐山真面目（虽然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而是怎样逃出“庐山”，这山太凶险，太恐怖，太邪恶。这位写日记者并非“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圣人，六个月后他终于逃了出来，逃回北京，写下已经佚失了或者至今仍被藏匿的《铁佛寺水库记录》。当然，日记中也有他拨云撩雾，想看清庐山真面目的文字，但更多的却是直接面对浓云密雾、前狼后虎、断崖绝壁时恐怖的描写，还有求生欲望、求生手段的叙述，读来惊心动魄。

这部日记更像是一份社会机体取样切片标本、病理检验数据表、诊断书以及——处方单。

本想用老“伎俩”，以他的“历史交代”作为“日记”的注解与补充，加上信阳商城、铁佛寺水库以及还尚在人世的、和顾准一起在那里劳改过的老人们的口述，不再以日记的顺序，而是以事件顺序为脉络，还原（这次姑且放胆地用一次这个词汇）顾准除去西大畷国营农场的三个月之外，在商城铁佛寺水库六个月的生活。但是发现这样写极其困难。

第一，日记很凌乱，背景不清，他认为“显然如此”的东西，现在却是“匪夷所思”，若不详作解释，必然导致误读，所以才有年轻人读过《顾准日记》之后发出“不堪卒读”，“过于浅薄”，“淡如白水”的感慨，大失所望；

第二，被删去的太多，事件关联不清不楚。失去时代背景，一切都说不清楚；

第三，五十多年前的语境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不把那个年代的人的作品拉出其历史语境，并

努力将它从时代性的重重“话语包裹”中抽取出来，就很难让读者追索到其思想真正的构成性核心。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知识考古学”，就是要将这样的埋在地底的文献档案重新存在于当下，用新的语言、新的概念来重新阐述他们的思想。

第四，用第三人称去旁述他的日记，非常的吃力不讨好。说多了，有夸大之嫌，说少了，有“断”“取”之嫌，说深了，有僭越之嫌，说浅了，有人云亦云、浅薄之嫌。

所以，不得不选用一种比较拙劣的手法——第一人称叙述来写他的“商城日记”，并在此先发一个拙劣的启事：

“为叙事方便故，下一章《饥饿大地》整章将以第一人称叙述，文字高比例使用主人公的《商城日记》，不做引申和阐释。此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写作方法敬请读者原谅。”

第十一章 饥饿大地

1. 商城日记（1）—— 劳动队

我清楚地记得，假如把“蚂蚁窝”的震动排除在外，从我开始过上这种生活的最初一段时间仿佛并未发现有什么特别令人吃惊的，异乎寻常的、或者不如说是使人感到意外的东西。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充分了解了这种生活究竟有多么奇特，多么不可思议，因此我越发感到惊愕了。

老实说在我的一生中，这种惊愕心理一直没有离开我，以致多年后它又导致我犯下新的、更严重的罪行。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我1969年写下的历史交代（二五）：“至于因为我对商城见闻的深刻印象长期不能忘怀，以至在1963年学习农村四清前十条中胡说什么‘不进人民大会堂’，则更是极其严重的右派罪行了。”

我对劳动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无比厌恶；尽管如此（说也奇怪！），这里比起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右派们尽管已是劳改犯人，却可以在工地上和住房旁各处自由行走，除了不准到商城县城去。

右派们大都岁数不大，商城本地的小学教员居多，还有几个副区长、秘书什么的。省城郑州来的右派都是文化机构的，什么教育局，广播局，水平也不太高，包括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也不知把他们弄成个右派有什么意义。

他们都还年轻，奈不住寂寞，吵骂、唱歌、吸烟，甚至喝酒的都有。到了夜里，还有人打牌下棋。几乎每个人都订阅一种报纸，好像谁要是不订就觉得很没文化，很不合群似的。

在我看来劳动本身并不那么繁重，只是后来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以日后被人们形容得万分繁重，与其说在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然而就劳动本身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比如我这个菜园组，种菜，浇水和上粪，都是为了种出蔬菜来能填肚子。

右派劳动队中间年轻一点的，和民工一起脱了上衣打个赤膊推车挑担，和土石方拼命，也还是有意义的。有些人甚至醉心于这种劳动，希望把活干得更巧妙、更迅速、更出色，这样就有一线早日“摘帽”的希望，虽然希望非常渺茫，再说也可以得到沈万山队长的一丝青睐，这个也很宝贵。

队长沈万山是劳动队唯一的共产党员，也是唯一的统治者。有一次听他自己说，他在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时为我军送了情报，这是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他最喜欢对右派们说的一句话是“你们简直不像样子！”

他站在队前，每次都要说这句话。或是劳动得不好，或是吃得太多——买零食。他描摹人吃饭时的“寒碜”，一脸的不屑，以及其他等等。他很喜欢队前讲话，东拉西扯，一套套新词汇，也不管用的是不是地方。不过他倒是从来不拿稿子念，他可能根本就是个文盲。

沈万山特别反对人们骄傲自满，骄傲自满的意思就是瞧不起他。所以每次在“简直不像样子”之后，都会加上一句“你们忘了你们是有罪的人”，以提醒大家不要骄傲自满。杨一般就赶紧符合，说大家这一段的确“不像个改造的样子”。这里的人尽量避免说“我”这个字，都用“我们”来代替。可“我们”的卑躬屈膝沈队长并不看在眼里。卑躬屈膝在这里是必修的功课，我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

刚从农场过来，我还成天介拉着个脸——几十年来什么样的嘴脸我没见过，会把你这副嘴脸放在眼里？在中科院右派汇报会上我傻乎乎地埋怨了一番，结果弄得灰头土脸不说，还惹得一身臊——全体下放干部加右派一起开会，对我狠批恶斗。为加强效果，还特邀了沈万山队长参加。沈万山用行动教会我在集中营除了劳动吃饭，吃饭劳动，还必须加上一条——卑躬屈膝。可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好这一条——不理人，自顾自地劳动吃饭，吃饭劳动。后来我才知道这并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要达到这目的，更必要的是“笑靥迎面，唾面自干”，这是我后来才慢慢学会的。

沈队长对右派们的蔑视和嘲笑中还混杂着另一种成分，特别是对我，这种成分更重一些——夹杂着强烈的羡慕，承认我们、我比他更有见识和判断力，并因这种差距永远也不会缩小而衍生出一种失望和自卑。这种羡慕、失望和自卑愈强烈，恨意也就愈多，嘴脸就愈难看。

其实沈某一开始对我很青睐，指定我做中科院六个右派的联络员。因为六人分别在不同的小组里，有菜园组的顾准、赵淑仁、李宝仁，“盆子”里的权少珍、彭楚楠和历史所魏某。沈队长公务繁忙，需要有个人经常向他做个“汇总”。我不晓厉害，想也没想就拒绝了，这才惹得他恼羞成怒——还没见过有哪个右派这么给脸不要脸的。

沈万山已经唾过我好几次了，说我不识抬举，当了右派还架子大得很，连我自费订报纸多了都弄得他十分不满。他莫名其妙地极为看重我这个人对他尊重的程度，别的右派，尤其是当地的小右派们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我也知道他在观察我，我是他眼中的一道风景，但他也是我眼中的风景——一苗菌株，典型的菌株。后来他指定心理所的赵淑仁做了联络员，这姑娘受宠若惊，忙不迭地接了“皇上”的任命。我虽然挨了顿批斗，却也乐得清闲。

不过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事儿可是个“大岔子”，回头再说吧。

在我看来，食物也是相当充足的。除了能吃饱粮食，还有大量的瓜果可以自己掏钱买来吃。比如刚来的时候，6、7月份吧，粮多、菜多，黄瓜、西红柿、菜瓜什么的都不贵，秀也寄了点钱来，我就慷慨地拿出来请客。当地右派们都竭力要我相信，北京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伙食。实际上这里的生活确实比西大畷国营农场还好，消费不受清教徒式的生活诫律的限制，不像在那里稍微多吃点瓜菜就有人批判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不过这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特征是整日昏昏沉沉，脑子转不动，跟锈住了似的。过去用脑做事，有各种事情要关心，各种信息要处理和归类，就不像这儿这么单纯。我也厌恶这种混混沌沌的生活，吃饱了就去干活，下了工饿得很，再吃。肚子吃饱了就瞌睡得不得了，很快就能睡死过去。脑子不好用，想什么也想不清楚，想到一半就睡着了，连梦都没有。我也对自己适应生活的能力竟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大为震惊，但是震惊归震惊，震惊也挡不住要睡的欲望。怪不得人家说劳改能治失眠。

沈万山是非常记仇的。8月15起，也就是我坚辞“圣恩”后不久，他的报复就开始了。

先是他组织队员自己自编自演了个什么戏，冯顺跟赵淑仁演梁山伯与祝英台，硬要我评价。我大概说了句不敬的“婢学夫人”之类的话，他立时就恼了，晚上就在队前点名批评了我，翻来覆去车轱辘话说了一套又一套，说得嘴角直磨豆腐，还威胁要贴我大字报，把我所有右派罪行，所有他知道的和听说的，公诸于世。我倒不怕他写和贴，就怕他写不清楚，瞎耽误功夫。他的大字报由于过于复杂没写成，却要我写检讨。白天活一点不能少干，都得是休息时间写。一次是绝对通不过的，两次、三次、四次、五次那要看他的心情和情绪。

批斗会是必不可少的。他指着鼻子骂，离你不到一尺，口味和唾液那个臭啊。有一次还真就一口浓痰唾到我左脸上，臭得要命，你还不能用手去擦，尤其不可用手绢，这种东西他深恶痛绝。批斗会时间一长，唾液就干了，也就不大臭了。我这才算弄懂了《新唐书》中娄师德所言：“人有唾面，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尔”之意。

为了不占用睡觉时间写检讨，为了不再挨批斗，我很快学会了笑靥迎面，唾面自干，反正所费不多，嘴角扯一下而已，他一个粗汉，根本看不出你皮笑了里面的肉笑了没有。

几个商城当地小右派告诉我，这些他们都经历过。北京有多少右派，商城就得有多少右派，北京有多少右派集团，商城就得有多少右派集团。商城“婢学夫人”的功夫十分了得，这个我到商城第一天就领教了。“夫人”怎么说话，什么作派，婢子亦步亦趋，忸怩作态，像不像那是水平问题，学不学可是个态度问题。

这帮小右派们也可怜，有些竟匪夷所思是被“选上”的——名额不满，滥竽充数，就因为最要命的当口内急要上厕所，就被群众选上了；还有主动要求当右派的，“夫人”那边最有名的是刚从美国回国的歌唱家张权，听说这么多名人朋友都是右派，她也要求当一个，被周恩来一把拉住没有往火坑里跳。“婢子”这边的小右派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为朋友两肋插刀做了替死鬼的不是没有，一时的义气把一辈子都交代了。

刚到铁佛寺，他们要我去工地做只“工蚁”。虽然经过了赞皇和西大畷的锻炼，可和铁佛寺水库“蚂蚁窝”的活相比，那些都只能算是“儿戏”。不几天右腿就瘸了，没有人愿意和我搭班推拉一架架子车运土石方，推和拉我都力气不够，尤其是拉，坡道又陡，上到一半泄下劲来那是会出人命的。单人挑独担更是要了老命也不行。几天下来，人已经垮了。

看我实在太窝囊，他们也怕这个北京的高级大右派（商城人民很喜欢学郑州人民用“高级”这个形容词）在商城弄出个三长两短来不好交代，就把我调到菜园组种菜去了。这里更加靠近领导，即直接在沈队长的眼皮子底下。这是个自给菜园，也是沈队长的自留地和小金库。

到了盛夏，每天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了十五六个小时，有时从清晨二三时起，有时晚上夜战。全队右派相互间一律不得称同志。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非经请假，绝对不得离队外出。节假日则一律不放假。除队里伙食外，不得向外购买食物。沈队长非常愿意右派队员购买私用的瓜果，现金所得一律“交柜”，美其名曰“公积金”。

1959年春夏之交，根据北京“夫人”的一个手势，对待右派的凶狠程度曾经有一个“凹”期，看来现在正往“凸”期发展，且愈来愈凸了。

现在我也进步了不少，可以穿着胶鞋下到粪窖底部去清底，用手把大粪抓到粪筐里；也能挑起一百多斤的粪筐走上二三里路。夏秋间菜园要巡视，轮到我巡夜时，晚上12时起巡夜，第二天白天可以照常整天劳动。可左股骨开始下挫。

因为右肩大约是从前写字写多了，根本用不上劲，只好用左肩膀挑水挑粪，这样左脚也肿了。何祥福和杨文华想要照顾我，让我在园子里砍白菜，他们去挑。可下午我还是要去挑，因为沈队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帮本地小右派想要照顾我的企图。有几个年青人虽然自己是“落难公子”，却老想帮我这个右派老头一把，让我少干点，多歇点。可惜沈队长深谙对敌斗争的一套政策——分化孤立、强

迫劳动和政治教育相结合，所以大开斗争会，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了被斗者，也教育了斗争者，于是有的人是经过恐怖达到了屈服，有的人方式不同一些，“自觉地”成为积极分子。但总得说来，还是从恐惧到屈服而已。

心理所那个赵淑仁，就是因为我的坚辞而当上了中科院商城右派小组联络组长的姑娘，由于自觉地成了积极分子，遇上国庆节“大赦”而摘了右派帽子。如今她更积极了，却也没有准许她回北京。可怜她孩子还那么小，听说丈夫坚决要求离婚，就算摘了帽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在“摘帽子”这样的政治勒索面前，你得心甘情愿拿出包括良心的一切，这值不值得，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劳动队里人与人之间有种刻意培养互相间仇视情绪的趋向，用沈队长的话说叫做“分化孤立”。就此点而言，劳动队的成就是很大的，它的全部生活与制度，曲尽其妙。人们相互间态度粗暴，虽然都是“麻风病”却决不可有同病相怜之心，大家要比个麻风谁轻谁重，轻的看不起重的，重的也有各种理由瞧不起轻的，虽然都和外界隔离，却也有自己排布下的等级。

劳动评级是结合发多少钱的。虽说少得可怜，但谁也不肯让谁，为一元两元的就能撕破脸皮吵起来。这会儿就只有共产党员沈万山看不起所有人的份儿了。我感觉钱还在其次，更要紧的是谁评级高些，钱多一两元，好像麻风的程度就轻些。人们互相订下框子，要求别人认罪，以昭彰自己的成绩。有时评级时我有意表现积极，没话找话，成为主要发言人，为的是避免争吵，让大家都留些脸面。这个我做起来不费什么事，惠而不费，挺好。

今天蔡璋又评了个最末等，沮丧得要命。徐云周则大暴思想，什么“建设中的大手大脚”，无非多用了几根柴火，没话找话，没事找事，真是拆烂污！可他要是什么都不说，不臭骂自己点什么，怎么过得了沈万山这一关？

董将我的军，除了骄傲自满又要牵扯到人道主义，什么大跃进的愿望和人道主义的矛盾云云，我赶紧云山雾罩扯开了，否则又不知几点才能散会睡觉，弄得不好还要“炒豆子”，就是把你推来桑去，看着是没动拳头，倒在地上摔伤了可得自认倒霉。蔡璋就被这么干过，好在他年轻，经摔，经“炒”。

劳动队有一切残酷生活的外形，但我依然能看到活跃其间的人性！

人们在会上和会下的两幅面孔就能证明这一点。柳学冠私下和我说他曾想打击我，对我在他绝望时所作鼓励，感动得很，说老顾若看得起他，准备与我谈谈云。说到此时，竟至泣不成声。从没有人见他笑过的副队长黄，在蔡璋病重住院时拉着脸扔下句暖心的话：“不好全了别出来！”

前晚为跃进灶担土坯砖，一共 520 块，来回六里路。男十六人，女十二人。女人都担八块，我只好担十块。一块足有十斤，原准备拼了老命的。路上张哲华为我去掉二块，柳学冠又为我拿走四块，到家时才四块。全部担完已是下晚一点，不担完沈万山是万不肯叫停的。

人人都是两幅面孔，我也是。

除了沈万山。其实他也是，不过和我们不一样，不是会上和会下，而是在当官的面前和右派面前。

实际上人们的这些表现行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原因——恐惧。我这样讲，并不代表我自己不恐惧，不屈服。我只是无法“自觉地”成为积极分子而已。

沈队长对我说原本是可以给我“摘帽子”的，因为我的给脸不要脸，就眼瞅着人家“摘”吧。这就是我前边说的“大岔子”。

我倒无所谓，摘了帽子不还是囚在这儿干活吗？摘不摘的有什么区别呢？可秀万分在意，一再告诫我下次可不能再任性了。好吧，为了秀，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争取摘了这毡帽子。

从“盆子”里被淘汰下来，我就移居到下菜棚。这里真就是个棚子，紧靠着菜园，离“盆子”也不远。有时夜里透过席子的缝隙向外窥视上帝的世界，能看到一隙清亮的天空和闪烁的星星。那些狗屁小高炉，炼铁炉总算是熄火了，不然哪有这样的夜空？

前阵子哪里都是乌烟瘴气，把农民的锅、勺、盆、罐都“炼”了，弄出一堆堆的铁渣，扔都没处扔。眼下别说煤，连烧饭的柴火也不够了，它们才算是熄了火，可到处都还能看见它们丑陋的遗体，像些半截子酱油瓶子，两米来高，东戳一个，系戳一个，把好端端的水田戳得千疮百孔。

因为国庆节，大赦了一批右派，大约二十几个人吧，摘了帽子，其中有心理所的赵淑仁。这姑娘幸福得无可无不可。还有人直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终因没有人随着高呼，显得有些尴尬。

“摘帽子”的刺激看来对恐怖到屈服的人来说肯定能够产生大跃进的效应，将来这怕会是一种常态。再遇上摘帽子这样的机会，我也要努力一下，振奋精神，积极劳动，不怕脏不怕累，负病干活，轻伤不下火线，还要显得思想活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句话，我要“变好”，做个好好乖乖。不就是双重生活，双重性格，双重人格吗？为了秀，我豁出去了。

眼下菜们等着施肥，可大粪奇缺。百多块白菜地恐怕要靠硫酸钡了。若两毛五一斤，0.25元X300斤=75元，沈队长肯定很心疼，我的劳动强度却降低了。我也不是看他出钱幸灾乐祸，实在是搞不到大粪。去民工厕所掏粪经常一无所获，好像他们就不拉屎似的。他们的家属早就守着茅坑掏完了，我后来也不得不采取这一招，守在茅房门口等人拉屎。

现在是十月中旬。回想中秋国庆前后，伙食真是不错，大吃饼子，就算是月饼吧，商城人管它叫“提糖月饼”，含义不清，比起上海的苏式月饼可就差远了。可过了国庆，伙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工地夜班也日趋缩短，这两天人们九点半就都回来了。下一个高潮是收红薯，种蜡菜和豌豆。天气转冷，日照减弱，蒸发减弱，浇水量也减了。总而言之，不必再那么拼命干了。

只有沈万山还在拼命锄地。菜园的好地他都占去了，大家都猜他打算在这里安家。这些好地肥厚水丰，可以种高级蔬菜，说不定一年能有150——200元的收入。他老婆小刘也来了，到处跟人说今年的棉裤问题，说一家四口人就三十多元的收入，做不起棉裤。他老汉早就暗示蔡璋想要他那件呢子大衣，蔡璋问我咋办，能咋办？见机行事吧。劳动队右派们都在暗地使劲争取摘帽，这当口沈可不缺能帮他种菜的人。可光帮他种菜怕是不行，蔡璋的呢子大衣恐怕保不住了。

昨晚上收到秀的信，语句公式化，毫无温存之意。我虽然知道她不能不如此，依然心里一阵阵地疼。从前我们通过那么多的信，她出差时或者我出差时。到商城后也有许多次信往来，虽有专人检查却也不妨碍我们默契表达的真实意思，他们看不懂。有时她数落我几句，言语也温存，从来没有像这封信一样冷冰冰。

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上次哭泣是什么时候都不记得了。幸亏下菜棚就我一张铺，呜咽无人听见。

菜园组的何祥福，乡村知识分子，目光开阔，有理想，深知知识就是力量；而杨，自诩全无问题，样样通达，喜告密，爱鹦鹉学舌，极世故，奉承沈万山不遗余力，甚是可厌；最可惜赵，北大毕业生，心理所的，也就三十岁吧，貌似婉变，琐琐屑屑已十分公式化，初现老太婆之态，心理系的废品，只红不专。她所祈求的无非是脱帽子与做老婆，如此而已；最让我有兴趣的是徐云周，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且正直。农民中确无能人，劳动队这些人都还算是农民中的佼佼者，可看不出有什么人能做农民的政治代言人的。徐云周也许是一个，然而他能提出什么政治方案来代替现在的一套呢？何况整风、反右加上大跃进，把仅属于萌芽状态的农民代言人禁锢起来或者大洗脑，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可是底层的新生力量终还是有徐云周这样的人存在，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此来商城，并非虚行。

李老是喜欢跟着我写思想汇报，劳动总结什么的。我十天半月就得向商城那边科学院的领队汇报思想，占去我大量的纸笔、大脑和休息时间，他的东西也不知交给谁看。刚来时我看不起这个獐头鼠目的县级小干部，现在我不鄙视他，我和他是在相同的地位、等级上罢了。

睡它娘的，还有明天呢，这些狗屁东西就算你写死了，也是写不完的。

蔡璋进了医院，高烧不退，基本上垮了。我去看伤了的左胫骨，顺便看了看他，大家都说不要出院，好不容易住进来了，不好全了别出来，副队长黄（也是右派）也这么说，可见都有隐蔽着的人性。

昨天在缝纫组干活干到夜里12点，赵刚给了我半个馍馍吃。有机会买点什么送她孩子，她总在维护我，赵就为此向沈揭发她，可悲之至。

黄副队长说要每人拿五毛钱出来做“公共积累”，没有沈万山的允许不能动用。

左骨股下挫很久了。挑水挑粪都用的左肩。刘大夫说可能右肩是“五十肩”，怎么也使不上力气。我才四十四，怎么就得“五十肩”了呢？手里钱都花光了，不敢再去医院开药。劳动队的医生刘复生是个不错的人，可他也不敢白开药给我，要想让他开个“准休”一两天的证明就更不可能了，一个乡医，右派，能做得像他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不要难为他。

一连写了三封信向秀要钱。她担心我有了钱又请客、胡说，改造不好，就是不寄来，还威胁说再不好好改造就和我离婚。我当然不相信，我还能不知道她？今天写了一封吵架的信给她——“生活本有各种方式，一切由你决定好了”，顺便也告诉他我左骨股下挫的事，要钱不是贪吃，是要看病！兜里就剩下二元钱了，杨打碎了碗还借给他五角，你不给我钱我就只好不去医院，硬挺着。

左骨股下挫换来的是被评为劳动二类，且舆论颇佳。徐云周评为一类。

又是翻地整理粪塘子，胫骨坏得更凶了，都在左边。没有钱，不敢到医院去，对秀的意见愈来愈多了。

思想汇报总算写完了，搞了七个夜晚，昨天先向赵汇报并送阅初稿，她俨然以指导者的身份指指点点，不胜其烦。

因为左腿故，特批我喝了二十多天的豆浆。今晚站队时被告知此事城里机关都已经知道了，提出意见，“右派还喝豆浆，不像改造得样子”，明天就没有豆浆喝了。可磨完豆腐总会有豆浆，除了沈万山人人都是右派，谁来喝它们呢？看来是沈万山假传圣旨，想让小刘把豆浆都拿回家去罢了。

揭发是没有意义的，百害而无一利。

脚已不良于行，岗还是要站，主要是看守待腌的大白菜，冬天主菜就靠它了，农民和民工也最爱偷。喝了一大茶缸代乳粉，精神抖擞。再说站岗是我的时间，可写可读，还可以捋一捋思路。

沈把他父亲也弄来了，专门种菜。他的白菜长得极好，已经砍了好几次，据说已经买了十多元。看来小刘的棉裤问题今冬可以解决了。

沈在劳动队就是皇帝，独裁者。种瓜的人吃瓜是偷，他可以随便吃。他老婆小刘经常带着孩子在大食堂白吃白拿。他一家占便宜占的是罪人的便宜，当然不算什么。他不知道自己有多猥琐，每次站队时都要指着这些人说“你们简直不像样子”，不是偷懒就是吃得太多，还用手做出往嘴里扒拉饭，嘴吧唧吧唧山响的样子，嫌右派们“寒碜”。最后总不忘一句“你们忘了你们是有罪的人”。

眼下地富反坏右已经全部集中在南关附近，病人进城看病在街上逗留久了，公安局就反映到劳动队，“右派满街跑，像个什么样子！”

晚上讨论周恩来《伟大的十年》，全是捏着鼻子哄眼睛的瞎话，骗人骗己，全篇废话。写这种东西的读后感真不如去劳动。

秀总算寄钱来了，还不少，30元。秀说我昧于形势，抱怨太多，但主要是大骂我不告诉她要钱是为看病，看来气得不轻，可这封信我觉得才像秀写的，虽然她从来没这样凶过。

我决定不再吃零食，计划储蓄20元，报答秀的宽恕，并诚惶诚恐赶紧回信，向秀汇报劳动和改造的进步并节约的计划。要是能博她一笑，我就满足了。

沈报告说今后全体右派的生活补助不再发现金，一律存起来。没有人提出资金监管事宜，他的话就是圣旨。

“盆子”里十二组大逆不道的杨学廉到了菜园组恢复了人的尊严。这个来自郑州戴眼镜的小科员，就因为别人碰了他眼镜争辩了几句，被人扇了好几个大嘴巴子。受不了这样的屈辱他想自杀被发现了，好歹调到了菜园组。菜园组外来干部多，高级知识分子多，他好受一些。其实什么“高级”、“低级”知识分子，还不都是沈万山的奴隶。

在“盆子”里干活的大半是本地干部，小学教员占半数以上，水平有限，讨论个“增产节约”全是吃萝卜吃月饼喝酒的扯淡，言不及义。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张培从看来也平民化了。杨静超原是位小学校长，好像叫做“共产主义小学”，好几所小学合并起来的寄宿制学校，女民工就住在这所小学里。听女右派叽叽咕咕说，好像这些女民工穷得只有一条见人的裤子，回到住处就不穿裤子。杨静超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比较高，本地右派中很少有像他这样水平的，看来也是底层中能代言人的料子。可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危险，君不见汉阳县几个校长、教师不都已经因为所谓“煽动学生闹事”，最后反被学生揭发而五花大绑上了刑场枪毙了？

偷东西吃的魏和高就不去说了吧，太丢人了，好歹你们也是北京来的。

劳动队的全体人员素质，是被这批小学教员决定了的，难怪沈那一套完全吃得开。

有了秀寄来的钱，我去卫生院治腿。李云卿看见我拄着根棍子，大有“应怜范叔寒”的样子。我倒是巴不得我的腿痛之态能传到县城下放干部处以致达于北京院部，这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反正已经坏到底了，还说不定能让我回北京一趟。

卫生院水平还真是不错，腿和脚踝都好了不少，其实就纯是休息也能好。

可我这种轻松不可告人，还是采取老办法，重活抢着干，轻伤不下火线，反正菜园的活已经日趋轻松，累不死人。就算是晚上极困我还是要求代人站岗。何祥福、杨学廉争着要照顾我，我还是坚持重劳动不辍，一是要做出样子给别人看，二也是不连累他们又为了我被沈万山这个王八蛋呵斥。

从下面看，反右倾鼓干劲声势浩大，其实是战略投降，色厉内荏。局面非变不可，不是好起来就是坏下去。色厉内荏是因为现在连要变的本钱都没有，城里局势已经紧张到了要强迫储蓄，如何得了？资本主义有 Cataclysm（大灾变），难道社会主义就不会有？

徐云周的儿子来看他，告诉他爹家里已经断炊了。亩产仅三四百斤，各家偷藏一些稻米还都被抄查去交公粮，为此村里还打死了藏粮的人，吊起来打，惨状不忍写来。徐极端痛苦——家庭负累，农民疾苦，生长在此要为农民说些话，结果如此，情何以堪？

我告诉他报纸上说的 100 万吨钢如何可能？消弭农村的祸患于无形才是当务之急，今冬明春，如何得了？

难在通达历史。告诉徐云周除历史规律而外，谁说得愈多就愈不真实，愈不自信。色厉内荏，估计无误。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连红薯叶子都吃完了。有人断定此人恐怕不是民工队的而是倒卖蔬菜的，我和何、杨听了都默不作声。

看来 Cataclysm 已经发生了。

2. 商城日记(2)——劳作与饥饿

徐云周的父亲死了，死于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缝纫室张保秀的哥嫂也同时死了，也是肿病。看来肿病就是累的，饿的，没有什么正经病名。

已经开始下雪了。看我穿上大衣和棉鞋，徐云周的儿子羡慕得不得了。这孩子劳动队吃了早晚两顿稀饭，欢天喜地。劳动队现在成了天堂和避难所。真的是天堂，不光是在这个羸弱的小孩眼里，在我眼里也是。

需要有个避难所，像《圣经》中的“逃城”，专门收容罪人。兴许这个集中营就是逃城吧，城里都是罪人。

政策不变可怎么办？就算他们想变，还要讲究转变的艺术呢。

隐隐约约听说庐山开了个会，我是绝不可能听到真实和细节的，但我猜一定会有争议。

大会堂在开群英会，倒是叫得很响亮，趁着还没有断粮，今冬还要继续大抓水利。这些都是反右倾鼓干劲的本钱。可现在已经在蚀本了，过此以后，又将如何？

劳动队里又跟着形势开始整风，猫猫狗狗、鸡零狗碎的麻烦就没断过。

心理所的李宝仁打碎了本地赵刚的热水瓶却不想赔，小组就开会批判她。我其实并不同情她，可罗正安非要我发言不可，我说了点肯定李宝仁劳动积极性的话，说到她一个女人扔下全家在这里改造不容易，大家可以批判她这件事情，她也确实手头拮据，但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屡屡提到她的丈夫和孩子怎样怎样，这太诛心了。

沈万山就责问我为什么为她开脱，拼命要我说清楚“诛心论”的性质。费尽了口舌他还是不依不饶，实际上他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于是恼火得更厉害，唾沫星子又喷了我一脸。就为这么点事，连着开了几天批判会，连城里科学院都来人了，按沈万山的说法，“斗争总算是展开了来”。

他极其注意我的态度，我也就积极起来，将热水瓶事件分析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从它的结构讲到它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讲到打碎它对右派的改造多么不利，打碎它的右派又是多么罪大恶极，颇得众人好评，夸我到底是北京来的，有水平。其实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煎何太急？下一次的摘帽大赦还不定猴年马月呢。

只有沈头脑清楚，冷冷地说你们中央来的人都幼稚得很，实在贴切之至。

至此，我已经基本上学会了唾面自干，笑靥迎人的一套，渐渐也能习以为常。我的气质已经变化。想起上海时候曾有人当面说我气质好，风度翩翩，不禁黯然。

夜里极冷，上茅房是个苦事情，昨晚开始用瓦罐做尿壶。早就从下菜棚搬回大通铺房了，尿尿时山响，我也不在乎，反正大家都一样。

还有些代乳粉，是蔡璋住院时在城里帮我搞到的。现在城里商店货架上已经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每次喝上一碗滚热的代乳粉都觉得幸福无比，体温上来幸福感就上来了，看来幸福和体温是直接相关的。可眼看着这些白沫沫就快见底了，这比摘不摘帽子的恐惧要大得多。

昨晚我吃了三斤红薯，二斤菜，味极鲜美，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脆极了，像水果。白天刨红薯时民工路过，羡慕不已，都到地头来捡碎屑，撵都撵不走。公社小孩也跟着捡，所得甚少，而喜悦愈恒，一派灾年景象。

劳动队发明了用薯藤磨粉来吃，徐云周是发明者和实施者。

沈队长连阶级斗争这根弦都松了一扣，说原来准备冬闲时斗争一二十人，结果发现大家表现都还不错，就说不用斗这么多了云云。

我和蔡璋现在结成了一个秘密联盟，盟约就是一个字——吃。我出钱，他去弄。我俩都知道饥谨近在眼前，要事先学会饿肚皮，可是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你知道某处藏的有食物时。

农村吃粮历来紧张，但有冬眠之说和男女之分。如今冬春不分，男女不分地干活，强迫劳动，粮耗大增，产量却因为去年的“痉挛”而大减。饥饿与疲劳造成慢性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但也可能是极峰新近想出来的解决人口问题之道。

沈万山种自己的地，用公地，公粪，右派无偿帮忙。赵刚嘟囔两声，罗正安列队报告大吼“你个小孩子忘恩负义！”“斗她！”。赵刚辩解，在一片吼声中声音都听不到。但毕竟沈还是有所顾忌，没有敢真斗赵刚。赵是郑州来的，一个小会计，不知得罪了那个衙门，也不知道她忘了谁的“恩”。

晚上列队时，沈万山故意提到熊县长知道他种菜卖了三四十元。这是他在留后手，应了一句上海俗语“剃头的怕痢痢头，痢痢头怕剃头的”。

摘不摘帽子如今我真不在乎了，就是被饥饿弄得很恐惧，也因这种恐惧而恐惧。

昨天开始吃红薯叶，在冀鲁豫时期都不能下咽的东西，这回全部吃完了。凌晨三点起来大便，顺便帮外厨房烧火。幸福之感突如其来，一时脑子一片空白，简直就是陶醉了。

最近常常有这样的境况，恐惧——幸福的感觉交替出现，饥饿——恐惧——吃饱——幸福，这比饥饿带来的恐惧还要令我恐惧，是一生都没有过的感觉——命运、生死和思想都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恐惧。

Return to 1957（回到1957）还可能吗？不可能了。1958春出现的情况曾让毛害怕，他曾企图Return to 1957。果真如此必先得否定总路线与人民公社，二者兼顾绝无可能。毛受不了这个刺激，于是决定蒙上眼把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道路走到底。Stalinism在中国有生命力的原因皆在于此。

开始拉肚子。

大家都在灶里烤红薯，谁的大，谁的小又要斗争。有人放个小的进去取个大的出来，我看见了，

懒得检举。民工队现在开始吃“跃进饭”，就是米粉中和着大量蔬菜蒸的糕，不经饿，但看着好看，体积也大。

如今连粪都搞不到了。捡粪就得等着人家拉，还要强占茅厕，腻烦得很。在西大畈农场时看稻田所浇粪水中有死虫，以为是死蚯蚓，捡粪才知道那是蛔虫。眼下民工拉的屎都没什么肥料了，有时全是蛔虫。上年极笔写下“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壮丽诗篇中还有一句“千村薜荔人遗矢”，如今人却连“矢”都“遗”不下了。

我常常因为不暴露思想，不向党交心而被训斥。沈万山能训我，赵淑仁能训我，董某人能训我，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训我。我何尝不想“暴露思想”，“向党交心”？可你要我怎么“暴露”怎么“交”？说深了党听不懂，说浅了党又要抓辫子，我索性还是闭上嘴多听训，只要你们不动手就行。可如今“交心”已成为整风的昵称，你愈不吭声，事情愈糟，问题愈多，怀疑愈甚，要求你交心愈严峻。这个情况大概秀就没有估计到，每封信都嘱我少说话。

所以仅仅笑靥迎人还是不够，还要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嫣然语兮的本事，有于无理处说出道理，于煤球处说出汤圆，于汤圆处说出煤球的本事。

拿捏张嘴还是闭嘴的分寸真让我腻透了。今天这个人训你一顿，明天那个人要来和你谈心交心，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限，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人疲惫得厉害。可我还是决定，绝不把“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交了心，这个要是交了一定会引火烧身，双重的灾难。

三五天内且编出一套提纲交上去，好的，我来做这件事情，否则“想回到党的队伍”是做不到的。权且为了秀吧，要对得起爱人哪！

今天县委来了个库部长，指示要在上、下菜棚之间建个养猪场，叫做“千头猪场”。他们指令原来的小学图画老师杨明昭画图，听他嘟嘟啾啾，好像准备发展到五万头！

猪饲料在哪呢？还是让猪吃人？！

但这也并非不可能。柳学冠的母亲、弟弟，刘引芝的父亲，刘方惠的父亲、杨柔远的母亲、夏伯卿家人、张保秀哥嫂，杨宪一家都死了，也许可以拿来喂猪？

冯顺抓到一个偷柴火的民工，三个右派合力剥下他的棉袄，令他光膀而去。现在是十二月天气，雪都下过两场了，他不饿死也一定冻死。果然，闻此人又去别处偷衣服，被捉住，许多人眼看着他被打得半死，将次毙命。

我写下这几行字时他肯定已经死了，大概也能拿去喂猪。

牵两只羊到屠夫那儿，牵两条牛进屠宰场，使两只里的一只知道他的同伴可以不死，羊会欢喜得咩咩叫，牛会高兴得乱吼，可人呢？屠夫还没有下手，人自己就先扑向同伴。人啊，你这万物之灵！

县委王书记准备投入十万元绿化水库区，要建一个武汉中山公园式的大公园，要原来在小学教算术的冯设计，沈万山也要我参加，我说我没有去过武汉，不大清楚，怕设计错了。沈又说我“给脸不

要脸”。

沈最近情绪高昂，买了手表和自行车。这和他把全家都搬到劳动队密切相关，这里几乎没有开销。想来小刘的棉裤问题也已顺利解决。

劳动队是艰难的，但比之农村，尤其是天堂。还有北京带来的最后一点红茶，烧了一大缸子喝下，舒服极了。三十年前潘序伦老板的茶饮里永远有免费随便喝的红茶，我怎么会那样不在意啊。

又没钱了。和蔡璋结下吃的联盟，省心省力但绝不省钱。他能给我搞到胡萝卜和碎米，我应该知足。匆忙地、卑躬屈膝地向杨柔远借了二元钱，买了四毛钱的红酒，五盒六分钱一包的烟（我抽得少，多为给别人递上做准备），红酒就着红薯就喝完了。红酒这东西我从前并不是特别喜欢啊，为什么此刻竟这么渴望能喝上？货架上也就还有它是能进嘴下肚的东西了。

曾是贪污分子的杨荫堂现在成了“摘帽右派”。除了神气得了不得之外他还成了劳动队的买办。人们向他买烟买酒，买日用品，蔡璋弄吃的常常也是通过他，省却了我直接面对他的腻烦。他的诀窍就是讨好和贿赂沈万山，用烟酒和食物。还有一位新来的副队长，好像也是个“摘帽右派”，都被他拉拢到旗下。他用来行贿的费用就从我们这些右派身上搜刮，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他都是被评为一类，而且摘了帽子。

我常常被评为二类，摘帽子更是痴心妄想。不过我有个愿望，就是想有一小块自己的空间，不要任什么人都能坐在我的床上。我卑躬屈膝地向黄副队长提了出来，希望能搬到杨静超他们里间去。黄队长正在忙东忙西地走动，我就亦步亦趋地跟着，腰稍微哈着。他虽然说得极不耐烦，但内容不错“你要搬搬就是啦”，后边又加上一句比较和蔼“你先和他们商量商量”。住在里间的杨静超已经表示欢迎了。

雨雪中，“盆子”里还在坚持作业，晚上各组发柴火烤湿衣服。民工跑了很多，估计抓回来的可能性不大。菜园组则正在斗争柳学冠，因为他喝中药喝得不好，把药倒了。七组不知在斗争哪一个。我前面的锅里正在熬豆腐。厨房组的人在读“反右倾鼓干劲”的那篇文章，现在正读到反对甘居中游那一段……。

王书记商城中山公园的预算又追加了十万元，首付一万五千，还是坚持要我参加设计，说你没见过武汉的总见过北京的中山公园。也好，可以开开眼界，看看商城的婢怎样学北京的夫人。

猪场计划有改变，不在我们菜地了，这里地方不够大。移到蔬菜联社那边。那将毁掉大片的蔬菜地。

“盆子”里的人苦，昨夜搬砖搬到夜里十一点半。明明有架子车可以一人拉一人推，一次能搬一百块，担一次才十六块，可沈万山说挑担子更利于改造。

有人累得上厕所掉茅坑里，有人从“盆边”上摔了下来。工伤几乎天天有，前几天还死了两个民工。

每周能洗一次澡，这也是天堂劳动队的好处。轮到我烧澡堂一早三点就得起来。胡萝卜两个，小红薯三个就着一缸半红茶吃下去，通体暖和，更何况我共用了9 Tea spoon full (满满9茶匙)的糖，管他娘的，吃完就没想头了，省心。一时间又幸福陶醉得不行。

整整四天没有电，商城城内也是一片漆黑。“盆子”里和菜地都不能开夜工了，沈万山决定加强学习。出了个讨论题叫做“什么叫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为什么人民公社——应该保护？”反正你们右派别想趁着停电休息，不讨论到十一点谁也别想散会睡觉。

厨房成了严禁外人入内的军事要塞，关起门来厨师自己做给自己吃。杨和倪给食堂贴大字报说他们多吃多占，可厨房把领导伺候好了谁也不怕。沈每晚回来食堂都另给他做饭，我特意站在窗边观察了一次——他们不大防着我。饭是面疙瘩汤，加大量猪油，撒上芫荽。沈吃得稀里哗啦。沈吃着，厨房的人也分了一杯羹。

我嘴里唾液都满了，只好走开。

城里来了个砌“跃进灶”的老师傅。跃进灶就是用蒸饭代替煮饭，因为容器直接就是食器，与火面接触损失的部分就小了。厨房给他的疙瘩汤里打了两只鸭蛋，谢有本事把鸭蛋打得满锅都是，他们就都能分润。

回想从前我做首长时也相同。不过那时是供给制。现在大家伙食费一律相同，又不准自购东西吃，特别是领导带头搞特殊化，不偷才有鬼。我也偷。

偷东西吃普遍之至，加上抢。我洗偷来的胡萝卜，人人伸手。现在我已经不敢公开喝红茶、红酒和代乳粉了，好在也没有了。

让我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重新定个义：

1. 社会主义：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
2. 共产主义：关怀多数人的生活，尽可能降低生活水平的悬殊并在社会道德方面回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的畸形发展。

如此而已。

沈又在提建“万头猪场”和“商城中山公园”的事，说水库修完劳动队就要去建公园云云。公园先放一放，猪场县委要求十二天建成。搬干打垒做成的砖块。沈不许用架子车，还是那个老原因——劳动队就应该使用最原始的方法劳动，否则不叫劳动队叫车队好了。

五个月里，劳动队242个人已经死了2个，有喝豆浆资格的病员现在是48人，他们都是通过了严格检查的。柳学冠，打夯时肋骨折断，不算病员，后来转成肋膜炎，现在加上肿病，今晚还挑担五次，还算不上病员；鲁涤寰，肿了许久，今天总算进医院了。

人间何世！

今晨两点半就起身写那永远写不完的检查。我打算坚决不讲我的人道主义思想。

沈万山就是党性的化身。如今的党性都属此类。回想延安整风时天天讲党性，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党性。如今倒是在沈万山身上和周围奉承着他的人身上，在沈万山对待王书记、熊县长的嘴脸里找到了注解。莫看沈是粗人，他是深得毛之三味的。

恰在此时我倒得了沈队长的表扬。他说我“接上头”了。我近来每见沈必先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极尽殷勤，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他最怕人家骄傲，不尊重他，尤其是我。我软了，大家就都不敢骄傲了。

北京传来摘帽子的消息，无非是一种政治勒索。浦熙修，潘光旦，照顾影响罢了。广大右派分子是绝没有份的，局势愈紧张防范愈严。所以秀，秀，我改造表现再好，不过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又怎样？不见此间摘了帽子的“摘帽右派”不依然在劳动队不外放吗？

都是采秀式的空想。

3. 商城日记（3）—— 纯粹的饥饿

昨天柳学冠偷了两块鹅屁股藏在羊棚里，黄抄出来给他展览了，还写了很刻薄的大字报。不过现在大家脸皮都厚，就像孔乙己偷书不算偷，劳动队的人偷吃也不算偷。生存第一，生态第二。

早上黄队长宣布现在开始是“四防月”，防偷，防摸，防拿什么的，我没记全。

马上要转战猪场了，人家那边的东西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其实劳动队的家当都是捡破烂捡来的，靠搜集破烂起家的人，什么是偷，什么不是偷哪里分得清楚？

我偷东西吃也被发现了，偷胡萝卜吃。挨批，刚好和批判我的人道主义一起搞，省了一道事。因偷吃而在众人面前被批斗，可我怎么就没觉得有太大的耻辱感呢？

饥饿令人丧失羞耻心。

会后赵还诚恳地要和我交心，我倒是情愿多斗争，少交心。赵愈来愈像个领导了，召集中科院六个右派单独开会，传达下放干部小组长会议精神：

1. 全县 5/7 的公社超额完成公粮、余粮征购任务，全体超额全县任务。但信阳地委要核产，严防虚报产量，根据核产安排好群众生活，连红薯叶、蔬菜也要核产，以便全体人民直到明年夏收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严防虚报产量”，还要“保证人民幸福”？！My God！

2. 冬麦比往年好；

我怎么连夏麦都没发现过？

3. 提倡多种经营：上石桥一个队每家养十多只鸡，家家有存款，粮店粮多。官畈全面跃进，卫生

好，食堂办得好，冬播搞得好。燎原是县委的重点，就不用多说了。

我倒是很愿意相信。

4. 要组织万人检查团还要组织下放干部全体参观。

怕是不会包括右派吧。

都是让你摸不着头脑的见鬼话。

前晚、昨晚均早睡，不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得想个办法，怎样才能得以早上多喝上一次菜汤。

蔡璋很久弄不来吃得，也饿得七荤八素。大概何祥福能帮我搞到一碗。再就是想象回北京家里后怎样尽情大吃一个时期，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绝对是美味。初到北京我居然吃不下这种东西，想想实在是罪过。

万一实在买不到吃的（北京应该是这样），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就到专供外宾吃的菜馆去吃它几次，估计老孙能帮这个忙，他认识的苏联专家多。伏罗希洛夫来北京还开了千人大宴会，无论如何还是有得吃嘛。我也顾不得这张老脸了，能吃到东西才是最要紧的。

和食欲相比，性欲简直就是个屁。

商城如今已无食品市场，只能通过杨荫堂买到一点黑市月饼。托他随便买瓶什么酒，他说“啥也没得”。

今春的五十六字调整，就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明春是绝不会再有吹的了，没本钱了。

保卫人民公社，反对富裕农民，其实是国家 VS（对决）农民。大反一通之后又往死胡同里走了一截，现在想退也退不出来了。那就接着往前走吧，路走得愈快愈好。

《Marx on Napoleon III》（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得好，“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老田鼠，你掘得好哟。”莎士比亚先生的这句台词马克思最喜欢用，他喜欢得有道理！我也喜欢得很。

London Times (伦敦《泰晤士报》)对“政治挂帅”的诠释最妙：凡是离开经济手段而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的的，都属于政治挂帅。可惜政治挂帅全部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农村，城市不仅不能实行，还必须维持一个比较过得去的货币经济的外观。中国政治挂帅的大跃进，其实是在匈牙利事变之后再一次告诉落后国家，建设工业的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它起了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中国内政严峻，外交咄咄逼人，加以大跃进发生在波匈事变之后，在新独立的国家看来，实实在在不复有吸引力。

在饥饿中一切都不再有吸引力，除了食物。

而国内形势是，清了党，意见一致，指挥统一。这些东西贯彻愈迅速，舆论愈一致，行动愈迅速，假话愈多，集中营愈多，苦战愈烈。这种局面愈是持续时间长，回头的机会愈小，愈是要逐步推进，事情愈是要向极端化发展。

只是朋友愈来愈少，欧洲，东南亚莫不如此。可不是，手里没把米，叫鸡鸡不理睬。

还是饿，写这些东西也止不住饿的感觉，要命的饿。

斗争会天天都有。柳学冠偷鹅肉，狠斗一晚；王秉三偷馍，又多吃了一份饭，撤组长职，斗争；我的人道主义是斗争的老主题了。

赵淑仁专门召集起科学院的六人帮助我暴露思想，狠挖根源，触及世界观以及灵魂等等。我已不以为意，检查、笔记尽量拖一下，拖到哪天算哪天吧。

今晚用大车运砖。沈发慈悲，允许重病号留下不去，他说这几天“担浪了”，再这样下去要死人。他也害怕劳动队死人。

早饭稀饭很稠，新编了桌号，加上今天轮到我刮盆，吃得极饱。午饭就少了，分给我的一份还特别少。晚饭吃得很饱，到现在，凌晨快两点了还无饥饿感。

我站岗看柴火与萝卜种，种下 197 个，已经被偷 20 多个。河那边站岗，是要看住西瓜地里种下的胡萝卜，那可是宝中之宝。遗憾的是实在是看不住，外人偷，站岗的人自己也偷。我也偷。

饥寒交迫的造物，只可能一半是人，一半是动物。

下放干部现在普遍要参加斗争粮食的工作，就是到农民家搜查，把藏匿的粮食搜出来上缴。听说搜粮的人把农民吊起来打，逼他们说出藏粮的地方，然后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来。有些人就活活被打死了。我不敢相信，也不敢不相信。

据说院部的赵家骅还直接参加到一个公社中去“斗争粮食”。那个公社“极坏”，一天只能吃一顿菜，既如此，他们上哪里去“斗争”出粮食呢？所以劳动队对于我来说是个保险库，不用参加这一类活动。假如我参加，情绪上不起反感不可能，当场干起来的可能性都有，连小命都可能丢在那儿。

什么“农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趋势”，什么“阶级分析”，都是空话。如今要反的、斗的是全体农民。古时还有个告算緡，如今即不需“告”也不需“算”，直接褫夺罢了。自己若在场，很难自持。

上午担粪水浇麦时一阵阵发冷，担不动。到刘复生大夫处量体温，38° 3，给了一天的全休。发烧应该睡，可是无法入睡，就是要吃，不吃就不能睡。

刘复生其实懂得这是什么病，劳动队全部病人的病情性质他都懂，可就是开不出药方来。熬到中午，吃了一碗米面糊涂，四点吃上了跃进饭——十二两一盆。发烧时消化本会不好，结果是十分良好，稀饭又吃了七大勺，大便极端良好。

自 6 月到劳动队，吃饭制度已经三变。第一种制度是饭盛在桶里，大家从桶里舀到各人碗里。那

好紧张，真是抢饭啊。我也不免少嚼急咽，还不免受到“干活一个不如一个，吃饭一个比一个厉害”的白眼。这种制度夏天还行得通，秋天就不行了；第二种制度是十一前实行的，一个人一盆，分饭，分的时候还是紧张得很；第三种是现在，直接从跃进灶蒸笼里拿自己的饭碗。

穷有穷办法。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刘大夫说肿病会传染，其实谁都知道是营养不良和休息不够的结果。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十有八九是肿的。劳动队里天天听到家里死人的消息。二三年后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 Malthus（马尔萨斯）主义的效果了。

但愿 1960 年有一个丰年，那时也许毛先生自己会变一变。但一年也好，二年也好，国际、国内的了解是不可免的。亚非拉都在走改良了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解之路，中国也不能不在内部求和解。

昨晚路旁倒尸二具，由劳动队埋了。死者罗店人，身上有人民币四元。

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两个小孩在一个半月里相继死亡。他家原有人口十五人，比例也不算小了。柳学冠家母亲和弟弟死了。张保秀家是哥哥嫂子。

今晚站队，黄大讲肿病是思想问题，若一肿就倒，就怕死，精神垮了，再也治不好。但他又要五个肿得厉害的人留下来不上工，告诫他们老实躺着，不许偷偷扒扒的。

队部还做了一件好事——给了柳学冠一件棉袄，这实在是雪里送炭。柳学冠 1958 年搞滚珠轴承挣了一千二百元的公共积累，是个强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好像信阳也放了个卫星，冶金部还在信阳开过现场会。他的工资无论如何应该在劳改四类的 11 元和一类的 17 元之上。所以我说，劳动队就是天堂，公社的人就得不到这样的照顾。

刘复生研制成功一种肿病药，黑色大丸子，鸡蛋那么大，每天一丸。我问他成分，他说有枣泥、面粉、蜂蜜和若干中草药。这是疗饥丸，也正是治肿丸也。若要我开药方，事极简单：每天十八两饭，每顿再加半斤胡萝卜，肿病可速愈矣。

胡萝卜市价每斤贰角，市场挂牌是二分九厘，但只有牌，没有胡萝卜。

数九寒天将至，死人还要增加。现在问题不在死不死人，而在于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都四五十了。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却是糟糕事。诚哉斯言！死掉一些老人和孩子，达到了 Malthusism（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的强劳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

商城 42 万人，麦收前能保存 35 万已是大好事情了。

一鼓作气，58 年我之见矣。再而衰，59 年我之见矣。而吴芝圃（是时河南省委书记 - 作者注）要在二年苦战基础上再苦战三年，是再衰三竭之后的四鼓、五鼓。殊不知四鼓五鼓，曹刿又如何论战耳。

赫鲁晓夫说中国国庆庆典是盛大的，则大会堂、北京饭店朱门之内，当不免酒肉臭也。我若能活着回去，将永远也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它的基石下面是什么？我岂能踏着基石下面的这些冤魂

走进去？我发誓，此生此世绝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

有时低头看看自己身子，背带早已革掉，习惯勒紧裤带干活，麻绳，皮带，草绳都可以。最大变化在如今满身是粪，初来还要用肥皂洗洗手，现在根本不问了。手的变化最大。现在已经不再起泡，起茧皴裂，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尤甚，手指甲都变了形，已经完全不适宜抚摸我的妻子和孩子了。

吃饭，开始不惯用大盆，还要从盆里装碗。现在别说碗，用小洋瓷盆都不习惯了，须得用大盆才合适。回家用小碗，如何适应？那得添多少次饭？看来得用个大脸盆。无论如何回家后要用尽各种办法猎取食物。科学院有350元生活费可取，用50元吃十天大概总是够的吧？

我可能不致在商城成为饿殍。呜呼，个人主义！

今晚有牛骨头豆腐汤，就馍！牛骨头是熊县长批准的，沈场长（因要建养猪场，他从队长改称场长，辖下人员不变）直接去找了熊县长才搞到，市场是一无所有的。城里人说去年劳动队还有些干部味道，今年跟民工一模一样。

这就是改造的成绩。

彭铁一家全死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人。劳动队怎么不是逃城？

劳动队近来情绪不高，主要是肿的恐惧。队员浮肿的已经不少。大家认为夏日劳动出汗多，多喝一些盐开水可以补充盐分。沈万山认为多吃盐易致浮肿，昨晚站队他对全队讲话，要制止这种行为。他说：“你们拼命喝盐水，你们的肠子会变成腊肠。”

沈万山对劳动队队员粗暴，尚可以理解为他对右派的义愤，可他对自己的阶级弟兄——水库的民工比对右派还要残暴。拿走一些菜叶的民工要是被捉住，就剥下这些人的衣服再把他们放回去，要他们本队的人来把衣服取回。我同情民工，他们不是快要饿死了，怎么会为

沈万山对劳动队队员粗暴，尚可以理解为他对右派的义愤，可他对自己的阶级弟兄——水库的民工比对右派还要残暴。拿走一些菜叶的民工要是被捉住，就剥下这些人的衣服再把他们放回去，要他们本队的人来把衣服取回。我同情民工，他们不是快要饿死了，怎么会为这原来猪都不愿意吃的烂菜叶子丧尽尊严？

可我只要为他们说句话就要遭到劈头盖脑的批判，被迫检讨“人道主义”的错误。

就是这样，还要“鼓足干劲”？再衰三竭！

晚间大咳，夜里尤甚。右胸肋骨因巨咳大痛，至睡眠不能反侧。痰极多，都是脓状。十九日开始评比，我自称劳动表现下降，何对我尤其不满，原来他是争着要照顾我的人，现在已无那份善意。赵淑仁也颇关心，又要求谈心，推脱说怕是肺结核传染她而婉拒。

队里劳动力一日少一日。雪中劳动，雨雪夜工，病号已不知多少。

刘复生照例一律不量体温，大家也不要求，心照不宣。

科学院权少珍脸肿得像大阿福依旧出去拉树。语言所彭楚南体力不支且有病，连摔五六跤，热泪

盈眶。赵淑仁自称腹痛腹泻，坚持劳动做给我看，她主张我继续捡粪，根本不同意医生批我全休的意见。然而我不会像先前那样照赵的意思做。一是我根本不指望在商城摘帽，二是沈现在极怕死人，劳动队情况正在向上汇报。加上我人滚蛋在即，他犯不着对我认真。

我还得留一条老命回去呢。

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都摘了帽子返回原地？一日局势不好一日不可能。眼下遍地哀鸿，人相食，灾荒报丰年，打肿脸充胖子，如何搞得？快新年了，搞个10%，筹备节日气氛，做一个政治勒索的资本，如此而已。就以商城劳动队而论，摘掉帽子的人离队根本不可能。想来无非就现在基础创办一些产业，约束群魔，不蹈洪太尉覆辙罢了。当年金圣叹那句批语“天下本无事，游山游出事来”，真是绝妙。

若真摘帽，必得有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出来。世界形势绝不容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复活。宋庆龄的和平、进步、正义才是正宗，妖魔邪气，何能持久？这件事的解决将为日无多。

民间除大批肿死，商城已发生人相食二件，一是夫杀妻，一是姑吃侄。据说要公判。即是公判自然满城风雨，但劳动队内是传播不得的。可如果活生生的身边人都能杀了来吃，那饿死后的人岂有不被吃掉之理？

吃活人要公判，吃死人呢？

公开说谎，已成风气，积弊已深，骑虎难下，类似舒同文章连篇累牍，都是表态：毛主席的领导决不会错，跟定毛主席走，是全国人民长期斗争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至于事实，唯一原则就是根据上级指示定产量，根据上级意图做调查而已。发了一批人民公社调查，浦江的种菜养牛，黑龙江的机械化，上海市郊的公共食堂——“并起来吃”（？），无一处提到华中各省农村。

不幸的正是华中各省，条件最坏，人口最密，1959除河北省外，无一省不早，无一省不灾。旱与灾之后又决心向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这些地方的人啃山吃水，消尽自然资源，若非天灾、兵灾匪灾，必是要“治山治水”，而后是慢性饥饿和死亡。

如今农村体制经多年经营已告成功，结构是：

甲. 公安户籍体制。有此一条，灾区农民无法流入城市。苦惯了的中国农民，但凡每天有一顿菜吃也不会外出逃荒；

乙. 人民公社，产业军体制，把纯粹农村结构组成营连并随时可以从中组成野战军（例如水利）；

丙. 公共食堂，把农村粮食消耗彻底控制起来，使“粮食出荷”不足以造成骇人听闻的饥荒事件，让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谁说是饿死的，谁就是右派右倾。所以在宪法规定有居住自由后却又有“流窜犯”的名目，怎得自圆其说？

综合队那边在盖戏院，除了自己的三四百人，还有二百多到处找吃的人加入。

蔡璋这个大滑头，劳动避轻就重，结果大发烧又被送回医院。

进城买痰孟见他整洁健朗，医院独占一室，可获额外供应。他当即给我信阳大饼三个，硕大味美，我早中晚各吃一个，幸福极了。这个大滑头，明明有我给他的钱在手，不见我他是不会给我吃的。想想也不能怪他，托谁带给我也不保险，可不是只能当面交割。

食品来源愈来愈窄，我得自谋生路。决心向药品进攻——不论多贵，也要买虎骨酒和鱼肝油。托医生去买，应该不会引火烧身。向药品进攻已成风气，买鱼肝油者极多，麦精鱼肝油已经买不到，只能买到果汁鱼肝油了。

商城人均耕地不足一亩。1929年前后，商城一时红，一时又白了。人口死了一批，走了一批，但人均耕地目前必低于1927年以前。彭铁孩子四个，黄渤一家十五口，不死一些，这片土地如何承受得起这许多人？

土改时人多劳力少的农户划为贫农，人少劳力多的划为富农是有道理的。中国农村的阶级变化，土地所有制为决定因素的比重恐怕还不到一半，人口增殖对阶级变化所起的作用远甚于土地所有制。

商城人民有句自豪的话“咸菜干饭树兜子大，天上神仙不如俺”，典型的糊口经济，孩子一个个生下来，又无耕地可辟，必做樵夫，破坏山林，最后全家沦为贫民。

在此种糊口经济与人口大量繁殖情况下，若无统购统销，人民公社，用进口粮食满足工业的需要，一个高商品率的农村经济永远无法形成。农村不会有积累，积累的只是人口，这些过剩人口将涌向城市，压低城市劳动力价格，障碍机械化发展。

粗糙的物质怎么会产生精致的精神？那只会诞下糊口政治。不过如此“政治”还能叫做政治吗？

我要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个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朗、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峻刑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

然而贫病愚昧，还自夸“天上神仙不如我”的农民，又如何能文明得起来？只好消灭一部分，培养出一批新人来，新农村才能建立。这个历史使命完成之后，新局面就要开始。或许那时我能做些什么？在这之前，我要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人所知。

这个体制会自上而下地崩溃吗？答案是不会的。

农民中确无能人，加上整风，反右，大洗脑，把仅属于萌芽状态的农民代言人禁锢起来，选拔大批连营长式的队长、会计、技术员，在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政治集团，例如沈万山。所以这个体制是崩溃不了的。真正的改弦易辙必待农村财富积累，可以从生产资料的“盆边”溢出到消费资料，必待糊口经济耗完它的生命力。在中国，这意味着提高粮价，放宽农村供粮，取消公共食堂，代之以严格的工资制。新制度将是工资制，吃饭不仅是要钱而且很贵，少很多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制度。

糊口，糊口，我现在就急须到哪里找块红薯糊口！

4. 商城日记（4）—— 饥饿中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听说要走了，北京也怕右派们活活饿死在各处的集中营里，那会在国际上闹得很不好看。

终于要走了，谢天谢地，该离开这个集中营了。

科学院的右派可以走了，可劳动队的解散是遥遥无期的，人们还要在这儿受苦受难。劳动队固然是天堂，但1959年的劳动队艰苦甚于1958年的，1960年将更甚于1959年。光是粮食问题已经够受了。

固然是群众的不济事决定了领导可以胡作非为，群众有与其相配的领导。然而我不能不深深怀念这儿的人们。

在此哀鸿遍野之际，商城生活水平高的人却有的是！蔡璋跟我说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天天吃肉，天天吃炸油果。部队招兵的人和开各式各样会议的人，天天好招待。我们几个过几天也会奢侈起来。

苦的是农民。

街上卖咸菜是商店唯一的业务，很多人买了就当饭吃，当街就送到嘴里吃起来。

熬不到走的那天，三点半跑到蔡璋里吃了一点健身粉——炒米粉。只见科学院的权少珍也来了，原来也是找蔡璋搞吃的——糖、月饼，什么都行。人人都有各自搞吃的门道和本领。权的脸肿得像大阿福。

沈万山则公开地吃，鸡、肉都常常有。有人不识相提意见，他说是自己买的。若问为什么我不能买，答曰：你们是有罪的人。

昨晚赵又缠着我要我交劳动队思想总结，说是每个人都要先写个“大纲”交上去。我说我要站岗，说得也生硬。最后一次站岗了，三点起身，根本未出屋，门口站站，烤烤火而已。

早饭我公开要求喝米汤，以前都拉不下这个脸。喝了两盆，实在不少。午饭是跃进灶蒸的糯米饭，我准备这几天把剩余的糖和鱼肝油都吃完，进城后吃得门路肯定多，不用保留它们。

摘了帽子的当地右派也要走了。何祥福国庆节摘了帽子，还回到教育岗位。给他留了北京的地址，相约通信。徐云周我想和他做一次秘密谈话而且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他，虽然也都是破烂，但在劳动队却属于奢侈品——雨布斗篷，旧衣服，裤衩背心，热水瓶，竹箔子什么的。但谈话和送的方式，还要慎重考虑，免得节外生枝。

原来以为人人都写总结不用劳动了，没想到还有最后一次捡粪。捡粪现在更困难了。“盆子”已经合龙，连石头缝里的散粪都捡干净了。厕所粪不多，民工早就告诉你们捡不到粪，因为我们都喝米汤，只撒尿，不拉屎。我意外地在在坝下发现一个茅厕，有个像是基层干部的人在拉屎，便秘，硬

是用手抠出一个个粪蛋蛋。他说他是越美公社的。我想和他交谈一下农村吃饭的状况，他说现在肯定没米，过了年国家会供应。我问他越美在哪，他说跟你说你也不知道，你捡粪，捡完走了不就得了？问那么多！估计我一开口他就知道是右派劳动队的，能跟你说上两句就算不错了，你还想跟我打听事，我可不想没事找事。我很识趣地闭上嘴，赶紧捡粪。

出了劳动队，你只要和任何一个人说话或者问点什么，随便谁都能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高尚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只要你看他一眼，你立刻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卑劣之徒，因为他实在太高尚了。这里是一个“纯洁”和“高尚”的世界。黑格尔不也说过“在纯粹的光明中就像在纯粹的黑暗中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吗？

不过这个茅厕存货很多，我满载而归，高兴得很。

冥思苦想写材料，先写那个狗屎大纲吧。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子丑寅卯，ABCD，须言及右派言行、红专矛盾、人生观世界观、阶级观点、思想根源、个人迷信、波匈事件、统购统销、大国沙文主义、批判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情绪、Macro declaration（宏观定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领袖与群众——跟毛主席走不会错、政治挂帅、大坝合龙、抗旱种菜……可媲美美国情咨文或者政府工作报告。

我反正写惯了，全不费工夫。

毬，写什么材料，我只当它是半年后的大休息。

昨天下午吃的糯米饭还回味无穷，放了大量的糖与油。糯米即使在北京也仅仅是阴历年才能每户买一点，现在商城却大吃糯米饭，应该是最后的存粮了。

中午站队时沈说27日前必须交总结，好给每个人做鉴定，我说我只能交个大纲。赵淑仁说要讨论人生观问题，你必须得说一下，只好应下来。

下午到地里正遇上收胡萝卜，吃了四条，消化极端良好。

晚上就他妈的一个邹如山的人生观问题就讨论到半夜，又饿又冷。

赵淑仁向城里科学院的人反映我有“归田”之心，说我对蔬菜农业有兴趣，不关心政治。今天我借机向她表示了愤慨，我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你不好这样夸大吧。

她说我自满情绪又上来了。去他妈的屁自满情绪！我懒得再和你说，把愤慨表达了也就行了。一切都得半真半假，真真假假，假里有真，真里有假，如何对付这些毬事情是门大学问。

把该送的物品都送了，撒尿的家伙送了杨学廉，家具、还有一些物件送去下菜棚，实际上就是送给徐云周。拿出二元大钞交给杨云华，要他准备一个夜宴，酒，胡萝卜，菜心，相当丰盛。

盼望已久的库部长来做报告约一小时，比前日王检察长的要简单扼要些，虽然一样的论据缺乏，捉襟见肘，总比沈整天指责，挫尽人们尊严强些，至少他还是希望这些人像人。说到肿病，就两句——好人不可能不病，病人不可能全治不好。所以到底掌声还是稀落。劲可鼓而气不可泄，劲和气如

今都不过如此。

天色阴沉，奇冷，冷极了，到处找火烤。写字都伸不出手来，还得写。

就一个邹如山的人生观讨论了两天，我简直未发一言，无聊透顶。如今天天要讲革命的人生观，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呢？做“职业革命者”？人人都做向秀丽？高尔基区分了家雀与海燕，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所要求的不过是所有的人都做驯服的家雀，可又都立下摘星星摘月亮的可怕大志，又要提倡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其间逻辑的、道义的联系，简直就是狼腿扯到狗腿上。

倒不如承认人民就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力。家雀中若是真有什么海燕，还是把它区分出来另设一类的好。

空话连篇，相互欺骗，什么都似是而非，不清不楚，毫无逻辑可言。政治挂帅做到这一步，可怜已极。

眼下城里卖酱卖咸菜的也没有了。我让蔡璋去弄点饼子，他说现在乡里一窝一窝的饿死，还能有饼子卖？

城内新工人一律 15 到 18 元的工资，比劳动队还少，可上班每天都是早晨四五点就开始，还有夜工。

所以才有王书记十万、二十万的闲钱建设公园，据说他的范例现在已经不是信阳、武汉了，是北京的大会堂和国庆十大建筑。

人民公社把人的劳动力价格贬值到无可再低的程度，阻止城乡劳动力的流动，为县社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这样积累的速度将是可惊的，大小工业将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还有剩余，北京的大会堂和商城的戏院当然能应运而生。

如果 1960 年丰收，1957 年前的局面也永远不会回来了。除非：提高粮价，农村实行全面的工资制，粮食供应和公共食堂自由化。

早上赵催总结稿，我说我有病，誊不完，她说你自己跟队部说去。费尽口舌，极尽诚恳，队部一关总算过了。其实我们这些人的总结、鉴定别人早已写好，与本人何干？

进城以后恐怕还得继续闹病，夜间睡下，胸口痛未已，身上乌糟糟的，什么也不想干。

该理发、洗澡洗衣服、洗鞋、晾被子整理报纸什么的，明天要参个什么观，真不想去，还不都是假的？参观有何用？听听夜里家家大哭小喊饥叫饿的声音不比毳的参观强万倍！

还有人在打我的主意，权少珍要向我借五元钱，彭楚南想要我的鱼肝油，一概拒绝。看彭楚南这半年来已经彻底屈服了，他追求的是摘帽子，不复再想回马来亚了。权少珍是一副落难大少爷相，拼命搞吃的。我可没钱借给你。

可话说回来，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已经变得很卑鄙。可不偷吃

东西，不偷东西吃，我将如何？11月起一个半月无外援，结果是肿。若不偷吃，我难道不会大肿吗？

饥饿中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反是几个本地年轻右派，特别是何祥福和徐云周，前者还梦想着飞翔，后者一直忠于自己的政治见解。徐云周至今没有学会怎样撒谎，这几天非常焦虑着总结怎么写。我指点了他两三句，无非是教他如把谎撒得巧妙些，他竟认为问题解决了，甚是高兴。他说他将来一定要到城市去，做码头工人也行。我跟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如此，他这种青年才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希望，要坚持留在农村。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劳动队的最后一夜是在昏昏沉沉中度过的，大家把剩下的红酒白酒都喝光了。

沈讲话，说库部长对猪场建设速度很满意，要求在年底前四天完成。

过年，商业局绝无可能供应任何东西，他说打算自己抓生活，至少要搞到一百斤酒大家喝个够。他还豪迈地说，思想总结不做了，先过年再说。

劳动队本来是劳动的，何必过问思想？

晨四点，便急，拉完就跑到外厨房烤火，幸福感又上来了。我就这样幸福地结束了六个月的劳改生活。

赵淑仁非要叫上我去和沈告别，还要他最后指示一下。沈就老实不客气地指示了——内容不外我对你们的教育怎么得力，让你们都“接上了头”云云。真正有内容的就一点——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意思很明确，就是你们回北京见了人一定要说谎，饥饿、死亡都是小事，你们回去说话要小心，胡说八道事可就大了。

权少珍在蔡璋处说了好几次所谓接上头接不上头的问题，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今天蔡璋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之所谓接上头原来是他经常买东西给沈的孩子吃，而且这一次临走，还跟蔡璋商量买些什么东西送给沈。

原来他要向我借钱是干这个！

另一件事情是蔡璋向单位要劳动补助，单位要劳动队开证明。沈说你有呢大衣，手表，为何不卖？他要出20元买他的呢子大衣，80元买他的手表。蔡璋有呢子大衣和手表卖给他，别人呢？只有筋肉与骨骼，各尽所能，各献所供好了。沈眼中的右派，不过如此而已。

在沈万山眼里，劳动队的人毫无尊严可言，能让这些人在自己面前因为恐惧而屈服，因为屈服而成为奴才，对于他有饿虎舔血一样的快感。可在王书记、库部长们的眼里，沈万山又有什么尊严？无非是个狱卒，刑官和刽子手罢了。而在极峰的眼里，所有这些上司和上司的上司们又有什么尊严？这里无非是个只有等级，毫无尊严的、猿的社会罢了。

在所有的人中间，人性最少，阶级性最多的是沈。在他眼里，思想改造永无成就可言。这不是阶级性而是兽性。

有两种刽子手：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不自愿、职业的。自愿的刽子手在一切方面当然要比职业刽子手低劣，然而人们对职业刽子手往往十分厌恶，他们常常使人感到可怕，憎恶，不可理解，甚至令人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怖感。可是对自愿的刽子手人们却往往漠然视之，甚至加以赞扬。可是自愿的刽子手身内的兽性要比职业的刽子手多得多。

沈万山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愿型刽子手。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他还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是把人看的很下贱。我还记得这几句话老孙冶方也特别看重，前年我们还一起议论过。可你看现在人间的兽性！

沈万山，假如有一天，让我来审判你！

昨天在城里买了二双袜子，脚下齐整起来。今晨洗澡换衣，短裤里尽是屎，夜里起床便急所致，当时就知道，懒得换，今天算是换下来了。停会儿去理发，总得有个人人的样子，我还不想就这样脏下去做一只猥琐的猿。

洗衣服，晾被子，去邮局，还在劳动队混了一顿不要粮票的饱饭吃。今天一天做了不少事，明天干什么却颇费踌躇。太阳极好，真正是可亲可近的冬日。

别了，劳动队，别了，Concentration camp（集中营）！

V. 商城日记（5）——自由了，依然饥饿

住到县城招待所，各归各队。赵淑仁的权威开始解除，颇惆怅。现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习惯呢。昨天晚上我七点就睡下了，完全合法。

今天他们去长竹园参观，我坚决申请不去，很容易就通过了，这才真正有获得释放的感觉。

县招待所吃饭还不如劳动队，每天十七两粮食，基本无菜，只有咸菜。赵给了我三斤粮票，我收下了。蔡璋说只要有粮票，他就能搞到吃的。去长竹园的人走前，我拉开脸大声问谁能给我些粮票，陈定一又给了我三斤。

全体人马都走了，只剩下我在这里，这下好了，我是真正的自由人，完全自由了，小便不用请假，日记本不用费尽心思东掖西藏，更重要的是可以搞点东西吃了。可我已经养成了秘密工作的习惯，额外补给从未被人发现过。

29日，30日，二天弄了几顿饱饭吃，31日，1日应该不会饿肚子。从劳动队回来填了几肚子，1959年12月24日起到1960年1月1日，一共过了九天，不，几近一旬的好日子，身子和生活都趋于正常。

那个总结是非写不可的。我现在就在南房墙角处写，十分暖和。写就写吧，我打算先把这200

多天的日记整理一下，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不去长竹园大半为此。

睡觉是九人一屋，通铺，但究竟是床，不是竹箔子，劳动队睡的那个东西，说是“竹箔子”实际上和竹毫无关系，是用苇子、秫秸等打成的草垫子。这里房子也是真的房子，不是劳动队的棚。房比棚到底强多了，干燥、暖和，夜里盖的棉大衣，再不愁两袖二襟垂到地上弄湿。

晚上还能打到开水，早上能洗个温水脸。今早洗完脸还对上开水多洗了一次脚，明知早上洗脚很可笑，况且还打算上午去洗澡的，还是洗了。洗完澡又拿李宝仁给的凡士林大量抹手，龟裂的冻疮假如能在回京前消失就好了，那是最希望的……。

总而言之，这里是真正的天堂。

毛毯忘在劳动队了，反正不远，走了五六里路去取。原以为丢了的肥皂盒子竟也意外地找到了。

人们对我们的离开已无惜别之意。昨天都别过了，为条毛毯又回来，挺没趣的。

我们是走了，可他们还不知要在这呆上多久。这是最后一次到劳动队，以后不会再来了。

但这次也不白来。食品加工厂厂长给蔡璋弄了点点心，我准备在这儿弄5斤胡萝卜回去和他交换一下，维持到元月4——5号的伙食就不发愁了。二杨亲自挖，一杨登帐收钱，另一杨做证明。我三毛钱买了6斤，比黑市强多了。用找到的毛毯包起胡萝卜抱走，我就这样最后离开了劳动队。

再用胡萝卜和蔡璋换了二个烤馍。大约半斤糯米饭放进了五六个胡萝卜，他还打了五毛钱红酒，买了一份病号菜，青菜，粉丝，豆腐。我俩从二点半吃到三点半，总算是吃饱了，简直是酒足饭饱。无限的满足。

半醒半寐，慵懒得像一头冬眠的熊。这大休息是合法的，自由的。连日来都不断被催促干活的梦惊醒，假寐中也是如此，常常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真实中。

可是有一种犯罪感。我自己警醒，不能再休息了。

大休已经六天，六天中所动全部脑筋除了吃，还是吃。应该干活了，不是撒菜浇粪担水而是写作——先要把敷衍门面的总结写起来，然后整理劳动队记录大纲，这才是最重要的。

昨日傍晚下雨，晚间转雪，竟日未停。体力逐渐恢复，右胸肋骨疼痛逐渐消失，手也光滑了些许。如此的不紧张真让人有点紧张。

回来后观察下放干部，比初来时大有变化，对吃的问题尤其敏感。余他们在木河大队每天就吃一顿菜，都肿过。历史所一个女的，说到吃饭问题，几次把话咽了回去，“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Bishop of Candbury, Dr. Johnson said (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逊博士说) 饥饿在中国已成过去，《人民日报》用花边框起新闻来加以刊载。这位主教大人从前不也在布道中说过“苏联正在进行着壮丽的社会主义实验”吗？可莫斯科的报纸在他们的漫画版中正是照着主教大人的外观来嘲笑基督教教会的：长筒靴，十字架，白头发，表面上让人肃然起敬，实则荒谬愚蠢。如今他又要告诉信徒们中国

也是因着“壮丽的社会主义实验”而将饥饿消灭了。这些东西可敬可爱的大主教博士先生相信，下放干部却是不会再信了。

写了信给采秀。

今冬七千万人兴修水利，相当于去年的大办钢铁。

我怀念铁佛寺水库的民工，这么大的雪，完工无期，不知他们的死活。趋饥寒交迫之众，到处新开工工程，这些水利要成渠道系统，完成土地与灌溉系统的整理，没有三年是办不到的。

“小洋群”炼铁（小型，洋法，群体大炼钢铁）的装备与工业配套仍将耗尽一切工业的增产，工业中劳动力的增加受到了极端的限制，它的代价就是用新的工业增产来装备工业。这些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

工业方面的这个形势，逼迫着城市供应的紧张，使商业极端追求农产品的采购率。

现在高唱入云的农业四化（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不得不极端限制于商品率高的地区与部门。

中原农业的餬口经济严重阻碍着商品化，索性搞万头猪场之类的东西，极其缺乏统计学概念。中原农业有三重负担，却几无所得：（一）支援国家工业化，低价搜刮一切农产品；（二）支援城镇工业建设，例如商城的机械厂之类也靠在它身上；（三）完成农业本身商品率提高的改组，水利与猪场均属此类。而中原农业于这三项却几乎全部无所得。

农民太苦。

水利化、提高商品率、工业配套和中原农业技术中心的建立，这些需要至少二三年的时间。

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还能不能再撑二三年。假如1960年丰收，加上去年今年死了一批老人小孩与部分壮年，粮食消耗量有所减少。吃得饱些也许能撑得久些。但是打肿脸充胖子究竟能充得几时？乞求外援吗？

实际上我也肿过的，半月前照镜，脸比现在胖，昨天理发时再照，消瘦而有精神。

长竹园参观的全体人马下午三点回来了。长竹园看来是商城的招牌，20000人，20000亩地，7000只羊。深山区，交通闭塞。水库工地上就没有长竹园的民工。伏天可能比周围多下些雨，据说每亩收了八百斤以上的稻。山地林多，落叶沤肥供给土地，16000亩稻田是肥沃的。吃得好，不见缺粮现象。老苏区优待是个重要原因，公、余粮要得少，供应也充分一些。他们把科学院的人当成了中央检查团招待，一顿十七八个菜，肉食丰富，皆大欢喜而归。

那里是世外桃源，但愿不要发生“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后果。

虽说在长竹园吃得那么好，他们回来后第一件事情依然是——吃饭，看来又饿坏了。

我虽然中午吃了十两午饭，还是又随他们吃了一顿。人似乎永远处在饥饿的状态。晚上下放干部去听报告，右派和摘帽右派们则写总结。八点半还有一顿糯米稀饭，机不可失，必须去吃。

风闻中央在开扩大干部会议，安排群众生活。

莫道安排生活是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核实产量，真正缺粮的要供应。但除非各地承认估产是虚报，否则又会有一个“反瞒产私分”的斗争，继续伤害群众。会有所点缀，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还会出现各种惨象。

用阶级斗争来解决吃饭问题，“解决”一部分，“摧毁”一部分，也好，可以加速农村劳动力的纯化，却无助于人口的减少。

没事干，重游西大畈农场。会计室里正在写春联，上联忘了，下联是“农业四化尽快实现”，居然赏脸征求我的意见，我连声说好。

气象预报今年的伏汛还是不正常，涝的危险大。我真怕这个铁佛寺水库顶不住汛期的大水，堤坝无论如何显得太单薄了，底部的承压能力、泄洪通道也看着不大像回事。但愿七千万水利大军春耕前能完善这些项目，也愿今年的水能蓄一些给明年用。

反正现在是自由人，又去看了看商城机械厂。它目前水平大不如赞皇机械厂。熊县长所说已能够制造什么什么，全是牛皮，与粮食产量、水利工程都是一回事。可它造起那么像回事的厂房，使上海的弄堂机械厂望尘莫及，可里面全是些破烂东西，毫无投资的经济效果。全国情况基本都是这样的，程度有差别而已。群众大办工业，无非是将地方建设投资于劳动力消耗提前支付，目前支付着极其沉重的代价，把人命也都抵押上去了，如此而已。

要继续这样干下去，人民公社组织形式不能少，只有人民公社才能控制产品、控制分配、控制消费，才能极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使“安排生活”和“核产”紧密结合起来。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组织大的商品生产，把餬口经济完全打垮。还有全国能有七千万人上水利，也是人民公社的作用。

体制既已建立，下马万万不能。下马，就是大乱。

商城县委一切都是婢学夫人——纪念日游行、工业化、机械厂、人民公社、公园，一切都是模仿，近的模仿信阳、郑州，远的模仿武汉、北京。想当初刚来时听信阳地委刘书记报告介绍商城情况，对商城人曲尽讥嘲，毫无同情。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被更高一级城市的人讥嘲。

人们对我的观感，始终不过是特殊化，有一套等等，谁也弄不清我想什么。我只能暗笑他们的无能。人落到这一步谈不上什么价值，到底还有什么作为人的价值呢？连徐懋庸都不过是个蠢材而已。想当初我读他翻译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恍如隔世。

东西方相互渗透之说，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我都很感兴趣，也基本属于这种类型的思维。就算我是花岗岩脑袋吧。继续这个态度，潜心研究十年。要争取到经济研究所或北大或复旦教书去。现在弄不清回京后如何安排我，去南口继续改造也好，当资料员也好，总比在劳动队强。有了商城右派劳动队的经历，今后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

岁末和元旦，主题自然还是吃。

1959年的最后一天，岁末，晚八时喝一碗半凉的糯米稀饭，元旦晨七时半，稀饭两勺，九时去蔡璋处，弄了八九条胡萝卜煮来吃。除此之外还有：油炸糍饭糕三块，中午米饭一碗，晚上聚餐晚饭一顿，实质上等于没有肉食，因为一点母猪肉根本嚼不烂。牙齿也不行了，劳动队时候有天一摸就掉一颗来。但吃了炒猪肝一盆，萝卜丝炸豆腐丝一盆，酒二两，烤红薯馍两个。

不算少了，却不觉过饱。

到蔡璋那一天去了三趟，都是吃完就走。我决不揩他的油，实际上半年来额外补给的吃的东西都是他设法搞到的。粮票没亏待他，钱也没亏待他。我俩的“吃联盟”看来也要散伙了。

下午开始学习。开始先是一个个人表态，然后集体朗读文件，然后是决心书，挑战、应战一番，好似大合唱，有独唱、合唱、对唱、轮唱，看上去很热闹。但情绪毫不热烈。大家都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到底什么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找了好几篇东西看过，陈伯达的，施东向的，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定义。

陈伯达的文章最妙，标题是《世界观的斗争》，通篇却都是讲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并不指明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看来这个问题还得我自己解决。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蔡璋跟我说吴华家也死了几口，三个孩子只剩下了一个，寄养在劳动队附近，看来是有选择留下的。他还跟蔡璋借了钱。家里死上几口子的右派还有的是。所以说劳动队是逃城，是天堂，一点都不假。

这次明确，赵淑仁的摘帽子未经院部批准，都是沈万山、李克征的意见，原因是我不合作，她合作了。也就是说商城劳改队的摘帽子是不作数的，她依然是右派而不是摘帽右派。姑娘，我不埋怨你，我为你难过。

学文件一大好处是体会一年来的变化，例如现在提到的“紧张论”（干群关系紧张），总路线刚发表刘（少奇）的说法已不时髦，取而代之的是“一穷二白论”。

农村问题的办法，哥穆尔卡是一套，赫鲁晓夫是一套，中国又是一套，较之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社会主义也是愈到东方愈野蛮吗？

刘的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等构成自身一套逻辑体系。这套体系似乎八月份是一个结构，十月份又是一个结构，到了十一月份又变成了世界观问题，又是个新结构。听说1957年初陆定一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是来自极笔。

李富春元旦文章提法是一农二轻三重，到底是色厉内荏呢？还是改弦易辙呢？且看。

讨论文件时受到围攻，决定不再暴露真实想法并决定这一方针要坚持下去。

依然奔走于吃的问题。中午的糯米饭，上午的酒酿都解决不了问题。午饭后到蔡璋处凑巧碰上他吃面，又吃了一顿。蔡批了点点心给我，这已经是第若干次了。还买到了一点饼干，吃完面又加了点

饼干才算有了吃饱的感觉。

还得省下一些明早吃。还得去跟买饼干的那个门市部缠一下，决心要买到几个月饼吃。钱会发生问题，拉亏空了。蔡璋那儿又放了五元，长线放远鹞，还有十多天要熬呢。

村里死亡愈来愈严重，一死就是一家，一窝一窝地死人。城关卫生院组织医疗团下乡去治疗这个“传染病”去了。

昨天买到五元钱的饼干，今天一元钱买了五枚月饼。起床先吃完饼干，早饭前吃二枚月饼。这回是真的吃饱了，痛快之至。每天几乎都要用去一半的时间谋求补给。

赵生祥说昨天他去鲤鱼山买鱼，路上遇见一个肿病的女人，家里已经肿死二人剩她一人，到城里找叔叔，实在走不动了，要他的自行车带她一下。看来肿病，全家死亡，不仅限于右派家属。

在我们招待所食堂里，今天有个老太婆拿起我们吃完的饭碗，用手刮着碗壁的残羹，实在刮不到就舔。残羹之少，因为我们这些人已经刮得很干净了。她身边的几个小孩，实在精瘦得可怜，有个小孩还跑进伙房，躲在床底下吃偷来的东西。

农村哀鸿遍野，我却整天努力谋求补给，今后只能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这种内疚。狮子奋进，总是有这一天的。

什么“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都是滥调。实际上一切决定于数字，那崇高的理想也决定于数字的。

VI. 商城日记（6）—— 饥饿令人下流

主动去找领队李克征是为了表示忠诚，汇报总结内容并请他指示。本想在总结上写上一条——目前有一个缺点：失掉自信。想了想，咂摸一下李克征的气候，还是不写的好。我要是到了这一步还有自信，那才是麻烦事呢。改成缺点是唯我主义，参考的是马克思论谦虚，看上去能对他胃口。

来前我又跑到蔡璋那吃了四两早饭和六个炖胡萝卜，肚里有食，人才可能心平气和。

做些表面文章眼下我已可以信手拈来，毫不费工夫。我可以同时拿出好几套套货来，不同的货色对付不同的人。外表上我变得沉默了，半年的沉默已成习惯，大约将来也不会变了，内心的熔岩不会有人知道。还有一系列需要分析的政治理论问题，在持续饥饿的环境中很难作下去，因为没有力气。现在才知道，思考也是需要体力的。

Compare 1943 of Honan（与1943年的河南相比），Compare 1959 Spring at Thengchow Conference（与1959年春的郑州会议相比），都是很可纪念，需要思考的事。

领队说北京正转入系统理论学习，又是政治经济学，又是毛主席著作，到底什么噱头还弄不清。

在劳动队时还叫“保卫”——保卫总路线，保卫人民公社，现在已正式升级到“捍卫”——捍卫总路线，捍卫党中央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把戏？“保”和“捍”前面的敌人是谁？以前估计的色厉内荏，掩护退却，蛮干到底，再衰而竭，但体制不会垮。那到底是什么花招呢？

日来出现思想改造的高潮，人们是激动的，特别是年轻人。激动的中心是社会责任感，一项崇高的感情。但这种牌号的社会责任感是直接被引导到做驯服工具这条结论上去的。人们对国庆建筑与哀鸿遍野发生在同一时间所产生的联想并不多，说明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还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们昧于事物的客观规律，社会责任感之说一律出于谴责自己贡献少而享受多，有了如此的经历还如此众口一词，除了宗教情绪其他无法解释。

前几天曾出现衰弱与卑微之感。卑微，出自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日夕奔走于食品点与蔡璋之间，谁也不知道我几乎天天到他这里来。我变得卑微、谨慎，甚至狡猾，费尽心机计算时间以便能到招待所名正言顺地多吃上两碗饭。整个人都变得下流了。

衰弱之感来自精神分裂，参加会议，表示积极，实际想法是另一回事。和青年人的单纯相比感到自己没有力量。

哀鸿遍野，我努力求饱。

北京大会堂大宴宾客，还有著名演员演出助兴。

我要保存自己，给历史做一个记录，给后来者一些经验教训。历史决定了这个时代不能是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什么思想改造，只会造成一些神经病患者，把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引导到一种宗教感情上。将来谁能将他们引导向更为健康的方向上去呢？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一代人不会很快就摆脱掉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东西；一个人也不会很快就抛弃掉那种已经注入他血液之中，也可以说是从母亲乳汁里吸吮过来的东西。不可能发生这种急遽的转变。人们还很少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祖传的罪孽。应该彻底抛弃它，但这并不是很快就能办得到的。

可如今阶级斗争才是第一位的，斗啊，斗啊，据说还有二十年？五十年？斗谁呢？再斗下去，势必斗到尽头。“老田鼠，你掘得好啊！”，再斗下去，无非是自己和自己斗，自己咬住自己的尾巴而已。

大革命局面下的必然产物，Terrorism（恐怖主义）必然不能长久。

坚定起来，1848年后马克思还沉寂了十多年呢。

可这一切思索，需要有食物的支撑。饥饿令人无法思考。

昨晚开会从六点半起直到今天凌晨一时半，二十个人说了八个小时，表态，人生观漫谈，不胜其烦，实在够受。这是另一种疲劳战，疲劳轰炸。RELIGION（宗教）性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是区别海燕与家雀的情感，而宗教情绪则是卑微的，它将人引向愚昧。也许各个时代的社会责任感各有其表现形式？

假如这样，我和稽头也就不必冲突了，采秀也希望是这样的局面。

然而要青年人避免宗教情绪的感染是不可能的。我怎能强制他们做一件他们无力抵抗的事情呢？再说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理想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群中是无法产生的。前些天误解了陈志雄的意思，还以为这个年轻人对今日的宗教精神有所怀疑。其实正相反，他是从中找到了解决思想苦闷的道路——从罗曼·罗兰的泛神论走到了马列主义的泛神论。对于他，神是群众。可见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的活力和宣传教育的力量有多大。人们硬说相信丰收却又自觉节粮，以献身精神和宗教精神来自我牺牲。

有人对我夜里吃馒头大有意见，倘若他们知道我这半个月吃了多少东西，那还了得？我曾偷吃东西，也曾偷东西吃，现在要偷偷地吃东西。这当然都很卑鄙，可我怎么愈来愈感觉理所当然了呢？这比偷吃，偷偷地吃还要可怕。

人们硬是要歌颂国庆十大建筑，又把农民的艰苦生活动作献身精神的原动力。青年人的纯洁、易染，更加衬托得 1957 年可怕。

通知十七日走，经信阳回京。现在当务之急要抓紧时间搞到路上的口粮，就是在火车上吃的。还缺一斤信阳粮票，是向蔡璋要呢？还是向陈志雄借呢？颇费踌躇。吃的补给愈来愈困难，饼子要 20 日以后才卖，赶不上了。没有面粉，没有粮票，只剩下蔡璋给的一点糯米粉。好在不劳动已经快二十天，额外补给的需求似乎降低了。

蔡璋要为我践行，要杀只老母鸡吃，回报是到北京买东西寄来送给他的护士老婆，听说她人长得特别漂亮。半年来他确实帮了不少忙，我们是酒肉朋友，要善始善终。他最近不幸被盗，箱子撬开，大失窃，计公债 200 余元，呢料衣服一套半等等。

常常无法思考，不是来劳动队初期那种浑浑噩噩的不能思考，而是没有力气思考，思考也会出虚汗，这倒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种体验相当可怕，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促使我竭尽全力去寻找食物，生存下来。

劳动队是令人道德败坏的地方。都是读书人，却时常发生偷窃，尤其是食品。人饿到极处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强烈地怀念他们，视他们和自己为一体。这些人是无辜的，他们在炼狱中，在能把人变成鬼的地方。

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天地中，意识形态是低级的，但这些人并没有抵抗历史的前进。连他们也要关进集中营，中国得有多少集中营啊。我们这些北京的、省里的右派走了，他们的生活能有所改善吗？

1960 年春是绝不会好过的，他们中间必定要倒下一批人。

这也是中原农民的厄运。

灾荒并非始于 1959，从 1958 那个丰收年的春季，他们的厄运已经开始了，是人祸，不是天灾。

中国农民过着勉强糊口的经济生活，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和他们一样不懂这个问题。从糊口经济

的立场出发，他们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将能维持他们的糊口经济的人视作是救命恩人。结果是救命恩人回过头来要打破这糊口经济，不是用圈地的办法，而是在饥荒中大办钢铁，大兴水利，造万头养猪场，盖公园戏院，还给他们扣上“资本主义自发”的帽子。他们根本不是留恋生产资料私有制，纯粹是因为饥饿。假如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城市，早就引起城市工人的暴动了。

这是一个历史悲剧，虽然无可避免，可他们的救命恩人至今不懂这个道理。不，1958年前他不懂，以后他逐渐懂了，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左右斗争，驱饥馑的亿万农民从事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与消灭过剩人口。这个方子最堂皇，也最残酷，最迅速，最高效。

若说他将载入史册，那确实与 Peter Great（彼得大帝）和曹操一样。他是聪明人，这样做是有意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1959年的大旱帮了他的忙，按他的说法叫做“坏事变好事”了。

还有一个大问题，中小型工业的都看不出农本主义倾向，相反，无论大中小建设项目，一律是大会堂式的宏伟壮观，拼命刮削农村来建设，而建设本身就是建设的目的。

土包子而怀抱城市中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

这个灾难的途径是通过统计学起始的，自上而下指标式的统计学——那个5500亿斤就是标本，加上沈万山式的道德良心，结论只能是：苛政猛于虎。

还要办户口转移，好艰难啊。派出所不给办，说是要户口底册。我明知问题不在什么底册不底册，而是户口转移不该由我自己来办。伊会计慨然答应帮忙，又一起冒雪来到派出所。人家在开会，人多，我知道我的身份不该坐到屋里去，就在门外等着，人家又说要大队部的介绍信，县招待所没有电话，伊就自己去找。我在候审室那样的小屋子里等着，要说也是理该如此的。谢天谢地，户口总算转好了。

肿，到处是肿。

彭仁鑫一家都死完了，剩下一个小孩人家给他送了来。

我真该感谢蔡璋，若不是他，我早肿了。回商城二十多天我每天获额外补给，肿消了，腿有劲了，也得感谢他。

今天的饯行宴丰盛至极，一碗牛肉面，二盆牛肉豆腐。先吃面，又吃四两干饭就一盆牛肉豆腐，然后我去买一瓶红玫瑰酒（1.09升），又吃一盆牛肉豆腐。这是真正的牛肉，不是大队部那种嚼不烂的牛杂。酒醉饭饱，辞别而去，说好到京后买几样东西送给他。

他一再说花了我一些钱，但按照我的“主观价值”而论，他给我的帮助，不是能以钱来衡量其价值的。到京后，多大困难我也要买他想要的那些东西送给他，若采秀不给钱，我就动用母亲那里的存款。

蔡璋告我，现在农村里的流窜犯比城里的还多，青年妇女，不论大姑娘小媳妇，只要给吃的就自愿留下给人当媳妇。那男流窜犯又当如何？

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能做出平日看来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四个半月才会有今年第一批作物下来，谁知道这期间会出什么事？

道德败坏成为普遍现象，谁都想当炊事员。我亲见炊事员一顿吃三碗，全日合粮二斤多。粮从哪来？每碗四两的饭少放一些，完全解决问题。这种现象，愈是农村愈严重，愈是不按价值规律办事，一把卡住全村吃饭咽喉的公共食堂，怎能不成为横行霸道权力的来源和道德败坏的泥坑？

何祥福的父亲肿了，他对沈竭尽阿谀奉承，从劳动队搞了三十个不花钱的饼子带走。从我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这个乡村知识分子是改造好了还是学坏了？上帝明鉴，他学坏了啊！可是他不学坏，就眼看着父亲饿死吗？

下放干部赵淑仁，这姑娘是学好了还是学坏了？学坏了啊！她感激劳动队为她摘帽，但她从摘帽中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钻空子、拍马屁、说谎话。可她不学坏，就只有离婚一条路，眼看着孩子没了父亲。更何况到了科学院方面居然根本不承认商城劳动队的“摘帽子”，“赎金”交了，“肉票”还是不放。

下放干部也确实有许多人学好了，这是他们套用社会责任感的宗教仪式的效果。他们是外来者，来此朝圣式地消灭肉欲，城市的生活方式在等着他们。他们也饿，但不是劳动队这种锥心蚀骨的饥饿，他们有盼望，吃饱的盼望。否则饥饿也会使他们人相食，卖屎，说谎，拍马，害人害己。

心头一阵阵绞痛。若说这是无法逃避的历史一幕，代价也太高了。后一个历史时期为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代价。

说是再也不去劳动队了，还是忍不住又回去了一趟。

大家都说我好了，瘦，但气色正常了。徐云周告诉我沈家畷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三口，是个很典型的数字。张承业请假回家处理家中的死人，三组的周百风肿死了，前天抬进医院，昨天就死了。

除了死亡率高还要加上一条生殖率底，连下放女干部都个个月经不调，农村妇女就不用说了，她们根本就没有月经。可领队说这很正常。上帝明鉴，若四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扎实实提高一些产量，大跃进就大功告成了。

前几天《河南日报》有关铁佛寺水库的报道，典型的客里空，一句真话都没有，捕风捉影的一点点，例如有保暖饭具、澡堂理发等等这些只有劳动队才有的东西，却让读报的人以为民工也有同样的条件。记者们撒谎的水平也是越来越高明了。

说民工热火朝天，天知道。我看都跑得差不多了。简直就没有一句实话。

才受了一番“洗礼”的我们这批人，至少饥饿病肯定是治好了。中午的菜十分丰盛，有四两左右的肉，晚上据说还要多，明早还有炸油条、馍、馅饼、牛肉带在路上和到信阳后吃。我真想现在就把它们领出来呀，可要是真领出来，我一定今天就会吃完它们。

小组的思想总结，彭楚南和李宝仁没有通过，前者是“不暴露思想”，后者是“顽固”。彭楚南，可怜他一介马来华侨，兴冲冲回国参加建设，“暴露思想”的诀窍根本没掌握；李宝仁的顽固则是“不相信丰收”。这姑娘很愚蠢，然而可是可钦敬的愚蠢，而且，她也肿了。

大队全体照相。我吃饱了，别人也吃饱了。吃饱的人易于激发宗教热情，只除了我这个老油条。我站在高处，还自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神情——不，高傲而沉思。

现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健康了，都站起来了。

VII. 商城日记（7）—— 回家

六个月劳动队可以这样总结：

不用、也无法用脑子的阶段——恐怖与屈服的阶段——摘帽子的刺激，政治勒索的阶段——增产节约、反右倾、烤红薯的阶段——病了，肿了，走了。

劳动队目前病了，肿了的有80%，我从病、肿到走，感谢上帝，相距不过一二十天，想尽一切办法，不间断地找到各种额外补给，主要是胡萝卜，消了肿，我真是得天独厚啊。

周百风就不行，倒下了。

昨天我对蔡璋说，还有四个半至五个月的时间，果类蔬苗要赶早育苗，这是救命的事，这件事办不好，什么都不要说了。然而连最早的杏，也要麦黄才能下得来，麦黄以前，病了，肿了，“走了”——不是像我这样走——不知将有多少人。

商城最后一天。

找地儿煮胡萝卜吃找不到，就吃生的，刚才吃了六七条才算稳住神能写日记。徐云周送我的几根有些舍不得吃。暂且留着，路上再吃吧。

追忆这六个月，很动感情。

买了二分钱茶叶煮了喝了，以畅消化。

晚上联欢会，对不起，不去。

抽身到蔡璋那里，托他把一本在商城买的土壤化肥学讲义转交徐云周。

告别商城仪式搞得很隆重。王书记来送行，整队呼口号。上车，车动后又呼口号。

王书记再见！

商城同志们再见！

商城人民再见！

我有我自己的告别方式——把下放干部们不要的破衣烂鞋包成一包，送给蔡璋。

早饭丰盛，肉食足六两，胡萝卜粉丝一大碗，赵生祥还拨给我一些。油条三根半，豆包四个，麻

酱花卷一个半。我吃掉了油条、菜和一个豆包，一个半麻酱花卷，十分饱了，还带了半斤牛肉让路上吃。

途中，无心观察公路两侧，所谓“超英”、“越美”现在都看到了。这些口气大过天的公社，其实就是个破集镇，连江南一个像样的村子都比不上，更比不上苏南苏北时期曾经呆过的停翅港了。好在除了水库还挂着“越美”牌子，公社已经改回原来地名，把“越美”二字取消了。

车过信阳铁厂，烟筒林立，很像个样子。对面土法炼焦火光熊熊，人声鼎沸。看来城郊还搞得动这个，农村已经早就搞不动，偃旗息鼓了。

八点才到信阳地区专署招待所。房子还是那个房子，街还是那条街，来时还不觉什么，从人相食的环境中出来，不免触目惊心，恍若隔世。

菜是城市式的四菜一汤，一碟肉，一碟白菜，其他二碟都是胡萝卜，汤也是。米饭不限量，菜量少，但我已毫不在意了。

我是不是把吃的细节记得太详细，太琐碎了？可你叫人如何能忍住不对这些细节做详细描述？仅仅是描述它们就是享受啊。

清教徒们无论如何诅咒，还是得跟着城市生活走。

城市生活的特征，1959和1960两个初春大不相同。1958年秋冬，农村杀猪，烧花生，大吃一通，更显得城市供应困难；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可能比较顺利了，可这个农村啊……

挎包里还剩一个压碎的豆包，徐云周给我的胡萝卜还在。胡萝卜，胡萝卜，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哪。一种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

禁止右派上街。

上午人们听报告，我未等人家暗示就主动请了假，要识趣哦。右派不参加会议从来信阳时就开始了，回时当然不会有变化。

踏上回北京的路程。

我们这个队伍强调军事化，集合上车每一步都作了详细规划，可结果是一团糟。人们行李都托运走了，我的行李全部带着，用扁担担着。从招待所到车站三里多，加上列队集合，等车，担得一身大汗，眼镜发蒙，只好摘掉。五六十斤的行李担到车站，不觉过累。

车上也是昏昏沉沉的。基本准点到达。科学院的人来接，十分帮忙，行李总算拖下了火车。北京正在下雪。坐院部大轿子车到动物园，从动物园到家是担着行李回来的。到百万庄迷了路，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迷在回家的路上了。

上一次从赞皇回来，去时家还在中关村专家楼，回来家已搬到百万庄建工部宿舍，我找不到归家路，又累又饿，又急又气，看准了门牌号码就学着赞皇农民回家的动作猛拍大门，把孩子们吓坏了。

这一次我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勇气，没有了拥有这种勇气的资格。不过我也不再需要这种怯懦的所

谓“勇气”了。

好容易摸到家门，望窗口发黑，一家人都睡了。叫开门，冷淡的接待，好在已经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身上的一套衣服被要求全部脱下来，怕我把虱子、跳蚤、臭虫什么的带回来。

自己煮预定的一份饭——就是那个压碎的豆包，徐云周给的胡萝卜，商城发的牛肉。洗洗脚就睡了。

这一次旅程就算是结束了。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

(以第一人称的《商城日记》至此结束。以下全部转回第三者旁述。-作者注)

第十二章 惯于长夜

I. 顾准名单

“劳动队人物志

沈万山、黄鑫泉、罗正安、萧海滨、刘应中、杨柔远、张彦生、徐可嘉、杨荫堂、老姜、杨静超、张泽华、谢德征、夏伯卿、周北萍、赵刚、刘美悟、张保珍、雪梅、张克侠、冯顺、邓振兴、王伯溪、何祥福、杨永华、余济美、刘方晦、柳学冠、陈舜初、杨学廉、蔡璋、王宏亮、徐云周、刘世明、顾准、赵淑仁、李宝仁、柴广坤、李光汉、骆昭田、刘北勤、朱正翔、毕祥麟、李学海、沈际平、岳正中、王进先、王再兴、陈德选、邹振舫，杨刚、杨明昭、李国广，鲁涤寰、庄永胜、王冕南、杨义昭、刘引芝、姜实唯、蔡从兰、王秉三、张世英、甘斯益、张承业、黄渤、张振武、张培从、杨永新、老余、宋一峰、余本江、廖鸿义、宋步初、任葆乐、刘复生、吴华、高舫、岳乐、郭鸣剑、张士元”^{59.12.26.}

这里是一份“顾准名单”——1959年商城右派劳动队部分队员名单，就在他1959年12月26日的日记里。除第一名——队长沈万山之外，名单中的人全部是右派分子。其中科学院右派三人，其余为郑州、信阳右派和商城本地右派，他们大部分原是郑州、信阳、商城的中小学教员，教育、财

政系统的职员，县、社中、下层干部。

实际上商城铁佛寺水库劳动队到了 1959 年已经有右派四百多名，“顾准名单”列出名字的仅占五分之一，即八十名左右。但日记留下了很大的推测空间——上述名单仅限于他日日接触的“劳动队统治层”、“里厨房”、“外厨房”、“缝纫室”、“理发室”、“菜园组”、“七组”、“八组”和“几个病号”以及几个“其他突出人物”^{59.12.26}。

既然有“七组”、“八组”，那么必然有一、二、三、四、五、六组，例如他曾提到三组饿死的周百风。在五十多年后的实地采访中我又发现还有一个“宣传组”，很可能就是被他列入“劳动队统治阶层”的部分。2013 年还找到了当年“一组”的王彦，“二组”的江明珠，“七组”的李军，老人们都已年近九十。江明珠还印象深刻地记得当年县法院一个什么李院长，不知是被指派还是自作多情要找顾准谈话，被顾准当面破口大骂：“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还想找我谈话！”

真可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骨头烧成灰也轮不着驴儿猪儿们来教训。

在这份集中的“顾准名单”外，还有若干散在日记中的人物，也是可以算在“顾准名单”内的，例如中科院右派彭楚南、权少珍、魏某，省城郑州的右派方医生，商城本地右派陈寄初等。

名单中人很多确实够得上列“志”。

例如场长——队长沈万山，商城右派徐云周、何祥福、柳学冠，郑州右派蔡璋、赵刚，北京科学院右派赵淑仁，彭楚楠等等。顾准不吝笔墨，将他们记述得栩栩如生，近在眼前，可摸可触。但由于是日记体，又是在那种“日记本不受尊重”的日子里记下的，常令读它的人有读乔伊斯式意识流文字的感觉——时空颠倒，晦涩凌乱，作者在文字之外，读者反在文字之内。看这些文字，你需要将“他们”的事情、事迹、轶事、故事从不同的日子里，不同的语境下摘出来，Puzzle 着（拼起来）看，方能看到一个个纪事本末和人物志异。

这份名单是“商城日记”最震撼人心之处，也是一干民间“顾迷”寻踪觅影的线路图和探宝指南。他们中间大部分已不在人世，幸存的也都已是耄耋老人。

“商城日记”共涉及有名有姓的人物近二百名，人次无数。仅提到沈万山者近百处，蔡璋者六十

多处，赵淑仁者五十多处，徐云周者五十多处。

这几位都是可以立个小传的。

沈万山者，劳动队队长，唯一的非右派、共产党员（右派分子没有一个未开除出党）。一个典型的“自愿型刽子手”，非典型的中共基层干部，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平庸之恶”典型：

“如今的党性都属此类。莫看沈是粗人，他是深得毛之三味的。” 59.12.8.

此人集狱卒的暴戾、流氓的残忍、农民的狡黠于一身，兽性和奴性交替表现。无论面对敌人（右派分子、“流窜犯”）还是“人民”（民工、农民）都是一副嗜血的兽面。只有在面对王书记、熊县长时才会拿出类人的面孔，却已经不大像了。关于他穷凶极恶地打人，打不听话的小右派，打饥饿到极处偷吃菜园蔬菜的水库工地民工，打“流窜犯”，往死里打，这些情况顾准竟没有写在日记里，堪称疏漏。如今还活着的劳动队老人们提起他们的“沈队长”，众口一词的称谓是——牢头、阎王、最坏的坏人。

“（沈万山）这个王八蛋，假如有那么一天，让我来审判你！” 59.12.29.

审判？在什么法庭？有那么一天？哪一天？谁又有审判谁的权柄，除了上帝？

蔡璋者，顾准“吃的同盟”盟友，也是唯一的盟友。

“吃”，是劳动队后期实质性的、唯一的主题，什么思想改造，什么战天斗地，都是扯淡，没有吃的，肿了，死了，还改什么造，战什么天，斗什么地！蔡璋，这个可怜的小书生，小秘书，只因负责组织工会搞“大大双百”，糊里糊涂就成了右派。来到商城，来到铁佛寺水库，人被搓揉得不成样子，肚皮也一样。为了活下去，只能无所不尽其极地寻觅食物。靠着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哥哥和嫂子，千方百计地让他一直有东西吃，他活了下来，也让顾准活了下来。**“蔡说他花了我一些钱，但按我的‘主观价值’而论，这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60.1.15.

当然不能，生命的价值怎能用金钱衡量！时至今日，八十六岁的蔡璋老人说起当年，当他交给顾准一包千方百计搞来的代乳粉，这位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大高干”、“大右派”，怎样直接就从包装纸袋中用手抓进嘴里，狼吞虎咽，呛得要窒息，还宛若昨日，唏嘘不已。

当年铁佛寺的小蔡和老顾并非初识，只是出于对环境的极端谨慎，小蔡没敢告诉老顾罢了——1954年，在洛阳专区做小秘书的他就见过被贬谪到“洛拖（洛阳拖拉机厂）”的大人物——顾准，听过时任计划处长的表哥对此人的高度评价。以后在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舅舅袁宝华家中，他又听到过更高的评价。顾准二字在小蔡眼中几成传奇。

如今顾大叔虎落平阳，和自己一起沦为右派劳工，他只能默默地敬重他，尽其所能为他搞吃的，却不敢告诉他这段前缘，怕不知什么硃节上说漏了嘴连累了亲戚们。日后的《顾准商城日记》写到蔡璋却多有不屑，例如嫌他“耍滑头”，动不动就住进医院“偷懒”，殊不知小蔡17岁就参加抗美援朝，被炸弹震出战壕腰椎受伤，一干重活就复发。小伙子自忖自己不过是个小右派，哪里敢在“老革命”顾准面前卖弄“当年勇”。顾准日记面世近二十年，连累他背了这么多年“滑头”的黑锅，可平心而论，中国有顾准，小蔡——蔡璋功不可没，没有他上天入地弄来的代乳粉、虎骨酒、果味鱼肝油什么的，四十多岁的半老头右派顾准（彼时能够活过四十的人绝对称得上“半老头”）只怕也会像活活饿死在工地的三个右派一样，从肿到倒下、到死掉，不过在几天之内。

赵淑仁者，中科院下放商城的女右派，北大心理系毕业生，心理所研究员。顾准对这位女士颇多微词，例如“貌似婉变，实际公式化”，“心理系的废品”等等，未免刻薄。

彼时的一个普通年轻女子，最大愿望无非是平平安安为妻为母。既沦落到商城这一步，身为现役军人、海军舰长的丈夫已经提出离婚，她得有多难受。一旦看到“摘帽”、回家、保住婚姻、保住孩子的海市辰楼，你不让落水的她奋力向前扑腾，就算踩着同伴的尸体也要爬上虚无缥缈之岸，非得要她也像你一样，不管不顾地向相反的方向搏涛击水，浪遏飞舟，死而后已，这不公道，也不厚道——你有秀，她没有，你的孩子都已长大，她的孩子才三岁。你不能理解一位做母亲的能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这也是造成你和秀的悲剧的主要原因。

徐云舟者，年轻的乡村知识分子，人性、淳朴、忠实于农民，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在高压下依然忠实于她。曾经的商城上石桥区副区长。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他是能够和应该做农民政治上代言人的，可在这里，他却进了集中营中，眼看自己的亲人、孩子一个接一个饿死，束手无策，痛苦不堪。

他是顾准在劳动队中唯一能够在政治和哲学的层面上做深入的交谈与沟通的人。顾准临回北京，徐云周不敢送行，怕给两个人惹出新的麻烦，“送别的人很多，杨文华有依依之情，赵刚特别真挚，徐云周避嫌不来。”^{59.12.29}他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送，除了几根胡萝卜。

“到了百万庄还迷了路。找到家门，望窗口发黑，扣门，大家都睡了。把身上的一套衣服全部脱下来。煮预定的一份饭——一个压碎了的豆包，徐云周给的胡萝卜，商城发的牛肉，吃完洗洗脚就睡。这一次旅程，就算是结束了。”^{60.1.20}

仔细读这段平淡如水的日记 掐指算算日期——中科院右派顾准1月16日最后一次去劳动队(顾准根本不安于商城招待所的所谓“集中思想总结”，不断地往水库上跑)，17日就离开商城去了信阳(信阳离商城差不多二百公里，今天开高速也要近两个小时)，20日夜晚回到北京，手中还攥着“徐云周给的胡萝卜”作为自己“最后的晚餐”，其情，其义，其悲，其痛，不身临其境谁又能解！

“像徐云周这样的人尤其可怜。他忠实于农民，他有自己的政治信念。他不是富农的政治上的代言人，而是全体农民的政治上的代言人。他不应该坐集中营，他的品质比沈万山之类，不知要高贵多少。但愿他能撑过这段苦难的时期，能重新进入农民的时代。

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今晚上去看看他们，尤其是如果徐云周在那个棚里值班的话，谈谈多好。可是去是不好的。只好不去，到京后写信吧。

无论如何，想知道劳动队的结局如何。”^{60.1.11}

徐云周是令顾准看到中国、中国农村还有希望的人物，可是顾准可能至死都不知道，不足五个月后，1960年5月18日凌晨，徐云周就连同其余十八名右派一起淹死在铁佛寺水库的决堤大水中，来不及给亲人，给答应了“今后要多交通”的他的顾大哥留下只言片语。随大水飘走的冤魂，还有“顾准名单”内的柳学冠、卜万福，余子美，张士学，涂浩英，刘方海，杨显，时广发，李建民，杨文华，罗甸钧，刘判洲，谭静宜……

还有若干未出现在集中的“劳动队人物志”中而是散记在日记里、有名有姓的人物，例如周百风。周百风死了，肿了之后送到医院第二天就死了。这一天的顾准日记是这样的：

“Died No. 3(死去的第三位)

劳动队又死了一个。三组的周百风，肿死的。前天抬送医院，昨天死了。”^{60.1.11}

也就是说周百风是劳动队第三个饿死的。1959年12月8日日记中“242:2:44”的比例已经过时。

毕祥麟者，郑州一个银行小职员，闻一多的姑表侄儿。1957年方21，血气方刚，口无遮拦，传了听来的一个顺口溜“国民党拐（坏）又拐，白米干饭紧人口（吃）；毛主席好又好，穷人上山吃青草”被要求定为“极右”。好在上级没批，说只属于年轻不懂事，打发去铁佛寺修水库吧。顾准初到水库就是和他搭帮开一辆“火车”（独轮车）运土石方，顾准推，他拉。时年顾准44岁，推不动也拉不动，险些出了人命，这才调去菜园组。这位被“照顾”去劳改的小伙子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极右”之灾——1978年差不多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还不给他摘帽（啥时候戴上的他都不知道），说他“言论恶毒”。他和周百风是铁佛寺劳改队最小的右派，那年都是22岁。周百风“肿”死了，他活了下来并且是劳动队仅有的8个没有“肿”的人之一。到2014年我见到他，78岁的老人还对自己居然连肿都躲过去了颇感骄傲。

再例如“董”。

日记提到此人均以“董”呼之，是顾准“思及生活像泥污，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59.11.23}。所述中主要的“训斥者”，特别嗜好要别人“暴露思想”，因为欢迎“别人在自己的脑子里跑马”而弄得最喜欢和享受“在别人的脑子里跑马”。

“董要求暴露思想。他嫌我暴露不够，大训一顿……董之大训一顿，背景如何，值得研究……始终维持笑靥迎人的一套。与赵同送董到大街，竭力解释不暴露的原因——充实思想笔记，思想上有松了一口气之感云云。总之，抵触情绪是丝毫没有的。”^{59.11.23}

“我在董大将我军之后，一开始说自满，牵涉到人道主义问题，跃进的愿望与人道主义的矛盾问题……”^{59.11.27}

无法判断“董”是商城同志还是北京同志，但他那种强烈地想要进入别人“思想”的欲望令人印象深刻，非常典型的“文革”人格。

再例如，死了四个孩子的彭铁；

再例如，邹如山，旧时期的翻译家，经济学家。

“昨晚前晚都是座谈会，中心是邹如山的人生观，那是一个雇佣劳动者的人生观，批判的人却不能脱离这范围。我昨晚简直未发一言。” 59.12.26.

.....

顾准名单中还有许多无名无姓者，例如：

饿死的柳学冠母亲、弟弟、杨柔远母亲、夏伯卿家人、张保修家人、沈家畷附近一个七十多人生产队中的一半——三十多个人.....；

丈夫杀了妻子来吃，姑母杀了侄女来吃中的丈夫、妻子、姑母、侄女；

被剥去棉衣，殴打冻饿毙命的无名氏；

拉不出大便的公社干部；

饿得将死，赶去嫁人，以求活命的少妇；

吃了劳动队两顿稀饭而欢天喜地的右派的孩子；

病饿而死的民工，摔死的民工；

被因藏匿口粮而被打死的村民；

带着孙子们偷偷刮舔劳动队食堂脏碗的老妇；

来帮助沈万山搞自留地的他的老父；

作报告的老红军；

.....等等，凡数十名。

有姓无名者例如县委王书记，熊县长，地委刘书记，库部长，伙房老姜，沈万山媳妇小刘等，十数名。

和许多描写 1959 年大饥荒的纪实性作品相比，“商城日记”不是“人”淹没在事件中，而是恰恰相反，事件几乎要淹没在人海中。顾准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尽力记下了当时他所能够记录的名单，是其人本主义意识的一次无意识大流露。

“名单”这个概念在中国，也就是最近这十年才开始流行起来。受“南京大屠杀名单”、“辛德勒

名单”、“王友琴中国文革名单”、“共产主义受难者名单”、“波尔布特大屠杀名单”……的启发，2008年，中国终于有了纯粹国产的“汶川名单”，虽然这个名单的“出笼”是那样艰险；2010年有了半官方的“玉树名单”；2013年有了官方的“雅安名单”……。

有人注意过顾准的“商城名单”吗？

相比于上述那些著名的名单，“商城名单”很小，在人名数量的绝对值上，在知名度上，在影响力上。但它又是庞大和壮观的，在相对值上——记录下了很大一部分（至少六分之一）发配商城右派的姓名，还有一个刺目的比例数：“242:2:48” 日记 59.12.8.

“这 242 人，一年半来贡献的劳动，是水库的主力与技术兵种，还贡献了万元以上的公共积累。242 人中，二个死了，喝豆浆的病员 48 人。” 59.12.8

前面已经讲到，这个比例到了顾准离开劳动队时已经需要修改——他肿了，很多人都肿了，周百风已经死了。除了 242，其他两个数字要更改了。

“顾准名单”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全部都是小人物，没有一个是在 1959 年之前或者之后成为了著名人物的。相比于章士钊、罗隆基、储安平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谢德征、王进先、冯顺、张保秀……不是离我们更近一些，切肤之痛更尖锐一些，痛定思痛的反思更直接一些吗？

“顾准名单”中的人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尚在世上。

当年四十四岁的顾准曾经称呼他们青年人和姑娘，如果他或者她还在，也就是八十多岁的中年老人，但前提是能经历了如此这般的炼狱生活还活了下来，没有肿、饿而死，也没有像顾准那样落下致命的病根。

他们确实还有人在。

宋一峰，顾准名单人物，1929年生人，原小学教员，1957时为商城县巡视组巡视员，中共党员。罪行是：“大、大、双百”时说公社太大，浮夸太凶。新时期摘帽。水库决堤时游泳逃生。妻子赵凤仙，1931年生人，1957时为城关镇妇联主任，副镇长，中共党员。丈夫成为右派时已有四个孩子，无论别人怎样劝导，坚决不离婚，被镇长嘲讽为“葫芦不挂在墙上非要挂在脖子上，自讨苦吃”。

一个人拉扯大四个孩子，个个出息，个个孝顺，尤其对爹。现在过着清贫、坦然的百姓日子。

老人几乎完全聋了，但听到妻子大喊“铁佛寺”三字，依然能起身进屋，翻出县志给我看。他永远在微笑，发自内心的微笑。妻子还是那样倔强，只是在听到“您真的是因为爱他才这样不离不弃？”的提问时，八十多岁的老人才露出一丝小姑娘般的羞涩：“要不是，我咋会这样”，弄得人泪水涟涟。半年后，本书还没有找到能够付梓的出版社，看似非常健康的宋一峰老人已经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这才想起来当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位将近十年的海默式症患者。

张保秀，顾准名单人物，被顾准称为“和我女儿一样大”（这里我的传主有点吹牛，他的大女儿生于1942年，小保秀9岁），1933年生人。1957时为小学教员，非党员。罪行：“大、大、双百”时说现在教育机构有些混乱。铁佛寺水库时在缝纫组。谈到顾准时，她第一句话是“他像朱镕基”（许多人都这样譬喻，有点奇怪），第二句是“他像个孩子”。她帮顾准洗过衣服，数落过顾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为要他在菜园拔草，他把韭菜苗拔掉了。她还帮赵淑仁给要求离婚的军人丈夫草拟过回信——“干（淑仁的丈夫叫徐干），我已于X月X日回到了人民怀抱”，保下了这桩婚姻，保下了一个家庭。1961年摘帽。水库决堤时因身在县城免于死。丈夫张光桐，不在顾准名单内，原商城县老公安，和妻子同为右派，同在铁佛寺水库劳改，就在顾准想“要挤进劳动队的统治阶层”^{59.12.1.}的宣传组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1960年病饿而死。彼时妈妈想回去看看临终的孩子，向沈万山请假，沈说你回去有啥用，你又不是大夫。孩子临了也没有看见爸爸妈妈。光桐、保秀现在过着清贫、坦然的百姓日子，临告别时拿出全家福给我看，儿女孝顺，全家平安。

朱云翔，顾准名单人物，1927年生人，商城很罕见的高中毕业生。给共产党送过情报，彼时新政权翟畷区区长，1957时兼商城县巡视组组长，中共党员。罪行是：“大、大、双百”时说公社太大，浮夸太凶。新时期摘帽。水库决堤时游泳逃生。现在和孩子们一起安度晚年，生活相对富裕。老人已经行动不便，说到激动处仍捶胸顿足，高喊：“怎么就不能有个人向我们道个歉呢？！”

“……我今晚却引起了强烈的怀念他们的情绪。这一伙人是无辜的，他们现在是在炼狱之中。”

60.1.11.

“今晚”被我的传主强烈想念的人们，再过四个月就会有 19 人离开人世。

该死的大跃进工程——铁佛寺水库在 1960 年 5 月 17 日开始的大雨中摇摇欲坠。摆样子的闸门锈住了，根本打不开。泄洪洞形同虚设。县长率队上坝扒扣子泄洪无果，18 日凌晨三点正式决堤，大水排山倒海般翻过右派存身的上、下菜棚、共产主义小学、一个拟建和一个在建的万头猪场，直扑商城城关，人为鱼鳖，死伤无数。事后熊县长做报告时一再强调“淹死的都是右派，没有老百姓”。新时期后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死亡两千余人，其中右派十九人，十九人中就有徐云周，时年三十五岁。

“像徐云周这样的人尤其可怜。他忠实于农民，他有自己的政治信念。他不是富农政治上的代表，而是全体农民政治上的代言人。他不应该坐集中营，他的品质比沈万山之类不知要高贵多少。但愿他能撑过着段苦难的时期，能重新进入农民的时代。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今晚去看看他们，尤其是如果徐云周在那个棚里值班的话，谈谈该多好。” 60.1.11.

还是回到那个大雪纷飞，顾准回到北京家中的五十多年前的夜晚，他是怀揣着徐云周送给他的、最后的胡萝卜跨进百万庄的家门的。窗外是北方一月冰冷的风雪，窗内是更加冰冷的世态凉炎。这个四十四岁的南方汉子，硬是就着信阳发下的一个已经压碎的豆包吃下了这几条压扁了的胡萝卜。

他又一次饿坏了。

踏着积雪从动物园挑着劳动队的全部家当走到百万庄，虽然和劳动队的日常劳作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却是出奇的累。至此他才算是彻底相信自己不会成为无人认领的饿殍了。可是徐云周呢？何祥福呢？蔡璋呢？柳学冠呢？你们现在身在何处？在菜棚还是水库里？病了吗？肿了吗？你们还活着吗？

“不是像我这样走的（指回北京 - 作者注），不知将有几人。” 60.1.16.

如果说离开信阳时的顾准是被一种悲恻浸透，那么在北京烧着暖气的家里，他整个人则被一种巨大的悲悯压迫得快要窒息了。

肚子已经喂饱——被压碎的豆包和压扁的胡萝卜，这胡萝卜是徐云周最后的礼物，他在商城终于找到一个锅煮熟了。他的周身也是暖和的——拜久违的，北京特有的蒸腾的暖气所赐。可是几个月来每逢吃饱和温暖后就会袭来的“幸福感”到哪里去了呢？

用热水洗了脚，依然是冷，冷得周身寒彻。

他们太可怜了，这片地土太可怜了，农民太可怜了。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么至少这片地土上的人绝不会是它的同路人。

此刻，刚从炼狱逃出的他根本找不到任何人能倾吐心声，连唯一的秀也对他背过脸去了，虽然此刻他就躺在她的身边。他们从未像今天这样陌生过。

五个一字排开，从七岁到十七岁的孩子们就更加不能理解这位有着一个严格的逻辑心灵和一个冲动的，着了迷的本性结合于一身的，独一无二的父亲。

他从未惧怕过孤独，可是当这黑渊般的孤独吞没了他时，他还是战栗了，一时甚至产生了再回到名单中去，去接着做“菜园顾”，直到再次肿了，倒下，让白茫茫大雪覆盖了这具饿殍的愿望。

铁佛寺水库劳动队那一张张面孔又浮现了出来。

在京西百万庄这个干部宿舍单元氤氲着暖气的卧室里，在屋外漫天的大雪中，在午夜的黑暗中，在妻子和孩子们的微鼾声中，这些面孔格外的鲜明，格外的突兀也格外的怪异——悲苦的，愁怨的，哀痛的，困惑的，狰狞的，菜色的，浮肿的，将次毙命和已经毙命的……。

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因为肿过又消了肿而苍老的、四十五岁的脸颊落了下来。

“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先找一个洞穴活下来，就算是为了这片地土，这群人吧。”

2. 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读杂志数天，写铁佛寺水库记录，11/2 写完。……有一种感想，脱出二十年的拘束，走上自由批判的道路也很不容易。三十余年的历史无足反悔，年青时代没有好好求知的机会，还是一件可惜事。” 60.2.3.

回家十几天了，顾准惊魂甫定。

根本没有人要求他要写什么“铁佛寺水库记录”，否则就不是“记录”而是“报告”了。人们不但不会要求他“记录”些什么，说白了，最怕的恰恰就是他要“记录”些什么。临行前沈万山场长的

“千叮咛万嘱咐”还不清楚吗？

“沈场长老实不客气地指示了。其内容是接上头接不上头，我对你们的教育如何如何等等。所说的话只有一点是有内容的，就是要从大处看党的成绩。这意思就是说，说谎、饥饿、死亡都是小事，你们回去说话要小心。这个王八蛋居然自称我对你们指示……！” 59.12.29.

不是叮嘱，甚至不是指示，人家直接就是威胁。可这个王八蛋又怎么就没有资格来指示或者威胁你呢？在“模子”中，他当然有这个权利！

我的传主终其一生都不能接受“稗子‘指示’高粱”这样一个逻辑，更不屑于稗子的威胁，这令他吃尽苦头。现在总算逃出生天，他又开始想不做“好好乖乖”而是把真实的东西拿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难道他还是有幻想，在作了那么多历史的解析和比较，痛心疾首于所谓“三面红旗”，“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对人性的摧残之后，深恶痛绝于将无数血肉之躯为这出政治游戏作活祭的行为之后，还依然对制造了它们的人有幻想，依然对“唤醒民众”有幻想吗？

“1959年的商城县委，我认为就属于伟大三面红旗运动中的‘反动势力’那一方。……我对商城县委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十分愤恨，可是我顾虑自己的右派身份，没有向党积极地无保留地反应商城的严重状况，同时则在家庭里，在母亲和孩子面前不时透露商城见闻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对孩子们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这段写于1969年的“历史交代”的话，我最初把它当做是顾准的真心话，并据此判断是他1960年2月写下“铁佛寺水库记录”的原动力——他要想中共中央反应真实情况，却又怕党不相信他。我把顾准想得太幼稚了。

铁佛寺水库还用多说吗？一个字就够了——饿，两个字——饥饿，三个字——太饥饿，四个字——饥饿死亡！

可就算不提那些指示他，威胁他的人，秀和孩子们也全都不相信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这一切。他还没来得及说出看到、听到的十分之一，就被他们冰冷仇视的目光吓住了。一家人，除了母亲，都以为他是因为右派下放劳改而神经分裂了。

十七岁的稻头，十四岁的小米，十一岁的高粱，九岁的五五，七岁的小弟，十只惊恐的眼睛，无

时无刻不追随着他，除了惊恐之外，还满含着怜悯和怨愤。而秀那双母鹿一样的眼睛根本就回避他的目光，让他怎么也捕捉不到。在这些眼睛里，他再也不是那头鹿角像大树一样挺立着的，骄傲的公鹿，他成了一头四不像，异类，丑陋而且危险。

商城劳动队科学院方面的负责人已经“再三告诫队员回到北京后不要随便传布商城的情况”。人们都识趣，更是知利害地三缄其口，不但绝不和同事，同志们提起，也不向亲人、家人们述说。这是党的“麦城”，是极笔的“败笔”，报丧的人，传播丧气消息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人人心知肚明。

顾准更是心知肚明。可是，一个声音一直在他耳边鸣响，又是那簇蓝焰燃烧的悉索声，他躲不开，挥不去，令他日夜不安。

“历史要重写的。谎话连篇，哀鸿遍野，这一段历史如何能不写？” 59.12.27.

也就是说，顾准写“铁佛寺水库记录”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想“向党积极地无保留地反应商城的严重状况”，他明知党倒不是“不相信”这些严重现实，而是即使一切都属实，也不能由他这种人来“记录”，更遑论“报告”。他推测，最严重的还不是商城，甚至还不是信阳，这种状况应该是全国范围的。

“59年的旱灾，看来是以湖北为中心，二头扩展的。河南确实还算较好的。” 60.1.18.

“还有四个半月，谁知道会出什么事？中央知道这些下情吗？那么1960年上半年还会有些什么措施呢？” 60.1.15.

庐山会议刚刚开完还不到半年，不仅仅是党内噤若寒蝉，人民也噤若寒蝉。谁家八竿子打下去还能没有个把河南、四川、湖南、甘肃的亲朋？谁又敢说真的没有听到过一句“饿死人”的传闻？连我这代五零后，当年十岁左右的孩子，都常有风闻，何况大人？我们被大人们呵斥住嘴的情形至今还犹有记忆，可见他们当年都被吓成了什么样子。

1959年的庐山，从“神仙会”开到“扩大会”，从“扩大会”开到“全会”的一个半月，正是身在商城铁佛寺水库的大右派顾准处在“移居下菜棚”到“因看戏事，沈在队前批评，写检讨”的改造前期，介于“不用脑子的两个月”和“恐怖与屈服”两个阶段之间。

庐山会议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内都不传达会议内容，彭德怀的所谓万言书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就更是忌讳莫深，普通干部如汪璧这一级根本不可能看到听到。这些东西是一直到了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大白天下的。不明就里的人们，仅仅知道几份公开发表在党刊党报上的《决议公报》——《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就是根据这些公报的指示和暗示，开始在自己身边大抓各种“小彭德怀”。

到顾准回到北京的1960年1月，情况就是这样。

自从1952年三反撤职，顾准所能获得的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就只剩下妻子汪璧。在中国，能够得到何等级别的信息是最重要的“政治待遇”，它代表着你在“模子”中的位置。顾准早就没有任何“待遇”了，他也早就把这些东西视为“政治勒索”而睥睨过了。但他并未对随待遇而至的政治信息不屑一顾，相反，他热衷于从非正常、非典型渠道攫取本不应他知晓的信息，用于他的观测和探索，且乐此不疲。这种行为在中国一般被定义为不安分、野心和僭越，且不容分辩，因为它撞击了（即使非常轻度）森严的等级制度。

例如1959年初的郑州会议精神，他就只能从汪璧处得知。汪璧是中央大部委的处级干部，相当于地、师级，“待遇”级别相当高。但即使如此，庐山会议的具体信息仍是不允许知晓的。所以“顾准日记”根本就没有提到庐山会议，就不足为怪了。只是在写于1969年的“历史交代”中他提到“1959年9月我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那时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庐山会议实时的情况，汪璧没有可能从正常渠道得知，加上她沉静、淡泊的性格，又摊上这么个大右派丈夫，仅仅为避“瓜田李下”之嫌，她也不会到处乱打听。再说她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她关心的，第一是孩子们的平安，第二是丈夫何时能摘掉右派帽子。

恰恰是这两项，都不在顾准的视野之内。

前者，他认为孩子们自有自己的成才之路，他们也确实个个优秀。他总是拿自己的少年时的经历去要求他们——你们都大了，不仅不需要大人整天为你们操心，相反，你们应该为父母、奶奶分忧。

而后者，若不是为了秀，他才懒得操哪怕半分心呢，用他的话说，叫“去它个毡帽子”。

九年后他写“历史交代”，说到铁佛寺，他说他以为负责人自己会去向上级详细汇报的，“如果没有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我认为他就违背了主席下列教导：balabala, balabala, balabala……”。

粗看，顾准要么是政治上的弱智，要么就是黑色幽默的高手。他当然是后者。

细读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系列，“希腊城邦制度”系列，“马恩”、“历史”和“西方经济学”笔记系列之后，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很难认同他的这些话语出自一种“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如沈万山同志所言“你们中央来的人都幼稚得很”，而是倾向于同意他其实是一名黑色幽默的高手——你愈是不相信我，我就愈是弄得煞有介事，让你除了直觉不对劲之外，找不到任何缺口、口实或薄弱环节来指责我不老实，没有改造好。

此时此刻他写“铁佛寺水库记录”，肯定不是幻想能送达“极峰”，为民请命，而是写下了又一次将要入“库”的、详尽翔实的探索和观测记录。他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靠清官为民请命是行不通的，靠个人的“刍蕘之献”在一个残暴的体制内也是无法真正改变什么的。从此，他的文字中再出现这个谦卑的成语时，已经变成了不动声色的黑色幽默，比如：

“那时候，反动立场没有丝毫触动，还想以我的反动思想体系来“影响”(!)领导，还在想作什么“刍蕘之献”哩!”

他早已不再有“刍蕘之献”的浪漫。1957年献上的《试论》这一捆“刍蕘”，除了令自己差一点在商城成为饿殍，还有什么用处呢？

但他没有罢手，他要建立一个思想库，一个当代史切片标本库，哪怕仅仅是建在纸上，建在抽屉里。这些东西要尽可能留下来，它们也许会成为“牛痘”，为未来带来免疫力，使社会和人类免于进入下一次恐怖无序的“天花”。他将其看作使命，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安排吧。

看到自己的预言再次成谶，他毫无幸灾乐祸之意。除了忧虑还是忧虑，为这个国家和几亿苍生：

“气象科学研究所的预报，今年伏汛还是不正常，是涝的危险大。但愿七千万人的水利大军在春耕前能够做成一些事，能够解决一大批问题。Refer 12/30 人民日报社论：开展一次水利大检查。

但愿今年的水，还能蓄得一些给明年用。”^{60.元旦}

忧旱忧涝，忧患忧失，忧国忧民……无尽的忧虑。

“惋惜历史是没有用的”^{笔记 P21}。“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目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目前没有萌芽的。”^{59.3.8}。

从商城人间地狱回到北京人间的顾准，眼下最急于要做的，是“**脱出二十年的拘束，走上自由批判的道路**”^{60.2.3}。既然一切改变都始自批判，就让我来做这个始作俑者，从现在开始用十年的功夫，蘸上不可遏制的激情之水，来磨砺这把冰冷的剑吧。

“**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们长大**”^{59.12.31}。

他居然在日记中写下如此“变天账”式的语言。

顾准的“铁佛寺水库记录”如今不知在何处。一个大饥荒的亲历者，思路宽广、清晰，文笔平实、流畅，假使保存下来将会是一份何等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不要太遗憾吧，人们，好在如今，毕竟，中国有了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记事》，有了杨继绳的《墓碑》，顾准地下有知应得安慰。

不过此时的他，还没有亮剑呢。

3. 妻子和孩子们

“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这四年的变化十分剧烈。

“商城一年，其中7月至1月这六个月，物质生活的艰困还超过解放区的灾荒年头。回到北京，好几个月吃得特别多，家庭生活主要靠汪璧的工资，虽还不甚困难，然而我在家庭中的微妙处境，已使我感觉到我是这个集体中贡献微小而消耗巨大的成员，家里自母亲以下，恐怕都对我有一种奇特的观感，我的生活习惯变“野”了，脾气变古怪了等等。”^{自述 P272}

“家庭关系既然变化很多，1960年每月五十元的生活费由我自己领取，这笔钱干脆归我一个人花，除伙食等生活开支而外，其余全部用来买书了。”

回到北京的顾准，肉体的磨难减轻了，精神磨难却大大加深了。自商城始，他和秀之间就起了龃龉。

秀是汪璧的昵称，这个称呼也只属于她自己的母亲和顾准两人。汪璧原名方采秀，1934年和顾

准结婚后就被丈夫“秀”啊“秀”地叫到今天，她则叫丈夫顾准“云”，因为他号“哲云”。六弟陈敏之是五哥五嫂婚姻命运最好的见证人——从还是少女的五嫂跨进仓基弄他们陈家灶间的那一瞬起，到五哥五嫂婚姻的结束，到五嫂五哥的先后离世，他目睹了全程。

1935年10月，结婚刚刚一年的顾准夫妻流亡北平。

临行这天清晨，六弟——小叔子——十五岁的陈敏之赶到杨树浦码头为二十岁的五哥，二十一岁的五嫂送行。六十多年后，五哥五嫂都已作古，当年未及弱冠的小叔子已近耄耋，仍是忘不了那日、那时、那刻黄埔江面上离愁别绪似的薄雾，那是小男孩生平第一次经历离别的惆怅——

“他们坐的是一艘货轮，去天津再转北平。已经是深秋，江面上有一层薄雾，似乎增添了几分离别的气氛。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离别。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谁也难以预料什么时候能再见。当时离别的情景和我的心情，至今犹清晰可忆。” 陈敏之 我与顾准 P56

六弟和五哥五嫂的感情特别深厚，除了三人年轻时在政治见解上的高度一致这个主要原因外，也和他们的际遇都坎坷不平有关。敏之1937年十七岁时曾经被捕过一次，从此“叛徒”的阴影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虽然比起全国有名的“三反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五哥，这顶若隐若现，时真时假的帽子份量小很多。兄弟俩在新政权中同样未进入主流，未被固定在“模子”的某个位置上，却也是他们能够思考，勤于思考和善于思考，从而在壮年和晚年精神始基愈来愈接近的一个要因。

六弟见证了五哥五嫂三十四年的婚姻，结婚——流亡——最早两个孩子的夭折——夫妻苏区、上海的分居——苏区的相聚——十年间五个孩子的诞生——五哥上海的“滑铁卢”——北京的遭遇——残酷的右派改造——五哥的思考——五嫂的自戕——孩子们的叛离——五哥的离世，一切。

1960年1月从炼狱河南商城回到北京后，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真正的冲突。

“1/19回家。雪地挑担，冷淡的接待。” 60.2.3.

并不意外。

1952年的风波没有摧毁他们十八年的恩爱婚姻，反使他们更加相亲相爱。一是顾准至此才知道依恋家庭了，“料想不到在进入四十岁以后，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艺，懂得爱孩子” 55.11.16.，二是汪璧坚定相信丈夫是无错的，他的倒霉在于遇人不淑。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令她对这位丈夫的感情，除了

妻子对丈夫之爱外还夹杂着对任性的大孩子一样的母爱，另外她由衷地在知识，见识，学识，胆识各方面敬佩他。

丈夫是不凡的，尤其在政治、经济、历史和哲学的深度上。妻子是不俗的，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假如在一个和谐善意的社会中，他们的婚姻一定是最具楷模风范和人性光彩的神圣婚姻。可这婚姻却如此地生不逢时。

起初，和绝大多数共产党的男性干部一样，顾准也是尊崇“党和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和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原则的。在位时，他永远处于工作、开会、起草文件的无限循环中，能把每个孩子的名字不叫混已经谢天谢地了。后来他下了台，进了党校，有了思考的时间，也有了去爱妻子，爱孩子的时间。因祸得福而回归亲人的他在家庭中深得宠爱，深受欢迎——妻子甚至因他的回归而减轻了对那些不淑之人的怨怼，孩子们则以得到他的夸赞为荣。

孩子们也都特别优秀，尤其是两个大的。长女稽头，已经是大姑娘，知道爱美了，很久以来都想要一双冰鞋，好和同伴们在八一湖或北海的冰面上驰骋，这是地道北京孩子，尤其是地道北京干部子弟的必修课。爸爸还在党校的时候，有个星期天咬了咬牙，下狠心要给闺女买一双，不料她又坚决地拒绝——一双跑刀差不多要五十元，一双花刀也要四十多元，弟弟妹妹都还小，虽然总不清楚爸爸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一直有不详的感觉，不能在这当口增加父母的负担，冰鞋我向同学们借。长子小米，言语不多，爱动脑子，缠着爸爸都不是撒娇，一定是要问些连爸爸也答不上来的问题，都是关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生一副数理化脑子，清华北大的大门对于他，会将不叩自开。三个小的也都聪明懂事，五个孩子和睦友爱，大的照顾小的，小的尊重大的。

他们还有个慈祥的奶奶，七十多了，顾了大的顾小的，顾了儿子顾媳妇，就是很少顾到自己。

劳改前的顾准曾经得到过世上幸福男子应该得到的一切天伦之乐，他丰丰富富得到过，又眼看着慢慢或瞬间就失去，失去之后才痛彻心腑地懂得其宝贵。直到临终一刻，为了片刻的重温，他甚至甘受最后的精神凌迟，以致连执行的“刽子手”都不忍下刀，转而去帮他寻找这份就算是罪大恶极之徒都不应被剥夺的人伦，却终是没有找回。更遗憾的是在两难时他往往选择了舍弃，那一腔罕见而纯粹

的激情，直到死神来临都无法分出一个像样的比例来给爱人、孩子、家庭和亲人，他也为此受尽了折磨，以致酿成最后无法收拾的家庭悲剧。

1960年1月19日，商城回来的劳改犯顾准回到北京。从这天起，他的家庭开始分崩离析，裂口从相濡以沫了二十六年的妻子汪璧始。

还在商城时，汪璧就出口过“离婚”二字了。

那时每隔几天他就会给妻子写封信，和从前的每一次小别或长离一样。他们的信给对方的温暖，人们可以从顾准日记中体味。但这一次，他的每一封信不但给不了她任何安慰和平安，恰恰相反，几乎每一封信都令她陷入更大的紧张和不安。

多少年的相濡以沫，他以为最了解自己的就是秀，唯一能向其说真话的也是秀。秀也的确值得他信任，无论在丈夫显赫一时还是灰头土脸的时候，她对她的爱一以贯之。再说她也早就习惯于他的灰头土脸，每当至此，她反倒有某种安全感——总算是尘埃落地，他太出色，太扎眼，磨去些棱角也许更好过日子。

可商城不同。自从他戴上右派帽子，秀知道这回事情闹大了。

和1952年的撤职，1955年的调京，1956年的调入中央党校学习都大不相同，右倾成了右派，内部矛盾成了外部矛盾，意外犯错误的同志成了故意反党的敌人，“量变”已经“质变”。假如不十倍百倍地努力摘了这顶右派帽子，志同道合的夫妻就只能分道扬镳，这不是离不离，弃不弃的问题，而是已经事关生存，尤其是孩子们的生存。再也不是能放一本《安徒生童话》在他床头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她必须鞭策他摘帽，真正的用“鞭子”来“策马”，这个鞭子，就是离婚。

他一封封信向秀诉说商城之苦，商城农村之苦，农民之苦，劳动队之苦，也诉自己的苦，一生都没有吃过的苦。秀闻所未闻，半信半疑，心惊胆战，彻夜难眠。他向秀要钱，因为左股骨挑担压坏了，要进城治病。可 he 不想明说，怕她担心，就什么也不说，就是要钱。秀知道他天性大方，怕他大手花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就是不寄给他，且回信语言冷淡，公式化，还吓唬他说你再这样我们就只有离婚。这个小孩子接到信忍不住半夜呜咽，就在信上和妻子吵架——“生活本可有各种方式，一切由

你决定好了”^{59.10.24.}，同时说明要钱是为了看病，而心中对秀已经有了意见。秀立刻寄来三十元钱，埋怨他为何不早说。大孩子忙不迭回信致歉，承认错误，汇报工作，表示要努力改造，早日摘帽，对得起爱人。其实他又何曾把什么狗屁“摘帽”放在眼里过，背过脸去就暗自嘲讽“都是秀式的空想”^{59.12.8.}。

从真正政治二字的内涵讲，他的认知程度要比妻子高许多，虽然在常人眼里他之于“政治”简直就是个蠢头。

商城饥饿的浪潮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就算劳动队有书信检查，他还是不管不顾地告诉采秀身边发生的一切，信上涉及的所见所闻过于骇人听闻，和她在北京党组织中接受的信息南辕北辙，这才是他们龃龉的真正开始。

虽然妻子也对生活水平的急遽下降大有感受，可这些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致——天灾是1959年的大旱，人祸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农业严重歉收时逼我们还债。比如他们逼中国人还他们苹果，要用个铁丝圈一个个过，太大太小都不要云云。苏联老大哥的突然翻脸则是因为我们党中央坚持要走马克思主义路线，坚决不同意他们对斯大林和他的主义的过分批判等等等等。妻子和全国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全盘接受了这些宣传，没有人站出来问一个为什么。1957年的杀鸡吓猴不单是吓住了猴，连狮子老虎都吓成了兔子。人们索性交出自己的脑子，以不思考为常，这是生存下去必须付出的代价。有两句话是这个时期“人民”之间见面时“互勉”的：

“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胡说八道！”

如果说妻子的不思考是出于恐惧，出于母兽要保护幼兽的无奈，那么孩子们的不思考却是他们思考后的决定：

爸爸是真的还是党是真的？是爸爸重要还是党重要？要爸爸还是要党？

两个出生在新四军苏区的大孩子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小孩子们则义无反顾地追随了哥哥姐姐——这也符合你们对我们从小的教育，我们是党的孩子，党就是真理，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

怎么做。党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从饥饿商城回来后的顾准不但在社会上，在家庭里也成了异端。

他食量大增，好像永远都处于吃不饱的状态，翩翩绅士变成了饕餮之徒。生活习惯也变得粗野了，常常不洗脸不洗脚就往床上一倒，还常有牢骚、粗野的话出口。往日那个在孩子们眼中唯其马头是瞻的父亲没有了，完全是一个闯进家门的陌生人，粗野，肮脏，还要大量吞食有限的口粮。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胡说八道”，孩子们看他如同看一个怪物。粮食早就开始凭票供应了，光是紧着他吃饱，奶奶和妈妈就大费周章。加上他原来近三百元的工资变成了五十元的生活费，还大部分都被他用来买了书。

贡献最小，消耗最大的他成了家庭的累赘。孩子们对他唯恐避之不及，妻子没有阻止他们，她对他已经从爱变成了怜悯。只有老母亲胆怯地望着他的婆娑泪眼，还让他有些许熟悉的感觉。

他也认不出这个家了。几乎在一瞬间，他就成了孤家寡人，原先不在意的全部天伦之乐在一只不可抗拒的铁踵下，灰飞烟灭，消失殆尽。

汪璧，这位熟读普希金的温柔女性，原是可以做一位“十二月党人妻子”，和那些高贵的女性一样，抛弃一切，连孩子也扔给奶娘，从华丽的彼得堡千里万里追随高贵的丈夫们到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矿坑，先跪下亲吻他们脚下的铁镣，再亲吻他们刚毅的嘴唇——假如不是在这个有着株连九族和廷杖传统的国度里。

在这里，一个女人绝作不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任她是谁也做不到。在这里，汪璧首先是个恐惧的母亲，有着五个随时可能受伤害和被吞噬的孩子的无限惊恐的母亲，其次是个罪人之妇妻，惊弓之鸟般的妻子。没有财产，没有奶娘，婆母养活不了他们，丈夫也并非身处西伯利亚的皑皑白雪中，而是被压迫在商城的泥淖和粪秽里。人们最要毁灭掉的就是他的尊严，如果他的妻子要追随他，等待她的将是更加不堪的泥淖和粪秽。而这个男子，回避甚至摒弃了本应是一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天然职责——仕途，俸禄，待遇，专业和事业，全身心地追寻某种在他的灵魂中烧灼的东西，根本顾不上妻子在想什么。

这种烧灼着他的灵魂的东西，她起初还是能理解的，可是到了 1959 年，她已经迷失了，在灵性和意识两个方面都迷失了，完全跟不上他那不顾一切的步伐。她疲惫不堪，自信尽失，惊慌失措。她是个普通女子，具有女人的一切美德。你可以说她配不上她不凡的丈夫，但也可以说顾准这样的男子配不上这样的好妻子，他原就不应该有妻子和孩子。

抛却时代和社会原因不谈，顾准无疑是造成一个举国皆知的家庭悲剧的主要责任者。

妻子汪璧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而孩子们的苦难至今都没有到头。

4. 一个雏形

“采秀通宵夜战，我守候一晚。4 至 5 日，开门干预家务。4 日晚间，三个小的孩子大嚼一顿，颇感痛快。5 日晚，颇感伤，无聊！”^{60.2.6}

但他对采秀，还是依恋，对这个家，还是有一家之长的感觉——你看他要“开门干预家务”呢。

怎样干预呢？其实他完全无法插手。

计划家庭开支？他毫无经验，再说也无财政权，别看他作过大上海的财税总管；分配口粮？他哪里搞得定，自己能吃饱就很不错了；教育孩子？五个孩子对他都唯恐避之不及，嵇头还和爸爸大吵了一架，只因为他说对她说了一点点商城的惨状。他也只敢和长女说，毕竟她十七岁了，原以为她已经能够独立思考；帮助妻子整理家务？妻子常常通宵夜战，倒是不再大炼钢铁，土法炼焦了，不是开会就是学习，要不就是等候着上级的指示或者基层的汇报，再不就是批判谁，斗争谁，帮助谁，反正日夜、周末、节假日都不消停。哪个办公室不通宵地灯火通明，就说明此办公室的人不革命，没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夜里是有一顿晚餐的，人人潜意识中这顿晚餐比什么革命都重要，却绝无一人说得出口。一顿晚餐，一宿灯光，这就是 1960 年的机关总路线和大跃进最重要的表象，一直到晚餐不再开得出为止。

右派顾准与总路线、大跃进无关，更与晚餐无关。

“连天采秀夜班。前至四时，昨夜外出，迄今未归。”^{60.2.9.}

他是被排除在这一切之外的。“颇感伤，无聊”的他，在《铁佛寺水库记录》之后不得不开始写“右派分子改造始末”。他很认真，从盘古开天地的“思想危机”说起，一直说到现在而今眼目下“改造归来”，妙笔频生花，下笔如有神，计有：

“思想危机——对党不满——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信仰崩溃——人的尊严——知识分子的春天——十大关系——十五贯——劳动教养——百花齐放——自由平等博爱——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人道主义——费孝通——科学规划——一看二帮——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民主——党章丢到茅厕里去了——党内生活——社会主义经济学规律体系——资本主义生命力——帝国主义论——新民主主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南斯拉夫——波匈事变——大国沙文主义——朝鲜战争——和平问题——议会道路——第二国际——毛是反 Stalin 的——Stalinism 在中国的生命力——毁灭的预感——合作化高潮——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支持肃反——三七开——百花齐放的说法保留部分——个性与共性——古田会议——大汉族主义与秦皇汉武——乌云满天日子里的第三者——整风——漫步清华——党内是非也议论——民主党派座谈会——天山脚下——新草木篇——黑龙江之行——哈尔滨工大与返京途中……”均摘自日记^{60.2.4.}

我的天，叫人读着都气短喉噎，亏他老人家怎么写出来的。

“四年史实，排比不易，分析更难”^{60.2.12.}，甭管水平高低，字数肯定是够了，总算是能交账了。

和中共各次运动中被运动的对象写出的各种“坦白”、“交代”、“罪行交代”、“历史交代”、“检讨”、“检查”、“认罪书”、“悔过书”一样，和顾准的“交待”也充分体现了那个年代之不由衷，不真实，不聚焦，洋洋洒洒，不知所云的文风。彼时这种东西何止堆山填海！但是据说顾准写的即使这种东西也比别人的好看。多年后曾经有位爱好文学的军宣队员，看了他类似的东西，像当年潘序伦看小顾准编写的《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一样，一击三叹，连连说是“一种享受”，也算是慧眼识英雄，惺惺相惜吧。

要说呢，顾准写得也不亏：

“必须坚定不移地卑微下去。写作中自己提高了。现在看领导层的变化，简直是一种欣赏眼光。思想提高，态度必须继续卑微下去。”^{60.2.14.}

幸好 1960 年的日记本们还可以安藏篋匣，否则翻出来也够他喝一壶的。

欣赏完人家的“变化”，他开始读张知本的《宪法论》，与此同时，大量摘录了从1956年7月开始至今的《人民日报》，大概也只有人民日报可供他摘录了，他开始新一轮的思辨：

“转变递嬗之迹，不做细致的工作是弄不清的。现在体会到两次下乡的伟大作用。右派分子是不能做，不许做研究工作的，拆穿西洋镜是危险的，所以我必须坚持做好这个工作” 60.2.21。

“右派下乡的伟大作用”，够幽默！眼下焚书坑儒是没人敢干了，可是把儒们赶到全封闭的乡下，让劳作和饥饿拖死他们也还是不错的替代。只可惜还是有些拖不垮饿不死的东西，比如他顾准，能“完全根据XXXX宣传部给出的资料和文献”——用几十年后谈到顾准的某位学者的话说——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什么的，“层层剥皮”——用顾准的话说，把1956年到1960年匠心巨手好不容易搭起的西洋镜拆穿，掀开“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盖头，看看底下的把戏。你越怕我做什么，我越要做什么。因为我没有被你“豢养”，我就有权利做下去。

“可是剥皮不是容易事，要花费大量劳动。” 60.2.21。

“剥皮”何止是不容易，这“皮”是和自己连着筋的，从少年起就连上了，除了“不容易”还有“痛”。与其说是“剥皮”不如说是“剥洋葱”，越剥到最后泪水越多，辛辣和眼泪还在后面呢。

摘录完一年的报纸他就马上卖掉，“卖废品”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充裕荷包好买书。

半年多没逛新华书店，真有不少新书面世，政治的，哲学的，文学的，自然科学的，中文的，英文的。无论喜不喜欢书的内容，他都希望能占有它们，先读了、“吃”了它们再说。

采秀在钱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卡脖子”。仅仅她的一百六十多元工资要供应全家八口人的吃喝拉撒，还有上海自己的娘家妈妈要供养，丈夫的五十元生活费杯水车薪，她不得不紧缩银根。

他就想方设法开源节流：卖掉自己珍藏多年的绘图仪器、计算尺，那还是几十年前的美国、德国货，现在拿出来依然精致结实。加上卖报纸的钱，现在得有一百多元了，除了抵消买下这批新书的赤字，承诺商城的难兄难弟们要在北京帮他们办理的事情也都做了，没有动用母亲的那点家底。他很高兴。已经不大敢向秀伸手要钱，用自己想法子搞来的银子买书，总算可以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读它们。

他首先从《宪法论》以及刚刚买到的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下手。那时好歹还有这类书在卖，不像六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甫一开始国门立时紧紧闭上，落下千斤大锁，涓滴不进，原来剩下的也都下了架，入了窖或成了灰。

妹妹棣珍、妹夫义之来看望母亲。三人间没有交谈。妹妹、妹夫不是没有苦闷，只是亲人之间无法交谈，不敢交谈。妹夫施义之，新四军时期参加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眼下仍是现役军人，刚刚升任解放军 21 军政治部主任。现在人们见面都不谈国家的事，社会的事，没什么好谈的，也不知怎样谈才能比较安全。并非人人都是幽默大师，还是免开尊口的好，再说“莫谈国事”也是这个族群的优良传统之一。

他埋头在报纸中，立刻敏锐地发现一天的报纸中就有好几件新鲜事：

第一，周恩来准备到新德里去。他判断西亚那边要出事；

第二，发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新生事物的语录。他怀疑“就已经发出的声音而论，难道去年八九月以来有反对新生事物的声音？显然没有。那么不满新生事物的声音究竟从哪里来的？”^{60.2.28}他好像已经看到了近二十年后才正式公布的“万言书”——那么那个会议上确实有“声音”发出，而且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第三，农业生产数字的基期突然转为 1949 年了，是不是准备以后不再伪造统计数字了？那么他们岂不是实际上已经承认从前的数字都是伪造的？这可真要感谢上帝。老孙早就对这些“赵姨娘”数字深恶痛绝，这回一定是他最兴奋，但愿老兄别高兴过了头，有机会见面要提醒他。

这几件都是大事。

“现在正是发展到顶点的时候。哪里都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物极必反，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过的。他该走了，大概也真的快走了”^{60.2.28}，他放胆推理。

自党校时期“读亚书”始，他模模糊糊有了一些关于“国家领袖”的政治概念。这次从劳改地商城回到北京，他买到了苏联史学家塞尔戈耶夫所著《古希腊史》，读后这个概念越发清晰起来，这就是“僭主”和“僭主政体”的概念——王政、寡头政制与民选、民主政制之间的过渡政制。但这是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事情，近代西方会发生，美国独立战争后的华盛顿更是触手可及的先例。但东

方会发生吗？中国会发生吗？

“他”要真是“能走”，人民当额手称庆。可从几千年的东方专制帝王传统中走来的“他”，有可能像雅典的梭伦和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有可能有他们那样的胸襟和气魄吗？

这是毫无可能的啊。什么“一线”、“二线”，无非帘子垂不垂下来罢了。

科学院院部对他新的工作安排也决定了——人事关系从综考会调到机关事务管理局，到北京郊区清河农场饲养场继续劳动改造。他觉得很满意，至少不用再回狰狞恐怖的商城。

从商城的难兄难弟们的回信中他已得知，整个信阳地区现在都已经从炼狱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吃人，吃活人也吃死人。吃了人肉的人眼神都不一样，看人都是直愣愣的。胖点的人（其实都是浮肿）尤其不敢外出，怕被杀了吃掉。没有人上街，街上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更没有人劳动，谁也不再干得动。一点点救济粮，杯水车薪，未到站就被抢劫一空——饿极了的人已经不再是人。

劳动队又肿死了好几个。他难过极了，也庆幸极了。

和他做例行谈话的是院部干部局和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二位正职局长。局长们亲自出马，客气万分。他有点“受宠若惊”——

你们干嘛这么客气？不就是去清河农场吗？一个来自地狱的人，到哪里还不都是天堂？1956年我就想找一个窟窿躲起来读书，你们非要抬举我进什么什么的综考会，这下可算是找到个好窟窿，“在那里住上一二年，二三年，等候局势转变，与农村联系，这太好了……到清河去，写作困难，读是可能的。那就去好好读。到清河去，接近公社，可以深入观察城郊公社二三年。这可以为我的著作增加新的内容”^{60.3.2}。

他的“稿库”如今已经相当丰富，“愈来愈变成一个1956年以来的现代史了”^{60.3.2}，他自豪得不得了，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近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大话。说完又有点不好意思，下一句赶紧掩饰了一下，“以个人经历为中心做夹述夹议的评论，这条路似乎走不通”^{60.3.2}。

党校时期他读过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最后一部小说，被称为革命前俄国社会生活史诗型的百科全书。书中广阔的社会场景，大气磅礴的艺术构思，丰富多样的

表现手法，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手法的交替使用都曾令顾准心醉。但他也明知自己不是文学家，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哪怕自己曾身在其中。

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读了不少史，非常清楚“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原因一定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自身的桎梏，才是能写出，或者至少，读懂一部接近真实的历史的前提。这桎梏包括个人的际遇，经历，观念，传统，观点等等等等。首先必须通达历史——东方的，西方的，中国的、外国的、远古的，古代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代的，再加上广泛的比较它们的能力，即掌握深厚的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直到宗教学、神学的功底，才有可能做文明的比较，最后才有下笔去书写历史的可能。

但他也并不奢望做一位历史学家。

他最经常在考虑的是“政治上取舍的问题”^{60.3.2}，这从他的全部已经面世的文字中都有明显和毫无歧义的体现。

“人们或许要问，我是不是一位君主或一位立法者，所以要来论述政治呢？我回答说，不是；而且正因为如此，我才要论述政治。假如我是个君主或者立法者，我就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来空谈应该做什么事了；我会去做那些事情或者保持沉默。”卢梭《社会契约论》

法国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到的这段话，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在大众中只占极为微小数量的一部分人之所以“论述”政治，正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权力，所以才会借“论述”去间接地触发行动。卢梭叫他们做“政治哲学家们”。

后来英国人萧伯纳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能者做事，不能者教育！”

他早就看过《社会契约论》，甚至在它还被译作《民约论》的时代他就读过。他曾惊诧于卢梭是怎么写出来的^{文稿 P377}，但在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后他理解了——

“它是一个高贵的 18 世纪欧洲人读希腊史以后，也许还通过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把希腊心灵的历史业绩‘当代化’为当时的政论。于是，卢梭的值得学习之处，就不一定是他的智慧和灵感，更值得学习的是‘勇气’和‘技巧’了。”^{文稿 P265}

是的，智慧、灵感、勇气、技巧。他深吸了一口气：

“……观点也有很大的变化。政治上取舍的问题，去年秋冬之交在劳动队时已在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靠爆炸式的改革做不到，而且后果也不好。四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乎在走另一条路——自然演化。苏联在演化中，X（应该是斯大林 - 作者测度）所作的不过是过渡作用。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地上天国，矛盾永远存在，斗争永远存在，而斗争的方式，那老一套的‘正确错误’的绝对论维持不下去了。不同意见的人必定要组成不同的社团，发展的结果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度。民主，其原产地是自由农制度——美国、挪威、瑞士都是。当经济发展濒临高速度与集中化时，Hamilton（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Stalin（斯大林）的个人独裁都不免出现。然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展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生作用，任何事情也就不能在顷刻之间获得定论，自由争论，长期的政治斗争就成为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这时候，没有民主主义怎么办！” 60.3.2.

就在人人都以为此人正处于最最狼狈不堪，头破血流的当口，顾准，他已经愈来愈具备一个政治哲学家的雏形。丝毫不顾忌别人的冷眼和猜忌——一个毫无话语权的右派也配奢谈“政治”？他公开宣称“我十分关心政治”，只是“现在还是本钱不足，所以一定要读” 60.3.2.。在“政治”一词愈来愈被误解，愈来愈显得肮脏、龌龊，愈来愈在表面上被人们鄙薄、在实质上被人们惧怕，被妖魔化的年代，一个根本不配奢谈它的右派却对它愈来愈感兴趣，愈来愈多地谈到它，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角度和态度，像物理学家谈到“力”，化学家谈到“嬗递”，数学家谈到“模型”，哲学家谈到“爱智”一样，自自然然，坦坦荡荡，毫无愧怍，好像这才是他的天职一样。

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是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而这些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们在世的时候，鲜有人如此评价自己。他们在一般情况下终日埋头于观察、阅读、比较和记录之中，他们并不愿意谁来做他们的奴隶，他们在精神上也绝不做任何人的奴隶，他们想要阻断每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眼下，清河农场就是一个好极了的躲进去阅读的“窟窿”，对此他非常满意，虽然还有些美中不足——到清河去，写作有困难，参考资料不够，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写作空间来容纳书和纸笔，但读是可能的。那就去好好读。到清河去，接近公社，可以深入观察城郊公社二三年。

“这可以为我的著作增加新的内容。” 60.3.2.

他像一个贪心的财主数算仓库一样，盘点和计划着他的“稿库”。

5. 坚定不移地卑微下去

岂料院部忽然又改了主意。

就在顾准做好了一切去清河饲养场劳改、读书的计划时，突然一位副局长通知他要他即刻上班，明天就去院部上班，劳改结束了！

在普通人眼里，这不啻是个天大的喜讯——回到同类人群中，不再被视为异端、异己、异类，这是多么大的恩赐和荣幸。可你看我的传主听到这个消息作何反应：

“如果说对当前生活有利，可以很快摘帽子，加工资，恢复高官生活，这是好的。可是我真厌烦这种部吏生活，我也不愿住在家里，这又是一种精神上的苦刑！为什么我总找不到一个窟窿，天哪！” 60.3.2.

天哪，他居然哀号起来！怎么可以这样！

可他就这样了，而且很可能，当着副局长的面就哀号起来，弄得原以为会看到一副司空见惯的感恩戴德场面的副局长措手不及，不知说什么才好。

“天哪”二字是他 1960 年日记的最后两个字，再见他，已经是九年多以后的 1969 年 10 月，天知道“天哪”之后发生了什么。从他的“历史交代”中至少得知，他总算如愿以偿去了清河养殖场而没有“明天去院部上班”。也就从此刻开始，顾准彻底摆脱了厌恶已极的“部吏生活”，开始他两年的清河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感谢上帝，从此直到去世，他再也没有做过一天部吏。

妻子和孩子们对他这种行径是什么态度，因为再也没有日记文字记载，外人无从得知。十二万分的可能是——深恶痛绝，无法原谅。

在中国，能“上班”就预示着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至少在工资上将有所恢复，例如降级发薪，但一定会高过右派的五十元生活费。“恢复高官生活”是不大可能了，例如住房、汽车、司机、特供、

完全的免费医疗、疗养，尤其是“政治待遇”等等，都不可能，但恢复一部分还是可能的，毕竟他是1934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以七七事变为准，这是老规矩 - 作者注）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犯了逆天的错误，毕竟已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看过“颜色”，知道利害了。上了班就算是“过了海”，过了海再显什么神通都来得及，摘帽，官复原职，恢复俸禄，恢复“待遇”，一切的一切。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个家庭正急需的呀：

长女正在考大学的关键时刻，家庭出身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长子的入团问题因为他是右派而大费周折；三个小的正处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长身体阶段，极其有限的定量供应填不饱他们的小肚皮，从黑市购买高价的白薯，胡萝卜，蔓菁，南瓜之类的所谓“副食品”成了急需；母亲在他劳改期间因为爬高去摘自家种的丝瓜摔断了胫骨，需要人照顾，需要营养；妻子在建工部财务司财务处长的位置上因为有这么个右派丈夫一直抬不起头来，只因为她也是1934年的老干部而没有被株连下岗罢了，再提拔？连想都不要想.....

哪一样不需要钱？哪一样不需要地位，至少一个正常的“身份”？

假如他现在能够去“上班”，至少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一半。可他竟然拒绝了！

汪璧再沉静，脾气再好，他们曾经再恩爱，孩子们再优秀，再懂事，母亲再心疼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子，估计一家老小也接受不了这个！

他不去理解，也不愿去理解他们。他情愿在地上挖个洞天上钻个窟窿躲进去，也不愿去面对人间的一地鸡毛。

不错，中国如今是有了顾准，光荣的顾准，为全体中国读书人挽回了些许脸面的顾准，可是汪璧和孩子们又有多少人还能想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失望和绝望，迷失和丧失，又有几人能体味和理解？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不情愿地献出了丈夫和父亲，中国才有了顾准？

中国有顾准，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人们，请慈悲地记住这一点。

“好在不久又到了清河农场，在那里的约二年时间中，我照例是假期不回，在场留守，非假期补假，在家也是闭门读书，一切不闻不问。”

他坦率地承认一切，也许有些内疚，但毫无悔过的意思。

“那几年和孩子们的关系也很奇特。1960年，长女十七岁了，听我说话中谈起商城情况的某些黑暗面，很不以为然，跟我吵了一次。从此以后，我虽然仍然十分关心他们的健康和成长，在1960-1961年的困难时期，也尽量设法在不违反制度的条件下从农场买些蔬菜之类的食品回去，希望有助于他们的营养，我跟他们也较少接近了。”

他爱他们，但不知道如何相处，相处简直就是苦刑，索性就不相处。

在清河，顾准从饲养场小工做起，做到“闲散”的参谋，又操商城老本行去菜园组种菜，干过水渠设计，技术员兼领工，办过拖拉机站，干过临时外交，和地方政府打交道。

1961年11月初，我的传主毫无悬念，毫无戏剧性地摘了右派帽子：

“院办公厅郝主任找我谈话，告诉我院党组决定摘掉我的右派帽子，不久院部就召开了大约四五十人的会议（到会的以办公厅和劳动生产办公室人员为多，综考会有二三位同志参加），院部一位同志（大概是院党委的）宣布了这一决定，我表示了感激党对我的格外宽大，决心继续改造自己的态度。”

顾准在记述自己犯错误、右派“戴帽”、“摘帽”包括开除党籍全过程的文字，给人深刻的印象就是寡淡无味，毫无感情色彩，比如羞耻、懊恼、愤怒、激动、亢奋等等，与他的商城文字形成巨大的反差。

院部为了他的摘帽，专门召开一个中型的会议，各方神圣一一到场，虽说彼时不计算人工成本，却也是很高的规格了。他也就那么回事，和当年戴上帽子、开除党籍差不了多少：

“1958年4月下旬，综考会支部大会宣布我划为右派，已经上级组织批准，宣布我开除出党。这次支部大会我也到会，这是我参加我生活其间达22年之久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的最后一次。”

就算他对这件事关“政治生命”的大事没有搞什么黑色幽默，我也不认为他有什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情怀。他记录它们的文字之所以“淡出鸟来”，是因为它们早已不在他的视线之中，你想让他喜、让他悲，他也做不到，能做出这点表面文章已经很难为他了。他的注意力全部在解读历史上，尤其在解读历史的政治哲学方面。为此，他唯一要做的表面文章是“坚定不移地卑微下去”^{60.2.14}，越不引人注目越好，帽子反正在你们手里，要戴就戴、要摘就摘好了，随便给我个窟窿躲着，别打扰我或者至少少打扰我才是最要紧的。

可在妻子汪璧，这是件大事。不过她已经完全高兴不起来了。率领五个孩子在家门口欢迎“回到党的怀抱”的丈夫，汪璧的心一点也没有舒展开来。这个好不容易回到家的游子踏进大门的一刻，就像是发表声明一般庄重和冷峻地宣称：

“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高建国 《顾准全传》P490

汪璧认命了，她知道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也不会改变。

孩子们死心了，也恨透了——能低吼出如此反动透顶黑话的人，已经不再是父亲。

摘了帽，他又做了几个月农场会计，又到科学院新开办的、天津附近的宁河黄庄农场协助工作，主要任务是往返北京，帮助科学院职工搞吃的——主食，副食品还有煤炭。这可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非同小可。彼时凡有条件的中央机关都成立了“劳动生产办公室”，实际上就是返回到当年延安的“机关生产”，目的只有一个，给本单位的职工谋福利，找吃的，保证一个不死，大部不肿。这样的任务也只敢交给非右派或摘帽右派们去搞。

当年上海时期最反对“机关生产”的顾准，眼下相当的胜任愉快。

他九年后的“历史交代”，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清河农场他的全部任职和履职情况，琐琐碎碎，啰啰嗦嗦到令人厌倦。可是谈到他读了多少书，那就往往是一笔带过，越不引人注目越好。

从他的“历史交代”中，人们知道这两年他主要是读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东西。哲学方面——康德、黑格尔、罗素、杜威；历史方面——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史，西方近、现代史和若干史料。读了至于读了这些书后得到了什么启发，那是绝不会告诉你的。他只是很乖地向党“交代”：

“像这样读书，当然无助于自己世界观的彻底改变，甚至对于所谓‘探索’也没有发生什么有益的作用，只不过更增加思想混乱而已。”

他还生怕党不相信（连我都不相信），又画蛇添足，干脆把自己一贬到底：

“1961年党摘掉我的右派帽子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右派罪行并没有彻底悔改，反动世界观并未有所转变。也许因为这两年谨言慎行，不暴露思想，才造成一种‘变好了’的假象，其实，按我的思想实质来说，1961年11月，我远没有达到摘掉右派帽子的水平。”

把“交代”写到这一步，顾准“政治上的成熟”可算得上是炉火纯青了，任你从什么角度解读都

抓不到他的小辫子。顾准从书中得到的启迪，若你有兴趣，只可以去猜，从他最辉煌的“顾准笔记”和“顾准文稿”中找出线索，去排列，去考证，去猜，辅助读物嘛，就是“顾准日记”和“顾准自述”啰。

两年中他读过的书也绝不止“历史交代”中交代的，为了点缀门面、蒙混过关的那一点点。每次回北京，他也不是仅仅为了补假或者为孩子们搞点吃的，买书，借书，借书，买书，跑图书馆，跑资料室（估计摘帽后他已经有权查阅中外文资料）对于他至少是同等重要，多半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家庭关系既然变化很多，1960年每月五十元的生活费由我自己领取，这笔钱干脆归我一个人花，除伙食等生活开支而外，其余全部用来买书了。”

你可以做个大概的推算——农场的生活费超不过十元一个月，因为很多副食是自给的。就算他每月拿出三十元买书，买了二十几个月，就算它六百元，当时的书，除了《鲁迅全集》那样的大部头，都在五角到两元之间。就算一本发行量很小，很厚重的，装帧精美，尼赫鲁著的《印度的发现》售价也才三元五角，一本塞尔戈耶夫的《古希腊史》才两元。六百元买它三四百本书是毫无问题的，这还不算他借阅和抄录的。

即便如此，买书如今对他来讲还是愈来愈成了个奢侈和负担不起的开支。很快他学会了“淘书”，成了厂甸，东安市场，劝业场老旧书摊的常客。他大部分回北京的时间都在这些地摊前“蹲”掉了。

1961年春节后的一天，估计应该是他被恩准回京过年的最后一天，当他又一次蹲在东安市场的地摊上时，惊喜地发现了一本1947年精装、硬皮麻布封面、中英文对照版《圣经 新约全书》。掏出兜里所有的余钱，他买了下来，回到家立刻就在扉页上写下“顾准·一九六一·二·二四 北京”的字样，好像怕到手的宝贝再飞了一样。顾准临终时把这本《圣经》送给了他最小，最宝贵的朋友。这位十四岁就随妈妈去息县干校，认识了她的顾伯伯的小姑娘，那年不足二十岁。他是顾准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美的一抹光明。他把自己最宝贵的遗物留给了最宝贵的人。这个放在后面讲。

各种版本的《圣经》是顾准多年“淘宝”的重点。

早在1950年代党校时期，顾准就拜托六弟陈敏之在上海为他购买《圣经》。是时北京早已经明令禁止《圣经》摆上新华书店的书架，只因上海的基督徒数量要远多于北京，《圣经》下架的指令执

行稍晚，但敏之也没有来得及赶在下架前买到。他只得向一位老基督徒要了一本寄给五哥。是时敏之也已经是中共高级干部，至少在表面上必是无神论者，却不问缘由，毫不犹豫就为五哥去寻觅和邮寄，除了他对五哥的爱和敬，不排除他也一直受基督教影响的可能性。晚年顾准收藏了许多不同版本《圣经》，又返回头借给敏之六弟阅读，不能不说这兄弟俩除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共识，还有宗教和信仰，或者至少是宗教信仰研究方面的共识。

在农场的“窟窿”中，顾准整整修炼了两年。等他钻出窟窿时有没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得道成仙之感，可惜日记整整缺了九年，人们无法得知，真是可惜。

1962年3月，一次回京“买办”，老朋友孙冶方闻讯赶到家里，力邀摘帽右派顾准同志重新到他的经济所工作。老孙在反右中被批了“右倾”。真要较真追根寻源，这个错就得追到老顾头上。不过这件事情放到后面详述，先说眼下。眼下他早已不再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职位，全职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所长一职——翰林院一个分院的院长，没有实职，省得他不定什么时候又聒噪起来，大家脸上不好看。

可是像孙冶方这样即有科班功底又有实践经验的经济理论家，在中国又实在是太缺乏了，从他“翰林院”分院长的职位看，彼时他已经担纲国家首席经济师的角色。离又离不开，拢又拢不住，这就是中国所谓知识分子当年（也是现在）在当权者眼中的状态，而知识分子这个西来语的真正含义——“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为制衡政府而存在”却是当不得真的。

孙所长早就有心要把孤岛时期就是自己副手的顾准弄到经济所来，他了解他并且敬重他，敬重他的人品和渊博，特别是他的会计学学识，他认定中国眼下还没有发现有出其右者，是经济所急需的人才。只是顾老友一直带着右派的帽子，此话不好出口对党说。现在好了，老顾帽子摘了，他迫不及待地向党提了出来。

顾准答应下来，只要“组织”能够批准。

顾准离开清河农场就是孙冶方来看他的1962年3月。看来老孙一定事先就为此事积极奔走过，很可能从闻听他摘帽那天起就开始了。老孙这点“政治成熟度”还是有的。



《上海的早晨》油画 293×399 公分 李斌创作于 2007 年 中国美术馆收藏

1949 年 5 月解放军进驻上海，市长陈毅率领副市长潘汉年（后左 3），公安局长杨帆（后左 2）和财政/税务局长顾准（后左 1）视察上海。这几位秀才的修养与学识打动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稳定了政权变更后的上海局势。可惜不久，他们一个个被革命母亲吞噬。

目录（下）

第三部 天才之为责任 1962-1972

第十三章 苦旅驿站

1. 苦旅驿站-经济所.....310
2. 驿站长孙冶方315
3. 在还债中丰收320
4. 沙漠之井-宗井滔.....328

第十四章 波里斯与政治

1. 波里斯、政治与刍蕘之献334
2. 《会计学原理》340
3. 《粮价问题初探》 344
4. 迷失在“群星灿烂”中350

第十五章 永不“成熟”

1. 三岔口、马前卒与打手356

2. 一对荆棘鸟，两个苦命人	361
3. 死念	366
4. 人活着，而且是健康的	370
5. 一个自由而成熟的灵魂	376

第十六章 狰狞岁月

1. 在兽性与血腥面前	381
2. 人，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383
3. 我的幸运在于思想的自由.....	389
4. 所谓悲剧，就是将美撕碎了给人看.....	393
5. 汪璧之死.....	400
6. 一无所有.....	403

第十七章 新生日记

1. 天才之为责任.....	407
2. 美丽炼狱.....	413
3. 新生日记.....	421
4. “我决定不做魏连芑”	425
5. 过不去的过去.....	427
6. 还是得谈谈“猩红热”和“雅努斯”	430
7. 端倪可察（上）.....	433
8. 端倪可察（下）.....	439

第四部 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 1972-1974

第十八章 生命如醴

1. 那本书·····444
2. 即生于这个时代，就享受它·····449
3. 历尽劫波兄弟在·····456
4. 了不起的流水账·····461

第十九章 鼙鼓无声，理性争鸣

1. 历史的哲学质问·····470
2. 再来一个科学的质问·····477
3. 西奈山的上帝（上）·····485
4. 西奈山的上帝（中）·····493
5. 西奈山的上帝（下）·····499
6. 再识黑格尔·····505
7. 鼙鼓无声，理性争鸣·····514

第二十章 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

1. 元点·····522
2. 先知、此岸与彼岸·····527
3. 最远的跋涉也许是回归·····532
4. 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540
5. 他思、他言，故他在·····546

第二十一章 希腊心灵的形式

1. 人，不可以被奴役·····	550
2. 契约精神、自然与人性的和谐·····	558
3. 僭政与民主·····	563
4. 从雅典到耶路撒冷·····	570

第二十二章 籽粒落下

1. 最后的一年·····	573
2. 向死的生命实践·····	577
3. 美拯救世界·····	582

尾声 故事未终 1974-

1. 治方之痛·····	589
2. 无题·····	593
3. 一本会计学书籍对社会的威慑·····	597
4. 北枳南橘·····	599
5. 贵州故事·····	603

后记 ·····	608
-----------------	-----

第三部 天才之为责任

1962-1972

愚蠢的一致性思想是思想小人的鬼把戏，为政坛、哲学和宗教界的小人物所钦慕。伟大的灵魂则与一致性丝毫不沾边。

-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怀疑的和不抱怀疑的行为，有了第二种行为才有第一种行为。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我在探索的，是未来历史发展的道路。

- 顾准

第十三章 苦旅驿站

1. 苦旅驿站 - 经济所

“我现在还清楚记得，5月上旬那一天来所见孙冶方报到，谈话完毕后到政治经济学组，然后陈德金同志把我带到四楼31号，告诉我这是给我准备的单人办公室，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

顾准同志事隔五年第二次走进翰林院分院——中科院经济所，他何止是高兴，他是高兴坏了。这里可绝不止是个“窟窿”，分明就是个正等着“仙人”的仙人洞。能到经济所来“修炼”，这件事情他盼望了许多年，至少从1956到眼下，足足六年。

“如果有机会做研究工作的话，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并且决心穷毕生之力来做这件事。这里不仅是理论的、历史的研究，并且必须以充分的时间与严肃态度来对待实际经济问题。”^{56.3.22}

六年中发生了如此多样的事物和变幻，他观察、记录和思考了，积淀了比未亲历者多得多的直接经验和绝大多数亲历者多得多的间接经验，急需有个地方、有段时间让他归纳、分析和判断，就像收了满坑满谷庄稼的财主，当务之急是找个仓库先藏起来喘口气再慢慢数算。

没有比经济所再好的“地方”，没有比眼下更好的“时间”了。“财主”顾准心花怒放。

所里好多年轻人都知道这位六年前就差点做了他们副所长的半老头，全国会计界好生了得的学问家，因为坚辞不授官衔而离开经济所，以后命运多舛，历经磨难，“戴帽”、“摘帽”的著名大右派，现在终于还是来了。他们又好奇又兴奋，公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年轻的女研究员张纯音去看个究竟。

张纯音蹑手蹑脚躲在领导们的身后，看到令她终身难忘的一幕。她不但把这一幕立刻告诉了年轻的同事们，后来也告诉了她善良而美丽的女儿咪咪：

“你顾伯伯一进门，看到办公室这么整洁明亮，还有你孙伯伯专门嘱人为他准备的一张单人钢丝床，上面是雪白的床单和枕头，顾伯伯这个半老头兴奋得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打起挺来，乐不可支地喊叫：‘哈哈，我这个穷小子可是一步跌倒青云里啦！’”。

这是小咪咪听到的第一个关于顾伯伯的故事，以后这一老一少间还有许多故事，充满人性之光，温馨到让人潸然泪下。

“来到经济所搞会计研究，并不完全合乎我的理想。可是这到底是经济所，是六年前我企求进来、已经进来，因为不想当所长而不得不离开的‘和尚庙’或‘神圣殿堂’，几经曲折到底还是进来了，这里是研究工作的环境，它比我前四年抓时间读书的环境多么不同！”

“并不完全符合”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直接针对“会计研究”四个字。

顾准对自己“起家”的老本行——会计专业，自从二十郎当岁对师傅潘序伦说出“志不在此”四字之后，真的就是兴趣索然。他始终不是很明白，党和革命实际上最看重他，也最需要他奉献的，就是他那十八般“会计”武艺，外加财政，税务，也都是和“会计”环环相扣的招数。革命，并不缺少打天下的“职业革命家”，缺少的是坐天下的“职业管家”。所以无论是在苏南，苏北，淮海，山东还是在整风中的延安、进城后的上海，甚至一直到清河农场劳改，他的这个看家绝技都没闲着，虽然除了短短的上海两年半，基本上是“杀鸡用牛刀”。

可他就是不感兴趣。他有意识或下意识地感到，自己身处的中国这个年代根本无法施展真正“会计兵器”的威力，尤其是被熊彼得称作“资本主义实践高耸的纪念塔”的复式簿记这一杀手锏。会计这个东西太实际，太现实，太直观，用什么样的会计制度，建立什么样的会计学，在一个政治挂帅的国度，就是以“非经济手段达到经济目的”为常态的国度，会计学没有丝毫独立发展的可能。既然经济学都是政治的奴婢，会计学更是奴婢的奴婢。反正他就是对会计研究提不起精神。

现在到了经济所，孙所长明确规定他的任务是会计研究，这真是有点美中不足。要是能让他集中精力研究历史、政治哲学和经济学，那才是贾哥哥要娶林妹妹，是“从古到今，天上地下第一件称心

满意的事”了。

不过经过一百零八般磨难的顾准，这一次绝对接受了这一点小小的美中不足。这里何止是环境不同，连味道都不同哦。人们对他充满善意，没有人瞧不起他这个知名右派（或者知名摘帽右派）。这里学术氛围浓厚，即使时常有学术观点的碰撞却不影响讨论时的民主气氛。最可贵的是这里很少外面那种鸡斗狗斗的戾气，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出于内心的、相互需要的和睦气氛，真难为老孙，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大环境中是怎么调理出来的。

实际上所长孙冶方，副所长邝日安早就向全体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打了招呼，告知了他们顾准的历史——他的辉煌，他的错误，他的性格，他的过五关斩六将和走麦城，特别是他学识之渊博和专业功底之深厚，先就为他的出场亮相造足了声势。而顾准也绝未让两位所长的开场锣白敲，他日后的出色表现以及在经济所“翰林”们，尤其是青年“翰林”们中获得的尊重和爱戴，大大超过了二位所长的预期。

1960年代的中科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那可真是藏龙卧虎的蟠山。室主任正是顾准新四军时代的老上司，军财经部副部长，华东财委秘书长骆耕漠先生。此公在1950年代的“肃反”中无端受潘汉年、杨帆案牵连，被定位为“隐藏多年的内奸”却又证据不足，终因疑罪从有的“特嫌”罪，1958年被中共组织部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调开，到经济所做专职研究员。

顾准来到的第一天，两人见面，四手紧握，老骆连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们都了解你”。顾准已经多年没有听到过这样善意和温馨的话语了，竟一时语塞。

政经研究室还有位“大佬”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骨干，共产党前总书记张闻天先生。此时的张闻天居然还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头衔（也算是优待俘虏或者治病救人吧），每天带着警卫员、秘书，坐着苏制“大吉姆”上班，算得上是经济所一道风景。

还有巫宝三，就是顾准黑龙江在考察后发狠说道“我要搞数理经济学，我绝不会向涅姆钦诺夫卑躬屈膝地去取经，我会要巫宝三，关淑庄这些人来翻译介绍西方的东西，也组织人翻译西方的东西，

哪怕是搞修正主义”的那位巫宝三，曾在哈佛大学亲聆熊彼特主讲的经济理论学，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经济学理论专家，也是经济所研究员。

老朋友林里夫、狄超白就不用说了，右派归右派，还是要给个吃饭的地方，所以也都在经济所做研究员，孙所长像善待顾准一样地善待他们。

中年研究员有江明——高岗的外甥，新政权第一批留苏学生，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因为彼时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这批高干子弟不要学习政治，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不需要让苏联培养中国的政工干部。还指示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干脆就不要学文科而是学习工科，学习工业。但学习工业回来的江明也被送到经济所，学非所用，舅舅的倒台肯定是主因；还有李云，前国家建设委员会劳资局副局长，不知什么原因也从部吏的位置下调到“翰林院”来，日后在“史无前例”时期，顾准和他俩一起成了什么“桃园三结义”的反革命集团，这是后话。

年轻人有吴敬琏，民国老报人邓季惺之子，秉承了母亲开拓和叛逆的性格，敢说敢做，血气方刚；有张纯音，中国最早的心理学家，开民调先河的张耀翔与胡适、李大钊亲授弟子，中国第一位古籍与史学女教授程俊英的女儿，秉承了父母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女性特有的慈悲、温柔心肠，勤奋好学，正在积累原本就有个好底子的学养。眼下他们还都没有充分显示出难得的独立人格特征，但已经——用顾准的话来说——在萌芽。还有同属一个党支部，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的赵人伟，大学毕业分配到经济所的张曙光、林青松、周叔莲……他们二、三十岁，一派初生牛犊不怕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朝气，让我的传主重新看到二三十年前的自己。

“在这间办公室里耽的时间愈长，这里的优越性愈为明显，政经组的同志们热情地对待我，我在这间办公室里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我这个右派分子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

失去家已经很久的顾准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他又幸福得有些陶醉了，就像三年前铁佛寺水库旁“上菜棚”那些青钢一样冰冷的凌晨，刚刚站完岗，坐在灶前烤上一烤的感觉。有过商城-铁佛寺的经历，任什么艰苦环境也不会压垮他了。

从商城开始，他常常有幸福的感觉，总是感觉活着非常有意义，人非常值得活下去。他常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我热爱生活”。有时他想自己是不是很可笑，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顾准

本来就长得像唐·吉诃德，又高又瘦，行为上又和那位举世闻名的骑士相仿——骑瘦马，持长矛，与风车搏斗。可他觉得这个形象又是多么美好，之所以美好，不就在于他同时也很可笑吗？而且对取笑他的、认识不到美的价值的人有着一种由衷的同情和宽容。唐唐·吉诃德体现着中国十分缺乏，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过的精神——骑士精神，这些没有文化或稍有文化的骑士，蛮勇、狭义、忠诚、尊重妇女，以向妇女献殷勤为荣，多么可爱。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说到过，欧洲文化中骑士文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夫一妻制，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等等的渊源。” 文稿 P308。

假如人们定要认准我像唐·吉诃德，那也没什么耻辱的。对于他们人云亦云，只知道唐骑士斗风车的故事也完全可以原谅——吉诃德先生可不仅仅是无谓地和风车搏斗了一场，那只是他初做骑士的一个尝试罢了。更多关于他单枪匹马，除暴安良，浪迹天涯，浪漫到无以复加的故事，却少有阅读过全书的人去述说。“世上有个可怜的骑士……精神无畏，勇往直前” 普希金诗，“谭嗣同倒似乎有点骑士派头” 文稿 P325，能和他们比肩而立，不丢人。

为了庆祝回归经济所，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他起了个大早，到菜市场采购了许多材料并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一家人多年都没有这样欢乐的团聚了。能办这样一个家宴，一是到了 1962 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市场的货架上有东西可卖了；二是从五十元的生活费已经提高到一百五十元的工资，虽然比原来二百六十多元的九级干部工资低了许多，但在 1962 年的中国依然算得上是高薪。再丰盛的家宴，了不起也就是有鸡有鱼，十来二十元钱就能办下来。四年来他亏欠这个家太多，现在上帝给了他个还债的机会，而且并且不要他以违背自由意志为代价，他又感激，又珍惜。

三个小的欢天喜地，和爸爸一起大嚼一通，可其余四人，各有各的心思。顾准当场“向家人倾诉我的兴奋心情。我说我从此要做好我应该做的一份工作，要埋头读书，除此而外别无所求”。

母亲松了口气，但并不确信他这个儿子从此就真的“改邪归正”了，知儿莫如母，她深知他的秉性。妻子依然存着深深的恐惧，她压根就不相信他能“改邪归正”，但是寄希望于他能在“政治上成

熟”起来，把“邪”压下去，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些孩子们，至少在表面上顺应这个“正”。两个大的，嵇头十九岁了，是中国科技大学动力学系大二的学生。两年前右派父亲的“出身成分”没有影响到她考进这所由新政权刚刚创办的、培养高科技人才的著名大学，除了她多少年在101中学无出其右的优异成绩¹⁰¹同学口述，应该是哪位上层人物打过招呼的，其中不知有多少妈妈的辛苦和心酸。小米十六了，马上要考大学，目标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成绩根本不是问题，保送都绰绰有余，最担心的依然是“出身”，摘帽右派父亲和右派父亲，理论上讲相差无几。

一家八口，四对四，顾准在“小的”这一边，他像个孩子。他不操心明天的事情，明天会失去什么，后天会得到什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些都占据不了他的思维内存。“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祂尚且养活它。生命胜于饮食吗？身体胜于衣裳吗？”《圣经》马太福音 6:26。他着迷和专注的东西一样也不在“明天”、“后天”、“明年”、“后年”的范畴内，更

谈不上什么功成名就，扬名立万。顾准五十九年的生命，自始至终有一种罕见的童真，就像当年那位比他年龄小几乎一半的二十三岁商城女右派张保秀形容的——“他就像个孩子”——严重缺失患得患失之心。眼下他又无忧无虑了。

“经济所的环境，决不是在农村劳动抓业余时间来读书时那种孤陋寡闻状态，这里可以读到外面无法买到的期刊《译丛》、《动态》，可以读到学部的《外国学术资料》，可以读到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各种期刊和资料，还可以读到外文期刊，还有机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仅以政经组的学术讨论而论，在“扩大思路”(!)方面的好处，就是闭门读书时期无法想象的。”他的欣喜溢于言表。

二十三年前，旅人顾准曾经到过一处叫做“孤岛”的人生驿站，第一次邂逅孙冶方。是这座岛和这个人，容纳了从狂涛恶浪中爬上岸的他，让他心能安一安，气能喘一喘，以期再次游向更深更远且不可测的大海。二十三年后，又是这位苦难的旅人，在孤独疲惫、伤痕累累、弹尽粮绝之际走进一片绿洲——他的又一个人生驿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这里水草丰盛，棕榈成荫不说，还有原来驼队失散的伙伴们，尤其是老伙计孙冶方，他第二次做了这位苦行僧的驿站长。

经济所和孙冶方给予顾准的，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

2. 驿站长孙冶方

现在必须完整地说一说苦难旅人顾准的这位驿站长——孙冶方其人其事，虽然本书前面就说到他，后面还要大大地说到他。他是顾准生命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人物，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长顾准七岁。

1924年，萼果未满十六岁即成为无锡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第一任支部书记。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改名孙冶方。1930年毕业回国，实习革命，参与组织人力车工人运动，中共沪东区工人运动等。1931年被捕，因无证据七天后放出，但失去党的关系。在找党未果情况下参加了陈翰笙先生领导的中国农村田野调查，从此正式开始从事中国经济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冶方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持左派进步观点的有关抗日和中国经济的文章，尤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相互排斥的经济原则》为最，讴歌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1933年因南京国民党政府怀疑陈翰笙的农村调查团与李济深、蔡廷锴发动的反蒋的福建事变有关而被通缉，流亡日本两年。1935年危机过去才回到上海。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中共决定在上海重新建党，至此冶方才恢复了党籍并担任上海学联书记。彼时顾准任职员支部书记。1937年末上海沦陷，孙冶方在“孤岛”出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委员会书记，副手就是刚被清理了“顾准路线”，调离职委，来到文委的顾准。

是时冶方，不满三十岁却已久经磨练，沉着冷静，尚未结婚的他甚至被刚刚入党的小青年们称作“妈妈”^{王元化语}，可见其风度和亲和力。而顾准，二十刚出头却已才华出众，激情四溢，加上教授和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又是这帮小青年们的“偶像”。

两个年轻人成了“孤岛”上抗日文化力量的组织者，这也是两人终其一生友谊的发端。

后来他们俩，一个被延安指名道姓要求去参加整风，一个自己坚决要求去了苏南新四军苏区，后

来也参加了延整。虽然如此，两人并未在延安见面，原因是从上海绕道香港——广西——重庆急赴“圣地”的孙冶方没有赶上重庆飞延安的最后一趟飞机。再见面是在1945年底的苏北淮阴新四军军部，这一次两人合作了六年。

还是用顾准的话来看冶方：

“这6年中，因为我和他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就相识，而且他在上海是我的上级，此时是我同辈的同事，他对我完全平等相待，所以我和他的关系还特别密切一些。”

这种“特别密切一些”的私人关系甚至差点促成当时顾准所在的上海市财政局向冶方所在的华东工业部所建工厂投资。哈，这哥俩差一点“徇私”。

“他不担任任何种工作，都没有卖老资格或悻悻不平的表示”；

“这六年中我不记得孙谈起过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也没有听到他提起刘少奇的《答宋亮信》以为夸耀，他似乎自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个缺点，埋头实际业务绝口不谈理论问题。”

这样的人品，顾准是欣赏的。

“三反撤职以后我很不服气，羞见故人，从前熟人极少往来，孙冶方是少数例外之一。……但他态度鲜明地认为我确有错误，罪有应得……. 他对我的案件不知内情。”。

这，顾准是不服的。

1956年年末，被整得“饭也要没人给得吃”的顾准同学从中共中央党校毕业来到经济所。所长正是自己整整二十年前的老上司孙冶方。尽管两人二十多年前就是战友，尽管自己眼下黥面戴罪，倔强的顾准也绝不会自轻自贱。别看他已经被整得七荤八素并且喜出望外能来到他最渴望的，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经济所，他却毫无要“叩头谢恩”的意思，依然是党性严重缺乏，严重率性而为——“副所长？我不干，要做就干干净净做个研究员，其他免谈”。

性格使然，顾准对法家鼻祖《韩非》之“利害说”和“术”这两样东西从来深恶痛绝，他对人从不行“术”也绝不容“术”来委屈自己。说不当官就是不当，诸多“官人”以退为进的那套官场艺术，在他是一窍不通。

而孙冶方，对这位深知其德行的老弟，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恶谥”，更不

在乎他对自己的那副嘴脸。56年那次，就是这小子灰头土脸从党校来到经济所，却死活不肯作副所长那次，就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问题跟他这位正所长乱嚷嚷，说“孙冶方是个标准的教条主义者，硬不承认这个道理，且以为马尔萨斯理论在中国不应有地位……”^{56.12.3}云云。可他老孙最敬重老顾的，不正在于他的绝不肯人云亦云吗？

他欣赏他永远保持独立人格的特质和永远横溢的才华，多少年人前人后管他叫“倒运的大才子”。将他弄到经济所，虽谈不上寒门立雪却也煞费苦心，是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埋下头来，1957年初顾准开始动手撰写《试论》。

在酝酿阶段，他拿着《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作用的一段论证向孙冶方“请教”。这段论证，用顾准的原话说，对孙冶方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

“我拿这段论证去请教孙冶方时，他似乎很‘震动’……也许这段论证他从前没有想过，此时在苏共20大逆流的影响下，抽芽盟长，蠢蠢欲动，（论证）对他起了一种‘惊蛰’的作用。”

就冲着“惊”的这一“蛰”，顾准就没有辜负孙老哥。

从此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包括顾准已经调去院部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期间，两人接触频繁，谈话主题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同时对骆耕漠等经济学家抱住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某些论点不放大加非议，虽然三人是非常要好的战友和朋友，可学术上的分歧是绝不调和的。其间孙冶方还趁访苏其间直接就马克思的这段论证向前苏联大经济学家索包里请教，得到索包里的认同，而此时正是苏联“老大哥”慢慢向“修正主义”右转的开始。

“（我们两人）炮制出来的毒草，在我是《试论》，在孙冶方是《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推动我写《试论》的实际经济问题是农业问题，尤其是几十年来苏联农业停滞不前这一可惊的教训。孙冶方的议论中心则是固定资产问题，他对‘只准复旧，不准革新’这一可怪事实（颇有微词）……。”

这就是1957年顾孙两人先后发表的三篇著名反党文章——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孙冶方的《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正是这些文章为日后“孙顾反革命思想联盟”奠了基。

1962年3月，劳改了整整四年的顾准第二次回到经济所，孙冶方在后台的奔走斡旋他一概不知，

老孙也懒得跟他说起，反正，如骆耕漠先生说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们都了解你”，将来大家会不会又为学术观点的不同吵吵嚷嚷、磕磕碰碰那先不用管它。这十几年咱们个个都焦头烂额，遍体鳞伤，今天起总算能平平安安再次相聚一起做学问了，这才是最好，最重要的。

可不是吗？

老骆，中共老财经专家，新政权“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受“潘杨反革命集团”案牵连，仅仅因为不经意给某位被怀疑者发放了赴香港通行证而被冠以“联合通敌”嫌疑，从“阁老”高位调入经济所，做了个无官一身轻的“翰林”；

老孙，中共科班财经专家，新政权“户部”的一个分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却对“赵姨娘”般不可信任的国家统计数据大加非议，1957年即被授予“右倾”桂冠，不再适宜兼职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职务，纯粹做了经济所所长。1957年，他在被顾准“惊蛰”后，两人又一起大唱“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遵循价值规律”的刺耳反调，引起一干“计划经济主义者”同志们巨大的反感。

其实顾准“惊”不“惊”治方都不会再“蛰”了，老顾来了，老孙惊蛰动静更大罢了。

1958年他率团访苏，直接用俄语对老朋友，苏联统计局副局长索波里说“大跃进是头脑发热的结果，把最好的原材料变成废铁，把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变为废品”，被懂俄语的随从同志揭发；1959年他又一次向来访的波兰经济科学院院长明兹批评大跃进，又一次被揭发，成为他几年后他“里通外国”，“叛国投敌”的罪证；同年，由他签发的经济所两名年轻研究员——董谦、王绍飞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将人民公社大食堂的现况和将会发生的问题向中央提交了详细阐述和分析，明确提出“迄今为止尚未有一种经济组织是完善无缺的”，拂了正在兴头上的极峰面子，逆了龙鳞，令龙颜大怒；1960年他赴农村，包括他的家乡无锡玉祁镇调研，采集了大批“一大二公”共产风负面数据上报中央；1961年他在上海公开肯定美国的会计制度优于我国亦步亦趋跟在苏联后面沿用的苏式会计制度；同年6月，在刘少奇“要按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的提法鼓舞下，孙冶方向中共中央递上了一份“内部报告”，提出国家财经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责、权、利以及它们同国家的关系，应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在原有的生产方向和范围内

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不必过问。企业应通过经济核算，按价值规律办事，以图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利，以图社会发展之利。同年，他提出“最大、最小”理论，就是企业要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1962年他更开始全面批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将它们称作“主观唯意志论的错误”。事前的提醒、反对、抗争，事后的反思、分析、批评，所有这些都和以政治手段管理经济的“政治挂帅”唱反调，令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失误的执政者老羞成怒。

此时多少人都已随着庐山的“雷霆之怒”，随着国家主席都受到申饬而噤若寒蝉了，他还是不闭嘴，成了离右派仅一步之遥的、该杀的报丧信使。

这就是1962年再一次走进经济所时顾准所面临的局面、老友、老上司和老朋友们。

他这次一进所，孙治方就搬出所长的款儿，明令禁止他涉足会计研究以外的领域，是为“防患于未然”。孙所长太了解这位顾同志了——学术研究能力绝对第一等，惹祸的能力也是第一等，不压住他一点，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把天戳一个窟窿，那时再补救就很麻烦了。经济所早就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美誉在中央风传，现在自己又招降纳叛了这么一只“大王八”，可不能让他随随便便就上了人家的砧板。

刚刚经过三年大饥荒的中国眼下正处在短暂的“不折腾”时期。老实讲，也折腾不起了。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极峰无法回避责任，总算是道出“第一责任人应当是我”的话，看上去痛心疾首，实际上是“虚悬起真正的政治责任”王聿文《“七千人大会”五十周年的反思》，并且，又一次提出类似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让憋着气的人出气”的伟大号召，将民间的怨气一口气推向下面的省、地委。

下面，当然是“上有好者，下必甚之”。

各级干部争相效法极峰手笔，虚担起政治责任来，其结果是虚悬在先，推卸在后，不追实责，不究实责，不担实责，不分析，不反思，能淡化多少就淡化多少，政治伦理丧失到零。这一次以强行实现个人重构社会的政治抱负为目而上演的、以饿死三千多万人口为代价的政治游戏，无论从哪种意义

上讲，都属于两千年前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那本流芳百世的《沉思录》中所定义的“被快乐所压倒，被冲动所驱使，更加放纵也更加怯懦”的罪愆。假如将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海外殖民，贩卖奴隶，驱逐杀戮土著和使用童工”等，以经济为目的行为称作“第一种罪愆”，这种行为就是“第二种罪愆”。

现在游戏结束了，游戏者却也束手无策到了极处，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面子”，这一次算是丢尽了。对国人好办，一句“三年自然灾害”就过去了，直到今天也还说得过去；可在西方人和俄国人面前怎么说得圆，尤其是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家面前？

在这样的环境中，孙冶方、顾准之类有了一些话语权，因为他们是那些在事先就看到和道出了这个游戏弊病的人，要想不重蹈覆辙，人们就不得不耐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

“来所之初，正值所内农村调查、广州会议、包产到户、自由市场这股黑风弥漫之时，有关这类的传达和会议，组里往往不通知我参加，我警惕我是摘帽右派，决不可再犯错误，这类活动也一概回避。我抱着 1957 年划为右派时的信念，不想翻案，埋头工作，决心在会计研究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他这次真的下决心要学“乖”。游戏虽然结束了，可游戏者还在，谁知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游戏开场、什么新的游戏规则出台？

集经验和教训在胸，早在 1960 年，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眼看着苏联那一套搞不下去，中国又没有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而一个没有经济学的国家能维持自然经济（也就是顾准所说的“餬口经济”）就不错了，什么兴盛，什么强大，都是痴人说梦。

1958 年的“发昏”，1959 年的疯狂以及紧随其后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不就是在毫无经济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吗？他也早就看出来，各地在无理论指导下劳民伤财作出来的、堆山填海般造出、毫无可信性的“赵姨娘”式假数据^{孙冶方语}，误导了不懂、不甚懂或稍懂经济学的当权者，令他们生出盲目和不正常的激情，然后又反过来作用于各地，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糟践国计，荼毒民生，贻害无穷。

他也曾试着去理解这个体制，但很快就认识到它与人的天性，普世性、普适性以及基本的经济规律都是相悖的。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眼下的孙冶方急需各路经济学家——宏观、微观，金融、货币、银行，会计，管理，数理，计量，统计、国际，市场……协同作战，制定体制，构建操作系统，把中国经济羊圈的这个大窟窿补起来。

作为曾经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面对全国一团糟的“政治挂帅”后果，他发誓要纠正国家这种“所有事务都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状。会计学，管他是资本的奴隶也好，是资本家的奴婢也好，反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国眼下急需建立自己的会计体系，包括理论和操作方法，那一套仿苏的斯大林体制下的统计、会计制度害死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顾准这样出色的会计专业人才当然是最理想的精兵强将。

就这样，他成了孙冶方“招降纳叛”的降将叛卒，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我地地道道地充当了张孙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和打手”。顾先生很难得地谦虚了一次，将自己投名到别人的麾下，且担任的是贱役——“马前卒”和“打手”。真可谓“士为知己者死”。

孙冶方，顾准加上张闻天上演的这场“全武行”眼下还没有正式响起开场锣，离重头戏的上演还有好几年呢。所谓“马前卒”，“打手”什么的，都是他在七年后的1969年“历史交代”中写下的，彼时张闻天早已被“彻底打倒”，老哥孙冶方正坐在北京秦城监狱的大牢里，什么帮凶，马前卒，打手，一丘之貉等等，都是那时流行语，当不得真的。

眼下，1962年刚刚回到经济所的研究员顾准先生，绝不是想当什么劳什子马前卒和打手，除了那个终极追求，他的当务之急是——“还债”。

3. 在还债中丰收

他确实需要还债，且刻不容缓——

“1958年以后我积欠了家庭一大笔债，此后我要想法还债。我的工资从五十元增加到一百五十元，去沪调查，耗费较大，从此以后，力事撙节。按照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我认为每月一百五十元不够还债。我把我自己在30年代的经验搬到60年代，要设法用‘笔耕’来还债。”

还债过程本身就是债务人热爱、热衷之事，当然会造就一位幸福、快乐、心甘情愿的还债人。他又一次感到了幸福。

会计研究，这是顾准“拿了俸禄就得干活”的本职工作。孙所长可不是潘序伦，人家可不听你什么“志”在不在的废话，你得老老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有成果，那是“职务发明”，孙所长会表扬，没成果那就不好看了。不过孙所长百分之百知道只要你用心做，一定能做出成果，万一做不好，那一定是分了心。孙所长最怕的就是顾研究员“分心”，那可就不仅仅是“工作上的损失”了，那会是巨大的危险。

至于业余时间嘛，我们可以商量着办。老孙知道顾家孩子多，顾准被停发工资整整四年，生活上的拮据可想而知。彼时每个单位都是可以“民主评议”申请补助金的，可你让顾准这样的人去申请补助，无疑是一种远超经济拮据的痛苦，他也不可能去做。细心体贴的孙冶方立刻着手帮助他联系商务印书馆，约好翻译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出版社是老孙帮着联系的，起念翻译这本书可是顾准自己的主意：

“我还埋头读了几本这里那里借来的、前所未见的经济、历史著作，译熊彼得的书，就是这最初的一二个月中动的念头。”读者，您现在知道了吧？这本世界名著的第一个中译者是顾准呢。

是时顾准的英文程度，远没有达到像他后来那样能在各个学科之间自由地穿梭、欣赏、驻足流连或抽身就走的程度，还只是熟悉于会计学和经济学类术语，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对于他还是艰涩的。就是在翻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过程中，他下了笨功夫，英语程度有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他找来熊彼得最有代表性的书来读——关于景气循环（亦称商业周期）理论的《景气循环论》，关于企业创新理论的《经济发展论》（“企业”和“企业家”两个名词即由熊氏首创）以及他将

要翻译的关于菁英和议会制民主理论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动手前，顾准先把他初步掌握的关于熊彼得的知识写成一篇文章，刊登在社会科学部的《动态》杂志上，介绍作者的生平和著作，然后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译完了全书并交给商务印书馆。其间，他的译稿曾被出版社退稿，这令他“不胜汗颜”，也促使他发奋攻克语言关隘，不仅仅是一遍遍深读熊氏原著，连带着把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和男性经济学家们抗衡的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以及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主要著作也读了、译了。

除此之外老孙还四处为他联系笔耕，并亲自出马，放下翰林院分院长的面子，为千字多少元和出版社讨价还价。这真是雪中送炭。

这种“八小时以外”的、还债式的工作对于顾准不啻为一次巨量的充电加享受：

第一，使他从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经济历史学各个方面获得了大量新知，新观点，新概念，新观念；

第二，令他的英文水平稳稳地、足足地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为日后顺畅翻译、理解和吸收琼·罗宾逊夫人和约翰·穆勒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二位是他新结识的朋友，“一个人”的探索、攀登路上的旅伴、山友。“至于译书之后，阅读外文文献的速度大大提高，当然更为明显”。那是当然，用心地翻译好一本书相等于一次再创作，更何况是这么好的书。翻译好一本好书像是在巴别塔上遇故知，何等有幸。

第三，拿到一笔可观的译稿费，可观到老孙都眼红——“嘿，你这得有多少稿费啊？”“有多少我也不能送你一毛钱呵，老哥——多少我都得交给掌柜的秀，你又不是不知道。”

熊彼得、罗宾逊夫人和约翰·穆勒，还有英国经济学大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及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对顾准日后思想形成的影响至关重大。

还有一个西方“资产阶级作家”的著作，这里不能确定顾准是否读过他，因为在他所有面世的文字里对此人一字未提。但他不知道，不认识此人以及他的经济、政治、哲学观点、思想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此人就是奥地利裔英国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哈耶克先生最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1962年4月首次在中国出版了由滕文藻、朱宗风翻译的中文本，封面标明是“内部读物”，但并没有“绝密”或“秘密”的字样，它的保密程度甚至连有名的“中国灰皮书”^{见百度注解}的程度都没有达到（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就是灰皮书中一本）。摘帽右派顾准肯定没有资格读到它，但孙冶方却有足够的资格和身份，不但能够读它，而且能够拥有它。此书和五年前的《新阶级》一样，是印数很少的高级干部读物（眼下已成文物，一本“按计划免费分配”的《通往奴役之路》在“自由经济市场”上的叫价已经高达数千元）。顾准没有读过哈耶克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第一，中国最早的两位市场经济倡导人——顾准、孙冶方都是经济学家，彼时既然出版哈耶克，不准顾准看还说得过去，不准孙冶方看怎么可能？巴巴地用公帑译出来、印出来，不给经济学家们看难不成要给梅兰芳、庄则栋们看？

第二，按照孙冶方的性格，他看过后当做党和国家的头等机密，双唇紧闭，滴水不漏给挚友——摘帽右派顾准，同样是不可能的。这两人因为政治和经济理念的一致，在所有知识上“分享”的欲望比和其他什么人都大，交流和沟通也比和其他什么人都多。文革中连一起扫厕所的时间都不肯放过交谈的这两位，说一方读过哈耶克而另一方一字不知，或者两人都没有读过，逻辑上不通。

第三，顾准自己的文字中有些“马脚”不慎露了出来：

“既然在堕落的深渊中激发起来了新生之念，读书所得的结果了必以前不同了。从前，不论读什么，都是愈读愈“修”，此后，不论读什么，哪怕读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著作，总多多少少引起了趋向改悔的‘重新检查自己立场’的那种效果。”

谁是“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熊彼得？罗宾逊夫人？约翰·穆勒？还是约瑟夫·汤因比？沃尔特·罗斯托？都不是！“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就是——哈耶克。顾准读过哈耶克，但是他不能说起，甚至不能记录在不示人的文字里，怕的，就是给借这本书给他看的人惹事。日后很多人将顾准誉为中国的哈耶克，就因为1957年那一篇让他成为右派、极右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实际上1957年的《试论》比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温柔十二万分。

哈耶克的《之路》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投出的都是直指命门的飞镖——计划经济吗？那是个会

把你的一生，从孕育、出生、教育、职业、体格到娱乐、婚姻、爱好、交往、思维（假如还有的话）、衰老、死亡都一手操控起来的“利维坦”怪物，它是你的上帝，你只能是它的奴隶；而顾准的《试论》则是小心翼翼，苦口婆心的“劝喻篇”——同志们哪，中国不是桃花源，商品、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经济核算、价值、价格、价值规律……这一切的一切都事关民生，你现在就废了它，国家怎生管理，苍生怎生活命，兀的不苦杀人也么哥！

《试论》和《奴役》相比真是太温柔了。可即使这样也没有影响他成为极右分子。

先放下哈耶克，有一位哲学和经济学先哲对顾准的影响不容忽视，他就是德国政治哲学家马克斯·韦伯。

从顾准去世前一年写出的《关于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提出对“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追问看，两人在政治、哲学、历史和经济观点上都有明显相似的推理轨迹和相同的渊源。但是遍寻顾准文字，都没有发现这位德国人的踪影。

一位最早探索顾准的学者推断，顾准是在翻译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过程中，抓住了熊彼得引了的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指该书第二章《社会学家马克思》中的一个注释——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著名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顺藤摸瓜，紧紧抓住不放，往前推，推到了和韦伯距离不远的地方。果真如此，那顾准顺藤摸瓜，举一反三的求知功夫真是太神了。不过还有另一种更大的可能——他无权看这些“真神”们的中译本，可是他能看到“真神”们的“真身”——原文本，因为他紧挨着一口“沙漠之井”，这口井对他精神的滋养堪比商城时候胡萝卜对他生命的保全。这个将在下一节详细讲述。

在回到经济所的几年中，他阅读了大量这些人们的著作，它们有些已经被译成中文，但大部分他可能是读的英文原文，有些他顺手就译了出来。这些人有些在党校时期他就结识了，有些则是在经济所这块绿洲中新结识的，不过说到稔熟，说到深入，说到融会贯通，则肯定是在经济所才做到的。

在这个过程中，顾准的精神和思想发生了极大的飞跃，他们给他的冲击太大了，从前思考过却无法形成观念，观点和系统的东西，在他们却是捋得一清二楚，这给了顾准极大的自信和慰藉——在

跨过了雪线的攀登上，我不是孤独的，前驱们留下的绳索和冰镐触手可及，只可惜他们的目光从未注视过东方这座最险峻，最高耸的处女峰，那就让我来吧。

那么好，马克斯·韦伯已经一劳永逸地为所有和顾准一样想要攀登政治哲学高峰的人们确立了一项严格的要求——

“任何人，要想成为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范围广泛的比较知识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意味着去获得对文明进行比较的知识，不仅要知道现代文明，还要知道中世纪和古代文明，不仅要知道西方文明，还要知道近东文明和远东文明。那还意味着，通过保持与种种领域的专门科学的接触，而不断更新那种知识。在他看来，要是不这么做，就没有权力称自己是个经验主义者。”

而顾准，在生命近五十年的长度上已经以非线性的进程从一名理想主义者变为了一名经验主义者。变化从1952年接触数学和逻辑学开始，拐点在1956年党校时期。当他正式接触马克斯·韦伯之时，已经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经验主义者了。

既然如此，他就不得不达到韦伯的这项看上去那么高不可攀的标准。

他是没有任何学历的，所有知识的获取都是靠的自学，没有导师告诉他哪条路是捷径，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必去浪费时间。然而他如有天助神引，在那样的年代和那样的条件下接触、读到了许许多多有志于此的人几十年后才可能知道、读到的东西，在这片中西方文明交汇、化融通差不多为零的土地上向马克斯·韦伯定下的那条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度目标发起了冲锋。

这也是他除了“摘帽大右派”的身份之外，另一处在经济所特别引人注目之处。

经济所藏龙卧虎，老、中、青几乎全是科班且是名科班出身。比如日后成为“张闻天、孙冶方、顾准反党三家村”的村民中，张、孙二位都出身于赫赫有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张村民在进入中大前就曾是如今的上海海洋大学和南京海河大学的学生，并曾到日本东京和美国旧金山游学，从苏联回国前就是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助理教授、翻译以及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孙村民则十七岁就赴莫斯科中大深造，和著名的陈绍禹（王明）同学同级同班，因为俄文好，没毕业就做了教员，还作过由法国旅欧支部转来莫斯科旅莫支部的邓小平同学的俄文辅导员，几十年后仍被大他四岁的邓同学唤作“老师”。身边的小辈们也一个个出身名门，吴敬琏、周叔莲——复旦本科生，赵人伟——北大本科

生，张纯音——上海交大本科生，张曙光——中科院研究生……他们个个都有“响当当硬邦邦”的文聘在手，这个形容词在1960年代的中国非常流行，一般是用来形容“血属”——你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经济所更看重的是“地属”——你出身在什么地方。只有顾准，两“属”都既不响当当也不硬邦邦，“血属”就甭提了，“地属”更没法说——没有任何学历，没有任何文聘。

可这却成了他在经济所备受尊敬的要因——一位自学成才者，其知识的渊博和专业的精准能达到这样的地步，至少在经济所，找不到第二个。

1956年初进经济所，顾准曾对这座翰林院心存敬畏之念，他还“怕教授”，全然忘记了自己十九岁就曾站在三所大学的讲台上执鞭作过教授，不免有些“鲁智深怕蟑螂”式的滑稽。

“1956年初进经济所时对于‘神圣殿堂’的敬畏之念和‘怕教授’的想法，1962年以后也在逐步减少，因为这几年，即使在农村劳动时期我也在积累文献知识，而1962年再度进所以以后，即使大部分时间埋头专搞会计，我也以相当时间来积累文献知识和提高外文水平。就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懂得‘教授们’唯一可以炫耀自己的也不过是这些东西，至于把这些东西作为工具，运用这些工具来解决当前的和当代的问题，那他们不过是‘书生’。”

在和西方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泰斗们结识和稔熟后，顾准自信心大增，以致他又开始“睥睨”了。有泰斗们站在身后，这一次他睥睨的是神圣殿堂的教授们。结识和稔熟泰斗，他可全靠的是阅读和翻译、理解和融汇他们，这个过程不但使他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顺便还拿到一笔不菲的稿费，可以用于“还债”——还四年来他对家庭亏欠的债，还他大量买书拉下亏空的债，还可以用于他将来无尽的“买书欲”以及“按照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安排生活所需要的预支或者透支，比如手头宽裕一点就想喝点咖啡之类的小毛病。

职业即兴趣，人生一大乐也。

老孙的苦心、善意、善解人意他都接受了，情都领了，无以为报，只有做好他交下的革命工作——会计研究，译好大师们的著作，给经济所争光，给孙所长争脸。

他同时翻译《美国总会计师制度》。

这个东西可不是孙所长交下来的任务而是从人民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会计学书籍中偶然发现

的，他如获至宝，立刻动手翻译，谁也不请示，谁也不汇报。

其实老孙早就知道这个东西，却也早就知道它是个雷。1961年10月，孙冶方在上海和南京作的《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学术报告就提到了它，并依此公开肯定美国的会计制度优于苏联会计制度。

美国的总会计师制度截然不同于中国眼下沿用的苏式会计制度，从政治挂帅的角度说更是水火不容——一个是参与企业经营全过程，包括决策和战略目标制定的总会计师责任制度，一个是全盘秉承苏联1940-50年代那一套“服务于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流动资金的要求，因而大大地限制了企业会计本来可以发挥的多方面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企业经济管理和会计实践上的要求”的简单资金核算制度。二者从术语、概念、定义、涵义都大相径庭，说白了，一个为资本和资本家、为经济服务，一个为政治和统治服务，假如把前者比作“管家”，后者则是“奴婢”，且各为其主。

到了疯狂大跃进的1958-59年，这套苏式制度也跟不上趟，也要大跃进了——数据造假，统计造假，账目造假，“花账”翻新，全中国的账务乱作一团。疯狂过去，1961-62年又要全面复归，回到苏联的老套路上来。和所有的中国式“翻烧饼”一样，好不容易刚刚翻过来的“烧饼”谁要是在这档口说“糊了，不好，扔掉吧！”，那百分之百是自找没趣，自讨苦吃。是时的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就说过，“谁要在根本上反对这套现行制度的话，谁就得准备戴上右派帽子”。

这个当口提美国总会计师制度，老孙稍稍碰了碰，就听到了不详的雷声，顾准怎么可能不知道分寸利害？

他的翻译工作绝大部分用的是业余时间，所以虽是“未经领导同意，直接向出版投稿”却也无“利用职务发明”之嫌，再说彼时对此也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但这不是他“越过”孙冶方的原因。恰恰是他明知这件事的风险，也明知老孙在这上面趟过“雷”，触过“霉头”，否则他拿到这个东西的当天就会兴高采烈地跑去要求和老朋友孙冶方分享，就像1957年拿他的《试论》去“惊蛰”他一样。他清楚地知道风险却不愿让老孙分担，情愿所有的雷都炸在自己头上，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

其实老孙“政治”上的成熟度也很差。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起，到上海工运，到流亡日本，到孤岛时期，新四军时期，到新政权时期，也是磕磕绊绊，踉踉跄跄，九死一生——莫斯科时期，年仅十九岁的孙冶方曾因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事件被他的中国同学要求联共中央处决，只因为联共中央也厌恶了中国人的这一套内斗，加上格伯乌忙于自己的“肃托”，根本顾不上中国同志的“锄奸”热情，他才留下性命，背着个“严重警告”回了国。

孙冶方也是个率性书生，稍微比顾准“成熟”一点，不多，将将够不主动去碰《美国总会计师制度》这类地雷的水平。可这也正是老孙和老顾不同之处，一个是知道不能为，至少暂时不去为，绕道而行，伺机而为（但也不一定，后面再讲）；一个是明知不能为，只要合上了内心呼唤着的那个拍节就一定要为，死不足惜，不可不为，就像他日后在自己文稿中引用的、他推崇的熊彼得次引的欧洲航海世家门侧的题词：“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文稿 P345 一模一样。

“我确是日以继夜地干——8月份在海拉尔休假，我也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我的外文水平本来不够译这本书（指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 著者注），译稿反复修改了二三次，可是我硬着头皮干下去……《美国总会计师制度》和熊彼得书译稿都曾退回修改，修改中看到自己误译之处，‘不胜汗颜’。”

可是他哪里知道，《美国总会计师制度》一书的退稿何止是因为“误译”被退稿。此译稿被不知深浅的顾准绕过孙所长莽撞地直接投稿给《译丛》杂志后，立刻被革命警惕性很高的杂志编辑部看出端倪，抵制不发，并迅速反馈、退稿到经济所。全靠孙冶方事后的“直接干涉”和“全力包庇”，搬出他身份、地位、名望、权威等等诸般兵器，此文才得以在这份最有影响力的译文刊物上发表。当然所有的政治责任老孙都得担下，还得悄悄的，不能让这个难缠的译者知道，怕他不依不饶打上编辑部的门（他很可能做得出来）去惹麻烦。

此事全部过节，顾准竟全然不知，直到好几年后的文革中被革命群众揭发出来。

“《美国总会计师制度》一文译稿是我直接交给《译丛》编辑部的，事前事后都未告诉孙冶方。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揭露，《译丛》编辑部抵制了这篇译稿，只在孙冶方直接干涉下才刊载出来，此事我完全不知道。”

你看这就是孙冶方，这就是顾准——男人的肩膀，男人的性格，男人的作为。这才是真正能够

称得上浪漫、友谊和忠诚的故事。

顾准在“还债”中获得了大丰收，首先是经济上的，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他这位“被历史太青睐者”^{易中天语}在不可能的时间、不可能的地点、不可能的环境下做了一件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件正确的、有意义的事情。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他在经济所的几年中至少翻译和阅读了上世纪初英国“剑桥圈”的政治、哲学、经济学大师们，例如罗素、凯恩斯、维特根斯坦、罗宾逊夫人、哈耶克的大量著作。

顾准这位幸运的债务人，拾穗者，他可真是心满意足。怪不得文革初起，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贴他的大字报——“顾准为什么心情舒畅？”

他的舒畅你们不懂啊，年青人。

4. 沙漠之井——宗井滔

现在要来讲讲顾准身边那口“沙漠之井”的故事了。

中国有顾准，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如果说商城时期，在人人都饿得死去活来之际，是一位名叫蔡璋的年轻人使顾准免于成为饿殍，那么他二进经济所时期遇见的这个人则是给他提供精神食粮的“蔡璋”，他不仅维持他没有“饿”死——因为没有新知识而无法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熵量，还使他的精神机体营养充足，比起彼时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健康和强壮不知多少倍。

“这里可以读到外面无法买到的期刊《译丛》、《动态》，可以读到学部的《外国学术资料》，可以读到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各种期刊和资料，还可以读到外文期刊……”

二进经济所的顾准兴奋得几乎要欢呼。

“这里”，当然是中国科学院——社会哲学部——经济研究所，顾准的理想国，这是可以确认的。不过假如能再聚焦一点就更清楚了：你会看到一片净土，一座小楼，一阁书香，这才是他理想国中的理想国。这里就是经济所图书馆，那时是、迄今依然是全中国收藏中外经济类图书最多，最丰富的图书馆。

如果把经济所比作沙漠中的驿站，把孙冶方比作驿站长，那么这个人就是沙漠绿洲中一口甘水井。这口井默默地、汨汨不绝地把所有方向落下的、淌来的，渗出的，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水源收集、积攒起来。撒哈拉沙漠中这一泓甘水滋润了旅人干涸的双唇，令他从心到身倍感安慰。

这口沙漠之井就是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先生。

宗井滔，1909年生于察哈尔（张家口）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怀安县劝学所所长。劝学所始设于清光绪32年，为废科举开新学后各厅、州、县全境学务之总汇。所以宗老先生实际上就是怀安县的教育局长。老先生善风琴，喜藏书，唯一的儿子宗井滔在父风熏陶下将这两样都继承了下来，只是条件有限——风琴改作了口琴，为自己藏书改作了为别人藏书。

1920年代中期，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少年宗井滔不甘心在家乡闭塞的环境下终其一生，来到北京作了“北漂”。九十年前的“北漂”和眼下北京的“北漂”们想来境况相似，也许生活上的艰苦可能还要严酷一些——没有来自家庭的任何资助不说，还多是被家庭责难和阻拦的。

多年后宗井滔的第三子，年近七十的宗丕钊先生还记得幼年时有一天爸爸在街上碰见的一位伯伯，两人都激动得不得了。事后爸爸告诉丕钊，他当年到了北平没钱租房子住，这个伯伯就让他住在自己新婚的蜗居里，小夫妻俩睡在床上，他就在一旁打地铺。你想这得多么深的情谊才做得到。

宗井滔完全靠自学达到了大学水准，这和顾准有得一比。有时穷得实在连饭都吃不上了，他就去给人“替考”。那时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有的监考也不严格，结果是人家上了名牌大学，他还是个穷“北漂”。他不羡慕，拿到钱吃饱了饭，心里很平衡。少年井滔追求的是能在北京不间断地学到新知识，有真本事报效这个又穷又苦却生养了自己的国家。文凭不文凭的就不是个事儿，他一辈子的学历就是个初中毕业生。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首任院长蔡元培。中研院陆续在南京、上海、北平设立了十个研究所，其中就包括设在北平，由陶孟和任所长的社会科学研究所。1930年初，宗井滔被社科所录用为办事员。再也没有哪个职业比它更对他胃口的了。他在社科所先后作过资料员、管理员、打字员以及陶孟和先生的秘书。

毕竟因为没有一份高等学历，宗井滔始终没有被任命为研究员。但是他靠自学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加上足够的勤奋，在大学者——胡适、傅斯年、陶孟和、汤象龙、巫宝三……成群的中研院，他毫无局促，游刃有余。单单外语一项，他就懂得好几门，英语就不用说了，还能操德、法、日语。到了新政权的 1950 年代中他还自学了俄语。至于图书馆学一门学问，他几乎粗通所有能够对中国输出图书国家的语言。

1937 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作为直属总统府的中央研究院早在 9.18 事变后就已经开始应变，化整为零，以所为建制，陆续迁徙大西南。社会科学院辗转武汉、桂林、越南海防、昆明、重庆，最后在距离重庆三百公里的宜宾古镇李庄与史语所、体质人类学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汇合。1940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的大牌子在李庄又堂堂正正挂了起来。

宗井滔不爱说话，是个茶壶型性格的人——对生活的所有热情都埋在肚子里。社会所当时设在李庄石崖湾一户大宅院里，主人名叫张迎恭，后来成了井滔的岳父大人。那时李庄的姑娘们嫁给中研院的青年先生“些”（四川话——们）是件很时髦的事情，中研院和后来的中科院也因此有了一群“李庄姑爷”，这帮姑爷们日后许多都成了学界泰斗。

“我父亲有两兄弟，六个姊妹。宗井滔是我六姑爷，是察哈尔人，当时三十五六岁，在社会所打字，把白纸塞进去字就出来了。” 岱峻 《发现李庄》

这是宗井滔夫人张润晖的侄儿张执中老人的回忆。他还记得爷爷的院子西边是一溜厢房，姑父就坐在那里打字，和姑妈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到抗战胜利，中研院离开李庄的 1946 年，他们已经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就是如今将近七十的宗丕钊。丕钊刚刚四十天，宗家一家五口就从重庆坐飞机回到了南京。这一次不是迁徙而是凯旋。

再后来就是南渡北归、大江大海的 1949。中研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成建制地去了台湾，却挟走了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朱家骅、李先闻九位院士，另外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十二位院士去了美国，其余五十多位留在大陆，其中就有陶孟和先生。陶所长没有走，宗管理员当然不会走。1952 年社会所由南京迁往北京，第二年

更名为经济所。陶孟和做了新政权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宗井滔做了新成立的经济所图书馆的馆长。

中研院运走了中央图书馆的大部分古本、孤本、善本精品书籍，史语所和社科所的书没有带走，但已杯盘狼藉。百废待兴的经济所图书馆，人员编制却只有三个，除了馆长宗井滔，只有一个搞外文分编的年青姑娘，一个搞借、还整理的小伙子。可到了顾准二进经济所的1962年，也就是十年出点头的时间，这个图书馆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类图书藏书量的翘楚。到宗井滔退休的1987年，馆藏图书已达75万余册，其中善本1万余册，特藏1500余卷，珍贵档案资料数千册，是国内毫无争议最大、最全的经济科学专业图书馆。

宗井滔在经济所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上坐了整整三十八年。假如不拿政权的兴替去切割学者的学术生涯，那么加上他在中研院做资料员、管理员的年头，还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一辈子和书打交道，以书为业的他十分热爱图书馆事业，尤其迷恋经济类图书。他不但能阅读而且读得懂它们，不但熟悉图书，也熟悉需要这些图书的人，不但熟悉这些人，还知道他们的研究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总而言之，他了解学术的发展方向和历史的延续过程，提前就为研究人员准备好“嫁衣裳”，让他们顺顺利利，体体面面地“嫁”过去。

这就太难能可贵了。

比如张闻天正在研究什么，可能会向他借什么书，严中平、孙冶方正在研究什么，会向他借什么书，巫宝三，顾准正在研究什么，会向他借什么书……他都胸有成竹。等到他们来到图书馆，往往大吃一惊——“老伙计，你怎么会知道我需要的正是这本书？”

张闻天和宗井滔的关系特别好，他的夫人刘英也因此认识了当年的李庄姑娘张润晖。小丕钊就是从父母交谈中知道了“张闻天”和“刘英”两个名字，但直到很久以后，十四五岁的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的字眼，才知道这位老伯伯是什么人。

宗井滔对待顾准也是一样，他要什么书，想什么书他都知道。井滔知道此人嗜书如命，对书的需求度比任何人都高，他不能让他“饿”着。只要有一丝办法，他就要上天入地给他弄回来。只可惜他从未在孩子们面前提到过顾准，即使文革前，在顾准与张闻天、孙冶方已经被定性为中国经济界“三

家村”的时候，他也没有跟孩子们提到过他，所以直到 1990 年代，宗家兄妹才知道爸爸的工作单位还出了这么个奇人。

学人们管他们的这位图书馆长叫“活字典”。宗井滔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你叫得出大概的书名，他根本不用看馆目手册，马上就能告诉你在哪个室，什么方位，哪一架，哪一排，整个就是一个活目录。你想要的外文书籍，只要能把著者、年份、内容大致说出个一二三，他就知道此书的全部精确信息，哪个国家，哪个语种，那里可以采购，哪里可以订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且马上就千方百计给你弄回来。六十多年后，那位当年管外文分编的姑娘也已垂垂老矣，说到宗馆长的“治馆”之道，她说他“不靠制度”靠的是“记忆”和“厚道”。了不起呵，一个“国民政府中研院”留用人员，哪敢谈什么建立“制度”，有对知识和知识人的尊重、厚道，加上超强的记忆，他已经太了不起了。

可是除了家人，有谁知道为了做到这一切他花了多么大的功夫？

小丕钊记得最清楚的事情，就是爸爸每天晚上都要长时间地阅读中国图书中心的书单、书目和价格表。再就是算账，盘算过来，盘算过去，常常还需要打算盘——分配给每个研究所图书馆的经费非常有限，尤其是外汇，说它贵过金子一点都不过分。可订阅西方的经济学期刊是必须的呀，经济学是世界性的学问，怎么能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做井底之蛙呢？

他看呀，算呀，琢磨呀，抠唆呀，谋划着怎样才能用这点有限的经费满足学人们最大的需要，用最少的陪嫁银子做出最多、最漂亮的嫁衣裳。有时丕钊被爸爸的算盘声吵醒了，不高兴，爸爸就在妈妈的命令下躺到儿子身边，哼着西班牙味道的“鸽子”哄他入睡：

“当我远远离开哈瓦那去远方，

唯有你才能猜透为何我要悲伤……”

爸爸特别不爱说话，可歌却哼得特别好听，不是唱而是哼，他从不大声地唱，口琴也吹得特别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肖邦……孩子们都是从爸爸那里学到的。爸爸爱书，除了那些让人头大的经济学书，爸爸最喜欢的是《红楼梦》。每一次《红楼梦研究》出了新刊，爸爸都要支使小三、小四跑到恭王府后面的红研所去买。寒暑假爸爸是要过问他们的读书生活的，书架上的《战争与和平》、《猎

人日记》、《悲惨世界》、《双城记》、《九三年》、《人间喜剧》……是他们兄弟姐妹的必读书。至今丕钊还记得那本《双城记》是双语的，还记得那本曹禺伯伯的《雷雨》扉页上题着“井滔兄校正”的字样。

对于宗井滔，人们除了“活字典”，“活书目”的诙谐称呼，最众口一词的两个字评价是：厚道。这位少言寡语的图书馆长赢得了全经济所学人的尊重。有这样的一口沙漠之井，顾准怎么会干渴！

顾准大量的经济学文字，尤其是他的《试论》、《粮价问题初探》、《会计学原理》等，是需要参考大量国外文献，尤其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的。宗井滔根据原来在中央研究院时的经验，坚持订购《美国经济评论》一类的原文西方期刊和《译丛》、《动态》、《外国学术资料》一类的中译期刊。这类期刊他从1930-40年代就开始为陶孟和的社会所订阅，熟悉它们的所有风格和订购程序。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浪中，中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馆都已断订国外期刊了，他却不放弃，只要还有一丝希望就要千方百计去续订。例如《美国经济评论》，文革中仅仅断订了两年，就是阶级斗争最残酷的1966和1967年。

这近乎奇迹。

顾准从第二次回到经济所一直到去世，除了劳改和干校时期，就一直没有和宗井滔的书们离开过。他有本事从极细小的信息入手，顺藤摸瓜找到本源的文字，比如抓住某本书一条小小的注脚，追根寻源找到含有新思路，新观念，新思想的另一本书，而搞到这本书就要凭老伙计宗井滔的本事啦。

顾准大量和最精彩的文字是文革期间写下的，需要参考的书目实在是太多了。当时这些书只有两个来源：经济所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

“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先生不断地进书，顾不断地读书，你可以从《顾准日记》上看到，顾伯伯借书，读书速度之快绝非常人可比。可以说，顾伯伯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井滔先生功不可没。”徐方《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这是咪咪对井滔先生的回忆。

“文革”期间，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业“鸡犬不相闻”，完全断绝了来往，倒是这个宗管理员，每年用上级分配给他的一点外汇，订阅了国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譬如《美国经济评论》等等，这好比在铁墙上意外地凿出了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洞洞。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

经济异常波动，学术思想也变化激烈，经济所内一些敏锐的学者从刊物上已经察觉到了这一景象。我很感谢宗井滔先生。” 吴晓波 《吴敬琏传》

这是老年吴敬琏先生的回忆。

宗井滔先生一生忙于、乐于为他人家做嫁衣裳，而自己在人间留下痕迹的，只有这样一点点东西：

“姓名：宗井滔；

工作单位：经济研究所；

工作部门：待分配；

主要代表作：大型图书馆分类法经济类草稿（内部资料）1959年9月，本所图书馆工作同志集体编写；

学术简历：1980年任经济所图书馆顾问；

研究专长：图书馆学；

相关成果：雅可柴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1958年）、《伪满的农业专卖统制》 John R. Stewart 作 宗井滔译” 宗井滔档案

仅此而已。

第十四章 珀里斯与政治

1. 珀里斯、政治与刍蕘之献

所有读过顾准的人大概都会记住一个四字短语——刍蕘之献，它被我的传主多次使用，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个古语谦辞，出自《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蕘”，是以“君”为主体，谦恭地“垂询于民”；而“刍蕘之献”则是以“民”为主体，向君主献计献策，哪怕是刍蕘（割草打柴之人）献上“晒太阳能取暖”的常识，贤明的君主也会侧耳倾听。

生性就不大会谦虚的顾准，很有趣地频繁使用这个谦辞。

中国历来是个轻“商”轻“工”，重“士”重“文”的国家。除了这最近的三十来年，在权力、市场的支撑下，经济学人渐入佳境，成了时代宠儿之外，“经济学家”和“经济家”历来都是相当贬义的头衔。从“士、农、工、商”的亘古排列，到《红楼梦》对“经济文章”，“仕途经济”的刻薄嘲讽，殊轻殊重，一目了然。“会计学”，“会计学家”不过是汲汲于锱铢，名人雅士羞于提起的“禄蠹”和“禄蠹生计”。顾准对会计学一辈子不待见，一辈子“志不在此”，爱又爱不起来，甩又甩不开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都还在嘟囔“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71.7.17}，不能说没有受这种中国式思维的影响。

纵观中国大历史，从商鞅、李斯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眼下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学家大师，有哪个不想“为王者师”，又有哪个王朝或政权不是应验了约翰·凯恩斯先生令他们无限沮丧的谶语——“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好为王者师”，与其说是中国历朝历代经济学家的通病，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宿命。桑弘羊之于《盐铁论》，商鞅之于《商君书》，孙冶方之于《社会主义经济论》，顾准之于《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莫不如是。

可是历来中国士大夫口中的“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和现代意义上外来语的“经济学”一词，在词意上有着巨大差别。前者是“学得屠龙术，货予帝王家”中的“术”，后者则是作为研究人类生产，交换以及社会财富分配行为的学问。与西语中“经济”主要指称“个人行为”不同，汉语中“经济”常常是“当朝者”或者是“当权者”的行政行为。经济这个东西在东方这片土地上，一般情况下只能由不懂或者不甚懂经济的当权者们才能去实践，但可怜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做不了“王者”，他们只能“为王者师”，却往往没有好下场。

孙冶方和顾准都没有逃脱这样的宿命。

孙冶方因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而入狱七年，却在深受尊敬的中国改革开放后，怎么也写不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生命尽头的孙冶方，其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病痛的摧残。用他的学生吴敬琏先生的话说，“在中国

当代经济学术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二十几个字的评介可谓力透纸背，悲凉之至。

而顾准，少年时代即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在会计学一道上堪称神童。可惜他“志不在此”，虽然曾经靠它救家养家，成名成家，却无论如何不能满足于在这门被他称作是“经济学奴婢”的学问里终其一生。他有兴趣的是此奴婢的主子小姐——经济学，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最高形态”——政治学和同体不可分的历史学，而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立脚之本——哲学则是他的最爱。

“我自己的愿望是搞经济研究。早在1940年前，我对会计就是‘瞧不起’的，这是一门技术，不过是我谋生的工具。那时我也想搞研究，我选定的方向是经济学，而且要在广泛涉猎历史和哲学的基础上搞经济研究。”

到了1959年，他对这些学问作出了如下排序，也是他心目中最后的排序：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问题……第三个问题，最不重要的问题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9.2.23}

他公开宣称自己“十分关心政治”。无论际遇如何，他从未停止过对全球和中国政治信息的攫取，即使这些信息极为有限且通常因为经过了层层过滤，重重屏蔽，获取之时已经变形、虚假甚至相反，却往往被他罕见的政治灵敏度和选择性——海量接收信息和依据逻辑迅速去伪存真的能力化解了。这种能力令他具有某些先知的特征，提前预知各种政治势力制衡的趋势，全球政局格局的变幻，各国政治结构的变化，政治范畴的缩涨，本国政治上微妙的取舍，邻国政治的突变或微变……等等。

一句话，顾准热衷于政治。

一个下台官员，一个右派，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政治”场上彻底的失败者，有什么必要、什么能力、什么资格去关心、热衷政治？这不是让人笑话吗？然而有多少人注意到，顾准关心和热衷的政治和一般中国人理解的政治大不相同，或者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中文“政治”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诸子时期——“政”归政，“治”归治，前者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后者指管理和教化人民，实现安定的状态。这和辞源意义上的“政治”——西方古希腊“政治”一词的含义完全不同。

“政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πολις(珀里斯)，意为城堡或卫城。古希腊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

城称为“阿克罗珀里斯”，简称为珀里斯。城邦制度形成后，“珀里斯”就成了具有更高意义上城邦、民众以及公共生活的代名词，同时衍生出政治、政治制度、政治家、公民等名词。因此希腊语“政治”一词，从诞生那天起就是指城邦中的公民参与统治、管理、斗争、战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由“珀里斯”变形而来的法语 Politique、德语 Politik、英语 Politics，才是真正希腊语“珀里斯”意义上的政治。

顾准在他最著名的史学文章——《希腊城邦制度》的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中首先就考查了希腊语中关于城市、城邦、政治、政治学等名词的变化，依据是吴寿彭中译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下笔之前，他先将“珀里斯（Polis-政治）、阿克罗珀里斯（Acropolis-雅典的山巅卫城）、珀里德斯（Polites-公民）、珀里德亚（Politeia-公民与城邦的关系、政治生活、宪法及政府政治生活）、珀里德俄马（Politeoma-公民团体、公务团体或与波里德亚同义），以及从珀里斯衍生出来的珀里提克斯（Politikos-治理城邦的人-政治家）区分得清清楚楚，尤其是珀里德亚——城邦国家的政制，她和僭主政体的水火不容，那将是《希腊城邦制度》以及他一系列“读希腊史笔记”最耀眼的亮点。

再看中国。

当波里斯这一希腊名词由英文的 Politics 从日本传到中国时，是孙中山第一个对译为“政治”，并定义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可是谁来“治人”，谁被“治于人”，谁管理谁，依然含混不清，尤其是没有“公民”与“参与”的含义在内。而中山先生其后更为传神和准确的“民有，民治，民享”之译，则早已被抛之脑后，“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携手共退，大家一起重新回到了先秦诸子年代对“政治”的理解。

可见在中国也就出现了一百多年的“政治”一词，和三千年前从《荷马史诗》中诞生的“珀里斯”一词的距离，大概与苹果和梨的差别不相上下，也和老国父的原意相去甚远。时至今日，广为人知和人用的百度百科上对“政治”的词释和“珀里斯”依然是鸡同鸭讲：

“政治，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 百度百科；而

维基百科则毅然去掉了第一句，并竭力按照“珀里斯”原来的模样改写了第二句：“政治是各种团体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团体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尤指对于某一政治实体的统治，例如统治一个国家，亦指对于一国内外事务之监督与管制。”

可见顾准关于语言逻辑的焦虑不是杞人忧天：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语言才能有思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文稿 P238

正因为这种苹果和梨、鸡同鸭讲的差别，“政治”一词在现代中国总有一重暧昧和晦涩的意味——“对政治感兴趣”是一种低下的品味，是“有野心”的代名词；“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学”即厚黑学。但是却人人都以为这就是政治。

顾准是个例外，且是个例外中的例外。

第一个例外，他观念中的“政治”非常接近“珀里斯”——重在参与而不是弄权，这和中国式政治——权谋截然不同，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兴趣与爱好；也因此有了第二个例外，那就是他公开和私下都宣称自己热衷“政治”，绝不遮遮掩掩。

顾准很早，最晚从1955年党校时期就在“读亚书（亚里士多德之书）”^{55.9.24}。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政体对于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最优良的生活应当寓于各邦在现实情况下所可达到的最优良政体中”。亚里士多德提倡人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因为人生一定要有“善行”而后才可以获致“幸福”，实践（有为）就是幸福。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应该“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他记录了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里斯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公职人员，除了政治之外，也有自己的事务要处理；我们的普通公民，尽管自己琐事缠身，但还是公共问题的公平法官。只有我们认为，一个对公共事务毫无兴趣的人不是无害的，而

是一种没用的品格。” 公元前 437 年冬季雅典阵亡将士纪念仪式上的演讲

顾准不幸恰好缺了这种“没用的品格”。

在《希腊城邦制度》中，顾准详述了希腊政治的起源、演变以及她最不可思议的偶然与独一无二性。虽然这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文稿，却不是临终前的顿悟，而是他整个后半生都在全力思考并加以区别的东西——“政治与权谋”，“人性与奴性”。

“蛮族王制是僭主性质（即东方专制主义式）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 文稿 P482

顾准在摘录了上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段话后，虽表达了“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样侮辱性的解释”，但又无奈地叹道“如果历史事实确实如此，感情上接受不了又有什么办法？” 文稿 P482

如果拿“马克思最不能容忍的人的缺点是‘嫉妒’”做范句（这个句子在文革中曾非常流行），那么顾准最不能容忍的人的缺陷是“奴性”，一个人只有具有奴隶、奴才的奴性，尤其是后者，才会不关心政治，不关心自己的生态。

他也绝不“轻信”。

自幼年即接受基督教教育的顾准很早就开始了无师从、不自觉的思辨能力训练，对哲学有着不完整的基础和热烈的兴趣爱好。过早开始的“社会职业生涯”又强化了这种训练和兴趣，加上少年时代就接触无政府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些肯定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的东西，到了十五六岁，他甚至已经把研究哲学和政治当做了使命和责任并在一生中都保持了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它促使他竭力掌握历史和当代的事实，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与他有着共同使命和责任感的前辈们留下的文献和著作。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人格、品格、性格以及他的命运。

这一点，从他留下的文字里看得最清楚。无论是“日记”、“自述”，还是“笔记”、“文稿”，与哲学和政治相关内容占去了绝大、绝大部分的篇幅，无需引述，也引述不过来。在他的观念里，政治是人人都可以觊觎的，既不下流，更不是罪过，而是一种公民的正当权力，关心政治是人类磊落的行为。

“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

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他的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选择的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文

稿 P389

虽然他呆在“模子”里呆的时间不算太短，却依然没有像绝大多数“模中人”那样学会顺应模子内“统一思维”或“不思维”的人格，他不但要思维，还要表达。在以言定罪，以文定罪的模子中他为此屡吃大亏，受大罪。譬如 1952 年“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的酒后之言^{注1}，譬如 1957 年逆了龙鳞的《试论》，再譬如 1963 年沦落为“反党的马前卒与打手”的“刍蕘之献”——《粮价问题初探》和《会计学原理》。

“回顾我的全部政治经历和思想历史，应该承认，其间贯穿着一种十分强烈的个人主义——对事情有所主张，要实现这种主张，并且把它看做“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和追求名利的个人主义有些不一样，因为为了实现什么‘主张’，它可以在个人利益的其他方面作出牺牲。它甚至和‘个人奋斗，成名家家’的个人主义也有某些区别，因为它要实现的所谓‘主张’，必须可以吹嘘为‘为劳动人民的’，‘符合历史进步方向的’，虽然按其实质来说可以恰恰相反。为了实现这种主张，它也可以甘做‘无名英雄’，甚至还得不怕戴上什么‘帽子’——1949-1952 年的上海工作确实大大加强了我的上述性质的个人主义，并通过它，复活了并恶性发展了民主个人主义的那种反动世界观。”

顾准在日后的“交代”中直言不讳地解释了他的这种个人主义的特质。除了充满时代感的“贱己”惯用语（到了 1969 年，任何人写“交代”而不用它们是不行的，那叫“过不了关”），你根本看不出真正意义上的批判，何况他紧接着又说，

“三反撤职以后，尤其 1955 年以后，我要‘扩大思路、独立思考’，在总的政治问题上进行个人‘探索’，于是愈来愈深地陷入个人主义的泥坑……狄超白说，1952 年以来顾准愈来愈狂妄，错误愈犯愈大，这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说对了的。”

你看他像是在“忏悔”吗？

我的传主有个至死都放不下的世俗抱负，就是要为他的国和民做“刍蕘之献”，这是他一生的夙愿和志向，是他“自我实现”的具体表现。可是在东方专制制度下，要实现自身价值，舍做官别无他

途。在这一母体内，做官就是服从，独立思考绝无可能，特立独行不啻自毁，洁身自好一事无成，同流合污理想又成泡影。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对于顾准，孙冶方这样的知识分子最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纵有顾准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以鱼死网破的勇气向这可憎的宿命一头撞了过去，但从他们留下的文字里你仍处处可见他们的无奈和妥协。

1962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顾准，实现这个世俗抱负的激情并未随着信仰（意识形态）的崩溃而崩溃，在强烈的哲学意识支持下，到他第二次进入经济所，它又重新炙热了起来。然而哲学不可避免是政治的，哪怕仅仅因为哲人是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内。他因此不得不把这种热情与“革命斗争”严格隔离开来。他不再浪漫，对“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东西充满了警惕和防备，对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厌恶至极。他只想为国为民做些实事，哪怕是道出“晒太阳能使身体暖和一点”这样的渔樵之见、刍蕘之献。

“我幻想在这个刘少奇控制下的经济所中，重新走1940年以前那种个人奋斗的白专道路。我说我要做好‘工作’，即做好规定要我完成的会计研究任务，那是因为吃了人民供给的粮食，理当有所报偿。可是我的这种报偿，其实是雇佣功能下的报偿，而不是无条件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

正是在这种热情和冷静中，他撰写了《会计学原理》和《粮价问题初探》。

2. 《会计原理》

经济所交给顾准的第一个课题，就是纯粹的会计学研究。按照所长孙冶方的安排，他得拿出看家的本事，按照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搞出一套中国的会计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组成部分，既大国策的组成部分，向执政者提供。

老孙一早就明确指示老顾，只能搞纯会计研究，不可涉及其他经济学科目。

孙冶方也算是个老“运动员”了，岂有不知经济所是个是非窝的理？这里的“是非”可不是人与人之间大酱缸式的小是小非，都是所谓“大是大非”，事关国计、国方、国策，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来“上头”就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座“小庙”、“浅池”，什么事弄不好都会成个“由头”、“口实”，到

头来事情没做成还惹祸上身。顾准二进经济所，老孙先就拿出所长这根金箍棒画地为牢——“你不要出会计研究这个圈一步，外面的牛魔王、白骨精你对付不了，别弄得壮志未酬身先死，你不在乎我还在乎呢。”

这次老顾很听话，乖乖呆在“圈”里，开始“打坐”。他首先拜访财政部官员，了解中国现行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接待了他。

1949年新政权彻底废除了徐永祚、潘序伦们的那一套作为“地主资本家奴婢”的会计制度，无论“中式”的还是“西式”的。消灭了私有制的中国即刻全套照搬了苏联40-50年代簿记模式——按照计划经济、全民公有制的框架建立起基本的会计制度。这套制度从簿记的目的到方法，从术语到定义，从规则到标准，全盘照抄苏联，毫无中国色彩，连“中国旧式会计制度翻版”都谈不上，更谈不上和世界会计制度衔接。

1958年这套制度受到冲击，但是冲击得很没有“名堂”，毫无理论根基和学术支持，无非大跃进的一套——强调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强调核算制度的通俗化、简单化，废除复杂报表，砍掉复杂科目。结果是原有的苏式会计秩序严重混乱，自己的东西还是没有，会计的监督职能大大削弱，直至整个会计制度实际上已经被废除了。

一时间数据大乱、统计大乱、财物大乱、计划大乱，搞经济不要簿记和种庄稼不论时令一样，不乱才怪。1958的大跃进直接导致了1959-1961的大饥荒，簿记的混乱和废除是重要推手。

1961-1962年，吃尽了苦头的中央政府又竭力复归这套苏式会计制度，到顾准会计研究开始时，已经绝大部分修复了。然而，当权者从接受前边骇人教训的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套制度被严格地保护了起来，在“政治”上竟然被提高到“谁要在根本上反对这套现行制度的话，谁得准备戴上右派帽子”的骇人高度。

顾准压根就没有把这张好不容易刚刚才又翻回来的烧饼奉为圣物的打算，一开始他就认定“现行会计制度必须改革”。

作为曾经身为中国最早期和最杰出的现代会计从业者的顾准，他对会计学有个最基本的是非判

断标准——是促进，还是阻滞生产力的发展。至于其他的罗里吧嗦，老孙不是一再交代“那不是我的事”吗？我也乐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虽然杨纪琬副司长那番话“此语对我刺激很深……已经看得很清楚，我的会计研究干下去，势必要‘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所以我对这项研究顾虑重重”，他却没有退缩的念头。对于把一切的日常生活，从百姓的吃喝拉撒到学人的学术研究和出现多元的观点都纳入“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范畴，顾准早已从不解到厌恶，从厌恶到睥睨。经济问题不从经济上论证，会计问题不从会计上论证，其反常识、反科学和反知识是彻头彻尾的愚不可及，他情愿被“政治”这头怪兽吃掉，也不愿被愚昧的粪秽淹没。

在孙冶方的支持下，他把自己最辉煌也最黯然的地方——老家上海作为调研的第一站，开始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程。

3个月的调研艰难而尴尬，但收获颇丰。“自知是摘帽右派，竭力避免接触熟人……调查内容，仅以会计统计制度有关事项为限，凡经济-财政数字资料，一概回避接触”。

做“会计研究”却不准许接触数字、数据，如此调研不啻戴着镣铐跳舞。他也不能对现行制度和改革建议做任何评价和表态。当年立信的老学生，眼下的上海财经干部向旧日老师征求“关于折旧基金下放”的意见时，纵使他十分同意，也碍于身份不发一言，怕的是适得其反，给对方造成麻烦。不仅如此，连赴沪调查的一部分经费也得由他自己负担，“去沪调查，耗费较大”。住宿是在大姐陈秉真家，绝不探访当年老友、部下，除了不想惹祸，他也不想看冷眼。和十年前做大上海总税吏时相比，他顾准现在是冰火两重天。

别人可以不去看望，庆志小姑母的家他却一定要去。周末，他专门去了一趟苏州探访小姑母。从倒在“三、五反”的狂涛中下台离开上海，姑侄俩已十年不见。耄耋老媪的姑母和年近知天命的侄儿，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十年坎坷，十年苦难，尤其是无法道与人知的商城经历，他都说给了姑母，那句大逆不道的“老和尚不出来做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的怒吼，就是在姑母家中喊出来的，也只有姑母面前他才能喊得出来。他知道她会相信、接受和理解。

“戴着镣铐跳舞”的三个月调研，令他对苏式会计制度心中有了底——最初的判断没有错，这个制度是阻滞生产力发展的，“这一套会计制度的根本用意是服务于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流动资金的要求，因而大大限制了企业会计本来可以发挥的多方面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企业会计经济管理和会计实践上的要求”。

回到北京，他很快写出了调查报告。

“我坚决反对把企业会计仅仅限制为‘资金会计’……直率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即是经营资金循环的计算体系，也是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他毫不隐瞒这个观点，不惜在年底的会计研究讨论会上和杨纪琬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步就跨出了老孙为他划下的保护圈，“公开表明了 my 会计研究是为刘少奇-孙冶方的‘利润挂帅’服务的”。

从商城起，他就已经不把什么摘帽不摘帽的劳什子放在眼里了，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政治勒索，他鄙视得很，也从未起过什么“回到怀抱、队伍”之类的心思。不过他感到掌握的资料还不够，还无法在企业管理制度的实践上说明自己的主张。在孙冶方的鼓励下他又去了东北，分别在吉林化工公司、长春汽车厂、鞍山钢铁公司和大连化工厂调查研究。

东北之行的世态凉炎比之上海更甚，除了依然不能接触数字、数据和应该面见了解情况的人，就算有孙冶方的介绍信人家还是不见——你一个摘帽右派，有啥资格指手画脚的，现行制度就很好，我凭什么理睬你？

还是立信的老学生们热情地接待了从前的老师。立信的学生们早已桃李天下，走到哪里的财会部门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而当年的小顾老师和他们是同辈，同龄人，沟通也因此而更加顺畅。

“东北调查虽然不顺利，因为已经经过上海调查……我自己的观点已经初步形成……从‘利润挂帅’这一原则出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能同意苏联这一套制度，于是就动手写《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理论问题》一书的主旨，表明了它要求把社会主义企业的会计改革成为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一开始，顾准就力图把二十多年前学到的资本主义会计方法接种到《工业七十条》“拟议”的中国总会计师制度上去，所以他最初向之“请教”的会计文献就是美国文献。在如获至宝地阅读和翻译

了《美国总会计师制度》后，1963年他写出《理论问题》初稿，1964年二稿，终稿，每一稿他都在第一时间寄给往日的师傅潘序伦先生，口称“秩师”，请他批评。

在上海调研时，顾准多次去拜访了他，希望能向他要些参考书。此时的师傅和徒弟一样是个摘帽右派，对会计一业早已心灰意冷。除了让旧日徒弟随便挑选，曰反正“现在根本什么书也用不着了”，师傅更感叹“回忆我等共事之初，我弟（指顾准）方幼年我已壮年，今我已暮年，我弟亦垂垂老矣”。他又哪里想得到这位“我弟之才，十倍于我”的小老弟十二年后会死在自己前边。温厚敦良的潘序伦以九十二岁的高龄仙逝于中国开放年代，激情刚烈的顾准五十九岁死在文革最后的腥风膻雨中。这是后话。

有了上海、东北的调研和“秩师”潘序伦的肯定，有了《美国总会计师制度》和《工业七十条》垫底，顾准心中底气更足了。

“在这段开始会计研究的时期内，工业七十条的总会计师制度成了我的研究出发点，《美国总会计师制度》一文译稿是我直接交给《译丛》编辑部的，事前事后都未告诉孙冶方。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揭露，《译丛》编辑部抵制了这篇译稿，只在孙冶方直接干涉下才刊载出来，此事我完全不知道。”

这也是前面章节讲过的故事。

在写作《理论问题》的同时，他开始撰写《会计原理》一书，根本没有理会中国的总会计师制度刚刚只是在“拟议中”这个指示。

写书，对于顾准早就是驾轻就熟的事情。十五岁上他就开始写书，出书。《中华银行会计》、《中央政府会计》，名头响亮，内容充实，一版再版。有些还不仅仅是“书”而是“教科书”。它们是中国史上第一批会计专业书籍。

在陈云、于光远和孙冶方的支持下，《会计原理》被列入经济所重点完成的书目。

却可悲，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命运一样，在本该最灿烂的时刻凋谢了——计划写七篇的它仅仅成就了一篇，就因作者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而夭折。这是顾准又一本“写给抽屉”的书，其手稿和《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打印稿，是在他死后才被六弟陈敏之整理遗物时发现的。但仅仅这第一篇的残卷就足以成书，它就是多年后在中国会计界广受赞誉的《顾准会计文集 会计原理》一书，

总共二十章，用顾准自己的话说，“初稿有十几万字，占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会计原理》——又一个完整的顾准故事，却只能留待他死后才讲得完整，那就先放一放吧，本书最后的章节会讲完它。

1963年下半年，经济所政治经济研究室在室主任骆耕漠的召集下开会讨论顾准的《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既有热烈赞成的，也有坚决反对的，争议轰然而起。

先来看《理论问题》主旨（A）和彼时主旋律（B）的冲突：

1A. 现行会计制度以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的流动资金运用为中心，从而大大限制企业会计发挥其多方面的作用。

1B. 现行苏式会计制度是唯一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好制度；

2A. 企业会计应是企业全部经济计算的中心，而就再生产过程的价值补偿方面而论，它不能同时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和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2B.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不可以涉及利润；

3A. 现行企业内的经济计算结构令企业内没有单一的经济情报和计算体系，结果是机构臃肿，报表泛滥，工作效率低下。应合并计划、统计、财会三个部门，组织总会计师工作机构。凡年度计划各项指标的制订、计算和考核，就应归总会计师统一负责；

3B. 可以推行苏联“四师一长（总工艺师、总设计师、总机动师、总会计师和生产长）”制度，但任何“总”都不允许凌驾在党委之上，生产的“指挥和计划”只能由党说了算。

4A. 会计这一工具按其性质本来能够完成计划、统计、财会的大部分任务，凡会计不能完成之处才需要用会计以外的统计资料来补充。这样做，比现在会计、统计两个系统同时并存，并在理论上把会计从属于“国民经济计算”工具的统计，要妥当得多。

4B. 现行制度已很完善，会计权限不可以太大，理由同3B。任何涉及体制改动的企图都是居心叵测的。

“以上是《理论问题》一书的基本主张，在辩护这一主张中，说到会计技术的细节，也涉及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后者，当然是以我的反动经济思想体系为依据的。”

在“反动经济思想”的强力支撑下，顾准又一次昏了头，面对反对派“你就不怕再戴上右派帽子”的暗示，毫无收敛之意。在讨论会上，他“大发牢骚，说什么‘（我就是）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又犯了一次严重的右派罪行”。

他始终没有明白一个中国道理——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不与“政治”紧密相关，别说会计学了，数理化学、天文地理也一样。

3. 《粮价问题初探》

粮价。

又一个看似经济，实为“政治”的大问题。这是顾准到经济所后的第二个研究课题。从顾准已经面世的文字看，他首次提到“粮价”问题，是在匪夷所思的1959年年底。

说“匪夷所思”，是因为此时的他正身处已经饿死了人的商城铁佛寺水库右派劳改队，人们面对着致命的饥饿，恐怖到极处的饥饿，别说“粮价”，连“粮食”两个字都无从谈起的1959年12月底。12月22日，这一天的日记他写了将近四千字。

农村从11月份已经开始饿死人，比劳动队早差不多一个月。此刻劳动队也断了粮，靠胡萝卜、红薯苦撑，已经死了两个，除了劳动队的“统治阶层”，人人饥寒交迫。

很难想象在腹中没有一粒真正的粮食，饿到需要“偷东西吃”境况中的顾准，是怎样挣扎着写下这些文字的。

一连几天他都在发烧，37°5左右的低烧，仍被要求担粪水，捡粪，锄地和看菜棚——菜棚不看着，会被民工和村民偷光。劳动队的右派们再卑贱，在真正的农民面前还是地位稍稍高一点，他们怕他们，一种出于几千年传统的、对读书人的敬畏，善良而卑微。否则半老头顾准哪里看得住菜棚。

前一天，医生刘复生给他开了半天一夜的病假条，今早已经用完了，他被要求按时上岗。此时的他已经开始“肿”了，什么“评级”，什么“摘帽”，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我还要留得一条老命回去”^{59.12.22.}，这几乎成了他的“终极目的”。连思考的体力也快要丧失殆尽了，可“终极目的”之外，

他还是要想，要写。

从凌晨被唤起看菜棚，接着又担了一整天的粪水，他疲惫不堪。夜已深，饥寒交迫弄得他头晕目眩，手中的笔打着哆嗦——

“疲劳万状。晚间咳甚，昨晚尤甚。右胸肋骨因剧咳大痛，至睡眠不能反侧。痰多极，都是脓状。发展下去，变成肺炎，完全可能……权少珍肿得脸像大阿福，依旧出去拉树。彭楚南体力不胜，并且有病，与权少珍一起抬树，连掉五六交，起来热泪盈眶，回家即睡倒了。” 59.12.22.

好不容易弄到手，能救一时之命的“果汁鱼肝油丸”已经剩不下几粒，快吃完了。他忍了忍，把已经摸到瓶盖的手缩了回来，转过头摸出那瓶虎骨酒喝了一小口。这酒是商城县城货架上最后一种可以倒进口中，咽下肚里的东西。因为贵，它比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例如咸菜、盐，胡椒八角等在货架上多留了几日。他千方百计，花了大价钱托人买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喝一口。稳了稳神，他写下去：

“人相食。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20日进城买痰盂，遇蔡璋，蔡告我这个消息。既是公审，自然满城风雨，但在劳动队内是传播不得的。” 59.12.22.

劳动队内传播不得，他却写信告诉了秀。他已经看到、听到许许多多“一窝一窝”饿死人的情况了。别处不说，劳动队右派的家属昨天死几个，今天死几个，明天死几个已成常态，还有全家死得就剩下一个孩子，被亲戚给送到劳动队来的，比如彭仁鑫。

开始还有人流泪，后来就麻木了。村村如此，家家如此，到了12月底，连叹息声都没有了，叹息原也是需要体力的呀。他早已见怪不怪。可是秀没有回信令他惶惑，不知她会不会根本不相信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假如不是亲历，他也是不会、不肯相信的。

晚饭是红薯和胡萝卜，腹中没有一粒正经粮食的他开始考虑粮价问题：

“真正的改弦易辙，必待农村财富积累，可以从生产资料这个盆边溢到消费资料；必待餬口经济的强力改组已消耗完了它的生命力，放宽，有利于生产发展之时才行。” 59.12.22.

也许是那一小口虎骨酒起了点作用，握笔的手竟不打颤了，他写下去：

“在中国，这意味着粮价提高，农村粮食供应尺度放宽，公共食堂方向取消而代之以严格的工

资制，公社有力量为农民营缮新宿舍等等的时候才行。新制度是工资制度，新制度不仅不是吃饭不要钱，而是吃饭很贵，少一张嘴，生活水平提高很多的制度。” 59.12.22.

打着寒颤写完了这一天的日记，整整三千七百二十九字。从自己一天的劳作写到饥饿的众生相，从政治勒索——“摘帽子”的逼良为娼写到人相食的真相和谎言，从人民公社的餬口经济写到自然环境的惨遭毁损，从宪法的“居住自由条目却又有流窜犯一项”写到“政治的取舍”，写到“体制自下而上崩溃”的不可能性……。

就是在此处，他首次提到了粮价问题。

四天后，烧退了，并没有发展到肺炎。四天里他吃到些破米（碎米）糊，这才知道饿，也是能令人的躯体发烧的，在迅速地“肿”，在逐渐地冰冷之前。

腹中有了几粒破米的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又写到：

“饿死人究竟是可怕的，然则 57 年前的局面不会再有了，直到实行下列的根本改革为止：提高粮价，农村全面实行工资制度，粮食自由供应，公共食堂自由化。” 59.12.26.

看来，1959 年的顾准就把粮价问题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一个能“回到 1957 年前局面”的条件、前提。紧接着，他写道：

“如果 1960 丰收怎样？如果 1960 丰收，1957 年前的局面也永远不会再来了。” 59.12.26.

顾准的文字，尤其是日记，多处有“回到 1957”，“Return to 1957”的字样。在他的观念中，1957 是中国政治上的一道分水岭，极为重要。何为“1957 年前的局面”？

假如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还有建立宪政制度可能性的局面。正是 1957 的反右运动，终结了自 1907 年秋瑾为武装创立共和牺牲，各省开始筹备选举成立咨议局始的、中国五十年宪政民主追求的进步历史。这是他最为痛心和惋惜的历史停滞和倒退。宪政是绝无可能了，议会制是绝无可能了，可“民”总还是要“生”，民生总得有人管吧？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国家粮价”是顾准一生都在摸索、探索的重大民生问题，尤其是在亲身经历了“粮食问题”的残酷和恐怖性后，他认为自己有资格，有能力去论证它，为国为民献上正确的国家粮食政策。如今到了经济所，可以踏踏实实考虑和研究中国的粮价问题了，这是为他的国家做“当

堯之獻”的机会。有了商城的经历和临在（presence）的思考，他满怀自信和激情，一头扎了进去。

现在已经不再饥饿，可是新的疑问又来了——从1959年的恐怖到1962年的恢复，是什么因素使得经济复苏如此迅速？饥饿到极点时他尚在思考，现在腹中有了粮食，脑容量更大了，他如何可能停止思考！

早在1956年党校时期，在密集思考了人口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之后，他就大篇幅写下了有关人口问题的思考，可惜很多被删除或隐匿了。比如下面这篇日记，可惜在最关键处都被腰斩了——

“……现有耕地面积十五亿亩，十二年准备垦荒四亿亩，加上工业化，能够吸收的劳动力不过六七千万人，恐怕只能抵这些年头上自然增殖的人口数字。旧的精耕农业产量认真提高一倍半以上是很费劲的，即使做到，收入增加还是有限。而二十年后又是如何呢？孙冶方是个标准的教条主义者，硬不承认这个道理，且以为马尔萨斯理论在中国不应有地位，这恐怕是不对的吧……1954年征购过多，农村不安，强调工农联盟，抑制基本建设……资本家俯首听命，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原有国营工业的生产恢复大体上达到饱和点……。但这时候的经济方略是集中重工业，加强后备，对农村采取强力的手段来征集粮食，更由于二年歉收，而对轻工业的发展采取缩手缩脚的办法。这期间，不仅机关精简，教育发展也压制，私营工业则几乎是任其破烂。对外贸易方面的情况如何不知道，有购买埃及棉花之举，但扩张亚非国家的出口，恐已是1955年亚非会议之后的事情。这一套办法，完全是抄袭当年苏联的办法，而在对外关系方面，则是把自己束缚在苏新国家这条链子上。

结果就是生产增长速度迟缓，沉睡一百多年的广大人民要求振翼高飞的情绪位能满足，党内生活的唯唯诺诺，活泼泼的生机是几乎在逐渐泯灭下去的。如果说积极作用，就是完成了高度统一。

[此处缺页——编者]” 56.6.15.

再例如：

“从国家的数目与人口的数目来说，社会主义类型的革命的胜利，与资本主义类型的革命的胜……

[此处缺页——编者]” 56.9.17.

这些被编者或他自己删除或隐匿了的文字，必是关于人口——经济——政治三者关系的分析和推断。从那时起到1960年代中期他写《粮价问题初探》，人口问题、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及他自己生造的一个词汇——“餬口经济”一直是他的思考重点，是一整套的推理过程。在亲历了商城劳改营极度饥饿的恐怖之后，他的分析愈加深刻，推断更加趋于真实。现在大饥荒刚刚过去，虽然“58年

起迄于今日，除 59-62 年剧变后又恢复而外，首尾相比，变化实在不大”^{71.4.1.}，但毕竟恢复到“大跃进”前的水平了。又一个问题立时浮了出来——是天降丰年吗？不是。本来大饥荒发生那年以及前一年，在全中国都几乎可以算作是个“丰年”，你看他 1959 年 3 月的日记不是还写道“地土多润湿！丰收有希望”吗？。而大饥荒（官方统一口径为“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年份也并非特别的丰年，该旱的照旱，该涝的照涝。是政治挂帅起作用了？更是扯淡得紧。这难道不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带来的结果？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一个大规模实证？

学者卢耀刚曾用顾准理性的党校日记加上感性、理性并存的商城日记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首创的著名经济学概念——“短缺经济学”相类比，得出的结论是——顾准和雅诺什·科尔奈同时道出了一个可怖的真实：“‘短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特有的痼疾，是常态，‘短缺’有利于统治”^{亚诺什·科尔奈《短缺经济学》主要观点。}

科氏与顾氏的一致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需求限制型（即需求有限）的，经常“供过于求”，而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是资源限制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都必然受到物资短缺的制约，“求过于供”。“短缺”不仅影响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还造就了一种“卖者”支配“买者”的社会关系。这种被科尔奈称作“短缺经济”、被顾准称作“连鲷口经济都不能相容”的大一统计划经济，它们都极其有利于集权和独裁体制的存在和发展。

但是“短缺经济”毕竟是在国民持有货币并“有商品可购买”情况下的经济现象，彼时只能作为中国城市中巨型通胀的经济学解释。顾准在商城的惨境中不也憧憬着回到北京找个地方“大吃一顿”，甚至准备动用孙冶方与外宾（实际上是外宾饭店）有关系的关系来完成这个心愿（实际上是“胃愿”），以致连 50 大元吃 10 天的预算都作了出来吗？彼时中国工资人口的平均年工资，以百度文库中吉林省为例（取全国水平中间值）是 602 元，也就是说月薪恰好 50 元。换句话说，顾准的预算是准备动用人均月工资供自己一个人吃 10 天。反观占全国人口 80% 以上的农村人口——农民，却是几无一厘货币收入的。科尔奈的“短缺论”完全无法适用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 50 大元，连 50 大毛，50 大分也没有，那是“赤贫”（零）而非“短缺”（少）。能够解释这种赤贫经济学的大概

也只有整整 20 年后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首创的“饥荒理论”了。

和顾准亲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一样，阿玛蒂亚·森 9 岁时亲历了印度 1943 年大饥荒——印度至今为止最后一次饥荒。而自这个国家 1947 年独立，在有了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便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怎样寻找，人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这就是森的“饥荒理论”基础。

无论“短缺”还是“饥荒”，科尔奈和森都认为不是“天谴”而是“人造”，是集权和独裁衍生的“人祸”。顾准 1959 年的《商城日记》发出了和他们高度相似的声音。科尔奈与森的学说十分系统、学术，但前者被某些西方学者批评为“实证非实证”；顾准百分百“实证既实证”，那“实证”是真正从火山口里舀出的岩浆样本，却可惜因为文字的凌乱而不系统、不学术，还来不及送进实验室就连人带样本一起被火山灰吞噬了。

“上帝明鉴，若四年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扎实实的提高一些产量，全国平均商品率达到 40%，毛先生就大功告成了。”^{60.1.16}

这是样本还未经送入实验室，舀浆人就测度出的部分结论。多么残酷的游戏！虽然看上去那么匪夷所思——就在短短的几年前毛先生还在学苏俄斯大林，评选多育多生的“英雄母亲”、“功勋母亲”，此刻却突然地“翻云覆雨”、“匠心巨手”地要消灭人口，提高商品率。“叹观止矣”之余，顾准下决心要看个透、想个透，就算是葬身火山岩浆也值得。

重回经济所的顾准亢奋不已。他决心放下一切“革命工作”去剥洋葱——“我的全部生活，不再以革命斗争为中心，而以个人、家庭为中心了。我幻想在这个刘少奇控制的经济所中，重新走 1940 年以前那种个人奋斗的白专道路。”

这是顾准 1969 年写下的“坦白交代”，交代的就是他重回经济所时的“活思想”。作一个不好的猜想：假如他的《铁佛寺水库记录》还在世并能面世，说不定就是同时于科尔奈、早于森 20 年的“顾氏短缺经济学”、“顾氏饥荒理论”。这一点只要去细读他的《商城日记》和 1960 年代的经

济学文章例如《粮价问题初探》，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同时也留下深深的遗憾——为什么就不是中国的顾准呢？

在经济所，我恢复了和实际经济的接触，恢复了和经济学界的接触，尤其在后期即 1964 年内，我又搞起经济研究，写了价格讨论会的两次发言稿，写了“内部研究报告”——《粮价问题初探》，积极充当起张孙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和打手来了。”

来看看《粮价问题初探》都写了些什么，令顾准再一次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且担当起“贱役”之职——马前卒与打手？

1. 经济形势和现行粮价政策不相适应，粮价问题需要执政者再考虑，眼下的低粮价政策不宜长此继续下去。原因一二三四，后果甲乙丙丁；

2. 长期低粮价衍生的诸多问题。原因一二三四，恶果甲乙丙丁；

3. 调高粮价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方法一二三四，良效甲乙丙丁；

4. 两个方案（粮价不动和提高粮价）的比较。一二三四，甲乙丙丁。

《初探》的全部立论，是把需求看做价格决定的主因。从这个命题出发，顾准认为粮价偏低不利于它的迅速增产，不利于缩小工农差别，不利于国家的农业积累。粮价偏低也是也是造成苏联农业长期停滞的原因，中国不能蹈其覆辙。在“中国历史”上也下了狠功夫，熟读《汉书》的他深知历朝历代都有“谷贱伤农”的问题，就算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那也是必得有经济基础才垫得起来的。他鼓吹提高粮价，提高粮价销售价格，建立一个较高的农业产品价格体系，同时提高低工资，高工资则不予调整，借以缩小工资差别。他竭力反对以降低工业品价格，保持低粮价和低农产品价格的手段来改变工农产品比价，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提高粮价，百物飞涨，粮价一涨，万物飞腾，国家财政将不堪负担”大唱反调，竟至提出以提高粮价促进城乡计划生育的建议。这一系列观点他并不是盲目提出的，在《初探》的后一部分，他强调提高粮价必须先作“厚集”准备，假如粮价提高的时机、幅度掌握得好，操作得好，是完全能够保持财政平衡的，但也预测“在一个短时期内也许会要求降低基本建设投资”，而这不幸正是激情燃烧、旋兴旋废的最高决策者最不愿意看到的财政局面。

写作《粮价问题初探》时所有需要用到的数字、数据，顾准都无法从正当渠道获得，只能通过一位财政部领导到家里探望因患胸膜炎而长期在家养病的妻子时的慷慨相告。“就这样，我心中大概有了一个‘数’，这也是我写初探的唯一资料根据。”

顾某人，就算是“戴着镣铐的跳舞”，也跳得比别人精彩。1964年8月，该文以“绛枫”之名被作者郑重地交到所长孙冶方手里。

4. 迷失在“群星灿烂”中

为叙事方便计，先倒回至1963年，这一年中国学术界有件盛事。

假如用果树结实有大小年之分来譬喻1949-1976年的中国，将肃反镇反、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郑州会议、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四清、文革算作夏花烁烁的大年，那么1963年应该算是个难得的小年，这棵果树得以稍作喘息，将息。

1963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先生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报告，再一次号召知识分子“出笼”，希图改变因6年前的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他这样说道：

“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是人民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学术上也应当是群星灿烂的时代。不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或者封建社会，都出现过学术上的繁荣昌盛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马克思以前的德国，哲学方面出了康德和黑格尔，文学方面出了莱辛和歌德。列宁以前的俄国，出了像普希金、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这样一批卓越的革命思想家和语言艺术家。我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龚定庵、康有为、谭嗣同、邹容、章太炎、李大钊这样一些人物，出现了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伟大作家鲁迅。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论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都把很多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推上历史舞台。这些人的有声有色的活动和高度的成就，至今还使我们感到钦佩。恩格斯曾经这样称赞文艺复兴，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

中国读书人最经受不住的，就是这样的号召——集激情、华彩、浪漫于一身，借古喻今，旁引博证，尤其是先哲、先贤们的光荣殉道，“政治要求的是动人心魄的动员口号，而不是‘烦琐哲学’”
笔记 P22——顾准后来悟到，它们是宣传，是诱惑，唯独不是‘烦琐哲学’，也就是说不需要繁杂的理论，尤其是数字化理论的支持。

有后人形容这样的一次次宣传、诱惑是“引蛇出洞”，未免刻薄，也不符实情。不如说是每一次“治大国如烹小鲜”前的炆锅——先炒起来再说，先折腾起来再说，后面的章法大厨不知道，助手也不知道。所以助手们常常就成了替罪羊，也被扔进锅里烩了。

但中国读书人又有“慎独”的传统，十几年的惨痛教训很多人是不会轻易忘记的。这是一次盛大而小心翼翼、谨慎乐观的集会，从会后毛泽东先生率几乎全体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对与会者的接见，合影可见一斑。六百多人的照片中没有顾准，他非常识趣地根本就没有到场。到会者，包括孙冶方、徐雪寒、骆耕漠脸上的笑容是拘谨、小心翼翼和谨慎乐观的，却谁也没把这次盛会与 1957 年“双百”盛会的相似之处看出来，连顾准也没有。

“这次会议我并未参加，只听了周扬的“群星灿烂”报告的录音传达。我积极响应了这次‘出笼号召’，第一次积极的表现是政经组讨论这个报告时我的极其激动的发言，又一次犯下了严重的右派罪行，见罪行交代（四）。”

在“群星灿烂”的号召下，顾准无可救药地又一次迷失了。

此前他还是非常谨慎的。顾忌自己的右派身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所长孙冶方也处处提防和压着他回避经济所一切有关经济问题的争论，以免他再一次陷入残酷无聊的“政治”泥淖。从 1962 年回到经济所到 1963 年底的“群星灿烂”，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也曾心满意足于埋头“一个人的探索”。先来看看他“一个人的探索”的过程：

“翻译熊彼得，就是这项‘探索’的主要途径……熊彼得的反动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对我起了某种程度的恶性启发作用，我的反动的‘共产主义两党制’就是这种启发的结果”。

翻译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阅读熊氏《经济发展理论 财富创新的秘密》、《景气循环论》、《经济分析史》等主要著作，是顾准成为一位思想者、思想家进程中一次重要的飞跃。此

间，受到“恶性启发”的顾准还绝无去影响别人的意愿，也惧怕别人来干扰他，他要坚持“一个人的探索”。

此前，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不熟悉的，翻译熊彼得成了他学习这门学问的入门课。他对这次翻译极其认真，为了尽可能准确，他同时用英、日两个版本做母本进行中译。在此过程中，他惊喜地发现“熊说”和“顾想”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但熊比顾的表达要明白透彻得多。“学习这门功课……助长了我反动经济思想的发展”，他说。

顾准上述这样的文革文字数量很多，被后人称作“猩红热”。但假如你能耐住性子把这些文字仔细看几遍，将同时间的文字挑出来并行、对照看，把事件捋顺了看，就会发现这些“猩红热”文字中的破绽（也可能是故意“卖”的破绽）很多。如此读来，除了有助于你深探顾准，还有助于你了解文革文字的奥妙，是有趣和值得的。

挑出其中的一个说说——

在谈完熊彼得对自己的“反动”助力后，顾准紧接着画蛇添足写道：

“学习这门功课在 1964 年前助长了我反动经济思想的发展。1967—1968 年间，反动世界观开始有所动摇，它有助于我面前展示出一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比的图画，从而促成了这种动摇。”

话中的“它”当然是指熊彼得的一系列著作，开始动摇的“反动世界观”当然是指他自己“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熊说”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比图促成了顾准先生“反动的世界观开始动摇”？这岂不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就连小孩子也看得出其中的逻辑荒谬。顾准真是有点欺负命令他写坦白交代的人们，侮辱他们的智商。

再看他写于 1967-1968 年，也就是他“反动的世界观开始有所动摇”那两年的几则读书笔记：

“可惜，十月革命以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是这个官僚的和军事机器（指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法国革命打碎的官僚和国家机器）的更进一步发展。十月革命废除过一阵，为时极短。1949 年的中国，在二十年的干部准备基础上，又接收了以前的国家机器……1949 年，人们再三背诵《国家与革命》中打碎国家机器的话，可惜不过是把它的意思引到（1）废除旧法统；（2）清理中层这二种意义上去，对于“打碎机器”的真正意思是完全不了解的。——打碎机器其实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者是无法了解的。（参见另片）。” 笔记 P624

“五十年的经验，证明这全属于空想（指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有关‘打碎国家机器建立社会主义’）。熊彼得比列宁要实事求是得多。” 笔记 P626

你看他“反动世界观”动摇了吗？

当年 11 月底，在讨论周扬先生“群星灿烂”报告的政治经济组会议上，顾准积极响应了这次“出笼”号召，做了一次“极其激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谈到中国的经济状况，谈到熊彼得，谈到共产主义两党制，谈到自己的商城经历，谈到三面红旗，谈到建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最后失控地喊出“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和“我永远也不会进这个人民大会堂”，两句“十恶不赦”的话语，就此迈出了再次沦陷且“永世不得翻身”的第一步。

第二步，转年 2 月，在讨论张闻天的“新价值规律”、“集贸市场”、“自由竞争”的论文时，顾准很快从“三岔口”的黑暗中走出来，看清了身边的张闻天、孙冶方是自己的思想盟友，“当我‘出笼’参与经济问题的讨论时，我就地地道道地成了他们的马前卒和打手了”。

第三步，紧接着 5 月，在学习毛著的学习会上，顾准事先写了一篇《体会》，照本宣科，读完稿子拍屁股走人，绝不发挥。要义如下：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要学习德、日、法、意诸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经济的经验；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和平主义发展经济才是正路。此时全中国正处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 年 9 月 24 日的日月里，如此刺耳的反调，估计他真要是念完稿子还坐着不走，后果不堪设想。

这篇《体会》被孙冶方拿去“参考”，至死未还，弄得他好长一段时间耿耿于怀。

第四步，在讨论会上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辩护，反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观点。会议当场就受到革命群众赠送一顶“修正主义者”大帽子，只有孙冶方为他辩护——“嘿，嘿我说同志们，讨论归讨论，有意见也不要随便给人扣大帽子好不好？”。

第五步，在讨论价格问题的会议上鼓吹市场经济，强调需求在价格决定中的重要。提议执政者提高粮价，降低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

第六步，写出了《粮价问题初探》，提出执政者必须重视工农产品比价问题。

第七步，交出了《会计学原理》第一篇，坚称“现行会计制度必须改革”，“为此不惜再戴一次右派帽子”。好在这一步不大要紧，因为《会计学原理》根本就没有被允许面世，它的故事在后面，在他死后——看一本纯工科，纯管理学书籍（并且还是残卷）怎样对社会构成威胁。

第八步，在学习九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共九篇）的讨论会上极力鼓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中心论，这也是他日后多元化论的一个分支。他反对无限制的对外援助，认为在和平建设的路线下，援外要有限度。

第九步，“对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充耳不闻，成为彻底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者”，但又认为必须制约党内的干部特殊化现象，“本着‘民主社会主义’这种一项存在的思想，在熊彼得反动著作的‘启发’之下，形成了罪恶的‘共产主义两党制’的思想……通过‘共产主义两党制’这种‘民主’的方法，可以代替革命来解决问题。”

在非正式场合，他甚至议论自己的老上级——陈毅先生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受超规格待遇一事——“陈毅就说过，日内瓦会议时他受到各国外长的特殊的尊敬，因为那些外长，只当一任，下台就是平民，哪里有一个元帅的威风”^{文稿 P386}。他认为这正是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区别所在，正是最值得、不应该夸耀之处。

这些都是他日后形成“鼙鼓无声，理性争鸣”观点的初始。

“我所梦想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专政下少数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理性争鸣’。‘理性争鸣’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以和平主义为前提，所以我对雨果的‘鼙鼓无声，理性争鸣’击节叹赏。”

有了这几步，尤其是最后一步——推崇两党制，顾准已是“万恶”俱全，可他全不放在眼里，“至于我的反动政治——经济思想体系本身，这两年通过‘探索’还有恶性发展”。

他竟已经有了“思想体系”！这段时期，顾准常把“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的话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派头，右派帽子好像成了他手里的耍猴棍，弄得手拿帽子的人倒像个猴儿似的被动难堪。

“群星”果然没有灿烂几天。1963年11月的盛会绝非一次鼙鼓无声，理性争鸣的盛会，而是又一次“大年”的前奏。周扬先生诗一样的话语还未落地，这边“极峰极笔”已经开口、落笔。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生就对文艺工作作出了两次批示：

第一次，12月2日批示在本月的《文汇》杂志上——“各种艺术都是死人统治着。戏剧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此时距他率众接见六百多名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盛会仅仅二十多天。怪不得照片上老人家面相已甚是不悦，一旁的刘少奇先生则是呆若木鸡，和周恩来、朱德二位先生的笑容可掬形成强烈反差。

第二次，1964年6月27日，老人家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他老人家好像总是处在不高兴的状态，中国这棵果树要是哪一年没有夏花烁烁，秋实累累都会惹他不快，至于此树会不会因此而累死则不在考虑之内。于是史学界开始批判范文澜的“让步政策”和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哲学界开始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文学界开始批判林默涵的写真实论，经济学界开始批判孙冶方的“价值论”。

我的主人公终于没有经受住“召唤”的诱惑，一头迷失在“群星灿烂”中，再次宿命般地沦陷了。

注1：关于“三年当市长，五年做总理”的话，顾准在商城劳改队期间和小右派蔡璋谈到过。他说他不能肯定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如果说过也一定是酒后之言。对此他一生都百口莫辩，除了他的时代“以言定罪”和“疑罪从有”的特色，“酒后吐真言”一关他也是跑不脱的，换个人别说“酒后”，就是“疯了”也决然说不出这般话语来。

第十五章 永不“成熟”

I. 三岔口、马前卒与打手

1964年8月，刚结束青岛的疗养回到北京的顾准手捧杀青的《粮价问题初探》，兴冲冲地站在所长孙冶方面前。

这已经是孙所长第二次安排他疗养，第一次是他刚结束在清河和宁河的劳改回到经济所的1962年，地点是东北的海拉尔。

疗养制度也是中共从北方老大哥那里学来的，但绝非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享受。孙所长连续为被开除了党籍的摘帽右派顾准安排疗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虽然老孙的初衷是想要吃尽苦头的老顾有个地方好好将息，可每次疗养后收获的副产品。

上一次，从海拉尔回来的疗养员顾准交出了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译稿。两个人都被熊彼得所言——“但我们使用的名词——社会主义，并不是意指中央当局必然是专制独裁的中央集权主义，这个当局我们不是叫它中央局就是叫它生产部，并不是意指企业高级人员的积极性完全来自中央当局的中央集权主义。关于第一点，中央局或生产部可能必须向国会或议会提出他的计划，也可能有一个监督和检查的权力机关——一种审计机关，可以想象它甚至有权否决特定决议”震撼不已，对“成熟性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顾准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充满了理解的兴奋，这不就是你我梦寐以求的民主社会主义吗？

这一次，从青岛回来的顾疗养员又交出了《粮价问题初探》，对两人都深恶痛绝的“白薯共产主义”^{笔记 273}，“**鲇口经济**”^{笔记 280}作了颠覆性批判，提出了创造性的改革意见。

可是这一次，老孙却不像上一次那样兴高采烈如获至宝，反倒是眉头紧锁，忧心忡忡。他当即找来青年研究员乌家培，把标有“内部研究报告”的顾准的文稿交给他，同时交代了关于粮价改革研究的下一步部署。转过脸来的治方迟疑着对顾准说：“今后你就不要参与这项工作了”。

顾准气坏了。他不能理解，更不能原谅老朋友如此的“过河拆桥”，当场就翻了脸——“你认为我不合适，我走人好了”，拂袖而去。老孙苦于无法解释，就干脆不解释。

顾准怎么会知道，就在他惬意地沐浴在青岛海滨灿烂阳光下，享受着疗养的闲暇和从容，一蹴而就写成《粮价问题初探》时，嚷嚷了多年“价值论”、“价值规律”和“利润挂帅”的孙治方已经“进入视线”，眼看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1963年6月，即“星光灿烂”盛事前五个月，在中共中央“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四清”会议上，“极峰”老人家向党的高级干部们厉声提问：“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中……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正是此声色俱厉的提问后不久，经济所所长孙治方就已经被策划、密商和内定为掌握着这三分之一权力的修正主义分子之一，而且是中国学术界暨思想界头号的修正主义分子。将来他的批判大会将会连续数日在当时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召开，他将为了他的经济思想付出七年牢狱之灾的代价。不过此刻，一切都还在事前的策划中，在风暴前恐怖的静寂中。孙治方再愚钝，也不至于对

这种寒意和恐怖毫无知觉，所以才一把推开顾准并“置于千里之外”，不声明也不解释，倒也符合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顾准完全不能明白这位老哥是怎么了，他也不能原谅他。

让他无法明白的还有一个人。

1963年春节，经济所政治经济组在北海仿膳菜馆聚餐。聚餐会上，顾准第一次和张闻天见面，这也是一年后的“三家村”——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三位村民的第一次聚首，比起1966年文革初起时国人皆知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此村比彼村早了一个时辰。

不过1963年的张闻天和顾准并不熟悉，不光是不熟悉，两人在年龄、际遇和“政治待遇”都差别甚巨。是年张闻天六十三岁，顾准四十八岁，小了一轮还多；张闻天是中共初创期领导人，做过毛泽东的上级；顾准是1935年的“白区”地下党，况且1958年就被开除了党籍，在党时间总共才二十来年；张闻天轰轰烈烈折戟于庐山会议，顾准懵懵懂懂沉戈在三五反中；张闻天拜“惩前毖后”所赐，到1962年还有坐大吉普带警卫员上下班的待遇，顾准托“大跃进”之福，1959年险些成为饿殍；张闻天此时头上有个天大的帽子——中国头号反党分子，但却是隐形的，顾准眼下只是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摘帽右派。

两人只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倒霉都倒在中国的经济问题上——前者作为国家外交部副部长，庐山会议上却置喙中国经济问题；后者1957年肇祸的《试论》捅的也是中国经济问题马蜂窝；前者7月庐山发言，8月就成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里通外国”的人民公敌，后者的遭遇已经讲了很多，就不必重复了。

先看一篇“讨张檄文”：

“怎么搞的？你陷于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是安的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了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了。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

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儿破，颠时节颠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泃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璧合，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笔，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毛泽东在庐山给张闻天的亲笔信

聊聊五百字，精彩至极，仅仅“漆黑一团，尽是假的”八个字，就此断送了张闻天的后半生。须知张闻天也是搞经济学出身，在日本、美国和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都是学经济学的。除了经济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主儿，精通俄语、英语、日语，粗通法语德语，中国第一个王尔德翻译者。可这有何用？在没有任何数字、数据、论证支撑的“漆黑一团”、“尽是假的”铁踵下，再深厚的经济学功底，再中西通吃，再详尽的数字、数据都不堪一击。“学问”在“政治”面前，“经济”在“威权”面前，“数据”在“华章”面前向来是“蚍蜉撼树”，鸡同鸭讲，秀才遇见兵，落花流水的肯定是秀才。

1960年11月，和顾准一样，张闻天以待罪之身来到经济所，干起了经济学的老本行。

庐山会议的沉重打击并未使他在经济研究上“改邪归正”。进所伊始，他就参加了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讨论和写作，到了1962年1-2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他被罢黜后又一次坐上大会的主席台时，已经丝毫不怀疑自己在庐山做了正确的事情。

和顾准反对“反阶级斗争熄灭论”并将其等同于杀戮一样，张闻天也是明确、始终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主张“经济问题首先要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政治上论证”张闻天《香山会议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感想》。他的目光专注于农村经济与市场、物价，这和他在庐山会议上被劈头盖脸地斥责“尽是假的”不无关系，他还是希望能拿出更有说服力的实例、实证来证明“尽是假的”才是假的。

可他又错了。七千人大会不仅没有可能翻了庐山会议的案，还动了把“面子”看得比天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奶酪”，因而埋下了更大的祸根。愤怒、嫉妒、虚荣、骄傲，四方戾气合股，祭出

一袭血红的“阶级仇恨”之袍，四年后它将牢牢地套在全体中国人头上，七千人大会的组织者，发言者，主席台上、下的人们，刘少奇、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你、我、他，一个也跑不了。狂飙般被挑起的“无缘无故”的仇恨，给全中国造成了长达十年的巨大灾难，令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骤失。

但是在1962年，还没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一点。七千人大会2月结束，张闻天4月就兴冲冲踏上了集市贸易调研之旅。在对苏、浙、湘、沪三省一市作过调查后，当年7月他就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先生提交了一份《集市贸易意见书》。

当详尽的，“尽是真的”的数字、数据再一次摆在当权者面前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又重演了一次“辱君之戏”——数字与实情愈相符，羞辱愈甚，仇恨愈深。张闻天再一次捋了龙须，逆了龙鳞，旋即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名，他被褫夺一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政治权利。

在这一点上，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倒是和顾准有得一比。

张闻天的集市贸易调查和顾准的会计研究调查发生在前后脚，等顾准东北调研结束回到经济所，对张闻天的大批判都已经开始了。顾准也投入了批判，可你看他批判的是什么就知道他对“政治”是多么的一窍不通——

“1964年2月，政经组讨论张闻天的名为读书笔记的一篇经济论文，张闻天在这篇论文中鼓吹什么‘新价值规律’——其实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的遮羞布。我在1964年春节假期内赶写了一篇发言稿，批驳他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天然适合需要论，在鼓吹市场经济方面比他走得更远。”

你看这一场精彩的“三岔口”——张闻天、孙冶方、顾准——焦赞，任堂惠，刘利华，尤其是顾准，黑灯瞎火就开了打。还好，舞台灯很快亮了：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是1962年的集市贸易的积极鼓吹者，把他当做我所谓的‘教条主义者’。其实他的那篇论文和我的批驳发言，在复辟资本主义方面是一致的，而这次讨论会也就成了实质一致表面不同的修正主义者间的一唱一和的舞台。”

除了明白了张闻天，他也明白了孙冶方：

“当时孙冶方之所以特别表明经济研究不是我的任务，是因为他已经有‘灭顶’的预感……我认为孙冶方在经济问题上发表了的一系列意见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一向自承，如果我关于经济问题

的见解是修正主义的，那我比孙冶方更为彻底，如果孙冶方因持有并发表这些意见，所以有罪，那我的罪更大于孙冶方。”

弄了半天三岔口上都是自己人。

明白过来的顾准有些又惊又喜。初来经济所，原是“我想利用这个环境里继续我的‘探索’，但是这是我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探索不成熟，不想去影响别人（?!）。”，而此时他有点不大能确定这还是不是他“一个人”的探索了，还有那么多人在探索——农村调查、广州会议、包产到户、自由市场、人民公社大食堂、头脑发昏的大跃进，毫无逻辑可言的总路线、政治挂帅、价值规律、市场经济……用他七年后的形容词叫做“黑风弥漫”，他不窃喜是不可能的。不过要按捺住自己的情绪，“不去影响别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极大的“定力”，这定力就是自己头上那顶“摘帽右派”的帽子：

“我抱着 1957 年划为右派时的信念，不想翻案，埋头工作，决心在科技研究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不想翻案”是一回事，还要不要“继续作案”是另一回事。最把逻辑当回事的顾准绝不会混淆这两者。再说摘帽不摘帽在他眼里根本就不是个事儿，要不是为了秀，就一辈子戴着也无妨。至于“重新入党”，他就更没兴趣了：

“读到报纸上揭发孙曾企图把我再度拉入党内，此事就发生在为粮价问题和他的一次谈话中。记得那次他用上级的口吻说：‘你这样关心国事很好，可以争取重新入党。’应该坦白交代，那时我虽然热烈地想作‘刍蕘之献’，可是，1952、1957 年两次旧案尚未解决，并不热切盼望‘重新入党’，而且孙的口吻也使我反感，所以顶撞地说了句‘我关心粮价问题，不是为了重新入党’，也就没有再谈下去了。”

不识好歹，太不识好歹啦，也就是好人孙冶方能容忍这样“不知好歹”的人。受到这么无礼的冒犯和顶撞，孙所长也只好自认倒霉，却不妨碍他继续以各种其他理由或者“钓饵”来动员他加入“集体探索”，最大的“钓饵”是——你可以在集体的探索中继续并深入你自己的探索啊。

“1963 年下半年开始的，在经济研究上作‘刍蕘之献’，在政经组讨论会上大肆放毒等等，还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经济所的代理人费去一年多时间的潜移默化和号召‘出笼’之后才转变过来的哩。”

顾准终于“上钩”啦，在刘少奇和孙冶方的“潜移默化”和“出笼号召”下。

要说刘少奇、孙冶方是不好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国家主席，再小也得算是个“副帝”；一个仅仅是个翰林分院的院长，至多算个首席宫廷经济师。可是且慢，来看看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一本藏书，你就不会这么想当然了。

这是一本典型的“东亚图书馆”型藏书，外皮是她标准的精致装帧——绿色硬壳、金色烫字，书目是《对孙冶方的批判和经济战线的斗批改》。打开第一页是毛主席语录：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这是一本如今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人才看得懂的书，不是因为它的深奥而是因为它的浅薄和毫无时效性。这本书将孙冶方定义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魁祸首，领头黑羊”，“刘少奇的代言人”。这倒是个新奇的说法。

实际上这个说法一点都不新奇——“康生、陈伯达等在60年代初已在暗中策划把孙冶方同志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四清’时正式定出了这个调子，并在报刊上大肆宣扬。”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话说回来，“动员”和“号召”顾准加入到弥漫的黑风中去的，可不就是“副帝”刘少奇和“首席宫廷经济师”孙冶方大人吗？他们不但把他卷入“弥漫的黑风”，还令他自觉地成为了马前卒和打手。

“这两年半的工作中，我地地道道地充当了张孙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和打手，在所内大量放毒，在所外犯下了严重的右派罪行。”

“我对他（张闻天）在他的论文中反对毛主席的言论不仅没有警惕，而且臭味相投，所以，我还是在讨论会上和他合唱了反党反对毛主席的一场双簧。”

好一出《三岔口》，好一个马前卒和打手！

2. 一对荆棘鸟，两个苦命人

覆巢之下无完卵。

1964年8月，面对手捧《粮价问题初探》，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十分良好的顾准，已有“灭顶预感”的孙冶方毅然下了“疏离”顾准、推他上岸的决心。这在他是痛苦的——被他误会事小，失去学术上这个唯一的知音，今后在精神上将更加孤独事大。可他下决心绝不能再连累上他——顾老弟已是满身满心的伤痛，不能再让他新伤擦旧伤。眼下山雨欲来，黑云压城，除了知道肯定要出事，其他什么都不明朗，解释都无从解释。不是现在就有人揭发说他孙冶方之所以敢如此大喊大叫“价值，价值”的，是因为被顾某人“启了蒙”吗？

他太了解他了，越解释越会害了他。他情愿被他误解，也不愿让他牵连进来。《粮价问题初探》到底是刍荛，是和氏璧，还是“臭狗屎”，眼下我俩什么都不说好不好？已经闹出来的事我都兜着，还没出的事就先不要让它出，好不好？

可顾准他不明白啊。再说，他也不是第一次误会冶方了。他们生命的交叉点有那么多，几乎每次都要从“误会”开始，只是冶方从未和他计较过。耿直倔强的孙冶方最能容忍的人，可能就是自己这位永远都无法“成熟”的顾准老弟。

说到顾准和孙冶方的生命交叉，前人已经有过无数篇文章书籍谈及。多少学生，亲属，后辈，仰慕者对这一对中国政坛上的荆棘鸟，经济理论界的苦命人充满了敬意和感佩，多少人至今还在对这一场不凡的友谊津津乐道。

孙冶方一生有很多朋友，他是个很纯粹的人，有学问无机谋，有性格不狂妄，有风骨无怪癖，有脾气无傲慢，老老少少的人们都愿和他交朋友，与顾准的狷介孤傲大相径庭。但纵观他的一生，能被他视为知己、无话不谈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友陈修良，他们是终身的挚友，直到耄耋之年他们依然直呼“萼果”，“阿纳”，从莫斯科中大开始的同志友谊一直延续到冶方生命的终点。另一个就是顾准——唯一能从精神，思想和学术上启发、影响孙冶方，同时能在这三个方面给他强力支持的人。

顾准和孙冶方际遇不同，但他们永远是平视的，也只有两个互相平视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朋友。

1969年，顾准专门写了一篇题目超长且超级拗口的“坦白交代”材料——《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副题）我和孙冶方关系的补充交代以及我对这一关系的政治性质的认识》，题目吓人，内容杂陈，却足够令有心人理解两人的“高山流水”之交。那就顺着这篇“坦白交代”慢慢道来。

从1930年代末两人在“孤岛”文委共事时期起，到眼下张、孙、顾三家村的名号都叫到中南海党中央里了为止，两人已经相识相知整整二十五载。从“拂袖而去”到“恍然大悟”并没有用去多长时间，顾准很快理解了孙冶方的苦心。

“当时孙冶方之所以特别表明经济研究不是我的任务，是因为他已经有‘灭顶’的预感，要和我这个摘帽右派划清界限。我因为不理解当时的局面，对于我这位‘老朋友’的这种态度很生气”。但是，“虽然孙冶方不要我卷入他的经济研究，我要搞的又是自己的‘体系’，孙在报告会上不提‘非会计’的部分，当然是不让我卷入他的经济研究的意思。不过就在同一天，他自己动手破坏了这一‘不卷入主义’。”

这又是怎么回事？

事情始于孙冶方1963年做的一份“折旧问题内部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出台后被扣上了“修正主义”大帽子，冶方十分压抑。顾准刚刚研究过美国托拉斯对下属工厂财务控制制度，认为折旧基金全交国库或全数留给基层工厂，都十分不利于生产和技术的创新和改造，所以全力支持冶方关于折旧基金的控制使用，部、局、托拉斯和基层工厂间的责权划分要因地制宜，分别制定的观点。

“折旧基金”问题肯定不属于“会计研究”范畴，孙冶方原是不准许他“卷入”的，但现在他双手欢迎他的“不请自来”，办公室讨论不完，晚上、周末还要互相到对方家里接着谈。除了谈折旧，他们还谈生产价格，资金利息以及资金税，而这些都是些更加敏感的雷区。碰上观点不同，例如顾准就不同意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证方法，他们还会从家里争论到公共汽车站，走一路争一路。顾准日后在“坦白交代”中说到有一次，“送他上电车时，（他）说我‘不民主’，他是‘彻底的民主’”。就是说在顾家还没吵清楚，送人家老孙回家的路上还在吵。

我把这一段“坦白交代”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最后哑然失笑：顾准先生和孙冶方先生之间有竞争，何止有，其激烈的程度还不低呢。

孙先生很想搞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个人体系，顾先生又何尝不是？

顾准有一个比“社会主义经济论”庞大得多的研究计划——花十年功夫对东、西方历史作一个彻底的比较，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除此之外，在经济学上他也有一个“自成体系”的研究计划。可他是“会计学”出身，就算会计学不像他那样刻薄地形容为经济学的“奴婢”，可在经济学大观园中至多能算上个庶出的探春，再优秀也有点“出身”上的自卑。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会计学大师顾准又不大瞧得起经济学大宅门正出的孙冶方，你看他说：“由于我对孙的理论能力估计不高和文人相轻的习惯，我并不认为孙能写出好书来，所以我对它（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毫不关心”。

顾准又是最怕碌碌无为的。再瞧不起会计一行，他也必得把它做好，至少对得起自己那份俸禄：

“1962年我再度进所以后，作为刘少奇实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社会基础，我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孙冶方要我研究会计，很明显，他不仅把会计当作利润挂帅的工具，而且也企图把会计中的成本利润计算理念经移植到他的‘最大、最小’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去，所以他再三坚持会计研究应该放在政经组内。孙冶方没有来得及用上我《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中的若干问题》就被打倒了，我的《若干问题》和他的反动经济观点是一致的，这是无可否认的。”

连孙冶方长期借去他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的若干问题》不还他都记下了。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大肆宣扬要学习资本主义的日本和西德高速发展经济的经验，却只字不提反对修正主义，反倒是一再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因为这十分投合了孙冶方的心意，被他要去‘参考’，长期不还”——“这可是我‘稿库’中的宝贝，又没留拷贝。你长期借用不还可不大好，我可记着呢。”

可同时他又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非常有趣：

“如果说我和他们有区别的话，区别只在于他们积极贩运苏修的货色，我则认为苏修的货色也是贩来的，与其贩运索包里和涅姆钦诺夫，还不如直接贩运乔安·罗宾逊、兰格、利昂节夫和斯通。”

“他们”者，孙冶方、张闻天也——“二位，让我说你们什么好？与其贩运二流货色干嘛不直接去拿一流的东西？乔安·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现代经济学导论》和她的垄断竞争理论，奥

斯卡·兰格的《经济计量学导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他的均衡理论，瓦西里·列昂节夫的《世界的未来》和他的产品周期理论，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他的国民经济统计理论……，哪个不比索包里、涅姆钦诺夫那等没有个人建树和独特体系的二、三流货色高明百倍？”

尤其对侮辱和告密过自己的涅姆钦诺夫，除了鄙视，不排除顾准还有几分泄愤的成分。

别看他死活看不上留苏海归孙冶方对俄国人的迷信，可到了关键时刻，就是到了两人认识到捍卫价值论就是捍卫民生，捍卫一种普世价值观念的时刻，二位老先生的“门户之见”，“文人相轻”一瞬间就收敛了——一个马上敞开“庶出不得入内”的大门，双手欢迎“探春”参与管理“大观园”理论的探讨，一个欣然加盟，立即就折旧，财务控制，价格论的论证方法，资本利息等等等等，肯定属于“非会计”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淋漓尽致，弄得正出的李纨，薛宝钗落得只有听这位探春小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份，到头来反倒是孙冶方埋怨顾准“不民主”，并且自我表扬一番自己“是彻底的民主”了事。

“我一向自承，如果我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是修正主义的，那我比孙冶方更为彻底。如果孙冶方因持有并发表这些意见所以有罪，那我的罪更大于孙冶方。既然孙冶方是运动中的重点，我也跑不了。”

你可以说顾准是在为自己的“难兄”开脱，但你也可以说是这位“难弟”在“争功”呢。

“1964年2月讨论张闻天‘笔记’会上孙和我互相支持，以及孙把我的学习主席著作的《体会》长期参考不还，都是孙顾间思想交流的具体环节。”

你听，1964年2月张、孙、顾三家村的三声部合唱就开始了，他们一唱两和或两唱一和，此“三家村”可比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彼“三家村”早了两年多呢。

“他对于我的会计‘理论’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理论完全合拍一点，绝对不会有所怀疑。”

他老孙当然不会怀疑，他要的就是这种“完全的合拍”嘛！再看一张1967年顾准读《马恩全集》所作的读书卡片：

“其实，马克思的价值论整个可以证实的部分，不过是‘价值总量=价格总量’这一点，他是从这个统计平均出发来论证全部资本主义的分配（Joan Robinson 琼·罗宾逊夫人）的，至于价格运

动的机制则谈得很少 (vol. III, part. I 《资本论》第三卷 第一部), 并且认为价格运动的机制说明不了价值规律, 相反倒是这种机制 (Marx 称之为竞争) 还有待于说明。如果着重点是这样, 这一切论断是无可非议的。现在, 所论的社会主义经济, 这种经济同样必须有某种 ‘自发的规律’ (《法兰西内战》) 才得以运行得了, 可是, 在这里却坚持反对迂回曲折的表现了。

真正的问题所在是在于, Marx 认为共产主义是古代社会在更高形式上的复归 (《复查苏利奇》)。Engels 这里推出来了印度的公社和南斯拉夫的家庭公社, 这正是 Marx 本人一生以极大的注意去用力发现的。(不说 1844 年的手稿, 只要说 1858—1859 年批判大纲中的《所有制形态》、《导言》, 一直到晚年的斯拉夫公社就够了)

可惜, 在这个问题长被迁就了一点: 废除货币以杜绝 ‘资本主义的复辟’, 其余概不顾及了。

A. 用劳动时间来计算并不简单, 而且, 即使用 ‘时间’, 结果一定要否定时间;

B. 消费者选择无法不顾到;

C. 分工的消灭做不到;

D. 没有市场机制的经济核算, 和 ‘价值规律’ 的指导生产是不可能的;

4. 确实应该承认 “复辟” 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如何对待这个复辟, 见前卡。

5. 最有趣的是 Engels 回顾了他的 ‘效果’ 论。对不起, 如果没有市场机制, 效果又如何测量呢?

即使抛弃这一点不谈, 提到 ‘效果论’, Engels 在前面所强调过的全部东西, 瞬间全部瓦解了。”

笔记 P717

他又找到了价值论立得住脚的论据! 紧接着他写下 “Refer 孙 (参考孙冶方)。” 笔记 P719

1967 年正是孙、顾两个人最狼狈不堪的年份, 一个是新科 “中国学术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 已经在天安门广场被批斗了无数场; 一个是早已打翻在地的 “死老虎”, 妻离子散, 无家可归, 可两人却有天赐的学术和精神交流场所——厕所。学部若干茅厕, 可能还包括一些女厕, 都由这两个反革命分子清扫了。每间厕所都是他们的会客室、会议室、讲堂、论坛, 顾 Refer 孙和孙 Refer 顾的, 肯定还有许许多多。

顾准非常讨厌有人侧目他俩的 “厕所论坛”。每逢这种情况出现, 他就故意横戳着湿淋淋的墩布甩来甩去, 赶走狐疑或骚扰的眼光, 屡屡奏效。书和知识的馨香, 友情、人性和人格的馨香, 就这样在污秽和混浊中升华。

还有一段顾准对自己 “坦白交代” 的注释, 尤其令人钦叹:

“有的同志把我说成是孙冶方的‘启蒙者’，我觉得并不确切。因为孙搞经济学比我早得多，这种反动经济思想在他脑子里恐怕早已存在，无待我来启蒙，充其量我不过通过请教《资本论》那段引文对他起了‘惊蛰’的作用。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清楚我的反动经济思想和我的反动世界观的关系，我绝不是如所内许多同志那样，不自觉地受了他的影响，受了他的蒙蔽不自觉地犯了错误。孙顾二人，是分别在自己早已形成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共同酝酿了反动经济思想，这两个人的经济思想基本相同，然而大同小异，两个人彼此独立地想搞自己的‘体系’，谁也不是谁的助手。所以我说，孙顾关系是‘反革命思想联盟’。”

真不愧是“顾准”，写个坦白交代也这么咄咄逼人——你们甭说是我给孙冶方“启”了“蒙”，可也甭打算说我是孙的助手，我俩之间的“官司”哪里是尔等人物能够理解的？我也犯不着跟你们解释。既然你们非要给我俩套上一个“名头”不可，好嘛，“反革命思想联盟”老子还算勉强能接受！

这样的“坦白交代”你要他们写它有什么意义？说他俩是“反革命联盟”还用得着绕这么大的圈子吗？从顾准1957年开叫“老和尚”到孙冶方1976年怒吼“老匹夫”，他们何止是“思想联盟”，就是一个“派”——反动派嘛！但今天可得好好谢谢“当局”，没有这些绕来绕去的“揭发批判”，“坦白交代”，后人怎么得看懂这一场华丽的“高山流水”？

因冶方毫无征兆的突然入狱，“伯牙”“子期”失了“相揖而别”的尾声，被后人视为憾事。那年头，连冶方最信任的学生们也担心老师会不会在残酷的单人监禁中疯掉，只有顾准大不以为然地嫌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老师——“老孙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就不会发疯，你们太不了解你们老师了”。他还把握十足地告诉这帮年轻人——“老孙只要出狱，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我”。

“老孙”出狱，顾准却已经遽尔长行，两人失之交臂，阴阳两隔，时间只差4个月。尚是“待罪之身”的冶方，日日徘徊在接纳了顾准骨灰的小小三里河旁，他的惆怅和心伤之痛，大概也只有顾准才能懂得。

人们，你不妨夜深人静时驻足一会儿今天还静静流淌在京城闹市的三里河，兴许你还能听到那一场“高山流水”的依依余韵。

我为顾准，冶方羡慕一声——人生得一知己如此，足以。

3. 死念

1964年10月，中央工作组进驻经济所，名曰“四清”。

“四清”更正式的大名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段至今都很“不清”的小历史。不但顾准文字中多次提到的“四清”和“假四清”很难定义，“农村四清”和“城市四清”也是两件内容完全不同却又在同一个名头下、很难定义的东西——前者曰“清工分，清账目，清财产，请仓库”，后者曰“清政治，请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以致搞农村“四清”搞出了名满天下“桃园经验”的人又成了城市“四清”的对象。一时间好像大家比着看谁更左，谁对阶级敌人更狠，谁整人整得更多，更凶。

“四清”既像是导致了文革的一个前奏，又像是企图阻止文革的一个矫枉过正，至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人说得明白，也就鲜有人去研究了。顾准写于文革中的“历史交代”口口声声称“假四清”，就是因为“四清”早已被彻底否定，“桃园经验”的经验者早已被彻底否定了。在中国最不被待见的辩证法三大定律之第三定律——“否定之否定”，在这30年的中国倒是展示得淋漓尽致。

“四清”先从农村下手，几与“群星灿烂”同时开始，人们都以为那仅仅是农村的事情。不料城市“四清”紧接其后，与“群星灿烂”相隔没有几个月的功夫，且又是一场大规模的压制行为，“群星们”别说灿烂，连收敛已经发出的微光都来不及。

10月，孙冶方和顾准被通知“停止一切写作，全部时间投入学习”，经济所的“四清”至此开始。

此刻，顾准已经“明确知道孙冶方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却“出于我反动阶级的本能，不能想象孙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阶级觉悟”这一点上，他永远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到死都没有“成熟”过。

经济所在四清工作组的带领下开始“迎头痛击”孙冶方。

革命群众揭发孙冶方的反革命经济理论的来源有两个：索包里和吴绛枫。前者是苏联的大经济学家，眼下正慢慢地“修正”着苏联斯大林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后者正是顾准老弟的笔名。老弟成

了老哥“反革命”的唆使者，罪莫大焉。也就是三个月前，顾准还因为不理解孙冶方为什么不要他再参与经济研究，不许他再对粮价问题“初探”下去而对孙所长大发雷霆，大甩脸子，现在他终于明白孙老哥为什么要这样作了——他要在他自己灭顶前先把顾老弟推上岸，保住一个算一个。

明白过来的顾准却丝毫没有上岸的意思，反倒顺势翻上孙冶方的“贼船”。

“我认为孙冶方在经济问题上发表了的一系列意见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一向自承如果我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是修正主义的，那我比孙冶方更为彻底，如果孙冶方因持有并发表这些意见所以有罪，那我的罪更大于孙冶方……既然孙冶方是运动中的重点，我也跑不了。我就等着挨整……孙冶方的问题是任用我这个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这个人到哪里都要害人，这回又害了这个老朋友。”

他要和孙冶方一起“顶罪”。不过话说回来，此刻他即使想要上岸也上不了了。这是另一个故事：

1962年他去上海调研会计制度问题住在大姐陈秉真家里时，一口答应了大姐请他在北京照顾正在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书的外甥宋德楠的请求。德楠1959年就考上了清华，可那会儿舅舅正在河南商城劳改，无力提供任何帮助，现在舅舅正常工作了，可以拜托了。德楠还有个哥哥德藩也曾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1956年就毕业了，1957年在留苏预备班被打成了右派，和舅舅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舅舅顾准十分器重和喜欢这两个外甥，认为他们不但聪明而且有思想。常言道“外甥像舅”，此话放在这甥舅仨身上很是不谬。可论到“不安分”，这仨人也差不多。德藩已经是右派，德楠也不安分。

1960年代初，清华、北大一帮学生秘密组织了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宋德楠是发起者之一。这帮初生牛犊不明白仅仅这个名称就足够要了他们小命——你们要研究什么？什么叫“现代马列”？我们有现成的研究、编译机关，难道你们认为我们的“马列”是过时货、冒牌货？

这些孩子们哪里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红色恐怖意味着什么。从1962年开始，德楠经常在节假日去二里沟的舅舅、舅妈家，和舅舅谈读书，谈思想，谈学问，有时还带着“研究会”的好朋友一起去。二十刚出头的德楠以及他的同学们和舅舅非常投机。“你们与其研究共产主义，不如研究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本、人道主义”就是那时候舅舅对外甥和他的伙伴们郑重道

出的。

到了1964年10月顾准又一次“陷落”之时，德楠的“研究会”也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死死盯上了。研究会的头头决定向专政机关投案自首，成员们慌得乱成一团，束手无策，幼稚的德楠竟带着另一名研究会同学来向舅舅求救。

他们都没有逃脱。

一个曾经是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的舅舅，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外甥，结果怎样，可想而知。

“研究会”案一直弄到康生先生手里。正发愁要打一个孙冶方，连上张闻天，揪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团伙却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凑不够数目呢，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延安整风中被苏联观察人员叫做“刑官”的康先生此刻喜不自胜，顺藤摸瓜，乘胜追击，宋德楠——顾准——孙冶方——张闻天——刘少奇，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跑不了。宋德楠被隔离，孙冶方、张闻天被批判，连带骆耕漠、林里夫、狄超白都吃了挂落，顾准当然更跑不掉。

康生先生的“三家村”至此就完美了——张、孙、顾三家村集团，色、香、味俱全。

这一回妻子汪璧没有说话。刚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的她非常虚弱，也许她该说的话都说尽了，面对又一次闯了祸的丈夫，她已无话可说。可这一次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爆发了——“你不管不顾自己可以，怎么能连累上我的小外孙，你怎么对得起你大姐！”

面对颤颤微微的老母亲，顾准痛苦极了。这一次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同。单枪匹马地面对你们，我死都不足惜，还怕你什么帽子不帽子的？可这一次，你们拿德楠和冶方放在中间做人质，我如何面对？

一时间顾准真的认为是自己连累了外甥德楠，拖累了好友孙冶方。平生第一次，他起了死念。“十二月中旬，死念不止一次袭击过我……假如我能够免除宋德楠的处分，无论怎样加重对我的处分，我也心甘情愿。”情愿被你们枪毙掉，只要能放过德楠，或者我自己了断了自己，事情到此为止也行。他开始认认真真考虑各种死法。

“我还无回头之意，径直往死不改悔的路上走，竟然羡慕起法捷耶夫来了。”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奇·法捷耶夫，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最著名的作品是《毁灭》，最著名的行

为是毁灭自己——1956年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自杀。

可时间不等人，也可能是上帝不允许他在使命未完成之际就匆匆抽身，1965年2月的一天，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和文件的状态下顾准被捕。执行的人们直接从家中把人带走，汽车绝尘而去，一家人谁也不知道他被抓去了哪里。这一回，死是肯定死不成了。

顾准是由康生亲自批捕的。先是关押在公安部，然后转移到一处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地点，出来后仍然不知道，至死也不知道的地点。好在被捕前他警告外甥德楠“清理”东西时自己也彻底“清理”了，母亲和妻子刀砍斧剁，火烧水冲，令抄家的人一无所获。至于都有些怎样的精彩文字，何等的菁华思想顺着马桶流入化粪池，人们将远无法知晓了。受尽苦难和屈辱的汪璧在三年后的文革中自杀，人们最后一次对她的侮辱，拿的就是这件事。可怜她死前留下的仅有一句话的遗书就是“帮助反革命分子顾准销毁罪证罪该万死”。多少残酷、残忍、遗恨、怨怼、无奈、软弱、哀痛都在这一句话中了。

中央工作组对顾准实行的是“监护”，不许回家，不需外出，不许见人，不许通信，二十四小时监视（是为“监”）以防自杀（是为“护”），从2月中旬持续到6月下旬。

“监护中我的态度异常顽固，甚至达到死不悔改的程度。”

到了“监护”后期，被监护者累了，监护者也累了。有一天他竟忽然异想天开提出想要写一篇关于财政制度和会计制度的文章，弄得监护者哭笑不得，气恼不得，匆匆结束了监护，恳请他出去后再写且礼送出他“监”。

“监护结束于6月下旬。6月下旬至9月中旬是我家庭生活的最后八十天，其间把老母送到太原妹妹家，又值汪璧出差，照料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深知监护的结束绝不可能是灾难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将老母亲送去山西的妹妹家，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大不了就是再去劳改而已，有商城垫底，什么样的劳改我不能对付？

就是这样的当口他也不愿闲着，重读了《粮价问题初探》手稿，深感不满——有了新的经历，新的体验，当然有了新的不满，新的想法。“拟了一个改写提纲。那时候反动立场没有丝毫触动，还想以我的反动思想体系来‘影响’（！）领导，还想做什么乌菟之献哩”。

身处如此环境还丢不掉他的“乌菟之献”，“政治上的不成熟”已经不可救药了。

1965年9月17日，顾准被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两天后被送往周口店农村强迫劳动改造。

他成了全中国唯一一个由正式官方文件下达处罚令的“二次右派”。

4. 人活着，而且是健康的

这是他第四次被送去劳改。

第一次，1958年5月到12月，河北省赞皇县；第二次，1959年3月到1960年2月，河南省商城县；第三次，1960年3月到1962年3月，北京郊区清河；第四次，1965年9月到1966年9月，北京郊区周口店。

以后他还要被去劳动，但是不叫劳改，也不叫监护，甚至也不叫监管而是叫五七干校，叫战天斗地。“地”是河南息县，离他差点成为饿殍的“地”——商城县相距不远，时间是1969年10月到1971年9月。和劳改相比，五七干校规模要大得多，但实质上还是“以体力劳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不过因为人众，大部分所谓知识分子都被送来了，符合了“摩肩接踵”的热闹感和“十万人家”的扎堆感，就显得惩罚的成分要小得多，甚至能让人产生“光荣”的幻觉。这也是人多的好处。顾准在息县是另一个故事，后面慢慢讲。

准确数算，顾准五十九年的生命，有六年多的时间在劳改、“监护”和监管中，比起孙冶方的七年囹圄还差上一年，在中国确实也算不得个什么。到顾准最后一次回到北京不再劳改，也不再被“监护”、监视、监管，距离生命的结束也只剩下三年的时间了。

“到周口店割谷二天，竟至下肢肿胀，走路困难……一个多月后去理发，看镜中容貌憔悴，竟然不认识自己了……心情异常阴沉。”

这是顾准生命中的又一次低谷。

第二次成为右派，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将会失去什么，这是早就讲好了的——“再度戴上右派帽子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完全离开这个家庭”，只不过和他事先就约法三章的妻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再

度戴帽”竟会一语成谶，他的丈夫会中这样一个全国唯一的“头彩”。

就要失去妻子、家庭和亲情的男人顾准，一时心如死灰。

就在顾准精疲力竭，憔悴不堪地跪在秋日的谷子地里收割之际，头上戴着“修正主义者”帽子的孙冶方也被送来了。他又惊又喜。惊的是孙老兄虽说是个老“右倾”但却从未被弄成右派，我为了不牵连他连自杀的心都起过了，细想也确实没有实质性地牵连到他，怎么会把他也搞到劳改营来，按说他还不够“资格”呢；喜的是“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乐也，何况在如此黯淡、寂寥和愁惨的“他乡”。

一时间他的抑郁至少去了一半。

顾准身上有一种很罕见的特质，就是每一种向上的、进步的、目光远大的事务或者事物都能激发出他身上人性的新能量。这种能量只需一点点就足以战胜诸如厌世、颓丧、愤世嫉俗、忧郁、怨愤、仇恨等等负面阴性的情绪，能刺激他不断向生命的高峰攀登，于无声处，无人迹处领略常人很难领略的生命之美。

这种能量的来源，明处有二：书和友——知识和友情，暗中有二，一个是天赋，另一个，不得不让人猜测，可能就是那簇一直没有熄灭的“蓝焰”。

而这二者也可以说是同一种能源。

书，他又带来周口店不少，都是公开出版物。我读的是史，且是你们钦定的史，总可以吧？从再一次失去自由的1965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顾准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主要是中国史学家们的著作，计有郭沫若的《古代研究自我批判》、《古代奴隶制》、《十批判书》，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汪奠基的《老子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无名论》，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等，还有日本史学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他带去劳改的书籍，在重量上肯定大大地超过了行装。除了阅读，他还做了海量的读书卡片。在紧接而来的文革红色恐怖中，他冒着丧命的危险保存了它们中间的一部分并带回了北京。而友，你看这不是来了吗？不单是友，且是挚友哩。

孙冶方是他此生唯一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而且是终身的朋友（Lifelong Friend）。纵观顾准一生，他肯定不是个内向之人，仪表堂堂，智商极高，渊博如魔王。但若是以中国标准衡量，他又显得情商平平，狷介桀骜，都是那“来得太早的成功”和来的也不算迟的各种打击和挫折造成的性格使然。敬佩他的人不少，尤其是年轻人，有些到了最后甚至是崇拜他，但和他接触频繁，能平等对话，有共同的精神始基，其思想的碰撞又能产生新思维、新思想的朋友，只有孙冶方一人。此外，孙冶方也是他的保护者，有许多次假如没有孙冶方为他扛着，例如《试论》事件，例如《美国总会计师制度》事件，例如《粮价问题初探》事件，他都会陷入更大、更危险的境地。这才有1968年4月的一天，当孙冶方毫无先兆地被捕入狱第一次被顾准得知，据在场的当事人形容，他面色苍白，身体摇晃，几近虚脱的一幕。不过他的软弱时刻一如既往地短，不久，当冶方的学生、崇敬者们焦急地担心老师会不会在单独监禁中疯掉时，顾准又嘲笑他们根本不理解他们的老师——“一个有思想的人是绝不会疯掉的，老孙是有思想的人，你们真是杞人忧天”^{当事人口述}。

眼下，老孙也被送到周口店，真是天不绝人。

然而他们被严格禁止交谈。两人在一块地里干活，一个锅里吃饭，却不许对话。焦阳下的大田里，他们只能用目光交换问候与关心，连打个招呼都是罪过。一个五十七岁，一个五十岁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老头，居然还被这样防范，不是不自信到神经兮兮，就是恶意到淋漓尽致。两人眼下最急于交流的是观点和思想，都是充满着数字、数据的东西，又哪里是眉目能“传情”的。如此劳改、监护，真是一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和老孙交谈不了，我就和书交谈，我的幸运就在于此，在于思想的自由放飞。这是你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幸运”。

从1930年代末始于上海孤岛，1958年正式实施的“系统读史”习惯，再次拯救了已经身处“沟底”的顾准。从他日后面世的大量读书笔记看，他的主要经济学观点成型于1950年代，尤其是《试论》问世前后，而许多政治哲学观点则是在1965年前后雏形和凝固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史观的形成。在这个时期，他彻底跳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五段论”铁模，

断然宣称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甚至也没有封建主义社会，只有“普遍的奴隶制”和“绝对的专制”，同时高度质疑“五段论”并非马克思的原意，而是被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传人”、“使徒”的人强加和篡改了的冒牌货。他用尖锐到几近刻薄、几近“恶毒”的言辞写到，就是这些人完成了“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 文稿 P300。

否弃“五阶段”论的要害并不在于就史论史和单纯的史论学术之争，而在于动摇了所谓“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基础——被“强奸”过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顺着“中国几千年东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造就了专制制度这条脉络，他质疑当前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餬口经济”上的“餬口政治”，为生存下去就必须具备某种低劣的不诚实，什么“收不了麦子收麦秸，收不了麦秸收思想”之类的愚昧。难道这就是五段论中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连停留在、或者向着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大大不如的这种四不像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难道就应该是中国的方向？这种早就在政治哲学领域内被定义了东西——一种“与专制主义和腐败的人民有关，与衰落的社会有关的低级的政治生活” 利澳·斯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难道就应该是中国人的政治宿命？

“什么是正义？保持千年来不变化的餬口经济就是正义吗？” 笔记 208

这个石破天惊的疑问贯穿着顾准整个政治哲学思维的过程，也是他抵死不低头的理论中坚。假如没有这个中坚的支撑，他的思维怕是早就崩溃了。

这一史观也直接导致他怀疑马克思主义源头的准确性，并看到和道出了几乎全体中国读书人都不能，不愿，不敢想到，看到，更遑论“道出”的偶像们的各种问题——论据的缺略，论证的偏差，结论的谬误以及导致的后果。

非常可惜这一时期没有《顾准日记》面世。依然是那个老问题，是“没有写”还是“不方便面世”困扰着每一位顾准探索者。1957和1958年的“失踪”可以断定是后者，但1960年代中期的“失踪”就很难判断。没有蛛丝马迹显示这些年有他的日记体存世，只有大量“已经面世”和“不方便面世”的读书卡片，虽然也非常珍贵，可以循迹找到他思想形成的轨迹，但终是不如那有日记体存在的九年来得直接和真实。

这个话题很难驾驭，还是把话头拉回来，稍微提一下他的第三种能源——那簇“蓝焰”。

他把那年在东安市场上淘到的中英文双语《新约全书》也带来了。在劳改队的窝棚里，他把它和其他史书放在一起，对比着细读，思考和理解这本书，既当做西方历史——政治史、人类史、宗教史和社会史，也当做中西哲学、思想史比较着读、理解和思考，这一过程在他的读书笔记、卡片以及和六弟陈敏之的通信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特别是在“历史笔记”中，他多次、反覆地提到基督教以及对中国现代史学家宗教观的批判，责备他们不懂得基督教，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另一种基督教意识，才有日后在《关于基督教的笔记》中嘲讽他们口中的“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是“数典忘祖，忘恩负义”。

不通透地阅读和理解《圣经》，尤其是新约，无人敢说出这种话。

谷子收割完毕，天也很快冷了下来。1966——一个不祥的年份，在格外料峭的寒风中来到了。周口店里，山顶洞外，寒鸦长号，万木肃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正播送着一年一度的元旦社论，“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更加深入地开展文化革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欣欣向荣……打倒美帝……打倒苏修……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慷慨激昂的男高音在呼啸的暴风中忽近忽远，令人心悸。

“春节假前，一方面幻想回家度假，能够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也有最终离开这个家庭的思想准备。到家在下午，汪璧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

既然该来的都会来，那就让它们一起来吧，无须期待，无法躲避。

“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第二天是阴历除夕，按照1962年以来的惯例，整天忙于做饭，做出了节日的饭食，度过了四天的假日……”。

这个不幸的男人用尽了全身的力量为即将破碎的家庭做了四天的年夜饭！

何等样的定力，能使这位满腹才华，本应“远庖厨”的君子，曾经被热爱被崇拜的丈夫和父亲，整整四天，躲闪着妻子和孩子们的冷眼，埋头于油盐酱醋、锅碗瓢勺、鸡毛蒜皮之间，沉默着用布满血泡破裂后结成老茧的双手殷勤劳作，以此与这个曾经令他感到无比温暖，无比骄傲的家庭告别。

本应是节日欢乐的天伦就这样成了心碎、煎熬的地狱，整整四天，他的力量都用尽了。

“阴历初五，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发现‘心律不齐’……这样，假期结束回周口店的时候，带回去两个包袱：离婚和心脏病。”

六天的假期结束了，背着两个包袱的他年初六要回周口店去。六天前他还只是个劳改右派，现在成了无家可归的劳改右派。临出家门，实在是再也忍无可忍，他冲着正在拌嘴的五五和小弟大吼了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

回到周口店他就病倒了，心悸，头晕，胸闷，气促，四肢发冷，有时甚至感觉就要死了。实在无法坚持下地劳动，他向劳改队请假，负责人动了恻隐之心，批准了。

他又一次想到了死，但是和一年前起过的“死念”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一次是他自认为连累了宋德楠和孙冶方，想以自己之死换取他们的解脱。那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想要自杀；而这一次是他感到真的面对死亡了，除了十分真实的对死亡的恐惧，他更大的恐惧是突然的死亡可能会使他给这个世界什么东西也留不下来：

“想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心脏病猝发就会死去，想把已经写成，自觉不满意的《试论》和《初探》改写一下，曾拟定了改写的提纲。”

这就是顾准不同于常人之处。与其说他死到临头还想“留名青史”，倒不如说他面对死亡也还是一如平常，人死并不如灯灭，该干什么还要干什么，只不过要抓点紧了。

他写信给汪璧，说到自己的“鰥、病、右”，可是没有回信。写信给唯一还能理解他的六弟陈敏之，说到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自己一个用了多年，带一面小镜子的剃须刀盒不小心掉在地上，竟被一匹走过的马踏碎了。他跟弟弟说这是镜破之讖，后面的潜台词却是，既有“镜破”，那就还有“破镜重圆”的盼望。

至死他都死心塌地地爱着妻子，他不相信妻子完全不理解他，只是为了他们的五个孩子，她只能这样，别无选择。

再后来，经过房山县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的检查排除了心脏病，对于顾准当然又是一次向上的能量补充，使得他“从‘沟底’爬上了一层”，“人活着，而且是健康的。”，这几乎令他欢欣鼓舞。

是的，人活着，而且是健康的，从灵到肉。

他从未厌倦过生命，也从不抱怨生活。他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热爱自己。八年后，在得知自己必将很快死于不治之症后，他写下的遗书，第一句话就是“我热爱生活”^{顾准遗书}。

我常常是忍不住地、不断重复地写下他遗嘱中的这第一句话。

在他死去近四十年后，有位后人学者谈到他，说他“太被历史青睐”，虽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却也不无道理。比起许多既害怕死亡，又厌倦生活的人，尤其是“文革中人”，他确实是一位被历史拣选者、精选者——既触摸了过去，思考了未来，又热切地拥抱了当下，胸中同时装下了昨天的历史、今天的现世和明天的未来，心胸长阔深淳如此，怎会不热爱生活？也惟其如此，他不惧怕死亡。越是热爱生活的人越是不惧怕死亡，这既是个悖论又是个常态，且屡屡在许多普通人和不大普通的人身上显现、证实。

四月，劳改队移师大韩继村，离周口店镇大约一公里路。劳动不再是大田农活而是建造干打垒的民居，用途嘛，为的是苏修一旦对中国打起核战争时，经济所全部搬来大韩继搞经济学研究。那年头，这种思维和行为很正常，到处都在打洞挖坑，备战备荒，有意制造一种紧张的氛围以增加“人民”的凝聚力。用顾准日后使用的一个词，叫做“Dose”——一剂药。

能活下去，令顾准很快振作了起来。不过话说回来，他也从绝望过。

还不仅如此呢，在大韩继被监管劳动的环境比周口店宽松了许多，他居然争取到了一个单独属于自己的小窝棚，能有不少时间在里边读书，笔记，思考，还可以大大方方地看“那本书”，没有打扰、诘难和纠缠。一至如此，夫复何求？

“调到大韩继工地，正在证实没有心脏病之后不久，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消沉情绪，究竟要振作得多。那时，反动世界观当然毫未触动，可是人活着，而且是健康的，总得工作。经过周口店的七个月，身体也更适应劳动了，所以，这四个多月的劳动是积极的，埋头劳动，也可以忘却一切。这四个多月，学会了推小车、打夯、安装窗玻璃、油漆门窗。”

小孩子般地容易满足却又哲人般的深刻，一个深刻的灵魂，即使痛苦也是美的。

5. 一个自由而成熟的灵魂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先生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同日《人民日报》加上长篇编者按转载，说是转载还不如说是同期发表。顾准看到了这份报纸、这篇文章，并立刻嗅出了格外不祥的气味。

紧接着，无声的喧嚣在各种、各地的报纸上骤起——你转载，我不转载，你早一天转载，我晚一天转载，你发这样的编者按，我发那样的编者按，你一言不发，我原文转发——都是事儿，都是故事，都是事件，都是严重的、“发人深省”的和“错综复杂”的。泱泱大国，一切事关极峰脸色之事都是“政治”，都必须煞有介事。

对这一套东西顾准早已见怪不怪、厌恶透顶，原是不愿花太多的心思去测度，也明知道自己是只“死老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眼下只要能允许他“躲进窝棚成一统”，他才懒得管它外面的冬夏与春秋呢。

虽然在四年后的“坦白交代大全”中他一再表白“对此很少关心”、“对此多少是漠不关心的”，但从同时代人日后的叙述和他留下的文字中依然可以看出，出于一贯对“珀里斯”高度敏感的本能和“观察”、“探索”人类社会的高度兴趣，顾准早在风起于“青苹之末”时，就已预感到它将盛怒于“土囊之口”——《北京日报》转载如此迟缓，如此不情愿，畏缩和勉强，他说——彭真要倒，并且“彭真倒了，刘少奇也要到，这是又一次‘罢官’”。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很可能已经再次面临大的灾变，和八年前的那次，和去年的那次相比，只会更加糟糕。

果然，半年后的1966年5月11日，姚氏的另一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顾准立即判断“少奇完了”。

天下不太平，未来一片诡谲。

“像不安分的猴子，总是拔起葡萄又种下，种下又拔起来，永远不消停”《竺可桢日记》，1957年他就把这话向综考会主任竺可桢先生说过，令竺先生深感不安。现在他又向一起劳改的“改友”哀叹：

“唉，为什么总跟小孩垒积木似的，摆摆好，弄弄乱，摆摆好，有弄弄乱。三年困难时期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算中国命大，现在又要来给自己挖坑了。” 陈瑞铭 《追思顾准》

惊诧于极峰极力推崇“阶级斗争永不熄灭”论和“不断革命”论，却又不能容忍黑格尔辩证法三定律的第三条——否定之否定在中国被宣扬，顾准判断这将又是一次以“阶级斗争”之名，行“任性之为”的权术、权谋之争。

“事实上，听凭一个人任性而为，世界上就永远没有容忍这回事。如果要真正的阶级斗争，你就必得有一个英国式的议会。否则的话，不过是假阶级斗争之名，杀戮或迫害异端而已。” 笔记 P327

人与人在灵性上的差异和冲突最是无法调和。

和顾准同在大韩继劳改的有个经济所的小“改友”陈瑞铭——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海归，1961年分配在经济所，因为写了《昌黎农村集市贸易调查报告》而被所长孙治方看重，不但被推荐上了中央内部刊物，还写了封亲笔信表扬鼓励他。小伙子出于小虚荣，把所长的亲笔信向许多人“秀”过。当庞大到70人的中央工作组进驻经济所时，57年还在莫斯科呆着，对国内的事情全不知道个天高地厚，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小海归惊慌失措，先是烧掉了它，后又推说是妻子收拾杂物时丢失了。工作组即在控制他的同时紧急讯问妻子，妻子一口否定，他立时三刻就成了“销毁反革命罪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者，当场反革命当场被抓住者也。

一封“大修正主义分子”的手信就这么造就了一个“小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成了人民外部矛盾，除了送去劳改营再没有什么别的好去处了。

在大韩继，“小反”陈瑞铭和“老反”顾准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性格脾气又相近，遂成忘年之交。四十年后，年近七十的瑞铭先生感慨万端忆当年，一连串用了十个排比句形容五十一岁的顾准——性情中人，口无遮拦、爱发议论、锋芒毕露、会计专家、精通英语、学贯中西、敢讲真话、喜怒形于色、生气时也会骂娘，最后说自己当时“不具慧眼，难识真佛”，没有达到眼下学术界对他评价的高度——卓越的思想家、预言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和理论先驱等等。但话锋一转他紧接着说，以上评价恰如其分，绝无溢美之嫌，当年之所以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自己少不更事，见识太少，是为“草色遥看近却无”，“近人身边无伟人”。

下面摘录当年“老反”和“小反”之间一场有趣的对话。

一天工余，“小反”踱进“老反”蜗居，幽幽问道：

“搞会计呢？这活儿对右派合适。”

“会计是我混饭吃的工具，我的兴趣在于玄想。”

“想些什么？”

“海阔天空，古今中外。”

“具体点。”

“那就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对阁下说吧，我在想‘一元主义’和‘多元主义’。”

“???”

“前者是我年轻时不怕杀头也要坚持的理念，后者是我这些年一直在玄想的问题，并且我已经转向她了。”

“哦？本人也算学过些许西欧哲学史，大概知道您说的意思。像苏、中这类基本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太多元了可能不行吧？”

“的确，夺取政权，‘一元主义’有优势，但执政后不走‘多元主义’的路就走不远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到头来一定干不过资本主义。”

“您可真敢想！如今连一说‘利润’都被扣上资本主义大帽子，连经济杠杆原理都不能提，您可倒好，敢想‘一元’、‘多元’这样的问题。”

“是。我不但想，还在拼命地写。将来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把它们留给你保存好不好？它们今天是‘异端邪说’，兴许几十年后人们会发现我的‘一家之言’有些道理呢。”

“谢了，谢了，您自己留着吧。我只想拜骆耕漠先生为师，做一部《资本论》的活字典，混口饭吃吃而已。”

唉，年轻人，你拒绝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

顾准在周口店、大韩继都没有中断他“拼命地写”，他享受这个过程。只要在读、在想、在写，

他就处于一种真正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中。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能够自由地思想，顾准的“被历史青睐”，他的全部幸运，就在于思想的自由。这是彼时几乎全体八亿中国人都无法享受到的幸运，包括专制者——他们可以“任性”，但是自由绝不是为所欲为的任性，任性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一种表现，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一种表现，所以任性并未达到真正的自由。任性也可能确是一种自由，但它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意图，所以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之内。熟读黑格尔的顾准深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在对社会作了长期认真的观察后，他对这种“受偶然性支配的任性”有如下记录和评论：

“(号称) ① ‘体现了人民的或无产阶级的最大利益’。② ‘时代的智慧与良心’；(但是) ③ 这可有问题：‘希求’是未来式，‘是’是现在式。那么这个自由意志究竟是实现了的自由意志呢？还是想望中的自由意志呢？(结论) ④ 总之是夸大。” 笔记 P369

黑格尔的“自由史”观直接影响了顾准的史观。黑氏将他那个时代以降的“人类自由发展史”分为三种形态：

1. 东方君主专制主义；
2. 古希腊奴隶制发展出的雅典民主制；
3. 资产阶级民主制。

黑氏认为东方的君主专制主义根本无自由可言，而所谓君主一个人的自由不过是“任性”和“放纵”，并非真正的自由（“连马克思也说中国只有普遍奴隶制，中国的大官僚要受廷杖，所以他们不是封建贵族” 笔记 P23）。古希腊的自由是在少数奴隶主和自由民手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制才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的普遍的追求，并把这一点归结于基督教的影响。

这种史观令顾准彻底抛弃了被斯大林“强奸”了历史而生出的所谓“五段论”，推动他从“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入手，创建起三维（古今、东西、中外）的思维框架，在夜漫漫，路漫漫中上下求索。

关于“自由与任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关于“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普通经验的规律应该

是普通经验的精神”，关于黑氏的“自由史”观和马氏的“五段史观”……这一系列马克思对黑格尔又继承又批判，有时却又显得是“故意曲解”的命题，在顾准日后读书、笔记和文章中有许多阐发，有些见解和提法即使今天看来也骇世惊俗。更奇异的是它们和与他同时代的某些西方政治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就像他1957年写作《试论》时与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不谋而合一样。

顾准这些思考过程的显露出现于“文化大革命”中期——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前半叶，主要的相关文字都在现在面世的日记、笔记以及和六弟陈敏之的通信集中，但思考却是从党校时期初识黑格尔就开始了。到了“文革”将起未起，全中国都浸沁在暴风雨前夜恐怖的静默中时，他的思考已经有了一个小高潮，至少从彼时年轻人陈瑞铭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的“一元与多元”观念已经牢固形成——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笔记 P424

这段写于1973年的读书笔记，是全部顾准文字中的一段高度概括，浅显易懂的精华，也是今天的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假如根据陈瑞铭先生的记忆，早在1965年这个观念就已经成型，也一定有文字记录，你看他不是说自己一直在“拼命地写”吗？只不过因为迫害和摧残极剧的文革骤起，又无人有胆识认出这些文字的历史价值并担当起藏匿和保存它们的重任，在血腥的“武斗”到来之前，顾准选择了大部分销毁它们，他相信自己有朝一日完全能够仅凭记忆复制这些已经根植在胸的文字——

“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要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以写，丧失它们，又何所惧。” 70.1.1.

当年的青年人陈瑞铭见证了这一切。四十年后，年过七十的他写下《追思顾准》的回忆。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

“（彼时）多少‘雄狮’失去了自我，被名目繁多的牌牌改造成了驯服、扭曲、自我忏悔的‘公驴’。反反复复挂到顾准脖子上的‘牌子’可谓多矣，他一概斥之以鼻，至死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愤然发出阵阵震撼国人心灵的狮吼，至今仍在神州大地回响不绝。” 陈瑞铭《追思顾准》

一个多么独特、自由和成熟的心灵。

第十六章 狰狞岁月

1. 在兽性与血腥面前

许多过来人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记忆，差不多都起于由远而近锣、鼓、镲、钹的合成喧嚣。1966年，从仲夏到深冬，这铿锵的国粹大声就没有止息过。最初的锣鼓还是歌咏，快板，秧歌，朗诵的开场，但很快就升级为焚书的烈焰和被殴打人们哭号的伴奏。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第二次“大接见”。一句潇洒飘逸的“要武嘛”，令打杀的疯狂升级为狂飙，震天的锣鼓也成了招徕人群看几分钟内活活打死一个人的好戏开场。

戏，是有名堂的，曰“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一场东方式的杀人游戏至少持续了一个半月，从8月到9月。

大韩继地处京城远郊，锣鼓点响起得也晚一些，但恐怖的程度非但不亚于京城，反而因为地处偏远和教化程度更低而显得更加狰狞。喧天拔地的锣鼓响到顾准的蜗居前是9月1日。若在正常年头，正是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

前一天已经上演了一场杀人好戏——“人民”已经在八月的焦阳下由锣鼓伴奏着活活打死了一个本村地主。本来顾准这些人的身份（你是干什么的），成分（你父亲，祖父是干什么的），乡下的红卫兵小将们并不清楚，可是前一天就有“城里人”偷偷地告诉了他们，谁是右派，谁是反革命——“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新约 马可福音 14：44》。这世界从来不缺犹太，他们甚至连那三十个银圆也可以不要，只是要满足骨子里那种类似蚂蟥或者鬣狗的、嗜血的爱好

和本能，他们叫它作“阶级觉悟”。

“人民”和“群众”里，这样的人不算太少。

“在一封信中，他（顾准）告诉我，红卫兵将他一顿痛打之后，还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拖，弄得满头满脸全是血污。” 陈敏之 《顾准的最后十年》

目睹者的叙述就更现场化一些：他们将他从窝棚拖出，按在地上剃去半边头发，名曰“阴阳头”（可能算是传统五刑之首——“黥面”的简易变种，以示贱民与顺民的区别），然后当众毒打，再用砖头猛击头部，让鲜血喷出来，溅开去，然后将受刑人在黄土地上拖来拖去，一边继续拳打脚踢，让血渗进土里，再让裸露的肉体在血的泥泞中翻滚，以示场面的壮观。

程序化的杀戮和暴虐，程序化的兽性表演，技巧熟练。可本应在如此兽性与血腥面前呻吟和惨叫的人，居然笑了。

在被又打又拖，脑门血流如注的时候，受刑人先是一声不吭，无声地笑。在殴打暂停，他摇晃着从血泥中爬起来时，竟冷笑有声，呵呵作响，连施刑者都吓住了。

与其说这是极度愤怒后的冷笑，不如说是强者对弱者“不过如此”的鄙夷，加上“观察”又前进了一步，没准已经到达“火山口”或“震中”了，“探索”又有了新的取样，虽被岩浆重重灼伤，可人还活着，多好，为什么不笑？

“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软弱的原因。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文稿 P394

1966年不过是把1793年“自由，自由……”翻版成“人民、人民……”罢了，专制和独裁依旧，暴行和恐怖依旧，软弱依旧，色厉内荏依旧。

“人民”是什么？“人民”原本不过是一个个渔父桑娘，贩夫田丁，是“驯服的家雀”^{59.12.26.}，如今除了十七年不断虚戴上的各种帽子，又加上一顶“人民民主专政”的冠冕，要他们“摘星星摘月

亮”^{59.12.26}般搞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将他们放在能够改写历史进程的高度来虚无神化，将比“大跃进”还要“可怕的大志”^{同上}——革文化的命，革文明的命——加在文明、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人民”身上，令他们沐猴而冠般可笑，提线木偶般可怜。

“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文稿 P270}

熟读中国历史，顾准深知“人民”原是个很不国粹，很虚妄的名词，老祖宗们也很少使用它。如今的辞典却解释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又一个“以文害辞”^{顾准摘孟子语 笔记 P146}、语乱天下的典例。无法明确定义和科学量化，也无法从普世的视角界定，却以最为密集的频率从1949年使用至今的“人民”这两个字，其爆炸式流行本身就是吊诡和无逻辑的。在数千年来只有“臣民”，“庶民”而无“公民”意识，“因为没有法权观念，所以，不仅没有人的基本权利、人民主权的概念，也没有国家主权观念”^{笔记 P187}的国度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如极峰极为坦率的说法——人民民主独裁）岂不是又一个“真正是在调和无可调和的矛盾，极可笑的名辞”^{笔记 P21}吗？

以“人民当家做主人”之名而行的“直接民主”，只有专制者的道德和意图伦理，没有行政者的责任和秩序伦理，令社会走向混沌和无序。“人民民主专政”之名发动这样一场“文化革命”，只可能阻碍文明、窒息文化。

“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近代文明。”^{笔记 P146}

在兽性与血腥面前，顾准更加警醒。那个他摸索了十多年的，类似“模子”一样的东西，如今有了一个病原性的追索方向和线索——东方专制主义。

2. 人，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踉跄着回到窝棚的顾准已经做好了被打死的准备——在得知大韩继有个奇货可居的全国唯一“二进宫”右派，“人民”一定会成群结队，呼啸往来，不看到鲜血和屈服，他们是不会罢手的。鲜

血，他还有，而屈服，他实在一时无法提供。

村头的大喇叭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歌声从黎明响到深夜。这是一支死亡之歌，多少鲜活的生命就在它慷慨激越的旋律中永远地丧失了。

几个月前孙冶方就已经被调回经济所接受批斗。如今他成了个“大人物”，批斗会都是在号称世界第一的天安门广场，那可都是各方各界第一号资产阶级权威才有资格站上去（或者跪上去）的批斗台。老孙眼下的头衔是“中国学术界暨思想界头号的修正主义分子”。“小反”陈瑞铭则见势不妙，早早“逃窜”回了北京的家。瑞铭有家可归，“老反”顾准没有，家的大门早已对他紧闭，他是个无家可归者。

对于死他并不十分恐惧，对施暴者也不仇恨。一如前述，在“顾准辞典”中就没有“仇恨”二字。查阅他已经面世的四本文存，“仇恨”一词仅出现过一次，还是引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那个天天都要“忆苦思甜”，天天都要培养仇恨情感的年代，他留下并面世的二百多万中国字（其中夹杂很少量的外国字）竟无一处用到“仇恨”二字的文存，不能不说又是个大革命中的小奇迹。

他没有恨，只有怜悯。“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圣经 路加福音 23:33》。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开盒者也惊慌。就在顾准被狂殴的9月1日当天，经济所就把包括他在内的三名右派拉回了北京。在大韩继多呆一天，这些人被打死的可能性就增加十分，这个责任经济所负不起，把他们右派身份告密给红卫兵的“犹大”更负不起。

回到北京的顾准收到的第一道勒令是“不许回家”。

“我和汪璧已经离婚，本来已经没有家，也没有想回去。”

他松了一口气。假如“人民”真是恩准他回家，那才是件棘手的事——没有能收留他的屋檐，岂不还得返回来乞求“人民”收回恩准？

年过半百的他还没有从被殴打的疼痛、屈辱和慌乱中缓过神来。最焦虑的是多年积攒下来的“财

宝”——他的“稿库”菁华怎样保存。他已经用各种办法销毁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有些东西他实在舍不得，即使冒着被打死的危险，即使都背下来了，即使已经给六弟陈敏之寄过了，他也下不了手毁掉它们。此刻，他也只剩下六弟还能通消息了——汪璧和孩子们决绝地不允许他进家门，孙冶方每天都在批斗中，家已被多次抄过。敏之眼下处境也十分凶险，一顶叛徒的帽子眼看就要压下来，朝不保夕。他决定暂时和他断绝通信。

此刻的五哥顾准并不知道，六弟敏之已经把他们的信件严密地藏匿了起来。这些书信就是二十多年后中国思想界名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雏形。

他把拼着性命留下的一束手稿，一叠读书卡片从大韩继带了回来，夹杂在“人民”钦定“准读”的书中间，还有那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多亏“人民”没有想到应该先抄查他的小窝棚，否则仅仅凭着这满纸的外国字和“民国版本”的字样，要说是特务的密电码你也毫无还口的余地。

收拾它们时，他还没有从被殴打的痛楚中完全清醒过来，沾满血污的手都还没有洗净，有些血迹就留在了上面。能带回这用血，用命换下的财宝，他知足。

9月的北京，打杀高潮依然没有过去，但经济所毕竟还是“斯文人”——读书人集中的地方，顾准不但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再一次被往死里打，还被恩准住进了楼梯下一间临时搭建的三角形“亭子间”。可是蹂躏和侮辱是不可少的，大韩继的殴伤还没有完全结痂，他就开始在所内接受批斗。

早已成为“贱民”的他，人人可以唾骂和殴打，往身扔甩脏物羞辱，为解闷而当众斥骂，全不在乎对一位五十一岁的老人这样做有多么伤天害理。每天例行的“喷气式”严重损伤了他的腰背和肩腿。可好歹大韩继那一套程序化的兽性表演这里还是有所顾忌，学部的这些“小玩闹”，他很快就习惯了它们。

在“历史反革命”的头衔下，“人民”又在他身上加上了一副重轭——应付“外调”。

“外调”者，到外省市，外单位调查某人某事缩略语。1966年也是个全国集中抓叛徒和特务的年份，因为国家主席首先被定性为“叛徒”、“特务”，各种叛徒、特务集团自然应“声”而生。既然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需要抓，自然需要大批的“人民”上天入地搜集证据。这些人有个很专业的称

呼叫“专案组”人员，就是一人一案，专人专搞。物证不大好搞，人证绝对不愁，顾准就是一个——1930年代就参加革命，同时又是“历史反革命”，这就是最好的“人证”、“专案对象”。

于是各种各样的“专案组”找上门来，顾准一时成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奇货可居的热门人物。实际上“专案”先生们并非真想向他做调查，而是要在他这里给许多人确罪——“疑罪从有”。比如：

“193X年，XXX和你同武卫会成员，他是个内奸，你必须证实一下！”

“194X年，XXX和你同是新四军的，他是个特务，你必须证实一下！”

“195X年，XXX和你同在上海搞财税，他是反对毛主席的，你必须证实一下！”

“196X年，XXX和你同是反党集团成员，你必须证实一下！”

……

面对毫无逻辑可言的专案先生们，他想掩都掩不住那点招牌式的睥睨。

“是的，这些人我全认识，有些非常熟悉，有些还有很深的嫌隙。可你要让我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泻点私愤，讨个轻巧，卖个小乖，那阁下可就太不懂我顾某人了。”

许多学部的人算是见识了这个老右派一枝独秀的做派：面对“专案”们的狂吼乱骂，他要么翘着二郎腿，爱理不理——你们连问都问不到点上，要我怎么回答？要么热潮冷风——要不要我从头到尾和你们讲一遍？要么和他们对着乱吼——不清楚！不记得！！不知道!!!

拳头和耳光常常劈头盖脑就下来了。专案们大都是年轻气盛，半通不通的汉子，识些文，断些字，原就有些、或者正学着野蛮。一次一个这样的男人实在受不了他的眼光，一个大耳光扇向他的右脸。他没有躲闪，站稳后将左脸送了过去，任他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一直到这个男人心虚了，胆战了，住了手，他才抹去唇边的鲜血，蹒跚着走出门去，眼神由睥睨变成了怜悯。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圣经新约 马太福音 5:39》

音 5:39》

“外调”、“专案”，令身处北京的顾准经常被殴打和侮辱。在野蛮和学着野蛮的“文化人”、“读

书人”面前，他眼中那种要命的，标准的“顾准式”眼神使他比别人吃了更多的苦头。比起大韩继的红卫兵，他们能读懂其中让人恼羞成怒直至绝望的内容。

他不出卖别人，却坦然接受了“人民”加在自己头上的一切“罪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江青、反群众、反人民……。这些概念不清，定义模糊，逻辑混乱的“罪状”，在他看来第一，承认或不承认毫无意义，第二，辩解或不辩解毫无意义，第三，为它们再受皮肉之苦毫无意义。总而言之这些东西毫无意义，一丝一毫也没有。而认下所有的“罪”，就可以回到“楼梯间”，可以想，可以读，可以写，这个意义可就大了。

顾准从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批斗之余，他被勒令去看大字报。

1966年岁末看大字报，可算得上是一件又时代又时尚的事。凡人群目视所能及的墙壁，统统被贴满了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的纸，好像自蔡伦造纸以来所有的纸都用上了——名曰大字报专用纸，就是大约三尺宽四尺长，主要色彩有浅黄，米白，鲜红，粉红，浅绿等，以浅黄为最多、写满了中国字的纸。大字报是文革的第一表达形式，按照极笔的说法，“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 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讲话，只不知子产先生比造纸的蔡伦先生早生了几百年，无纸时代的他用何等介质写大字报，也许和咱们一样直接把字写在墙上，相当于标语？唯一可以媲美1966中国大字报的，大概是约翰·里德著名文章《震撼世界的十天》中1917年1月17日前后的俄国——招贴画的数量非常大，在围墙上很难找到粘贴的地方，刚贴上去的很快被覆盖。他曾从墙上撕下很厚的一层，一张擦一张，共有16层，弄得他惊呼“看呀！我抓住了全部的革命和反革命！”

极笔老人家自己对大字报好生偏爱，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龄在中南海书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亲自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捧场喝彩，摇旗呐喊。一时举国沸腾，鼓翻旗摇，状如凯旋。这物1975年还被堂堂皇皇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直到1982年才拿掉。

后来墙壁是肯定不够用了，人就搭起了一排排大字报栏，一般用材是竹竿和粗席，人流可以像盘

桓在图书馆的书架中一样地浏览。大字报一层层地贴在席子上，直至无力支撑自重，剥落或坍塌下来。一层层贴上的纸厚度有时可达十厘米或者更多。顾准在后来的日记里很文雅地将此物称作“席屏”，

“XII/11 ”五一六动员大会；下午竖大字报席屏（运动开始）”^{70.12.11.}

“席屏”一竖，运动开始。席屏就是文革的烽火台。不用问，这道空前奇异的中国风景又成了我的传主观察、探索、取样的对象。他几乎热衷于读“报”，只当是另类读史——社会史，革命史，中国史，民族史、人类史、人性史、人类行为史……，白天读，晚上纪录，夜里思考。

不久，他被勒令也得写、也得贴大字报——将自己的所有罪行用大字报公诸于世，尤其是“现行”的罪行。纸是不要钱的，公家无限量供给。于是有一天他领出一张白色大纸，先小心翼翼贴在大字报栏上，然后将手上的大毛笔饱蘸浓墨，端端正正写上了两个字——

读 史

此处最是人群熙攘处。贴好写好了，他并没有离开的意思，端详这两个字也端详看字的人。人们也端详他——“什么意思？”

“读史”？

是的，我的“现行”就是读史。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你们仅仅安排我扫厕所，真是太轻的劳役，“每天的劳动量既如此之少，剩下来的时间如是之多……”。我现在的行动仅仅是在读史。没有，也不可能做别的，请人民，请大家放心。

但是，人，人民，你也来读一点点历史吧。

历史能告诉你太多东西。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将是明天的历史。太阳底下无新事，不要轻易就说“史无前例”，不要轻易就说“空前绝后”，不要轻易就喊“万岁”、道“永远”。今天发生的，昨天都发生过，也“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目前没有萌芽的”^{59.3.8.}。眼下的情状，不过是东方专制哲学与西方“直接民主”交媾孕育出的怪胎，从十年前的“反右”到今天的“文革”，莫不如此，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东方式专制制度，先哲们——例如马克思同志——早就有了论述，而“直

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 文稿 P380。

人，请读一点法国史——

“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软弱的原因。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文稿 P394

人，请读一点俄国史——

“列宁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吹捧的勇气，在布列斯特和约订立以后，解散了全部军队，用赤卫队（亦即公民的民兵的军队）代替常备军。他说，‘机关’，不过是会计和打字员，可以无特权的雇员组成；他说，群众的统计监督可以代替企业管理和政府内阁。列宁的计划委员会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它不是什么经济管理机构。

实行的结果是：

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职业军队。

它的官僚机构是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Dzerzhinsky（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 文稿 P382

人，请读一点英国史——

“13世纪初期英国的大宪章，虽然不过是国王和诸侯间的一个协议，然而多种历史事变的凑合，使在其上长出来的议会制度始而是一株不牢靠的随时可以摧毁的幼芽，继而经过 Cromwell [克伦威尔] 确立了权威，但不免还是典型的贵族政治的装饰品（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然后发达起来成为一种复杂精巧的、适合广土众民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足以代替它的制度，虽然它极不完善。” 文稿 P270

人，请读一点美国史——

“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中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以此来比喻1917年，那就是 Stalin（斯大林）、Bukharin（布哈林）、Trotsky（托洛斯基）轮流当了总统，并且，联共分成二个党，先后轮流了执政。设想一下，这么办，十月革命会被葬送掉吗？我不相信。吹嘘世界革命的 Trotsky 上了台，他还得搞五年计划，他还是不会冒什么险用武力输出革命。正向反，后

来苏联发生的一切弊害，倒反而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他失却群众的拥戴，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随便什么事情不敢做得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过头成为荒谬了，弊害的大半是可以避免掉的。

当然，唯有美国（这个新教徒移民组成的国家）才会有华盛顿。华盛顿其人，如果生在俄国（这个专制沙皇，又兼东正教教会首脑的野蛮落后的俄国），即使不成为 Stalin，也不可能是华盛顿。”文

稿 P383

人，请读一读你自己国家的历史——

“自由与干涉对待，政治上干涉主义之利弊，在我国先秦时代，实为学界争论最剧之问题。结果不干涉主义，殆占全胜。……故秦汉以降，我国一般人民所享自由权，比诸法国大革命以前之欧洲人，殆远过之。事实具在，不可诬也。其间昏主淫威，墨吏做法，致自由失所保障者，史固不绝书。然吏之毒民，非法律所许，民本有控诉之余地。至对于暴君，则自昔圣贤，皆认革命为人民正当权利。在学理上未尝少为假借也。我国民惟数千年生活于此种比较的自由空气之中，故虽在乱离时，而其个性之自动的发展，尚不致大受戕贼，民族所以能永存而向上，盖此之由。” 笔记 P196

“惋惜历史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懂的中国历史局面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其长处，它所背着的历史包袱，懂的中国现代化和中国革命所要克服的这个历史包袱如何沉重，这是革命斗争所必要。” 笔记 P21

你们读了史就会知道，马克思同志说历史总要出现两次，第二次是讽刺剧。而眼下不过是老戏码在上演，况且都不止第二次了哩。

人，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3. 我的幸运在于思想的自由

“每天的劳动量既如是之少，剩下来的时间如是之多，9月下旬起，我又恢复了我的读书生活。”9月下旬，头上被砖头砍开的伤疤结的痂还没有脱落，满身被殴打的青紫还没有消退，顾准已经恢复了他的“读书生活”。

如今读书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批斗会，惩罚性的劳动——扫厕所反倒成了业余活动。“人民”关

注的是新的、活的老虎，例如孙冶方，虽然是个老右倾，可从未被戴上个什么固定的帽子，眼下无疑是个大大的双料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他要比批斗死老虎顾准有趣得多，技术、娱乐含量也高得多。

就在“偌大中国，无一张安静的书桌”之际，中科院学部的这间三尺楼梯间里却安安稳稳地摆放着一张书桌，桌旁坐着一位安安静静的读书人。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

（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

（二）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马恩有关的其他作家的著作；

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

（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

（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

（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这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字。1968年8月监管开始搁笔。”

1966年9月到1968年8月这两年的时间，是顾准面世史料比较少的年份，没有日记，也很少旁述，却是他留下读书笔记最多的年份。一本730页，23.5印张，500千字的《顾准笔记》，被编者苦心地编辑为“历史笔记”、“西方经济学笔记”和“马恩全集笔记”三个部分，是全部《顾准文存》中最厚的一本。在出版说明中，编者说道：

“顾准……是我国最早系统论证社会主义存在商品、货币的必然性，主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学者。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尽管他后半生贯穿了惩罚性劳动和人身侮辱，但是他在精神上丝毫没有颓丧，相反，逆境和严酷的现实让他从根本上思考历史前进的规律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倾注了全部的精力，致力于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和马恩理论研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其价值难以估量。”

《顾准笔记》均为读书卡片。按照他自己的估计，仅“历史笔记”和“马恩全集笔记”的卡片即

有 2-3 千张。无论是按照一个主题一张卡片推算还是按照总字数推算，眼下人们看到的都不会是它们的全部而仅仅只是一小部分。除了那个最令人头疼的原因——不方便面世外，还有个最确定和最遗憾的原因，就是顾准在“拼命地读，拼命地想，拼命地写”的同时也在“拼命地毁”，为了能活下去，为了能把“读”、“想”、“写”进行到底。

1970 年代的第一天，他曾写下如下日记：“北京藏书，大体上已经利用过：通过这些书籍，我眼界开阔到上下古今，今后有赖于这些书籍的，不过是引证史实，引证百家，不致有文词上的错误而已，大体上 *their meaning had been caught already*（我已成竹在胸），即使这些书全部丧失，我也写得出东西来了。”^{70.1.1.}

这些被保存下来的卡片似乎都经过认真挑选：平静、平实、平和，没有激烈的、过于刺耳的词语文字，即使抄查出来也绝不是普通人能看得懂，就算碰上内行也绝不是一目十行就看得进去的。但是这些卡片文字的独特性也是很难掩盖的，真要是被抄查出来且真有人想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又要挑得比较文明（讲理而不是打人），那是需要下大功夫的，而“人民”那时一般都很忙碌，很难“过细”地对待这些卡片。

就拣出五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最后一句话做例子：

“把 Marx(马克思)的哲学命题普遍化起来，成为上下古今无不通用的规律，这件事开始于 Engels (恩格斯)。” 笔记 P730

这实际上是一句对恩格斯的严厉指责，也是对将马克思哲学教条地套用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上的观点的严厉批判，肯定属于钦定“反马”的。但你若不在意它的来龙去脉，不看其前言后语，也可以理解为他顾某人是在赞扬恩格斯弘扬了马克思主义，就像林彪弘扬了毛泽东思想一样。这种踩“钢丝”的文字本事，真不是一般人学得来的！

从党校时期开始，顾准就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弘扬有“越俎代庖”之嫌，尤其是“否定的辩证法”（也就是“唯物的暴力论”）这一命题，不但“马克思对这个武器用过了头，（而且被）恩格斯把这个命题更为普遍化了，（而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59.2.23.}。

你若不仔仔细细看其上文——“这里‘暴力论’的论证没有成功，相反却证明，历史总是历史，

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笔记 P730}，基本上就无法看出这句话中他对恩格斯以马克思之名将“暴力论”普遍化的严厉指责，也就抓不到他的小辫子。须知在那个愚昧的年代里，“文字狱”是非常惨烈的，即使黄口小儿有意无意说错、写错一些既定文字、口号，那也是能要了命的、天大的“事件”。

顾准的文字功夫眼看着在做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愈来愈好——无乖无戾，锋藏锋露，层层剥皮，丝丝入扣，其严谨和成熟的程度都远在“党校日记”，“商城日记”之上。“笔记”为他日后写出的一连串震撼人心的文章，例如《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民主与“终极目的”》等打下了坚实思想和文字基础。

实际上这些文章也都是他的读书笔记。例如被后人编纂单独成章的《希腊城邦制度》是他读了多位西方人写的希腊史后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他和六弟陈敏之之间的通信集，追根寻源依然还是由读书笔记而来，比如其中《老子的“道”及其他》、《论孔子》、《评韩非》等，而哲学杂谈章——《辩证法与神学》则完全是他读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读书笔记。

顾准的读书笔记有一些还可以进一步整理，独立成章。

例如仅他考证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新、旧版本对儒家和宋明理学评论的变化”的读书笔记，就有近一万三千字。除因为要对新、旧版加以对比而不得不摘抄新、旧版原文，略显臃赘之外，他的评论有理、有利、有节，充满学术气息且文字华丽，将新、旧版本如何不同，为何不同，他为什么不能赞同这样的版本修改，如此修改背后作者的无奈……分析得鞭辟入里，淋漓尽致。一直到去世前的一年——1973年，1月他还在摘录范本《通史》新旧版的论儒部分，看来是打算写一篇独立成稿的文章的。6月，他读乔治·格罗托《希腊史》后写成《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说到“希腊僭主政治”与“东方专制制度”的比较时，他又力挺范文澜关于“专制主义或僭主政治是相互斗争的阶级谁都无力克服对方时兴起的一种过渡政权的理论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文稿 P272}的观点，并狠狠地嘲讽那些“反对范文澜的人，虽然在理论上死命揪住阶级斗争这个教条，说起来似乎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个瘪三，干巴得很。”^{同上}

这些读书笔记——卡片，虽然能够明确找到书写日期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根据前后内容的连贯

性，依然可以判断它们绝大部分写于1967——1969年，中断于1969年底去息县干校劳改，接续于1972年回到北京，终止于1974年10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一个半月。那时他真是再也写不动了。

其中中国历史笔记的一部分可能写于1966年或者更早，结合他的“历史坦白交代”材料（《顾准自述》）看，应该是起始于第三次劳改——周口店-大韩继劳改期间以及更早，也就是他对青年难友陈瑞铭说他正在“拼命地想，拼命地写”，还希望能把这些文字留给瑞铭的日子，以及之前尚在经济所被批判的日子。

细读这些“读书笔记”和日后单独成章的文稿，别说在那“万马齐喑”的日子里它像是一匹无声嘶鸣着的黑马，就算在眼下“万马齐嘶”的日子里，它那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的、已然不再能听见的嘶鸣也格外令人心灵震撼，无声后面的悲壮依然能令人泪下。

遗憾的是由于文革红色恐怖骤起，顾准把它们大部分毁掉了。他深知一旦这些文字落在文化水平十分低下的农村红卫兵手里，那就太危险了——任何右派的文字，不用看，“人民”就可以说成是三反、五反、七反、九反，你纵有一千张嘴，也只有任人宰割、引颈就戮一条路好走。

他销毁了大部分，也拼着性命保留了一小部分，既是菁华，也是籽粒，成为日后面世的、震撼了中国知识界的上百万字文稿的胚胎。

顾准一直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就是要把自己“一个人”观察、探索、读书和冥想的结果集腋成裘，写出一部中西方哲学和思想的比较史。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将要写成的那本书的书名——《东西方哲学思想史》。他的一生曾经有过很多“立言”的计划，其中不乏希望“自成体系”者，例如会计学和经济类学的，但只有这本终于未能问世的《东西方哲学思想史》才是他最大的“立言计划”，也可以说是人生计划，是一份充满“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使命感的计划。

时至今日中国也还没有人写出一本这类像样的东西。

你听他说：

“手稿，比之要写的东西，幼稚肤浅，可以采用者少。卡片不外抄摘与感想，有，当然好，丧失了，丧失书籍手稿结果一样。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要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以写，丧失它们，又

何所惧。” 70.1.1.

1965年监管结束时他已经决心动笔。他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动笔的底气和资格。此后四年是他作读书笔记卡片最多的四年。他开始对多年来观察、探索的对象一个一个地作素描，从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三个角度。

曾经极度羡慕“希腊人思想的自由”的顾准如今对“自由”有了新的见解。虽然他深谙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希腊人能够有相当程度的思想自由，这大有助于科学和哲学从宗教分离出来，这点是古代东方文化所不知道的”^{笔记 P257}，但他更知道这自由无法靠别人的恩赐而得到，她也不是“必须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文稿 P364}而已。

一个独立的人，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做到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他们被很多绳索束缚了——传统、观念、物质以及懒于、疏于思考等等，总而言之，是自己不愿意。而顾准的幸运却恰在思想的自由，世俗生活的不幸是获取这自由的代价，上帝是公平的，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所谓悲剧，就是将美撕碎了给人看

顾准肯定是不凡的，却不是能够超越一切苦难的超人。

有一种苦难他无论如何无法超越，也超越不了。它一直折磨他到死，即使到死也没有放过他。它残酷而不动声色地延续着，直到您读到此书的此刻还在延续着，天长地久，此恨绵绵，不知何时才算个头。

这苦难就是亲人对他的决绝。更加不幸的是：还有逆反。

托尔斯泰那句名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放在顾家就显得有些轻飘飘，但其前半句——“幸福的家庭都是同样的”，从前的顾家可十分担当得起。无论在沪、在京，顾家都曾是个令人艳羡的大家庭——顶天立地的父亲，温柔贤淑的母亲，比肩而立的五个男孩女孩，加上一位勤劳慈

祥的奶奶，一家八口，相亲相爱，优秀向上，爱意、尊重和互促，喧闹、幽默和纪律相辅相成。一个幸福家庭应有的色彩，顾家一样都不缺。

顾准 1952 年“政治”场上的突然崩溃并未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大的伤害。妻子的理解和不在乎，孩子们的年幼懵懂，依旧的经济状况，都维持了这个家庭原有的秩序——父亲依然是家庭的首脑，他的特立独行和博学在家庭成员中依然受到极大的尊重。母亲不但被五个亲生的孩子热爱，还被所有陈家（顾家）的小一辈热爱。六弟陈敏之的女儿陈小嫣在回忆文章中就说：“五妈是个好妈妈，孩子们都争着要她做妈妈，我们就叫她‘大家姆妈’” 陈小嫣《父亲与〈顾准文集〉》。

“大家姆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个典型的沪上女子，柔弱，细腻，沉静，充满了母性，丈夫、孩子、家庭在她的心目中永远都排在前边，唯独给她自己留下位置很少、很小。汪璧的母性不仅仅赋予了五个孩子，也赋予了家里最大的“孩子”——丈夫顾准。除了一份深深的夫妻之爱，顾准对汪璧还有一份弟弟对姐姐和孩子对母亲一样的依恋，他也毫不隐晦这份依恋，屡屡在日记里老老实实地记下，令读到的人常常禁不住哑然失笑。

你看每逢妻子出差期间他那份焦虑；

你看妻子每逢周末在他床头搁上的小说——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有一次竟是一本《安徒生童话》；

你看每逢妻子出差回京时他那份欣喜；

你看他劳改期间频频向妻子写的思想、生活汇报，不管真的假的，那份要妻子放心的迫切；

你看他笔下每逢说到妻子时那份感激和依恋……。

这是东方人夫妻中不多见的一种柔情，尤其在顾准这样一个刚烈男子和伟岸丈夫身上，更有一种剑胆琴心的别样阳刚美。

悲剧起始于 1959 年商城劳改营时期。

离开北京前，顾准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已经一年，工资也没有了，只剩下每月五十元的生活费。要说妻子和孩子们为此而受到牵连、委屈和拮据也已经时间不短。1958 年他被送去赞皇县劳改，年底

回到家中时乞丐一样褴褛，饥饿和粗野吓坏了 10 岁的小高粱。

可是没有几天，顾准就恢复了从前绅士的形象。那一身他最爱穿的白衬衫配西式背带裤和一如既往的渊博谈吐，令惊恐的孩子们很快平静了下来。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孩子们最好的安慰剂还是妈妈对爸爸不变的温情——妈妈是世上最好，最可以信任的人，既然妈妈这样对待爸爸，爸爸就一定不会是个坏人。人们骂他右派也好，骂我们是右派崽子也好，摘了我们的红领巾也好，唾我们、不和我们玩也好，爸爸还是爸爸，爸爸依然是伟大的。大人们的纠葛爸爸妈妈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懂。我们在意的，第一是妈妈，第二就是爸爸。

面对“政治”场上失败的顾准，亲人们没有怨怼的情绪。你看直到 1959 年 3 月，顾准还有这样的日记：

“今天过了一个热闹、繁忙的星期天。五虎上将麋集，棣妹与小苹齐来，六时半恢复原状。孩子们极快乐，小米甚至打羽毛球忘掉了去学校的事。匆匆吃二碗泡饭而去。” 59.3.8.

“西颐路永远是我所喜欢的一条路。我们从前住的房子，看得见已住进了人家，白短窗帘已蒙在窗上。竹篱依旧，玫瑰花周围似乎围上了木栅以资防范。中关村是一个值得留恋的住所。” 59.3.11.

“昨晚稻头回来，谈得很晚，她今天一早就走了。” 59.3.13.

两个大的——稻头和小米，尚且还能和爸爸有如此的亲近，还能深谈，三个小的就更不会有什么异常了。可见彼时悲剧还没有开场，但顾家的寥落已经开始，从 1957 年父亲成为右派的那一刻起。

真正的齟齬出现在全国大饥荒开始的 1959 年深秋。

顾准从商城写给妻子汪璧的信愈来愈吓坏了她——毫无意义的、惩罚性的苦役、毒蛇钻心般的饥饿、可怕的饿殍、可怖的人吃人，吃死人，也杀了活人来吃……。这些信一封比一封骇人听闻，从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强烈地刺激着读信人。无论如何，汪璧身在北京，大部委、大机关，此时的她虽然已经体味饥饿但肯定没有体味到最极端和最绝望的、酷刑般的饥饿，加上上海出生的她也很少听到、更没有见识过什么叫“饿殍”，什么叫“人相食”。

在无人诉说的孤独与恐惧中，汪璧起了巨大的反感。

这一次和 1952 年不相同。这一次她不能理解他，也不再信任他。她不相信丈夫信中所说的一切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她断定他在夸大，夸大现实，夸大党的错误以证明他自己的正确。这不啻反党。

对丈夫这样彻底的不信任，在她是第一次。比起对丈夫信中叙述内容的恐惧，她更恐惧的是自己的不信任——“那么他真的是反党？”

反党，意味着他已经不是同类，是危险，是邪恶。眼下庐山会议的一点点消息正在“人民”中风传，“到处都正在架起艳丽夺目的火堆，正等着烧死那些邪恶的异教徒”，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人民”正等着要把他们扔进火堆，连带他们的孩子们、家庭，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

汪璧，她是个平凡、普通的女人，虽然曾深爱甚至崇拜着自己不凡的丈夫，可她有五个孩子，且不论什么政治立场、哲学高度、觉悟水准，仅仅就是这一点——五个孩子，母性的本能就能让她放弃一切。反党不反党，并不在第一位，丈夫若真的反党，家庭必将毁灭，孩子们怎么办？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才是最令她焦虑和绝望的。

回信没有了安慰和温情，字字行行都是由“意识形态管理者”统一设计的、公式化的语言。这不是夫妻之间的信件往来而是一封封的劝降信和哀的美敦书。看过信他哭了，半夜呜咽。“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四十四岁的男子，一个看上去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此时此刻，情何以堪。

接着是经济上的龃龉。

劳改队的劳作是他所力不能及的，腰腿都受了伤，左股骨下挫，需要钱看病。可是妻子不寄给他，深知他天性大方豪爽，怕不是要借给这个，送给那个，或是买了吃的和劳改犯们大家“共产”。本来家用就不够，这个还算事小，没得犯了“拉帮结派”的嫌疑，那才叫事大！

两人在信上就吵了起来，是顾准最先说出那两个夫妻间最不能说出的字，伤透了妻子的心。后来钱是寄来了，当她知道他确是需要钱看病疗伤。可心结也系上了。

比起劳改营期间或者之前就直接办理了离婚手续的人们，他们还不算是最糟糕的。后来他总算是活着回到家，在1960年1月某个风雪交加之夜。

在妻子的冷淡和孩子们的敌视中他顽强地在二里沟的家里呆了下来。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组织”上给他安排的那所中关村高级专家公寓，而是在他成为右派后汪璧自动要求降级搬来的财政部宿舍，是“妈妈单位分配的”。他凡事不问，埋头写那份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写，却有无数人想强令他不写的《铁佛寺水库记录》。

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听他叙说哪怕一句商城之事，如果他强说下去，他们就和他大吵，或者干脆不理他——既然妈妈都不愿听，那一定是你在造谣。

他痛苦到想把天戳一个窟窿钻进去，可是天不理睬他，试炼才刚刚开始哩。

接着是清河农场的劳改，那是在他断然拒绝了留在北京、继续从前的部吏生活后，“组织”上无奈的安排。其实他拒绝的何止是“组织上的安排”，他拒绝的明明是妻子和孩子们希望他还能回到他们身边，保住这个曾经非常幸福的大家庭不要破碎的愿望。回吏部做部吏当然令他害怕和厌恶，但天天回到又冷酷又期待的家庭氛围中才更加令他恐惧。

多年后顾准次女顾秀林在谈到1960年代的父亲时这样说：

“他在清河农场的时候，有时周末选择不回家，留在农场看书。那还是他有可能回家的时候。”

顾秀林 《我的父母基本上没有和我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倔强的他选择不回家，他惧怕家里那冰窟般的寒冷。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再相信他，所有的真实都已成为“谎言”，所有的光荣都已成为“耻辱”。父亲和所有人都没有了交谈的基础。

“连自己的孩子对我的历史也一概否定了——比如说，妈妈（汪璧）谈年青时如何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光明的革命道路，孩子们很爱听。我自己，羞于说我的经历，有那么一二次，我也想说说我的“故事”，他们连听都不想听。如果我说《沙家浜》的县委书记是我们一起搞起来的老战友，他们也许还会嘲笑我这个右派分子想攀附烈士、英雄的英名来给自己梳妆打扮哩！——既如此，我也就乐于把那些记忆深深埋葬起来不去触动。”

后来他毫无戏剧性地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经济所。家庭和他都又重新燃起团圆的希望，虽然双方都知道这希望不大靠得住。为了“赎罪”和“还债”，他拼命地工作，希望能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家庭一些补偿。可就是这“赎罪”和“还债”，令他又犯下新“罪”，欠下新“债”——还是那他终究敌不过的、在灵魂深处烧灼着的东西，令他又一次无可救药地“沦陷”了。

在顾准最后的日子，有位后面将会讲到的好友张纯音女士曾直率地指责他——“你们的家庭教育是失败的。我们对孩子都讲老实话” 陈敏之 《顾准的家庭悲剧》。顾准死去后很久，六弟陈敏之才从纯音女士的女儿徐方（咪咪）处听说此事。“骤听之下，我好像遭了电击一样，久久不能平静” 陈敏之 《顾准的家庭悲剧》。

可是顾准在家庭中果真是将真实的自己完全密封起来，将世间真相完全对孩子们屏蔽起来，如纯音女士指责的那样吗？

“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被选去参加国庆天安门广场组字，好几天全心全意地摆弄自己用的纸花，从广场回来后，父亲问过我：‘你喊毛主席万岁了吗？’我说喊了，他很不以为然。我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也不太在意。在1964年第一次学雷锋的时候，我听见他说，这样做会抑制人的思想，世界上不是只能有一种人。我听过就过去了。在我们中学，学雷锋是一定要学的。后来学毛选的时候，他又说过，光抄语录有什么用，没出息，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听过了又过去了，学毛选能不学吗？文革后来那么长的时间，能不抄语录吗？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是何等沉重的父辈的期望，有几个人能够负起这样沉重的期望？”

这是女儿顾秀林在同一篇文章中讲到的。你看，顾准不仅没有密封起真实的自己，听任孩子们被蒙蔽和愚弄，而是倔强地向孩子们道出真相，点明道理，包括他冒着“大不讳”向孩子们讲述商城之殇，勇敢而不妥协地要求孩子们用自己的大脑独立思考，不可以随随便便就允许别人在自己的脑子里“跑马”，试问，“家庭教育的失败”之罪真的应该全部放在这位做父亲的人头上吗？

人们，请想象一下。在那些“大义灭亲”的无情岁月里，有几位中国的父母敢对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更何况原就是个“坏人”、是个右派的父亲？看看冯骥才先生的《文革十年中的一百个人物》，多少人间悲剧就发生在亲人们的揭发和检举中，发生在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极其残酷的“大义灭亲”的大纛下。

文革甫一开始，“他的女儿带头逼迫她妈妈与顾准离婚” 邢小群 《骆耕漠访谈录》，那真是悲剧中的悲剧，绝望中的绝望。

在纯音女士的指责面前，作为父亲的顾准黯然神伤，沉默不语，作为叔叔的敏之如遭电击，无法镇静。不知内情的外人看来他们好像都默认了这个指责并因此而自责，可实际上两人有多少哀痛、压

抑和难言之隐隐在其中，无法道与世人知！

女儿在同一篇文章里还写道，“在我们家，父亲不是为我们而是为更多的孩子扛着那扇沉重的闸门，是母亲扛起了放在我们前面的那扇闸门。他们倒下来，我们走过去。”

是，为他们抗住那扇千斤铁闸的只有母亲柔弱纤细的肩膀。等孩子们一个个爬了过来，想再回头一起掙起来好让母亲也脱身时，已经来不及了。那么父亲在哪里呢？“更多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机会或权利回家。我记忆中和父亲一起度过的时间，大概可以用小时来计算。虽然实际上在同一个屋顶下的时间没有那么少，可是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不同的世界里。”女儿接着写道。

1965年9月，在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前夕，妻子绝望地哀求，“能不能先倒下来再说？”他痛苦着，迟疑着，嚅噉着，最终还是以无声的沉默表明了一切——“对不起，我做不到”。

是，他要为更多的孩子们擎起铁闸。他是个男人，这样的男人有个专用的词汇，叫做“铁肩担道义”。而女人是没有的，她们没有铁肩，只有命。为了孩子，她们只好用命去挑，去担，去掙，去擎，去扛。可孩子们本身难道不也是道义吗？

1966年春节，顾准、汪璧正式离婚。没有正式的离婚手续，没有离婚证书。汪璧提出“离了吧”，顾准“痛快地”答应了。

所有的亲人们，包括六弟陈敏之（汪璧离婚前曾征求这位小叔子的意见，小叔子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事后悔恨不已）和五个孩子们都认为，这是妈妈还有一丝希望能在将来和爸爸复合而故意不去办理的。可是人们，请想象一下，假如顾准和汪璧真去办理这些手续，从中科院革命委员会、财政部革命委员会，二里沟居民革命委员会、海淀区革命委员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们要从无数的革命委员会那里取得证明信，介绍信，批准文书等等等等，你知道在这些各式各样的革命委员会、“人民”和群众那里，还有多少，多大的屈辱在等待他们吗？彼时实在过不下去的夫妻们，要么像傅雷夫妇一样，再演凄美的“化蝶”，双双携手离去，要么就是顾家夫妇这样，分居——转户口——最多居委会开个证明而已。谁也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官司好打，也没有打官司的地方，谁会去自取其辱呢？如若不信，可以去查证当年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离婚文件，看看有几份？在“砸烂公（安）、检（查）、法（院）”的号召下，彼时中国连法律都没有，连法院检察院都没有，何来法律文件？

顾准和汪璧，从人格根本上讲是一位绅士和一位女士，要他们接受这些屈辱还不如去死，更何况汪璧已经去意彷徨，从顾准再次戴帽的那天起，她已经准备好自杀，连遗书都写好了，办不办劳什子的手续有什么意义吗？

“1965 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 年五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69.11.12.}

这是顾准一年多后第一次听闻汪璧已于 1968 年 4 月 8 日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写下的日记。而 1967 年 5 月又是什么日子呢？那是最屈辱和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周口店——大韩继劳改结束后的顾准年过五十，遍体鳞伤，无家可归。除了旧罪行，此刻他又添了新罪——“人民”在二里沟已经没有顾准的顾家抄出了一套他批注的《毛泽东选集》。右派批注《毛选》本身就是僭越，更何况还尽是批评，批判性的批注——“逻辑不通”、“脱离实际”、“错误”……满纸的贬义词。这还了得！

彼时有个专用名词叫做“恶攻罪”，就是“恶毒攻击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缩略语。他们不但将这罪名加在了顾准身上，也同时加在了顾准的“臭婆娘”——已经离婚的妻子汪璧头上。汪璧在财政部受到严厉的批判。连带着，“人民”群众还揭发了她几年前帮助反革命丈夫销毁“黑材料”的“历史罪行”。那都是 1964 年的事情了，汪璧和婆母一起焚烧顾准的大批读书笔记，烟雾惊动了某位阶级觉悟甚高的“人民”邻居。这一次正好新帐老账一起算。

在这样的屈辱面前，柔弱女子汪璧完全崩溃了。压死骆驼最后是只需要一根稻草的，何况汪璧哪里是能负起重轭跋涉荒漠的骆驼，她更像是一头需要公鹿保护的母鹿。如今公鹿没有了，这世道压在她肩上的却是一副连最健壮的雄驼也难以支撑的千斤之轭。还能走多远呢？

生命已经丝毫不值得留恋，只是孩子们还没有安排得放心，尤其是几个小的，叫她如何丢得开手。去意彷徨中，可怜的女人犹豫再犹豫。

1967 年 5 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实在抵不住思家煎熬的顾准不顾全家人对他“不许回家”的戒严令，心一横回了家。那真是凄绝人寰的一幕：

一进门，么儿小弟冷冷问道：“你为什么要回来？”二儿小米看也不看就拒绝了父亲小心翼翼递上的存折，里面是他苦心为孩子们攒下的一点钱。长女稭头、三子高粱、次女五五都在外面忙于革命

和造反，否则场面会更加难以忍受。妻子汪璧下班回家，甫一进门就厉声呵斥：“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你马上走！马上走！！”

面对满口无牙，憔悴不堪的老妻，顾准欲哭无泪的双眼不忍也不敢直视她，仓皇逃离。

他还是不死心，回一次家成了他梦中的奢望。这一次，事先他就写信给汪璧，说明自己要回家拿些衣物和书籍。汪璧不理睬，只是回信给经济所革命委员会，要顾准在某个周日早晨七点去取。顾准去时，东西已经堆放在家所在的三楼楼梯口，大门紧闭，声息全无。五十多岁的老头子顾准实在扛不动箱子，呼唤哪怕能出来一个孩子帮他把东西扛下去，竟无一人理睬。还是邻居实在是看不过去，走出一位大爷，帮他把东西抬了下去。

临走，他将一张银行存折和几斤粮票从门缝里塞了进去，咬紧牙关走出大院。当夜，铮铮铁汉顾准再次呜咽，枕上留下一片泪痕。他终于死了心，下决心不再去打扰妻子和孩子们，也果真在离世前都没有再见到他们。他以为这样就不会再伤害到他们了，殊不知这不但重重地、无可挽回地伤害了他们，也重重地、无可挽回地伤害了自己。

人说所谓悲剧，就是把美活活撕碎了给人看。顾家的悲剧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可在“美”还没有被撕得粉碎之前，那只巨掌是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的，它会说——“且看”，而下一幕会是什么？不确定，也无人知道。这才是悲剧中最恐怖和最悲惨的。

5. 汪璧之死

1968年4月，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顾准收到一纸文据，一纸除了长女嵇头之外四个儿女和他断绝父子关系的文据——“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顾逸东、顾南九、顾秀林、顾重之”。九个字，四个签名，恩断义绝，一至于此。

手捧薄纸的父亲浑身颤抖，顿足悲号。可是他哪里知道，这决绝的文据是孩子们在亲爱的妈妈服毒自尽后写来的。父和子的哀痛又有什么区别！

1968年4月8日，汪璧的人生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最小的弟弟也已经十五岁，他们都自立了，妈妈太累了，别说铁闸，连一张纸、一片雪也搨不动了。妈妈要走了。

绕着家所在的财政部家属大院，她恍恍惚惚转悠了一整天。星期一，孩子们都不在家，没有人能说上一句亲切的话语，没有一句善意的劝解。在西坠的残阳中，她用仅剩的一丝力气爬上三楼，打开门，反锁，然后喝下大量早已准备好的来苏水。这是文革时代一种最常用的自杀方式——先是烧坏消化道，然后是剧烈的呕吐，最后慢慢地死去。汪璧死得非常惨烈。死状恐怖。她留下只有一句话的遗书是：

“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连顾准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实际上1965年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时汪璧就已经支撑不住，写过一份遗嘱了。想来无论如何都会比这份只有十五个字的遗嘱更多一些人性的气息。

第一个发现惨死母亲的是从窗户翻进家里的高粱。孩子们哭得天昏地暗。大姐稻头不在北京，丧事是大哥小米带领三个小的办理的。悲愤和昏乱中，四人一致认为是父亲害死了母亲。他们爱极了母亲，也因此恨死了父亲。于是就有了那一文断绝父子关系的文据。

此时的顾准正处在第二次被监管中，没有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什么都不问，是不许问，也不能问。他被蒙在鼓里，连直觉都没有。他坚持给妻子和孩子们写信，每周一封。除了问候，他也写他的“思想改造”情况，把报纸杂志上、批斗会上、日常人们的言谈话语中的“套话”迅速地学起来，用起来。只要还有和汪璧破镜重圆，和孩子们相聚在一个屋檐下的希望，他豁出去了。

信是发出去了，可依然又痛苦又自责：为什么亲人之间也要说假话？在商城说假话，那是因为“公开说谎，已成风气。岁初，郑州会议时还想恢复实事求是之风，积弊已深，骑虎难下……”^{59.12.22.}，你无法判断对方是何样的人和何种思维方式。和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爱人、和自己同一个血缘的孩子们也要说假话，这令他恼怒和无奈到了极点。

“你能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你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的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 文稿 P444

假话、说谎说得太多，人就把它慢慢当成了真话，也就习惯了。没有常识哲学、经验主义垫底，“党（既）是梅兰芳的党”^{59.12.26.}，则“空话连篇，相互欺骗”同上当然不足为怪。他试着去理解和适应亲人们。

然而连一封回信也没有。从1966年到1968年8月被监管失去通信自由，一连近二十个月，他几乎每周一封写信给家人们，回信是零。这些信可能被看过，至少汪璧还活着的时候。但也可能连封都未开就被撕碎、扔掉了。

直到1969年写坦白交代材料时，顾准还在喋喋不休地念叨妻子的好处。此时汪璧已经死去一年两个月，做丈夫的浑然不知。“组织”不许他知道，他就不可能知道。

这些“交代”是为了开脱汪璧，更是他对她真情流露的一次集中文字表现：

“这是历史交代的末篇，理该说一说我和汪璧的关系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回顾1934年和汪璧结婚以后，无论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在解放区时期，在全国解放以后，她都在承担起做母亲的全部重担之下，坚持了革命工作的岗位。早期，即1940年以前，我抛弃比较优裕的社会职业转入地下，或离开上海到抗日根据地，她从未拖过后腿。全国解放以后的短期上海工作时期，她绝没有因我工作地位较高而在个人生活或家庭生活方面有过什么额外的要求。不但如此，1940年以前也好，1949—1952年也好，我尽我所能地照顾了我的家庭成员，我对她的家庭成员却疏忽到了极点。我没有见过岳父，直到1962去沪调查以前，汪璧的四姨一直在上海，她对汪璧早年上学出过很大力气，我却一直没有去见过她和四姨夫。1949年以后，汪璧内心里无时能忘迎养岳母，我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1959年岳母故世上海，汪璧终身抱憾。1940年的我去苏南，汪璧留沪，依靠她的工资维持我的母亲和弟妹。1943年汪璧自解放区回上海，长女生下来不久，我去延安，她们在上海的生活我当然无法照顾。文化大革命中，调查成都徐某（1935年武卫会宣传部的人员。1935年底前后，因反对林里夫离沪去北平）的同志还说，徐某当时在上海，从我家里知道，我们在平经济困窘，卖掉了汪璧的戒指。至于1957年我划为右派以后，全部家庭生活当然都由汪璧负责。正是我这方面的亲戚，评论汪璧时说，她是把一切都贡献给我了。在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这些都不过是琐屑小事，当我自以为我牺牲一切贡献给革命的时候，我对汪璧这些自我牺牲的行为，内心里也没有感觉过什么不安。

“1957年我划为右派，开始发现我欠了债。1957—1962年，汪璧对此全不在意，她所看重的

只有一项：鼓励我的每一点进步，批评我不是流露出来的反动思想。1962年我摘掉了右派帽子，满心想“还债”，可是因为我的“还债”方法原则上全部错了。我竟致在家庭范围内犯下了严重的右派罪行。1966年的离婚，文化大革命她对我的异常决绝的态度，当时对我的刺激都异常深切，冷静下来想一想，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不跟我坚决划清界限呢？事情当时，我固然埋怨她何以恩尽义绝，一致于此，冷静下来想一想，这种决绝态度的后果，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刺激我走绝路，另一是刺激我努力改造自己，很快获得新生，如果竟然实现了前一种可能，这证明了我不改悔，证明汪璧的决经是对的。如果实现了后一种可能，这就是汪璧在这种处境下唯一可能给我的挽救和帮助，同样证明了汪璧是对的。

“我现在选择了一条新生的道路。我现在对汪璧，除了感激几十年来她的恩情而外，也感激十几年来尤其最近几年来她对我的挽救和帮助。倘使今后我还有机会厕身于人民的行列，贡献我的余生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我也希望在我的余生中有机会照料汪璧晚年的生活——她身体本来也不好，1957年以来，由于我是右派分子，又担负起来了过重的负担，1967年5月所见的她的憔悴容貌，略一回忆，还如在目前！”

上面的文字写于1969年6月16日，离他真正听到汪璧死去的噩耗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如果说在那个“To be or not to be”（活着或者不活）的岁月里，顾准活着的全部意义在于思想的自由，那么汪璧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保护她的孩子们不被时代巨灵撕碎。她无法分享激励着他的使命感。在命运面前他毫不踟躇地选择了“To be”而她无奈地选择了“Not to be”。可谁又有指责他们其中一个的资格和权力呢？也不要再指责五个孩子了吧。生命中这不可承受之重，直到今天还死死地压在五个孩子的心头，天长地久，此恨绵绵，永无绝期。

顾家举国皆知的家庭悲剧延续几十年，至今都没有结束。它十足的国粹性、独特性和普遍性浓缩了家、国、时代、族、民、社会、人、性格与个性的全部悲剧色彩，没有一支高度人性和灵性之笔是很难描摹的。

6. 一无所有

到了1967年，顾准作为世俗的一切被褫夺殆尽——名誉、地位、金钱，家庭、子女以及手足亲

情——最能理解他的六弟被戴上了“叛徒”帽子，兄弟间持续多年的哲学讨论终止了。最不堪 1968 年汪璧之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顾准都已经占全了，只是他还在懵懵懂懂中，还在奢望着有和汪璧破镜重圆，和孩子们团圆的一天。

每月，“人民”发给他二十五元的生活费，粮票、油票、肉票、豆制品票、布票、棉花票也都按人头发给他，是为宽大为怀的“给出路”。好在那年头既无通胀又无通缩，除了吃食堂的大锅饭，他还能有一点剩余的钱和粮票。他把它们都攒了起来，痴痴盼望有朝一日再见到亲人们的时候能贡献出来并被他们接纳。家庭已经彻底摒弃了他，儿女们把他的户口、粮油关系转到了经济所，从此后，就连看看他们寄粮票的信封上那几个熟悉的字迹也是不能够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只除了一样——友情，顾准和孙冶方之间建立在精神、思想、意识和学术基础上的友情还在，他们的“厕所论坛”带给顾准的勇气与安慰实在难以估量。

但是擅长蹂躏的专制巨掌是不屑把任何一点点慰藉留给一个不驯服的人的，是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1968 年 4 月 5 日，也就是汪璧自杀前 3 天，孙冶方被捕。

一位花甲老人，一位学者，要抓也就抓了。没有罪名，没有程序，没有解释，在那个年代这是相当正常和常态的事情，这些东西既不值得做也不需要做，更没有人大惊小怪。何况 4 年前孙冶方就已经被中共中央主管思想，文教和“意识形态”的康生先生内定为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四清运动”头号的靶子，头号的思想犯了，现在不抓倒是有些奇怪。

其实这些都不是康生要抓孙冶方的根本原因。

这个憨直的书生大半生都在追问他四十多年前参加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董亦湘，以及中共上海地下党前辈、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俞秀松、周达文的下落。董、俞、周的生死不明和历史冤屈是冶方无论如何都放不下的心理重负，而这一切和康生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十五年前延安整风，极具攀援人格的他一脚踢开失势的王明，攀上了最高的高枝。可是多年来始终有个可怕的秘密令他寝食难安：1937 年他俨然以“副帅”的身份追随王明从苏联经新疆回国。两人合写的《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还墨迹未干，而俞秀松、周达文恰在此时被“新疆王、狼种猪”军阀盛世才逮捕并

递解苏联秘密处死，董亦湘则直接在苏联伯力神秘死亡。他和王明的手上除了墨迹是否还有血迹？延安整风那么残酷，他自己又是怎样和王明划清界线的？这是中共党史上至今未破的重大谜团，而孙冶方从新政权建立伊始就开始追索此事。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自己的历史问题可以先放在一旁，可寻觅董，俞，周的下落他却当做使命一般，下决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是一份对生命的尊重，也是一份同志间的道义，孙冶方生而俱来的江南士大夫情怀令他认为这份道义自己非担不可。

1956年访苏，他曾下大力气将一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多年的流苏同学家属弄回国和亲人团聚。这些事早就弄得素有“小斧头”之称的康生同志心惊胆战，不胜其烦。文革初，冶方点点滴滴涉及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往事疑问的日记和来往书信又被抄查了出来，你想都能想象得出来康老的恼羞成怒。又一次“运动”了，又一次“革命”了，不趁机收拾这个“隐私知道得过多的”书呆子更待何时？

在国人皆知的北京秦城监狱，孙冶方被单独囚禁了整整七年！

像对妻子之死浑然不知一样，孙冶方的被捕顾准也浑然不知，直到有一天无意地从监管人员口中听到。

“他摇晃了一下，差点没站住，脸色变得刷白”，在场目睹的人日后这样形容。

他当时确实几近虚脱——太突然了，前不久他们还在厕所讨论马恩，讨论价值决定、价值论，还在争执观点，还在统一思路，还在你 Refer 我，我 Refer 你，怎么一夜之间老孙就被抓起来了，并且不是“监护”，不是“监管”也不是劳改（他们已经在劳改嘛），而是货真价实的被捕，被直接送入大狱！

他知道眼下无法无天，可也没料到无法无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后来人们猜测顾准当时如此剧烈地被震惊，是因为他知道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了，是因为惧怕。也确实，从第二次进入经济所，顾准又给自己，给孙所长，给经济所捅了多少娄子——《会计学原理》、《粮价问题初探》、《美国总会计师制度》的“出笼”，置喙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全国价格政策、人民币对外汇率、资金利润率、集市农贸等等等等肯定不属于会计研究领域的、高度敏感的国策问题，高谈经济核算、高呼利润、高唱“价值规律之歌”……，这一切对于所长孙冶方既是无

上宝贵、无出其右的盟友支援，可也是他伤透脑筋的一件事情——怎样保护他？这位老弟从不设防，从不穿护心甲，任何一支明箭暗箭都可能要了他的命。保护顾准是他孙冶方的责任和义务，就像追寻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的下落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一样。

他老孙常常就是默默地为老顾扛着，不声不响地为他挡住一支支明枪暗箭，事后还常常不落好，不是被他误解，就是被他当作、骂作软弱。老孙依然不吭声、不解释，直到老顾自己恍然大悟。恍然大悟了，他老顾也从未向老孙表示过道歉或者感谢，不需要、太俗。用顾准自己的话说：“虽然当时的孙顾关系是不平等的，两人却有共同语言，两人对彼此思想一致都无怀疑。”

孙冶方原就是三百年前东林党的后裔，顾准也不是个弱种，当年为不连累老孙连自杀的念头都起过。孙顾两人那些骨子里传下来的东西真很难用无产阶级的一抔“净土”掩埋干净。

老孙被捕，顾准被震惊是肯定的，但并非人们想象的是因为老孙的倒台，失去了依靠、产生了惧怕而被震慑了。早已没有什么人、什么东西能“慑”得住他了，包括死神、死亡。到了他知道老孙被捕的那一刻，妻子、孩子、家庭都已经抛弃了他，除了精神和灵性上的东西，他对世俗的一切已经没有留恋。一个堂堂男子汉，此时此刻，何惧之有？

他的震惊，在于一，再也没有人能够对话，能够交通了，他将彻底地孤独下去，也在于二，马克思那句触目而逆耳的话——“中国只有普遍奴隶制，中国的大官僚要受廷杖，所以他们不是封建贵族”就在他眼前现了世。后者是更加令他震惊的原因。

孙冶方，再不济也算得上是个“首席宫廷经济师”，国家机器对他尚且如此，百姓们，例如我，其人的权力和尊严，至少是尊严，还能奢望保住吗？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没有自然法的观念——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不仅如此，一般的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也没有，契约观念也没有。” 笔记 P24

古代没有，现代依然没有。谈何契约，连法律也没有。说抓就抓，说打就打，说杀就杀，人毫无尊严感和荣誉感。而“荣誉感（是）西欧人道主义的‘个人尊严’观念，其实是骑士精神的延续。骑士不许人家侮辱。如果受辱，他可以要求决斗。长上对违背命的属下的惩罚，也不得有损人的尊严” 文稿 P323，骑士可以为尊严而决斗，连惩罚和处决都是尊严的，可在这里，人怎么可以和名叫“无

产阶级专政”的铁踵巨灵决斗？连死都只能死得猥琐和不明不白，例如以“长上”的名义当场廷杖，例如以“人民”的名义活活打死，谈何“决斗”？

他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能和老哥一起坐牢，他认为没什么不妥，反正一无所有，反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孙顾关系不是蒙蔽者和受蒙蔽者、主要人物和助手之间的关系，而仍然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的关系。”

这是他1969年7月写下的坦白交代，题目是《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副题是“我和孙冶方关系的补充交代以及我对于这一关系的政治性质的认识”，题目臃肿不堪，却是足以让人们了解孙冶方和顾准之间高山流水友谊的一篇奇文。

此时顾准依然还是不知道汪璧的死讯，但已经知道了孙老哥的噩运。冶方已经入狱一年多了，只不知为什么“人民”至今还没有把我这个“反革命思想联盟”的盟友也抓起来。他不单是一点也不想以“批孙”而开脱自己，反倒把自己说的比孙冶方还要“罪大恶极”。没能和老友孙冶方一起坐牢，他甚至有些遗憾。

顾准“历史交代”也曾写道“我要把革命群众对于孙冶方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活动的批判，看作也是对我的旧我的批判。我要从所有这些批判中汲取力量，以便进一步和旧我划清界限，和孙冶方划清界限。”后人看到此处，万望不要错会了他，这是文革通用文字，也是文革大批涌现的黑色幽默。顾准此生再也没有见到老友孙冶方，伯牙子期失了相揖而别的尾声，被多少学界后人视为憾事。

到了1968年，顾准已经真正的一无所有。

第十七章 新生日记

1.天才之为责任

顾准挣扎着从失家、失亲、失友的痛苦和震惊中恢复过来。

惯于长夜，惯于苦难的他，也习惯了疗伤和恢复。并非不间断的磋磨把他弄得皮糙肉厚，神经粗糙，弄得他“适者生存”了，非也。

顾准后半生多半沦陷在“非人化”的粗糙、粗陋、粗鄙的环境中，从精神到物质。尤其在生命的最后八年，他生活在一个没有艺术，对美毫无知觉，人只能在野蛮的运动里寻求快感的畸形时代。假如能将这个时代当做标本切开，取出一片断层，你会发现它的一些特征：伦理不清，全民无意识，不允许思考且把独立思考的人视作疯癫，没有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只能用从德国人那里拿来并经过俄国人愚蠢地做过唯物解释的历史观统一国民意识……。总而言之，是个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却自以为是全世界创造精神领袖和圣地的时代，一个必将遗笑万年的时代。

这就是他的时代。

但他不屑于沉沦在里面——因为生活的粗糙，粗陋和粗鄙也变得粗糙，粗陋和粗鄙。从灵性——神性上看，顾准是细腻和柔软的。仅仅从他的文字中人们就不时能看到这种细腻和柔软。还有眼泪。他的眼睛里常含泪水，也不惧它们流淌出来和被人看见。他是个活生生的，会哭泣、敢嚎啕的男人。

在感情上他常常是脆弱的，只是他的意志永不沉沦。种特质在中国文化人群，尤其是汉民族文化人群中是罕见的，且越是近、当代越是罕见。

1956年在党校，在斯大林偶像坍塌之后，顿失信仰的顾准一时也曾有过“还是看清自己，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56.3.13}的念头，也曾因怀疑自己“一个人的探索”会落得“只好追踪屈原于地下——而且是一个极劣等的三闾大夫，跳窗口的三闾大夫”^{同上}的结果而气馁。

但是他以后的文字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绪。即使是最不堪的情形下，例如在商城劳改，满身粪污、险些成为饿殍时；例如在大韩继被残酷而屈辱地殴打、差点丧命时；例如被亲人逐出家门、名符其实成为孤家寡人时；例如在六弟陈敏之被诬为叛徒，老友孙冶方被捕，世上再无一人能够交流

时……，他都没有自暴自弃和绝望过。

离开人相食的商城前夕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没有沉沦下去，这只有 XXX 懂得”^{60.1.16.}；日后在息县干校被批斗和殴打后他又在日记里写道——“什么消息我都受得了。充其量不过是死人，最亲爱的人的噩耗我都经受过来了，还有什么受不了的？……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招而已”^{71.1.26.}。

他有能力将一时的沮丧立即就化解掉。

1971 年元旦清晨，他心情灰暗：

“老了，没有年轻时迎新的豪情和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了。昨夜深夜不寐，萦绕于心的是炉子会不会灭，和吃饭等一些生活琐事。而今天早晨看炉子是灭了，晨九时半匆匆去看表演，一下子加了太多混煤，炉子又灭了第二次。可见即使是我萦系于心的事情，在这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也是极不顺利的。有时也想到，我这一生恐怕已经算做了结论，以后是残生余年，无复可作任何贡献之外，活下去不过是活下去而已……”^{71.1.1.}

可是第二天，他的日记立刻又充满了朝气——从波兰哥穆尔卡的倒台说起，说到他们在封锁媒体（当局封闭了华沙《直言周刊》，顾准连这个都知道，都没放过）和粮价问题上的愚蠢，说到奥斯卡·兰格这位被称作计算机经济祖师爷的波兰人，说到东欧和苏联的历史教训，洋洋洒洒，一扫前一天情绪上的晦气，令日后读它的人都精神一振。再看他另一篇日记：

“出处（路）如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怀的，还是追求真理。”^{71.7.11.}

1971 年，他已年过 56 岁，离去世仅仅还有 3 年的时间，跛、病、右俱全，身陷污泥渠沟。可你再看他的精神、灵性和灵魂，却正天高地广欢笑和翱翔着，百毒不侵。

日后有一天，他埋怨深恐自己关在监狱里的老师会疯掉的老友孙冶方的学生们：“你们太不了解你们的老师了。他是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疯掉的。”^{当事人口述}

顾准甚至不需要国人最离不开的“励志”——自己鼓励自己，用古人、名人，自己崇拜的人的话语，或者自己创造些话语。比如“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在科学的道路上”之类。熟读史书的他从未摘引过这类东西在他的读书笔记中。他情愿从“告算缗”、“均输”、

“城邦”、“原始积累”、“一元/多元”、“市民社会”、“边际效用”这样繁琐、具象的东西中获得知识而坚强，而进步，也懒得用“俱往矣”一类宏大叙事的抽象东西来励志。不是他不懂浪漫不懂诗，譬如“俱往矣”，他的读书笔记中就曾提及，可是他说比起“绝对精神”，“俱往矣”什么的那真是“何足比拟”的小巫见大巫啊。

他不用或很少用“我要怎样怎样”的句型，如此，反倒是有两次用到这个句型时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两次他说的都是“我要活下去……”。

与他足以传世的华丽文章相形见绌的是，顾准竟无一首，哪怕一阕诗文问世。少年时期就开始追求浪漫的他，在五十八岁，也就是临终前的一年这样说：

“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文稿 P431。

追求真理不能只凭“想象力”，更要凭籍的，是经验、理性和信仰。

曾再三慨叹于“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 文稿 P445 的他情愿做个笨人——既然无可能亲自接触考古学，那么就在语法学和逻辑学上下笨功夫去作历史的回顾和前瞻，找出规律，而不是想当然或者人云亦云，更不是夜郎自大式的大写意。

“散文式”的说理，能把道理说个透彻并与人讨论，而诗，常常是“不讲理”和蛮横的。连“散文”他甚至也不写，他写的都是“论文”，虽然今天人们读起来感觉比散文还要精致和美丽。至于“诗”嘛，就让诗人们去写吧，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诗人，从气壮山河的“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俱往矣”到“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的大跃进“红旗歌谣”，到文革小靳庄式的打油诗，够多的了。

不过有件令人惊诧的事必须在这里提一下：顾准临终前一年曾有一次连续十二天“读诗”的记录——从1972年12月25日起一直读到1973年1月5日。这十二天的日记都只有一个字——《诗》（或“同上”），然而遍寻旁证也无法猜出他这十二天读的是哪位诗人的诗或诗集。真是个有趣的迷。

他也很少怨天尤人，除了对黑龙江考察期间某位陈姓的先生似乎有些持久和异常的愤怒，是个罕见的例外。不过也不排除还有其他令他愤怒的大人物名字出现在其文字中，只是家人怕惹麻烦费口舌，

不愿出示而已。但是即使有，无非也还是说理的“腹议”而不是恶骂的“口谤”。即使对陈先生，他也只是表达了一种比较长时间的不屑。

相反他倒是不时用到“愉快”、“快乐”这些字眼，有时竟还用到“幸福”二字，且往往在世人以为他最应该去找根绳子上吊、挖个坑埋了自己的时候。比如在带着三反分子的“桂冠”进入党校学习的1955年，比如在打成右派，降职降薪，等候去劳改营劳改的1959年初，比如在喝了一大盆碎米粥，蹲在商城铁佛寺劳改营的大灶前烤火的1959年末，他都频繁地用到这几个词汇，不是反讽或自嘲，而是日记体写下的真实感受。

这真叫人拍案惊奇，在快乐的人和不快乐的人眼中，世界肯定是不同的。

顾准总是在回首历史的同时向前瞻望，世界总有希望，人类总有希望，生命总有意义。用他的话叫做“自然而然地达到了历史的乐观主义”^{55.10.11}。此人仿佛一生都在哼着《欢乐颂》。在艰难地克制了思妻，思儿，思家，思友之痛后，已经没有什么好再失去的顾准在灵性上日趋沉静和纯粹，这也是后人所谓“历史格外青睐顾准”说法的一个警证。疗伤的良药依然是书。首先是史书，其次是“马恩”和西方经济学。后两者他排比、对照着读，判断曲直，决定扬弃。而后两者又都是和前者对照着读，在史学、哲学和神学的层面上果断地判断着虚实、对错并决定着取舍。

从1966年到1969年，是顾准阅读中国和西方历史（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史、英国议会史和法国大革命史）、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最多的时期，也是他反思和质疑、肯定和否定最集中的时期。在“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马恩有关的其他作家的著作”^{自述 P307}之后，他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并在其上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为了要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到底在说些什么，除了哲学和经济学的学养外他还是迫切感到数学基础不够，依然不满意自己已经掌握的数学知识。这是他的弱项。虽然从1952年起他就开始立志攻克，可是一直无法系统地钻研下去，总有各种麻烦、灾难横亘其间，令他很难向自己西方的同行们那样，在数学的王国里也能或纵横捭阖或信马由缰。

现在“人民”不许他工作，正好趁此机会恶补一下。这样他又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复习了代数，深读了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原就是个“数字天才”的他，自学数学肯定是不吃力的，再加上日后在息县干校和回到经济所一段比较安定的时日里的自学，是他日后能毫无愧怍地在崇敬他的经济所小一辈面前炫耀他能拿三个博士学位，其中一个就是数学学位的实力基础。而另外两个——“历史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就根本不用说了，无人可出烦言。

读别人翻译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如今他实在感觉不过瘾，别扭。西方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译者或者因为不理解作者、作品以及他们的时代，或者实在找不到相应的中国文字，使很多原文的精髓在译文中明显地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肤浅、误解和想当然的诠释。“家”就飘渺“存在”何以存身？比如他举过一个典型的例子：

“现在的《资本论》中译，实在译得谬误百出，而且拙劣异常。例如《原始积累章》之IV，英译标题为 Genesis of Capitalist Former, ‘Genesis’套《旧约》的‘创世纪’，有一种真实历史的神话化的意思。中译干巴巴的‘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发生’。此外，Protestant 是新教，这是中国人习知的名称，直译应为‘抗议教’。译者用日文外来语的方法译音，结果凡和基督教有关系的和无关系的中国人一概看不懂。原始积累一章涉及大量西方历史，译文更不忍卒读！”文稿 P327

直到顾准的年代、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在使用王亚楠、郭大力 1930 年代由俄文翻译过来的《资本论》。这样的二手、三手译文，顾准当然不能接受，孙冶方也不能接受（这也是他在七年的牢狱生活中坚持自学德文的动力）。只可惜两人最终都没有弄懂德文。

好在西方经济学家们的东西大都是用英文写就的，可直接读原文他又觉得理解的深度上虽有提高，但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稿库”多少有些别扭。这些东西将来万一能有人看到，毕竟中文文体被接纳的可能性要高一些。几年前翻译《美国总会计师制度》和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过程曾使他尝到过巨大的甜头，如今又有闲又有钱（即使只有二十五元的生活费，除了给孩子们攒下一点，吃食堂还是足够。买书肯定是杯水车薪，不过如今书店也没有任何值得一买的书），离着沙漠之井——宗井滔——经济所图书馆又这样的近，何不重操旧业，再立“新功”呢？

说干就干，他立即从图书馆借出罗宾逊夫人《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

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着手翻译。到又要开始监管他时，“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监管开始搁笔”。只是这一次不会再有稿费了，从前为他争稿费的人如今蹲在大狱里，生死未卜。可就算他在，也绝不会再有任何刊物敢登载这样的资产阶级大毒草了。

没有稿费顾准照样译得乐此不疲，读得如痴如醉。

在翻译的过程中，他还找出著者其他的著作以及相关外文文献来对照。有1962年令他“不胜汗颜”的教训在前，他不敢再轻信自己的英语水平，只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翻译出来的东西他才会比较放心。

为翻译约翰·密尔的经济学著作，他去读他最著名的《论自由》。1903年严复曾以《群己权界论》为名首次中译此书。该书旨在探讨“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它提出了一个所谓“极简原则”，即“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正当理由是旨在自我保护”。全书的宗旨是“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约翰·密尔《论自由》。

顾准1972年的日记对再译、再读《论自由》作了记录，可惜那时他的生命已近尾声，日记记得极其简单，简直就是一张张书目表。但是从他的读书笔记以及通信文稿看，约翰·密尔的“自由史观”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也阅读罗宾逊夫人《经济论文集》的其余卷。这样的阅读过程令他的英文阅读能力迅速提高，加上是中英文交替阅读，也令他愈来愈能辨别出中译中的错误并据此修正自己从前的理解。

每天的读书、笔记、数学学习、翻译、给妻子和孩子们写信、挨批斗、写交代、写坦白、扫厕所、吃饭、睡觉……充满了他的作息时间表。书桌和斗室里到处是书籍、纸张、计算尺、字典。你倒是看他哪里有时间去哀叹、厌世，颓丧和自怜，就算是想“沉沦”都没有时间去沉啊！他就这样一直折腾到1968年8月再一次的“监管”开始。

是时“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和“军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进驻一切读书

人成堆的地方，是为工农兵改造知识分子。一般的知识分子接受一般的改造，特别“坏”的知识分子，例如顾准之流，就需要监管。监管室——经济所（后来是学部）的一间小屋，除了不许读书，不许写字之外倒也没有什么过于不人道的地方。监管对象一共是三个，除了顾准，还有李云（前国家建设委员会劳资局副局长，和顾准一样被“贬”到经济所做研究员）和江明（高岗先生的外甥，舅舅倒霉跟着倒霉的留苏海归）。多年后据监友李云说，三人常常围坐一起高唱“国际歌”。这个细节可信度不是太高。

兴许是李老先生《红岩》看多了，忘了三人都是“牛鬼蛇神”而不是江姐许云峰。“国际歌”是监管他们的“人民”的圣歌，怎么可能允许三个年过五十的老牛鬼蛇神去“亵渎”？这是其一；其二，此时的顾准早已深究过百年前的“巴黎公社”，仅仅他已经面世的文字，提到“巴黎公社”就有近二十处，尤其下面两段最为触目：

“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们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 文稿 P390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败，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文稿 P394

不仅如此，深谙英语，粗通法语的顾准非常可能知道“国际歌”不止只有已经译成中文的三段歌词，而是六段。恰恰是那未被翻译的、满含无政府主义红色恐怖元素的三段歌词，正是他所憎恶的“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的、被谱了曲的理论。12岁信仰过，13岁就抛弃了“安那其主义”的顾准，对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是持鲜明批判态度的，谁要说此时已经相当哲学化了的他能把个“国际歌”唱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感天动地，谁信呢？

话说两头。此时坐在正经牢房——秦城监狱里的孙冶方可一天都没闲着。老先生正在用打腹稿的方式撰写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论》。腹中打好一段，口里背诵一段，腹中打好一篇，口里背诵一

篇，到七年后出狱时为止，他已经把十万字的腹稿背得滚瓜烂熟。

监管期间，顾准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再一次通读了一遍，重点细读了毛先生未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笔记》。“1968年8月开始的集中监管，除读书生活不得不中止而外，我的生活方式并无重大变化，情绪上也没有什么波动……有一个时期和张之毅坐在一起，得以借读他那时还保存着的未发表的主席著作集，读了一些例如《政治经济学笔记》这样重要的主席的光辉著作，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获得了从前未曾达到的体会。”

如今他渐渐也学会了说些人前必须说的套话。

顾准的读书笔记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日期记载。推算起来，监管期间靠打腹稿、打脑稿记下的东西可能占了不小的比例，而且也能从有日期记载的部分找到它们之间明显和有机的联系。后人将他这一时期五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很专业、很到位地编纂为三大部分——《历史笔记》、《马恩笔记》和《西方经济学笔记》。就是从这些读书笔记以及日后他和六弟陈敏之的通信文稿中，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形象脱颖而出。

政治哲学，从某种角度看，不就是一种信仰的哲学表白吗？

2. 美丽炼狱

顾准的监管结束于1969年10月的最后一天。

10月底，中关村民族学院学部民族所里的集中监管就要结束了。顾准作完了最后一篇“坦白交代”，就是那篇《1934-1940年的上海地下工作》的“补充交代”。从监管开始，他又写了上百万字的“坦白交代”和“罪行交代”。

整整一年他都在写。不写不知道，一写才知道自己竟有这么多的罪行得向“人民”交代，这么多的罪孽得向“人民”坦白，直教人秋写到夏，春写到冬。

顾准也许知道得不全面，但绝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面，在他最关注的思想和学术领域，此时此刻正发生着什么——

此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正在撰写新作《致命的自负 社会主义的谬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二十多年来已经在全世界政治学、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堪称历史上最经典的经济学对决。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决斗的双方彼此凝视着——哈耶克 VS 凯恩斯。这道鸿沟就是顾准的时代（也是我们的时代）最壮观的经济学之争：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中国人顾准对双方都倍加欣赏，也欣赏着这场对决，但他有自己的立场，这个放到后面讲。

此时，新制度学派的领军者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和平与欢笑》、《新工业国》业已问世。这位美国经济学家是顾准所熟悉的，其代表作《丰裕社会》被他多次摘录和引用。富足经济与餬口经济间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差异以及来龙去脉已经被他思考多年；

此时，世界经济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萨缪尔森的巨著《经济学》已经出到第十八版。这是一位和顾准同年（1915年）诞生的美国经济学家。1948年，35岁的他出版了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到顾准日日夜夜写坦白交代的1960年代末，四卷本的《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又出版了。萨氏的著作也是顾准常常摘录和引用的。到2009年九十四岁高龄去世为止，萨氏的《经济学》已经以各种语言出版了一千多万册，成为世界经济学学子们的必读书。此时距中国人顾准的离世已经整整三十五年；

此时，发展经济学先驱罗斯托的新作《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近代经济的起源》在世界经济学界名声大震。这位经济史学家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并企图用这种理论代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顾准熟读他《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等早期著作，在其“读书笔记”中无数次摘录和引用，常和他进行隔空的神交——讨论和争辩；

此时，和顾准命运相仿，又比他幸运得多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的《历史与诺斯替主义》已经付梓。1938年，37岁的维也纳大学法学院政治学教授艾瑞克·沃格林惊险万分、千钧一发从纳粹吞并了的奥地利逃往美国。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与美国开放、自由、多元的学术环境成就了20世纪这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顾准和沃格林擦肩而过，无缘相识，多么可惜，仅仅“政治观念始自希腊化时期”、

“城邦的世界”话题，他们就会有多少共同语言。很难想象如果顾准能像沃格林那样从专制的铁蹄下逃出，也能在胡佛塔下阅读、徜徉和冥想，他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上的造诣会达到何种程度，至少中国的政治哲学领域不会静寂如冬至今吧。

……

地球在旋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万年太久而一生太短。可怜的顾准，此时距他生命的终点只有五年的时间了，却正下笔万言，洋洋洒洒地写着这些被日后年轻人评价为“淡如白水，味同嚼蜡，不忍卒读”的东西。很难向未曾亲历过的人解释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行为方式。仅仅是文风，它提倡的浮夸、重复、虚假、空洞就很难解释得清楚。只能说这是“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所必要的手段。只可惜那些被“砍掉了长得过高的谷穗”后留下的谷秸，它们因此比原就矮小的谷子们显得更加羸弱和空虚，也更加卑琐和可怜。

深秋夜，夜深沉，万籁俱寂。长长地出了口气，顾准写下最后一行字：“1969/X/26 志于民族所幽静之极的办公楼内”。这“幽静之极”的办公室和它楼下同样幽静之极的楼梯间是顾准两年来安身立命之处。楼梯间小到无法转身，逼仄阴暗，没有窗户，没有暖气，但它是单独的，可以容纳、容忍作为人的生活 and 隐私，给了他一个思考和精神放飞之处。除了那百万字的坦白交代，他大量的阅读，大量的读书笔记（卡片）也是在那里完成的。他好生留恋。可这里呆不住了。监管结束了，他这个老右派、死老虎要重新“交到人民手中”去训诫和改造。

不过这一次不叫“劳改”了。劳改这个词汇（Laogai）已经和苏联的古拉格（Gulag）并列，双双被收入《牛津简明英汉词典》和《牛津成语和寓言词典》，多少有点“国际影响不好”。这次伟大同志搞了点新意思，改了个名字叫“五七干校”。1966年5月7号，在一份林彪转来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报告上，极峰做出大篇幅批示：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

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篇一反他圈阅、“已阅”、“照办”简洁风格的、长近 800 字的批示，与“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号角”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同时出台，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公之于众。社论的通栏标题是《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它告知“人民”：这是一步“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它俗称“五七指示”，——又一幅“地上天国”景图，它将是：消灭分工的、消灭商品的、平均主义的、“大学校”式的社会。一言以辟之，就是要在地上、首先在中国建立一个一统、恢弘，存天理、灭人欲的“人间天国”。

如此宏伟的社会改造大蓝图，可惜“是非成败转眼空”，文革尚未结束，它连同其实验结果倒先就灰飞烟灭了。更像是一个没有可执行性的乌托邦宣言，“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却）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文稿 P268}，这个典型斯巴达式的社会结构规划蓝图，无论从政治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的学术角度看，还是从其虎头蛇尾，无疾而终的实验结果看，都是一种强行推行个人政治抱负，继 1958 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又一没有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任性与不正常激情的产物，也因此和上述诸物同样短命。

顾准前往的，就是这样一所“大学校”——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始自 1969 年 11 月，终于 1972 年 6 月，寿命的长短基本和全国“五七干校”同步，好像还要更短一些。

文革至此已三年有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厌倦了，再说得坦率一点——“人民”开始不耐烦了，人人希望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上学，军人守土，读书人教育、研究或者著书立说。可是三年多的运动已令中国满目疮痍，经济上姑且不论，人与人之间因真诚、信任和善意丧失而无法回到从前才是最可怕的，其中又以读书人的问题尤难解决。中科院是读书人最集

中之处，自然科学部分还好说，数理化、航天航空、原子弹总还是得搞，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就不一定了，况且那里还是个“黑马乱嘶”，“谷穗过高”的重灾区——经济所、文学所、世经所、历史所、哲学所、民族所、考古所、近代所，就连自然科学史所也未能幸免（以上进入息县五七干校各所名称均出自顾准日记），拎出哪一个也算不上是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缺的战斗员，都是有你过十五没你过初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你不去干校谁去干校？

五七干校说的是“工、农、兵、学”，实际上并无工人，农民本就是当地人，兵则都是领导——军宣队，且数量极少，真正的五七战士都是读书人，除了学部，各大部委，各文学艺术、学术团体的读书人也都在内。

比起十多年前去右派劳改营，去干校要“体面”得多，就因为人多势壮，且越是精英越是要去，特别是学部，五七队伍蔚为壮观。人们平常难得一见的人物，例如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丁声树、徐懋庸、吴晓铃、吕叔湘等等都一锅端来了。年过七十，因被毛泽东著文批判而声震全国的俞平伯老先生更成为老乡们追看、围观的“星”级人物。

干校的全体人员一律军队编制，学部为团，配政委副政委，研究所为连，配指导员副指导员。七连就是经济所的人马。如此，中国科学院经济、文学两所，连职工带家属，男女老少，瓶瓶罐罐，几百号人，1969年11月16日启程，在不足二十四小时内经由火车、汽车、徒步，“雷厉风行，令出如山，完全部队做法”^{69.11.18}地从北京建国门学部大院直插河南省息县东岳镇——一个连电力照明都还没有的中原贫穷乡村。

“五七战士”们分男女住在仓库里，犹如洪秀全的男女营。许多女人还带着孩子，孩子们小的不分男女都跟着妈妈，大一点的男孩子们就跟着爸爸，适龄的都被安排进当地学校读书。至今已经五六十岁的当年娃娃，有些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河南息县话。

劳动主要是盖房，为自己也为后来者。人人都以为这种生活方式要长年累月地继续下去了。顾准也逐渐灰了回北京搞研究的心，除了死心塌地地干活，就是千方百计想办法不要彻底脱离文字、文化和文明，经济学研究是搞不成了，但“一个人的探索”绝对不可丢，这是他的生命意义所在。

生活方式的陡然改变对老弱病残而言是残酷的。仅仅顾准日记的记载，死在干校的就有一千人——病死的、累死的、斗死的、自杀的和被杀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位老先生是看电影活活给看死了。当年八个样板戏都已拍成电影，看一遍是不成的，隔三差五就必须重看一遍，令“人民”不胜其烦。露天放映还好，影院放映为了防止人们中途退场，常常大门反锁。那年头因看样板戏电影突发猝死的故事时有发生，人们见怪不怪。假如不是曾经亲历，如此千古怪事我是万不敢采信的。

高集——中山靖王墓、金缕玉衣的的发掘和考古者，“先割静脉，未成，上吊，绳断，跌断二三个牙齿，伤太阳穴。然后去取新绳，砍了，系了，毕竟死了”^{71.8.8}，可见其去意多么坚决。

仅经济所，随儿女去干校的老人们就死了三个。学部死在息县干校的所谓“五·一六”份子就有十二人。更有惨者，一位所谓“五·一六”份子不堪凌辱自杀，在埋葬的当晚就被人掘开坟墓，剥光衣服和裹身的塑料布，暴尸荒野。并非是有人要掘坟鞭尸，而是当地穷苦至极的老百姓贪图他那身衣服和裹尸的塑料布才出此下作之手。

批判会是必修课，大会、小会、晨会、夜会，昨天批判刘少奇、今天批判五·一六，明天批判狄超白，后天批判孙冶方（人都在牢里还得批）……，反正不能让人消停和安静，好像只有不间断的喧嚣才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安全感。

是年顾准自己也已五十五岁，干校两年多的艰苦劳作，其强度大大超过了一位半百之人的承受力。除了与当年商城铁佛寺劳改营相仿的起猪圈、担粪、种菜之外，建造干打垒式住房的重要工序——脱坯和搬运更是最重、最累的活计，比他年轻十几、二十岁的人做起来都非常吃力，他都挺过来了。频繁的发烧和“铁锈痰”都不是要求休息的口实，要求休息一天就被认为是“偷奸耍滑”，这对他是莫大的侮辱，比叫他“老右派”、“反革命分子”更令他不堪忍受。他也从此不再要求请假，只要还能爬起来，还能吃饭，他就不认为自己在生病，就去拼命地干活，不是表现给别人看——一个老右派，累死也是活该，再积极也不会给你摘帽——而是以身体的疲劳去抗拒内心的痛苦。

干校初期他常常被批斗，曰“田头批斗会”，是为贯彻“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最高指示。愚蠢的人们还殴打他，以为这样才能更明确地表明自己政治上的正确。可怜打人者文化

水平都低，是经济所的工人，而恰恰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令他们的文明水平也随之低了下去。可是拳打脚踢哪里压得服“老运动员”顾准，他一次次从地上爬起来怒吼“我不服！”，“我就是不服！”，打人者手脚发软，围观者无不动容。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群人围观一位手无寸铁的老人被年轻人殴打的场景，当年却是家常便饭，你走开不看都不行，那叫“丧失阶级立场”。可也就在围观中，一批年轻人开始觉醒，开始被这位不屈的人感动，甚至以为看到了英雄。

他们原来和这个孤傲不驯的半老头并不熟悉，除了在批判会上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地批判他之外，并不清楚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今总算是见识了。几年间看惯了被欺凌被侮辱的书生们要么猥琐下去，要么疯掉，要么自杀，单是这老者为保卫自尊，“士可杀不可辱”的做派也令他们敬佩不已——真汉子，大丈夫也。不过此时他那一肚子学问他们还没有领教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纷纷向苦命的顾准靠拢，从他身上学到了任何一所大学都学不到的睿智，汲取了够用一辈子的做人道理和生命真谛。

许多人被他改变了，更有些人的一生都被他改变了。

劳作、殴打和精神折磨使顾准原本就不好的肺部迅速地向绝症发展，从铁锈痰到咳血，从肺炎到肺癌。他并不自知，还常常乐观地记录下自己惊人的饭量和不医自愈的速度，

“休息一周，饭量甚至更大于劳动之日，最多一天吃过一斤七两，消化良好，肺炎后的严重消瘦逐渐有所恢复。惟晨间常仍发现铁锈痰。既然一不发烧，而饭量好，体重恢复，也就不去管它是怎么回事了。”^{70.2.28}

这非凡的生命力真令人惊诧和肃然起敬。

息县五七干校建校方针美其名曰“经济建校，突出炼人”。至于效果，顾准总结道，“炼人效果如何，可以用‘谁来谁变’四字概括”^{71.4.1}。怎么变，他没写，但可以用和他同期在东岳、明港干校的学部资料室研究员孙越生先生的话来做个诠释：

“在干校之外，农民的生活依然故我，也就是说，照样贫穷。唯一能给我安慰的，是干校周围的风景非常美丽，美丽得使画家不能不为之手痒，诗人不能不为之心动。自然的美丽风景和干校的痛苦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么痛苦的炼狱居然存在于如此迷人的自然美景中；这么美丽的自然场景中却上演着如此残严酷的政审运动。天地间如果存在有情有义的逻辑与历史的话，必令逻辑

为之踌躇，历史为之踌躇。”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遗憾的是逻辑和历史从来都不会是有情有义的，它们不会踌躇，怜悯和改变，踌躇的只能是人，改变的也只能是人。顾准也变，光看他日记风格之变就足够了。从息县日记开始，他的日记只记录，不置评，例如记录干校这件事情本身的存在状况：人们花费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做基本建设，以为此生就“扎根”在这里（东岳）了，可“实际上只是忙着给（后来的）下乡人员建筑屋居”。还未等新盖的房子住上，人们又接到“集训命令”，一窝蜂搬到别处（明港）去，一年后又一窝蜂回了北京。从始至终，“这个干校‘中央交给河南，河南交给信阳，信阳交给息县’，到今天为止，谁来接收尚无信息”，学部息县干校一时成了无人认领的弃儿。又一次建立在“拍脑门子”式任性和激情上的产物——五七干校，真真是，用一句河南土话，叫“亲娘后妗子，提溜起来一阵子”。

顾准已经习惯了这种“旋兴旋废”，莫名其妙的折腾——

“57年以来，我目睹过居庸关绿化，机关农场，大韩继建房，皆旋兴旋废，东岳干校其第四次矣……这一批多年积累的学士，不宜务农太久，干校生活，只得戛然而止。”71.3.31.-4.1.

实际上此时离干校生活的“戛然而止”还有一年多，人人都以为要就此生活下去了，却又被他预测到了“干校”的短命。

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他的《札记》中写道，“一想到有时你走在街上，竟会看见莎士比亚当马车夫，拉斐尔当铁匠的场面，就不由感到不寒而战”。这种场景在五七干校却是常态——钱钟书做邮差，丁声树烧锅炉，俞平伯种菜，何其芳喂猪，徐懋庸担粪、吕叔湘卖饭，吴晓玲管仓库……。其实看惯了也就无人会“不寒而战”了，一切好像本该就是如此。

顾准更不会“不寒而战”。早已身经百战，什么样的场景他没有见过？“寒而不战”才是硬道理。他只是埋头记录：

“巫宝三脱坯，章有义制瓦，杨坚白和泥，骆耕漠装麻，林里夫拉车，看来也是勉强……”71.11.22.

况且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正常国家里这种场景是长不了的，除非这国家自己想亡国，而他绝不相信中国会亡国。

劳作的艰苦顾准是不惧的，可怕的是告密之风在毫无个人隐私的大军营里盛行并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连随行的孩子们都无法幸免。每一个“五七战士”都有互相监督和告密的义务，大车店式的生活环境也使告密更加方便和简捷。所有人只有在“战士”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这里要的就是“谷子长得一般齐”的、必须的平等，那么首要一条是降低教育水准，文化科学水准以及才能的水准。革命用不着太高的才能，“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才是当务之急——西塞罗必须割去舌头，哥白尼必须挖掉双眼，莎士比亚必须砍去右手，只有这才能达到乌托邦内的平等！

顾准的息县日记曾记下当年一个年轻人——沈元之死，确切地说应该是记录下了一次“直接民主”的过程——“人民”集体讨论并做出了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决议。顾准预测了沈元之死，惟其如此，貌似平淡的这段文字才尤显恐怖：

“又沈元乔装黑人企图入法国大使馆未果，如何处理，北京已交群众讨论，同志们的估计，此人大概也是要处死刑的。”^{70.3.16}

沈元，1955年17岁以当年高考文史类极出色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6年从美国共产党机关报《Daily Workers》(工人日报)上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后，不知天高地厚立即摘译了部分章节在同学中传播。1957年，19岁的大三学生沈元被打成右派并被北大开除，流放京西门头沟劳改。1961年经由街道摘帽。后经医学家姑母向中科院学部推荐，刘导生、黎澍等学者看过这位年轻人的著述惊为奇才，当下揽入近代史研究所做实习研究员。1962年著《〈急就篇〉研究》深得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黎澍、丁守和等大家赞赏。未几又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文，被中国一号党报《人民日报》摘编为《论洪秀全》整版刊载。在连顾准都被说晕了的“群星灿烂”中，他又写出洋洋洒洒一篇大文——《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以假名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并再次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一时间“沈元道路”的窃窃私语竟有盖过“又红又专”口号之势，学界甚至有“与其学习雷锋不如学习沈元”的声音出现

《人民日报》1966.6.23 吴同瑞文章《北大成了资产阶级权威贩毒的市场》。这棵“长得过高的庄稼”引起了同行人群的共妒，被几位分手多年的北大同班“调干生”同学以“右派分子妄图置喙当代政治”为由，不依不饶一路告

上去，直告到极峰处。

极峰的班子们却看出了这年轻人的可用之处。是时文革小三王——王力、关峰、戚本禹连带“旗手夫人”的秘书阎长贵，都已作为文革祭坛上的替罪羔羊入狱，这年轻人正是“今上”身边最缺乏的笔杆子。他不幸进入某位君侧重臣视线之后的事情，就太扑朔迷离了。多年后有位亲历者这样表述：“沈家中被抄时有毛氏宗谱，陈伯达给的。陈伯达要他写文章。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杀头的”^{郭罗基《哀沈元》}。更加诡异的是，“不肯就范”或是“不肯引颈就戮”的他，传说居然蠢到用黑皮鞋油涂抹手脸企图闯入苏联大使馆，被中国卫兵识破并逮捕。就在顾准写下这篇日记三十三天后的四月十八日，三十二岁的沈元在北京永定河畔被枪决。

沈元之迷至今无解——当年的判决书和后来的平反书都对他的“出逃”忌讳莫深，尤其是他究竟“出逃”到哪个大使馆，既无官方文字也无民间口述，就连曾经同关一个死刑号子的难友也没听说过他的案情^{张郎郎、马捷生、周七月口述}，这才有“苏联”、“马里”、“法国”、“某非洲”大使馆之类臆断。更有人断定所谓“黑皮鞋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沈元就是被灭口。而沈元之死更是被导演成一次“直接民主”的恐怖路演——由“群众拇指向上或向下”来决定是否剥夺一个同类的生命。那一天的中国式“贝壳放逐”和“苏格拉底判决”，军管会人物就坐在台上，近代史所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处死沈元，且至今没有一个人否认自己曾经投下的那枚“放逐的贝壳”和那只“向下的拇指”。

是“我们”，砍掉了这颗长得过高的庄稼。因为“我们”被告知这是保持乌托邦式平等的必要行为。就在这种“平等”中，顾准写下了至今被人诟病的《新生日记》。

3. 新生日记

1969年10月31日，就在“坦白交代”写完最后一个字的几天后，顾准开始用一只新的日记本写干校日记。

如今面世的《顾准日记》，1960年3月2日是他文革前的最后一篇，到突然出现的、1969年

11月1日开始的他的干校日记(新生日记),中间的空挡整整九年半。姑且认为他整整九年半没有任何日记文字留下吧,虽然这非常令人怀疑和沮丧。

在这只新的日记本扉页上,他写下:

新 生 日 记

顾准

1969/XI-1971/IX

北京-东岳-明港

这些字样好生怪异,和常人写日记,写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是哪天就是哪天大不一样。

扉页的自题字,只有一种可能——写日记在前,题扉页在后——没有人写日记会预先设计好“这一本”要从哪年哪月起始到哪年哪月结束。更不可能的是一个早已被踢出“决策圈”的人会事先知道“北京-东岳-明港”如此明确的干校地址变更程序。

还有个蹊跷。

这本日记的记法是这样的:前边一页或两页为流水略记,逐日记录,一日一行,记满为止,十分简单;接下来再一天一天详记,但也不是非常准确的排列,前后也有一些日序上的混乱。有时写着写着又写过了,比如某月前面的流水账只记到7号,后面的详记却写到15号了,那么在下一单元里又来补记流水账。

由此可以判断,略记都是当天写下的事体大概,而详记都是日后补充的事体细节。如此日记体是不多见的,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性是出于写日记人谨慎的深思熟虑——临睡前先记下大体事件,不详述,不评论,以免言多有失。得空时再字斟句酌地补上细节,更加字斟句酌地加上评论,但绝不留下招灾惹祸的莽撞文字。

五七干校的人们过的都是公众生活,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可言。“这里不可能有办公室和家庭的二

重生活，一切都无法隐蔽……”^{69.11.26}。这样的生活顾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过了将近三年，从1969年11月到1972年7月。“日记”早已不是私器，主权并不属于他的主人——“我”，而是属于“人民”。既然在乌托邦中，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皮子底下写，当然谁要看都是可以看的。你可以不写，但我要看的时候你不可以不让我看，这就是游戏规则。

实际上这个游戏规则从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到了文革时期，日记已经成了最好的“试金石”——检验你对党和“人民”是否藏“剑”或藏“奸”，在党和“人民”要求你交出来公布于众之时。彼时有不少丧生于“反动日记”者，例如遇罗克、张志新等，也有许多人就此罢笔。

顾准原是可以不写日记的，可是没有文字的生活对于他真是“毋宁死”般的难受。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可能像在北京的楼梯间里那样读“杂书”，写笔记和作卡片，除了写不完的、味同嚼蜡的检查、坦白、交代之外（他原以为在北京已经写到山穷水尽了，却不料革命正未有穷期，还早着呢），剩下也就只有写日记一项可以接触文明、文化和文字之事了。

不过你要断定他是因为穷极无聊才写什么“新生日记”，那也肯定不对。

日记被写得非常认真，没有玩世不恭，没有嬉笑怒骂，也少有含沙射影、“清风乱翻书”之类的讥讽。日记的篇幅还特别长，占去他全部已经面世日记的五分之二，将近十万字。除了那些被后人诟病为“猩红热”（例如1970年1月1日“元旦决心会”一篇）和看出了“端倪”（例如1971年6月10日“读天演论”一篇）的文字外，其他的文字无不是在“关心国家大事”，而这正是极峰号召“人民”去做的。有时他也略抒胸臆，但不哀不怨，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慢慢说去。

有人为新生日记送上了四个字——空、杂、冗、假，认为是一部专门写给“人民”看的假日记。更有学者出于爱屋及乌的情绪，直接叫它伪日记。“假不假，伪不伪”暂且不谈，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不能轻易放过的，那就是顾准日记实际上并未中断，是接着“1960年2-3月间日记”断断续续写下来而并非人们今天看到整整中断了九年多的这个样子。

写惯了日记的人很难停下来，许多人会一直写到生命终结，直到再也拿不起笔来。顾准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他一生的日记终结于1974年10月17日，距他的离世不足两个月。实际上10月16

日和10月17日他除了记下日期外，一个字也没有写——他那只书写了一辈子的右手再也没有气力拿起笔了。

现在来看“假”和“伪”。

和他的党校日记、商城日记、北京日记相比，这本“新生日记”似乎更值得深究、也更有意思一些。这是一本随时准备“给人看”的日记，“我”在其中是什么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允许“我”是什么，但是我依然要写下尽可能真实的“我”。

极少有人经过文革还保持着健康的人性和人格。文革最大的破坏是对真实，真诚的否定。你剥夺了我知道真相的权力，我很快就不想、不敢、不再讲真话，从对政权、政府直到对亲友、家庭和配偶。这是一种本质的破坏。人们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什么有利什么安全说什么。叶浅予先生曾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许许多多（包括我自己）都是靠说假话活下来的。”叶浅予《自传》

顾准是一个不例外中的例外。

说“不例外”，是因为他也“靠说假话”活了下来。“坦白交代大全”中的假话就不追究了，“新生日记”中被后人冠名为“猩红热”、“雅努斯”的文字还是需要推敲的；说“例外”，是因为他在说“假语村言”的同时却未将“真事隐去”，对照他说假话（新生日记中）的同时以及前、后说出的真话（笔记、文稿和旁述中），不仅仅是精神高度上无需赘言的差异，就是语言文字本身的差异也是一目了然的——一个是人云亦云，照葫芦画瓢的集体癔症意识流，枯燥乏味，面如瘡三；一个是特立独行，散文诗般的个人意志表述，高山流水，独特清新。后者的美更加衬托出前者的可笑、虚空和丑陋，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反差故意更叫人“纵难忘，费思量”。就算是前者，有时也会露出隐晦但依然可察的端倪。这也是顾准文存的一大特色。他是在一个散发着邪恶气息的、变化不定的沼泽地上走钢丝，必须保持平衡，一个滑脚就意味着新的灾难临头，甚至是粉身碎骨。

顾准的“例外”在中国十年文革史上是罕见的，它除了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基础外，还需要高度的智慧，包括文字智慧来支撑。要了解顾准生命末端到底是九死未悔还是变幻陆离，除了他最后的空

谷足音——那些足以传世的文稿，最好的史料就是这本《新生日记》。

可惜的是虽然顾准一再强调自己“新生”了，这本日记依然没有逃过被斧钺和腰斩的命运，特别是它的被“腰斩”——戛然中断于1971年9月2日，尤其令人起疑。此时距顾准和他的七连离开息县返回北京还有差不多十个月的时间，既看不出干校有何变故，也看不出顾准有何必须罢笔的原因。

已经面世的“新生日记”起笔于1969年10月31日，终止于1971年9月2日。与“党校日记”、“1959年二、三月间日记”、“商城日记”和“1960年二、三月间日记”相比，“新生日记”中断得更加离奇和没有道理，被删除、被缺页之多的故意也更加明显，更加惹人注目。在没有新的史料面世之前，我不得不说，这是因为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早早被顾准预测到了，也正是这些“预测”和后来的“记述”以及“评论”文字被齐崭崭地删掉了。

“参考不准看，思想不活跃，尤其近来几天，晚上常常很晚才能入睡。幻想消除了，见五日的日记。”^{71.9.2}

强调“参考消息”不许看，难道是最近才“不许看”的吗？为什么突然不许他看了？而“五日的日记”又何在？

“局势有变化，但仅仅是开头。而且局势的变化，在势怎样也是快不了的，它只能是月计不足，岁计有余，如果缺乏耐心，只有一条出路——不等了，不等也可以，但是，既然立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何必不等呢？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71.9.2}

顾准在幻想什么？在等什么？

他在等一个“月计不足，岁计有余”的局势大变！

这一次，再也无法让人相信这是日记主人自己的中断了。只要稍作回忆，任何一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恍然大悟，豁然开朗——1971年9月是什么日子？！

“新生日记”突兀地终止之后十一天，九·一三事件发生！

这是中共党史上最难堪和尴尬的事件，上上下下的“人民”群众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顾准料到了，只是在时间的准确性上略有偏差——不是“月计不足，岁计有余”，而是“天计不足，月计有余”。

“……（1970年）XII 下旬主席与 Snow（斯诺）谈话……（1971年）I 元旦社论，提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战线方面的教育……IV 下旬 Snow 文章陆续发表……17 日起《参考消息》发表 Snow 文章译文。排成上面这张大事表后，可以推测，揪出总后台在十一以后，元旦以前。” 日记 71.6.23.

就在全封闭的息县干校，顾准以超常的观察和判断能力，仅凭着几张公开发行的报纸，整整提前四个月预测了这次惊天动地的中国政坛大地震。

怪不得彼时的 9 月份人家不再允许他看《参考消息》，而后人们则毅然决然地腰斩了他 1971 年的日记，两者大概都是出于万般的无奈——此人实在太厉害，什么都让他说中了，怎么得了？“人民”的面子可往哪里放呢？

所以我们看顾准先生的《新生日记》，最好是耐下心来学鲁迅先生看黄历——“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横竖睡不着，把个黄历颠过来倒过去地仔细看上半夜，你必能看出名堂。那就看下去。

4. “我决定不作魏连芟”

有句话在“新生日记”开篇第一天的文字中，不要轻易放过它，它是解读“新生日记”的好钥匙：

“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69.11.12.

魏连芟者，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第一篇——《孤独者》的主人公，不大出名的一篇、不大被人记住的“这一个”。大先生笔下精彩的人物太多了，淹没在其中的魏连芟实在委屈，因为倘若放在别人的文字中，他的光彩即使比不上“阿 Q”、“狂人”，至少也不应该在“孔乙己”、“华老栓”之下。

连芟本是个新派知识分子，与夏瑜、“狂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庸众更加彻底的疏远，也不再有那种主动对立的精神或者任何唤醒他们的愿望。他原是极富异秉，极清高超脱的，可依然失败了，最后还是成了权贵的幕僚。他写给叙事人“我”的信里说，“我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真的失败了，然而我胜利了”。周作人先生曾说，鲁迅的小说中从来没有一个像《孤独者》中的魏连芟那般和作者接近，可以把他看作鲁迅“作为一个陷于夹缝中的、必然会痛苦并感觉到死之阴影的笼罩的、觉醒了的孤独者的自我隐喻”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我决定不做魏连芟”，假如能将这句话视作顾准整本“新生日记”的基调，许许多多关于“两个顾准”、“猩红热顾准”、“雅努斯顾准”、“假日记”、“伪日记”……之类疑问、疑惑都会迎刃而解。

从表层看，顾准和魏连芟真是像极了，都是“作为一个陷于夹缝中的、必然会痛苦并感觉到死之阴影的笼罩的、觉醒了的孤独者”。对于无知的群众（庸众），他们都采取了疏远的态度，都很少有唤醒他们的愿望，都对个别的人——魏连芟对“我”，顾准对陈瑞铭、张纯音、吴敬琏等年轻人还有交流的欲望。

还有，他们都爱孩子。

魏连芟是“见到孩子眼里即刻就发出欢喜的光来”，他说“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人们形容他对孩子是“怕孩子们比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均摘自《孤独者》。而顾准的爱孩子是有目共睹的。在渴望爱自己的孩子们却无法爱的惨痛中，他把一腔父爱都投向了身边干校的孩子们。这就应了诗人雪莱和鲁迅小说同名的诗《孤独者》中的一句——“他的命运之杯虽苦，优胜于一个不懂得爱的可怜虫”雪莱《孤独者》。两人又都是“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摘自鲁迅《孤独者》，却也都并不憎恶生命。行到水穷处的两人，魏连芟说“我还得活几天”，顾准则坚定地说“我要活下去”。

甚至连他们的病状和死亡都相似——魏连芟是位肺结核患者，时常咳血，最后死于大吐血。写新生日记时的顾准已经开始咳“铁锈痰”并很快转为鲜红血块，五年后死于肺癌。

但他们又绝不是一样的。

魏连芟最终放弃了天赋的异禀，随了时代的潮流，做了权贵杜师长的座上客——“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我先前的旧客厅里现在有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鲁迅《孤独者》。

顾准则将各种各样的“杜师长”拒斥到底。何曾是没有机会？但凡一生中能有一次屈从，他就会比魏连芟更加热闹喧嚣的新客厅。但他至死也未屈从，从人性、人格和意志的意义上保持了不被玷污（虽然他自己还是不满意，这个放到后面讲），所以才有那最后的坦然和欣然——“我热爱生活，

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 顾准遗嘱。

人的临终最能展示其本性。魏连芟与顾准的临终也截然不同——魏连芟至死都是孤独的，“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摘自《孤独者》，想必他不会原谅任何人，也不会求任何人的原谅。他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东西。

顾准的临终是他苦难的顶峰，也是他人性展示的极致。他原谅一切人，也请求一切人的原谅。他的死何止是不孤独的，简直就是死在无边的爱海中（这个也放到后面讲）。他给后人留下的是一支轰鸣至今的精神欢乐颂。

两人的差别，天壤云泥。

顾准在“新生日记”中专门提到“魏连芟”这样一个不为世人熟悉的名字，且用了“励志”的口气说出（他的文字中极少出现“励志”用语和口吻）——“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用心良苦。

“自暴自弃”者在顾准，既不是望岫息心的遁世，也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更不是破罐子破摔的萎靡，而是魏连芟所谓“舒服极了的胜利”，是那杜师长恩赐的“八百现洋薪水”，是那“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他早就和魏连芟分道扬镳，早就不认识什么杜师长，李司令了，如今再次声明他绝不做魏连芟——我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不论你们把我逼迫到哪一步，也不论有怎样的诱惑在前，我都不会放弃我内心的东西——良心。而黑格尔说，“良心，它就是对它自己有了确信的精神”。

这就是1969年“再活二十年的勇气也增加了”^{70.6.7}的顾准。

这个顾准当然是1959年商城的顾准，1949年大上海总税吏的顾准，1939年“联谊会”和孤岛的顾准，1929年“我也要扛起红旗”的顾准，1919年“五四”、“小姑私塾”的顾准。

他们怎可能不是一个顾准？！

最后五年的顾准只有更成熟、更强大，人格没有分裂，人性没有异化。

5. 过不去的过去

“let bygones be bygones.”^{69.11.12.}

这是顾准“新生日记”开篇中的另一句话。

它真可以读作“让过去成为过去”吗？顾准真要把自己的“从前”弃如敝履，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吗？为不再赘述，就从开篇说起。

新生日记从“生离死别，最是最难堪事”的汪璧之死起头，真是悲惨的“新生”。11月初，顾准在民族学院的监管结束，回到建国门内学部大院。针对顾准这类人的监管已经不叫“监管”，改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X期。一般群众一听谁谁谁是第几期学习班的，一般就能立即判断他问题的严重性。顾准所在为第三期学习班。从他日记所记，头天“作最后的检查交代”，第二天总结，第三天还在“全天修改检查交代”，第四天再誊写检查报告，可以判断该期学习班是属于改造问题十分严重者的，一般问题者一期、二期就“结业”了。

第五天，他填写了去五七干校的登记表，随表写了一份要求见妻子汪璧的申请。

就算离婚了，就算恩断义绝，毕竟他们曾是三十多年的夫妻，共同养育了五个孩子，何况两人曾经非常恩爱且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如今既然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毕了业，一百多万字的检查交代也缴上去了，还蒙恩能和众多人民内部矛盾的同事们一起去五七干校改造，他心里又起了些许希望，“我想，检查交代交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要清查我与采秀之间的事情了”^{69.11.12.}。

“我和采秀之间”要清查什么事情？无非还是妻子包庇反革命分子丈夫，未把他胡批乱注的“毛选”主动交给组织，还帮助他刀劈斧砍、火烧水淹地“销毁罪证”而已。如今我自己已经坦白交代了个底朝天，你们再追究也没什么意义了。现在提出来见见老婆，就算根据“给出路”的政策也不为过吧？可就在申请交上去的当晚，毫无征兆地，他突然之间就有了不详的预感——“晚上，开始感到秀也许不在了”^{同上}。

此时距汪璧自杀身亡已经一年零七个月。五百多个昼夜都没有过的这种感觉令他抓狂。

其实“有朝一日能和妻子复婚”的念头一直都埋在他的潜意识里，现在最狂暴的已经过去了，它

就浮了上来。那天偶遇经委大楼看门的张老汉，说到一个离婚的右派又复婚的例子，当场道破了他的心事——多希望自己也能这么幸运啊。

他徒劳地抗拒着不详的预感，可疑惑却愈来愈多，愈来愈大。他坐卧不安。为了证实自己是庸人自扰，他豁出去了，转着圈地找组织，找工宣队、军宣队。做丈夫的向每一个能听他诉说的人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下去，二不影响改造”^{69.11.12.}，请你们无论如何告诉我，我的妻子她现在在哪里，怎么样了！

他恳求、哀求着，一个人一个人，一遍一遍地问，闻者无不为之动容。三天后，军宣队的指导员终于代表组织告诉了他真相。他陡然静了下来。

虽然早有预感，早有准备，可一旦噩耗证实，预感成讖，他依然无法自己。她真的走了，“可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同上}。

天黑了下来，再不打饭食堂就要关门了。趑摸到饭盆，他呆呆地从食堂打来晚饭，四肢瘫软地伏在桌角上，下意识中竟还呆呆地吃了两口。起初，他只是抽噎，流不出泪来，之后总算能轻轻地哭出来了，过了好大一会才真正领会了别人告诉他的到底是什么，这才“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同上}。

一个五十四的男子，曾经的翩翩君子、桀骜不驯的高干、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一时竟将风度、面子、场合、影响、议论……这些国人最注重的东西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当众嚎啕，除了出于最深度的痛苦，出于对妻子最深切的爱、内疚和想念，还能是什么？“组织”上的一句话，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66年在大韩继予六弟信，曾说到周口店的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踩碎，云为镜破之讖。”^{69.12.11.}，镜子破了，还有“破镜重圆”的盼望，“不幸此种想望竟成泡影，讖语竟不幸而中……”^{同上}，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69.11.12.}

失声大号后还能把混合着眼泪的饭吃完，这得有多么强烈的信念支撑着活下去的愿望。

孩子们一个都不来见他，就算有工宣队、军宣队的同意、督促，最后已是强逼，他们就是不来，

一个都不来。可明明是伤透了心的父亲却说：

“这些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我的《新生日记》增加了一重意义 ‘Let bygones be bygones’。1944 在延安，我为父亲服丧。这一回，我不服丧，因为我为秀服丧是终身的。长恨歌说 ‘此恨绵绵无尽期’，那是空话。但是马克思把他父亲的小像，镶嵌在胸饰中的，带进了地下。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69.11.12.

“Let bygones be bygones” ——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果真吗？为什么后面的中文表述又和这句英文完全歧义？假如真的是“让过去成为过去”、“既往不咎”或者“不计前嫌”（该英文句子三种中文语义），那还需要巴巴地说到“终身服丧”，说到马克思父亲的小像，说到“三十五年，二十年”什么的吗？不要望文生义吧，找本字典来，好好看个究竟，顾准的英语水平可不是等闲的：

“Let bygones be bygones” —— “陪你到世界终结”。这，才是顾准的原意啊。

崇敬父亲的马克思在父亲去世后一直把镶嵌着父亲小像的胸饰佩戴到死，并在死后带进了地下，这是马克思的“Let bygones be bygones”。顾准没有胸饰，即使有，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可能佩戴，但他有他的办法，顾准有顾准的“Let bygones be bygones”。

说是不服丧，可到了干校，他立刻向别人借来布票，购买了大量白布做成了被褥。“被服如此补充，逐渐可以成套，用的是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我国服丧从白，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上可以用到我长辞人世之日，服丧从白，从古礼也……” 59.12.11.。我用素白的被服为我最亲爱的人服丧，总不能为此治罪吧？

人说“多情未必不丈夫”，顾准对妻子（何况还是亡妻）的多情，仅仅一本“新生日记”已经足够说明。在这本日记中他提到妻子，流下泪水的就有多处：

“我唯一（能）诉说我一切的人，只有她一个人！” 69.11.12.

“洗 65 年秀床上揭下来的垫被套一件。这件垫被套上还有血迹加粪迹，大概还是渤海区旧物，二十年未洗过的了。” 69.12.1.

“这些‘家务活动’，过去是写信给秀的资料，现在则‘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句内，梦寐中曾痛哭失声，醒来强自抑制，犹留呜咽……” 同上

“自暴自弃，何以对死者？——秀永离尘世之际，究竟是怨恨我还是对我有所希望，也许我永

远不能知道的了。然而秀实实在在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为，我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70.1.1.

“这次又是发高烧……，第三天发现铁锈痰，确诊为肺炎，是为一生中第三次患肺炎。回忆 1947 年宫乃泉诊治的一次和 1953 年住华东医院的一次，不免感慨。尤其 1953 年秀亲自送我住院，现则未及话别，竟已长逝……” 70.2.5.

“这些事，以前都写信告秀，甚至告已经长眠的秀。我现在无处诉说，默默地办了也就算了。” 70.9.11.

“悼念亡妻，无法自己。64 年前半生经历，处处与秀有关，此生所有一切欢乐场面，都是秀给的。这几天，梦中有时出现这样一二个欢乐镜头，醒来悟秀已离人间……” 70.10.15.

“日子就是这样过下去了。心情宁静，只是昨晚梦见采秀，又哭醒了一次。” 71.1.26.

“芜湖到贵溪的铁路已在修建中。高兴得很，也不免引起悼念亡妻的哀思。偕游秀故乡，登黄山，曾相预期，已成泡影……” 71.4.30.

“幻想消除了……‘孤老头子’的凄凉感愈来愈甚，怀念孩子，怀念死去的采秀。” 71.9.2.

……

顾准的“新生日记”，从第一篇“开始感到秀也许不在了”开始，到最后一篇“怀念死去的采秀”结束，其哀其痛，如闻如见。在息县的日子里，一天他偶得英文版的德国作家特奥多·施笃姆名著《茵梦湖》，他边读边哭，最后竟是无法自己，泪如雨下。爱似执著，却总也充满了大痛。大痛之后能够化却一切的便只有那无边的孤寂，思忆渗透其中，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四十年前那个薄雾弥漫的清晨，十九岁的他和二十岁的秀手牵手登上流亡北平的客轮，黄浦江上汽笛一声，挥手从兹去，一去四十年。如今雾霾未散，笛声未住，如何忽地秀就不见了？

“多年以后当人们再看到莱因哈德的时候，他已是个平静的老人，眼睛却依然澄澈。他依然想着他的伊莉莎白。” 特奥多·施笃姆《茵梦湖》是啊，就像他依然想着他的秀。

汪璧——采秀——秀，这才是顾准最过不去的过去啊。

6. 还是得谈谈“猩红热”与“雅努斯”

无论如何，顾准的“新生日记”都是最被后人难以理解和诟病的文字。人们认为“新生日记”时期的顾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顾准——

“这个顾准，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斗批改’加以充分的肯定……这时的顾准已经失却了免疫力，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红热’……”林贤治《两个顾准》；

“从顾准对于‘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的赞扬之词，肯定之语，讴歌之意，鼓舞之心，与红卫兵，与造反派，与军工宣队使用同样的文革语言，保持同样的宗教感情，不禁怀疑，是《文集》中闪烁智慧火花的那个人吗？……公元前的司马迁和文革中的顾准，其实都是‘雅努斯’！”李国文《顾准的“雅努斯”现象》

所以即使有了“魏连芘”这条线索，还是有必要谈谈关于顾准的“猩红热”和“雅努斯”现象以及“新生日记”是否为一本伪日记的问题。

先从“新生日记”中挑出颇具“猩红热”表征的一段文字：

“元旦决心会

昨晚今晨的辞旧迎新，七连学员游行二次，部分同志连夜草决心书，今晨二排七时集合讨论，八时半开表忠心会，九时去指挥部呈递全连决心书，行列整齐，旗帜和主席绣像飘扬，口号震天，情状热烈，与在北京相同。元旦晨加餐，迟至十时以后才开饭。

元旦社论固然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然而更加强调斗批改，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等在内。70年任务，看来后者较前者更为迫切。由是，对于学部五七干校的任务又有了深一层的理解。看来，上层建筑中的问题，目前重点在于整党建党，文教战线还未提到议程上来。文教战线上的问题早晚要提到议程上来，这时就会出现一次文艺复兴。这个名辞不确切，不仅在于内涵的不同，也在于其出现不见得是一次自天而降的狂飚，而是长时期的和风细雨——不，应该说是整整一个化育万物的东风化雨的季节。” 70.1.1.

以上摘自五七战士顾准1970年元旦日记。人们说“猩红热”、“雅努斯”，无非也就是从这类文字上得出的印象。先看看时代背景：

当年每逢有新的“最高指示”发表或者登载有“最高指示”的重要社论发表，“人民”必须在第一时间做欢欣鼓舞、热烈拥护状，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敲锣打鼓，上街游行，高呼万岁类口号。最新最高指示还常常选取夜间新闻联播时间发表，一般来说当日的新闻就会特别长，配音员就预告“这次节

目大约需要 X 小时 XX 分钟”，最长甚至能达到三、四个小时。这样听完广播差不多就半夜了。夜半游行是常事，回到住处人人连夜“草书决心”很平常，紧接着就开会“表决心、献忠心”，跳忠字舞，折腾到第二天早上也不新鲜。按照五七干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顾准的七连还算不上太“紧张”的，“表、献”都放在第二天才搞，还有元旦加餐，很不错了。

那么顾准真在这样的群体环境中得猩红热了？不妨对他上面这段日记文字略作探究——

首先，他说从元旦社论看出，1970-1980 这个 **Decade**（十年）依然还会是个革命的 **Decade**，革命、整党、上层建筑依然是首要，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都需要让位于革命；其次，他预测一次自天而降的狂飙式的“文艺复兴”，但又怕惹祸上身，忙不迭解释此“复兴”绝非彼“复兴”也，又加上“化育万物、东风化雨”什么的，还一口一个“主席”地叫着，即使你抄查出来又能奈何？

熟读西方史的顾准当然知道“文艺复兴”是什么意思，那是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巨大的变革，至少要冲破令人窒息的一言堂社会空气吧？在同一天日记中他写道，“大破之后，犹有待于大立。70 年代的第一年如此，70 年代的整个十年，在这个方面更是任重道远，波谲云诡”^{70.1.1.}。一个“任重道远”，一个“波谲云诡”，意思已经很清楚了。时至 1970，盼望一次骤然的“文艺复兴”的希望已存在于许多中国人潜意识中。民众精神饥渴，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革命和破坏，有此愿望的又何止顾准一人，只是无人能表达得如此巧妙。

再举一例，是他 1971 年元旦日记，距前一则日记正好一年：

“昨晚所广播元旦社论，又翻了一下去年所元旦社论后的日记，看来今年比去年将是成就更大的一年。社论以五·二〇主席声明为基础，指出大好国际形势，在国内问题分政治、经济、国防三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的行动纲领，是十分振奋人心的。”^{71.1.1.}

看来老顾真是人云亦云，不再特立独行了。其实上述文字要是和他差不多同期的“历史交代”相比还算是好的呢。不信你看下段：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永远不能忘记毛主席海一样深的恩情，今后有生之年，我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不渝。我永远不会忘掉革命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挽救，我诚恳地希望革命同志对我的清算继续给以严肃的批判，严格监督我的一切言行，帮助我及早彻底改造成为新人。”

肉麻？确实。说顾准猩红热、雅努斯，也就不过据此吧。

可是须知，这些语言都是当年的“生存用语（preserver of survival）”，不夸张地说，从高知到文盲，从天安门上的“接班人”到工厂田边的刍蕘之辈，男女老幼人人嫫于此道，个个出口成章，愚昧成为大家恭维的德性，肉，是不麻的，麻的是精神和意志。

顾准“坦白交代”肯定是被迫的“麻”，“新生日记”是否自愿的“麻”呢？

这个夹缠暂且放一放，来对比和这些“猩红热”、“雅努斯”同期产生的顾准文字，这些文字他从不示人，除了六弟陈敏之。

1967-1969年，就在他洋洋洒洒作着“历史坦白”，“罪行交代”的同时，也正是他下大力气剥《自然辩证法》这颗大洋葱的时候。白天，他交代、坦白，毫不费力——“天大地大”、“爹亲娘亲”、“三忠于四无限”……巴拉巴拉，根本不过脑子；晚上回到楼梯间，他吭哧吭哧剥洋葱，艰苦卓绝，酣畅淋漓，乐此不疲。

1969年-1972年，就在他不焦不躁写着“新生日记”的同时，也正是他正式开始从希腊史入手，梳理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的时候。“批评我和吴敬琏拉拉扯扯……”^{71.9.2}则正是两人利用一切机会探讨“希腊城邦制度”话题时被人举报了。和老友林里夫之间就更无顾忌了，顾准常常来找里夫说说不用胡编乱造的真话，不止一次对里夫说出“我笃定要比老头子活得长”^{当事人口述}却可惜没有实现的话。

两两对比，真假立见。

话也只能说到此处了，凡人如顾准，再“雅努斯”也不可能两副面孔都是真的，更何况“雅努斯”本身这个譬喻就有问题——雅努斯(Janus)者，罗马人的门神兼保护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一个在前，看着未来，一个在后，看着历史，两副面孔都是真的和严肃的。假如从这个意义上譬喻顾准，倒还真不失别致和准确。

顾准没有患“猩红热”，也没有一个所谓“雅努斯”的顾准。“新生日记”不是伪日记而是一个完整顾准的组成部分。

7. 端倪可察（上）

说罢“猩红热”和“雅努斯”，回头来看“新生日记”几处顾准不当心露出的庐山真貌，姑且叫它“端倪”吧。“新生日记”正因为这些可察的端倪而显得格外有趣和格外值得深究：

1. “刘毒”

“刘毒”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的简称。“新生日记”两次提到它都涉及十年前那场大饥荒。顾准写下这些文字时肯定不知道几乎就在同时，1969年11月12日凌晨，“刘毒”宿主、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刚刚惨死在和息县、商城同属河南的开封。但是顾准和许多中国人肯定都知道，正是1959年那一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才是他必须得死的真正原因。

“王（军宣队副政委）的报告中谈信阳地区59-60年的刘毒，很直率。他说这里这二年中劳动力的损失很大，有些生产队整个都不复存在，至今还看得见有些水渠环绕的宅基，那就是这些消失了的的生产队的遗址。王还谈到所谓信阳事件和光山事件，可惜事件详情我不知道，王也未详细谈到……来后我和农民有过两次在这方面的接触，一个东岳社员谈到他家死了三人，50%；一是机耕队的铁匠谈话，他说他家七口死了五人，那就是70%了。”^{69.12.1.}

“息县机耕规模之大，自与1959-1960年的刘毒有关，这是中央关怀本地区农民的补偿措施。”^{69.12.11.}

不动声色中，顾准又一次记录了他曾亲历的大饥荒——信阳、息县、光山、50%、70%、水渠环绕的宅基，消失了的的生产队遗址……。但这一次他滴水不漏，只说事，不置评，还把个什么“刘毒”的花花帽子扣在“1959-1960”的尴尬推诿之上——息县机耕规模之所以这么大，竟与“刘毒”有关，却又是“中央关怀农民的补偿”，绕了多大个弯子，捋直了却简单——到底谁该为“1959-1960”负责？

来息县前，顾准原是打算要去一趟商城的。和大多数人都有意无意避开伤心落魄处并努力忘怀它

们不同，顾准差点饿死在商城的经历，除了刻骨铭心，他还要刻意牢牢地记住它，以便日后做深刻的反思。如今到了息县，他本想故地重游的，但在了解到许多息县甚于商城的大饥荒数据后，他决定不去了。在“新生日记”里，他写道：

“这里也发生了我思想上十年来的变化，究竟还是‘同情’农民，赞成资本主义倾向呢？还是彻底革命，事事从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着眼来观察问题？……从前有过再访商城的意愿，到息县来，即使不去商城，这个意愿算是已经达到了。”^{69.12.10.}

是，息县当年情状比商城还要惨烈，许多数据到息县不到两个月他就摸清楚了。千篇一律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开头的忆苦思甜大会，干校是不可少的。农民们忆着忆着就“忆”成了1959、1960年的“苦”，顾准怎么会听而不闻？息县，大饥荒期间死亡率为274.71%^{官方息县县志}，1960年死亡人数107,263^{官方息县县志}，639个村庄死绝^{官方息县县志}。

再看：

2. 两剂“dose”

“……盖备战，为不作城下之盟计，备战亦为建设计，即柳宗元所谓世人但知敌之害而不知敌之利之意也。68年秀永离尘世之际的dose为内敌，69的dose为外敌，内部则改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后者之效力当然十百倍于前者，于是不但派性消除，而建设亦获得前所未有的动力。”^{1970.1.1.}

这段话，只要把“dose”一字弄清楚就都清楚了。

Dose者，一剂（药）也。此处此“药”当然是拿来治国的。去年，这剂“药”还是内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加修正主义分子，其中当然包括顾准、孙冶方之流；今年，这剂“药”就变成了外敌——美帝苏修，后者之效力当然十百倍于前者。专制国家得以保持稳定的秘诀都是一样的——不断制造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让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此“药”一下，于是中国“不但派性消除，而建设亦获得前所未有的动力”，一举数得，皆大欢喜。“时势不同，措施各异，匠心巨手，叹观止矣”^{70.7.17.}

他再一次啧啧称服。

对比1960年1月11日“商城日记”，你就更能体会这个“Dose”的妙用了。彼时顾准正亲历

着中国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人为饥荒，造成这饥荒的恰是“Dose”的滥用——“农民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留恋”和“农村人口的过剩”拖住了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人生易老，一万年太久，那么就“下猛药”吧——组织起来过集体的生活（人民公社），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断肠方、虎狼药、索命汤。

“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虽然从历史来说，这个悲剧是无可避免的，然而他们的救命恩人却全然不懂得这个问题。不，或者说，1953年以前他不懂，以后他逐渐懂得了，并且摸索一些解决办法，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 Peter the Great（彼得大帝）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他应该感谢 1959 的天旱，并且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把坏事变成好事。”^{60.1.11.}

只是彼时他大大方方用中文“药方”，此时他小心翼翼用英文“Dose”。标准的顾式风格。

3. 关于大寨

“经营这个大平原（黄淮平原）农业的经济效果，远胜于山区的治山治水。大寨型的农村是可贵的，然而这块大平原的农产量却是无限的……关键在于大寨是三线农业……”^{70.1.1.}

我顾某不反对大寨，但大寨肯定不是中国农业的方向。中国农业的希望在于发展高产区域农业集约化产业。如此，再加上大量土方工程机械和大量的化肥，前途未可限量，一个“千里淮上”就抵得上世界任何一个著名谷仓。几年前他就深度阅读过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边疆》一书并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对中国历史的形成中农业的重要性做过深入的研究——精耕、灌溉、专注的劳动力、土地制度等等都是他关注的要点。波兰哥穆尔卡的倒台不就倒台在农业问题上吗？“哥穆尔卡的小农经济主义，既不能使波兰农业在社会主义集体大农业中找到出路，又不能使波兰农业通过自由竞争达到大农业来找到出路……竟然在农业——粮价问题上找不到出路而崩溃下来”^{70.1.2.}。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4. 臧否浮夸

“57 年以来，我目睹过居绿化，机关农场，大韩继建房，皆旋兴旋废，东岳干校其第四次矣……艰苦创业，改地换天，报上见过很多，我得以目睹者，再三搜索，仅得 69 年去摘葡萄的京郊某农场。

——先为劳改农场，此时已改为公安部干校。至于下乡数次，所知农村情况，则 58 年起迄于今日，除 59-62 年剧变后又恢复而外，首尾相比，变化实在不大。以 57 -70 年两个粮产数字相比，平均每人得粮均为 600 斤，实际上也无所增加。”^{71.4.1.}

“看农村贫困二十年来并无根本变化，而瞻望未来，则全国都发生大寨式的变化，前途尤多困难。”^{71.4.4.}

你们吹的牛老子根本不信，好不好少吹点牛多做点实事，至少不折腾了好不好？你紫禁城里金銮殿上，兴头上一句话旋“兴”了，轻巧巧一句话旋“废”了，知道老百姓有多苦，有多难，有多少人要死在这“旋兴旋废”上吗？

5.对一贯权术的鄙薄

顾准对政治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对造成这些变化的来龙去脉他总要弄清楚才能善罢甘休。1971 年 7 月，尼克松访华。小小乒乓球推动了大大地球，大出所料，直到《公报》发表，他才相信是真的。这一次他很平静——“公报是戏剧性的。中美关系则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发展”^{71.7.17.}，他判断“对峙还要继续下去，而实力地位又是谈判的本钱。局势不可能有戏剧性的发展，原因在于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使事态有戏剧性的发展，但是长期看来，局势确实是戏剧性的……”^{同上。}

一连用了五次“戏剧性的”，本身就比较戏剧性。中美关系之“戏剧性”大概只有这两样：“意识形态”和“经济地位”。眼下的中国“经济地位”完全无法和美国抗衡，连“革命”都失了序，经济如何上得去？国穷民穷，“手里没把米，叫鸡鸡不理”^{70.6.11.}，“世界革命的领袖”、“意识形态的主导”可不就是戏剧性的笑话！要想确立新的国际关系，“需要革命的秩序，需要反题以后的合题，需要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同上}，否则中国只会一步步倒退，重回弱国寡民、落后挨打的惨境。尼克松的访华促进了极峰对这一点的认识，他想要勒住革命的马头，转向经济和生产的方向。但是重新盖上潘多拉的盒子谈何容易，不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且颜面大失。于是有了去年的“斗批改”变成今年的“弄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思想革命化”变成今年的“清查五一六”。这种手法，顾准 1948 年就见识过一次了——“这是 48 年的晋绥讲话精神”^{同上。}

顾准多次提到 1948 年毛泽东先生的晋绥讲话，有一次还上溯到遵义会议和七大（见日记

71.1.26.), 类比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具备了完整形态的过程 (虽然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 “不能做冒然类比”), 其中的隐喻大可深究。

历史的先声——晋绥讲话, 无疑是一个哲学上 “复合判断” 的上佳例子——打到蒋介石夺得政权是总路线, 具体路线还得喊蒋委员长万岁; 有时候要抗一下日, 但又不要过分刺激日本; 抗日的时候要讲民主团结开明士绅和富农, 日本人投降就分土地打倒地主和富农, 这样才能动员穷人当兵……。反正每个阶段具体路线和政策都不一样, 怎么说都有理。虽然一般干部都会糊涂, 但是只要记住总路线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一条, 一切就好理解也就好把握啦。谁说中国人就没有称王称帝、穷兵黩武的基因? 真是笑话!

“晋绥 1948” 放在 “中国 1971” 又有啥新意思?

这年忽然全体 “人民” 不分文化高低都被要求 “认真看书学习, 弄通读马克思义”^{极峰语录}, 被要求 “熟读” 六本诘屈聱牙, 深奥无比的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以及《唯物主义和经济批判主义》。原因嘛, 巴拉巴拉, 也没几个人听得懂。顾准立即响应号召, 认真阅读, 不, 是重读了钦定的六本 “正书”。

“万事都有关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要全体国民读六本马恩列加上两本赫胥黎, 其中必有原因——

“去年国庆口号, 还是继续斗批改, 虽已提出学习主席哲学著作, 着重点还在 ‘思想革命化’, ‘弄通马列主义’ 的口号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明港的几个月, 学习上的口号是 ‘认真看书学习, 弄通马列主义, 学会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具体要求实在是 (甲) 进行政策教育; (乙) 号召全面看问题, 以历史事件为比喻……”^{71.7.17},

六本书甫一读完, 他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一定 “党天下” 又有了类似 1957 年 “轮流坐庄” 叫嚣的幻听。事过都快十五年了, 这幻听还是无法消失, 犹如哈姆雷特眼前的影影绰绰, 麦克白夫人耳边的切切嘈嘈。越是万马齐喑的绝对静寂, 幻听就会越强烈, 这在生理学上也是个常识, 和 “绝对的光明如同绝对的黑暗。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 相反, 在绝对的静寂中, 幻听甚至会比真实的声音还要

喧嚣，更何况前不久温都尔汗的那一场爆炸，几乎把全中国人的耳朵都震得一时失聪。

他不得不读更多的杂书，去探究这幻听的来源。

干校后期，顾准不知动用了什么渠道挣得了光明正大读“杂”书的权力，竟有本事把钦定之外的各种“封资修”带进干校来。军宣队也对他睁只眼闭只眼，除了他身上那股强大的气场令人发憊，也不排除他们也对他暗生敬佩。军宣队员也是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就看调度得出调度不出了。

他看《诸子集成》和二十卷的《韩非子》，将那些“韩式之术”细细读来。读罢合上书，他顺手就无情地剥了“韩非”这颗土洋葱，写出《评韩非》的犀利小文，三言两语，将专制的“御下之术”、“利害之术”、“权谋之术”、“术势之说”、“君主中心说”剥了个光秃秃、赤条条，干把字的“小大卫”操起抛石器就向二十卷的“歌利亚”投去。人道、人性、人权、民主——他哲学上的上帝就站在他的身后，“小大卫”底气十足：

“第一，他根本没有考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第二，（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导致了‘尔虞我诈’……。我十分厌恶这点。” 文稿 P425

此时正值全中国“人民”都在懵懵懂懂、迷迷瞪瞪地跟着伟大领袖“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之际，被尊为“大法家”的韩非在非人民的顾准笔下却成了只落水狗，令人厌恶和不屑。他也读韩非的老师——《荀子》。在驳斥一位中国史学家“是荀况发现了‘人’”的观点时，他又发飙了：

“荀况、韩非并没有发现芸芸众生的‘人’，他们发现的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予一人’。荀况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个人就是统治芸芸众生的‘予一人’，这‘一个人’，是‘贵独道之容’的明君，天道是体现在他身上的。” 文稿 P167

“予一人”是顾准从骨子里厌恶透顶的东西。心灵深处的那簇蓝焰曾赋予他这样一个审视角度：一位乞丐和一位皇帝在“人”的意义上是一样的，追索“家雀”和“海燕”在人的基本权力意义上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对人的发现”**。你发现个“予一人”有意义吗？中国几千年，直到今天不都是“予一人”吗？还用得着“发现”吗？

“这是 48 年的晋绥讲话精神，但是具体办法有所不同——以清查五一六代替“纠偏”。时势不

同，措施各异，匠心巨手，叹观止矣。”^{71.7.17.}

48年的晋绥讲话，71年的清查五·一六，顾准刻薄的形容——“时势不同，措施各异，匠心巨手，叹观止矣”就是这种复合判断的上佳注脚。

1971年7月17日这一天他的日记很长，最后以赫胥黎的话“‘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何懂焉’以之对付过去，以之对付未来”^{同上}结束。

“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出处如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怀的，还是追求真理”^{同上}何来“新生”，不还是“老一套”吗？再看他日后写给弟弟陈敏之的信：

“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假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们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文稿 P390}

“新生”？天知道。

8. “端倪”可察（下）

接着来看“新生日记”中可察的“端倪”：

6. 继续关注粮价

中国的粮价问题一直是顾准最萦绕于心的一个经济学大问题。在亲历了“粮食问题”的残酷性和恐怖性，体验了餬口经济学下的“白薯共产主义”后，他更放不下它了。五年前他的《粮价问题初探》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铁墙前面碰得灰飞烟灭，但他并未放弃——迟早国家在粮食和粮价上还要出现问题，这在西方已经屡见不鲜，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不会例外。

“新生日记”中谈到粮价问题竟然有十四处。

“粮价问题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唯有一个富裕的农村才能提供最大可能的积累……与粮价问题相联系的是房价问题……”^{70.1.1.}

“昨天运麻淋雨，晚上喝了几口酒，早早上床，不能成寐。酒力促进狂想，对粮价外贸与发展有了一定新的想法”^{日记 70.9.22.}

“Gomorka(哥穆尔卡)倒台在粮价问题上，提高粮价而不调整工资，要想出这个法子来，真需要特殊的愚蠢” 71.1.2.

.....

“新生”了的顾准，“乌菟”情结依旧。由粮价问题他又引申出两种国家现代化的途径：

“粮价问题其实有一个前提，即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现代化，究竟遵循孤立主义的和平经济途径呢？还是遵循战时经济的途径。历史上这个问题曾经有二个典型，很值得检讨一番。” 70.1.2.并据此作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道路的对比——一个是全面的现代化，尤其在改善国民生活质量方面；一个仅仅是军事现代化，国民生活无改善甚至退化。他严重倾向于前者。这就有了下一个“端倪”：

7. 美苏经济结构和国家现代化途径对比

“19 世纪末期的美国经济遵循的是和平主义、孤立主义的道路。他们先发展农业，在人力稀缺的基础上，以最高度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吸引人力，直到 1940 年的第二次大战为止，他们在政治上一直是孤立主义的。其实，到第一次大战结束时的 1917 年为止，美国在经济上已成世界首位，然而在政治上他们甘愿居于配角地位，仍让大英帝国处于世界政治的支配地位，‘引而不发’，至第二次大战以后遂成为世界霸主。这样做，美国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畸形与病态。他们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这当然是不可不注意的事情。但在生产结构上说，而不是在分配结构上说，这一点可以姑置不论。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苏联建设，是在和平时按战时经济模型进行的建设。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苏联长期来成为国际军火商，农业停滞，消费品生产永远落后于购买力的增长。这种经济上的畸形，延续五十年之后，简直成了苏联经济之癌，积重难返，任何药方投下去，总要被政治因素所抵销——到现在，苏联海军已经游弋全球，征服太空的活动咄咄逼人，然而西红柿黄瓜面包的问题却迄无解决之望。所谓经济改革，一碰到预算战争的压力，有预期效率不得不全成泡影……” 70.1.2.

从美苏两个大国身上，他看到了经验和教训——一味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不啻竭泽而渔，“hence（从今往后），无限的就业扩大，hence，把中国建成一个最大的工业国。竭泽而渔，苏联可为借鉴” 70.1.1.，这条路中国走不得！波兰紧跟苏联，却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就是教训。中国应该学习美国，首先发展农业，发展孤立主义的和平经济，而不是搞什么“深挖洞，广积粮”，说是“不称霸”，实际上老想着要做世界“意识形态”领袖。这还是战时经济的思想，还是一味追求军事

现代化的偏执。

关于这个“孤立主义的和平经济与战时经济”的问题，“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理论总落后于现实”^{70.1.2.}

从1957年接触Lange(奥斯卡·兰格)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起，顾准就对这个问题做过慎密的思考，曾“触电般”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重大。它牵扯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牵扯到 **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 究竟是应该受到重视还是可有可无的雕虫小技。

“Lange (兰格) 不过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没有展开和解决这个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来。这样做的结果，宏观经济就始终居于微观经济的首位，**marginal utility** (边际效用) 成为雕虫小技 (虽然是有用的)，政治就居于经济的首位了……”^{70.1.2.}

顾准十分重视“边际效用”概念，当年曾向年轻人用极简单的“老农妇捡麦穗”故事来阐释它：提倡的节俭精神是好的，但如果一位老农妇一天能捡回一斤麦子而她一天的消耗也是一斤麦子，这就到了一个边界，就需要计算这种经济行为值不值得。这需要用导数和微分的方法精确计算，而不是一件一拍脑门子喊出条“颗粒还家”口号那么简单的事情。没有经济学，不讲经济规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餬口经济、白薯共产主义只能导致国强民穷，进而国也不强民也不富。

熟读亚当·斯密“世界主义价值理论”、李斯特“国家主义生产力论”、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论”、凯恩斯“自命为世界主义实质是国家主义的重商论”的顾准，何尝不希望能去做这个专题的研究？如今却只能在日记中过过干瘾。

顾准在息县，可真是实实在在履行了一句彼时的流行语(也是口号)——“身在XX，放眼世界”，例如他身在干校，那就是“身在东岳，放眼世界”。不过可不像一般人那样，口号喊完了却不知所云，很快忘个精光，他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

8. “一个人的探索” 必是要进行到底

“我决心在五七干校一面劳动，一面继续观察思考和研究。北京藏书，大体上已经利用过：通过这些书籍，我眼界开阔到上下古今，今后有赖于这些书籍的，不过是引证史实，引证百家，不致有文词上的错误而已，大体上 *their meaning had been caught already* (已经掌握了它们)，即使这些书全部丧失，我也写得出东西来了。手稿，比之要写的东西，幼稚肤浅，可以采用者少。卡片

不外抄摘与感想，有，当然好，丧失了，丧失书籍手稿结果一样。一个人，用全生命写出来的东西，并非无聊文人的无病呻吟，那应该是铭刻在脑袋中，溶化在血液里的东西。我所要写的，没有书籍、卡片也可以写，丧失它们，又何所惧。”^{70.1.1.}

1970年元旦这天的日记他写得特别长，可以肯定是后补的，也不是一天写就的。

“铭刻在脑海里，融化在血液中”也是那时的一句流行语，所指主体是别人的东西——XXX思想。顾准要铭刻和融化的却是他自己用全部生命，或者用他自己的话——“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文稿 P388}写出来的东西。明知今后将会有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处于没有精神食粮的困境中，但“一个人的探索”不可中断，“已经掌握的东西”不可丢。北京二里沟的旧居里有他大量的图书、读书卡片、文稿，有他的“稿库”，是有朝一日撰写《中西方哲学思想史》的资料宝藏，这个宏愿一直是他生命的动力。眼下组织上要收回房子，他必须做好把所有宝藏都转移到大脑里的精神准备——一定要留住记忆，背也要背下它们来，不能手写我就打腹稿好了。

无独有偶，此刻他的老友孙冶方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国人皆知的北京秦城监狱，孙冶方被囚禁在一个四周都是防自杀墙的单人牢房里。屋顶的电灯24小时不灭，皮带，剃须刀，钢笔，鞋带甚至铅皮的牙膏……凡是想象中能令你自杀的东西，统统都被狱卒没收了，更不用想铅笔钢笔纸张能给你用。这是个能逼人发疯、让人想死的地方。可老孙有他活下来的动力，那就是立志要写一部《社会主义经济学论》。他用打腹稿的方式撰就了数十万字，每天默诵，修改，补充，到他出狱为止全书已经复诵了几十遍。

所以才有后来顾准幽幽地埋怨孙冶方那些杞人忧天的学生——

“怕你们老师会自杀？有思想的人是不会自杀的。老孙是个有思想的人，你们太不了解他。”原来他自己早就深有体会啊。

“今天没有任务，晨起较晚，上午苦苦思索了萦绕多年的历史观问题，写了几张乱七八糟的卡片。看起来，如果我还有若干年的余生生活可过的话，这个问题总是压迫着我要把它整理一番的。”^{71.1.28.}

你看他是要“罢手”，要“新生”的样子吗？

9. 读《天演论》记

要说“新生日记”里最大的“端倪”，肯定非“读《天演论》”一篇莫属了。这是他1971年6月10日的日记，也是被许多后人看出绝无一丝“猩红热”的篇章：

“初见是书，似受电触。曾读李锐书，知昌济先生曾以欲得大树擎天，与夫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教人，亦知主席少时，极重立志，《天演论》要旨为以人力胜天，今见是书新版，度必有原因，极想一读。前日今天，粗读一过，颇多感触。

读后所得，约之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一语。赫氏此书，虽以达尔文物竞天择之义开其端，又以人力治园，与天竞胜之例演其义，其间评述诸教祖与哲学名家之人生哲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说，可以破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非仅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柢悉在此。

此义极精，可与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又可与《实践论》中思想改造——共产主义之论相比较。”

71.6.10.

此书是那一年作为文革后对西方经典政治，哲学，文艺作品开禁后引进的第一批书籍，书名未用严复的《天演论》而是叫做《进化与伦理》（白话，译者不详），与赫氏另一本《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白话，译者不详）以及严复译的《天演论》旧译同时内部发行，扉页上还有极笔语录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许多中国人都是由此书才知道“物竞天择”的达尔文进化论的。

顾准在这里将伟大领袖好听点叫“激情万丈”，难听点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定胜天”说，释为“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非仅人事，特为自然”，并斥为：“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柢悉在此”。说到此处他还嫌不过瘾，又接着大加嘲讽：“此义极精，可与否定之否定相比较。又可与《实践论》中思想改造——共产主义论相比较。”

这篇日记，如果按照当时的“政治敌情”标准衡量，本应属于“最本质上的反动”——宇宙观、世界观的反动，混杂在被某位后人评论为“热烈讴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充分肯定斗批改”的“新生日记”中，当年竟如漏网之鱼，侥幸没有被查出和销毁，成为今天洞察顾准人生观，价值观的最好入口。

.....

“新生日记”中这样的“端倪”还能举出不少。

美国近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利奥·斯特劳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一文中提出了“高贵的谎言”——一本意与寓意说。斯特劳认为伟大的思想往往只能用神秘晦涩的文笔写出来，它给读者提供的有两重意义上的教化——“作为前景的教化特征的大众教学”和“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关于最重要话题的哲学教学”。斯特劳相信大哲学家都用这种方式写作，因为“自由的探索，探索的所有结果的公之于众”是不可以保证的。

顾准“一个人的探索”可不恰恰是这样的自由的、其结果很难公之于众的探索吗？

今天，与其评论顾准的“猩红热”、“雅努斯”现象，还不如深究顾准的后半生不幸“躬逢”其中的、人人都只能在假面下存活、“公开说谎，已成风气”^{59.12.22}的、被西方学者挑衅地质问“你们到底有没有稍微像点样子的人物”的1960-1970十年历史。这个历史的小断层，小切片，纵古今、横中外都属不可多得，不珍惜它实在是罪过。

更何况，你今天不让说，明天不让说，后天、大后天还能不让说吗？明年、后年.....也就真“上”不了“书”了，还真就能“抹”干净了吗？人啊，别再愚蠢下去了。

第四部 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

1972-1974

正在被形成的精神，是次第抛弃旧世界的建筑底一部分，同时为了新的形态而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在这些动摇上面，只能看到单一的征候，即轻浮的心思，生活中扩大着的倦怠，不知怎的不安的预感等等，这就是等候某种新的东西底诞生之征候。全体相貌不至于变化的渐进的发展，因她开头而被破坏时，她是像电光一般突然间确立新世界底形象。

- 顾准 1956.10.5.日记中摘录的黑格尔语言

不信神的人，不是推翻人群的神的人，而是附和人群关于神的见解的人。

- 顾准翻译的伊壁鸠鲁名句

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 《圣经 新约 约翰福音 12 : 24》

第十八章 生命如醴

1. 那本书

1972年7月，周恩来先生一句“让学部回来吧”，几千号男女老少又蜂拥般回到了北京。“五七干校”无疾而终。“终”的理由说起来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也就一个原因，无非又一个“宏图变权宜，权宜变鸡肋，鸡肋变废物”，旋兴旋废的即兴之作，低级政治——餬口政治的产物，和大跃进下场相似，寿命相当。

苦只苦了男女老少人民，特别是学部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既不会建屋又不会搭棚的人民。

原来的居处都作了别用，大部分给了新居民，有的做了仓库，有的拆除了，和电影《日瓦戈医生》中医生从一战前线回到自己从前莫斯科家中的情形一模一样。没有了住房的人们集中在历史所的小礼堂里，六七家人住在舞台上，拉上几根绳子，挂上床单、衣服就算是分成一个个家庭了。

老单身汉顾准和那些小单身汉们就睡在台下的水泥地上。没有人抱怨，能回北京，他们心满意足。特别是老顾准，又能天天去北京图书馆借书了，夫复何求啊。

立刻买了一张月票，他开始一天一趟的北图之行，早晨从建国门外的学部到故宫后面的文津街，晚上从文津街回建国门。后来他感觉身体好了些，索性连每月四元的月票钱也省了，天天来

回徒步十多公里借书还书，读书摘书。

如今他每月的生活费已经减到了无可再减的二十五元，四元的月票钱对他非同小可。徒步时能思考，还能给儿女们攒下一笔小小的积蓄，一举两得，值！他想孩子们想得要命，总是梦想着有一天会有哪怕一个孩子能来看看他，能让他把这笔小小的积蓄放进他或她的手里。

即生于这个时代，就享受它吧，好好享受，无论它有多么粗粝，多么不尽人意，但它是属于你的，你可以走在它的中间，也可以走在它的前边或者后边，或者穿梭于它，慢慢走，欣赏啊。如今他已站在生命的高处，不胜美也不胜寒，却依然保持着人最初的品质——纯真和热情，依然在瞭望，在寻觅，就像他最欣赏的北欧航海家们镌刻在门楣族徽上的格言“航海是必要的，生命在其次”。

“马克思嘲笑黑格尔的必然向自由的飞跃。这种飞跃诚然是可以嘲笑的，因为只要变一下思辨的魔术——其实是服从当时的秩序，人就算自由了。这样，黑格尔的法，无非是服从现存秩序的芸芸众生的‘意志的表现’，而这些芸芸众生的意志自由，简直是先验地规定了的。

马克思需求一个物质生活上社会关系上得以全面发展的个人才能的那种自由。他甚至把劳动时间规定为必然，把自由看做处在必然这个界限的彼岸（记不清，见资本论摘录）。然而这究竟已否把人类生活穷尽了呢？” 笔记 369

当然不可能！黑格尔不可能，马克思不可能，谁都不可能！哪一个人说自己的理论已把人类生活穷尽了，就是十足的颟顸、愚昧。顾准最痛心疾首的，就是人类在寻找这“道理”时，不时就轻易宣称“我已到达彼岸”或者“我已找到通往彼岸之路”，像某只类人猿爬上了一棵高些的树就自以为到了天堂。

“此岸世界——彼岸世界”文稿²⁶³，他好像总是不大敢去碰这个题目。马克思二十五岁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似乎有点把他吓住了：

“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比起西方此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因为创立了“阶级斗争”和“专政”概念而“一

下子跃上世界舞台的最高处，把世界历史当做自己考察的对象和时间的园地”^{笔记 364}所作的极其尖锐的揭露和批判，顾准有点绕道而行。他似乎在寻觅一个“元点”，只有找到了，他才能心安理得地往前走，往更高、更险处攀登，否则就只好停下来或者干脆打道回府。

直到生命的最后十多年，他才逐渐确信自己已不再缺少这个“元点”。

他的生命跨度一共才五十九年，十多年时间也不算太短。更何况他从小就熟悉它，只是“前我失丧，今又寻回”罢了，比起从未亲近过它的人，顾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极为明显。还在干校，他就又一次拿起了那本书。是，又是那一本。这一次拿它起来，顾准就再也没有放下，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从小姑私塾岁月第一次捧起它，多久了？五十多年了？有这么久了吗？那时他差不多认识这本书上所有的字，可是并不能理解。小姑和小姑夫握着他的手，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讲给他听——创世纪，诺亚方舟，约拿和鲸鱼，大卫与歌利亚，但以理和狮子，马槽里的婴孩，十字架上的祂，复活与永生……。后来当他能阅读这本书的英文版时，许多词汇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小小的心灵上了——“公义”、“爱”、“怜恤”、“饶恕”、“启示”、“契约”……任是再狂暴的风雨冲刷，再粗粝的时间磨削，这些金子铸就的字也没有消失。

这书就是两千年未改动过一个字的，许许多多人的生命航图——《圣经》。

这书，青年时光的顾准也曾多年不再翻开。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革命，辩证法，共产主义……五彩争胜，流漫陆离，在应接不暇中年轻的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它。1952年，在上海愚园路的顾宅官邸，在苦恼不堪中迟疑着再次翻开它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当那些熟悉的字眼，熟悉的人物从书中站起来面对他，安慰他时，他却有些羞赧，有些不安，却也并没有阻塞他和他们久别重逢后那份温柔、喜悦之情的流溢。

在北京，他没有中断阅读它。当他发现北京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本更全的版本，最好是中英文版本时，立即写信向六弟敏之求助。毕竟上海是中国基督教的大本营，虽然从1949年起已经被扫荡了将近七年，连孩子都知道“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尤其是基督教，还有一层“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的外衣，更是在扫荡之列，《圣经》也被列为反动书籍而绝迹，但好歹，上海还有徐家汇教堂被保存着，还允许老基督徒们在严格的监控下礼拜。他知道有教堂，有教会，有基督徒的地方就会有《圣经》。至于怎么弄到手，这难不倒老六。

好兄弟敏之，对五哥除了兄弟手足之情外，还有点下意识的崇拜——“五哥做的事总是对的”。他连问也不要问五哥这会子要它作甚，只是千方百计地去找，也不顾自己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身份，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熟识的基督徒，总算是弄到手了一本，忙不迭给五哥寄了去。

1961年，在京郊清河农场劳改的顾准回北京休假，在东安市场旧书摊淘到一本罕见的中英文版《新约》，出自著名的“中国圣经屋（CHINA BIBLE HOUSE）”。

这是一个专门印刷和发行基督教《圣经》的机构，从同治十五年(1876年)就开始在中国印刷和发行《圣经》。这一本《圣经·新约》出版于1947年，里面有很多红色、蓝色和黑色铅笔的下划线。例如“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盗窃，不可做假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圣经 马太福音 19：18》、“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圣经 马太福音 26:22》、等处。但因为是旧书，无法判断是原来的主人还是新主人顾准所划，不过扉页上顾准写下的竖排字“顾准 一九六一·二·二四 北京”至今还是清清楚楚的。

后来他到周口店和大韩继劳改，都带去了这本书。

1966年9月1日他被大韩继的红卫兵差点打死，回到居住的草棚，来不及洗去头上、身上、手上的血迹就慌乱地收拾他的书、稿、摘记卡片——学部怕他们这些大右派在乡下被打死，急令他们返京。这本书上至今清晰可见大片血痕，很可能就是那时留下的。

后来他把它带去了息县干校。先是在油灯、汽灯下读，1970年底息县东岳开天辟地第一次通了电，在五七干校大车店通铺式的宿舍里，他就在明亮的灯光下坦坦荡荡地读，读中文的，也读英文的。当某位军宣队参谋斥责他“你怎么可以看这种东西”时，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本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幽幽反问道“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对方哪里知道这个，张口结舌。

“这是个有名的《圣经》故事呢。你不读《圣经》哪里知道列宁在说些什么，小伙子？”羞愧难当的“小伙子”从此怕了他，看到他在读书就绕着走，生怕再触霉头丢脸。

如今回到北京，在几十人合住的小礼堂里，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依然读得津津有味，旁若无人。他毫无愧怍和频繁地阅读这本书，弄得身边的年轻人起了好奇心，从好奇到伸手向他借阅。不料天性大方的他此时小气得要命，像个吝啬鬼老太婆不得已把看家的宝贝出借给别人似的——

“我跟他借过一回《圣经》，他答应只许借阅两个星期。他宝贝自己的书也无可非议，结果还没有到应该归还的日期，他就一再催还，我一气之下，不到十天就完璧归赵了事。” 楼肇明《面影和命运 顾准

先生二三事》

当年气得咻咻的年轻人眼下已经年近八旬，讲起此事还是哭笑不得。

要说呢，顾准小气得确实有些不像话，当时他已经攒了好几个不同版本的《圣经》，新约、旧约，新旧约全本、中文、英文俱全，就算是送人家一本也是应该的嘛。退一万步讲，上帝也不喜欢小气的人哩。不过且听当年的年轻人把话说完——

“较之借《圣经》所引起的不愉快，乃至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向他请教某些疑难就要愉快得多。他堪称是一位和盘托出，绝不藏着掖着的良师和诤友。” 同上

这就是顾准啊。这个名字确实无法和“伟大”一词相连，他有“人”的一切特质和色彩，和你我相比，他只是“不凡”而已。再举个例子：

顾准老友骆耕漠先生在晚年回忆顾准时告诉采访者，1972年5月经济所的人从息县干校回到北京后，很多人都失去了住房，只好到亲戚家借住，耕漠自己一家就是借住在弟弟家。顾准和江明（高岗外甥）这样的人因为要便于监控而不能住到学部外面去，军宣队就给了他俩一个小屋以便于监管。耕漠先生晚年回忆“顾准住在里面一间，整天就是看书，当时正认真看《圣经》，（骆老说到这里紧接着补充了一句）——**“当然是作为学者在研究”** 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老先生好像在为已经故去多年老友开脱什么。

即使最理解顾准的六弟陈敏之，多年后历经磨难终于得以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实现了“一字不改”

地出版五哥文集的宏愿时，也把五哥在最后的日子里写给他的、被编辑冠以《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名的那封信删掉了十分有意思的一段——

“2. 关于基督教，你现在发生了兴趣，你来的时候，我可以提供你一点资料。有一份万把字的翻译稿（就是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中“罗马法与教父们”一节 - 作者注），这是我近来读书时为求理解译出的，读后可以讨论讨论。还可以介绍两本书目，你设法去借。此外，你最好找一本圣经，若你实在找不到，我可以帮你弄到一本《新约》。这些，来时再说吧。” 文稿 304

须知那已经是 1994 年，顾准死去已二十年，中国开放也已经十五年了，说到基督教，说到《圣经》，人们还是噤若寒蝉，包括陈敏之在内。这一段当然可以确认当年是敏之自己要求删去的，直到 2002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套四卷的《顾准文存》才重新加了上去。

是的，这本书别说在顾准的时代，陈敏之的时代，即使今天不是还是有许多人无法坦坦荡荡地亲近它、读它和与人论及吗？顾准却是不需要开脱的，他当然是“作为学者在研究”，但更高精神层次的东西他是不愿、不能、也无法与他人沟通的，他不在意、也不需要老友善意的开脱。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白驹过隙般的二十年多年过去了。这一次轮到哥哥反过来要给弟弟找《圣经》了。六弟到今天才对基督教发生了兴趣，比五哥晚了许多年，他自小没有被送进过庆志姑妈的“小姑私塾”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至此，顾准已经阅读了那么多的文献、名著、书籍、文稿，热门的，冷僻的，人们阅读过的，人们没有机会和条件阅读的，人们趋之若鹜去阅读的，人们不屑于去阅读的……他都阅读了，深钻，至少也是涉猎了，为什么今天突然将这本早已熟读，很多章节都能倒背如流的书最后一次拿起来，且从此再也没有合上收起，束之高阁呢？

这一点都不稀奇。

从年近“不惑”重新翻开，到接近“耳顺”拿起后不再放下，顾准的这一举动，除了在中国，算不上什么特殊之举。多少西方的科学奇才，其中就包括被他倍加欣赏，不断引述的牛顿、达芬奇，培根、汤因比、甚至“被造论”的对立面——“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写出名著《常识》的极端自然神论者托马斯·潘恩……这些世界上百年都难出一个的奇才，当他们的肉体生命行将终结时会不约

而同地在“神圣的必然”面前，在“第一推动力”面前，在“有意义的永生”面前，在“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面前，在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被造（**Created**）”的、即被赐予的反思和良知能力面前俯伏了下来。

顾准特别喜爱的列夫·托尔斯泰，曾专门为文化水平很低的俄罗斯农民写下了一本《托尔斯泰福音书摘要》，连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他的老师伯兰特·罗素也是顾准十分熟悉的哲学家，其观点常常被他引用。罗素后来称他的这位学生“无疑是自己的先生”）也被它迷住了，成了他的护身符，无论去哪都带着，反复地读，整段整段地记熟了。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最大的分歧就在对待宗教，当他在杂志上看到罗素写的无神论、反基督的文章时，学生拿着杂志当面对老师说：“您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维特根斯坦传》。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使罗素深深不安，“他觉得我背叛了对严格性的信仰……我非常在意，因为我部分同意他。”^{同上}

顾准不过和这些人相似罢了。

接近死亡的历程把光带进了他们的生命，不可逆转地凸显了他们生活的“某种宗教体验”。你看直到今天，出了几十位诺贝尔获奖者的英国剑桥大学凯文迪什实验室朴素简陋的门楣上，不是还镌刻着这样的字样：

“The works of the Lord are great, sought out of all them that have leasure therein
(上帝创造了万物，去发现那里所有的乐趣吧)”

科学和上帝不但不对立，在这些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的眼里这简直是天经地义。就算退一万步说，他们也绝不可以没有一个“哲学上的上帝”，没有一个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元点”。

愈来愈接近死亡的顾准离这个“元点”也愈来愈近了，他也只是要和他们一起去“发现那里所有的乐趣”，享受生命中最后和最美的馨香。

2. 即生于这个时代，就享受它

罗曼·罗兰说，“最终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

活。”有些人用一生诠释了这种英雄主义，顾准就是其中之一。

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家 M·博斯先生曾说：“在基本的焦虑中，人类对于生存，即‘在世’是既害怕又焦虑的。只有当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想象下述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现象：害怕生活的人也特别畏惧死亡。”那么热爱生活的人情况有可能相反吗？答案是肯定的，顾准就是其中最好的实例。

命运对他十分残酷而不公，噩梦连连无尽期，生命又是那么脆弱和短促，令他最终无法实现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宏愿。但他从不抱怨，和芸芸众生“既害怕死亡，又厌倦生活”的状态截然相反，顾准既热爱生命也不惧死亡。

直至临终，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热忱都没有一丝减弱，对死亡则坦然接受，从他遗书起头的第一句话：“我热爱生活，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和致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我）也算勘破一关了”，一览无余。我的传主以英雄的气概直面、度过并享受了他所生于斯、长于斯和死于斯的时代，心灵因为所遭受的不幸而变得更加热情并在不幸中得到了洁净。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顾准对承受苦难已经有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惟其因为他既不是苦行僧又不是受虐狂而是一位翩翩真绅士，堂吉诃德般伶仃瘦长的文弱书生顾准才堪比二千年前身陷古罗马斗兽场，伟岸挺拔的色雷斯贵族斯巴达克斯——同样深重的苦难，同样高贵的尊严，只是斯巴达克斯面对的是饥饿到要立刻吃人的野兽，顾准面对的是蒙昧到不可理喻的要吃人的人。

这样的人格真可谓魅力十足，也是愈来愈多的人不约而同地由敬生爱，希望能出一份力量来保护和帮助他的原因。这群人除了他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之外无一亲人，都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经济所的同事们。有年过花甲，自己还带着右派帽子的老经济学者，也有被他嘲讽，挖苦甚至批判过，如今却和他达到了一种心灵契合的老上司，老学人，更多的是曾经批判过他如今却对他崇敬有加的年轻学子，加上当年商城铁佛寺劳改队的一千年轻右派。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年轻未嫁的知识女性向他这又老又穷，鳏、病、右俱全的孤老头子袒露心扉，希望能嫁给他，照顾他，与他终老。好心的人们都劝他接纳这位姑娘。可有谁能取代他的秀

呢？这“过不去的过去”只有到了那一天，他“过去”的那一天才有可能过得去呀。更何况还有那五个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仔仔，他随时都梦想着他们回到自己身边，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什么苦，什么委屈，什么孤独都咽得下去。老伙计们，不要再劝我了，我和我的秀是怎么过来的，你们都知道；年轻人，不要再劝我了，你们还不大懂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岁数，这种地步，就明白，就懂了。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顾准临终前两年的生活有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他们之间的故事是需要另写一本书才说得清楚的。多少年像孤狼一样生活着的顾准在最后的岁月里不再寂寞，直到离世，都有浓浓的人间真情和时代所能够给予的最大友善拥绕着他。这绝不是每个人都能尝到的生命甘甜。

相对十多年来的监管-劳改-挨饿-批判-斗争-殴打-交代-坦白-监管……无休止的循环，将近三年的息县干校生活和回到经济所两年多一点的北京生活，那个模子一样的东西至少在精神上对顾准逼迫较轻。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军心涣散，军宣队对干校的管理越来越松懈，顾准身边慢慢聚集起一批愿意思考的年轻人，这些人被他的渊博、睿智和人格魅力所吸引，“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地走到一起来了。

如今顾准“一个人的探索”演进成了一群人的探索，只是他始终站在队伍的排头，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他都是向导、旗手和领队。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取代或者接替他的位置，只是这支队伍愈来愈大，愈来愈强了。

许多人认为顾准的一生都很悲惨，晚年尤甚，临终更是凄凉不堪，令人唏嘘泪下，无疑此人完全“已经被这个冰冷的世界彻底地遗忘和抛弃”吴晓波《孙冶方之痛》了。没错，从“人死如灯灭”观念看顾准之死，当然就是这么回事——死亡的虚空吞噬了一切，理想、成就、努力、亲情、友情、爱情，统统泯灭在死亡的黑暗中，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死后的辉煌纯属偶然，那些“写给抽屉”的文字能得以面世和传世纯属偶然。

但是，不。细看、想象、细细体验顾准之死，以及他的死后，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从干校末期开始，此时离顾准的离世只有三年左右时间了。他不但“个人奋斗”（这在他的时代是个大大的贬义词）成就卓著，而且逐渐有一批人心甘情愿地和他一起奋斗。纵然他临终之时名符其实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仅仅因为想见见孩子而经历了被迫写下认罪书的“奇耻大辱”，如他所言。

可有谁能说他是死在和“魏连芟”一样的虚空和孤独中呢？更像是一位贯颐奋戟，身负重伤的将军死在悲哀的士兵们的环绕下，死在深爱着他的战友们的怀中，顾准之死充满了勇敢、安详和美。在一位思想家，这不啻真正的幸福。他享受了这份独特的、绝非每个人都能品尝得到的甘甜。这甘甜也只有热爱生命，拥抱生活的人才配得到。而他那些被称作“写给抽屉”的文字更是“四万年结出的果实”，它们的面世和传世不是偶而是必然。

关于“顾准之死”，后面还会讲到。他也享受世俗生活之美。

比之1959年的商城，息县干校就是天堂。不但有吃的，还能吃饱。他不用再“偷吃东西”或者“偷东西吃”。这是很不同的两件事，可在“傻气”书生顾准眼里有着质的区别——前者仅仅是“可怜”，后者则是“下流”。在商城他曾沦为“下流”——偷劳动队的胡萝卜吃，这令他刻骨铭心。干校不但顿顿能吃饱，逢年过节还有加餐。他在心满意足之余不厌其烦地将它们记录下来，这也是他在商城留下的习惯，只不过那时笔下都是胡萝卜、红薯、土豆什么的，如今是鱼、肉、粉条……。他不是个美食客，更不是饕餮之徒，他只是太明白能“吃饱”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了。对生活他从未有很高的要求，有时能弄上一杯红茶或者咖啡，在他就是至高的享受。

“以我连食堂而论，实在是愈吃愈好。12月清队新高潮以前，卖酱肉卖鱼的次数特多，12月中旬以后，“卖小菜”的次数减少，实际伙食标准并未降低，冬季生火以后，据说女同志宿舍中鱼虾不断，肉松炼乳不断。我自年初肺炎以后，消瘦特甚，春夏之交，略有恢复，冬季大见丰腴。这不仅因为我是买小菜的积极分子，也吃过一些炼乳、奶粉、藕粉之类。糖的消耗，最多时一个月可达三至四斤。肉松也吃过二斤……”^{71.4.4.}

每月的二十五元的生活费，除了攒下一点奢望将来能留给孩子们之外，他都用在购买食品上了——酱肉、肉松、炼乳、藕粉、王八……。买书淘书如今无论如何办不到，好在想要的、知其

名的书从前都买到或借阅过了，如今新华书店架子上的书没有他认为值得掏钱去买的，乐得把钱都花在嘴上。加上他天性大方，“托林里夫买炼乳，未打招呼，受到批评”^{70.11.8.}，“两周前和贺菊煌在明港一起吃了一顿饭，没有要他的钱，又批评我和审查对象拉拉扯扯，吃吃喝喝……”^{71.9.2.}。

“审查对象”又怎么啦？干校有几人不是“审查对象”的？他才不在乎呢。

里夫夫妇带了五个孩子来到息县，一家七口，足够一个班的建制。军宣队还算不错，“林里夫一家、乌家培一家独处一屋，是个别的例外”^{69.11.22.}。林家有时可以自家开火做点改样的、好吃的东西，夫人胡柏琴就放上一碗在房子窗口的席棚底下，老单身汉顾准就知道是给自己留的，端走吃就是了。骆耕漠有时从身处另一处干校的夫人处得到点花生、猪油、炒面什么的，就偷偷塞一点在他的铺盖卷里，有一次不慎被发现和举报，还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典型在全排开会批判。

老伙计们这样对待他，再看年轻人：

“我常常见到一位先生（那时还不知道他就是顾准），他的身材鹤立鸡群，长得像堂吉诃德骑士一样伶仃瘦长，在大家唯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充作‘运动服’为时尚保护色时，他却身着二三十年代上海绅士间流行的背带西装裤，西装背心，再加上那一副玳瑁眼镜，一副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高视阔步，眉宇间显然有些威容，虽不是因戒备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仍给人以视对方为无物之感……任凭什么凶神恶煞般的监管人员，在他面前也只得退避三分，凶焰会有所收敛，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楼肇明《面影和命运——顾准先生二三事》}

这是他留给当年干校一位年轻人的印象，也是干校顾准的标准着装和面孔。这身着装是他从“立信”年代就穿惯了的——我就是喜欢，它就是舒服嘛。你看不看得惯那是你的事，我想什么时候穿那是我的事。这副面孔是我的“本来面目”，看得惯看不惯我管不着。

除了在看到孩子们的时候。

干校有许多孩子，他爱孩子。只有在看到孩子们时，他才会彻底收敛起那副对人爱理不理的面孔，彻底舒开紧皱的眉头，展露出和他们一样的笑容。“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圣经 马太福音 19:14》}，他用中、英两种语言低吟那位加利利人的故事——“众人问基督：谁能进天国？我能吗？祂指着一个妇女怀中的婴儿说：‘他能，因为他纯’”^{高建国《拆下肋骨}

当火把》。

孩子们也爱他。

“他戴眼镜，穿吊带裤，头上有些微白，属于年纪比较大，可又显不出老来的那种人”龙冬《想起顾准》，这是一个当年七岁的孩子对他的记忆。他们和他玩，跟他逗，一点也不怕他，不像那些怪怪的成年人。

跟着妈妈一起来到干校的咪咪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位。

咪咪的妈妈是位书香世家女儿，是经济所优秀的青年学者，也是位出了名的女侠。三年前当顾准头破血流从大韩继被押回经济所监管，就是这位侠肝义胆的女子将自己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八十元偷偷塞进顾准的斗室，让险些没有饭吃的他度过了难关。她告诉女儿，今天挨整的几乎都是好人，是中国的精华，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女儿牢牢记下了妈妈的话。起初是在妈妈和其另一位叔叔，就是大韩继那位“小反”陈瑞铭的“指使”下偷偷地将些食品，比如奶粉什么的，利用自己小孩子的身份溜进作为“男营”的大棉花仓库，偷偷塞在他们的铺盖卷里，后来小姑娘自己被顾准强烈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常常像个小影子一样跟在顾伯伯身后，向他学习知识和道理。他逐渐成了她忘年的朋友、博学的老师、忏悔的“神父”和崇拜的英雄。小姑娘咪咪是顾准生命中最后和最明亮的一道人间阳光。几年后，当他就要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界河时，是这道人间的阳光一直伴随着他进入那永恒的彼岸，那里有无际的光明和温暖，她亲爱的顾伯伯再也不会挨打、挨饿，受冻、受屈辱了。这个也容我放到后面慢慢讲。

也有十分伤感的时候。

一天他得到一本英文版的泰奥多·斯笃姆小说《茵梦湖》，他边读边哭，最后竟是泪如雨下。以唯美和哀而不怨闻名于世的这本书触动了顾准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还书的时候他红着双眼对书的主人说：“我就是茵梦湖的那个男人啊”。

利用回北京的机会，他把许多世界名著也带进干校来了。他重读，也指导年轻人初读。

《悲惨世界》、《九三年》、《双城记》令初读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老的少的一起流下泪水。顾

准始终是个有泪的男子，内心总有一块柔软之处为人，为人类留着，再倔强、再桀骜，再铿锵，再苦涩，那里也不会变得刚硬起来。

那里有个现成的名字，叫做“悲悯”，也叫做“爱”，说得深一点，叫做“人道”，说得浅一点叫“同情”。连人道和同情心都不许讲，难怪顾准顿足大呼“人间何世”^{59.12.8}！

读书读到痴处，悲愤难抑的他当众就怒骂中国是个“狗道主义”^{当事人口述}的国家。往往这种时候，书对于他的作用就像烈酒一样，令他“峥嵘”毕露，露出个真顾准，至于后果，则“去他妈的”。好在武斗之风已过，事后被“口诛笔伐”一通罢了，不至于再吃皮肉之苦。更何况原先愤怒批判过他的年轻人如今对他崇敬有加，谁要是再敢对老顾同志动手动脚，那后果可是要“自负”的，也果然有人直到四十多年后还要“后果自负”呢。

他还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学习英语，不光为能够阅读世界经济学前沿的专业文章，更为能把握古今、中外、东西三个维度的历史走向。历史同时也是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了解经济学专业之外，所谓“工夫在诗外”，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应当只是单一的画家或者音乐家，而应是兴趣广泛的多面手的东西——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经济学家更是如此，必先要先对整个人类作一番梳理，才有可能拿出正确的国策，对国家和民族做“刍蕘之献”。

顾准这种很难企及的“高标准、严要求”令当年的年轻人，眼下的耄耋学者至今提起都惭愧企鹤，连呼“愧对顾准，愧对顾准”。

他深知作为非史学专业的经济学家要想了解历史，从希腊罗马入手是条好途径。他就引领年轻人从希腊史开始他们的历史漫游。

远游希腊罗马，近处也不能放过。顾准还常向身边的年轻人说起日本的“神武景气”，这是他最醉心探索的世界经济学奇迹之一。顾准认真研究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

1955年至1957年日本出现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是她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的开始。1956年制定了“电力五年计划”，进行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建设，并以石油取代煤炭发电，大量原油因此

而从国外进口，大大促进了日本炼油工业的发展。日本经济至此不仅完全从二次大战中复兴，而且进入积极建立独立经济的新阶段。经济景气推动了耐久性消费产品的热潮，出现了消费品市场的“三神器”——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最后是汽车工业的发展。日本人把战后这种神话般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

粗粝的生活并不妨碍顾准向年轻人解释这几样东西对人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解放意味着什么。熊彼得的亲炙弟子关淑庄女士更是用自己在美国亲历“三神器”现身说法，还被人告了密，名曰“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令世界震动的日本神武景气（じんむけいき），也是顾准十分羡慕和向往的中国远景。但你要是仅仅理解成这是他对中国经济远景的期待，那就错了。学生吴敬琏说：

“他认为中国的振兴是会到来的。他说的‘神武景气’要到来，不是指经济而是指政治。他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是不对的。” 邢小群 《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

要弄清楚顾准眼中的“神武景气”的真正含义，至少要追溯到影响和促成了明治维新的福泽谕吉。对于“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资本主义”、“什么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类的老问题，顾准早就有些不耐烦了——远处的、西方的你们不看，近处的、邻居的你们总该看看吧？

“为什么不去读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就够了” 笔记 119、125。

福泽谕吉——明治维新——神武景气，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国家强大，不言而喻的简单和不可分。顾准始终相信中国的相似景气不但一定会到来，而且时间不需要太长，规模将比日本还要壮观。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准备啊，中国崛起的一天一定会到来的，长则二十年，三十年，短则三五年，七、八年，一旦到来，你们就是中坚，要守机待时，发生变化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啊……

顾准还有特别有趣的一面。请看：

“李云是位棋迷，棋艺不差，棋德也高，无论对方水平如何，来者不拒，与友人手谈，以遣永昼。顾准的棋艺就差强人意了。他多半偶尔为之，李云下他的棋，顾准埋头看书译书。我记得不错的话，他那时好像在翻译当时看起来并无希望出版的凯恩斯的著作。顾准也偶尔与我对弈一二局，不过他的棋艺棋德，我实在不敢恭维。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招特别敏锐。我就算是赢了棋，却终是遭到他不留情面地指责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了棋，却像一

位十足的赢家。在他凌厉的指斥声中，我不说什么，可心里窝火……” 楼肇明 《面影和命运 顾准先生二三事》

让这位小伙子“窝火”的还不止这一件事情呢，上节说到向顾准借阅《圣经》，还不到说好还书的日子就被再三索还的，就是这位小伙子。

“臭棋篓子”们一般都属于具象思维能力比较差劲的人，估计顾准也一样，比起他超凡脱俗的抽象思维能力，其具象思维很可能差得很多，既在具体事物面前往往会用“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式的思维方式，尤其在权术、权谋的面前。而中国象棋是最讲究“谋略”的，他又完全不懂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谋略”，不输棋倒是奇怪了。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扯远一点，有件三十多年前的轶事也许能佐证顾准思维方式上的强点与弱点：

1937年初，“西安事变”后一个月，《大公报》编辑主任王芸生先生在他主编的《国闻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西安事变，主张团结建国并将张学良扣押蒋介石斥为“拆烂污”之举。在十四卷十五期《三寄北方青年》的文章中，王芸生先生说到有位名叫吴绛枫的青年给他写信，在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对他发表的《三寄北方青年》和《前进吧中国！》提出不同看法。文章说：“吴先生（吴绛枫—顾准—作者注）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但是，“西安事变后的两三天内，我见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一张传单，‘不杀某贼中国不能抗日’、‘不打倒汉奸政府，革命没有前途’，同时收到陕北红军的广播无线电报，也是对张学良的行动喝彩的……‘洪波震壑，川无恬归’……听听口号，看看事实，不惭汗吗？。”

是年二十二岁的吴绛枫——顾准当然不能代表“共产党的态度”，也因此而受到上级对他“不明西安事变真相，轻率的无纪律行为”的责怪。但不久，他“解释西安事变非出我党预谋，是东北军青年军官激于民族义愤所为”的观点就被证实确实正是“我党”观点，“延安电讯台还引用王的这篇文章，就中也转引了我的信，申明我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得以证实我的解释并无错误，才算放下了心”。

对于这件非常直观的事物，近七十年后，随着陈立夫回忆录的出版、俄国档案的解密和近代史学者的深究，人们不得不说还是老报人王芸生看得深一些、远一些，连晚年张学良将军自己也说王芸生

的文章对他警悟颇深。青年顾准对历史的解识还是赶不上深谙党派、权谋的《大公报》主笔先生。长于抽象思维、拙于具象思维，大概也是顾准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天差地别的原因之一。

话说回来。顾准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身边每个求知和向上的年轻人。在他面前，他们抛掉了面具和欺骗性的外表，充分舒展着童真和率直的本性，舒展着“善”的一面。顾准给人们留下了难以描摹的特点——保持着人最初的品质——大自然赋予人的率真，内心情感的井然有序以及能与生活能完全融合的柔韧。他像接受水和空气一样自然地接受了人们对他的爱。他享受这爱，也用爱来回报。

3. 历尽劫波兄弟在

回到北京的顾准又和多年失去联系的六弟陈敏之联系上了。

1967年底，时任上海市政府建委副秘书长的陈敏之突然被宣布为“叛徒”，旋即被关押进解放前叫“漕河泾监狱”如今叫“少年管教所”的特殊拘留所，罪行是1937年入党还不到一年的、十七岁的他有过一次被捕的经历。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干部几乎都集中关押在此，由军队把守。“人民”对陈敏之的判决是：“定为叛徒，清除出党”，和五哥顾准1958年“定为右派，清除出党”，半斤八两。

1968年下半年，中国大、中、小学校的红卫兵运动日渐衰落，眼看“老三届”初、高中生和1966年后的大学毕业生们的就业问题无法解决，于是一个新的运动兴起了——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旗下，上山下乡大潮席卷全国。

陈家几姊妹都要上山下乡，爸爸在狱中，没有人顾得上他们。北京的叔叔（小姑父）施义之和孀孀（小姑姑）陈枫和让“大哥哥”——顾家长子小米顾逸东带了一百元钱，还有为每一位要下乡的孩子们手织的毛衣，专程来上海为女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行装。陈（顾）家一门如今都陷在巨大的灾难中，右派、叛徒、走资派的帽子把孩子们快要压垮了。是施义之、陈枫夫妇不顾自己身处危境，伸出温柔的双臂，把顾家、陈家十几个孩子统统护了起来，从精神上、经济上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小姑父、

小姑姑出于人性、母性的这份恩情，孩子们没齿难忘。

小米哥哥到上海后才告诉姑娘们，他们的妈妈、陈家（顾家）的“大家姆妈”——秀妈妈汪璧去年就自杀了。“大家姆妈”竟然死了！这么好的人，就这么说没就没了！还不大明白什么叫做“死”的小姑娘们又惊又怕，伤心欲绝，却连哭都不敢哭出声来。

1969年11月陈敏之出狱。五哥顾准已经去了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为了少给家庭和自己找麻烦，他们坚持不通信，不见面，把所有的手足情、兄弟谊都埋在心底。六弟记着五哥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全世界的黑暗加在一起也不会影响一支蜡烛的光亮，这就是常识”。明天太阳会照样升起，兄弟们只要顽强地活下去，总有在太阳底下见面的一天。这也是常识。

六弟敏之对五哥的感情非常深。在他和弟弟妹妹幼年时，是尚未成年的五哥抚养了他们，使兄妹免遭冻馁之苦。后来又带引他们走上革命之道路。虽然五哥大不了六弟几岁，可他一直对五哥有种“长兄如父”的感觉，有些崇拜，还有些盲从。

比如五哥1950年代初被撤了大上海总税吏的职，贬去北京作“部吏”，正倒霉的风头上却急令六弟帮忙搞本全本的《圣经》。敏之二话不说就去搞，搞到就火速寄去，他才不管它什么阶级不阶级，斗争不斗争呢。对五哥，他是一丝一毫的“革命警惕性”和“觉悟”都没有的，五哥在他的心里激起的感情，只有爱和敬。

再比如兄弟俩最后的通讯，那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讳，哪一封拿出来也够闹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人仰马翻七荤八素的。可六弟对五哥的每一封来信都视若珍宝，反复念，用心读，如数家珍，精心收藏，否则我们今天也读不到他五哥那些字字玑珠的华丽文章。

1972年春末，顾准从干校回到北京，初冬，敏之也在上海的“五七干校”获准了假，去北京探望母亲顾庆莲。苦命的两兄弟终于见面了。“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没有比历经苦难的兄弟重逢更令五哥六弟欢喜的了。

五哥不提，六弟也不问嫂嫂的惨死。怎么提？怎么问？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吧。六弟是五哥和五嫂爱情最好的见证人，也是五哥五嫂悲剧的全程目击者。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

五嫂不得不提出离婚。她第一个去征求意见的不是娘家人，却是夫家的小叔子——六弟敏之。

“当时她内外处境艰难，困窘和难以言明的复杂情况，比我所能知道的可能严重得多。我深知，从1934年他们结婚，三十多年来真是两情相笃，患难与共，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不是出于万不得已，五嫂绝对不会提出这么绝情的措施。对此我只能表示同意，却没有想到五个家庭的这种裂变会成为碎片，再也不能复原。” 陈敏之 《我与顾准》

敏之是在上海监狱中得知五嫂自杀身亡消息的。1967年他最后一次见到五嫂，五十三岁的她憔悴疲惫，状如老媪，看来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五个月后她就自杀了。六弟是多么后悔啊，当时不但没有鼓励她再坚持下去，反倒还同意了他和五哥的离婚。如今他简直就觉得无法面对五哥。

他爱五哥五嫂，也爱那群一字排开个个优秀的侄儿侄女。正是这爱，令他同意五嫂和五哥离婚，保住一个算一个，横竖不能让一家人都一锅烩进去。今天的诛连和昨天的灭九族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五哥差点因为外甥德藩、德楠自杀可不就是眼皮子底下现世的例子吗？可我当时怎么就没好好想想五哥离开五嫂会怎么样呢？更不用说离了婚还是没有保住五嫂！

看着鬓发斑白的老哥哥，敏之老泪纵横。倒是五哥反过来安慰六弟。“**Let bygones be bygones**”吧兄弟，我已经把你五嫂永永远远地埋在心坟里了。你看看这白被子，白枕头，白床单，都是我在为你五嫂服丧啊。逝者长已矣，活着的人还要好好地活下去。老六，难得你我兄弟还能见面，收起眼泪，露出笑容，阿拉出去吃个小馆子好不好？

他们去吃小馆子，去游公园，去拜访老朋友们，就手请他们为哥俩拍下照片——在日坛汉白玉的石棂星门下，哥俩肩并着肩，在学部纯中式的四合院里，哥俩并排而坐，老人的安详和孩子般的纯真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只是，都老了，哥哥五十七，弟弟也五十二了。老哥俩长得多像啊，同样挺拔高高的身个，轮廓分明的面颊，同样深度的眼镜，同样安安静静，不卑不亢，连脸上的笑容都那样相像。他们促膝长谈。

老六，你看了我写给孩子们的那封信流泪，责备他们不来看我。我不怪他们，我能理解。你别再费心、生气了。将来能攒下一些钱、粮票油票什么的，我还会寄给他们的。我虽深爱他们，却不能决定他们的道路。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这个爸爸的。他们也都大了，再说三妹和义之（顾准三妹夫

——施义之)一直在护着他们,和护自己的亲囡囡一样,我放心。义之自己天天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我只有感谢他们的心,但不会主动去找他们。姆妈老了,我也不能再让她老人家为我操心、伤心了。老六,我们今天不谈那些伤心事,只来谈一个话题——读书,好不好?

五哥知道弟弟也是个爱读书的人,尤喜中国文学,就盘问六弟这些年还在不在读书,读了些什么书。哥俩讨论读书打小就成习惯,从上海那条小南门外南仓街仓基弄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陈家老六最佩服的就是自己的三个哥哥——三哥陈怀德、四哥陈怀良和五哥顾准。三哥写得一手好字,懂几国外语:英、日、法、德,随随便便就能阅读几种外文的报纸,对哲学特别感兴趣,康德、斯宾诺莎、马克思这些名字,老六就是从他口中第一次听到的;四哥写一手好魏碑,五哥干革命办进社出印刷物,钢板都是出自四哥之手,他从来不声不响地做事,没有任何要求。

那时三哥翻译过一本叫做《从一个新世界看一个人》(应该不是由俄译中,三哥不通俄文),五哥却醉心于《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徐懋庸由俄译中)。小六弟跟在他们后面也爱上了读书,爱上了思辨和哲学。

后来三哥和四哥都死了,就剩下五哥这一个哥了。兄弟俩一个在京一个在沪,无论多么曲折坎坷,哥俩的通信从没有断过。一个问题他俩可以辩上好几封信,好几个月,可六弟总是差五哥一截,每次都输,“六弟来信,辩难结果,他不能不服输”^{59.3.7}——那次是五哥去劳改营的前几天,哥俩辩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足以解释全部历史。老六说能,老五说不能,五哥又赢了,得意得很,六弟也输得口服心服。

那时顾准已经在剥“历史唯物主义”这颗大洋葱了。

当年的小小少年一转眼都成了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如今五哥问六弟读书之事,弟弟还是有被哥哥检查作业之感——哎,关了几年监狱,除了“红宝书”什么也没读过。五哥,我也有许许多多的疑问在胸中,被无数的不明白折磨得寝食难安。今天的现实,哪里还有一丝一毫当年我们心甘情愿为之献出生命的共产主义景色?中国是怎样变幻成了这个样子的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五哥,我

是多么想弄明白呵。你我都已年过耳顺，可是我们的耳“顺”了吗？我们就这样“顺”下去和“驯”下去，一直到死吗？

六弟，你的这些疑惑和诘问我都想过，而且不止一年两年，已经十几、二十年了。这么多年来我读了许多书，思考了许多问题，也写下了不少的文字。今天看它们都是异端邪说，不但毫无用处，说不定还会叫我再做一次“白虎星”害人。可也许几十年后人们会发现我这“一家之言”有些道理，对这个国家兴许还有些用处。我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且不会太久，长则十年，十几年，短则几年，三五年，二三年。可是这些东西眼下不能示人，我也不愿意把他们交给外人，即使我相信他们，他们也不一定敢收藏、保管。只有你，我愿意，我敢全都拿出来。

你这次来，一连串问了我那么多问题，这也正是我在探寻答案的问题呀。阿拉兄弟还是像从前一样通起信来吧，你问我答，我问你答，阿拉一起问，一起寻觅答案，探索前路，好不好？

你不是已经读过《圣经》了吗？应该知道耶稣说过“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他们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但假如你能把古今中外先知们的语言都读一读，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到耶稣、牛顿、马克思、爱因斯坦（中国的我就不说了，你都熟悉），就会知道先知无非是不随当下的万众一声，提前说出将会发生的事情。世上万物都有规律，有秩序，天气既然能预报，就是因为预报员们掌握了长期的、大量的气象历史数据。大自然是有秩序的，历史也同样。一个人若能将古今、中外、东西纵观横看，细细分析，一定能像天气预报员一样预测他身边的事物，包括专属人类的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文明的走向。我不是先知，就像你不能把天气预报员叫做先知一样。

五哥，你说得太好了，我多想能像你那样通古今、博中外、融东西。可是怎样才能做到呢？从哪里开始呢？

老六，就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探究开始吧，这也是我向经济所那些好学的年轻人的建议。不懂得希腊就不会懂得真正的政治。中国从荀况、韩非开始的东西，那不是政治，那是权术、权谋，我们中国人却一直把它们当做“政治”沿用至今，这才有几千年的东方式专制和对人性的残酷压抑。

老六，就用我们兄弟间通信的方式把这些探索的痕迹保留下来吧，假如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这危险而美好的探索的话。它们也许能解开你的疑惑，消除你心灵的痛苦。说实话老六，五哥如今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没有这探索，五哥这条老命留着有什么意义呢？我也只有你一个手足亲人可以信赖、依赖和交通了。共同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激情、欢乐、危险、磨难、侮辱、困苦……，如今你我还能全须全尾，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我非常知足啊。五哥还能活多久？不知道。在干校我说我要为我的秀服丧二十年，可那也仅仅是愿望而已。我现在痰中常常带血，医生又说并不是肺结核，谁知道怎么回事。好在有商城的日子垫底，如今什么日子你五哥都能过得去。回到北京更是如进天堂，因为有书，有图书馆，还有一群关心我爱护我的人。有些你认识，像里夫，耕漠、李云……，更多是你不认识的年轻人，他们好学，上进，聪慧，看到他们就像看到当年的你我，还有你五嫂。

六弟，即生于这个时代，干脆就来享受它。“历尽劫波兄弟在”，这是上苍奇异的恩典，你我当珍惜。只当四十年前你送我和五嫂从杨树浦码头出发去北平流亡一样，兄弟，就从这里，这另一座杨树浦码头出发，开始我们新的旅程吧。

4. 了不起的流水账

是，回到北京的顾准最感幸福的，莫过于能挨着图书馆，挨着书。

说起来北图离他并不近，从他所住的建国门学部到故宫西侧的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差不多有五公里，可离着经济所图书馆就太近了。9.13 之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军宣队命令原在三里河经委大楼的经济所图书馆全数搬到建国门学部去。这可是沙漠之井——宗井滔的图书馆，对书的饕餮之徒顾准而言真是个大福音。虽然从三里河搬来的图书都打着包，无法借阅，宗馆长奇迹般续订下来的西方经济学期刊可都是新的，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新知”。妻子死了，五个孩子都远离他，可他天天都有“新嫁娘”，天天都有“新孩子”。新嫁娘就是那些新借来的书，新孩子就是他笔端永不停歇潺潺流出的新文字。

顾准依然写日记，但一改他从前风格，“北京日记”极为简洁，粗看上去活活就是一本流水账，不但无感慨、无议论，也无人物，无情节，甚至连事物、事务都没有，除非你把“休息”，“洗澡”看作是事物或事务。而“同上、同上、同上……”则比比皆是。日记最短时只有一个英文字，例如“Catlin”^{74.5.17-18}、“Cambridge”⁷³⁻⁷⁴多处、“Immense”^{74.5.16}什么的，令人摸不着头脑。

实际上，“北京日记”是一部读书目录和时间表，起始于1972年10月13日，终止于主人去世前十八天的1974年10月18日，时间跨度整整两年，字数却只有四千多一点，其中一大半还是“日期”和“同上”。更纠结的是内中还夹缠着许多英文和中、英文缩写，无怪乎人们看不懂和不耐烦看。

但它却是一部了不起的流水账。

先不管他“息县日记”与“北京日记”之间又整整地缺失了一年零一个月又十一天是怎么回事，除了前面章节已经提到的、必然存在的“9.13”的原因，其余的蹊跷就先放一放，来看看这部奇异的流水账奇异在哪里？它为什么这样简洁。

和“息县日记”也就是所谓“新生日记”恰恰相反，这部“北京日记”是顾准单单为自己做的读书记录，不准备给任何人看，但也许仅仅除了六弟陈敏之之外。

再不知深浅地说一句，这部日记也是我唯一不怀疑被人腰斩斧钺过的顾准日记，但是否被“斩首”则不能肯定。

说它未被腰斩，是因为这370天的日记一天都没有缺；说它未被斧钺，是因为它本来就已经简到不能再简，再砍下去就没有了；说它不能肯定是否被“斩首”，前边已经说过了，是因为从1971年9月“息县日记”的结束到1972年10月“北京日记”的开头，中间缺了一年还要多。

顾准是个逻辑性极强的人，抽象思维能力大为超凡，十分在乎数字上的完美和优雅，“半半拉拉”、“稀里糊涂”从来不是他的风格，这从他的文字表现和旁人旁述中即可领略。从前的“党校日记”、“商城日记”、“新生日记”之所以会有许多处半半拉拉状，稀里糊涂状，前面的章节已经猜测和说过很多，不再重复。至于说最后的这部“北京日记”是所有面世日记中最完整的，除了一天没缺一条因素外，他的“笔记”和“文稿”也间接佐证了这一猜测——从“北京日记”开始那天起，“笔记”、“日

记”、“文稿”就成为了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记记载他今天看了什么书，笔记是摘录和评论，文稿就是最后的成品——《顾准文稿》，百试不爽。

比如“北京日记”开篇：

“X/13 《经验与自然》” 72.10.13.

《经验与自然》是经验主义大师，美国人约翰·杜威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实用主义流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被誉为“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有哲人称杜威是“实用主义神圣家族的家长”，那么这本书就堪称“家训”了。在书中，杜威提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把它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种观点反对把人与经验同自然截然分开，主张确立“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由此建立一个“统一的经验整体”。

顾准读杜威当然不是始于1972年。早在1959年去河南商城右派劳改营之前，他就读了他的《哲学的改造》，“读杜威哲学的改造，极有意思。问题苦我极深者，不图于此公处获得解决”^{59.3.7}。不过那时他仅接受杜威自然科学部分的理论，“社会与伦理大约未必可取”^{同上}。那时他已经开始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颗大洋葱，至少杜威关于自然科学部分的观点深得他心。

时隔十三年，到了再读杜威《经验与自然》的1972年，顾准的理论高度已经大不同前了。早已汲取了杜威、罗素等人多元主义哲学的观念，对黑格尔主义的神权思想的“绝对”和“比之前所有的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笔记 597}的《自然辩证法》，他都已经都不再惧怕。就像摘下了金箍儿，不再害怕紧箍咒的孙悟空一样，他虽说还不至于挥起金箍棒去痛打师父唐僧，可至少敢于大胆批评师傅了。至于教训猪八戒，那是他的长项：

“也有人曾经企图把杜威、罗素哲学打上帝国主义的印记，英共的康福斯写过这样的书。1957年，他慷慨陈词地用了杜威、罗素都强调过的话：‘哲学的任务在于批判’。”^{文稿 359}

这样不好吧，康思福同志。你要真是主张“哲学的任务在于批判”，为什么要对多元主义扣上“帝国主义的印记”金箍儿，且跟着就念紧箍咒，谁“批判”就要叫谁脑袋疼？对这种以为紧箍咒就是“终极真理”猪八戒们，他可是一点情面也不留的。那么什么才能叫做“批判”呢？顾准同志紧接着话题

一转，“西方思想界确实善于批判。政治权威当然是批判对象，任何既得权利都是批判对象，美国盛行的群众性的种族歧视也是批判对象。只要是和公众有关的事情，怎样保密也无法长久保密下去。说美国在越南的肮脏战争，是被批判得只好撤退，至少也有一方面的真实。”^{同上}

我不管你那个“圈儿套儿”是个什么玩意儿，金箍儿也好，铜箍儿也好，批判是一定要货真价实的，那就是金箍棒，就是对政府、权威、威权、既得利益者的制衡。你念“紧箍咒”，我就金箍棒伺候！

“说来奇怪，中国人痛斥的杜威，实实在在是培根的“实践论”的继承者。他的书，诚然大不同于培根，不过差别只在于论证和资料现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论，和 Bacon（培根）几乎毫无二致。可惜，因为胡适把他糟蹋了（说什么真理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姑娘，你爱把她打扮成怎样就怎样等等）。所以，我写这份东西的时候，还不敢称实际上是实践论者的工具主义为实用主义。”^{文稿 370}

顾准口中的“这份东西”就是他的《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一文。此文脱稿已是 1974 年 3 月 27 日，离他死去只有半年时间了，却还是有许多不敢确认，不敢妄言的东西，更不敢说发现了什么“绝对真理”。

杜威的这本《经验与自然》顾准看了两个多月，1972 年 10 月 13 日和 11 月 20 日分别两次作了记录。当然这期间并不妨碍他看别的书籍。顾准看书从来是若干本齐头并进，很少见他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而不插进其他书籍的。他喜欢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的作家、作品来相互印证，或者让它们“扭打”、“撕咬”，然后从这些思想的猛烈碰撞中萃取他认为最接近真理的东西。

例如他在看杜威这本书时还同时看 18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这部书代表了休谟晚年成熟的哲学思想，其主题是驳斥当时流行的宗教假设，也就是宇宙设计论——又一种以为“穷尽了所有”的理论。

同时他还读巴鲁赫·斯宾诺莎所著《笛卡尔哲学原理》和附录《形而上学思想》，前者是作者用几何学方式讲述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后者更多的是斯宾诺莎自己对一些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和概念的札记。顾准接触逻辑学也是从几何学开始，对于笛卡尔他不陌生。

读书的同时他还译书。

早在文革初期的 1967-1968 年，还在监管中的顾准就开始翻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了。此书是这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大师最著名的著作，它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学界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此书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了严复先生的文言文中译本——《群己权界论》，1959 年又有了许宝骙先生的商务版白话文译本，但顾准好像对两者都不甚满意。密尔本身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作为同道，顾准决心重译《论自由》。此前，他已经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和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论文集》，英译汉水平突飞猛进。《论自由》虽然并非一本纯经济学著作而是一本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一体的名著，但篇幅不大，观点清晰、文字优美，令他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并没有人要求他翻译，也不会有出版社出版和付他稿费，可他就是技痒，非重译一遍不可。

赴息县干校前他已经译完了它，如今回到北京，他开始校对已完成的译稿。这一次他没有分心，全心全意用了八天的时间。校稿的过程当然也是重读和重新思考的过程。此书对顾准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的笔记和文稿中，J.S.Mill（密尔）这个名字被多次提到。例如：

“19 世纪中期，J. S. Mill 的书中，十分强调一切营业性事务都绝不宜由政府来办。这其实是 17 至 20 世纪三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以此于中国汉代开始的盐铁国营，及其后连绵不绝直到清代的盐专卖，广州十三行是皇商的传统相比（其实，在中国，远古的商代，手工业就是“国营”的），可以更加突出它的特点。” 文稿 342

密尔一百年前就反对“官商”，力主政、企分家，顾准就注意到了这点。不过顾准更关注的，是密尔一个最有名也最被后人推崇的口号——“保护少数派”，这也是顾准最希望有朝一日他脚下这片东方的土地上能够喊出的声音：

“1957 年前后，我们这个一党制的国家也响亮过‘保护少数派’的口号。其实这是英国的穆勒说过的话，是地道的两党制口号。” 文稿 385

顾准所译的《论自由》若按照常理推测应该还在世上。1972 年以后中国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焚书”行为，他的很多文字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经济所发还给了亲属，包括他的历史坦白、罪行交代、检查、检讨等等。《论自由》的顾氏中译稿非常可能就夹杂在其中。

到了1973年，顾准日记里“11/12 英文文献”，“11/10 Journal of Ec. Review（经济观察）”，“11/19 翻译任务”，“11/21 翻译任务”，“11/10 英文文献”……比比皆是，他在经济所简直成了职业的译员，只是这个译员没有工资，只有刚够维生的生活费。

再举个例子：

“北京日记”从1973年6月13日开始记录他开读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格罗特是十九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希腊史学家，所著十二卷本的《希腊史》是近代希腊史世界级权威读本。这套巨著至今无中译，顾准读到的是四卷本的英文原版。四卷本并非十二卷本的缩写而是缩印，字迹非常细密。他不仅阅读还翻译了其中“希腊的僭主时代”整整一章，大约一万五千字左右。八个月后，1974年2月12日，他最辉煌的篇章——《希腊城邦制度》落笔，

“而这次译 Grote 的文章时才领会了的” 文稿 269。

这里他“领会了的”，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把“斯巴达完全撇开，将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与雅典民主焊在一起，把分明是神权政治的希腊王政（巴西流斯）说成是‘军事民主’” 文稿 269 的历史虚无和歪曲。

读格罗托《希腊史》四卷本原文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从6月18日起到9月12日止，他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通读了它们，除了整译“僭主时代”外，还做了不少摘译。次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74年2月起笔的《希腊城邦制度》里，“城邦制”、“僭主政治”、“希腊民主”、“公民团体”都是最重要的阐述，显然是参考了格罗托某些章节的。

彼时古希腊史有中译的近代论述只有苏联史学家塞尔戈耶夫的《古希腊史》一书，是彼时高等院校历史系“希腊史”教科书的唯一钦定本，却不仅完全无法满足他的胃口还引起了更大的怀疑，读格罗托的《希腊史》很可能由此而起——书中数处提到了这一巨著。至于古希腊人自己写的自己的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则多年来都是他的案头书。希腊史是顾准此生最为醉心的历史和政治哲学课题。仅梳理他已经面世的文字即可知道他读过的相关书籍有：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西谚有“人人知道荷马，谁读过荷马？”还好，有个中国人

——顾准读过)；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 19 世纪末考古新发现的《雅典政制》；

希罗多德的《历史》；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色诺芬的《远征记》；

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英文版)；

J·B·伯里的《希腊史》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

大卫·佛里德里克·埃伦伯格的《希腊与罗马的社会与文明》和《巴苏陀古今史》(剑桥英文版)；

本杰明·法林顿的《古代世界的社会与政治》(剑桥英文版)；

亚里士乌芬尼斯(古希腊早期喜剧作家,诗人)(未见著作名)；

欧里皮德斯(希腊悲剧诗人)(未见著作名)；

埃斯库罗斯(希腊诗人,悲剧作家)(未见著作名)；

赫罗兹尼的《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

塞尔戈耶夫的《古希腊史》；

R·W·梅肯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阿德科克的《希腊城邦的兴起》；

C·Я·卢里叶的《希罗多德论》

J·B·瓦斯的《早期爱琴文明》；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杜丹的《古代世界经济生活》；

D·G·荷格斯的《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

格尔顿乃尔的《早期雅典》；

亨利·萨姆奈·梅因的《古代法》；

H.J.瓦德·吉里的《多里安城邦的兴起》；

巴克尔的《公元四世纪的伟大政治思想和理论》；

爱德华·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威·恩·弗·瓦拉的《加纳史》；

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

作者不详的《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英文版)；

……

这还没有将“北京日记”中许多处“**Cambridge** (剑桥)”字样的书目都排列进去，那至少应该包括剑桥版《希腊史》或《古希腊史》是毫无疑问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学术水平最高的出版社。她出版的各国历史，各国古代史的品种之多和质量之高在这个星球上暂时还无出其右者。顾准日记除了记录他阅读过《剑桥东方史》之外，其他无数“**Cambridge**”字样中除了有关希腊史的著作，应该还有罗马史，非洲史，美洲史、欧洲史、东方史和中国史的著作，这也是无疑的。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顾准通读了《剑桥古代史》。

这是一部极为浩瀚的史著。彼时北京图书馆可以出借的是十二卷英文版本，初版于1928年，后由英语世界及法、德等国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进行了长达30年的重写，由原来的12卷扩展至14卷19册，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早期希腊历史的篇幅更是成倍增加，还将初版中公元3世纪的古代史下限推到了公元7世纪左右。但是这个新版本顾准不大可能看到，在非常大的可能性上，他看的是1953年版，主编者正是写出了《思想自由史》、《希腊史》和《亚该亚人和特洛伊战争》的英国研究古代世界文明与思想发展的重要学者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B.Bury)。在顾准最后的日记和最后的华章《希腊城邦制度》中，C.A.H.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剑桥古代史》)字样曾多次出现。

这部巨著至今也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

顾准将他读过的许多英语原版书的章节作了中译，例如《希腊的僭主政治》就是他译自乔治·格罗特《希腊史》的第一卷，第二部《历史的希腊》，第九章《希腊的僭主时代》的一部分，版本是美国图书公司（United States Book Company）1869年版，531-547页。他记录得清清楚楚，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美中不足的是所有面世的《顾准文稿》此处都错了一个章节号，将 ch.IX（第九章）错记成了 ch.X（第十章）。由于无法得见真迹，不能判断是译者顾准还是编辑者的错误。但出于对顾准文字、数字一贯严谨态度的信任，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相信这是编辑者的错误。

“北京日记”中像这样的读书——思考——落笔行文的轨迹太多了，举不胜举。

六弟敏之记得五哥到了最后的一两年，读书、译书、摘书几乎成痴。北图是三天一趟，一趟三本，译书的记录也是连篇累牍。他两年多的“北京日记”真是一本重若干钧的了不起的流水账，凡人如我，肃然起敬之余不禁望而生畏——要想将“北京日记”中的书目统统抄录一遍，把这些书的作者、年代、背景、观点做个简介，再和顾准的笔记、文稿结合起来叙述，这个工程量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令人踟蹰不敢前行。

多年以后，当顾准被发现，其对历史的探索和解读得到中国知识界高度重视后，有人指责他探索希腊史所涉及的文献都不过是通俗读物，科普读物，依此而对历史作出的解读和反思都不过是肤浅的入门之说——你研究希腊不懂希腊文，研究黑格尔不懂德文，研究基督教不懂希伯来文，那就算不上“研究”，至多只能叫“入门”罢了，“推崇顾准的人也都不过‘还在教室之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仲维光《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云云。

对此，我一个工科出身的人不敢僭越妄评，只是有个疑问：假如当年顾准读的都不过是人家的通俗读物，可连这些科普性质的（如其所言）浅薄的“大、中学历史教科书”咱自家的史学家们尚且无人看、无人读、无人写出有价值的书评和论文（不过也许他们都在“教室内”看、读和写，只是芸芸众生不知道罢了），却生生被一位会计学出身的人“独占了头鳌”。真不知道人家真正专业的历史文献当年和如今达到了何种高度，咱怎么赶得上！既然人家四十多年前的大众读物就到了这样的程度，

那么在人家今日的、专业的高度下，咱自己的史学家们岂不是连“高山仰止”都谈不上？这样的评价与其说是对咱们自己知识界的“傲慢”，倒真不如说是对人家知识界的那一种“欢喜得要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柔逊和崇拜。

顾准在写作《希腊城邦制度》的当儿，在中国，除了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对古希腊略有介绍外，还有谁像他这样对人类社会起源性的希腊城邦制度作过研究，写出过有分量的文章？这是个连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史学界也从未放弃过研究的大题目，根本性题目，更不用说西方史学界了。仅仅从顾准多次提到、引用并推荐给六弟陈敏之读的、前苏联史学家塞尔戈耶夫所著《古希腊史》，就用了整整一部的篇幅来描述“古希腊史的史料和编纂”在苏联时代的进展情状。什么都跟在老大哥后面学习的咱们，怎么就没有学学人家大哥这一点呢？就算是顾准的城邦希腊只能算个“入门”习作，能在这个时代写出这样的关于“民主源头”的科普性作品，难道不该受尊重反倒要受奚落吗？

来说点轻松的，放松一下。“北京日记”里有几篇还是有“事物”和“事务”的。

“XI/4 做萝卜丸子”^{73.11.4}。

“II/4 招待孩子”^{73.2.4}。他招待的肯定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那帮年轻人的孩子，四五岁、七八岁的小妞妞和小淘气们。被他唤作“大炮”的张曙光有个五岁的小女儿，当年最喜欢到顾准伯伯那儿喝“黑水”。小丫头不知道那叫“咖啡”，只觉得又甜又黑，真好喝呀。这位老伯伯又那么慈祥，说起来都够叫“爷爷”的了。

年近六十的顾准也觉得这帮小不点儿应该叫他爷爷了，可这样一来，小不点儿们的爸爸妈妈就得叫他叔叔，这个他们可不愿意。他们都非常尊重他，叫老师可以，叫叔叔可就有点太“Naive（儿童化）”了。

有一天一个七、八岁的小小子看见这位年轻的爷爷——年老的叔叔穿着西装背带裤在院子里走，就问他：

“你多大？几岁了？怎么老穿这种裤子？”

“为什么不能穿？”

“小孩儿才穿这种开裆裤嘛，不过你的裤子倒是不开裆。大人只有资本家才穿啊。”

他好像吓了一跳，接着就笑了，连眼镜片都显得亮了起来。

“不一定穿这种裤子的都是坏人呀，只要舒服就行呗。你不能问我几岁，应该问我几十岁啦。懂了吗小不点？”

“那天，他教导我一番后，还硬要我喊他‘爷爷’，而且我被他用什么办法说动了，喊了他一声。他异常兴奋。回家我跟父亲一说，父亲紧跟着也教导了我一番，说什么比父亲大一些的要叫伯伯，小一些的只能叫叔叔。他虽然比我父亲大八岁，可叫爷爷还是过分了。从这往后，我一见他，老远就大喊他‘叔叔’，想用这办法气他。有几回我还突然推开他住的那间小屋的房门，一连串大叫‘叔叔’，每次都吓他一大跳。他总是一个人，身边没有别的人……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想起很长日子没有见到那个穿吊带裤的人了，一问，才知道他死了。不管怎么说，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忧伤。那年我九岁……” 龙冬 《想起顾准》

他爱孩子，他自己就是个孩子。看他北京日记有趣之处：

“I/17 买鱼，炸鱼”^{74.1.17.}， “I/22 做年夜饭”^{74.1.22.}， “III/9 去医院，采购，做菜”^{日记 74.3.9.}， “IV/29 炸鱼”^{74.4.29.}……。

就算他孤家寡人一个了，有机会还是要改善一下生活。不过鱼炸出来，年夜饭做出来，肯定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份儿，那多麻烦，多没意思啊。学部里那帮年轻人（也都四十出头，不算年轻啦），今天是你，明天是我总要给这老单身汉送些吃的。还有那帮老朋友和他们的夫人们，更是心疼这位跛，病，右俱全的老汉，所以顾准见天能吃上他们的红烧肉啦，腌笃鲜啦，红烧带鱼啦，鸡块啦什么的。东家北京味，西家江南味，南家四川味，北家上海味，顾准能光吃他们的吗？当然不会。但凡发了鱼票（那时几乎全北京人都只有带鱼和一种叫做“剥皮鱼”的鱼可吃），他必是精挑细选地买，认真真地烧，东南西北大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又快乐又温馨。不过也有伤心欲绝的日记篇章：

“V/10 开始重写 ch. 6 买米，林荫路凭吊”^{74.5.10.}

“重写 Ch.6”——重写《希腊城邦制度》的第六章先略过不说，林荫路？对，就是林荫路，好漂亮的一条林荫路——南头是钓鱼台，北头是百万庄，路东是财政部，路西是它的家属宿舍，整条马路绿荫蔽日，尤其在北京的五月天。那是他的旧居，也是汪璧，他的秀魂归离恨天之处。

那一天他并非形只影单，老友耕漠刚领到工资，特意请他去莫斯科餐厅吃西餐——他知道他一向喜欢西餐，“老莫”又是他的最爱。不巧老莫客满，两人只得趑趄摸到一家小饭庄吃了顿饭。本来应该向东回学部的，顾准突然提出能不能向南走走，散散步。耕漠不解其意就跟着他向南，一直走到百万庄那栋家属楼跟前。顾准眼望三楼那个黑灯瞎火的单元，满脸哀痛，很久很久都不肯离去。耕漠这才恍然大悟，安慰着，劝慰着，轻轻地拉住他调转头来。

人间自有真情在，顾准最后的岁月既不灰暗也不冰冷，所有那个时代，他的时代的色彩——哀与乐，悲和欢，还有最要紧的——爱，他一样都不缺。

第十九章 鼙鼓无声，理性争鸣

1. 历史的哲学质问

“我在探索的，是未来历史发展的道路。”

这是顾准在“历史交代”中作为向人民坦白交代罪行时的一句话。

他的探索当然是罪行。在集权制度下，任何置喙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思想天才，都会被视作“癫狂”，他们天赋使命意识本身就是一宗罪，一宗重罪。但是今天人们探索顾准，倒是不妨从他的历史观入手，这是一道好的入口，还兴许能和他苦苦探索的未来历史发展的道路“接轨”。而以黑格尔“世界历史即是世界审判，这种史观兼有神义和人义的双重品格”之言做切入，用以观察顾准的史观，也许会事半功倍。

近百年前，马克思的俄国继承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和大祭司的身份，推出了一套声称适用于全世界人类历史进程的公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

会——共产主义社会(含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被 20 世纪的信徒认作人类发展必经之路,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参照欧洲,尤其是西欧发展史捋出来的这套公式,从此成为世界各地革命史学家们的圣物。尤其是中国的革命史学家们,更是将这只圣“水晶鞋”奉为圭臬,为将中国革命这只大脚塞进去,不惜以修正中国历史去削足适履。

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根据马恩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顾准不承认这个主义是“马恩”的,而认为仅仅是恩格斯的,并且是被后来的俄国人争来抢去成为“斯家政治工具”的东西),资本主义没有高度的发达就不能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也就没有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提。而没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和理想”,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失去了理论上的根据。

这是万万不可的——中国历史必须有同样的、没有缺项的“脚”。

可是马恩之前,中国人哪里有什么“脚”的概念。远有司马迁、司马光,中有黄宗羲、顾炎武,近有钱穆、傅斯年,再通古博今,才高八斗也没有哪一位对这“脚”有概念。到了马克思主义由日本传入中国并勃兴起来的上世纪 20 年代,弥补这个理论上致命缺项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革命史学家们的头上,至于“找脚”、“修脚”、“补脚”的技巧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按图索骥、张冠李戴、生搬硬套……种种,都不妨一试。

1920-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弥补的开端,也是我的传主最初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事件。他的《进社纲领》,就是“内容参照社会史论战中中共新思潮派的观点,指出中国现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是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是社会主义”云云。在这场论战中,再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够比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商末周初(公元前约 1000 年)定为“可与希腊罗马相比的奴隶制社会”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在这块东方土地上生根开花的创造性贡献更大的了。郭氏自己则认为“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编”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1952 年他又发表了《奴隶制社会》,将奴隶社会的下限再次精确定位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公元前 475 年,更是与古希腊历史取得了完全的

同步。毛泽东先生则把这件史学史上的大事提纯为政治，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个“必须”和一个“应用”，一个“亟待”和一个“亟需”，倒是对“鞋”与“脚”的关系作了毫不含糊的注解。可是不妨来听听不同的声音：

“我们往往下定决心要找奴隶，所以竟有由甲骨文找到漫山遍野的奴隶的例证……像这样的凿空之作，在学术发展史上恐怕是很难找到第二个例的”雷海宗先生 1957 年 6 月 2 日的学术演讲

“唯物史观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论的认识》

这是中国非革命、非主流史家们微弱的声音，可前者是在台湾岛上发出的，后者则在发声后立即成了右派分子，五年后郁愤而死，和顾准一样未活过一个甲子。

有了“奴隶制社会”垫底，中国的“大脚”塞进德国的“水晶鞋”已经成功了一半。然而我的传主到了他“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的岁月，已经决不肯接受这一史观：

“中国史家的奴隶社会观，十分荒唐。甚至他们把‘前封建社会’（西周封建，应该仍列入古典社会范畴之内，不是 Marxism 意义中的封建。这里的‘前封建社会’，指西周及其后中国史家所称的封建而言）一律不要证据地归结为奴隶社会，说不如此就是反 Marxism。”笔记 248

“春秋时代，王朝也好，诸控国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释为奴隶制，其实是生搬硬套。”文稿 371

还不仅仅是不接受中国人的生搬硬套，就连“水晶鞋”本身——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都顶礼膜拜的“历史五段论”，他也看出了根本不是马克思的东西：

“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这个范畴，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谈“亚细亚的”，于是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完成了。”文稿 300

多么刻薄又多么精准。幸亏此人毫无话语权，否则岂不羞煞“人民史家”！

“中国的历史学家闭起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 文稿 301

真是“夏瑜”啊，头都快要被砍了，还要可怜刽子手“康大叔”，可怜等着拿人血馒头去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们。可怜归可怜，《奴隶制时代》还是很轰动的。紧跟着要做的，是将“封建社会”这一骨节儿塞进去——将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定性为“封建制”，以适应“水晶鞋”后面的尺寸。顾准更不买账了：

“Marx 关于封建主义的概念太狭窄，不能包括所有传统社会……举例来说，Marx 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时……就说得很牵强附会” 笔记 329；“倘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是绝对君权，就是专制主义，不是封建制度了。” 文稿 321

而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无疑是绝对的君主制，和西来语 Feudalism(封建主义)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将秦汉以后断代为“Feudalism”，曾被侯外庐先生斥为“语乱天下”，顾准更是断定“中国永远不会发生西欧式的封建制” 笔记 225。这也是顾准日后写出包括《马镫和封建主义》以及《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在内的一系列中西历史和史论比较文章的基本观点。

“语乱天下”归“语乱天下”，“会不会发生”也不必去管它，反正“封建社会”这一段总得塞进去，于是就有了周秦以降是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史论，被顾准鄙薄嘲讽得一塌糊涂——“就名辞本身来说，这是极可笑的。因为它把“中央集权”、“专制”和“封建”搞在一起，真正是在调和无可调和的矛盾” 笔记 21。

中国史家们，你们这种“好样的治学方法” 笔记 248，可真是太丢人了！这不是治学，更不是学术，分明就是“不入于杨必入于墨”的“意识形态”——不是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的就是 **Autimarxism** (反马克思主义) 的，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不拥护就是反动，就得专政，就得打压、消灭。这哪里是“治学”？分明是“治人”和“人治”。你们也太可怜了。

“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这桌满汉全席非调和出来不可，再无法调和也得调和，否则“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基础就有问题了。它果真也就被调和了出来，因为“极峰”、“极笔”认可了。

“水晶鞋”的下一个部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节很不好塞。

不过不要紧，既然前面塞进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下面按照俄国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国”、“半独立国”的定位，接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还是很顺理成章，很学术、很专业、很像那么回事的。这样一来就大功告成了，那么就让我们跳过“资本主义”进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吧，再迅跑几步，我们将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地上天国的理想就算是实现了。

可顾准却断定“中国历史纳入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削足适履”^{笔记 84}。至于 1910 年代中叶到 1930 年代后半叶（日本侵华之前），区区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实际上真正曾经萌芽过，并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法）玛丽格莱尔·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的时代，却又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完全地忽略不计或被断代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了。可顾准没有放过这短暂的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绝对君权的专制主义下面可以有资产阶级，但不可以有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专制主义管不到的租界里才‘萌芽’得出来，这岂不是历史的证明吗？”^{笔记 6}

天，此人也太法眼烁烁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在中国近代史上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他竟也看出了端倪。可是须知，顾准正是这转瞬即逝的年代造就的人物，怎么可能不洞察秋毫？就连日后被尊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旗手”的鲁迅先生，不也曾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她新兴的资产阶级身上吗？这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当然不能忽略，不仅不能忽略，还应该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大书特书。虽然——

“惋惜历史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懂得中国历史局面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其长处，它所背着的沉重的历史包袱，懂得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革命所要客服的这个历史包袱如何沉重，这是革命斗争所必要。”^{笔记 21}

承认、记录、书写和研究这半个世纪不仅仅出于“惋惜”，而是第一，它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的实存，你承不承认、记不记录、书不书写、研不研究都无关宏旨。你可以虚无历史，历史可从不因为被谁虚无就会放过他，该重演时它就会毫不留情地重演，不管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第二，它太值得总结和借鉴。在这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中，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

卢作孚们奠基了中国最初的、真正的大工业基础。他们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拓荒牛，也是 1949 年后中国那一点工业根基不容抹杀的播种人。他们也确实一人一人挨着个地被毛泽东先生赞扬为“中国 XX 业（例如轻工业、化工业、纺织业、航运业等等）不可忘记的人”，却一个比一个下场悲惨，今天来追问一个“为什么”都嫌晚了。第三，假如（当然历史最不能“假如”）中国再一次重演相同的历史（历史可最钟情“重演”）将会怎么样，最好怎么样，最不好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难道这些东西不值得探索吗？

从“公车上书”的 1895 年起算，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走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已经发生的一百年之路”的希望——以工商文明取代动乱、暴力、战争和阶级斗争并同样达到小康的道路。而且，不仅仅只是一个“希望”，它其实已经萌芽、吐蕊并且在差不多 15 年以后进入过一段被法国女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白吉尔称作“黄金时代”的好时光。只是这段好时光实在是太短了，短到完全来不及孳生强大到足以阻止一场异族的入侵。但是异族的入侵并没有使它夭折，抗日战争胜利后它曾竭尽全部的生命力去争取回暖返青，萌发新枝。可惜这一次历史给它的时间机会就更短了——在苏联红军枪杀张莘夫们的子弹声中，在国共血腥内战的大炮声中，在庆祝政权更替的秧歌声中，它迅速地枯萎、凋零下去，终于彻底灰飞烟灭了。

忽略可怜的、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套进“水晶鞋”的这二十多年，中国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总算还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说得过去的。此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一旦成功，中国就顺理成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历史的整只大脚就都套进圣“水晶鞋”了。

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向共产主义迈进这一件事情了。

这是一套完整的史观，却可怜并非原创而是俄国人“庸俗社会学”的中国式翻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和庸俗化起来，把社会看做是孤立、封闭和自律的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无限夸大阶级性，把一切社会意识解释成阶级性产物，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否定常识。但是因为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国”的理论基础只能建立在这套史观上，所

以在顾准的时代，它当然属于“政治上正确”的唯一学说，不但为中国每一个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所熟知，连“人民”也妇孺能说，翁媪会道，街头巷尾抓住谁，都能从“盘古开天夏商周”说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共产主义”，是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伟大功效之一。

可怜，可惜，熟知并非真知！

“政治上正确的一方，就历史学方面来说，实实在在证明了他们对西方历史的枢要之点的无知，以致他们不得不硬把西方历史的一套公式生硬地套到中国头上来。假如马克思有机会详细研究中国历史，他必定会引申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说。而扼杀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斯大林，实在是不学无术的人。他看不见使亚细亚方式等同于两汉社会形态，指出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沉重历史枷锁所能达到的政治结论，和硬把中央集权和封建连在一起的这个勉强的公式是同样强有力的。”^{笔记 22}

坚决否定“意识形态管理者”加在全民头上的历史观——把中国历史同欧洲历史套在同一框架里并得出关于社会发展的通用模式，进而在这种模式理论上建立权威主义的集权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是顾准成为一位政治哲学家最重要的一步。

顾准的历史观绝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关于这一点，在其早年的日记里就有表示：

“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不足以解释全部历史，比如中国大跃进的动力它就无法解释。”^{59.3.5.}

用其变种——“庸俗社会学”倒是解释得通，无非经济唯物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而已，这种狂热性正是出于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无限夸大。

“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原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有血缘关系的东西。这是不可以忍受的东西。”

60.元旦

越到晚年，顾准对共产主义哲学家们赖以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支撑点越是怀疑。这个支撑点是怎样从无到有，发展成型并强有力地支撑了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座大厦的？他怀疑这个支撑点并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倒是有许多论及之处，但是，

“这部作品是未发表的原稿，我们不应该要求马克思作严格的逻辑的讨论。他本来已经付诸老鼠去批判了嘛！可是从这里，可见马克思并不企图作出原始公社、奴隶、封建的三分法的铁硬框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说明了唯物史观的原则，至于那几种社会结构，所举的例多少是任意的：按

序言的目的来说，它本来并不企图对历史分期问题作具体的解决或讨论。”^{笔记 441}

看，他在为马克思开脱。他是常常为马克思开脱的，马克思也确实需要后人，譬如顾准这样的后人来开脱——后伟人们把他歪曲得太厉害，他老人家人在地下又无法辩解，就如他 1877 年写给俄国彼得堡《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所言：

“他们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段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们原谅，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恩全集》19 卷 P131}

这样的话伟人们是绝对不允许芸芸众生甚解的。甚解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有了纰漏，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诸如此类基础的基础会大大弱化，“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将成为笑柄，成为“真正是在调和无可调和的矛盾，极可笑的名辞”^{笔记 21}，制造这些可笑名辞的伟人岂不也是和斯大林一样成了“不学无术的人”^{笔记 22}？

顾准甚至看到，中国有个范文澜先生，他所掌握的史料、他的知识、意识和理智都在告诉他——Oriental Dispotism（东方式专制）和希腊—罗马、欧洲类型的社会肯定不是一回事，可是在为了“政治上的正确”却不得不服从“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虽然他“绝不愿意把中国古代文明列入似乎低人一等的东方范围之内，可无论如何，他一定会自承他的论证实实在‘勉强’。原因是，他对西方历史并非完全无知……这点他是看得清楚的。证据之一，就是他力称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笔记 84}。

顾准不惜精力、时间、笔墨，把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版本从 1949 年第一版（第一编）考察到 1965 年第三编（最后一编），一条条对比，一条条分析——他“曾经怎样写过”，“改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改写”，“增了什么东西，删去了什么东西”，“重大的历史观点改口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改口”……仅此一件事情，他就写下了一万三千多字的读书笔记，一时间弄明白了多少史家的言不由衷和所谓“史实”的蹊跷。

此人真是会读书！

顾准对马克思的诸般“开脱”在这里也显得格外珍贵——老师对欧罗巴历史所做的学术分析硬

被人生扣在亚细亚头上并成为“斯家工具”，这不是老师的错是“斯家”的错，是“斯家们”的错！斯家们个个口称日后要“去见马克思”如何如何，真要见了，未必不被他老人家大嘴巴子伺候，真为各位“斯家”担心呵。

（这里“斯家”可能有两种解释：斯大林的“斯家”和“后伟人们”的“斯家”。由于顾准光说不解释，我情愿相信后者。请读者见仁见智。）

对老师开脱归开脱，学生顾准却不肯撒手放过多年的怀疑。在反复深读老师的伟大战友的伟大著作《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后，这位学生发出了严厉的质问——

“根据我们对于归纳法所作过的透视，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所得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你曾经观察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事变，你能超过这个或然性，主张你有权“创造”——不对，按照唯物主义，成该说‘发现’，至于‘创造规律’则是唯心论了。——好，（就）说“发现”吧，再问一句，你根据多广泛的观察，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 文稿 451

话说到这个份上他还不打算收声，又不依不饶、斩钉截铁地加上了一句：

“这是哲学的质问” 同上！

是的，给他的老师马克思带来了无数的荣誉和同样多侮辱的这套历史哲学理论，顾准从疑问、诘问到质问、责问，网越收越紧了。

他是不会放过这条大鱼的。

2. 再来一个科学的质问！

先暂时放开“哲学的”，也是顾准的对“历史五段论”的穷追，放开这条“大鱼”，说点关于我的传主性格的话题。顾准一生都活得很高傲。无论在世、离世和离世多年以后，但凡人们提到顾准，几乎把含有“傲”字的形容词都用尽了——“孤傲”、“桀骜”、“傲世”、“傲物”，还有“傲慢”——他确实傲慢，对于无法对话又蛮横不讲理的人，他能在“傲”的同时干脆视你为无物。

除了“傲”他还“狂”——什么都敢质疑，什么都敢臧否和评论，嘲讽功夫更是好生了得，直追鲁迅，但又不是鲁迅那种落在众生头上，落在国民性头上的臧否和嘲讽。被他下了狠笔的人物都比华老栓、阿 Q、九斤老太、豆腐西施们高高在上一万倍，例如恩格斯、列宁、例如斯大林，还有极峰。

除了“傲”和“狂”，他还“笨”。

他从不大写意式地反对或者赞颂一事物，他认为那是“知性”上的哗众取宠，既不诚实，又不体面。与绝大多数因为“太聪明而懒得穷根究底”的同胞截然相反，他不稀罕聪明，聪明靠教条也能得到。他爱的、追求的是智慧，而人追求智慧往往就起源于对教条的怀疑。他欣赏古希腊人“格物”时的那一种“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的“穷根究底的笨拙的憨态”^{文稿 369}，他情愿像他们一样笨拙地低下头来，对想要弄清楚的事物层层剥皮，像“剥洋葱”，从最外面一层薄翳一直剥到芽芯——它来自哪里，怎么来的，为何长成了这般模样……，一层层剥下去，一条条记录在案，去伪存真，定夺取舍。他说，“剥皮不是容易事，要花费大量劳动。”^{60.2.21.}

看顾准“剥洋葱”是件十分过瘾的事情。那就先收住关于他的性格的题外的话，从他剥“自然辩证法”这颗洋葱说起吧，因为他的“哲学质问”所诘之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最强硬的支撑点就是这颗“洋葱”。

他下手起势就狠，“哲学的质问”话音未落，紧接着就是一句——

“再来一个科学的质问”^{文稿 451}！

从 1950 年代党校时期对“辩证唯物主义”产生怀疑和反感（这个本书前面章节已经讲过很多，不再重复），这颗“洋葱”被顾准穷追不舍地剥了十多年。到 1973 年 8 月，顾准和六弟陈敏讨论辩证法问题的通信显示，他已经剥出了它的芽芯，看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被封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最初只是一篇书评，是 1859 年 8 月后者为前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书评。而这篇书评——

“其基本的调子和三十年后的‘On Feuerbach’是一模一样的。

甲、它首先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名词，而在 1859 年以前马克思的文献中没有

见过。以后也没有见过；

乙、它提到了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这些名字准确无误地重复出现在‘On Feuerbach’上面，这些都是 Engels（恩格斯）认为从 Hegel（黑格尔）倒退之处；

丙、它要求发展一种‘比之前所有的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同时又强调 Hegel 体系的巨大的历史感的基础，并要求改造 Hegel 体系中的‘从无通过无到无’的特点，并把这种唯物的世界观同 Hegel 思想结合起来。

正是这三点，就是后代哲学家赖以建立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地方。也正是这三点，使 Engels 晚年从事他那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企图以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治整个‘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笔记 597}。

必须花一点笔墨，先把顾准文中“On Feuerbach”的概念弄清楚。

1845 年马克思著《费尔巴哈论纲》一文，但生前从未发表。马克思死后五年的 1888 年，《论纲》作为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件第一次面世。在中国，恩格斯此书被简称做《费尔巴哈论》，英译也是“On Feuerbach”，令人极易与马克思 1845 年所著《费尔巴哈论纲》相混淆。顾准的文字每每论及此话题因为大多使用英文，也不免令人有混乱之感，但如能认真阅读前后文还是能够分辨出他何处指马克思之《论纲》，何处指恩格斯之《论》的。上面所摘他的笔记，“On Feuerbach”所指无疑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而非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仅从“三十年后的”这个定语即可确定。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到，世界马恩研究学界一直就有一种说法，甚至可以说是“一桩公案”——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马克思 1845 年春写下的原本，一个是四十多年后恩格斯的修改本。两个版本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哲学论点上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个放在稍后展开。

话说回来。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越俎代庖”，顾准一向颇有微词，又尤以这一部《自然辩证法》为最。这在 1959 年的日记中就出现过：

“无论如何，辩证法作为认识过程的描绘与认识规律则可，作为世界图式则不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公布对恩格斯本人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那里充满着黑格尔的图式向自然界头上套下去的片断。80 年代前恩格斯曾有此企图，无论如何，费尔巴哈论以后，他是一直没有理睬哪些片断旧稿，而哪些片断旧稿的观点，与费尔巴哈论也是不符合的。Adam Smith（亚当·斯密）临死前要求

人家把旧稿完全烧光是必要的。”^{59.3.5.}

在反复阅读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十一条）》、《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附后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他对这桩“公案”心里更有底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自然辩证法》跟卡尔·马克思先生的辩证法哲学，即便不能说是南辕北辙，也至少“差别是极其显著的”^{笔记 598}。更别扭的还在于，这是一部未完成且“分明是不想发表的草稿”。马克思生前能否同意、是否同意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都很可疑，更别说“自然辩证法”这个新名词了。

其起源仅仅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书评的这部著作，却竟然“企图以‘比之前所有的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治整个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笔记 598}，顾准刻薄地将之称为“妄想”和“梦呓”。

从 1859 年的《书评》到 1888 年的《费尔巴哈论》，顾准看出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来将自然界一以贯之”。他不禁大吃一惊。

吃惊的不仅仅是中国人顾准，生下这一“巨蛋”的母鸡本身也被自己的产品吓住了——连恩格斯自己也自嘲地说他是在“跟着杜林啃酸果”，并且宣称是这是“从 Hegel（黑格尔）后退了一步”。可这并未妨碍他在著作中宣称“自然哲学告终了，凡想复活这一哲学的一切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后退的”。

但奇怪的是写下这部书的恩格斯却迟迟不愿发表，直至著者去世，它依然是一部手稿。恩格斯去世于 1895 年，是时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已成气候，假如恩格斯愿意，这部手稿的出版是毫无问题的。但他并不愿意。恩格斯对这个被自己称作“酸果”的东西是不自信和不确定的。

七十多年后有位名叫顾准的中国人看出了这种不自信和不确定——这颗“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的“酸果”纯粹就是“妄想”和“梦呓”。最初的梦呓者是黑格尔，“杜林跟着效法，更是梦呓”，到了恩格斯跟着杜林再“啃”下去，一半是“也还想要搞出一种指导科学的哲学来”，一半是“不得

已”（为何不得已，顾准没有说明。特希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译专家们能解开这个“百年之谜”）。也正因为此，恩格斯分明是不打算发表这手稿的。况且“文字”不是“行为”，尤其是作者生前根本无意发表，也没有授权、授意死后发表的文字。

也确实在他死后的三十年内，后来形成此书的手稿都没有发表。但是大不幸，他也没有在生前销毁。

到了1920年代，深藏在故纸堆里的《自然辩证法》被苏俄孟什维克（少数派）哲学史学家德波林“硬挖”了出来。他如获至宝，立即“大肆鼓吹”，“想抬出恩格斯增加哲学的权威，要用哲学来指导一切”。“那是一场悲剧”，顾准用一种怜悯的口气说。

悲剧归悲剧，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斯大林却“不能忍受（德波林的）这份狂妄”。这只被杜林、恩格斯和德波林相继啃过的“酸果”，最后被斯大林抢到了手。

“斯大林……把（这个）哲学武器没收过来，成为‘斯家政治’的工具，其结果就是《联共党史》中有名的那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幕，已经是喜剧了。”以上凡未注明出处的黑体字均

出自文稿 449-450

顾准将之嘲讽为“梦呓”和“妄想”的这颗酸果，就这样修成了正果。

几乎在顾准剥洋葱的同时，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英国人戴维·麦克莱伦写出了一部新的《马克思传》。1972年，也就是顾准从息县干校回到北京那年，它的第一版出版，后来多次再版。这是继1918年以德文首次出版梅林的《马克思传》后的第二部涵盖马克思一生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2006年它的最新版本（1995年版）译成中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被誉为“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

该书在谈到马克思最后的十年里与恩格斯的某些区别时，再明确不过地作了如下表述：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接近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这一倾向，开始于《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延续，并在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达到顶点。正是这一倾向，代表着作为哲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是客观规律，尤其作为实在的基本要素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的辩证运动的规律。这与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例证迥然不同。恩格斯一直有着这种对自然科学范

型的倾向，马克思却并非如此。例如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 戴维·麦克莱伦（英）《马

克思传》442

作者紧接着讲述了一件轶事：马克思希望把《资本论》第二卷献给达尔文，却被后者以“接受一位公开的无神论者的著作会伤害家人感情”为由婉拒。紧接着作者话锋一转：

“但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并不说明他用了与达尔文研究自然一样的方法着手研究历史。因此，恩格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误导。” 该书 443

无疑顾准看出了这种“极大的误导”，不但自己未被误导，还要像那位英国人戴维一样，先是探究，后是指明这种误导。

像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顾准首先下了探针的，就是“辩证法”、“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这三个“痛处”。

“因为这其间包含了严重的自相矛盾。让我从坦率地指出自相矛盾开始。” 文稿 451

恩格斯反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其哲学体系不可以用经验来证明。这“很好，很中肯”。可是，顾准穷追不舍地问，那么黑格尔的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来验证的吗？好，您说能，因为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我暂且同意。可是，弗里德里希先生，你哲学家能有多大能耐，你曾经观察了宇宙上下古今往来一切事变，就敢说超越了“或然”而达到了“必然”？那你把归纳法——“凡是人从客观世界观察所得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而决不可能是必然的规律”置于何地？就算你能超过这个或然性，主张你有权“创造”——哦，不能这样说，按照唯物主义，“创造规律”就是唯心论了——好，就说它“发现”吧，那我可就不得不再追问一句了——“你根据多广泛的观察，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 此节全部摘

自文稿 451，仅为前后文衔接作了语气修改

“这是哲学的质问。” 文稿 451

这“哲学”的探针下得可真够狠的，深度不输戴维。但他不如人家英国绅士戴维先生厚道，除了指责，他还要加上热嘲冷讽——“……Engels（恩格斯）本人的哲学思想，先知的成分本来就稀薄

很多，所以，‘定稿’性质的 On Feuerbach 强调唯物主义，强调真理的历史性和人类进步的无限性，而避免像 Hegel 那样的体系化。” 笔记 696

戴维先生还是很有分寸的，顾准一句“先知成分稀薄很多”，至少在中国语言中是不大厚道的。不过相对于这种类型的、在重大政治哲学命题和理论上东、西方思想家不谋而合的重大意义，顾氏的“不厚道”，请读者厚道一些，不妨先忽略不计。在此，无非西方人戴维用了十分规范的哲学行话——动词“范型”，东方人顾准用的是不规范的名词——“图式”和市井一些的动名词——“套”罢了，内涵是一样的。在一个封锁、闭关的时代和国度，这种不谋而合尤其显得不可思议和弥足珍贵。

至于列宁以及斯大林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蛮横诠释，顾准就更不客气了。对俄国人在历史学和哲学上的蛮横，他甚至用了十分极端，也十分不雅观的“强奸”一词（见上节《历史的哲学质问》）。

不要以为到此顾准的探针到此就算扎到底了，还没完呢，还得“再来一个科学的质问” 同上！

“质量互变规律，你怎样解释？现在物理学定义逐渐有全归于数量化的趋势——光波、声波、电波——燃点、熔点、氧化点——温度、压力——光谱分析、天体的光谱分析等等。物理学定义数量化 ≠ 质量互变规律。

同样的质问可以适用于另外两个辩证法规律。” 同上

恩格斯的这三个规律，其实是他所指责的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的逻辑学的三个世界——，存在论、本质论、总念论的精华。他指斥这种世界模式论是先验主义，然而一转身又把这种世界模式论的精华撷取过来，称之为辩证法，称之为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后来又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呢？

“假如近代科学死守住辩证法三规律，它老早停滞不了。” 文稿 452

把某些“图式”形式的命题规定为人们思考必须依据的教条，控制（或者缓和一些，叫范型）一切思考的表达方式，这种作法只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将人置于一种绝对的，毫无掩饰的暴政之下。顾准一生都在致力于摆脱“教条”这架制动器，他绝不允许别人在自己“脑子里跑马”，而要自己在自己脑子里跑马。谁要是想给这匹烈马上“套”，难！难！！难！！

来看看这“马”怎么个“跑”法，那可真是精彩绝伦——

“在中国”，他接着说，“这幕喜剧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关于‘坂田模型’的圣旨。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新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有于光远指导下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你读了杨振宁与记者的谈话了吧？这种新哲学体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文稿 450}。

“喜剧化的喜剧”？那岂不是闹剧？啥意思？接着来看——

“坂田模型”在当年（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也算是个不小的事件。

坂田者，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1955年发表了著名的基本粒子“坂田模型”——按照物质无限可分的唯物辩证观点，他批判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始原的观点，认为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并提出了一个基本粒子复合模型，亦称“坂田模型”。

“坂田模型”因为与《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不谋而合引起极峰极大的兴趣而迅速在中国哲学界走红。伟人亲切接见了这位“建模”人并口传“圣旨”——“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授意在中国大肆宣扬。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于光远处长立即组织一彪人马在中科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办了《自然辩证法》刊物（此杂志如今还健在，改名为《自然辩证法通讯》），准备开展大规模研究，期望能建立中国自主研发的、包罗自然科学哲学体系在内的新哲学体系。更有甚者，中国哲学界竟以此为据，以“物质无限可分”说划线站队，这就是著名“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阶级斗争学说。持“无限可分”说者是革命的，例如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先生，持“不是无限可分”说者是反动的，例如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刘耀阳先生。

中国此刻太需要自己的黑格尔、马克思了，至少要有“自己的恩格斯”吧，否则怎样取北方已经“修了”的老大哥而代之，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圣地呢？

正在此时，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出现了。正是这位真正的粒子科学家的出现，牵出了“自然律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是否为人所夸大”、“规律和归纳”、“或然还是必然”等等巨大的夹缠，尤其是他带来“相对论”创立者，伟大的爱因斯坦对《自然辩证法》一文无情的否定——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托付我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

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任何特殊的趣味。可是，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考虑到这部著作对于阐明恩格斯的思想的意义是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勉强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以及，在俄国人看到爱因斯坦此言后极为恼怒地指责伯恩斯坦并未将恩格斯手稿全部送给其阅读而仅仅送去了一部分时，爱因斯坦亲笔写信给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再一次坚定而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态度：

“爱德华·伯恩斯坦送来全部手稿要我出主意。我的评价是对全部手稿而说的：我坚信，要是恩格斯本人能够看到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后，他的这个谨慎的尝试竟被认为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会觉得好笑。”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

这位真正的、无可非议的自然科学家不啻给也想跟着“啃酸果”的人们兜头浇下一盆冰水，令正在兴头上的中国人大失所望。不过也可能是他们忙于更高层次的唯物辩证运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项目的前期准备，反正“模型”无疾而终，1974年5月极峰接见与杨振宁因共同命题共获诺奖的李政道时已绝口不提“坂田模式”，如今也鲜有人还记得坂田昌一先生。

更有趣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多年没有听到“自然辩证法”一词了——早在1990年代初，它就已经被悄然“修正”为“科学技术哲学”了。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在恩格斯和杜林的时代，这一哲学领域原本就叫做“自然科学哲学”。

可不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闹剧！真是个没有创造，却对创造有着最愚蠢瘾头的时代。难道人真能发现这个世界绝对的、普遍的规律吗？

“Tolstoy（托尔斯泰）说得对，人的自视是分数中的分母，分母值愈大，分数值愈小。居里夫人说“砂子”，我实在不由得敬仰她！”文稿450

常被人认为“自视甚高”的顾准，却在哲学的层面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视甚高和夜郎自大——“自然界如此浩瀚广阔，丰富多彩，你能添一粒砂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一以贯之，那简直是梦呓”文稿450。

他蔑视所有这样的梦呓，更遑论去相信。也正是这种不相信、不盲从、不人云亦云和蔑视，令他

戴上了所有带有“傲”字的荆冠。

除开“自然辩证法”，他还敢剥“辩证法”这颗格外辛辣的大“洋葱”。

找准了下手之处，他从中国自古有之的古算、周易和始自周朝史官李聃（老子）的“道”，到布莱尼兹的（二进制）电子计算机，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普遍性几达极限”的辩证法三定律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到毛泽东的《矛盾论》……，笨拙而不懈地剥了下去。

也只有这样的笨人，当他抬起头来时才敢说——

“（中国古算、周易、老子的‘形式逻辑’、‘朴素的辩证法’等）不仅使中国哲学具备十分特殊的性质，也使中国的所谓逻辑具备十分特殊的性质。它既使 Leibniz（二进制发明者莱布尼兹）惊喜交集，也使中国从来不去认真分析事物间的关系，却常常是高度综合的。中国人实在聪明，中国人又实在太不严肃认真……” 笔记 163

“否定的辩证法作为一个普遍命题是不对的” 59.2.23；

“（《共产党宣言》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整个是辩证法。它为革命的辩证法挣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荣誉，也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挣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荣誉。（然而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一切工人们互相联合起来达到最高度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生存未受致命威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威胁来自别的方面，并不来自工人的团结。” 笔记 492

“列宁……在辩证法方面实在是无知的” 59.2.23，（因为他）“坚持恐怖主义——专政这个方面……其实各方面是列宁主义，非复马克思主义了” 59.2.25；

……

这些话语彼时不但是反动和忤逆，简直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可时隔还不到半个世纪，它们不是又都成为常识了吗？

除了“自然辩证法”和“辩证法”，顾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集权、专制与无产阶级专政”、“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唯理主义与唯物论”、“辩证法与神学”、“自由与民主”、“中国历史与现实”……这些极神圣，极辛辣的洋葱头，无一不是像对待《自然辩证法》和“辩证法”一样——一层层地剥皮，一层层地观测、嗅探，全神贯注、潜心涤虑，哪里顾得上擦一擦横流的泪水。

人，假如你还在读书，请今天就开始读顾准，凑近这个笨人剥洋葱的手，和他一起观测、嗅探，一起流泪，一起体验精神解放的欢乐吧。

3. 西奈山的上帝（上）

受马克思·韦伯的影响，顾准对科学上“知性的诚实”要求非常高，这当然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剥洋葱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地为此付出了的代价——痛苦和眼泪。可等剥到最后，剥到胚芽，看清一切，等他抬起头来，擦去泪水的时候，那些“知性上不诚实”的东西就要倒霉了，它们的秘密被暴露，所有的伪饰以及由这些伪饰引起的无知都只能任由那支无情的史笔痛殴。这又给他无上的快感。

无论是谁，他从不厚道，只除了一个人。他对他不但手下留情的，还数次为其开脱。此人就是卡尔·马克思先生。顾准一生都尊重这位并未和他活在同一时代，且观念常常不相同、甚至非常不同的同道。

在顾准的故土和时代，马克思是一尊金子铸成的巨大偶像，不可冒犯、不可碰撞、不可触摸。比起莱茵河畔的家乡，他在遥远东方这片从未亲近和熟悉过的土地所受到的膜拜，是他生前绝难想象的——那是一种对神灵的崇拜。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宗教。

虽说泛神教的中国人对宗教自古以来都不是很认真，就像“梁（启超）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文稿 P243}，但是“30—40 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文稿 244}

顾准口中“30-40 年代宗教式的狂热”所追求的，就是马克思为普天下众生指出的，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马先生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无产者的上帝。

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问世（拜俄国人所赐）之日起算，在尚不到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新学说—

——新宗教在他的西方故土已日见式微。时间到了 1960-1970 年代，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和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破绽和先天不足也愈来愈被西方的政治哲学家们发现和诟病，只是由于中国始自 1949 年的闭关自守，学界，特别是哲学界对此鲜有所闻，不过即使有闻，也不可能会有任何声音的发出。

但是顾准有“闻”，不仅有闻他还有“知”，不仅有知，他还发出了声音——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虽然这声音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真正被人们听到，但即使完全不用诉诸时代的苦难和艰险，这声音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更有些观念和观点堪称刚刚“破题”，即使今天，别说答案，连解题的公式都还没有找到呢。

一直在阅读西方学术书籍和期刊的顾准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思想界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些书籍和期刊主要来自“沙漠之井”——宗井滔。

作为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先生同样身陷文革的红色恐怖之中。好在他是个党外人士，一生只做学问和为做学问的人们做“嫁衣裳”，从不和“政治”沾边。他想尽一切办法钻书报审查的空子，以“工作需要”为借口，将被“人民”疏忽而忘了废除的“科学院各图书馆馆长有权力和经费自行进口国外对口学科前沿研究成果的书籍，订购对口学科期刊”的政策用到了极致，千方百计为经济所图书馆购进各种西方当代经济学书籍，同时不间断地订购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原文期刊。出身原中央研究院，作过彼时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的秘书兼打字员，宗先生自己的英文水平就很高，加上五十年代起又自学了俄文，他的选择往往是慧眼独到的。还好在书报审查的口子对外文的东西比较松懈，倒不是“人民”网开一面，而是由于“人才”匮乏，最好的人才都被派去担任更重要的世界革命工作，例如钱钟书被委派去翻译毛著，而差一点的人才根本就做不了这个艰涩的工作，“人民”管不胜管，涓涓细流“不幸”就渗进了这口“沙漠之井”。

正是拜这口“井”的滋养，苦旅中的顾准从未有过极度饥渴的感觉。这头骆驼的“水囊”总是最大，步伐也因此比整个驼队快了许多许多。多年以后，人们，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人们把顾准称作先知，却不明白骄傲地定位自己是“经验主义者”的他，许多东西都是“后知”的。

例如他很早就阅读了弗兰兹·梅林英文版的《马克思传 (Life of Marx)》——

“在哲学的历书上，普罗米修斯是最崇高的圣人和殉道者。这是马克思的挑战的序言的结语，甚至他的朋友 Bauer 都吃了一惊……”

Mehring: Life of Marx, pp. 25—37” 笔记 651

这本写于一百年前，以“走下神坛的马克思”为其视角，曾经在考茨基和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阵营掀起过轩然大波的著名传记，对中国的顾准影响非常深。他的读书笔记中有大篇幅摘录和关于梅林的文字，例如：

“Mehring (梅林) 评拉萨尔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近似的说法，就使 Mehring 把 Marx 学说的核心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 Mehring: Life of Marx, p. 345 (梅林 《马克思传》 P345)” 笔记 P643 ；

“Mehring 论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 和第一国际关于巴黎公社宣言的区别和 Engels 其后的改正…… 《马克思传》， pp. 497—9” 笔记 646

等若干处。他甚至根据梅林笔下的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斯多葛学派和启蒙思想的不同之处列出了下面一份对照表^{文稿 654}：

	“Stoics (斯多葛派学者)	启蒙思想	Marx (马克思)
对象	罗马权力	封建制度	市民社会
目的	内心和平 (Stoics) 来世的和天国的幸福	自由平等博爱以及	推翻异己的物的力量的统治
动力	使徒、教会	末流的自我意识哲	统治
(基督教)	学的“自我陶醉”	全民——实质是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最后一个被压迫阶级”

有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如此开阔的大视野，就在无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早已衰落的 1960-1970 年代，在“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录歌”正被全体中国人万众一声高歌不已之际，顾准已经看到：

“在西方，Marxism (马克思主义) 在复活 (见最近的参考)，复活的是 Marxism 的‘破’的一面。它的‘立’的一面，后人固然有歪曲它的地方，然而它本质上是 Hegel (黑格尔) 主义的，那是

无可讳言的。” 文稿 444。

他已经超前不止一步地看到了一次明显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不仅如此，他还看到马克思主义在“立”的一面是薄弱的，是基本没有跳出黑格尔主义范畴的——“娜拉”出走问题不大了，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解决。

顾准初识马克思是在少年时光的上海。不足 13 岁的他刚刚从对“安那其主义”的“热烈吸收”中冷却下来，日本人河上肇通过他的《经济学大纲》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立即填补了这一空白。接着的经历：中国社会史论战——进社——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职救——孤岛文委——新四军——上海——洛阳等等，前面的章节都已详述。在这些过程中，顾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并没有占到很重的分量，他还是一位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对新宗教——马克思主义，新教宗——马克思虽然谈不上狂热，但也确实是独尊的，至少认为在政治哲学领域内是唯一正确的学说。

顾准真正思考马克思和他的主义，始自 1950 年代中的中共中央党校时期，始自他对《资本论》的“惊艳”（可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二章第二节《圣者与圣经》），也因此对社会主义还有没有、要不要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开始了最初的、政治哲学角度上的追问。

再后来，他写出了骇世惊俗的《试论》，经历了反右，赞皇、商城、清河劳改，重回经济所接触西方经济学思想、四清、文化革命和息县干校劳改一系列真正的“社会实践”，名符其实地通过“眼、耳、鼻、舌、身”的密切接触，更重要的是通过大脑的思维，他对马克思主义（自 1957 年始他绝口不再提“马列主义”，除非在那些“坦白交代”、“罪行交代”的假话中。他根本不认为“马”和“列”是一回事）有了重新的认识。他不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学说。在依然把自己视为马克思学生的同时，顾准更将马克思视作了同道、同好和诤友，是能够平等对话的两个平等的人。也只有平等才能对话，只有对话才能了解，而了解了，就不可能迷信和膜拜。

顾准最欣赏马克思的，首先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也许是在所有学问中最不可能出学问英雄的一门学问。这是一门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所谓“定理”的学问——既不像数学、物理、化学那样，其基础理论很难撼动，也不像文学、艺术、历史那样，有许许多多毋容质疑的大师矗立在前。经济学是一门随着社会的进步或退步变幻无穷的学问，甚至可以说是一门相当吊诡的学问。昨天的“大师”常常是今天的“小丑”，明天却又很可能成了“先知”。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体系，观点，理论是最容易过时，最容易被时代和社会从吹捧、迷信、盲从到嘲讽、诟病、厌恶并抛弃的东西。

然而经济学又是一门最可能出革命英雄的学问，这第一位革命英雄当然是卡尔·马克思先生。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资本论》，尤其是她的第一卷，首先是一部宏大而自成体系的经济学巨著，是完全原创并极具创造性的、影响了数代人并还有可能继续影响下去的、在经济学史上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的巨著。

顾准初读《资本论》，就禁不住地惊呼她的“精美绝伦”^{55.12.1}。他赞叹马克思是“高超的圣者”^{55.12.16}，这样的“最高级”形容词从未被他用在第二个人头上（除了“坦白交代”类假话）。他敬佩并倾慕马克思精妙的思辨能力、严密而强大的逻辑能力和高超绝伦的表述能力，再说句不大得体的话——也不排除他对马克思经济学自成体系的暗羨。他把这位先生当做老师，当作治学的典范，同时又当做同道和同好，你看他不是还“自作多情”地“深深同情自 1842 年以后 Marx 的独立特行，以及不幸，他老是碰到金开尔、伏格特、Proudhon（普鲁东）、Lassalle（拉萨尔）这类人”^{笔记 495}吗？

但是随着徐徐而平静的精神成熟，学生顾准逐步对先生马克思有了疑问：

比如 1845 年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时前者 27 岁，后者 25 岁。1967 年，他们年过四十的中国学生顾准这样问到——

先生，“《（德意志）意识形态》说过许多未经证明的理想主义，但那是没有出版，并不肯示人的东西”^{笔记 351}，对吗？您生前不愿示人却被后人硬从您已无法控制的遗稿中挖出，编辑出版，以壮他们自己的理论声威，在我所看到的您和恩格斯先生的合集中已经发现好几处了。比如我就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公布对恩格斯本人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那里充满着黑格尔的图式向自然界头上套下去的片断。80 年代前恩格斯曾有此企图，无论如何，费尔巴哈论以后，他是一直没有理睬哪些片断旧稿，而哪些片断旧稿的观点，与费尔巴哈论也是不符合的”^{59.3.5}。对吗？

先生，《自然辩证法》的出版，那是拜俄国人德波林所赐，后来又被斯大林据为己有。而它传到中国后加上“中国化”的诠释，更是被奉为改造自然，改造人类的圣典了。可是我特别尊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先生却在阅读了全文后，对交给他手稿并请他评价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说：“我的意见如下：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起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任何特殊的趣味。”《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先生，您的乡党和晚辈，“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远不是一个偏隘的物理学家，而是一个具有广阔眼界的科学家，他就否认辩证法对他的科学事业有过任何用处。相反，在辩证法盛行的中国……” 文稿 446

我只好有些省略号。怎么说呢先生，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下去了，请您原谅吧。所以我现在理解为什么“Adam Smith（亚当·斯密）临死前要求人家把旧稿完全烧光是必要的”了^{59.3.5}。

先生，“人是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青年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龄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文稿 431。

我非常看重《安娜·卡列宁娜》中仅仅是个配角的列文，先生，他太像我了。几近自杀的列文说：“不知道我是什么，我就无法活下去”，我也是这样。但列文没有上吊或者饮弹自尽，而是挣扎着活了下去，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俩活下来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弄明白——“我到底是什么”。

先生，他接着和他对话——

“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青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 文稿 432。

“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文稿 431

也就是说，我克服了信仰危机的途径，就是那条崎岖的小道——被您的主义的理论家们说成是“绝路”的经验主义。

还有好多疑问，先生，我会一一问来。

特别是对马克思先生的早期著作，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顾准的疑问最多。

1843年，25岁的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重量级文章，并在后者的结尾部分高亢地宣布了无产阶级的命运，那就是砸碎身上的锁链，赢得全世界。

“导言用一种反映马克思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式顺序排列了主题：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革命的。总体讲来，导言形成了宣言，其敏锐性和独断性使人想起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戴维·麦克

莱伦《马克思传》

顾准问道：

先生，您“为了驳斥黑格尔，指责他把‘普通的经验’说成‘现实的理念的定在’是荒谬的，这是致命的驳斥。可是，‘普通的经验’为什么又不能成为‘理念’（如果套用黑格尔哲学术语的话）呢？前面不是已经说，‘普遍经验的规律’应该就是‘普遍经验本身的精神’吗？”笔记350

顾准不能理解青年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曲解”黑格尔，“从反对黑格尔来说，这个打击是致命的”笔记350。他温和地试探着，坚定而勇敢地向先生马克思提出请求——先生，请循其本，愿闻其详。

同时代的西方，在德国和奥地利，此刻有一种比顾准严厉一千倍的质问来自马克思《早期著作》（*Frühschriften*, Kröner, 1955）的编辑们，他们这样谈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Law*）的研究：

“假如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述，我们可以说，马克思藉着仿佛是故意的误解，把黑格尔那些作为观念之述的所有概念看作是事实的陈述”。

马克思这位中国学生则在读书笔记上用粗大的黑体字标注：

“黑格尔：历史发展不得与概念发展相混淆” 笔记346

闭塞、专制的东方与自由、民主的西方在基本相同的时间里发出了基本相同的声音，不可思议又

颇具必然性。

此时已经熟读了英国经济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美国经济学家瓦特·罗斯托的《发展经济学》系列著作的顾准，已经开始用更开阔、更深邃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绝无用晚于马克思时代的科学家，新人、新观点去诘难老师的意思，但是老师的学说并非仅仅是学术的观点而是斩钉截铁的预言和断言，预言和断言着人类的未来——谁必将胜利，谁必将灭亡，“人民”——无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怎样怎样，将会如何如何，被中国的“人民”奉为行为标准、准则、法度的土圭和水臬。

这，他就不能不打破砂锅“纹”到底了。于是他接着问：

先生，您“把国家说成家庭与市民社会的理念；可是，从这一命题就不禁要问，为什么目的倒变成手段了呢？”^{笔记 350} 您为何一定要如此坚决地否定欧洲文明，也是基督教文明独特的产物——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呢？您把“市民社会”和“私有制”画上了等号，对于后者您是深恶痛绝的。可是您“对市民社会的愤激之谈，并不是历史的描述”^{笔记 378}，也不是历史的事实，更不是发展的事实啊。您看，“市民社会的发展愈来愈多样化，并未直线地走向它的否定”^{笔记 467}，这一点在您还在世时就已经显明了。譬如在您的故乡德国，还有日本，也许还应该加上帝俄，市民社会朝气蓬勃，还因此而发展出了一整套经济学，其中就有您的故乡人（好像还是您的前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先生的“贸易保护”说。而您得出的结论却是：

“宗教的批判一定要进展到政治的批判，而政治的批判则一定要进展到经济学的批判（即市民社会的批判）……要彻底和 Hegel（黑格尔）相决裂，就必须使市民社会返归于政治领域，使政治领域内的平等、民主等等也得以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内完全实现出来。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彻底否则市民社会。”^{笔记 354}

学生不禁惊呼了一声，

“好大胆的结论!!!”^{笔记 355}

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呢，先生？他嚅囁着，却一点也没有要停嘴的意思——而我，假如您能允许我对未来的社会说一句话，我至多只敢说那将是“实行分工的、无私有制的、领工资的社会，但工

资是有差别的”^{笔记 449}，那只能是公民社会，是尘世的和普世的。我不相信人类能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国，人类只有进步，无论如何我也看不到、不相信任何从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所谓“终极天国”。和您描画的伟大天国相比，这很卑微、很鄙俚，但我短浅的眼光和绞尽脑汁思考的结论只能是这样，真是对不起啊，先生。

您“1844年还在追随 Feuerbach（费尔巴哈），以“人”为本位，1846年，已经分析了市民社会，扬弃了市民社会了”^{笔记 391}。您在《费尔巴哈论纲》手稿中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实自己思维的真理，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文稿 441}，您这里谈到的，“可不是纺纱的骡机、蒸汽发动机和电灯电话之类的真理性，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性——请注意，（您）在这里用上了‘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几个字，就其意味着异化的消灭而言，翻译成‘在地上实现天国’，应该确未歪曲（您）的本意”^{文稿 441}吧？于是紧接着，1848年您和恩格斯一起发表了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如今在我的国家已经成为不可探究、不可改动、不可触摸的“第五”福音书——，而它：

“（一）否定“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道德前提，利己主义=人道主义；（二）承认它的进步作用，但这种进步不过是人类进步整个链条中的一环；（三）利己主义使敌对关系普遍化尖锐化，但它只是为‘普遍和解’开辟道路。以上三点，原则上全部纳入了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成为它的基调。”^{笔记 405}

这，就需要商榷了，先生。

许多历史的事实用您的唯物史观并不能解释哩，“例如罗马的兴起和希腊的衰亡，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简直无从着手。可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是人类历史上超越一切历史事件的最大事件，同时又是历史中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的变化，若不从社会结构来解释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笔记 310}，而“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市民社会”又是这“最大事件”中的“最大因果”，怎能“一语定乾坤”，仅仅用一种史观——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来解释和预言它呢？

“Rostow（罗斯托）太着迷于 Toynbee（汤因比）主义了。Toynbee 主义有其可取之处，他在解释古往今来一切民族的兴衰的时候，可以说明唯物史观无法说明的问题。”^{笔记 310}

我必须承认，在分析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例如英和法）发展的差异上，您的分析要比这些史家

卓越得多。但是他们都不敢为自己的历史发展观插上“此岸性”的标签，更不敢说什么“绝对精神”，也就是说解决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根本问题。可以说他们这是出于“胆怯”，但也可以说是出于“敬畏”呢。

“列宁强调直接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了政权，扫荡了沙皇政治的污泥浊水，他对了。他和考茨基之间的区别，是无畏的革命者和胆怯的庸人之间的区别，这是无疑的。问题还在‘娜拉出走以后如何’” 文稿 381。

再说您对中国是不了解的，“中国对 Marx（马克思）是一个谜。” 笔记 604。唯物史观至少解释不了中国的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娜拉出走后的困境。

先生，我说的有一点道理吗？

4. 西奈山的上帝（中）

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老师，您“唾弃批判的武器，转向武器的批判，把目光转向德国无产阶级这块还没有人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宣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您因此而）一下子跃上世界舞台的最高处，把世界历史当做自己考察的对象和实践的园地” 笔记 364，奠定了您“否定的辩证法”在世界哲学界的地位。即使我很想追随您的脚步，可却不得不发问：世界的进步是如此之快，“否定的辩证法”如何可能作为人类发展的普遍命题和图式？它怎么会是绝对真理呢？

后面这个问题顾准从党校时期起就一直就抱着怀疑和批判的眼光，但是直到 1959 年，他还在为马克思老师开脱：

“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这个命题，不过是实践中的武器而已。他不想做人类与自然界的宇宙的全宇宙的创世主。列宁在哲学上没有懂得这一点，他在唯物主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辩证法方面实在是无知的。” 59.2.23.

但是到了他成熟的 1960 年代末，在再一次重读老师《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中并无此篇，苏俄专事研究马列主义专家们叫它做《〈神圣家族〉的前期手稿》，中国承袭此一叫法），他

不再为老师开脱了：

“……手稿到此终止。

所引的 Hegel 的话，是：

启示

创造

绝对者=精神

……” 笔记 438

本书前部前章《初识黑格尔》一节中卖的“小关子”——从西奈山上发出雷鸣，除了上帝还会有谁呢？——现在可以揭晓了，谜底就是——马克思先生自己啊。

“马克思在这里站得多高呀！所摘引的 Hegel 的话，其实是 Marx 自己从西奈山上发出的雷鸣。其实，异化了的人的复归还不足以表达这时候的激情。这时候的激情，是超越古今，吞吐宇宙。回忆一个民族的历史，慨叹于‘俱往矣’，何足比拟？” 笔记 438

可不是吗？“俱往矣”、“数风流”无非还是老一套的“天下”、“江山”——人的俗窠罢了，在“绝对精神”——神的“启示”与“创造”面前，何足挂齿！

这是顾准已经面世的文字中唯一一次对马克思不留情面的嘲讽——老师这种“自我显灵”式的表述引起了巨大的反感，那压制不住的桀骜本性终于爆发了，从前屡见不鲜地发泄在另外几位“伟大导师”头上的嘲讽，这次终于发到了先生马克思的头上。

即使再尊重、崇敬，也无法同意老师在《手稿》中的表述和观点。

比如针对《手稿 III》最后一段，他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了的话，（马克思）提出了 Post-Communism Stage（后共产主义阶段），这是从未见于其他文献的东西。哲学家应当可以提出这样的远景。可是这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多么辽远？！最终目标可以是无所谓的吗？” 笔记 426

仅仅从他罕见地同时使用问号和惊叹号，不必“过度解读”也能听出这再明白不过的话外音——任何人，无论是谁，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为人类指出终极目标、绝对真理和此岸天国？到底是黑格尔先生“制造出了虚妄的逻辑范畴，（并）指称它是‘绝对’的，其实是‘脱离了现实的精神，脱离了现实的自然’” 笔记 432，还是先生您自己呢？

的确，根据基督教福音书记载，三十三岁的耶稣基督就为人类指出了天国之路。祂对众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 新约 约翰福音 14:5》。而您，老师，藉着彻底哲学化的语言说出了几乎相同的话语，唯一的差别，耶稣基督话中的“彼岸”到了您这里变成了“此岸”。到达“彼岸”的天国，我从小就被教导是藉着爱、信和盼望的船只，可是到达“此岸”的天国——人间的、地上的天国又是藉着什么呢？

“谬误在天国为神祇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从前人在天堂的虚空中寻找超人，结果只找到了他自身的反映”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这是您在《手稿》前写下的另一篇名著中的话，您无疑已经直接用语言杀死了祂。彼岸的上帝死了，此岸的西奈山上出现了新的身影，发出了新的“雷鸣”——“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同上

看呐，精神的武器、物质的武器都有了，批判的武器正在雄赳赳化为武器的批判，战场却不仅仅限于欧洲，限于德国——

“马克思不久又远远超过了 1843—1844 年的眼界，从德国的特殊问题转向了世界历史。” 笔记 363。那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专政，武器的批判，革命实践的杀人……——到达此岸、地上、人间天国的船只难道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或如一位诗人访苏归来所言：“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血 莫斯科游记之一》？

1932 年才被俄国人全文出版的这部《1844 年手稿》引起了北方震耳欲聋的欢呼，“被认为是马克思唯一最重要的著作。”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

即使《圣经》也还包括了四千余年前的“旧约”和两千多年前的“新约”呢，比《圣经》不知浩瀚了多少倍的马克思著作在八十八年后竟被如此地简约、总结和概括了，俄国人真不愧是最伟大、最能干的“使徒”啊。可是比起中国的“造反有理”的四字《圣经》，俄国人就太小巫见大巫了。

来看看相对有人从马克思这些早期著作里兴高采烈地看到“造反有理”四字，顾准看到的又是什么——

“即使 Marxism 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也是另一种基督教意识”^{笔记 116}，中国的史学家们是不懂得这一点的。“范文澜不懂基督教，当然更不懂共产主义思想是渊源于基督教的”^{笔记 107}，郭沫若也不懂。而一位日本的史学家井上清是懂得的，他曾说“Christianity（基督教）虽然也认为现实社会的痛苦最终也要在天国解决，但它……却有着为过去佛教所没有的，以神的正义来激烈地批判现实社会的非正义的特点”^{笔记 251}，这正是基督教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交叉点，只是交叉后的两条线立刻分开了——前者的批判是藉着神的公义来完成，后者的批判要藉着 **Proletarius**（无产阶级）来完成。

（注：**Proletarius** 是个古老的罗马字，由 **Proles**（子嗣）派生，意指该阶层对社会的唯一贡献是延续香火并供应人丁，是最低下的阶层，带有轻蔑之意。直至 19 世纪，马克思以此字形定义有资本工具的工人阶级，它才正式走入社会和经济。中文的 **Proletarius** 也可译作普罗大众、平民百姓，但论述马克思主义时，则专译作无产阶级。）

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就这样成了 **Proletarius**——无产阶级新的福音书，并且，“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笔记 442} 这种宗教的神圣性到了中国，则“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笔记 244}。

难道这，可以是“无所谓”的、随随便便的东西吗？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终于诞下了无比恢弘的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一句响彻云霄的“雷鸣”——“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在 100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轰鸣，从欧洲到亚洲，从美洲到非洲。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吓得发颤”《圣经 旧约出埃及记》，可是一位亚洲人、中

国人顾准没有被这景象震吓得伏地不起。他挺直了身子走向“西奈山”，硬是要和“神”对话——

老师，就拿我们极峰最反感的“言必称希腊”中那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来说吧，“历史家修昔底德写了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中译本），翻开这本书，我们惊异地看到，由欧洲人带到中国，带到全世界的一套国际关系的惯例——条约、使节、宣战、媾和，战争赔款等等，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不知道的东西，已经盛行于当时的希腊世界。这一套国际间的法权关系，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笔记 330}。老师，难道这也是阶级斗争？也是“藉着无产阶级”来完成的、对不正义的批判？

不能够吧，老师。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您这样宣而言之太不慎重了吧。

人都年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年轻有无数的优越之处，可也有个要命的软肋，那就是不成熟。当马克思年长后，有许多东西他自己就做了修正，可是相对他晚年的著作而言，后人们更看重和愿意膜拜的，是他充满激情的早期著作。可是，顾准追问着，老师在青年时代（24-28岁）写就的东西，难道就应该被后人奉为《革命圣经》，一字不能改动，只能照章革命、照章斗争、照章造反、照章杀人？难道老师的理论被别人推论到底……就可以得出……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行的结论？

那么“人性”这个东西往哪里放呢？不要它吗？彻底抹净、扼杀了它吗？

这不可能！

从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学生顾准都无法接受如此结论。他心灵深处那簇从未熄灭过的蓝焰，那个深藏的下意识，对这一切抵触得非常强烈，即使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也非常可能就是他在1950年代末就产生的——“到底是非跟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分手？还是仍旧可以服从这个基调？”

^{59.2.27}叛逆思维的最初和最根本起因。

无独有偶，一位与顾准同时代却擦肩而过无缘相识的奥地利人艾瑞克·沃格林，几乎在和顾准写下这些读书笔记的同时，写出如下评论青年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手稿的文字：

“在魔鬼般的封闭生存的层面上，《费尔巴哈论纲》不愧是一篇神秘思辨的无与伦比的杰作。马克思知道他是创造一个世界的神。他不想成为受造物。他不愿从受造物的生存视野来看这个世界……按照神秘思辨的标准来看，提纲的构造是完美无瑕的。它也许是迄今为止由一位想成为上帝的人所

能构造的最好的拜世界教 (world-fetish)。” 艾瑞克·沃格林 《从启蒙到革命》

两个同时代人，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同时对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先生这种“心灵上的无序”（沃格林语）和“（以为）已经把人类生活穷尽了”（顾准语）做出了相同的评价，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沃格林和顾准有着相似的经历：

1920年，19岁的奥地利青年人沃格林在作了4个月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因研读马克斯·韦伯论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顿悟这个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而果断否弃了它（顾准年过四十才接触韦伯）。后来他在维也纳大学做政治学教授，1936年出版第一部著作《威权主义国家》，此书在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被纳粹查禁。1938年他惊险万分地从纳粹铁踵下的维也纳逃往美国，从此致力于历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致力于抵制意识形态、集权专制和诺斯替主义——人的自我显灵现象，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就是以神圣的形象出现。

沃格林从教50年，留下34部著作，其中《政治的新科学》和《秩序与历史》已成为世界政治哲学经典。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萨维特里（Salvatori）学者，1985年去世，是世界公认的近代大政治哲学家之一。

1957年沃格林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就职讲座以《科学、政治和诺斯替主义》为题出版，在讲座中，他毫不留情地分析了马克思的“骗局”：

“作为一个不喜欢为了给知识分子提供乐趣而杀人的人，我要以不太文明的方式直言，马克思自觉充当知识骗子，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一种意识形态，允许他以一场道德义愤秀来支持对人实施暴力行为……不过，马克思是在非常高的知识层次来进行他的论辩的，而我直言他在从事一场知识骗局所引起的惊诧（新闻媒体反响不小），很容易按照与隐匿黑格尔诸前题一样的方式来解读。” 艾瑞克·沃

格林 《自传性反思》

沃格林的这段话直接针对的就是青年马克思那篇充满了杀气腾腾革命激情的名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年马克思二十五岁：

“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针对这个对象的批判是肉搏的批判；而在肉搏战中，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称，这都无

关重要，重要的是给敌人以打击……” 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沃格林出此激愤之言之时，正是顾准被打成右派，全中国打出了五十万右派，五十万个灵魂全部在“共产主义道德”的名义下，在“意识形态”的名义下被送进炼狱的年份。就像顾准 1959 年领悟的那样，意识形态——假一个已成的思想体系之名来进行争论——不，不仅是争论，更是迫害——是知性上不诚实，道德上不公义的现象，是一定不会有长远生命力的。

“人们既身处于历史过程之中，又各以自己的哲学语言反映了对历史的态度。各人有各人的哲学，却都假一个已成思想体系之名来进行争论……批判而不入于杨必入于墨是不好的，勉强地（而）不是以一个自觉的思想为基础的不入于墨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1959.2.23

而沃格林一生反对任何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或任何什么主义的。任何事物，假如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就是对语言、对逻各斯的摧残。他认为在理性批判分析的意义上，各种意识形态都与科学水火不容，任何人，只要他是个意识形态分子，就不会是个诚挚的社会科学家，因为他们矮化了知识辩论，赋予公共讨论一种明显的暴民统治色彩。他们不能作为讨论的伙伴，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的骗局涉及断然拒绝考虑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论论证，亦即亚里士多德论及的这一问题：人不是凭自身而存在，而是凭一切实在的神性根基而存在。” 艾瑞克·沃格林 《自传性反思》

沃格林一生都在疾呼：“**道德主义的目的并不能为行为的不道德提供辩护……各种意识形态不是科学，各种理想也绝不是伦理学的替代品**” 艾瑞克·沃格林 《自传性反思》。马克思不是神，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甚至也不是伦理学。

事实上，晚年顾准早已看出跨越过青春激情期的马克思对自己就有诸多修正，根本无需等待后人来做“修正主义者”。例如 1859 年（此时离令他“一下子跃上世界舞台的最高处”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发表已经十六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顾准无疑全盘接受了老师的这一思想。在他的读书笔记中有这样的话：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行程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笔记 539

至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西方专制政治所做的阶级分析，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现状，他的怀疑更深：

“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 文稿 267

马克思基于希腊僭主专制政体的演变对西方近代社会所做的阶级分析——政权永远是阶级的政权，专制主义或僭主政治是相互斗争的阶级谁都无力克服对方时兴起的一种过渡政权的理论，完全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滥用、套用西方的阶级分析法在中国头上，只会造成更彻底的一元主义和更严酷的专制。

顾准那段足以传世之言——“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文稿 P454，并非于无声处炸响的惊雷，而是受到老师马克思的启发。他当然读到过马克思临终前的那句名言——“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恩全集》中文 1 版 35 卷 385。马克思是人，顾准也是人，他们都不是神。

可是人啊，古往今来想要做西奈山上那一位的是如此之多。军事、武力、灵丹、方术、意识形态……差不多都被你用尽了。你是多么像普希金童话诗中的那位渔婆啊，永远都不会满足，欲望永无止境，绝不会因为新的木盆，新的房屋，新的王宫和做了海上的霸王而满足，因为海上的霸王本身也不安宁。心灵失序的人除非把自己宣布为上帝并取而代之，他是绝不会止步不前的。

可是他又没法子当上帝。那就只有痛苦和妒嫉。

5. 西奈山的上帝（下）

西奈山上有一位“上帝”就够他受的了，可随着对《马恩全集》以及外围读物，例如黑格尔、狄慈根、边沁、罗素等哲学大家以及梅林所著第一部《马克思传》的深读，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上帝好像还不止一位！这颠覆性的、大不敬的怀疑令他非常苦恼和纠结。

为什么总有不同的声音发出？假如西奈山上真有两位，那还能叫“祂”吗？至多，让我模仿一下熊彼得，只能叫“神人和天使长”吧。可天使们通常只是传达，至少不可能发出和祂不一样的声音。

不再重复马克思死后四十二年，恩格斯死后三十年才正式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这颗大洋葱被顾准层层剥皮的经过了，现在来看看另一件事情，另一份质疑，另一次剥皮。

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另一部著作——《反杜林论》，最权威的梅林版《马克思传》甚至将该书称为是马、恩的“合作”，但始终未被后人采信。

中国人一直跟着俄国人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式的、全面总结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巨著。《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一起，并列为这位“第二提琴手”在马克思主义交响曲中最重要的协奏。

顾准却认为是独奏。他在思辨《反杜林论》上所下的功夫要超过对《自然辩证法》，质问更严厉，反感也更强烈。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意识形态”直接与经济科学关联起来，“直截了当地指明，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应当）是一种道德上的义愤”^{笔记 704}。在谴责杜林“政治第一位，经济第二位论”的所谓唯心主义暴力论的同时“它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可是）这岂不是以暴力形式来改变所有权，用暴力形式来实现一种甚至无货币无商品的分配方式吗？”^{笔记 706}，实际上这不同样也是一种暴力论吗？

顾准把《反杜林论》提倡的暴力论叫做“杜林理论的直接翻版”^{笔记 705}，再一次无情地质疑了恩格斯。于此同时，也再一次为开脱他尊敬的老师马克思作了努力——“在暴力论上，M.（马克思）、E.（恩格斯）是二元主义的”^{笔记 706}，因为“人们费了多大的劲去猜测，到底 Marx 的‘亚细亚、古代’等等是什么东西，直到现在，还无定论”^{笔记 706}。也就是说，顾准认为马克思的本意可能是想把

“亚细亚”、“古代”这些他没有把握的历史领域刨除在“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之外的，他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就根本不是一回事——M.的唯物史观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而E.的唯物史观则是“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是对社会发展的唯一推动力”的论断。

但是多么可惜，“Die Geschichte all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德文）”、“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英文）”、“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中文）”都已成为不可更改和诠释的文献，更何况在深度研究《反杜林论》后，顾准还发现“Engels（恩格斯）对生产方式作了‘生产力历史进步’的那种解释方法，无疑，Marx（马克思）至少是同意的了”^{笔记 706}。“那种解释方法”，说白了就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且“由于《反杜林论》的传播之广，（这种解释方法）早已被 Stalin（斯大林）、Plekhanov（普列汉诺夫）以及无数人所承袭”^{笔记 706}，最后无可挽回地变为约定俗成、积非成是、无法改变的东西了。

顾准尤其反感《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的断言——“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意志唯心哲学中挽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对自然与历史的唯物理解的唯一的人”^{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版 1885 年序言}，顾准愤然道：“恩格斯在努力建立他的这种世界观时，显然陷入了几个无法脱身的泥坑之中”^{笔记 685}。

顾准常用“泥坑”二字形容事物在逻辑上的混乱。在一则顾准晚期的读书笔记中，他至少指出了恩格斯“无法脱身”的两处“泥坑”——

“第一个泥坑是……（大篇幅的思辨文字 略）。即使这个世界真正是辩证法式地构造起来的，人既不能穷尽这个世界，在人类有限度的观察基础上‘正确’地构成这幅图画，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它也不过是一个‘假设’，人没有权利肯定它就是客观的正确的一种图式。

“第二个泥坑是，他没有真正透彻了解，作为一个尘世天国的先知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或者不自觉地）懂得他的目标，不过是一个有限度的目标……恩格斯并非不了解这个目标的有限度性……可是又偏偏把世界发展的无限性和目标的有限度性两者愉快地并列起来，好像同时强调这两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其结果是以一元主义作为出发点，达到多元主义的结论，又反过来用多元主义的结论，来辩护一元主义！”^{笔记 685}

说到此处他还不依不饶，扬言要把“这个命题在 On Feuerbach 的摘录中，还要详细展开”^{笔记 686}。

这里顾准所指，是恩格斯 1888 年发表的《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这个“命题”马上就被他“展开”了，那就是直接对比恩格斯发表于 1877 年的《反杜林论》和发表于 1888 年的《费尔巴哈论》两书本身的文字。

他立刻发现了早有预感的矛盾。

按照《反杜林论》的说法，“迄今为止的历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就建立真正真善一致的人类世界而言，迄今为止的历史，不过是人类的史前史。——这几句话，见于《反杜林论》一书。（但）你如果拿来与《费尔巴哈论》对比对比，又可以体会出两者实在不是一个调子” 文稿 442。

顾准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巴别（弄乱）”的。

仅仅把两文“作极粗糙的对比” 文稿 439 他就发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特别着重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在《费尔巴哈论》中，不仅没有这样明示的文字，连这样的精神，都不可能在《费尔巴哈论》的字里行间找出来” 同上。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可以说竭尽了一切力量来遮盖‘逻辑 = 神学’的性质，简直把辩证法写成了进化论，把 Hegel 写成 Marx+Darwin（把黑格尔写成马克思+达尔文），把 Marx（马克思）写成‘反对不可知论的培根’了” 同上。

恩格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前后不一致，甚至同一文章中的前后不一致令顾准相当愠怒，“这几章……其间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 文稿 450。

他归纳这种不一致：“原因很简单，上世纪 80 年代 90 年代“科学”——不是 Hegel（黑格尔）自称的那种科学，Hegel 的科学其实是神学。这里所说的“科学”，是 Hegel 轻蔑地称之为经验科学的科学；《费尔巴哈论》用孔德的名词称之为实证科学，其实 Marx（马克思）是很反对这种名称的——发展十分迅速，神学式的唯理主义愈来愈不行时，Engels（恩格斯）也得注意这种风尚……” 文稿 440

顾准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写出的《〈反杜林论〉以外》、《〈反杜林论〉各章》和《再超出〈反杜林论〉》以及多篇读书笔记中，批评“先知的成分本来就稀薄很多”的恩格斯的哲学观点是很不留情面的。这和熊彼得“我确实认为应该坦率承认，在智力上，特别作为一个理论家，他远低于马克思。

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是不是总能懂得马克思的真意，他的解释，因此必须用得很当心”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批评如出一辙。

真正的先知，正因为长于“唯心”——静观玄览——“一种出神的 Ecstasy（心醉神迷），所以要苦苦地追究宇宙的本领，知识何以可能等等问题，发展出来一种超政治的宗教哲学，超乎日常生活的数学和逻辑学”笔记 136，他们才敢“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的问题都要谋求解决”文稿 436。这是顾准借狄慈根之口形容“形而上逻辑（狄慈根此语系指辩证逻辑或辩证法而言）”的目的，“是要把它的领域扩大到永生之界”同上。那么“辩证法就等于神学”同上，先知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就是他自己站在“西奈山”上俯瞰芸芸众生时发出的悲天悯人的雷鸣。

说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又是一个误尽天下苍生的错误。

至于《反杜林论》中平等观、自由与必然观以及“道德上的义愤秀”，他早在党校时期就有了质疑，那时他还不认识熊彼得。经过十几年的追索和剖析，他找出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的话——“辩证法的结论是一回事，用艰苦的科学研究去 Make up（架构）又是一回事”，大胆猜测恩格斯“也许因为这样的责备，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手稿（自然辩证法）》，Engels 坚决不予出版”笔记 696。

没有出版，但也没有烧掉，这是恩格斯犯下的大错，他生前绝料不到，死后无能为力。

本来就对西奈山上陡然出现一位“人的”上帝又惊又怒的顾准，哪里能容忍“上帝”还不止一位？这也是他日后写出精彩的杂文《〈反杜林论〉以外》最重要动因。

他还看到实际上在《反杜林论》中《费尔巴哈论》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了，那就是“现代唯物主义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一神教基督教的否定之否定”——一神教否定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旧的唯物主义，而后者又被现代唯物主义否定了——这样哲学就被“扬弃了”。顾准刻薄地讥讽：

“有了这个基调，On Feuerbach（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只等写出来罢了。可是，这是一幅多简单化的漫画啊。”笔记 699

那里有这等便宜、简单的事情！就拿你《反杜林论》中论及并高度赞扬的卢梭的平等论，那“正是非科学的进步思想，（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显著例子”笔记 700，跟你的现代唯物主义哪里搭

得上界！辩证法确实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可它并不能代替事物的特殊的发展过程啊。你说因为有了“辩证”的概括，因此就可以“不去注意每一特殊过程的各个特点了”，不对！这即使就辩证法论辩证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我来辩证给你看呵——

- A. 假如“特殊过程”的研究不可少，那“一般规律”有什么用？
- B. 如果不用“特殊规律”去作穷尽一切的证实，你如何就敢说“一般规律”正确？
- C. 相信这个“一般规律”不是总存在着某些危险，例如商品、货币的否定等等吗？
- D. 结论：所谓“一般规律”，无非“独断论”而已。参阅笔记 P701

你独断个“麦粒发芽到麦秆死亡”过程《反社林论》举例的“一般”与“特殊”还不打紧，可你独断“迄今为止一切……”，把“亚细亚”的、“古代”都“不去注意”了，那可就是个天大的事啦。

如果说顾准是把马克思视为老师、同道和诤友，那么他视恩格斯则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存在严重逻辑混乱的，误导了几代人对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的人。他是如此地忿忿不平，为马克思，也为不分青红皂白的所有人：

“这里“暴力论”的论证没有成功，相反却证明，历史总是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Marx（马克思）所坚持的是他的哲学，而在历史范围内，他总是强调，《资本论》论证的范围偏于西欧，谁要无条件套用，谁就是给了他侮辱。把 Marx 的哲学命题普遍化起来，成为上下古今无不通用的规律，这件事开始于 Engels（恩格斯）。” 笔记 730

就在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父辈将这位和马克思一样，甚至更漂亮地留着一把大胡子的德国人视作和马克思一体，却更加谦逊、更加人性（例如他对贫困中的马克思一贯的金钱援助）的伟大革命导师时，顾准却看出了他们间的差异、混乱以及后人，例如列宁、德波林、梁赞诺夫——此人曾受联共中央指令亲自到德国，当面向伯恩斯坦索取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大清洗中被斯大林处决——以及斯大林本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东西。

他从未将恩格斯视做老师更遑论“导师”。后者对于他至多是一位争论对手，连“诤友”都算不上。他不敬佩他，也从不为他开脱，一旦从学术上找到破绽就绝不放过，痛下狠手。

比如在说到青年马克思那篇非常著名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

学的差别》，论到马克思高度赞扬伊壁鸠鲁哲学和雅典精神，并引用了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借普罗米修斯之口写下的名句——“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之后，顾准话题一转，冲着恩格斯就开了炮，毫不厚道——

“这是他（马克思）一生信念的宣言书。继承他的遗志，利用他的笔记，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把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直接和雅典民主焊接在一起，完全撇开了 Sparta（斯巴达）；而且，还不惜（其实，就“客观主义”的历史而论，是歪曲）把分明神权政治的希腊王政（译文作巴息琉斯，即希腊语的王）说成是‘军事民主’。” 文稿 268

再比如，在谈到梅林论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和 1871 年“第一国际关于巴黎公社宣言”的区别以及恩格斯对其的修改时，顾准强烈表达了对恩格斯“机会主义（Opportunism）倾向”的睥睨：

“……就理论内容而论，1848 年……所遵循的方向（还）是 Robespierre（罗伯斯庇尔）的方向。1858—1859 年的批判大纲，经过“雾月十八日”的批判之后，已倾向于公社制度，就 Marx（马克思）本人而论，这种倾向始终未变，而且愈来愈强烈（至查苏利奇的信，致祖国纪事报的信等等）……这种倾向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有无表现，如何表现，现在还没有读，读此时当作详细摘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 Engels（恩格斯）的现实感，也许可以称作机会主义倾向，实在比 Marx（马克思）要强烈得多。1883 年以后，德意志帝国的议会、官僚政治、工会、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等愈来愈正规化，而且没有第二帝国的腐败，而民兵制度的不可靠，Engels 早在 60 年代已得到肯定的结论，原始民主的公社，和这些公社之联合成为国家这个第一国际宣言所强调的原则，自然不能不深深引起怀疑。Engels 的《论权威》一文，就是这样产生的，1895 年死前的若干文章，也是这样产生的。” 笔记 646

他认准恩格斯“注意风尚”、“跟风”并轻蔑地称之为这是因为他“先知成分本来就稀薄很多”，这样的批评假如正确，无疑是致命的。再举个例子：

在反复阅读了《反杜林论》第一篇第三、四、十一、十二章，这些论述辩证法、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章节后，顾准简直就是忍无可忍——

“这几章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其间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让我从坦率地指出自相矛盾开始。

Engels（恩格斯）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先验，就是超越于经验，就是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意思。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就是说杜林的哲学体系不可以经验来验证。这一批评很中肯，很好。不

过请问：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经验来验证的吗？

Engels 说能，理由，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

但是，根据我们对于归纳法所作过的透视，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所得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你曾经观察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事变，你能超过这个或然性，主张你有权“创造”——不对，按照唯物主义，应该说“发现”，至于“创造规律”则是唯心论了。——好，（就）说“发现”吧，再问一句，你根据多广泛的观察，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

这是哲学的质问。

再来一个科学的质问。质量互变规律。你怎样解释，现在物理学定义逐渐有全归于数量化的趋势—光波、声波、电渡—燃点、熔点、氧化点—温度、压力—光谱分析、天体的光谱分析等等。物理学定义数量化≠质量互变规律。

同样的质问可以适用于另外两个辩证法规律。

已经指出过，Engels 这三个规律，其实是他所指责 Hegel（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的逻辑学的三个世界，存在论、本质论、总念论的精华。他指斥说，这种世界模式论是先验主义。然而一转身，他又把这种世界模式论的精华撷取过来，称之为辩证法，称之为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后来又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呢？” 文稿 450

问到这一步，他已经是怒火中烧。这个例子已经在前面的章节详述，就不再重复了。

顾准对恩格斯的不敬分明夹杂着一种愤怒，且愈演愈烈，一直到生命的终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恩格斯对后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误导，这不是一般的误导，而是一个重大的人类错误。

总览顾准读书笔记中有关马恩的部分，加上他早年的党校日记和晚年的有关辩证法与神学的精彩杂文，你能很容易发现他对马恩哲学，尤其是辩证法部分对旧世界、旧秩序“破”的一面的深刻领会，与此同时你也能时常看到他因为一直苦于无法同意马恩“立”的一面的苦恼。换句话说，娜拉“是否应该”和“应该怎样”出走，二位先哲的理论非常透彻，可“娜拉走后怎样”没有令他信服的答案。即使有答案，“它的‘立’的一面，后人固然有歪曲它的地方，然而它本质上是 Hegel（黑格尔）主义的，那是无可讳言的” 文稿 444，他说。

既然如此，他怎么会放过黑格尔条大鱼，这颗“洋葱”？

6. 再识黑格尔

顾准对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十分复杂。

初识黑格尔的顾准刚满四十岁，还剩下不多一些浪漫情怀。那时他的哲学阅读还仅仅局限在马、恩、列、斯、毛的范围内，不过已经开始阅读亚里士多德（见“读亚书”^{56.9.24.}），以及钦定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中的哲学部分简要。课余他读巴尔扎克的《老单身汉的家事》、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左拉的《崩溃》，狄更斯的《古玩店》……还有，在妻子汪璧用心良苦的安排下读《安徒生童话集》。

正是此时，他第一次接触了黑格尔和他的逻辑学——辩证法（见前《初识黑格尔》）。

面对巨哲他有些敬畏，有些相见恨晚，还有很强烈的拒斥感，这从他的党校日记可以看出。例如：

“读黑格尔小逻辑。读形式逻辑”^{55.9.24.}；

“逻辑一书，读得极有兴趣”^{55.9.28.}；

“特别是读形式逻辑，提示了不少反面的论据。从昨天开始，特别是今天上午（读）瓦因斯坦的介绍黑格尔，思想上给开了很重要的窍”^{55.10.5.}；

“开了窍”的他打算从“反面的论据”——形式逻辑开始，先掌握“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思维规律的规定”^{同上}，再去理解和掌握更高位的东西——辩证逻辑，即辩证法。但是他的阅读并不顺利。

和逻辑学同时进行的课程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准确地说，应该是此二书在党校的课程安排中本身就是“逻辑学”教材，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是以日后被俄国人钦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立脚点写下的。顾准同学正是在此产生了最初的疑问和“剥洋葱”的冲动：

“这几天曾经怀疑为什么有些文献如此绝对，又如此富有‘套’的意义？问题也基本上求得解决了，解决的钥匙是《矛盾论》，与马恩列一向的郑重声明——不是教条。”^{同上}

文献，显然指的就是恩格斯的这两本书。

顾准真正直面和质疑恩格斯，就在彼时党校的课堂上。“问题基本解决”且“解决”的钥匙竟如此简单？倘若果真如此，大概就不会有日后的顾准了。同一天的日记他摘录了黑格尔好生浪漫的一段文字：

“正在被形成的精神，是次第抛弃旧世界的建筑底一部分，同时为了新的形态而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在这些动摇上面，只能看到单一的征候，即轻浮的心思，生活中扩大着的倦怠，不知怎的不安的预感等等，这就是等候某种新的东西底诞生之征候。全体相貌不至于变化的渐进的发展，因她开头而被破坏时，她是像电光一般突然间确立新世界底形象。”^{同上}

这段话十分贴切他眼下的心境——轻浮的心思，生活中扩大着的倦怠，不知怎的不安的预感等等。他好像也确实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某种十分不安的预感，朦胧中等待着一个大事件的发生。后来这个大事件果然发生了，在整整半年之后。

对于逻辑学，顾准从 1952 年从大上海总税吏的位置上下台，就开始了最初的学习和探索。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是那样地无逻辑、无秩序和不可理喻，让人困惑不已，痛苦不已。没有像大多数人在同样境况下产生的应激反应——顺着时局和权势者的思路，不断地申诉，解释和推诿。发生在顾准身上的“恶”，恰如黑格尔所说“恶是动力”，产生了强大而相反的力量——不能容忍将生命耗费在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死不活的混沌状态中，他痛下决心要先建立起自己的逻辑思维框架，找出事情的秩序——规律，同时找到混沌的根源。太阳底下无新事，“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目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目前没有萌芽的”^{57.03.08}，同理，眼前的东西过去一定出现过，没有“过去”的萌芽，就不会有“目前”的果实。他深信这一点并且下决心从过去的“萌芽”和“太阳底下的旧事”开始追索。

“自古华山一条路”，追索从逻辑开始，那就从文献《反杜林论》入手，他一定得先“搞掉她”^{55.9.28}。那时他称《反杜林论》为“她”，从他的文字风格看这是很高的尊敬，和十八年后同是一个人的他对《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无情的追索、剖析与嘲讽并连连称“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顾准的“逻辑学课程”始自 1952 年下台后开始的高等数学和几何学的自学，起点低、年龄大（当时他已三十七岁）、无师从、无计划，没有系统学习的时间（很快他就被派去杨树浦搞基建去了）。但

这对一位数字天才来说都不是什么大的障碍，他有本事做到常人做不到的无师自通。

实际上，顾准深厚的会计学知识和作为一位出色的会计师的思维惯性，是他早就已经具有的、重要的“逻辑学”基础，只是他不自知，还以为自己是在“从零开始”而已。会计学虽然是一门应用技术学科，但和自然科学一样，有基本原理，有完整的逻辑体系，有明确的是非标准。顾准自小接受的又并非中式的、仅限于“记账”的会计学，而是西式的、能制衡政府的会计学。这种技术，不可能不成为对于权力的挑战，且真正的会计技术就是为了制衡权力才得以发展的，而制衡本身就是一种最典型的逻辑，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潘序伦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多年的浸润和熏陶，顾准的思维方式在无意识中已经打下了非常牢固和良好的逻辑基础。只是像通常人们从不在意阳光、空气和水对生命的恩惠一样，顾准对会计学于自己精神发展的恩惠也总是浑然不知，还动不动就对它出口不逊，什么“志不在此”，什么“奴婢”、“婢女”的，实在是有点“忘恩负义”。

1952年，37岁才拿起《初等几何》的他，未几就从数理中触摸到了强烈的逻辑感，这令他狂喜并沉醉其中，却全然忘记了12岁就开始亲密接触的西式会计学才是他无师自通的最大助力。到他水到渠成地从圆规、三角尺和计算尺的神秘丛林跨入历史的广袤平原，顾准已经在政治哲学的两个牢固支点——“逻辑”和“历史”上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自那时起，顾准就攫住了古典（始自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近代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死不撒手。循日记追踪，黑格尔的《逻辑》（亦称《大逻辑》）和《小逻辑》始读于1955年党校期间，息县干校期间重读，临终前大读深读，同时辅以中国哲学家姜丕之的《小逻辑浅释》。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尤其对《小逻辑》一书的偏好，可见黑格尔的这位中国读者至少从逻辑学——方法学的角度已被征服。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从哲学的角度质疑黑格尔：

“我是不能从黑格尔那里找到哲学的解答的。我看到那个绝对就头痛。” 56.3.8.

这位大哲是不是太狂妄自大了？以为人类历史在1830年，在柏林大学中就完成了？可大哲凭着

天才，前无古人地表达了人类在智力和精神在每一个层次的特征，令他后面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受用不尽。这又让顾准不得不又钦佩又纠结，剪不断，理还乱。

先放下大、小逻辑，把话说回到 1950 年代末来。

1956——1959，三年过去了，那件大事——斯大林偶像的坍塌早已发生过了。在经历了初进经济所、写作《试论》和《粮价问题初探》、参加竺可桢的综合科考队、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赞皇农村劳改等一系列动荡之后，顾准正面临着再一次被送去河南息县右派劳改营劳改的命运。

“像电光一般突然间确立新世界底形象”并未出现，反倒是他个人的境况愈来愈糟糕，生活状态每况愈下。但令人惊诧的是，在身历这一切之后的他反而没有了那些“轻浮的心思，生活中扩大着的倦怠和不知怎的不安的预感”，到了 1959 年，他倒更像是一片吸足了营养的好庄稼一样垂下头沉静了，不再幻想揠苗助长的“大事件”发生，不再幻想一蹴而就的丰收，这片庄稼只是“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等待着收割的一天。

请看此时的另一篇日记：

“历史唯物主义隐含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这个必然规律向着共产主义的完成。我接受经济学的分析，但拒绝黑格尔式的图式。黑格尔的图式实际是未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以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这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前门拒绝形而上学，却从后门把形而上学的范畴——偷运进来。Spinoza（斯宾诺莎）是泛神论，Hegel（黑格尔）是有神论。Plekhanov（普列汉诺夫）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是有信仰论。”^{59.3.5.}

比起三年前党校时期的文字，哲学味道要浓厚得多。

“有神”和“无神”问题的提出，是一个人开始哲学追问的最显著标志，不同的只是程度深浅而已。“真正的哲学，如果浅尝辄止会引导人离开上帝；如果深入地钻进去，则把人引向上帝”，十九世纪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这句话，如今还不能放在顾准身上校验，1959 年的他还仅仅是开始了哲学上的追问，简单地用“无神论者”或“有神论者”去判断他是不审慎，甚至是轻佻的。事情远没有那样简单。

不过说至少在 1950 年代中期顾准还是个无神论者应该没有大错，彻不彻底很难说，就像你不能论断狄慈根或者马克思是否是一位“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那种不怕神、不怕鬼，不信天谴，不信地狱，“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行”的王熙凤、戈贝尔式人物。所以倘若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之言为标准来“逻辑”一下顾准，那就只好说他即使是个唯物主义者也是“不彻底”的，因为他肯定不是“无所畏惧的”。

至少，他畏惧人间的“地狱”——人性的丧失。

他的时代，那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文稿 394}正大行其道，“张阎王”、“李阎王”作为英雄的别号屡屡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可作为曾经的老革命、老地下党员、老新四军、解放军战士的顾准，在政权取得胜利后却屡屡伸出双手向人表白“我手上没有血”，和老革命们依杀敌多寡定倨傲程度形成巨大的反差。和“阎王”们相比他可不就是“胆小鬼”？手上有血——别人的血，那是光荣，要真是“唯物主义者”，你怕它作甚？！可他就是怕，怕得要命。

顾准在其读书笔记和文稿中屡次提到埃斯库罗斯最著名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那句有名的独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有人依此判断顾准就是那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构成他探索的最重要取向”并因此而探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组成部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为基督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文稿 432}，进而判断他是中国最早扬弃和告别黑格尔，也就是“告别革命”的先驱。

这非常需要商榷。

假如你能把他三处提到这句名言的文字前后通读一遍，就会发现他对于“无神还是有神”——人类最古老、最重大命题的立场，退一万步说也不是“彻底的、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所应该持有的。尤其其中一句：

“不信神的人，不是推翻人群的神的人，而是附和人群关于神的见解的人。”^{笔记 652}

这句伊壁鸠鲁的话，顾准摘录自梅林版《马克思传》。

在非常大的可能性上，顾准1960年代就阅读了英文版的《卡尔·马克思传(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爱德华·菲兹吉拉德(Edward Fitzgerald) 1936年译自梅林的德文原版，而不是当时已经在中国公开出版的罗稷南先生或樊集先生的中译本。这句至关重要的箴言的中译有着很浓重的“顾氏”味道，与罗译——“轻辱庸众的神祇的人不是不敬上帝的人，而承受庸众对于神祇意见的人才是”，以及樊译——“读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相比，顾译要清晰明了得多。顾氏从不附和任何“人”和“人群”的秉性是人所共知的，他当然更不会附和“庸众”(这是马克思、梅林、鲁迅和罗稷南都喜欢使用的一个词，假如我没有误会，应该是对“人民”一词的蔑称)关于神的见解。这是事关“终极”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讲超过关于民主、自由，关于哲学、政治、经济、美学……的一切思考，他怎么会“附和庸众”？

切记，普罗米修斯是个神话人物。人们记住了他这句话却没有几人知道真正写下这话的人。他当然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埃斯库罗斯——希腊诗人，悲剧作家——一个不是神的人。顾准注意到并重点关注了此人。他的笔记、文稿多次提到他，并在生命最后的日记——北京日记中屡次以中文和英文——**Aeschylus** 标注下这个名字，明显是正在阅读他，且不言而喻是阅读的重点。

任何一位没有读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人都会将这句“告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认作这部悲剧的全部意义而不会看到埃斯库罗斯实际上是把普罗米修斯对神灵的憎恨描绘成疯狂的。他用了 **noses** 一词，在古希腊文中它指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柏拉图即使用过这个词，特指“不正义之病”。

在顾准最后和最辉煌的《希腊城邦制度》一文中曾多次提到埃斯库罗斯，并在临终前的日记中数次写下这个古希腊人的名字。这和马克思到了晚年(最后十年)“每年至少要读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一次”马克思女婿保尔·拉法格语倒是有些相像。可惜临终前的顾准除了多次的简单记录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评价。

人们以普罗米修斯的悲壮告白来衡量顾准，将他定义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却忘记了普罗米修斯并非“无神论者”，他只是憎恨“一切神”。退一步说，马克思借这句话要表达的，是他憎恨“泛神的

逻辑”，这从日后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的批判处处可见。

顾准数次摘录这句话的意思，细读他精彩的哲学杂谈章——《辩证法与神学》（其实是他读《反杜林论》的读书笔记）就能明白——他最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何为“逻辑泛神论”。就在弄懂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克思从《神圣家族》时代对黑格尔的否定，通过《经济学哲学手稿》、《费尔巴哈论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回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哲学整个是“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唯物主义和归纳法大师”培根与“唯心主义地将神秘洞察理性化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的神妙结合。

这一发现令他大受鼓舞，对黑格尔越发地兴趣盎然，他和兄弟陈敏之关于哲学、辩证法、唯物与唯心论的讨论也愈来愈热烈。

这表现在他写给敏之的一束信札，后人将其冠名为《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其实倒不如《“娜拉走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来得更加通俗和一目了然。不过话说回来，谁会料到这些信札会有昭然天下，轩然天下的一天？彼时有兄弟间的相知和默契已经足矣，要什么题目不题目，通俗不通俗的！

许多最著名的顾氏“语录”都出自这扎书信（为了更加清晰，所有顾准所用的英文人名均已转为中文，不再注释）：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青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文稿 P431

“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所

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青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文稿 342

.....

那么处在生命末端的顾准究竟是要告别黑格尔还是要重新认识黑格尔？

中国人接触黑格尔始自戊戌变法始。黑格尔哲学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观和哲学思维，更因为被俄国人钦定为“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来源”之一而受到膜拜，在 1949 年的锣鼓声中君临天下，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显赫的存在。

但是，确如一生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王树人先生所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黑格尔研究）并不是从发展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出发，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出发。实质上，中国人的这种研究乃是把马恩列的评价既当出发点又当做归宿，或者说，把黑格尔研究变成了围绕着马恩列的评价兜圈子，变成对他们评价的图解。”

正是这种中国式的黑格尔主义——教条主义、国家主义、一元主义、先验史观、绝对真理等在其肆虐横行的六、七十年代，黑格尔在中国受到了质疑和批判，批判它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张中晓，一个是顾准。前者的批判集中于他的《无梦楼随笔》，后者的批判就集中表达于 1973 年 5 月《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这一束信札中。

但是批判并不是扬弃，更不是抛弃。三个月后的 8 月，顾准写下了给陈敏之的另一束信札，后人冠名为《哲学杂谈》或《辩证法与神学》。后一个题目也许更明确、更通俗，它紧扣问题实质并有画龙点睛之妙。顾准是这样表达的（缩写而非原文）：

“在德国，一位与马恩同时代人——工人出身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狄慈根曾一语道破天机：**‘辩证法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 狄慈根 《辩证法的逻辑》。尽管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尽了一切努力来遮盖这一点，不惜把辩证法写成进化论，把黑格尔写成马克思+达尔文，把马克思写成‘反对不可知论’的培根，但依然无法掩盖辩证法之逻辑=神学的性质；

是马克思一手攥住黑格尔唯理主义的所谓‘真理是整体’的一元主义，亦即‘神性寓于人性’

之中的、黑格尔加以哲学化了的基督教新教精神，另一手攫住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这两者在马克思那里‘神妙’结合诞下了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结合的后果是惊天动地的。它因为几乎拥有了中国话‘道’的意义（中国的道，西方有现成的名辞叫做 Logos-逻各斯，和 Logic-逻辑只差一点点。英译是 Words。至于希腊原文，顾准猜测还是 Logos）而赋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以宗教的神圣性。旧唯物论的立脚点——‘公民社会’在新唯物论的立脚点——‘人类的社会化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面前轰然倒塌，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思辨变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真刀真枪，‘玩儿命’的事情；

‘破’的辩证法与‘立’的辩证法——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即见于黑格尔，也见于马克思。破旧是为了立新，马克思的‘新’要立的是对立于公民社会——个人主义社会的社会化了的人类，亦即‘集体英雄主义、民主集中主义’的人类社会，这和他《神圣家族》中曾经激烈批判过的黑格尔把概念看得高于具体事物，把共性看得可以优于、超越于、可以淹没个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矛盾；

在中国，社会化的人类——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不是唯物辩证法所谓‘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而是以恐怖主义手段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

非辩证的世界观——形而上学，并非中国官方钦定的如是说——‘反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恰恰相反，它是中国最缺乏的对自然分门别类、‘孤立’地深入钻研下去而不综合，不在其发展运动中观察的那种方法。恰恰是形而上学的缺乏使得中国没有真正的科学，因而也更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要有一种综合的世界观。恩格斯的‘以辩证法来范型世间一切事物’与台湾一位工程师的‘世间一切事物都可以数学公式来表达’是一样的以偏概全。辩证法一旦成为统治思想，它的‘整体性的真理’（真理不可分）和‘一元主义’（真理是一元的）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唯有真正的民主——立足于科学之上的民主——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学术自由才是天然的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

真理是相对的。辩证法一旦成为统治的思想，绝对的真理，就一定是教条。我曾赞美和参与过革命的风暴，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为教条主义，在‘辩证法’的大纛下将其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这就是被顾准再识后的黑格尔，也可以说是再识了黑格尔后的顾准。尤以下述两句话的表述最能说明顾准对黑格尔的认识：

“黑格尔主义其实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 文稿 384

“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

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文稿 242

黑格尔主义=哲学化了的基督教，基督教的上帝=哲学化的上帝=真的化身，既然如此，顾准怎么可能抛弃“真的化身”，怎么可能抛弃“哲学化的上帝”，进而推理怎么可能“彻底抛弃”黑格尔？就算抛开这点不说，回头看他 1960 年代后期写下的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读书笔记（见前章节《一个自由而成熟的灵魂》），他怎么可能会“彻底抛弃”把自由意志作为自己政治哲学体系的起点、主线和归宿的黑格尔？

还有多年前黑格尔的“自由史观”对他的重大启发——“自由既可望又可及，人类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将人类自由发展史分为东方君主专制主义的，古希腊奴隶制发展出的雅典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三种形态，认为东方的君主专制主义根本无自由可言，所谓君主一个人的自由不过是“任性”和“放纵”，并非真正的自由，古希腊的自由是在少数奴隶主和自由民手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制才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的普遍的追求，并把这一点归结于基督教的影响。

这对顾准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抛弃”从何谈起！

因此，说到“告别黑格尔”，他当然要“告别”，但他要告别的不是大哲黑格尔而是被后伟人政治化、教条化了的黑格尔；说到“批判黑格尔”，这也千真万确，但他批判的是在把人和国家联系起来之后，以国家的神圣之光遮蔽了个人自由的、他不能同意的这一部分黑格尔，他说“这种理论说教之有害，可以从德国的历史得到证明。所以不如不作这种说教，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地扩大实实在在的自由” 笔记 371；

他要重新认识黑格尔。

要重新认识的，是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以及它与俄国的、中国的“黑格尔主义”之间的重大差异。认识了，他就不依不饶地要探究这个“重大差异”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前生今世、前因后果。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足够称得上是“误尽天下苍生”的它，生生是被权威、威权经过对黑格尔的搓揉、拿捏、扭曲，活活“造”出来的，这也太“居心叵测”了。

和西奈山上的人们声称“不再有对黑格尔的惧怕，不再有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

文稿 431 异曲同工，再识黑格尔后的中国人顾准对“西奈山上”的人们也不再有“惧怕”和“敬畏之念”了。

7. 鼙鼓无声，理性争鸣

顾准是高傲的，他手中那支史笔是精准、残酷和不留情面的。但如果细读顾准，却也能发现他和他的那支笔有个明显的优点——说理，剖析，但不轻易论断。他从未说出和写下过一句世界上最残酷的话：

“真理在我手里，而不是你。”

顾准知道自己不一定正确，他一再宣称自己害怕、头疼所谓“绝对真理”，更不曾、不会宣称自己掌握的就是绝对真理。他一生最讨厌（也可能是最敬畏）的词汇也许就是“绝对”。所有通过经验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这是他的信条。

“曾经怀疑为什么有些文献如此绝对”^{55.10.5.}；

“独断、绝对；当时常常不免，事过境迁，也就会发现正确之中有自己的界限，错误之中有一定的道理的”^{55.12.16.}；

“相对真理到达绝对真理，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天才（能够）独立完成的……对‘成功’的人做绝对肯定的估价，与对‘不成功’的人作绝对否定的估价是同样不正确的”^{56.3.4.}；

“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原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有血缘关系的东西。这是不可以忍受的东西。”^{59.3.8.}；

“Marx—Engels 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唯理主义者总以为他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性）对于科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真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的话。”

文稿 449 ；

……

不胜枚举。

“我看到那个绝对就头痛”^{59.3.8.}，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说。他只是低下头来“剥洋葱”——逻辑、分析、判断、记录。也许剥到底也没什么新发现，但这个过程依然令他醉心和享受。他的眼中只有进步，也只相信进步而不相信什么“终极目标”。他因此而缺少“伟大”的元素，但至少，他给我们做出了不盲目崇拜权威，人要独立思考的榜样。顾准这个名字的确很难和“伟大”一词相连，他有“人”的一切特质，他只是“不凡”。

顾准对“一家言”、“一言堂”，即所谓“钦定的绝对真理”^{文稿 449}非常厌恶和睥睨，相反，对一个来自法国的短语——“鼙鼓无声，理性争鸣”却数次击节叹赏。

这是法国大文学家维克多·雨果的名句，出现在他的名著《悲惨世界》中：

“只有野蛮民族才会凭一战之功突然强盛。那是一种顷忽即灭的虚荣，有如狂风掀起的白浪。文明的民族，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因一个将领的幸与不幸而有所增损。他们在人类中的比重不取决于一场战事的结果。他们的荣誉，谢谢上帝，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光明，他们的天才都不是那些赌鬼似的英雄和征服者在战争赌局中所能下的赌注。常常是战争失败，反而有了进步。少点光荣，使多点自由。鼙鼓无声，理性争鸣。”^{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第二部“珂赛特”第一卷“滑铁卢”第十六章“将领的比重”}

对这位曾呼喊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维克多·雨果《九三年》}的人道主义大师，顾准情有独钟。雨果最负盛名的《悲惨世界》被他的这位中国读者从青春少年一直读到临终。1973年8月11和12日，他用了两整天的时间重读她，所记的日记只有两个法国字——“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73.8.11}和两个中国字——“同上”^{73.8.12}。此时离他去世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身体每况愈下，低烧，咳血，潜伏多年的肺癌即将爆发。从息县回到北京，他的日记已经简化到无法再简化，却还在拼命地阅读和写作。

重读《悲惨世界》的前三天，他在阅读《基督教基础》（著者不详），后五天他交叉阅读英国近代历史学家乔治·格罗托的《希腊史》和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希腊史》。此刻正在撰写《希腊城邦制度》的顾准，想必是在两千年前的希腊雅典与两百年前的法国巴黎之间找到了某种共同点，某种人类的共通的天性，也找到了他和三位作者某种心灵的共鸣，只可惜日记是如此的简单，令人们无

法得知五十八岁的顾准是否仍像少年、青年和壮年时一样，再一次为芳汀、珂赛特，为冉阿让、艾潘妮流下眼泪。

顾准提到的雨果这句名言却不是此时，而是要早的多的 1969 年，在他的“罪行交代”中：

“本‘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一向存在的思想，在熊彼得反动著作的‘启发’之下，形成了罪恶的‘共产主义两党制’的思想。[参阅罪行交代（七）]。……我所梦想的，正是这种资产阶级专政下少数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理性争鸣’。‘理性争鸣’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以和平主义为前提，所以我对雨果的‘鼙鼓无声，理性争鸣’击节叹赏。[参见罪行交代（一九）]”^{自述 296}

对这句名言“击节叹赏”本身，在老罪人顾准就是新的罪行。他必须向“人民”交代其思想根源并“深挖狠斗”。

精神贵族，至今依然是个大大的贬义词，顺带着还诛连了一个相当尴尬的衍生词——“政治菁英”（以及菁英政治）。这是个几千年的东方式专制传统根本不能容忍存在的东西，即使在某些年头遇上“明君”宽松了几天，有了些个“政治菁英”，有了几天菁英政治，没几天也就成了“书生空谈”、“书生误国”、“秀才造反”、“有机知识分子”、“无机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等爹不亲娘不爱的弃儿，上帝笑了，“人民”笑了，菁英们自己也笑了。顾准在他的时代曾无数次被骂作、被批作“精神贵族”，时至今日也还是被诟病，和上述传统大有关系。来看看他类似下面这样的话有多不招人待见：

“居里夫人的科学业绩，一个诗人的好诗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学家高。——当然，这又是精神贵族的语言，而且，说老实话，我承认，清洁夫的工作，怎么样也不会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样。我老实承认，我的平等主义，对待清洁夫的是怜悯而不是尊重。”^{文稿 420}

即使今天，这样的话依然容易引起某些人群想要做“义愤秀”的冲动。

中国的社会性格主要还是“斯巴达”式而非“雅典”式的。斯巴达式社会性格最突出的特点，用顾准的话说，是“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采取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文稿 268}。精神贵族必是那“长得过高的谷穗”，当然是要被砍掉的。“人民”不大会注意和接受他紧接着关于“教授和清洁夫”话题的下面一句话：

“不过，无论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在天王或公室前面好受得多吧？” 文稿 420

但是不一定。相对于“当家做主人”，“人民”往往更喜欢“好的”天王或者公室，明君或者清官。不幸精神贵族却恰恰不能够是天王或者公室，而是制衡天王或公室的天敌。后来精神贵族在西方有了个大名，叫做知识分子，追其词源却并非纯西方产物，而是来自半西半东的俄罗斯。如今英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源出俄语 *интеллигент*，其本意是指那些未必具有高深专业知识，但却执着于思想信念并怀有救世情节的一群人。可叫到中国就有点乱套了，“精神贵族”一词无论彼时此时，其中饱含的嘲讽、训诫、轻蔑和醋意，没有被骂过的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

顾准倒是不大在意，倒是很想笑纳这个头衔——“精神”，倒也许还算是有一点，“贵”是没有的，而“族”，则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拜托“人民”，还是不要亵渎这个词的好。可话你得让他说完：

“民主，事实上只能是‘精神贵族’之间的民主。打倒精神贵族的结果，就是专制主义，或者专制主义和暴民政治相结合” 笔记 255。

说得明白，一点不扭捏作态，不含糊其词。

“雅典是原始民主，是公民大会的民主，这种民主始终要求有对外殖民的出气孔来维持。（假如）没有这个因素，就更加需要一种精神贵族的民主了。” 笔记 256

看，又在“言必称希腊”。可德先生本来就是希腊人嘛。

顾准最喜欢（在日记中被他狡黠地写做“favor”）的一件事情好像就是“称希腊”，喋喋不休。光是希腊史，他就看过好几个不同史家的不同版本。其实这点事也曾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通好”，开口希腊、闭口罗马，只是1941年的延安，极峰一句“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把大家伙给吓住了，纷纷转而去寻宗问祖，从尧舜禹到夏商周，连神话带野史打包一处都算作“文明”，弄出个“上下五千年”，而“言必称希腊”也从此成为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代词被读书人避之唯恐不及。

可顾准不在乎，一边是“希腊”照称，一边是“宗”照寻、“祖”照问。历史是个本体的东西，了解得越广泛，经纬度越细密，就会越接近其真实。结果他不但在东、西两头都获得大丰收，还被后人赞为与德国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历史轴心时代”理论相通的中国第一人，这主要指他将中国与希

腊同时代相比较，得出前者的“史官文化”和后者的“雅典民主”各自如何产生和发展，如何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后果的研究成果。后人的赞扬虽略显牵强，但也不无依据和道理，至少在中国，在顾准的时代，他的研究和结论肯定是首创和独一无二，且直到1980年代也还没有见到哪位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像他这样下死功夫、笨功夫的。有一篇今天的专业人士写下的中国古希腊罗马研究领域状况的文章极有意思，作者写道：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古希腊罗马史研究的艰难起步阶段。当时学科建设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和图书、杂志还十分缺乏，国内掌握古希腊语、拉丁语的学者寥寥无几，一般的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到批判地利用原始文献去形成自己的判断……。到1980年代末，（才）共有十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并出版了一部专著《希腊城邦制度》（顾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赵丽珍《三

十年来的古希腊罗马研究》

绕来绕去，这顶史学桂冠还是阴差阳错落在了会计学大师顾准的头上。

也许深挖一下顾准的思想根源比较容易理解他的创造力的最初来源。如他自己曾多次在“斗私批修”会上承认的那样——

“抽象地说，我并非不理解这个社会过程（1949年前后），然而我没有亲身经历这样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现实，我并未在其中受苦，我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温情待遇，反过来，又不能不使我对资产阶级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温情主义。”

“温情”确是产生“精神贵族”的充分必要条件，“悲天悯人”的情怀不可能出自粗粝的情感和物质环境。他从雅典社会看到了现代社会。在将雅典公民大会时代“从未想到过要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形态和现代社会“正因为没有对外殖民这个因素却充满了前者所没有的资本-经济因素”的形态相比后，他得出结论——现代社会“只会更加离不开民主，也是现代民主离不开精神贵族的又一理由” 笔记 257。

那么现代民主到底是什么呢？能以“一言以譬之”吗？能，当然能！

“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 文稿 270

这就是顾准的结论，也是他的自问自答——“娜拉走后怎样”简而又简的答案。

顾准一生读书无数，仅仅从他的文字中能找到线索的书目数量就很惊人。尤其是到了晚年，用六

弟陈敏之的原话形容五哥读书的速度——“我惊异地发现，在1972-1974年这两年中，除了生病被迫休息和写作外，他全部时间都在读书，其速度有时可以达到两三天一本书，书名可以列成长长一大串”陈敏之《我与顾准》。不过深刻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和精神塑造的书籍还是数得出来的，例如《圣经》、《逻辑》、《资本论》、《论自由》、《新阶级》、《历史研究》、《希腊史》等。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也是其中的一本。

1962年，从劳改农场重回到经济所的顾准开始翻译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这本书是熊彼得生前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最著名的著作。它以创新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制度形态问题，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它的“创造性的破坏”而存在不下去，而“成熟的、由民主而产生治理者的社会主义”是行得通的，资本主义可以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这本著作对顾准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熊彼得的反动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对我起了某种程度的恶性启发作用，我的反动的‘共产主义两党制’就是这种启发的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确是一本十分好看的书，正如熊氏自己所说，这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近乎四十年思考与研究的成果。顾准的译本译得非常精彩，因为他本身就是熊彼得的同行，明白他在说什么。

“在经济思想方面，通过熊彼得那本书的翻译，通过阅读大量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经济文献，对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复辟资本主义！）有了更加牢固的看法，概念形式也更加精炼化了。”

至今有人否认顾准是中国“市场经济取向第一人”，根据是他的《试论》并未像哈耶克那样，特别强调政府不应干预市场。但就冲着上面这句他自己的“坦白交代”，大概也很难否定人们对他“第一人”的定位。这段话看上去顾准好像是在翻译熊氏的过程中找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知音和同道而兴奋不已，但实际上很可能更早，他就认识熊彼得和他的这本书了。以下这段话就“露了马脚”：

“1960年起我又继续我的理论‘探索’，企图澄清‘民主社会主义’中的一些问题。我把艾德礼和熊彼得的反动理论视为至宝，设想什么‘共产主义两党制’。”

既然1960年就“奉为至宝”，那最晚从九死一生的商城回到北京的他，就已经认识熊彼得了。

那时他疯狂地买书，跑图书馆、资料室加上到地摊上“淘”，连家都不回（虽然“不回家”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书），熊彼得的书被他“如获至宝”地搞到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甚至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在他1950年代中期写作《试论》的过程中，就已经手握熊书，甚至可能已经手握哈书——哈耶克的书了。

暂且不提在他提到的在1945年大选中击败了二战英雄丘吉尔而被民选为英国战后第一任首相的艾德礼（这在民主政治中一点也不新鲜，公民们最要提防的，就是战争英雄们上台，因为他们要是搞独裁会更加简单和容易。当年华盛顿对有人要他当“皇帝”的怒斥，战后丘吉尔、戴高乐的败选无不如是），仅仅熊彼得“成熟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化”对顾准的影响就相当大。当然，《试论》中没有提什么两党制，但是关于“所有制”和“所有权”，“法律关系并非经济关系而只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等一系列“法权”概念，都可以看出二人的相似之处。

熊彼得认为，西方两百年间主要的民主理论皆建立在不真实的前题之上，例如不经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对投票内容的专业认识便以为多数的意见优于少数的意见，这样的民主学说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节，更没有真实地阐述政府权力的来源。熊彼特认为民主仅是产生治理者的一个过程，而且还不是一个必要过程，无论人民参与民主的程度有多少，政治权力始终都是在菁英阶层当中转让的。投票是民主的必要，但不是充分组成部分。如果缺少合法的代表和执行机制——将民意转化为具体政策的实体，民主必然会失败。民主并非是用来反映多数人的意见，而是旨在通过合法机制过滤多数意见，再通过正当程序将其转化为政策，这就是政治权力的功能。

这正是顾准所梦想的民主社会主义，却不幸也正是老师马克思最厌恶的。

从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顾准看到他这位老师十分向往雅典民主却对现代社会的议会民主深感厌恶。

“这就是《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基调。也许他读过格罗脱的《希腊史》，当然他不会为此书所动。不过100多年以后的我们，读格罗脱比较英国王政和雅典民主的篇章，却实在是有所教益的。”

文稿 270

他大胆地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论巴黎公社”的一个段落旁作了这样的批注：

“若没有两党制，若没有普通公民的监督权的高度发挥，这只能成为昙花一现。” 笔记 619

这“昙花一现”所指，正是马克思为巴黎公社勾勒的政权形式——“由巴黎各区按普选制选出的代表所组成，这些代表应该负责并可以随时更换。其中大多数自然是工人或已被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当然不是国会式的，而是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党制的，立法行政合一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

好大胆的反驳!!!这是不是太胆大了？被人查出来可怎生是好？您难道不知道哲学所“自然辩证法”课题组的朱锡坤不就是因为被人偷看了日记而受到检举揭发，不几天就卧轨自杀了吗？您难道忘记了前几年您在极笔的选集上，在《某论》、《某论》的空白处批注“逻辑不通”、“脱离实际”、“错误”、“不通”、“简直不通”……给您和全家带来的灾难了吗？

顾准不要餬口经济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民主的社会主义，然而他却绝不是一位“反社会主义者”。直到晚年他都这样表白：

“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 文稿 392

餬口经济-直接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

丰裕社会-两党制-议会民主-社会主义。

后者，才是顾准所梦想和追求的社会主义。不要再吞吞吐吐了吧——那就是菁英政治，菁英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所拥有的所有“刍蕘”才可能献出来，献给他们的国，他们的族和他们的民。

“娜拉出走了，1917年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可）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比Marx（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不过，每一代人不会满意他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的问题。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

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革命家如果树立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文稿 397

顾准，了不起的雄辩家。但凡人们能真正坐下来，令鼙鼓无声，让理性争鸣，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相信很难有人能“辩”得过顾准。只可惜生不逢时，他的时代既没有苏格拉底常常光顾的小饭馆，也没有亚里士多德踱来踱去的学园廊下。哦，不对，小饭馆和廊下倒是有，可墙上到处张贴的都是花花绿绿小纸条——“莫谈国事”。

第二十章 徐徐地、平静地成熟下去

1. “元点”

1973年的一天，顾准手握一本新到的美国《经济评论》，兴冲冲地找到一直在跟着他学英语的年轻人赵人伟。

“老赵（相对顾准，他们是年轻人，但也都是四十左右的人了，顾准一般叫他们老X），鲍尔丁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试着把它翻译成中文吧。”

北大毕业的高材生“老赵”欣然领命，可啃了几个星期也没有啃下来，愁眉苦脸去向咪咪的妈妈——张纯音求援，因为她也同时被顾老师布置了英文作业。不料这位从小就能看英文原版电影的世家女也正哭丧着脸——“我把文章中的每一个单词都查了一遍也无法理解文章的意思，看

来你我不是英文水平而是经济学水平有问题啊。”

当年的这帮年轻人对顾准能看懂这一类“天书”都佩服得不得了，可“老赵”、“老张”们却因为看不懂，实在不能理解顾准为什么对并不大出名的鲍尔丁的这篇文章这么激动。

鲍尔丁者，肯尼斯·艾瓦特·鲍尔丁。1910年出生在英国一个虔诚的美以美教派卫理公会基督徒家庭，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师从莱昂纳尔·罗宾斯（也是一位出现在顾准文字中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37年定居美国，先后在密执安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校任教。鲍尔丁自幼就是卫理公会教徒，以后又成为贵格会教徒。他不仅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宗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用宗教信仰来指导他一生的经济学研究。他在经济学中独特的贡献正是来自于宗教，这也使他有别于主流经济学家。

鲍尔丁认为，宗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一种价值观，信教者是用他们信仰的世界观来观察与分析世界的。这正是鲍尔丁自从进入经济学领域起就强调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反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根源。他认为“经济人”的假设并不现实，人不是只会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的理性动物，而是有感情、有狂热，有爱与奉献精神的。由此出发，他对传统的“厂商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厂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并不一定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厂商的决策也并不以边际分析法为基础，还会考虑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不应该把个别厂商做出决策的原则——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作为普遍真理，厂商的决策更多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鲍尔丁由此出发，创建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的厂商理论。

鲍尔丁和加尔布雷斯（另一位多次出现在顾准文字中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丰裕社会》的著者）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重视制度与组织。鲍尔丁与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是从基督教倡导的爱心出发去研究“组织”这种制度的。他认为，组织是由有意识并有意志的个体组成，它产生于三种力量：

1. 为获得相互利益的交易；
2. 报复的压力和恐惧；
3. 爱心或希望与目标相结合。

随着组织的扩大，恐惧日益代替了交换。这样组织就会停止发展。要避免这种前景，就要用爱心来代替恐惧。爱心是人类组织发挥作用的唯一基础，也是人的一般需要。这种爱正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他主张把爱放在社会伦理之上，以爱来代替恐怖的竞争，代替对抗。组织应该为这种爱的形成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正是组织革命的方向。

鲍尔丁认为经济学所探讨的是商品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他从他的宗教信仰出发，努力超越传统经济学，建立能体现基督教观念的经济学分支，例如，赠予经济学。他把赠予经济定义为“出于政治目的经济行为”，是一种由于受到威胁，或者出于爱心而产生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属于非市场交换行为，但在经济生活中相当重要，影响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与此相关的是爱的经济学与恐惧经济学。出于爱的赠予行为是礼品，出于恐惧的赠予行为是贡品，其余才是交换行为。经济正是由爱、恐惧与交换所决定的经济行为组成的。

鲍尔丁一生写了近 40 本书和 1000 多篇文章，自 1931 年起就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论文。他 1941 年写的《经济分析》是萨缪尔森（又一位多次出现在顾准文字中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畅行世界知识界的经济学教科书和必读书——《经济学》的著者）《经济学》出版之前最畅销的教科书，曾 4 次重印，被 150 多所大学采用，顾准也读过。

他的经济学著作还有：《和平经济学（1945）》；《经济学的重建（1950）》；《组织革命（1953）》；《经济政策原理（1958）》；《20 世纪的意义（1964）》；《经济学之外（1968）》等等。

这位顾准的同代人（几乎是同龄人）也是一位天才学者。1956 年，他在加州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仅用 11 天就口述了一本名为《形象：生活与社会中的知识》的书。他甚至还写过十四行诗。经济学中最有趣的譬喻——“经济学家既要成为亚当（Adam，《圣经》中人类的始祖）又要成为斯密（Smith，英文的工匠），所以我们才有了亚当·斯密”，就出自鲍尔丁之口。他这是在“借名发挥”，要求人们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

鲍尔丁写过一系列“作为 XX 学的经济学”的文章，除了《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之外，还有例如《作为数学的经济学》，《作为伦理学的经济学》等等。

顾准推荐给赵人伟的这一本《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的主旨是：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人既要成为经济人又要成为道德人。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不行，没有道德调节和政府干预也不行。在个性解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人应该成为‘经济人’，同时也必须成为‘道德人’，否则就会引发巨大的灾难。”

当年因译不好此书而苦恼的年轻人“老赵”，十五年后坐上了老所长孙冶方曾经坐过“官椅”——中国社会科学院（即从前的学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位置，此前还曾坐过林里夫曾经坐过的“官椅”——《经济研究》，就是那份1957年刊登了顾准《试论》的、中国经济学界最权威杂志的主编。

如今早已名副其实成为老赵、赵老的赵人伟先生也是当年顾准身边那群年轻人中间的一个。小老赵也真给他的顾老师争脸——中国国门洞开之初，就因“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获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奖。这个以老友孙冶方的名字命名的奖项成立至今已经三十余年，是中国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此后赵先生又分别在1986年和1994年因为“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两次获得孙冶方奖；2006年他被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1995年被列入美国的世界名人录（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

顾准天上有知，定然高兴。

事实上值得他高兴的还有许多个当年的小老X呢。他们后来几乎个个都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他们虽然经济观点有所不同，但为国为民作“刍蕘之献”这一点上却都和他们的顾老师一样执着。

但是在“元点”这个问题上就很难说了。

经济学界本身就是最容易出现猛烈思想碰撞和巨大观点分歧的学术领域，其碰撞的猛烈和撞击的反应不亚于物理学上的电子对撞。但是碰撞也好，对撞也好，都一定会有一个“元点”。物理学上困惑了牛顿一生的“第一推动力”说，生理学上的基因说，历史学上的文明起源说……等等，都是在寻找元点中产生的学说。经济学也是同样——它是让世界和人类更加有序、和谐发展，以及发现如何做到更加有序、更加和谐的方法，而不是为了引导人类走向混沌的“撒旦学问”。那么它也一定是有个元点的。但是元点在哪里呢？

顾准要小老赵翻译的这本《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就是要年轻人去寻找书中经济学专业之外、

所谓“功夫在诗外”的东西，去寻找那个年代他不便于说出口的“元点”，这个东西本来就有个堂堂正正的名字——信仰。

“有道德的人一定是有宗教意识的，这种意识的顶尖是一种难以表达的对生命和存在的感悟——信仰” 肯尼斯·艾瓦特·鲍尔丁 《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

身处言论自由环境下的鲍尔丁可以一语道破天机，身处“无产阶级专政”铁踵下的顾准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表达的。不能表达当然不是“并不拥有”。顾准“意识的顶尖”就很难说不是是一种信仰，顾准现象的出现很难说不是这种信仰的胜利。

尽管顾准从未受洗成为基督徒（幼年时的情况已无从查证），然遍读顾准，还是无法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思维方式和精神始基最接近的还是基督教精神，是“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过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文稿 248}的一种特别的，比普罗大众对基督教教义的朴素理解更加深入一步的思维和解析。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思维和解析的能力反倒可能妨碍了人对基督的接近。顾准也曾说过：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于上帝”^{文稿 248}。

这段话出自顾准和六弟陈敏之的通信集，2002年出版《顾准文存》时被冠以《关于基督教的笔记》，应该是出于作者认真思考后的严肃文字。但紧挨着这段话的、顾准记录的竺可桢先生多年前同他的一次交流以及他的感想又有不同的表达：

“教徒，他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的爱人类。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你不要以为康德没有市场了。竺可桢有一次对我说，他去美国二三次，美国现在道德水平下降了，这是因为宗教精神衰落了——事实上，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同上}

在这里，顾准显然不反感“并未企图把‘善’的元点从上帝手里夺到人的手里”的西方人的观念，虽然是借竺可桢、康德或“西方人”之口。

这样的表述在他的遗稿中实在太多了。这并不稀奇，除了可能的原因——顾准所处的“反基督”环境因素之外，他确实没有像鲍尔丁那样，可能也不希望像他那样成为一位虔诚的，经过宗教仪式确认的，积极参与宗教活动的信仰者。这也并不稀奇。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公开表明自己对基督教持有坚定信仰的大哲学家、大艺术家、大经济学家，例如在顾准的文字中屡屡提到的牛顿、康德、笛卡尔、雨果、培根、鲍尔丁、布莱尼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爱迪生、居里夫人、维特根斯坦……等等，还有些一生都没有受过洗，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却依然一生都以这一个“元点”为中心而生活的人。

例如前面章节讲述过的、近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艾瑞克·沃格林。

沃格林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以基督教，以《圣经》为“元点”探索历史的秩序，探索人类灵魂的秩序。在其等身巨著《秩序与历史》第一卷“以色列与启示”开篇第一句就是：

“神和人，世界和社会构成一个原初的共同体。” 艾瑞卡·沃格林 《以色列与启示》

但即使在美国这样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度里，他也从未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只是到了生命的末端，在他的临终前的十多天，病床上的他微笑着对朋友说：“我终于理解基督教了！”而他的朋友同样平静而愉悦地回应：“是的，艾瑞卡，但你将带着它上路！”艾利斯·桑多兹 《沃格林革命》。弥留之际的沃格林最后一句话是——“我在忏悔”，非常安详平静，却未要求受洗。

基督教提倡爱并且明确解释了什么叫“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慈爱；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扬，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 哥林多前书 13:4-8》

顾准在头破血流、唾面自干的苦难中“忍耐”生成了，在“忍耐”中一种生活方式生成了，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种罕见的品格生成了，它使最易滋生仇恨的土壤挺拔出最绚丽的人性之花，使最非人化的熔炉锻造出人最应该具有的形状——上帝自己的形状。

很难说这不是一种信仰的胜利。

有人判断晚年顾准其实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我不敢贸然采信，也无意下这样的判断。“是一位

基督徒”和“做一位基督徒”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事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眼下意义上“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言而喻，4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懂得。顾准最终是否“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不重要，他“做了还是没有做”一名基督徒，比之前者要重要得多，因为前者仅关乎“宗教”，后者才真正关乎“信仰”。

近年来积极推进全球伦理思想，倡导宗教对话，全球伦理基金会创建者，现代神学家汉斯·孔对“基督徒”下过这样的定义——“任何人，只要他拒绝专制，只要他指责神学家或教会头目的傲慢自大，只要他批评教会专制，批评教会与国家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假如从这个定义出发，顾准何止仅仅在晚年“成为了”基督徒，从读史，论史，纪史，解史开始并竭尽生命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知识，追求美，追求真理的他，其后半生就已经在“做”基督徒了，否则那些关于“契约”，“宽恕”，“罪愆”，“诫律”，“审判”，“悲悯”，“反偶像”，“反专制”的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顾准的文字被销毁，隐藏和阉割的太多了。假如这些文字能够公布于世，完全有可能在其中找到更多关于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和基督宗教的哲学化论述，更多的对基督教的阐释和更多的他的信仰意识。

“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文稿 240 ；

这是顾准在谈到文法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的研究以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时发出的惊呼。他不是憎恶而是欣赏着这一发现，就像当年马、恩、列对狄慈根全篇大谈上帝的《辩证法》的态度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于一个全能的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点。” 同上

话说至此，谁还敢一口断定顾准是位坚决反对“神性即寓于人性之中”的无神论者和“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者呢？就算是退一万步说，也有一个“哲学的上帝”，一个“不具人的形象的上帝”

站在他的背后，给他“元点”——信仰的支撑和宗教的情操，赋予他柔韧若水的“上下求索”能力。

假如将顾准的晚期作品比作一部灵性的欢乐颂，那么“元点”——信仰就是它的定音鼓，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就是这阙浑厚壮丽的交响乐中交相碰撞，缭绕上腾的主旋律。

2. 先知、此岸与彼岸

人们在谈到顾准时常常会用到一个宗教性很强的名词——先知，其中包含的神秘色彩和启示意味非常浓厚。顾准真的是一位先知吗？

他确实预测到了诸多多年后才显现的东西，例如——

1956年，他说“我们的财政现在是偿债而不是举债。我怀疑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举债而不是偿债”^{56.5.7}；中国应该“依托东方，开发西方”^{同上}。多年后中国果然必须实施类此国策；

1956年的党校日记，在论述完“自由主义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圣经”后，他话题一转“然而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即就其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是不完全的。物质的、利益的自由主义必然走向世纪末的肉欲与颓废”^{56.2.23}。1960年代他的马恩笔记表述得更清楚了——“一百多年来的实际经验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却同时造成了青少年犯罪的日益增加——从这里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人，当生活的顾虑减轻以后，不是走向个人的全面发展，而是走向纵欲。而纵欲这种‘自我实现’的方式，显然不是马克思所要求的‘自我实现’的方式。马克思是一个性善论者。马克思设想，一旦人类脱离了异化的困境，每个人都会像他那样力求‘实现自我’。经验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笔记469}。

这正是一位经验主义者和一位理想主义者在“脱离异化，实现自我”命题上的重大分歧。

从旧世纪末至新世纪初，这种肉欲与颓废果然在中国大地滥觞，资本主义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主义难分伯仲。在“**Materialistic**（物质的、唯物的）”消费主义的层面上，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和“憧憬中”的共产主义几无区别。拜日本人河上肇所赐的两个汉字——“唯物”，一百年后的今天倒是有了最好的脚注。

1959年在发配河南商城劳改之前，他说“世界太小了。世界的合理（经济）组织，看来只有经

过集团化——集团联合才能做到”^{59.3.12}。好家伙，此人 1959 年就预测了 1994 年才出现的 WTO(世界经济贸易组织) 和 2001 年中国的加入！

1960 年在经历过地狱般的商城劳改后，他说“饥饿会促使他们人相食、卖尿、说谎、拍马、害人肥己……后一个历史时期，为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60.1.15}，这个代价迄今依然在付出，且因为几十年“穷怕了”，“苦怕了”，“饿怕了”的普遍国民心态而生出畸形膨胀的贪婪，使得这“恶毒的影响”债台高筑，高息累累，付讫之日，茫茫无期；

1960 年代他就说，“我们的工业品可以而且必须进入先进国市场，包括美国在内。”^{笔记 P278}，“中国的工业产品不仅将占领一切不发达国家，还将直接拥进不论多高的关税壁垒的美国……请等着这个井然有序的世界的到来吧”^{笔记 315}。话音未落，国门一经洞开即成为事实。可是福兮祸兮？就算顾准再世，只怕也难以回答；

1960 年代，他提出“问题是法律和制度如何订定”^{笔记 280}。善哉，此事至今依然困扰中国；

1960 年代，他看出“马克思并不把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看成什么原则的区别，宁肯他是 favor（更喜欢）集体所有制的。关于这一点，也搜集了许多卡片，可以写成一篇文章”^{笔记 662}。“Marx（马克思）一定会奇怪，怎么号称宗奉 Marxism（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和中国，竟成为 Hegel（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热烈宗奉的，Marx—Bismarck—Hegel（马克思-俾斯麦-黑格尔）的联盟！”^{笔记 676}。多么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出这篇文章，也没有活到以老友孙冶方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成立的那天，否则他没准可以拿到首届孙冶方奖。

不过他若是真要写出这篇文章，一定会被定位于“非主流”！国家——集体——个人的顺序是绝不能颠倒的，所以他拿奖的可能性肯定是零。

1960 年代末，苏联正和美国在科技发展上争当世界老大的时候，他就断言“只要辩证法继续是教条，苏联永远不可能成为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发明的故乡”^{笔记 447}。又是个一语成谶，怪不得“老大哥”和顾某人永远处于“对不上眼”的状态，他最烦的就是整日介摆着个“辩证法教条”嘴脸的那帮俄国佬，他们也确实在科技上败给了从不将“辩证法”奉为天条的杨基佬。

1970 年代初，全中国尚在大革命、大批判的热浪中，谁抓经济谁倒霉的时候，他却断言“中国

革命（将）直接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凡在这方面做不出什么来，或者做得不够快的，必定要换班子”
笔记⁵³⁵，可谓一矢中的，所以才有今天被视作护身符的 CPD——谁低谁下台。

1970 年代，他说“资本积累必然导致贫富不均，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这已经成了个严肃的问题”^{文稿 349}，这个彼时真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才真正“是个问题”，是个大大的，且几乎是最大的“问题”；

1970 年代初他写给陈敏之的信中指出，“现在人类发现，人的活动对于自然的改变，对于自然界自身的循环运动的影响，已经不是可以忽略的了。于是发生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甚至宇宙医学问题等等”^{文稿 446}。在还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环保”这个词汇时，他就已经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忧心忡忡。“环境”、“能源”都已是世界谈判桌上的第一话题，唯“宇宙医学问题”还显得过于前卫。不过在已经有了“宇宙垃圾”喋喋之声的今天，顾准的预测，你我应拭目以待，不要掉以轻心。

1970 年元旦，身在息县农村劳改中的他预言了无限城市扩大化的后果，“无限的就业扩大，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大国，（这是）竭泽而渔，苏联可为借鉴”^{70.1.1.}。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城镇化”喧嚣吹唇唱吼。竭泽而渔？太夸张了还是太可怕了？且行且看。

同一天的日记，他说“与粮价问题相联系的是房价问题”^{同上}，天哪！彼时谁会知道什么叫作“房价”，今天它可不就是快成了“鸦片”——国家经济最大的支柱也是最大的心病？

1973 年，他说“要重新考量（美帝国主义和我们）‘较量’这句话的意义”^{笔记 360}。他“不想详谈”，仅仅举了一个“小”例子——朝鲜战争：“朝战是北朝先向那打，而这是 Stalin（斯大林）引得中美迎头相撞的策略的结果。这一点，早已不是秘密，我是 1950 年从内部得知的。看来这个问题也和我国今后走什么路有关。这又可以引起一大堆问题，也等以后再谈吧”^{文稿 360}。顾准所有的“文稿”和“笔记”都没有出现过“抗美援朝”的字样（真真假假的“自述”另当别论），日记也仅仅提到过一次——“抗美援朝可以说的对外斗争，也是对内斗争，它是对新中国的一个考验”^{55.12.16.}。

很明显，他对中国出兵朝鲜是不以为然的。如今“1950 年的秘密”已是尽人皆知，眼下无论谁来谈论和处理朝鲜问题，可不都应了“我国走什么路，中朝关系就是什么样子”的预言？更何况不经意间还蹦出个活蹦乱跳、生猛无比的韩国，真真的情何以堪！

……

顾准确实是一位天才，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点。但是天才并不等于先知。先知是被神以异象启示，而顾准从未经历过，哪怕像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劳改营医院中那样的经历^{注1}，他也不曾有过。顾准的启蒙、启示和启发都来自人类的知识和先哲们的思想，尤其是来自古希腊的思想以及被古希腊思想哲学化了的基督教精神——两希精神，希腊和希伯来精神。

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家就很容易被人称为先知，例如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熊彼得、哈耶克等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建言当下，但大多数人的依据是过去。只有极少数的天才，除了抚今追昔，他们还能想透未来，站在别人达不到的高度和角度上俯瞰众生，评论现在，评论过去。这才是大师或者先知。

顾准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他仅仅自承为一位“经验主义者”，他只是达到了马克斯·韦伯先生对经验主义者所定的标准——

“任何人，要想成为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范围广泛的比较知识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意味着去获得对文明进行比较的知识，不仅要知道现代文明，还要知道中世纪和古代文明，不仅要知道西方文明，还要知道近东文明和远东文明。那还意味着，通过保持与种种领域的专门科学的接触，而不断更新那种知识。在他看来，要是不这么做，就没有权力称自己是个经验主义者。”

何况先知通常并不精通于专门学问，如果他们有什么创造力，常常正是由于他们在专门学问上无过人之处。光是这一条，顾准就不符合先知的标准——他精通会计学呀。

1974年5月，去世前7个月，顾准开始读一部冷僻的英文原著——英国人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s , by George Catlin**），同时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后人在出版《顾准文集》时一般将这部分读书笔记冠名以“关于基督教的笔记”，并作为第一部分编纂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总标题下。这份笔记还包括两个附件，附录一是他摘译自《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的“圣托马斯‘政治学’语录”，附录二是摘译自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中的“罗马法与教父们”一节。

这篇读书笔记，实际上是顾准写作他最著名的篇章《希腊城邦制度》，写到第六章——最辉煌的伯里克理斯民主时，写不下去了。城邦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盛极而衰……他实在是心痛难忍，就像看到自己最亲爱的人们在堕落、自毁一样。他迷惘了。

迷惘的顾准甚至不愿接着写下去，《希腊城邦制度》嘎然终止在伯里克理斯民主。然而探索并未停止，希腊衰亡了，但是希腊精神存留了下来，他要探索希腊精神至今不但不衰还历久弥新的原因，是什么承载和递嬗了她，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新的东西发生？

“希腊文明如此卓越，然而希腊人的历史命运落得如此悲惨，这是基督教兴起的重大原因之一。”

文稿 303

这是《希腊城邦制度》停笔后他写给六弟陈敏之的信中的一段话，他的笔触有了一个拐点，拐向了对基督教的探索。阅读和翻译乔治·卡特林就是为此目的。这篇译文一般被冠名为《基督教》，但这也许是译者或编者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这一节的主要内容并非介绍基督教本身，而是：

1. 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嬗变——国家与宗教二元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阐发：

2. 对福音书的哲学化来自希腊的阐述；

3. 对基督教平等化的个人主义的阐述。

当然这点小疏忽并没有妨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也没有妨碍读者对译者的理解。在译文的最后，译者写道：

“创造——拯救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那是企图调和两者。因为实现这一条的时候，矛盾就消灭了。然而，彼岸世界的教会不可以有，此岸世界的职工运动和小人物的自由社团则是不可少的。

知识——信仰

Plato（柏拉图）是中间体，F. Bacon（弗·培根）— Plato（柏拉图）— Tertullian（特图里安）

此岸世界——彼岸世界” 文稿 263

这几句话意味非常深：

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拯救——社会的进步；

两两协调，矛盾消失就是共产主义的彼岸。但在到达彼岸前，此岸世界“小人物”的自由社团是不可少的；

假如把知识与培根划等号，信仰与特图里安（古迦太基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拉丁西宗教父和神学鼻祖之一）划等号，那么柏拉图就是中间体，是介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桥梁。

那么彼岸——共产主义到底是何方神圣？说白了一点都不新鲜，它就是渊源于基督教意识：

“范文澜不懂基督教，当然更不懂共产主义思想是渊源于基督教的。” 文稿 107

“即使 Marxism（马克思主义）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是另一种基督教意识” 笔记 116；

顾准在生命末端所领悟的共产主义，早已不是当年河上肇《经济学大纲》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政权作为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的、唯物的、物质的共产主义，而是被他定义为“渊源于基督教”的共产主义。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无神论——有神论，共产主义——基督教，辩证法——神学，多大的一个圈子，难道又绕回来啦？难道果真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3. 最远的跋涉也许是回归

在顾准全部的思考中，“娜拉走后怎样”可能是最大、分量最重的命题，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在精神的各各他之路——死亡与复活之路上最远的跋涉。

比起鲁迅的原创，顾准的“娜拉走后”要沉重得多。前者仅仅事关妇女解放，后者事关全社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命运；前者今天已经大致解决——居委会、妇联、职业介绍所、婚姻介绍所、妇女儿童保护中心……，只要娜拉还有理性的大脑，她都可以做到既不回到虚伪的“玩偶之家”，也

不走入毁灭的“青楼”，依然可以有未来。而后者——四十年前的勇者顾准在万马齐喑中霹雳一声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东方未白，欲晓非晓，连“破题”都还谈不上。

人妻出走本是寻常事，可中国真正的娜拉只有一个——秋瑾。她出走、革命、赴死，“秋风秋雨愁煞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娜拉、一个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可她们当真找到归宿和出走的价值了吗？

娜拉走后怎样？人类的道路走到今天，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下去？这不是问天，不是天问，它是震耳欲聋的人间之问，人性之问，人与人之间的对问。

“论到夺取政权，Kautsky（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Kautsky 对了。” 文稿 387

考茨基“对”在那里？顾准憧憬的人类社会远景到底是什么？两个问题只会是一个答案。

考茨基认为，民主与社会主义都是用来实现同一个目标——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一个种族、一群人。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二者不可分，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更意味着对少数派的保护。考茨基最重要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论的否定，也因此在一百多年中被意识形态分子骂作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尤其在列宁先生《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发表之后。

顾准从不把列宁先生看做思想和学术上的谈话对手，自然不会在意这篇“讨逆檄文”，相反，他欣赏考茨基的正是他在“娜拉走后”——夺取了政权后的理论，亦即他的“叛徒”理论——当阶级斗争以其全部的尖锐、恐怖、反人性展现出来并且变得不可收拾时，被迫从他的理论中引出的最终结论，即所谓“机会主义”的结论。你我只要看看考茨基的后期著作，“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也许就不需要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去探讨顾准本意。这是条捷径。

但考茨基毕竟是西人，还是不要偷懒的好。顾准这个东方人典例实在难逢，不要轻易放过。他考虑“走后怎样”的大问题横跨二十多年，但真正动笔把全部思考的过程写下来是在临终前的两年——1973-1974年，以一种貌似过于随意，实际是万般无奈的方式——和弟弟陈敏之通信的方式，在生命结束之前把这份宝贵的考卷交了出来，交给了人类。

顾准、敏之两兄弟在历尽劫波重逢后开始的哲学通信，自 1973 年 3 月开始至顾准去世前的 1974 年 8 月止。十八个月间，两兄弟京沪之间的通信没有断过。可惜的是，如今人们看到的只有哥哥的信而没有弟弟的，事实上兄弟之间的精神对话看上去成了顾准一个人的独白。

弟弟的信还在不在，假如在，为什么至今不见天日，眼下只能回避这个问题。但愿每一位读者都把自己当做陈敏之，去追问或诘问，否定或肯定，辩驳或赞同，这样我的文字才能仅仅根据顾准一个人的独白写下去。

这些只有哥哥的没有弟弟的、看似哥哥一个人自言自语的“独白”，粗粗计算竟超过了三十万字，足可以成书且二十多年后也真的就成了书，这就是王元化先生建议命名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顾准文存。它们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科学与民主问题的大篇幅思考记录（1973 年 3-5 月）；
2. 乔治·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中关于基督教的摘译和笔记（1973 年 5 月）；
3. 基督教与现代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1973 年 5-6 月）；
4. 欧洲封建主义和骑士文明的思考与评论（1973 年 4-5 月）；
5.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原始积累以及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资本主义的分析评论（1973 年 5-6 月）；
6. 老子、荀子、韩非子与孔子批判（1973 年 4-12 月）；
7. 为《希腊城邦制度》奠基的几个话题：
 - a) 东、西方两种专制帝国成因差异分析（1974 年 6-8 月）；
 - b) 希腊文明渊源于跨海的克里特文明；
 - c) 希腊僭主政治与民主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
8. 对恩格斯《反杜林论》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剖析与批判（1974 年 8 月）。

除了译文和摘录之外，这些文字都是他多年追索、探求和思考的结晶，也是他二十多年来读书笔

记精炼的文汇。一般是弟弟提问，哥哥回答，书信体的痕迹不是特别明显，要不是频频出现“你看”，“你不觉得”，“你认为”等字样，你甚至感觉不出它们是书信而不是文章。

这一扎书信的文字非常优美，超过了顾准以往所有的文字。顾准后来传世的不少格言警句就来自这些书信。许多人读顾准，首先从美学的角度上就被征服了：美的思想——精神，美的载体——华章，美的魂灵——人性，真可谓美不胜收。这种感觉，至少在我，绝大部分来自这扎书信。

与这些灿若夏花的书信相比，“日记”就显得晦涩，尤其是被人诟病至今的“新生日记”；“自述”则显得呆板，尤其“天大地大”、“爹亲娘亲”之类文革语言；《笔记》虽然也非常精彩，但毕竟比较凌乱，“细思量”后依然要“费猜详”。而这扎被后人冠名《顾准文稿》的书信则给人一张十分清晰的“顾准照”——一个有着希腊心灵形式的中国人。

常常有人后怕地问“假如没有陈敏之……？”这是无法回答，连顾准自己也从未去问过的假设。到了生命的末端，他已不再为世事忧虑，不再为明天忧虑，做好了今天的事情，他心安理得。

1973年整个春天，北京的顾准和上海的陈敏之通信非常频繁，五哥、六弟交谈的只有一个内容——科学与民主。日后顾准的老友王元化先生将其称作“低调民主”，以区别于“人民当家做主人”的乌托邦假民主——“高调民主”。

顾准如是说（以下是顾准论“科学与民主”命题的概略，非原文）：

由有教养的贵族静观玄览，爱琴海岸所特有的、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们对客观事物变革过程的感悟而生成的希腊思想，诞下了“科学”与“民主”这一对孪生兄弟。东方中国传统的官家思想文化——史官文化以及专属王室皇帝私产的手工业之所以生不出同样一对孪生子，是因为中国同时代人静思的结果却是排斥“格物（奇技淫巧）”，中国的经验主义只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因袭而不是以“致知”为目的的系统思考，这导致了中国思想的贫乏。至今传统思想还是中国身上的历史重负，只有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才能发展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不但是孪生的且是连体的，哪一个离开了另一个都无法存活。唯有民主才不致扼杀科学并发展科学研究，也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真正的民主，而不是“真主意，假商量”的假民主。

马克思本人就是个超级古希腊雅典迷，他的《法兰西内战》就是他近代直接民主制理想的表达。可是直接民主的原型——雅典和罗马后来变成了帝国。至于后来彻底承袭了东方式

专制主义的、被马克思称之为“没落帝国”的拜占庭帝国，不在讨论之列。

那么什么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民主？是雅典式直接民主吗？

灭亡了罗马的日耳曼诸侯实行的是孟德斯鸠的“等级君主制”，君王和诸侯之间是权力和义务的关系，这是这个蛮族在作为罗马帝国的邻人和雇佣兵的时候从罗马法的契约观念里脱胎出来的，也是启蒙时代的卢梭写出《社会契约论》的历史传承结果。

《法兰西内战》中的“公社”，效法中世纪西方城市里的自由民自治，好像一个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欧洲议会制度正是在这种组织形式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即议会，是在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后来有了《英国大宪章》，争得了王室对诸侯的“不侵犯诺言”，城市生长，商业发达，议会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舞台。议会演进，权利逐步下移，形成了民主政治——议会政治。再往后就是“代议政治”，议会代表立法权而王室代表行政权，这就是被孟德斯鸠系统化了的、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议会演化出政党。通过一个议案式的赞成派就是执政党，反对派就是在野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能使政治和政策的公开讨论成为可能，否则它们将永远是“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壁垒森严的宫廷里做出的决定。

这一套政治规则，在没有一般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契约观念也没有的中国是无法被理解的，所以中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而无“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

后来就有了英国和法国两种不同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后议会取得了全部政权，王室成了傀儡。这革命看上去死气沉沉，庸人气息十足，却维护了责任伦理和个人价值。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议会是英国式的，到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罗伯斯庇尔时期通过了恐怖主义，将立法和行政权集于一身。轰轰烈烈的革命复古了罗马时期的直接民主，却为拿破仑皇帝专制铺平了道路。假如罗伯斯庇尔不死，也只可能他自己变为拿破仑。这一点在德国希特勒时代也得到了验证。

马克思、列宁的直接民主-直接专政，熊彼得、艾德礼的议会民主-议会监督下的官僚机构，孰能，孰不能，孰取，孰舍，历史的事实已经作出了答案。

“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是有答案的——假如没有真正的民主，出走后的娜拉只可能自己变成海茂尔且只可能更虚伪、更残酷。

马克思、列宁都强调直接民主，事实却证明复古的直接民主是行不通的，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都是例证（中国就不说了）。列宁相信直接民主甚至到了解散常备军，以赤卫队取代的地步，然而结果却是：苏联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大的职业军队，它的官僚机构是除中国以外最庞大的机构。捷尔仁斯基的“契卡”成了贝利亚的内务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再来看美国。美国开国英雄华盛顿坚决拒绝当皇帝，但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和主流党对峙，成为两党制的基础。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的主要角色都在政治舞台上露了一手，假如套在 1917 苏俄身上，相当于斯大林、布哈林和托洛斯基轮流当了总统，联共分为两党，轮流执政。但这在现实中绝无可能，因为唯有美国这个新教徒移民组成的国家才会产生出华盛顿，这是野蛮落后的俄国绝做不到的。

议会政治被批评为“议会清谈馆”，庸人气息十足，被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所有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教徒所讨厌。然而“两害取其轻”，还是庸人的“议会清谈馆”好过革命的“蜻蜓吃尾巴”。两党制的议会政治是现代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根据一套游戏法则（宪法、选举法），谁赢谁“坐庄”。这样一定会产生一种职业政治家的精神贵族，不过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贵族”多如过江之鲫才好呢，要的是进步而不是向后看齐。

“保护少数派”是两党制的口号，这是英国人穆勒说过的话，是地道两党制的口号。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一百年中可以有那么一天、十天、几十天等于二十年，天天等于二十年一定闹笑话，我们已经受够了。

至于代议政治的官僚机构，那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日趋复杂，打烂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但立法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受到监督，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这一套全是进口货，可是不进口不行啊。不必设想李自成、洪秀全胜利会怎样，朱元璋不就是李自成吗？农民造反得有知识分子方可成事，可刘基、宋濂、牛金星、李岩类，除了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而外还能读到什么？他们不承袭旧制能建立政权吗？还有 1957 年的“百百长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那是恩赐的民主，肯定靠不住的。五四的事业，民主要进入中国，必得要是有志之士开路。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挣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说到“直接民主”，“人民当家做主人”等等，不是假话就是真无政府主义。为什么？因为首先，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对于现在没有城邦，都是民族且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专制，就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直接民主”不过是一党制、独裁国家的骗人的幌子。历史确实是人民创造的，但政治上当家作主并轮不上他们，无论是专制下还是“和平的阶级斗争”下，莫不如此。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的办法是有人在旁边觊觎，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更大，而是让人民在竞相贩卖他的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选择的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

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是为两害取其轻。

政治是一门专门的行业，需要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在台上时他们是总统、总理或外交部长，下台了，当一名教授或农民，这才没有褻渎民主的神圣含义。

一个主义一个党，必定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千千万万因为一个“你们将及身而见”^{列宁语}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出走的娜拉，如今却走进了“利维坦”的噩梦，比起虚伪、专制、摧残人性的夫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娜拉你可知道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科学与民主的道路——真正人类进步的道路。

民主是最不符合自然人情，最需要人栽培的政治制度，因而也是最困难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它却是出走后的娜拉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但民主并不是目的，和社会主义本身一样，它只是手段，是工具（早在1950年代他就声称接受罗素的“工具主义”），是用来实现人类的不断进步的工具。

东方的顾准和西方的考茨基对于“娜拉出走”的观点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终极目的——“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或一个种族”，并认为这目标就是唯一的“至善”。前者则连这个目的也不去假设，他只相信人类的进步，相信“至善”是一个水涨船高，永远也达不到的，却又是值得人类牺牲性命去追求的目标。

“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文稿 397}

多年后，当人们看到这些精彩“独白”的同时也恍然大悟到它们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常识性，但这并未妨碍知识界对它的激赏。在赞誉它是“中国思想界自1949年以后最为扎实也最为沉重的一次收获”^{朱学勤《愧对顾准》}的同时，还引起一片“愧对顾准”和“历史格外青睐顾准”的惊呼。

常识是人类世代经验的产物，其特性就是它的经验性，而顾准正是以一位“经验主义者”自居的人。最远的跋涉常常是回归，回归到常识。

中国政治有可回归之点吗？中国古代政治真的自有信史以来就是与人性相悖的东方式专制政治，真的就和古希腊罗马政治毫无共同之处吗？一位近代中国人——熊十力先生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中国古代不但有与古希腊相似的制度民主思想，还已经有了相似的联邦制国体设计，这个设计蓝本就是面世于春秋时代的政治哲学著作——《周官》，并据《史记》明言《周官》为孔子之作。

1950年春，熊十力通过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的辗转传递，以四万字文言上书毛泽东，直抒其多年研究《周官》之己见——这是古代中国创造性的民主主义、东方的民主主义。出于和顾准一样要为国为君作“刍蕘之献”的情怀，十力先生希望能以周官之解作今日之用，借古人之政治智慧作新中国国策建言，让看上去深谙、深喜中国历史的新君、明君能带领新国家走向、或干脆曰，回归民主政体。可惜的是，这封四万字长信在仅仅得到“长函读悉，谨致谢意”^{毛泽东复熊十力函答复后即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次年它被著者扩写为7万字，冠以《论六经》之题自费交大众书局油印了200册，流传民间，在失传几近30年的绝境中保存了下来并在1980年代被重新发现。而著者自己则早已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初期即绝粒而亡。

《周官》者言：

“万民有——选举和被选举、言论自由和监督、弹劾乃至罢免公职人员包括群臣、群吏直至王之权；对国家宪章、政策、法令和实施措施的知情之权；直接参与和决定联邦国家重大决定之权；要求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之权；无偿获得住宅用地和生产用地之权；劳动就业之权；受教育之权……。一切自然资源属于联邦万民共有；公平、诚信的市场制度；道德和科技并重的普及教育；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法律制度；礼乐的社会功能及其本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且有了“民主”、“科学”、“人权”的概念和术语。”^{郑绍昌、朱小平《解周官》摘抄}

这不啻中国的“理想国”，东方的“共和国”、“国家篇”！

中国最早使用“民主”一词的王韬（1828-1897）曾认为，“民主”这种最完美的政治形式出现在尧舜时代，而“君宪”出现在西周初年，是仅次于前者的政府形式。最后才是最糟糕的君主制，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制度民主思想在两千多年间遭到了集权专制制度的一再摧残、扼杀、阉割、篡改和歪曲。《周官》——这部十足民主色彩的政治哲学著作到了西汉王莽年代被正式篡改为《周礼》，“民主”萌芽归于灰飞烟灭，华夏中国从此走入“亚细亚”的、“东方式”的专制独裁政体。

顾准在他的时代能够读到的中国古代史，就是经过了如此摧残、扼杀、阉割、篡改和歪曲，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屏蔽——的历史，从他的文字中也看不出他读过熊十力的《原儒》，更遑论“七万

言书”了。顾准对古代希腊城邦制度、民主政体的的赞叹、羡慕和对中国历史的惋惜，他的厚西薄中，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且慢，也许此人用不着后人的“原谅”——

“‘西藏书于周室’，恐应解为要周室的藏书来阅读研究（古史）。” 笔记166

这是他读史笔记论及孔子“翻经”时写下的一句话。“西藏书于周室”出于《庄子·天道篇》，可是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有无“周室之书”已大可怀疑。顾准此说与王国维“解儒不可用汉字而是金文”并斥史官“汉儒解经多以‘汉制说古制’”的荒谬、与熊十力先生不屑于王莽、董仲舒独尊之“儒术”如出一辙，也是他直到临终都在反复阅读《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字大系》、《殷周青铜铭文研究》、《周易》等古文字学书籍的苦心。在根本不可能读到中国中古史籍——“周室藏书”或比较接近它的近古、近代“解经”的那个时代，顾准，在海量阅读后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读到的并非“真史”、“良史”、“信史”，了不起，太了不起啊！设若上天假他以时日，谁敢说他会写出一篇优美白话文的《论六经》、《注六经》、《释六经》，甚至是一篇现代《六经》来？

“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比 Marx（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见《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 文稿 396

那么顾准的“理想社会”、“理想国”到底是怎样的？那么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注1}？那么我反对社会主义吗？

注1：这里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因为顾准认同熊彼得的观点——“我没有分别为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下定义。我将完全不用集产主义这个名词，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也只偶然用于自称为共产主义的集团。但如果我不得不用这两个名词时，我将只把它们用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在分析历史上的用法时，多数作家曾试图给予它们不同的意义。诚然，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词几乎一贯用来指比其他各种社会主义者更彻底、更急进的人。但是社会主义的经典文件之一，题名却是“共产党”宣言。原则的区别从来也不是根本性的——在社会主义营垒内部公开宣布了的分歧，并不比社会主义营垒和共产主义营垒之间公开宣布了的分歧更小”。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吴绛枫译

4. 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

“那么，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 文稿 392

这是顾准写给陈敏之的非常精彩，也许是最精彩的一封信（后人将它冠名为《民主与“终极目的”》）中的一句话。紧接这句话他写道：“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 同上。这两句话曾令人很费解，也是眼下的年轻人不能理解顾准的痛点——怎么？反专制英雄要返回到“剥夺一切私有财产”的专制主义魔障中去吗？但揉揉眼睛接着往下看，眼前依然还是那面大书“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旗下还是那个反专制英雄——

“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东方某些国家也一样，你对那一套阿谀崇拜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任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同上

这是怎么回事？顾准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几乎无法把握对顾准思想的理解。

写于 1966 年 12 月，读欧文·拉蒂摩尔《中国的边疆》的读书笔记中，顾准这样总结各式各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

- 梁启超儒家的“社会主义”，是君上对庶民的恩赐而无“人生而具有的权力”的根据；
- 王夫之的“原君”，“原臣”，还是以君臣等级之分为前提的孟子再版；
- 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是基于租赋关系的权宜号召，同样无“人生而具有的权力”的根据；
- 天朝的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若还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前提，则人的自然权利还是没有地位。（不得不说，这里顾准显然没有仔细阅读《大同书》，好在他并未肯定《大同书》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前提，而只是假设。 - 著者注）。

何止在中国无法定义，“社会主义”——**Socialism**，这个据说最早由法国人圣西门、付立叶，英国人欧文首创的政治制度概念至今也还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公一嘴婆一嘴，令人犯晕。你看——

- 有上面三位开山祖的“空想社会主义”；
- 有号称正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 有俄罗斯的“苏维埃社会主义”；
- 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 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社会主义”；
- 有缅甸的“军人社会主义”；
- 有利比亚的“民众社会主义”；
- 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

.....

还有其他无数自称的“社会主义”。连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革命的老革命家们也犯晕，谁也说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说不清不等于没有——

“既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革命家还要自称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崇高的理想，革命家不因为说不清而且没有出现过公认的真正社会主义就轻易放弃崇高的理想。正如中国从古到今尊崇大同理想，不因为从来没有出现大同而放弃大同的崇高理想。” 周有光《民主是人类的经验积累》

顾准是幸运的，他没有这种“说不清”的困惑。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他有个明确的标准——凡不以“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权利”为根基而是以天子、皇帝、寡头、僭主、强人或一切统治者名义压倒一切人，没有个人权利，没有权利义务的观念，连契约观念也没有的“社会主义”，都不是他认为的、至少也不是他“不反对”的社会主义。

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呢？标准也同样——

“郭沫若说(《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孔老二必然论 Necessitarianism 不是宿命论 Fatalism。必然论，像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一样，确信历史演变，必然趋向一个至善的目的。惟有怀抱着这个至善的目的的确信，然后‘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才是有所本的。孔老二有这样的至善的目的没有？郭沫若把他描绘了一通（恐怕这也就是康有为所描绘的那一套）：称道尧舜，讴歌禅让，‘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恭己正南面’，即要制作一个‘东周’，实现他的乌托邦，唐虞盛世。这个乌托邦的内容是些什么呢？无非还是整个尊尊卑卑的等级秩序，加上那种行不通的，无所根据的（在这一方面，韩非尖锐地把它指了出来）父道社会主义，如此而已。” 笔记 117

这篇读书笔记写于 1973 年，是他对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旧版本后记下的大大的、无奈

的慨叹。时值全中国都处在晕晕乎乎“批林批孔”高潮中，顾准却拿被“人民”弃如敝履的孔老二的“必然论-宿命论”与至高至尊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并论，真可谓大胆至极。如此看来他对“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不买账的。可是他又说：

“那么，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 文稿 392

他认可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看上去很复杂，说白了却简单，他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他在1960年代二进经济所后通过翻译其书而认识的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熊氏社会主义”才是以“经验主义者”自居的顾准的真正理想。

人怎么可能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地活着是多么地无意义，尤其是在这群富有天职感——使命意识的人们，例如顾准的身上。只是他们看够了，看透了“从圣母玛利亚的理想开始，以所多玛的罪恶告终”的所谓理想主义。他们已经惧怕了“理想主义”这个词。

说到底，顾准这一群人坚决否定和抗拒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 文稿 432。他们勇敢地撕下权威、威权们“理想主义”的假面具，露出它的狰狞面目——在公共领域内以强行实现个人政治抱负为目的统治者的特权，和必须服从这一理想的臣民们的义务。在这两者之间毫无人格的平等、价值的平等和权利的平等可言，它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摘自《共产党宣言》的美好定律毫无关系，南辕北辙——只有权威、威权们“权宜凌驾于伦理之上”的、任性的自由发展，而臣民们的个人尊严和发展在它的面前只是蜉蝣、粪土、齑粉罢了。

他们拼了性命要抵制的，就是这种“理想主义”。

然而这群人怎么可能没有理想？怎么可能没有梦？

“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文稿 397

没有梦，卢梭写不出《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达芬奇画不出《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贝多芬谱不出《欢乐颂》和《命运》，雨果讲不出《九三年》和《悲惨世界》。没有梦，中国的顾准怎么会凭空生出一颗希腊心灵，去感受人类的苦难，去拼了性命地探寻人类的出路？

他们否定和抗拒的不是“理想”本身，也不是“绝对真理”本身，而是教条化、庸俗化了的理想主义，是那种“钦定的眼镜限定一切人全得戴上，不戴者斩”的、“钦定的绝对真理”文稿⁴⁴⁹。不用看别人，仅仅看顾准，在他的私人领域里，不是一直高高地飞翔着大书“科学”与“民主”的理想主义大纛吗？再睿智、再坚强的人，没有理想——真理——信仰做支撑也只会“沙器”般一败涂地，哪里会像他这样孤军奋战，左冲右突，万死不辞！

无法想象顾准是个没有理想，没有信仰之人。正如后人形容，他是“理想之敌、理想之友”刘军宁《理想之敌 理想之友》。

在熊彼得那本著名的著作里有一个问答句，作为整个第三篇的标题，和后人顾准“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的问答句相映成趣，简直能做个上下联——“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当然行得通。”

熊氏的这本书共分为五大篇。

在第一篇《马克思的学说》中，他分别将马克思放在先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教师四种位置上作了分析——

作为先知和社会学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属于向人们许诺在人世间建立天堂那一派，因此带有严重的宗教性。马的经济史观一直被称为唯物史观，他自己也这样称呼它（顾准则认为这是拜恩格斯所赐）。马氏“唯物史观”和它的跛子姊妹（熊彼得的刻薄与顾准基本等量齐观）——社会阶级理论，在信徒们看来简直就是揭开人类历史全部秘密的万能钥匙，然而他被自己制造的某些困难阻断了走向成熟的阶级社会理论的道路。他的第一合作者恩格斯的理论是分工类型的理论，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纯哲学角度出发，熊彼得说：“马克思哲学并不比黑格尔哲学更唯物。”

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无疑是李嘉图的学生，还有魁奈（弗朗索瓦·魁奈，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其价值理论肯定是李嘉图式的。他对资本理论做出了许多贡献，尤

其是对资本净收益的解释，即他的剥削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但就实际内容而言，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即使人们同意他推理的逻辑链，这个链的末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崩溃，我们还是找不到这个必然过程的内在原因。这里存在着计算错误、预期错误和其他各种错误。马克思经济理论完成了他的社会学体系，虽然并未成功，但在失败中它却建立了一个目标和一种方法。

在第二篇《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中，熊彼得说：“不，我不认为它能存在下去”。

他从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毁灭”、“垄断”、“投资机会的消失”、“资本主义文化”、“企业家智能的过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结构的毁坏”、“日益增长的敌意”等若干方面推断出资本主义终将解体的结论。这是以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创新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但是在熊彼得看来资本主义不会毁于它的本身——经济，而是会在“资本家和企业家”与“不断创新的技术”的促使下自动进入社会主义，前者（资本家）更被他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功臣和社会主义的先驱。他甚至说“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塑造了事物和灵魂，而且被塑造得如此完美，以致最后的一步不过是个形式。资本主义将毁于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失败，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而非什么阶级斗争。

第三篇就是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行得通吗？》，熊彼得回答得极干脆——“当然行得通”。

在本篇中，他首先肯定社会主义经济在纯逻辑性上没有错误，同时排除了所有“可以称为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东西”，声称不愿为讨论它们而浪费时间，然后才转入正题——

社会主义社会指的是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这个当局我们叫它“中央局”或者“生产部”，社会的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非私人。但第一，它必不是专制和独断的，它必须向国会或议会提出他的计划，也可能有一个监督和检查的权力机关——审计机关，有权否定它的决议。第二，必须把某些行动自由留给“现场负责人”——产业或工厂的经理们。

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世界，从旧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两种形式：“成熟状态下

的社会主义化”和“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前者的征兆之一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确切可能性，以和平的、不破坏法律连续性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后者的征兆则是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尚无准备，必须使用暴力来反对一些集团和阶级（不是孤立的个人），不可能修改宪法，即不破坏法律的连续性而通过社会主义原则：新秩序必须通过革命建立，尤其是通过血腥的革命来建立。

熊彼得极力赞扬并主张“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采用国有化。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可期待的事情。

第四篇，是顾准最为倾心的命题——社会主义与民主。

首先必须明确定义什么是民主。假如把“决策”和“统治”等同起来，“民主”的定义好像就是“由人民来统治”，但这不够明确，因为不同的集团在不同的时期声称他们就是“人民”，可是“人民”怎么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去进行统治？除非实行“直接民主”，人民本身决不能真正进行统治或管理，人民实际上也从未统治过，技术上的可能性就没有，却总能被定义弄得像在进行统治。但这不是民主。

人民必须想象为把他们的权力“授予”将“代表”他们的议会，而议会是一个国家机关，与政府和法院同等。人民的任务是选举产生政府，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接着，他提出“应用的原则”：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除了美国是由选民投票直接选出总理，所有其他国家选民投票不是直接产生政府而是产生一个被称为议会的中间机关，由议会产生政府——选举总理（国王、总统或什么委员会任命，那仅仅是形式）——总理提出内阁名单——议会投票表决此名单。关于他的政治地位，由三个必不可混淆的要素，以不同比例混合在一起——首先，他是作为议会中他的党的领袖担任此职，直接成为下院，间接成为上院的领袖；其次，他可以利用另一个党来强迫他自己的党；最终，他成为超越党路线、党舆论的全国领导。民主方法的实质，也是议会制度的实质在于：每匹“马”都有脱缰的自由，反叛或消极抵制领袖的领导，是“马”与“驭手”之间正常的关系。

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指“人民”在那里“统治”，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为防止要来的统治者破坏民主，他们必须经由自由竞争选民的选票才能上位。用一句话

定义一下——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事业生涯。民主方法成功的条件：

(一) 政治人物的品质必须是很高的；(二) 政治决定的有效范围不能扩展得太远；(三) 必须能够支配一个训练有素的由好出身，良好传统和富有强烈责任感和集体精神的官僚机构的服务；(四) 要有民主自制力，选民和议员一定要有高度的智力和道德水平，使其不为歹徒和狂人的献纳所动；(五) 对不同的意见作大度的宽容。

.....

总而言之，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它只能是多党制的、议会式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

“不同意见的人必定要组成不同的社团，发展的结果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度……（独裁虽不免出现，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展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生作用，任何事情也就不能在顷刻之间获得定论，自由争论，长期的政治斗争就成为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这时候，没有民主主义怎么办！”^{60.3.2.}

熊彼得的这部著作深得他的中国同道顾准之心——

“Schumpeter（熊彼得）优于 Bohm- Bowerk（庞巴维克，奥地利经济学家），优于 J. B. Clark（约翰·克拉克，美国经济学家）。他看出，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革新，他从不作静态的假定。不错，他也有他的静态观，但他的静态社会，是资本主义过完了它的豪情奔放的青年时代，该进入他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了。”^{笔记 299}

“Schumpeter 首尾一贯。因为他把边际理论扩大到社会动态，又把资本主义规定为其生命寄托于“动态”的一种经济。可是，社会主义难道能够是静态的经济吗？”^{笔记 301}

上面是顾准 1968 年被监管期间读西方经济学著作时所作的两段笔记。

比起罗伯斯庇尔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的社会主义，比起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社会主义，比起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英国式议会实在显得猥琐，“这全套东西表明一个民族没有领袖，缺乏领导，也就等于没有‘主义’……真叫做庸人气息十足。”^{文稿 384} 可是最害怕“庸人气息”的顾准却对这套“庸人气息十足”的“东西”击节赞叹。这才是他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但不是静态的），理想的人类发展必经之路（但不是终极目的）。比起庞巴维克、克拉克、欧文·费

雪等边际论经济学家，熊彼得更有意识地有他的社会发展观——在公开声明拥护资本主义的同时，断言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过完了豪情奔放的青年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成年阶段，且这个阶段必然是“官僚主义”——议会形式的。

这大概也是顾准 1973 年写给六弟陈敏之的那一札“漫谈民主”信函中“议会清谈馆”之议的基础——“自由民主”本身就是分权制衡与议会民主的代名词，却被老师马克思厌恶至极。1789 国民公会异化成为恐怖的罗伯斯庇尔牌绞肉机，“《九三年》（雨果有一本书的题目）却是 Marx、Lenin（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文稿 393}，顾准从这部绝大多数人从中看到高尚人道的名著中，独具慧眼地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整套政治体制——中央集中的政治体制。

正是在这里——直接民主与议会民主的交点上，顾准又一次与老师马克思相悖。

我反对社会主义吗？我不！假如为在中国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我可以再一次“出走”，像秋瑾那样的、真正的出走。

5. 他思、他言，故他在

顾准深受熊彼得“成熟的社会主义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从他全部已经面世的文字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两党制”和“保护少数派”两个概念，就是他从 1962 年最初接触和翻译《资、社与民》开始逐步确立的。

（后面凡提及此书均使用此缩写。因为二十年后有新人重译此书时用名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与顾准首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略有出入。）

1962 年顾准结束劳改，摘去右派帽子重回经济所。他一头扎进久违了的西方经济学期刊中，连抬头换口气的功夫都舍不得划拉出来。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宗井滔，一期也没有落订地订齐了《美国经济评论》、《译丛》、《动态》、《外国学术资料》……，伴着这些封、资、修的“货色”，这口“沙漠之井”

居然安然度过“反右”狂潮。他依然坐在那张老旧的、中研院留下的老式办公桌前，精打细算着怎样用最少的钱去购买最多的书籍，好让顾准这帮嗜书如命的人们吃饱吃好。

就在宗先生的盛宴里，顾准如获至宝地发现了熊彼得的《资、社与民》和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论文集》英文原版——“我还埋头读了几本这里那里借来的、前所未见的经济、历史著作，译熊彼得的书，就是这最初的一二个月中动的念头。”

所长孙冶方立即同意了，并很快帮他联系了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他日以继夜地干，自承“外文水平本来不够译这本书，译稿反复修改了二三次，可是我硬着头皮干下去”。他被熊氏这本书文字的隽逸，表述的透彻和立论的果决深深地吸引了。自己思考多年的东西，此公二十年前既已捷足先登、一矢中的，除了钦佩，只剩下赶紧把它译出来，让更多的同道分享的心思。

他羡慕起身边的同济来。巫宝三，原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经济学学者，关淑庄，原联合国经贸组织工作人员，他们都是熊氏亲炙弟子，亲见、亲聆过如此智慧之人师。掐指一算，当他们在哈佛的课堂上速记着熊老师的高谈阔论之时，正是自己在延安的窑洞中诚惶诚恐地聆听“读书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情，杀猪猪会跑，读书，怎么读都行；以及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比狗屎还不如……”训诫之日。

人的命运，知识的命运，中国经济学的命运，都被这两个课堂预定了。

关淑庄女士曾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同我们所受的完全不同。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两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而我们是两条线（供和需曲线）”赵人伟《从一些片段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女士一语道破两种制度下的两种经济学难以对话的原因，他们也都没有再“鸡同鸭讲”地争辩，只有顾准，一直试图使“两因素”和“两条线”包容并兼，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之路——

“如果我这修正主义者当所长，我要搞数理经济学，我决不会向涅姆钦诺夫卑躬屈膝地去取经，我会要巫宝三、关淑庄这些人来翻译介绍西方的东西，也组织人翻译苏联的东西，哪怕是搞修正主义，我也还要取两者之长，走自己的路哩！”

显然，顾准陷入了“关公战秦琼”式的徒劳，包括他翻译熊彼得《资、社与民》的良苦用心，都

是徒劳。诚然商务印书馆在他死后五年的 1979 年终于正式出版了这部世界名著的一译、一版、一印，可却是一部“供批判”的“毒草”。

五、六十年前的中国有个有趣的事情——“上头”常常会在出其不意的时间、出其不意的“人民”等级内，例如群众级、公社级、县团级、地市级、省部级等等，发行一本本“供批判”的“毒草”，有时还会是“毒草丛”——丛书。例如从五十年代起直到八十年代才绝迹的灰皮书和黄皮书，封面、书角上都印有“供内部参考”，“供批判”的字样，灰皮的发至什么等级，黄皮的发至什么等级都是严格规定的，其中就包括了严重影响顾准思想进程的《新阶级》、《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集》、《考茨基言论集》、《通往奴役之路》等“大毒草”。

1964 年，顾准译出了两部西方经济学名著，一本是熊彼得的《资、社与民》，另一部是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论文集》。1965 年两部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无标价版本，译者署名绛枫，姑且称之为“供批判毒草版”。但这两个版本如今都已绝迹。在译者死去五年后，1979 年，绛枫译本《资、社与民》正式发行，虽依然被标注了“内部发行”的字样，但封底也同时标注了价格——1.65 元。（《经济学论文集》则在 1984 年公开发行，译者顾准，定价 0.82 元）。千万别小瞧这个“1.65 元”，它的意义在于它首先已经是一件商品，是可以用货币购买的、非钦定的“形而上”东西。

从实质上讲，这本书依然是“仅供批判”的。也许这并非“上头”的意图，而是出于一种国民惯性。此时离文革结束刚刚三年，国、民都还处在惯性中——学术、思想、观念、人性和语言在铁罩一样的意识形态模子桎梏太久了，乍一看见外面的春光无限，即使花红柳绿亦如鬼魅魍魉，这一点，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踌躇再三，我还是不得不提到熊彼得先生的另一位中国学生，也是他哈佛亲炙弟子为自己导师的这本名著两个中译本——1979 年的“绛枫内部版”（以及 1965 年的“绛枫毒草版”）和 1996 年的“吴良健正常版”译本写下的序言。一本书，两个译本，三篇序言，时隔三十一年——1965、1979、1996。因为 1965 “毒草版”连带序言已经遍寻不见，只好从 1979 “绛枫内部版”与 1996 “吴良健正常版”说起。

1979年，顾译《资、社与民》正式出版。十四年前的“毒草版”序言被作了修改后一并发表。这篇序言与其说是书评，倒不如说是一篇标准文革体的大批判文章，其遣词之激、造句之烈都十分极端——“别有用心”、“恶意攻击”、“肆意歪曲”、“厚颜无耻”、“大言不惭”、“竭力诋毁”、“鱼目混珠”、“真实货色”、“不打自招”等文革常用语处处可见，从“……本书综合表现了……反动观点”起，至“……那就是在论断和手法上更加直接对地同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气脉相通，互相承袭和模仿”止，一万余字的文章，除了“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口号，经济学观点的阐发和学术说理几乎没有，完全看不出作者到底“想说”和“在说”些什么，却又几处写道“很清楚……”、“显然是……”云云，好像事先就知道读者和作序者的观点必是一致似的。难怪顾准的学生赵人伟先生在序言空白处批注——“没有说清楚，谈不上‘很清楚’！”。

此书是顾准家人1979年送给赵先生的，赵先生在扉页上记：“译者在生前答应赠我此书，但待此书出版，已是人去楼空。此赠书任务，是由其子来完成的”。他的批注也是1979年写下的，真是句大实话——不说理何来清楚？！

读罢熊彼得正文再回过头来读序言，真令人汗颜——一个在说理，一个在恶骂，都是经济学家和“著名经济学家”，但两人压根就不是在一个层次上对话。仅仅这篇序言就足以佐证即使时值1979年，《资、社与民》依然是一株大毒草，熊彼得其人、其社会主义观点以及顾准一类人的赞同推崇，依然是“反动”的。

时隔十八载，1996年该书出版了吴良健先生新译本。依然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依然是那位先生写的序言。同一个人为同一本书写下的序言，相隔十八年，文字大变。除了称颂熊彼得“很清楚”、“显然是”服膺马克思学说，并对熊的这种态度赞扬有加（虽然显得牵强）外，至少对熊氏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其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作了学术的上的对比，对师生两人都反对的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利息剥削论则基本不予置评。此外在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熊氏社会主义提出自己不同看法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兼收并蓄”的做学问的风度。

序言去除了十八年前版本中几乎所有的刀光剑影，有褒有贬、臧否基本上是说理的。中国读书人

经过 1949 年后的九蒸九煮，已稔熟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全套技巧。假如你读过这同一本书、同一译本，相隔十八年的两篇序言，同时相信海德格尔先生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你会真切感到“存在”在这里已是无家可归——知识、学问、人的意志、人的存在都在“语言”中流离失所，一无所依。

顾准的“新生日记”也有同样的悲哀，但好就好在他有“料”能让你“横”着看，看他同时的、真实的存在；而这位先生，他说自己“三十年”（1949-1979）都是“站着生活”（没有坐下来做学问，不做学问，没有学问），所以“横”着看，什么都没有，“人”已不存在了。

大哲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顾准“思”了，万幸的是还“言”了——口不能言我就笔言，直笔不能言我就曲笔来言，写给弟弟也好，写给抽屉也好，只要我写下来，言了，责任就尽到了。他写到——

“民主是方法，是保障自由与社会安定的手段，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是目的，但也不是‘终极’目的。‘民主’只关联‘进步’，与‘终极目的’无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大意

故他今天还“在”。

第二十一章 希腊心灵的形式

1. 人，不可以被奴役

五岁开始接触基督教文明教育，十二岁初入社会就生活在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浓厚的西方生活方式中，顾准的童年、少年同时受到希腊和希伯来两种文明的浸润，这在旧时中国人中概率很小，也是

“历史格外青睐顾准”的一个曲证。

“我在潘序伦那里过了十三年的社会职业生活……潘序伦的社会联系是多方面的——他是美国留学生……他的主要社会联系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民族资产阶级，他的主要政治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我在潘序伦那里的十三年，正是我思想定型的年代——从12岁到25岁，弥漫在“立信”这个机构内的，表面上含混、并未以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不能不对我产生异常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成年后的顾准对希伯来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圣经文化还有些顾忌，那他对古希腊文明以及她的现代传承——西方文明的倾心却是从不隐晦的。

“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拿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若无欧风东渐，五四运动何能掀起，孔老二怎能打得倒？科学与民主我们还是太少。第三世界的兴起，若靠传统的老本钱，我看还确有问題。沙特阿拉伯的巴鲁迪曾经慷慨陈词，西方人打到东方去，结果还是要滚蛋，这诚然是历史事实。但是，穆罕默德也曾带领第三世界西面打到法国的西班牙边境，东面打到匈牙利的边境，到底这个第三世界还在发源于‘航海、商业、殖民’之上的‘科学与民主’前面比下去了……” 文稿 423

顾准出此之言之时，正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急盼中国人民去解放”的流行语盛行，妇孺皆知，人人信以为真之日，他却深知这全是以己度人的夜郎梦呓、井底蛙言，恰恰反证了那一句“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愚昧。

熟读韦伯的他当然知道范围广泛的、对文明进行比较的能力——通过对不同时空条件下古今、中外、东西的历史现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将文明、文化、政治、政制，以“人”与“自然”为尺度来比较，来分高下的知识和能力，在历史研究中有多么重要。早年中国还有史家们在比较，比如胡适、吕思勉，比如钱穆、陈寅恪。“比较”本是研究、探寻历史规律必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希罗多德用过，司马迁用过，马克思、恩格斯都用过，可是到了顾准的时代却成为禁忌，1957年之后更成了“周天寒彻”的禁区——“数典忘祖”、“崇洋媚外”、“借古讽今”、“洋奴哲学”、“含沙射影”……帽子满天飞，罪名莫须有。

愚民的、去文化的、“餬口政治”统一下的史观，顾准是万难接受的。他毅然决定从人类最高层次的政治文明——希腊文明入手，写出他多年探索的重大题目“娜拉走后怎样”的第一部。目的，

还是要找出“走后怎样”的答案，再说得俗一点，人——娜拉，要往高处走。

顾准对西方文明的倾心并非盲目，他的史观也非突兀接受或形成，那是长达四十年日积月累历史学学养的集成、结晶。他的读史始于1930年，十五岁，到他落笔书写“东西方思想比较史”的1974年，整整四十四年。

“1930-1932年读过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陈寿的《三国志》”，尔后是“中国社会史”论战时的读史——中国史。到了孤岛时期，他萌发了系统读史的初念，“想有系统地读一些历史”。在同龄人专注于“行动”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关注“历史”、“伦理”和“哲学”，开始了一个人的“爱智之旅”。

到了文革前后，顾准的史观已经形成。首先，他基本上同意“中国文化西来说”。

“西来说”在清康熙年间即被定为“邪说”，康熙历狱——汤若望案即由此而起，汤神父也差点被砍了头。康熙亲政后更提出“西学中源”的史观。至乾隆，对西方和西学的夜郎自大、愚昧无知已达极致。“中国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之信”，人家英国人可能都忘记了，却被我们自己津津乐道，贻笑大方至今。

清末，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的“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出，大胆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和古巴比伦，一直被中国正统读书人视为异端。直到今天，“中国文化西来说”依然是中国史学界畅叫扬疾的话题。打开互联网，“西来说的终结”、“XX贩卖西来说”、“XX痛斥西来说”的标题满目皆是，可史观归史观，是人的意识，历史归历史，是事物本体，正应了一句“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不过顾准赞成郭沫若、范文澜先生“西来说”的史观是不争的，虽然他在其他历史观点，尤其是“五段论”史观上常常不厚道地詈骂郭、范两位先生。

“中国文化西来说，似乎已经可以定论。而且中亚-西亚古文明，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大概也已经可以定论。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从这个根子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除希腊文明而外，从这个根子发展起来的一切文明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类型的……除希腊而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发展不出来一种工商业城邦，同时，除工商业城邦而外，任何其他状态也发展不出来雅典类型的希腊文明。”^{笔记 36}

这是1968年顾准读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的一段读书笔记。虽然这部1949年版和1964年版的范氏《通史简编》已经彻底删除了初版的“西来说”文字，但顾准比谁都清楚范先生把自己的

著作改来改去的脉络和苦衷（见前章节《我的幸运在于思想的自由》），说不定比范先生自己都清楚。

中国文化“西”不“西来”，话题就够大的了，可比起下一个话题——文明源头从此有了东、西两大分支并被西方史家冠以 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主义）与 Western Democratic Tradition（西方民主传统），西不西来就小巫见大巫——不算什么了。对于这两个大话题，顾准都持明确赞同的观点，而后一个话题——西方文明的起源正是古希腊，更是顾准史观的立足。

黑格尔说：“希腊是人类的永久教师。一切现代文明都可以在古希腊找到源头”；

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古希腊是人性展开的最美好的社会幼年时期”。

希腊文化是世界文化可以夸耀的一切的起始——这一由来已久的西方学界共识也影响了一大批东方人。他们和他们的西方同好一样，好似出于本能一样地热爱古希腊并连同其后继——古罗马。他们把诗人雪莱的诗句“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腊”挂在嘴边，继而也说“我们都是罗马人”。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希腊罗马，就像谈论自己的爱人。他们高唱着“瞧吧，黑暗快要收了，光明已经射到古罗马的城头”^{1930年代电影《夜半歌声》插曲}扑向异族的入侵者，好像自己身后真的就是罗马城，就是台伯河。

这些人，在顾准时代的前期有个专称，叫做“言必称希腊”的人，与其说是称谓，倒不如说是讥讽，基本上是“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代词。到了他的时代的后期，尤其是1957年之后，古希腊、古罗马更是成为禁忌，别说创造性地研究，就是略略提起也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就是因为它们背后那洪水猛兽般的两个字——“民主”。

1973年，顾准生命结束的前一年，仲夏，他开始读被西方史学界誉为“最伟大的”英国古历史学家乔治·格罗托著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希腊史》。这是他动手实现巨大的著述计划——写一部东西方宗教、哲学和政治比较史（思想史，政论）的第一步的一部分。

希腊史一直是顾准读书的重头。早在党校时期的1955年，他就痛感自己历史知识的贫乏，特别是西方历史知识的贫乏，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史知识的贫乏：

“回忆 1940 年以来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毫无所知，这就使读书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 1955.11.25.

自那时起他就开始注重希腊罗马历史的阅读。格罗托的《希腊史》当然不是他读的第一部希腊史，在格罗托之前，他已经读过了许多古代和近、当代史学家的希腊、罗马史著作，他的相关阅读已在前面的一节《了不起的流水账》中作了详述。格罗托的《希腊史》放在最后阅读，也许是为“好戏在后面”，但须知在阅读、翻译和笔记格氏《希腊史》的时候，他并未意识到这将是最后和古希腊的亲近——立志还要活二十年（从得知妻子死讯的 1969 年发誓要为她“服丧二十年”算起）的他，仅仅五年后就随她而去了，足以传世的华章——《希腊城邦制度》，据六弟陈敏之陈述，原是五哥顾准十年研究计划的开篇之作，却不料成为未完成的绝笔。

顾准一系列最具学术价值的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作品几乎都涉及古希腊罗马。除《希腊城邦制度》之外，《关于海上文明》、《僭主政治与民主》、《关于基督教的笔记》、《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马镫和封建主义》、《关于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笔记》、《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老子的“道”及其他》、《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老二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吗？》、《论孔子》、《评韩非》、《辩证法与神学——关于〈反杜林论〉》……无一处不谈希腊罗马，真个是“言必称希腊”。

说顾准是个中国希腊人，有颗鲜活的希腊心灵，不过。

是时中国别说民间，就连大学的历史系，国家科学院也无人在系统研究希腊、罗马史，更遑论写出有价值的论文和书籍。一本“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为国立大学及师范学院历史系唯一教科书”的 B.C.塞尔戈耶夫著《古希腊史》成了中国唯一钦定的教科书和读本，可就连此书，也是经“日丹诺夫同志在哲学讨论会上正确地严评过的、含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的、需要批判的东西。例如说到修昔底德的著作，该书“已经含有历史现象底规律概念”，这无疑夺了“现代最正确的史学方法——马列主义”的风头，而“未曾指出柏拉图政治观点的奴隶主阶级的色彩，也未曾严格批判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极端反动的倾向”，则更是不能容忍的、故意的疏忽。以上黑体字均摘自该书引言及后记，根据《联共

此书直到 1980 年代依然还是中国各大学历史系的主要教科书之一，它的结论还是各种考试的标准答案。

顾准早早就读了塞尔戈耶夫的《古希腊史》，可是不仅完全不能满足他的知识要求，还引起了更大的怀疑——作者已经努力在往“马列历史规律”学说上硬套并且在 1939 年去世后由别人“删改增订”了，可还是被批判得一塌糊涂，那好，我倒是正经要看看那些“一点都不往上不套”的、完全由著者自由写作的著作究竟是怎么说的。

1973 年 6 月 13 日，顾准正式开读格罗托的《希腊史》，这一天的日记是：

“VI/13 History of Greece (希腊史)” 73.6.13.

他读的是出版于 1869 年的四卷本英文原版，这是乔治·格罗托《希腊史》袖珍版，虽然版本不同于 1846-1856 年陆续出版的十二卷本，但内容是一样的——起始于希腊远古神话与传说，中止于亚历山大之死和希腊的彻底衰落，全书大约 270 万字，字迹异常的小而细密。这部巨著至今无完整的中文译本，只有 1964 年商务印书馆为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使用出版了极薄（不足 50 页）的一本“摘选”——“伯里克理斯时代雅典宪政和司法制度的变革”，郭圣铭译。

至少八年前，即文革尚未起始之时，顾准已经阅读了史学大家汤恩比的代表作《历史研究》。汤因比的“非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点与他拒斥“历史五段论”的观点非常契合：

“Toynbee（汤因比）主义有其可取之处，他在解释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兴衰的时候，可以说明唯物史观所无法说明的问题。例如罗马的兴起和希腊的衰亡，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简直无从着手。” 笔记 310

早早就甩掉了“五段论”紧箍儿的顾准，阅读和翻译格氏《希腊史》和其他古希腊罗马史就没有了任何观念上的障碍和桎梏，也因此，他的读书笔记《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城邦制度》流畅清新，一泻千里，不仅仅是阅读希腊史的笔记，更是人类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的华章，即使放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不失其夺目的光彩。

格罗托的《希腊史》的主旨是阐述了希腊人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雅典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民主制度。在书中，他猛烈抨击僭主政治，攻击马其顿的腓力，把亚历山大当作一个不过有些才能的野蛮人，其目的只在于破坏，并想把马其顿亚洲化。格罗托关于雅典民主的记录和评述在西方至今仍是希腊史学的经典。

将近 300 万字的格氏《希腊史》，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一气读完，中间还夹读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又名《政体论》）作为导读，但从日记看，用时都很短。

希腊心灵，不，再准确一点，应该是雅典心灵——雅典潮流——雅典民主，这才是顾准最大的兴奋点。他把和她一度共生的斯巴达潮流，即停留在寡头、僭主政体上并借助其严酷纪律长期维持平等、尚武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心灵形式严格地排除在外了——

“我对 Sparta（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Sparta 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 文稿 268

显而易见，成熟的顾准是摒弃“斯巴达精神”的，和大史家汤因比对斯巴达政制的观点相似——“斯巴达社会和奥斯曼社会——这两个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成为集体偶像或被神化了的利维坦等级基础之上的。” 汤因比《历史研究》

个人主义的顾准怎会崇尚“斯巴达精神”？他崇尚的只可能是“雅典精神”，他的“希腊心灵”只可能是雅典心灵。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马克思相通。马克思是雅典精神的热烈崇拜者，《共产党宣言》所树立的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充满了雅典味道。老师要效法希腊创造一个现代民主，他完全不想取法于斯巴达的寡头政治而是要取法他深爱的雅典精神。但是可惜，雅典民主的条件——希腊城邦制度已不复存在，既向往雅典的直接民主又厌恶英国式清谈馆议会的马克思先生，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得不效法 1793 年的法国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的

公安委员会。这奠定了他被后世伟人们最钟情的名著——《法兰西内战》的基调。但是——

“可惜 Marx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过分理想化，理想的灵感又从来不是凭空可以得来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他未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的民主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所利用，真是遗憾！”文稿 271

谁被利用？马克思？

对！两千多年前的僭主们“利用”了他，其结果就是《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问世。与其说“利用”，不如说“误导”，无疑是“僭主政治”误导了马克思。顾准大胆猜测：

“也许他（马克思）读过格罗脱的《希腊史》，当然他不会为此书所动”文稿 270。可是——

“在这里，我必得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专制政体所作的‘阶级分析’，主旨无疑得自 Aristotle—Grote（亚里士多德-格罗托）。从这里又不妨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专制政治所作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文稿 267

马克思的中国学生顾准又批评了老师一次，相当严厉，但比起批判、指责“后伟人”们的教条主义，或者，用另一个更时髦的名词——历史虚无主义来说，还是温情很多。比如在说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干脆把《法兰西内战》所设计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时，他干脆将之归结为列宁对马克思故意的歪曲，事关知性上严重的不诚实，是害得世人“从往昔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文稿 270 的历史大倒退，是误尽天下苍生的今不如昔。

要说历史虚无主义，硬把“五段论”放在亚细亚，放在东方中国，大概算得上是史上最大的“历史虚无”，也是咱中国名言“于无缝处下砒”的好注脚、好应用！

假如将顾准在临终前写就的《希腊城邦制度》看作是他对希腊史的独立研究和对人类文明源头的解索，那么《希腊僭主政治 跋》就很明显是在“把希腊心灵的历史业绩‘当代化’为当时的政论”文稿 265，隐喻着他对现代政治以及政治史、现代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哲学史的看法。

“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本来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陈敏之《〈顾准文集〉序言》

这是六弟陈敏之在五哥去世后边哭边读完《希腊城邦制度》后写下的读后感。知兄莫如弟——

“他的本来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实在是一语中的，敏之序言最后一句话“我瞩目于未来”^{同上}，何尝不是替哥哥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被顾准遗赠了《希腊城邦制度》手稿的、他的学生吴敬琏先生也认为，老师的研究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找出“娜拉走后怎样”的答案，探索“播下革命理想主义龙种却收获法西斯主义跳蚤”的可悲因果。

实际上在这里连“隐喻”两个字也多余，他就是在“谕说”，在“善喻”，在“警谕”——王政、寡头、僭主政治，专制政制都不符合人性，都与人的自然权力相悖。人类从必然向自由迈进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希腊——雅典人为后世人们奠定的民主政治、政制之路。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应该具有希腊心灵的形式，人不能被奴役，更不应该“富于奴性”^{亚里士多德在谈到东方人时的不敬之言。}

到底何为希腊心灵的形式，雅典心灵的形式？一个好的注脚也许是顾准所译格罗托《希腊史》中的一段文字：

“当希腊人想到一个免除了法律上的责任的人，他们就把他设想为名实相符的实际上确确实实免除了责任的、有一个无防御的社会共同体被遗弃在他面前任其压迫的人；他们对他的恐惧和憎恨，恰好可以他们对于法律平等、言论自由，他们对于保障的希望寄托于其掌权之上的这样一个政府的尊敬心情来衡量——也许，在民主政制的雅典，更甚于希腊的其他部分。这种感情，正如它是希腊心灵中最好的一种，它也是传播得最广泛的一种——它在细节上虽有许多异议，在主旨上却是全体一致，被高度评价了的。”^{文稿 281}

非常拗口，多读几遍可明了：希腊心灵是一种感情，一种性格，一种感召力，一种将希腊人维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对独裁的恐惧与憎恶和对天赋人权的尊重和珍惜。独裁——毫无责任心的、无限制地对横陈在面前的无防御社会共同体任意压迫、摆布的政体；民主——可以将社会共同体保障的希望寄托其上的政体。假如一定要一言以蔽之，那么下面这句亚里士多德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了，那就是——

“人，不可以被奴役。”

出于恐惧、憎恶和希望，希腊-雅典人生出了一种愈来愈紧密的凝聚力：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情绪，全都趋向于这种凝聚力所形成的团结，它显示为城邦的第一个性。这种个性愈是高度发展就愈是被强烈地意识到，也愈是不愿意哪怕是部分地牺牲它。这种感情、性格和个性，感召和

凝聚力，就是希腊心灵。她是进取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却完全没有扩张的愿意，因为扩张意味着他们密切共同生活的松懈。她视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国是一种完全不值得讨论的“野蛮人”制度。她静观玄览，身体力行，得出改善社会结合的诸方法。那是一套高度复杂的制度——民主制度。再通俗一点讲，希腊人把“王”弄成是“可以惩罚”的了，与“神授——王权”、“超人——寡头”、“强权——僭主”相比，这是人类群体生活方式“质”的变化和飞跃。爱琴海边这个偏僻的、布满岩石的小小半岛，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就这样为我的世界奠定了现代生活的完整基础。二十五个世纪过去了，在西方，“民主”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流，即使反对者也少敢撻其锋。现代的寡头-僭主-独裁者们（即使是东方的），至少也要先摆出民主的面孔方能上得了台，站得住脚（最近、最好的实例莫过于爱蜀先生编撰的《历史的先声》），否则仅仅是那帮“言必称希腊”者，他们就对付不了。

希腊心灵，功莫大焉。若是天地间真有“正气”，希腊心灵必居其间。

但是遗憾，希腊的出现不具有任何普遍性和规律性。希腊文明是一个奇迹，是当所有的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文明程度一起达到了一个理想的组合，或者达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条件组合时，貌似自发地、突然地产生的一种最高级的文明。希腊-雅典文明只能出现和行使于奇迹般出现的希腊城邦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国家都可能出现的。顾准也说史家们在中国、埃及、两河、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等的历史中都找不到城邦制的影子，“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文稿 P481，“历史上不走这一条路（诸如“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始制”、“名份大义”、“孤寡不穀”之类）的古文明，只有一个希腊。那是各种特殊条件结合所成的特例”文稿 415。

希腊历史令历代史家“绝望”，因为他们无法在其上滥用“历史规律”这个概念，滥用了，那是要坏大事的。

也果然有人“滥用”，也果然就坏了大事。

“惋惜历史是没有用的”笔记 21，“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褒贬的，历史的教训所能照亮的只是未来，而未来倒确实有待于历史去照亮它的！”文稿 415

顾准如是说。

2. 契约精神、自然与人性的和谐

再来完整地读一下顾准的这段文字：

“从前我不知道有亚里士多德《政体论》，不免诧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究竟是从哪里取得的灵感。知道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知道了它本身就是格罗脱所说的进取的、爱好自由的希腊心灵的历史业绩的集录和评论，那么卢梭此书的来历也就不奇怪了。它是一个高贵的 18 世纪欧洲人读希腊史以后，也许还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把希腊心灵的历史业绩‘当代化’为当时的政论。”

文稿 265

“Greek mind”是写作《希腊史》的人们很钟情用的一个词汇，顾准也十分青睐它。

在翻译格罗托的《希腊史》时，他不译作“希腊思想”或“希腊精神”，而是译作“希腊心灵”。四个灵动的汉字立刻就把爱琴海、雅典、卫城、梭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拉倒读者眼前来了。顾准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像卢梭一样，把希腊心灵的历史业绩“当代化”为这个时代的政论。他视卢梭为榜样：

“卢梭的值得学习之处，不一定是他的智慧和灵感，更值得学习的是‘勇气’和‘技巧’”同上。

勇气，就是在王政-寡头-独裁者-僭主的统治下推进民主，不徘徊、不却顾；技巧，就是不仅仅翻译和介绍他人写作的古代史与著作，更在乎发出自己通俗的、煽动的、引起当代人思想感情的、为众生所喜闻乐见的政论。

后者正是勇敢者顾准生前发下的宏愿——写一部东西方思想比较史，一部巨著，一部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感情共鸣、且能被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政论。在中国，这不叫雄心叫野心——两者的界线很分明：“雄心”是“我们”允许你拥有的 Ambition（抱负，志向）；“野心”是“我们”不允许你拥有的 Ambition（雄心）。

1974 年 2 月 12 日，顾准下笔书写《希腊城邦制度》。

这篇极具学术性的史学文章是他迈出实践雄心的第一步，也是他一系列“希腊史”读书笔记的集成。文章2月12日落笔，5月1日实际上就已经写成，八十多天的时间，11万3千多字。

他始终称它是“Note（笔记）”，从题目——《希腊城邦制度 - 读希腊史笔记》，到日记，到给六弟的讨论它的信札，屡次提到它，遣词都是“Note”。既如此，你不妨将他的另一篇关于希腊史的读书笔记——《希腊僭主政治 跋》和写给六弟陈敏之的一封史学讨论信札——《关于海上文明》与它当作一体来读。除了内容，它们在写作的时间上也是连贯的，除了《跋》写于1973年之外，其余两篇都写于1974年。《关于海上文明》更晚于《希腊城邦制度》，以致可以看做是前者的补充。一体来读这三篇东西，会有更酣畅淋漓的读书感觉。

1974年，顾准即将与死神迎面相撞。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写着足以传世文字，但那种“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的轻松和超脱已跃然纸上，令人很难不联想到半年后他的遽尔长行。这些笔记一气呵成，不事雕饰，洁净优美，气势磅礴，令日后有幸读到它的人们展卷初诵血脉已张，难以忘怀也难以释怀。

《希腊城邦制度》开篇点题：

“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究竟是一些什么历史条件，演变出来这样一种制度，正是本文所要探索的。” 文稿 467

探索是和比较同时进行的，充斥着深刻的反省意识和反思张力。

以《城邦制度》为首的这三篇笔记，是中国自1949年始的现代史学中第一部挣脱了钦定的“五段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深厚的历史科学功底为基础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著作，说它“足以传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顾准是自1949年起至他死去的1974年止，中国唯一的一位政治哲学家，也部分是在这个意义上。

作为世界性显学的希腊罗马学在他的时代和国度曾是一片长期的、悲凉的空白和废墟。

介绍西方文化典籍到中国来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籍的“耶

稣会士”，例如利玛窦和南怀仁，徐光启则是中国学者中的代表人物。葡萄牙籍教士傅泛际和中国学者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名理探》，刊行于崇祯四年（1631年）。书中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是我国介绍古希腊哲学的第一个中译本。但是由于这批人自身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的了解深受天主教传统束缚，还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古汉语的中文，因此传播面狭小，在学术界影响有限。1905年，严复先生翻译的《穆勒名学》出版，1909年他又译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严复始终将“逻辑”一词译为“名学”），这才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第一批希腊哲学译著。

真正在中国奠定古希腊哲学翻译、介绍和教学研究基础的是20世纪初以降一批旅欧、旅美学者，其中以陈康、冯友兰、贺麟和严群为代表，是学术意义上中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第一代人。

冯友兰先生翻译了《赫拉克利图斯残句（一）（二）（三）》，写作了《哲学略述》等著作，但在将《庄子》译为英文，向来华的西方人士介绍之后，他就心无旁骛地专心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没有继续西方哲学史的研究；

贺麟先生曾大力从事翻译、介绍西方哲学著作，在西南联大时期领导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之后即专心致力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近代中国在古希腊哲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并影响巨大的是陈康先生。抗日战争中后期他回国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讲授古希腊哲学的课程，同时致力于翻译、介绍古希腊哲学的名著，于1942年翻译柏拉图《巴门尼德》篇（陈译本名为《巴曼尼得斯篇》），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和重庆中央大学开设“古希腊语”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掌握古希腊文的学者；

严群先生则在燕京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长期从事古希腊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并开设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课程，陆续翻译了柏拉图的多部作品，例如《浙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泰阿泰德》，《智术之师》等篇。遗憾的是这些译著都因为各种“政治”问题不能出版，直到1983年才得以见天日。

还有一位吴寿彭先生，机械工程学家却谙熟古希腊文，热衷于亚里士多德著述的翻译。1955年肃反，因曾在国民政府任工程处长、局长等职而被捕，后免于起诉。1957年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

翻译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顾准探索希腊城邦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就是这本书。

事实上，必须“言必称希腊”才能进行下去的中国古希腊罗马研究，在1949年以后已经全面禁止，直到1980年代，中国才开始古希腊罗马研究艰难的再起步，到1980年代末才算开了些生面，也不过陆续出了十多篇论文而已，和世界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即使仅仅和苏联相比，也没有一部可与塞尔戈耶夫《古希腊史》媲美之作问世，恰如《鼙鼓无声，理性争鸣》一节提及的那篇今天的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专业人士论及这一话题的表述：在经历了1949到1980年代无奈的学术停顿和恶意的历史虚无后，“到了1980年代末，（中国才）共有十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并出版了一部专著《希腊城邦制度》（顾准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① 赵丽珍《30年来的古希腊罗马史研究》。

你看多可笑，被专门家定位于一部“学术专著”的《希腊城邦制度》竟未被注意到它其实是一部万户萧疏、万马齐喑年代的作品，它也不是出自专门之手，而是一位会计学家出身的外行，在空白与废墟上单枪匹马、拳打脚踢开垦出一片生光葳蕤。

如此，说顾氏的《希腊城邦制度》为开山之作，传世之作还为过吗？先来看看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著述：

首先，《希腊城邦制度》勇敢驳斥了与历史事实不符却三人成虎、积非成是的谬说，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历史的本体——希腊的、西方的，中国的、东方的。它公然谴责了对历史缺乏尊重敬畏之心、将历史炮制为寡人工具的“古为今用”说，告诉世人，历史的真正用途，是“用”来启迪人温故之思、反思人类发展进程的百科全书，是而不是“用”来加强当代统治的权宜之术。它蔑视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史学家在“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待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②毛诗的专制高压下，不加掩饰地顺从统治者“历史学应该和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加强统治的目的来解释和重述（或者编造）历史”的主张，无言地责备了他们的功利、怯懦和知性上的不诚实——情愿在“政治”的帅旗下做优孟，做班头，为曹操歌功，为秦始皇颂德，为武则天树碑，为李自成立传，为太平天国编神话，为义和团唱赞歌，也不愿、不肯去反思历史，更不敢说出那两个来自西方，来自希腊的

洪水猛兽般的字眼——民主。

首先，它直截指出老师马克思的“主义”在史学论据上的缺失，由此缺失而产生的论证的偏差以及结论的谬误——

“马克思本身也受了极大的时代限制。马克思的古代史学，是上世纪 60，70 年代的水平，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利亚文明。换句话说，除迦太基而外，欧洲另外两个海上文明是不知道的。你现在翻翻《家庭，私有财产……》和马克思关于 Morgen（李维斯·亨利·摩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他（Engels 在《家庭……》中说的，都确实代表 Marx 的意见）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氏族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土著’直接形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把历史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部族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前国家的部落联盟等同起来，这真是天大的错误。” 文稿 300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灾难后果——一种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古典进化论单线演化模式的诞生，再经由恩格斯的曲解和俄国人的蛮横演绎（顾准甚至用了“强奸”一词），衍生出号称“历史铁律”的“五段论”公式，在近一个世纪内霸占了半个地球的历史学话语权，成为在这个星球上制造出许多人类的、人性的、人道的悲剧的“阶级斗争动力论”和“暴力革命决定论”的理论依据。那真是，顾准一点也没有夸张，“天大的、误尽苍生”同上的错误。

其次，它谴责了“先知的成分本来就稀薄很多”^{笔记 P696}的恩格斯先生对历史的“曲解”，甚至，顾准不认为那是“曲解”，而是“不诚实的歪曲”——

“……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把易洛魁人的直接民主，直接和雅典民主焊接在一起，完全撇开了 Sparta（斯巴达）；而且，还不惜（其实，就“客观主义”的历史而论，是歪曲）把分明神权政治的希腊王政（译文作巴息琉斯，即希腊语的王）说成是“军事民主。” 文稿 269

也曾有过“超人”、“英雄”、“神授王权”，有过王、寡头、僭主的希腊，从公元前 594 年的梭伦改革起确定了民选原则，确立了官员的任期和不得连任制，建立了世界政治史上第一个以法治国的政制。他们不但有了宪法，还有了民法与刑法的雏形。基于庄严的“契约”——权利的互相转让观念，他们建立了“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任何人都要立誓遵守契约，也就是后来的法律。他们确立了防止官员终身制和滥用权力的罢黜制度，确保官员“公仆”的性质不变质、不

腐烂。他们建立了真正的人民司法制度，法官由公民抽签产生，人人都有参加陪审团的义务。他们首创的、专供平民控告官吏和贵族违法行为和对执政官在其任期终了时实行政绩审查的“申诉法庭”（Helia-

ea），是最具希腊特色的了不起的司法民主，也是中国芸芸众生直到1990年代从《秋菊打官司》才知道的“行政诉讼”的鼻祖。

《希腊城邦制度》在第六章第四节写到城邦极盛期的伯里克理斯民主。伯里克理斯是推进了梭伦开创的民主制度的、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在一次阵亡将士纪念会上，他说——

“我们的政治制度并非抄袭于任何其他的国家。我们不是历史的模仿者而是为历史提供了典范。我们的制度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我们的人民在法律面前无贵无贱，一律平等。我们选择官员只考虑能力不考虑阶级。我们不但保证人民的政治自由，而且保证人民的生活自由。我们公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显示他是自身的当然主人，并且依靠自身理性的指引，对个人事务作出独立的判断……我们的公共生活没有排他性，私人交往没有互相猜忌，如果我们的邻居我行我素，我们也不会生气……我们在私人交往中无拘无束，在公共举动中则毕恭毕敬……” 伯里克理斯在公元前437年冬季雅典阵亡将士纪念仪式上的演讲

这段曾话被许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引用，其中就包括格罗托、塞尔戈耶夫和沃格林。这段话因为是对现实的陈述和赞美而不是对未来的空谈和约许而显得更加珍贵。二十五个世纪过去了，每一位书写希腊史的人们都很难绕过这一段“阵亡纪念演讲”来讲述希腊城邦和雅典心灵。

“帮助公民”成为城邦的中心思想和目的——是的，没错，帮助公民，还包括奴隶。连彼时钦定的苏联人写的古希腊史也这样盛赞：

“人民大众，连带奴隶在内，生活在民主制度的雅典，总比在其余有别种国家机构的希腊城邦还要好些……。雅典人选择了这样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贫民比贵族生活得还好……雅典在一切方面都偏重贫苦的平民甚于贵族……在雅典甚至不能鞭打奴隶。”（俄）塞尔戈耶夫《古希腊史》

希腊为我们的世界奠定了现代政治生活完整的基础——法律、法庭、民法、刑法、巡回法庭、民事调解官、陪审团、申诉、国际仲裁，宣战、媾和、交换战俘、发还战死者尸体、同盟与和平条约、使节、领事馆、公民、市场监理、城市监护、公共水源管理、注册、典狱、执罚、信贷、契约、买卖

条约……。连顾准也惊诧：

“我们读古希腊作家留下来的史籍，比如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往往不免怀疑，那里所说的一套国际惯例是不是把古史现代化了。然而作者确实是生在希腊的古典时代，而且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一个方面军的将军，因战败撤职而从事写作的。” 文稿 477

希腊城邦制度是基于契约观念，而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式霍布斯自然丛林法则而胚胎、发育、长成的。也只有城邦希腊才可能孕育出希腊——雅典民主这种人类文明的菁华。这是《希腊城邦制度》最重要的、篇幅占去最多的论述。自然的和人性的两个方面的和谐与秩序，可以说是希腊哲学中的根本性观念，也是顾准最为欣赏的部分，其溢美之词本身就写得非常唯美，《希腊城邦制度》不仅是一篇出色的政论，也是一篇足以进入普通语文教科书的美文。

3. 僭政与民主

关于城邦制度下特有的僭主和僭主政治的论述，是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和《僭主政治与民主》两篇历史笔记的重头戏，这在他的时代可真正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空谷足音，这座空山至今也还是人迹罕见。提出和研究关于希腊的僭主制度本身，已经远远超出了“言必称希腊”——一种尚可饶恕的、勉强可以算在学术范围内的“过错”，而是走向了“罪”的危崖险峰。

僭主和僭主政治这两个概念和术语，在顾准读格罗托《希腊史》之前的所有笔记、信件和文章中都未涉及，显然对他来说也是个新东西。

写下这两篇文章时的顾准已经通读了格罗托的《希腊史》并服膺了格罗托对古希腊政治科学研究和立论的方法。从这部巨著中他汲取了“现代希腊史著作中的古典观点” 文稿 266 并从古典的学问中得知了什么是僭政，更重要的是，不自觉中，他“已经能够而且自认为有责任将他所处的时代以专政为面目出现的政体诊断为僭政” 沃格林语了。

顾准并不同意将“僭窃”（相对“世袭”和“民选”）了统治权的强人称作“暴君”，而是相当欣赏“僭主”（Tyrant）和“僭主政治”（Despotism）这两个中译词汇。他甚至将他们称作“民选独裁

者”（亚里士多德称其为“民选调解官”，并认为这相当于“公举的僭主”），也不否定僭主和僭主政治（强人和强人政治）在历史上的作用，尤其是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他们是王政-寡头与民主政府间的过渡，僭主只是不合法的“王”。但有一点他清楚地意识到：城邦，尤其是雅典，是绝对与僭主制对立的。而城邦，就是政治。

此时顾准那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情绪很明显地表露在他的文字里和写作过程中。

开读格罗托《希腊史》仅仅一周，他就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同时迫不及待地节译了第一卷、第二部《历史的希腊》之第九章《希腊的僭主时代》的一大部分。日后这些读书笔记被编纂为《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作为译文（标题为《希腊的僭主政治》）的跋。他这一次的系统阅读和思考，其急迫和冲动之情十分明显。

格罗托关于希腊僭主政治的论述引起了顾准极大的兴趣和兴奋。很难说他只是在阅读和解索古代历史而没有一种像卢梭一样的、“把历史业绩当代化为这个时代的政论”^{文稿 265}的冲动。今天我们读顾准在临终前写下的《希腊城邦制度》，倒是不妨把这篇“跋”当做它的“序”或者“导读”来读，它完成于开读格罗托《希腊史》17天之后，下笔《希腊城邦制度》八个月之前。

在王政寡头政体崩溃后，希腊人的政治经验还不足以促使他们立即进入民主政治，只剩下僭主政治一途。这种政制至少可做到“均贫富”，至少城邦中所有人所受压迫是平等的。僭主们既非世袭又非民选，通常都是在国族危急时刻崛起的强权人物，即所谓“超人”。在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主义素养的族群内，他们成了民众的领袖、导师和统帅。僭主政治是地道的专制，一旦这种政体确立，那么就只有僭主的更替和专制政体的永久化，且只可能愈变愈坏，能够钳制它的，只剩一种力量，那就是“希腊心灵”的力量。“希腊心灵”不允许这种局面维持下去——僭主政治只能是王政寡头政制和民主政制的中介和过渡，且只能是短时间的过渡。在希腊心灵强大翅膀的驱使下，僭主政制只有向着民主政制发展一条路，别无他途。

顾准读格罗托的《希腊史》关注的重点正是其中关于“僭主政体”，即王政寡头政体向民主政体过渡的一个无法避免的中介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向民主政体转换的过程。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僭

政”问题上，顾准与西方同时代政治哲学家在完全无沟通、无交流的情况下又一次“契合”了，非常神奇，却也符合哲人们“感悟验证约定法则”。

1948年，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利奥·斯特劳斯发表了他作为“开拓其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力作”^{著名西方哲学研究学者刘小枫教授语——}《论僭政》，以义疏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著作《希耶罗》的形式论述了僭主、僭政的概念以及僭术种种和僭主心理。他指出，在面对以现代性为外表出现的当代僭政（各种形式的现代专政政体）时，人们反而不认识它了，也就是说被它欺骗了。因此能将这些现代专政政体诊断为僭政即完成了对它的去蔽——识破它。《希耶罗》是“专门讨论僭政问题的唯一一部古典作品”^{沃格林语}，它在指控僭政（病理学）的同时也提出了哲学家对僭主的教导（医疗学）责任。

斯特劳斯和沃格林一样，也是从希特勒纳粹铁蹄下逃到美国并终其一生在研究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代大家，特别在僭政问题上。在《论僭政》中，他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僭政政府统治下，知识分子对僭政批评的自由问题——如何能频繁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不会在此过程中被杀害。对于柏拉图和色诺芬来说，这种有缺陷的政府形式——僭主政治已经是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东西。城邦堕落了，民主已经不再能有效运转，“僭政”就成了它不可避免的替代者。斯特劳斯认为，“一门社会科学如果不能以医生言说癌症的那种确信来言说僭政，那它就无法理解现代社会的真相”^{摘自《斯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沃格林则认为“一旦哲学家们再次从古典学问中得知什么是僭政，那他们就能够而且也有责任将当代许多以专政为面目出现的政体诊断为僭政”^{同上}。虽然两人在“更广泛的哲学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例如神学与哲学、启示与人类知识、希腊与希伯来精神的对立与统一、信仰与哲学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强烈冲突，却并未妨碍他们在僭政问题上的热烈探讨和相互支持，正是这些“一致”和“不一致”的猛烈碰撞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友谊。

也正是在僭政问题上，顾准与斯特劳斯和沃格林契合了。

例如如下的观点：雅典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治、僭主政体而勃兴；僭政在希腊历史上之必然；僭政总不免愈变愈坏以及它和希腊心灵的冲突是导致的民主潮流兴起的中介物；当称一个现实政权为僭政的时候，“宪政”政府将是一个可行的代替……等等，《僭主政治与民主》和《希腊城邦制

度》两篇文章都做出了相当出色的论述。虽然这些文字在数量、深度和系统化上都逊色于斯氏和沃氏，可你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它是首创、是壮举，对顾准而言则意味着他已经“对无产阶级专政论述以及它们在苏联和中国的实践”去魅了——它们被识破了：太阳底下无新事，它们古已有之，那就是僭政。

尤其特别的是，顾准一方面强调僭主政治是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将中国和希腊的政治发展史做了比较，再一次阐述了马克思对专制政治所作的阶级分析并不符合中国历史，更不适用于中国现状。

当希腊正从王政过渡到雅典民主的全盛期的同时，地球的另一边正是中国的春秋时代，可惜这个巨大的东方族群没有走他的西方同类的政治道路，而是从“礼乐征伐出天王”走向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走向七雄并立、法家兴起、秦汉统一，走向彻底的、东方式的专制之路。在顾准的这两篇文章中，他实际上已经将中国各朝各代的开国帝王都列进了“僭主”之列，只是在史官们笔下他们个个都成了“奉天承运”的开国明君。写到此处，顾准对历史的“惋惜”之情又一次跃然纸上，也正是他“惋惜历史是没有用的”^{笔记 20} 哀叹背后真正的惋惜。

希腊的僭主和僭主政治是这个“人性展开的最美好的社会幼年时期”^{马克思语} 很难避免的短期和过渡产物。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三十僭主之治”就是典型的被希腊人看做政权被僭夺的时期，顾准将之称为“变态，不能算是常态”^{文稿 471}。也有不少为了城邦的利益而坚决不做僭主的人们——雅典的梭伦和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都曾有过建立世袭僭政的机会，却都在任期届满时自动放下了政权。顾准尤其欣赏他们那“更不类僭主行径”^{文稿 603} 的行为方式。可惜中国没有出现过梭伦和彼塔卡斯这样的“打天下而不坐天下者”，各位“奉天承运”们都由僭主过渡到了“王”和“皇”并名正言顺地“坐”了“天下”，名正言顺地世袭了下去。

稍稍离题一下：乔治·华盛顿先生在率领美国人完胜独立战争后立即解甲归田，回到他的弗吉尼亚家乡继续做花生农。卸甲前有一位尼古拉上校“劝进”他做美国国王，华盛顿怒不可遏——“先生，我曾做出过什么错误的事情竟会令您产生如此的误会，以为我会对国家做出这样祸害最烈之举，

诚百思不得其解” 1782年5月22日乔治·华盛顿致刘易斯·尼古拉。初闻，国人想必也多是“诚百思不得其解”，殊不知这正是他们的传统——华盛顿先生不能，不愿，不肯，不可以做个僭主！二战英雄，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莫不如此，这才弄得顾准犯下“我把艾德礼和熊彼得的反动理论视为至宝，设想什么‘共产主义两党制’”自述³³⁰的“罪行”。

《城邦》还大量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僭主们、僭主政体和僭术的描述：

“单独一人统驭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高，对于人民的工艺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

“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切足以使民众聚合而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全都应加预防”；

“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

“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同其他的人都好像陌生人一样”；

“使住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汇集在他的宫门之前。这样僭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风尚”；

“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们的尊严和自由”；

……。以上黑体字均为顾准摘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对“僭术”的一段故事性描述，对顾准震动尤剧——

“相传……（米利都）僭主司拉绪布卢曾遣人问计于另一邦（科林斯）的僭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至黍穗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就这样去汇报主人。司拉绪布卢听到了，心里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出的人。”同上

这应该是顾准写出他对斯巴达政体的反感——“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文稿²⁶⁸的出处。

这些“僭术”与数千年东方中国专制式的“政治术”如出一辙，而僭主们的心理状态，他们最终

所要、所爱欲的也正如斯特劳斯义疏《希耶罗》中哲人西蒙尼德的表述——并非智慧，而是“爱”本身，是荣誉，是一切让他显得像个王者，从而可以激起民众真心爱戴的东西，只有这样他才会快乐。

这里顾准又问了一个犀利的“为什么”——僭主或者“公举的僭主”或者“民选调解官”，或者相似的政治概念，为什么从不见于古代中国？他这样阐述自己的认定：实际上中国从“三家分晋”的韩、赵、魏，“田氏代齐”的田成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到“草莽暴动”的刘邦、“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欺孤凌寡”的赵匡胤……哪一位都是僭主。就算那被孔丘捧上天的“文武周公”，要真从殷商“法统”来论，又何尝不是僭主？至于近代，就更不用说了，这样说下去，岂不就水银泻地般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顾准再有胆有识，估计写到此处也却了步——不去趟这浑水也罢，反正该说的都说了，何必不留一点想象的余地给读者？可你要是能耐得下性子返回头来再看他早年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写下的读书笔记，就知道实际上他什么都说了，这层窗户纸他早就捅破了——

“既说没有一个 by（林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中之‘by’ - 作者注），又说选举？不是，最多不过像东汉的举孝廉而已。这种“选”与“举”，仍以皇权为其主体的”笔记 P206，“（中国的）‘公权’只有应试权”笔记 204。

一种政制，既然没有“by”（孙中山曾对译为“民治”），当然没有“公权”，更不可能有“民选”，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民国以来的历史，孙中山实际上不占重要地位，他只是一个思想家，占地位的是袁世凯、蒋介石和……，除此以外，就是群雄并起，令严几道（严复 - 著者注）之类慨叹‘一线生机……先王教化（严复原文为‘一线命根，乃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现在一线生机，存在于复辟。’ - 作者注）”笔记 205

其思考都化作无言之言缩略在省略号中了。中国不是没有僭主和僭主政治，而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官文化只有“直书弑君”的传统而无“僭主”的概念。中国的僭主们在史官的笔下都成了“奉天承运”的开国帝王，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的敌手而后确立的，而孔、老、墨、庄、荀、韩都是在为它的君临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称他们是利国利民的“天赐”。正因为他们可以在土广民众的王国

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室、朝廷以及为王室和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唯有有这样的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唯有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谎言才能发生效力。

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迦太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都事同一律，没有出现过希腊世界那种古怪现象”^{文稿 272}，但是这种“希腊古怪现象”——由于城邦条件而产生的、“绝不允许僭主政治长存”的希腊精神——希腊心灵却被西方人承袭了下来，发展了起来，最终成就了现代的民主。

在顾准的时代，这是极为大胆的史观、史论。它不仅对那个时代、也对我们的时代提出了挑战。在不自觉中，顾准履行了一项一位真正的政治哲学家的义务——“能够而且自认为有责任将他所处的时代以专政为面目出现的政体诊断为僭政”。

彼时中国，持这种史观史论并有所表述的，大概“只有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虽然只用了二页来对付僭主政治，观点却明显的是 Grote（格罗托）的”^{文稿 266}，以及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提出的“让步政策论”，稍有涉及。占据着历史学话语霸权的权威们没有谁敢提“僭主”、“僭主政治”，更遑论将它们与“民主”、“希腊心灵”、现代民主相提并论了。“僭主”意味着独裁者，“僭主政治”意味着专制和独裁，这可不仅仅是“敏感”而是巨大的禁忌。试看范文澜、翦伯赞先生也就是蜻蜓点水般的“让步政策论”，不也落到个“全民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惨境吗？再上溯一点，有陈独秀先生晚年对苏联专政体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批判，在这一点上他无疑大大地早于顾准。但陈独秀的批判是基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依然充满现代性——以为这是“太阳下的新事”。这是他与顾准“从现代希腊史著作中的古典观点攫取理论根据”最大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基础原也是从希腊精神和城邦制度推论而出的，却囿于时代和考古学的限制而缺如、不完美，更因为恩格斯和俄国人的“曲解”、“歪曲”甚至“强奸”而变形，其演绎出的“政权永远是阶级的政权，专制主义或僭主政治是相互斗争的阶级谁都无力克服对方时兴起的一种过渡政权的理论”^{文稿 272}被硬性规定为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铁律”而强加于人。可是这种理论

完全不适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尤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同上}。

这就是顾准口中误尽天下苍生的天大错误。

马克思原是最主张自由与民主的，但由于性格的极端和观点的激进，加上西方国家自由民主体制不完善，议会民主的作用不仅发挥不大，而且由于没有普选权，大量的工人处于无权地位，造成一生追求民主的马克思厌恶议会。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他老人家原创了一个德文复合单词 Parlamentarischer-Kretinismus——“议会克汀病患者”或者叫“议会痴”，用以批评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和柏林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后更泛指醉心于议会制度的人。俄国人列宁沿用了这一概念，更将其引申、发展到将“相信议会式管理制度并认为是唯一的、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主要政治斗争形式”的党派和个人称作“机会主义者”。

《雾月十八日》之后的《法兰西内战》则更是直接提倡法兰西大革命的风尚。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风尚，是要复共和罗马之古，亦即复直接民主之古。倡导直接民主，一方面要消灭异化，一方面也是复古——复公民大会之古，也是复共和罗马之古”^{文稿 380}。

顾准又忍不住要刻薄了，他借花献佛，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历史总要出现两次，第二次是讽刺剧”^{同上}，这一幕讽刺剧，就是“1789年（的）议会转为国民公会”^{同上}，“直接民主的理想，来自《法兰西内战》”^{文稿 374}。

“现在人们读《法兰西内战》，简直是和尚念经。对《法兰西内战》究竟说些什么，历史渊源如何，当然一概不知道。至于拿它跟现实生活对照一下，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它究竟行不行得通，当然更是无从谈起了。”^{文稿 381}

看，他又剥了一颗“洋葱”。

至于死命揪住“五段论”、“阶级斗争”教条，说起来似乎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史家，顾准更是把他们一个个骂了个遍——“数典忘祖”，“太无史识”，“太不谨严”，“荒谬”，“实在牵强得太不像话”，“实在可怜”，“太无聊”，“干巴得很，像个瘪三”……诸如此类，不仅是不留情，连点口德都不留。可话说回来，《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著作没有出自中国一位专业的、真正的历史学家之

手，而是让一位会计学出身的外行占了头鳌，真不知是知识界的骄傲还是悲哀。

4. 从雅典到耶路撒冷

希腊民主为人类展开了迄今为止最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蓝图，但那是古典的、城邦式的直接民主，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效法。

“没有大一统，兴起于一隅的文明不可能大规模传播……事实上，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 文稿 303

这是一句断章（但不取义）之句，摘自顾准搁笔《希腊城邦制度》之后写给六弟陈敏之的信。此时《城邦制度》并未写完，写到第六章——“城邦希腊从盛极到衰亡-公元前5至4世纪的希腊”，他“卡了壳”。

“IV/28 卡壳” 74.4.28.

此时离他动笔不足80天，成文已过十一万字。顺着日记看，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写得都非常顺利，一共用时两个月。到了第六章，他感到了困难。

“其间他给我的信中谈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记中所记的‘卡壳’，打算重写。” 陈敏之《〈

顾准文集〉序言》

第六章并不是《希腊城邦制度》的最后一章。三天之后的五一节，他在日记中写下“结束 cht.6”，此后就再也没有写下去的记录了，这是没有写完的一章，《希腊城邦制度》也就此成了永远的残篇。

日后许多读者都以为是身体的病痛阻止了顾准将她写完，但他的“卡壳”不像是“卡”在身体上而更像是卡在对历史的迷惘上，一份“替古人担忧，为古人惋惜”、普通人很难理解的心伤之痛上。伯里克理斯年代——希腊文明的极盛期实在是太辉煌也太短促了，泰极否来，还在他有生之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已开始，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是因为雅典人过于富强使斯巴达人感到威胁，于是他们发动了战争。

“我写希腊城邦，本来是有感于在希腊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至今我们还在受其惠。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而且这个波斯帝国，此时已经奄奄一息，而希腊则纵然在自相残杀，还是方兴未艾——对于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起来了。” 文稿 302

既迷惑于创造灿烂文明的、“小邦林立”的、个人主义的希腊，又厌恶军事独裁下压抑人个人创造性的大一统，顾准迷惘的思虑和笔触都开始转向。他甚至撤下已经拟好的第六章第四节“伯里克里斯民主——城邦希腊的极盛时代”的六个小题目，以及其中第五、第六、第七节的纲目而不惜，毅然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从希腊转向希伯来，从雅典转向耶路撒冷，从希腊心灵转向了基督心灵：

“希腊文明如此卓越，然而希腊人的历史命运落得如此悲惨，这是基督教兴起的重大原因之一。Ionia[亿奥尼亚]自然哲学是兴高采烈在探索大自然奥秘的；Stoic[斯多葛]哲学返回到人的内心，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里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作的；《新约》最初就是希腊文的创作。” 文稿 303

《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停下来了。从第六章《城邦希腊从盛极到衰亡》只有题目没有内容的最后一节——第七节“城邦希腊的消亡和希腊文明的传播于广大区域——以马其顿为首的希腊同盟和亚历山大征服”看，显然这才是全文的结束——希腊文明在广大的世界西方传播开来，但生出她的伟大母亲——城邦却消亡了，希腊衰落了，亚历山大征服了，罗马人就要登场了……。

他几乎是不忍继续写下去，最终也确实真的没有写下去。从来做事有始有终的他做了一件有始无终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城邦》之后的顾准并没有放下笔来。此时据他去世还有近七个月的时间，健康状况确实已经非常不好，发烧、咳血，去医院已成常态，但他没有搁笔是无疑的。在这二百多天里，他翻译了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中“罗马法与教父们”一节，翻译了圣托马斯“政治学”语录并写下了《关于基督教的笔记》。除此之外，他还与六弟陈敏之作了一系列历史讨论的通信，其中包括日后被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关于海上文明》和《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

假如愿意，假如他满足于手头现有的史料，他是完全能够把城邦希腊写完的。无论如何这是他一

生最钟情的题目，且是他用去一生所作的“一个人的探索”将要落在纸上的开篇之作。可是他终于没有把它写完，而且对已经成文的部分不满意，一直犹豫、纠结着，要不要重写。日记中他屡次提及要“Reconsider the notes（重新考虑这个笔记），特别是“从盛极到衰亡”的、悲惨的第六章。除了迷惘的心痛，更明显的原因是：他在为城邦的希腊、挽歌的雅典之后就要来临的青史做准备，那青史就是——古罗马和基督教的兴起。

这一点，从他的那两篇译文——《圣托马斯“政治学语录”》、《基督教》和关于基督教的笔记看得最清楚。这三篇文稿的完成时间非常紧凑，都是在《希腊城邦制度》停笔后的那一个月——1974年5月之内。另外，还有8月他写给六弟陈敏之的两封信也是很好的佐证：

“关于罗马史，或者说一般的西方史，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它和希腊、迦太基一样是外来的海上文明，而不是当地土著的文明……” 文稿 296。

“关于基督教，你现在发生了兴趣，你来的时候，我可以提供你一点资料。有一份万把字的翻译稿（就是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中“罗马法与教父们”一节—著者注），这是我近来读书时为求理解译出的，读后可以讨论讨论。还可以介绍两本书目，你设法去借。此外，你最好找一本圣经，若你实在找不到，我可以帮你买到一本《新约》。这些，来时再说吧。” 文稿 304

显而易见，临终前半年的顾准并不是被致命的疾病拖累而未完成他的《希腊城邦制度》，而是因为要为第二个主题做准备而中止了《城邦》的写作。

“基督教，其福音书来自希伯来闪族犹太人，组织得自罗马，而它的哲学则来自希腊。” 参阅文稿

257

不妨把顾准摘译的乔治·卡特林的这句话看做他放下《城邦》的写作，转向另一主题——“罗马、基督教文明与希腊思想的结合”的转捩点，探索希腊、希伯来文明的结合、后果以及它对人类发展起到的重大作用——这就是顾准的下一个目标。

《希腊城邦制度》没有写完，但已经足以展现这位中国希腊人的心灵。它的残缺并不妨碍后人对它的赞美——这是一部集勇气与技巧于一身，推到、打碎偶像之作，一部未完成却如残缺维纳斯一样美丽的作品。况且还有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存在：如果作者能被假以时日，例如再多活一年，他也

许会在捋清楚基督教在罗马的崛起——一个弱东方小民族的宗教是怎样征服了罗马这样的超超级大国的，然后再返回头来完成城邦希腊的研究。毕竟，希腊哲学的宗教化和基督教的哲学化是多么壮美的命题！

希腊民主，它拷问着顾准那个过去的时代，也拷问着我们眼下的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挑战，一个哲学的挑战。

注：关于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在中国的状态叙述，得益于多年从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老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希腊语言学家李真先生的指点和帮助。

第二十二章 籽粒落下

1. 最后的一年

1974，甲寅虎年，平年，天下太平。就算世界有事，中国有事，也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1月，全中国的人开始批判一个古人——孔丘和一个现代人——林彪；

2月，苏联逮捕一位名叫索尔仁尼琴的异见人士并剥夺国籍、驱逐出境；

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因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水门事件辞职；

10月，瑞典人纳尔·缪尔达尔与英国人弗·冯·哈耶克因对货币理论、社会和制度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经济波动现象的深入研究，以及从方法论和研究方向上惊人的相似性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独一无二的获奖组合令世界经济学界大吃一惊：哈耶克居然获奖了，而且是跟缪尔达尔一起获奖！用同样的方法，两人得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论——缪尔达尔是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创始人之一，亲自参与了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哈耶克则是现代福利国家最激烈的批评者，早在40年代他就指出这是“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国，他的同名著作被列为“最反动的大毒草”而受到激烈批判）。瑞典皇家科学院以政治立场的对立不允许影响学术研究为由，坚持让两人一起走上领奖台。有趣的是，被寄予厚望的琼·罗宾逊夫人落选了。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消息令她的英国同胞十分失望和愤怒，许多人聚集在伦敦的广场上哭泣。她也从此被称作“未获奖的最伟大诺奖得主”。

这一条新闻，也许就是顾准有生之年最后一件世界大事了。10月10日站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大厅颁奖台上的哈耶克先生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在东方，在中国，有一位日后将被人们称为“中国哈耶克”的人正进入生命倒计时。

可那天顾准埋头捧读着的却不是经济学著作，而是哈耶克先生的乡党，英国史学大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的《英国史》（又名《自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

“X/15 Macaulay (麦考莱)”^{74.10.15}——这是顾准最后一篇日记的最后一个词，时间是1974年10月15日。这样说好像不太准确，后面还有两天的日记，但都只有日期没有内容——那只写了一辈子的右手再也无力书写了。假如把他歪歪扭扭写给陈敏之的最后一封信和被他称作“奇耻大辱”的最后一个临终签字排除在外的话，“Macaulay”一字可以说是顾准真正意义上的绝笔，四十多天后，他的遗书都不得不由六弟敏之代笔。

麦考莱的《英国史》也是他读书无数的一生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

在顾准的历史研究中，英、法两个欧洲“超级大国”的两次截然不同的“超级革命”一直是 he 关注的重点。他看出它们的共同点——“议会都是斗争的中心”^{文稿 378}，更看出它们的天差地别——前者妥协的进步和后者暴政的轮回，他的赞叹和嗟叹是不言自明的。

同他做研究的一贯精神一样，对英国史他是不会轻信一家之言的。在读麦考莱之前他已经读了初版于1962年的、中译的《人民的英国史》和《英史编年》，作者是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英共历史学家阿·莱·莫尔顿。它们当然是钦定本（直到今天，中国的文科考试标准答案依然据此为标准），也当然不能满足顾准“多元”和挑剔的胃口。从息县回到北京，靠近了书海——北图，他当然要读非钦定本，这是不言而喻的。他立刻就找到了它——麦考莱的《英国史》，绝对的非钦定本，非“人民”本，英语原文，冷冷清清搁置在外文馆的书架上。

1973年的顾准日记中，出现了“England in 1685 (1685年的英格兰)”^{73.2.8}，这是麦氏《英国史》的第三部，重头戏，就算他含含糊糊不注明出处，也不可能产生歧义。

这套有二十卷之多的《英国史》十分浩瀚，但笔触的年限却仅仅只有17年——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继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与莫尔顿从公元前三千年伊比利亚人开始的宏大叙事式《人民的英国史》相比，麦氏《英国史》只能算作《英国近代史》，可顾准关注的却正是这个，正是著者开门见山、先声夺人的命题——“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麦考莱《英国史》}

对这次议会不流血战胜君王的革命，麦考莱甚至用了“幸福革命”这样极端的词句来赞颂它，并

预言“它将是英国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同上}

麦考莱的预言至今没有落空，也至今还没有落空的迹象。英格兰 1688 年就告别了革命，以 Evolution（进化）一劳永逸地取代了 Revolution（革命），真是羡煞人也。

英国光荣革命也是中国人顾准最为推崇的进步方式，这一点在他的笔记和文稿中多有表述。早在 1959 年的日记中，他已断言“这个时代是妥协的时代”^{59.3.12.}，并一连串用了十个“妥协”来形容“这个时代”——

“连阿尔及利亚也不能不以妥协告终。戴高乐所扮演的是妥协的角色，而不是独裁的角色。波拿巴特式的政权本来不能不如此。柏林妥协，东西德妥协，德法妥协，欧非妥协，英美妥协，总之是大妥协。妥协背后有尖锐的斗争，斗争的形式与结果不能不是妥协。”^{同上}

“妥协”了又如何？中文“妥协”二字也无非是“妥善地协调冲突双方”之意而已，却在顾准的时代被约定俗成成为与“投降”、“叛徒”、“汉奸”、“内奸”、“工贼”等量齐观的贬义词。从这个例子看，“语言（Word）”就不能等同于“逻各斯”和“道”了——天不变，道却变了，或者说只要谁能掌握话语权，那就既有本事“变”了“天”，也有本事“改”了“道”。

可顾准不搭理这些，他十分青睐、欣赏这个词汇，尤以二百多年前那次被各国史学家一致誉为“人类史上最典型、最成功的妥协”的革命为最，甚至不惜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这样来赞扬它：

“反正，17 世纪英国革命，我们只见到骑士，见不到骑士军了，从技术上说来，只要用上了火器，骑士军就完蛋了。不过，骑士精神比骑士军活得更长久。”^{文稿 319}

顾准对“骑士精神”极为欣赏。他认为欧洲文化中骑士文明是一个重要的组成因素，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的渊源。在英国的这场革命中，双方高贵的骑士行为和妥协精神使得“议会至上”原则和前辈们不懈争取的其他宪政原则终于得以确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人类宪政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74 是我的传主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足两个月后他就要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界河，遽尔长行，行

前的最后一本书他读麦考莱的《英国史》，倒也符合这位长矛瘦马骑士，中国独行侠，东方堂·吉河德的身份和脾胃，也是他由古希腊的议会政治向现代议会政治追索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细节。英、法两大革命的同异在政治哲学上的意义如今已是常识，大概连稍有兴趣的中学生也能说个七七八八。可在顾准的年代别说“显学”了，大概说它是“险学”都不为过。

顾准在读书方面“顺藤摸瓜”的本事从来好生了得，这就令他的读书范围一扩再扩，一直扩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临终前的一两年，他去北图借书读书的速度，用陈敏之的话说，叫“三天一趟，一趟三本”，很可能彼时图书馆借书极限就是三本。英国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严复译《法意》），英国经济学家和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与经验主义哲学论著都是他这一年读书的重点。许多书是重读，例如李亚农的《史论集》，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伯兰特·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自由与组织》等等。特别是边沁的著作，早在1967年他分析马恩首创“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就反复阅读过边沁。从马克思对边沁和边沁主义急转弯的态度，他看出了马氏对市民社会的扬弃和对人性（Human-nature）的忽略，并“终于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之年）得出了终生的结论——prol. dict（无产阶级专政）”^{笔记 392}的全过程。马克思1844年写作《神圣家族》时还在热烈地颂扬边沁和功利主义，到了1846年却开始对二者进行猛烈的批判。对此顾准一直耿耿于怀，前边的章节——《鼙鼓无声，理性争鸣》已经详述。他早就计划有一天要好好研究马氏在《神圣家族》中郑重地作了摘录并赞扬为唯物主义的边沁学说要旨，“那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摘录，必要时，必须参考它们”^{笔记 393}，现在他要完成这个“必须”的任务并且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只可惜没有任何文字留下。

如果按照“顾准日记”时间上的推算，阅读、重读这些书籍和他撰写《希腊城邦制度》是齐头并进的，这之间一定有某种有机的联系，只是这大大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不敢置喙。

1974年——顾准生命的最后一年，2月12日，他正式动笔，撰写最后、最长、最华彩的篇章——《希腊城邦制度》。

上一年，从6月到9月，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他读完了乔治·格罗托二百七十万字的《希腊

史》并做了整整一个章节——《柯林斯，西库翁和墨伽拉——希腊的僭主时代》的中译，这就是顾准文存中的《希腊僭主政治 跋》^{文稿 273}。这期间他咳血、吐血，可他什么也顾不上，脑子停不住，笔停不住，脚停不住——天天都要跑北图。

这套 1846 年版的《希腊史》是北图的典藏，是不能外借的。饿了，有干馒头和开水，咳点血嘛，用草纸接着就是了，好在那年头“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图书馆本就冷冷清清，也就没人嫌弃。加上这里能随时借阅荷马、亚里士乌芬尼斯、欧里庇德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吉本、麦考莱、卡莱尔、汤因比……，他甚至还能借到了极冷僻的《巴苏陀古今史》（巴苏陀就是今天非洲的莱索托），让他了解大至希腊罗马、埃及、两河、希伯来，东方、非洲文明，小至克里特、迈锡尼、艾特鲁利亚文明——这些彻底更新了古希腊在史学、考古学意义上的面貌的海上文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根本不知道的、令他在历史哲学上犯了“天大的错误”^{文稿 300}的文明。这致命的错误导致了马克思史观论据上的缺略，论证上的偏差，结论上的谬误和后果的灾难性。

这一切，如今都被他找到了源头。

“Mystery（奥秘）”（顾准曾经的惊呼，见笔记 370）不再神秘，芝麻已经开门，夫复何求！夫复何求！！狂喜的他越发像饿极了的人一样扑向书籍，吃一样地读、译、摘，有些迫不及待的急切，还有些奋不顾身的冲动。

老朋友们事后回忆起顾准的这段日子，异口同声用到的一个词是“昂扬”——病容被激情冲淡了，疼痛被喜悦掩饰了，一清早神采熠熠地出门，傍晚兴高采烈地回到学部的斗室，接着是一夜不灭的灯光。

不爱他的人们撇撇嘴，不理解他的人们莫名其妙，爱他、理解他的人们忧心忡忡。大家都看出了这病的“不好”，连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都心知肚明，只是痛在心里口难开。一天，他从北图回家，过了食堂的饭点，被里夫拉到家里吃饭。里夫小心翼翼地问：“你到底感觉怎么样啊？”，倒被他一句“我肯定会死在‘操纵文革’的人之后”^{林里夫口述}给逗乐了。

在这些日子里，顾准对好友和六弟多次兴奋地形容——我就像个手持镰刀准备收割的工人，眼

见金黄的麦穗在等着我呵。而这正是《圣经 新约》中最著名的譬喻之一。无疑，《希腊城邦制度》仅
仅是个开始，是他“中西方哲学思想史”宏伟计划的开篇之作，而东方的孔孟、荀韩、黄老、墨庄……
都已齐齐列队，整装待发——顾氏的“历史轴心”已经开始“呀呀”转动，多么动听的声音，为了
它就算是春蚕丝尽，蜡炬成灰也太值得了。

在写给六弟的信中他掩盖不住内心的狂喜——“我又回到了三十年代的生活……”。三十年代，
那正是他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轻、单纯、浪漫、圣洁，有着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一
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老又病，一无所有的男人，居然有“回到了青春少年”的感觉，这后面得
有多少超凡脱俗的愉悦和幸福的堆积！

生命如醴，读书如醴，知识如醴，写作如醴，顾准的最后一年几乎是在如痴如醉中度过的。悲惨、
凄苦、沮丧，压抑……那只是别人的看法罢了，生命的滋味只有经验着生命的人才说得清楚，何况是
这样一个不凡的凡人。

然而上帝总是那样地不可捉摸——写到了“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文稿 559}的顾准，恰恰没有最后
完成他的《城邦制度》。譬如维纳斯，如此的绝世之美却不完整。可维纳斯的残缺之美又有谁能说不
是更美之美？

注：本节有关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名著——《英国史》的叙述得益于沈阳独立学者、翻译家沈占春先生的指点和帮助。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沈先生也终于完成了这部浩瀚英文名著的中译。

2. 向死的生命实践

顾准确知道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是在此年 10 月——肺癌，中心型，最凶险的癌瘤。不足两个月他就去世了，病程非常短促。但这恶疾的形成却绝非“一日之寒”，它日积月累、噬骨吸髓、积重难返的过程是很漫长的，仅仅从“顾准日记”就能捋出来——

“连日发烧，始终未退尽。晚间咳甚，昨晚尤甚。右胸肋骨因剧咳大痛，至睡眠不能反侧。痰多极，都是脓状。” 59.12.22.

这是商城劳改期间。十冬腊月，饥寒交迫，贫病交集，四十四岁的顾准，困顿如病兽。

“这次又是发高烧，又达 39.5℃，学部商大夫 28 日来，由她主治，连续打青霉素，第三天发现铁锈痰，确诊为肺炎，是为一生中第三次患肺炎。回忆 1947 年宫乃泉诊治的一次和 1953 年住华东医院的一次，不免感慨。尤其 1953 年秀亲自送我住院，现则未及话别，竟已长逝……” 70.2.5.

“……晨间痰中不断见血，有铁锈痰，也有鲜红血块，一直坚持劳动，没有提出” 日记 70.3.16；“肺炎病后，3 至 4 月间曾咳血二月……” 70.5.8.；

这是息县劳改期间。比起商城，情状虽略好，但五十五岁的顾准此时已是鳏、病、右俱全，“已经到了沟底，再沉沦下去，也不过剩下埋起来的一着而已” 71.1.26。

“VII/27 病休” 73.7.27.，“VIII/6 上医院” 73.8.6.

这是临终前一年夏天的一次严重咳血，连续十多天止不住，以致不能正常起卧，只能靠吃云南白

药止血。

从回到北京后他就在不断地感冒，发烧，仅“北京日记”记载的“感冒”、“Fever（感冒）”就有许多次，还不包括“去医院”、“就医”、“注射青霉素”、“验血”什么的。尤其是最后的一年——1974年，2月份的一次感冒长时间地不能痊愈，断断续续地发烧，高烧低烧，忽冷忽热，一直持续到5月，以致他怀疑自己是在“打摆子”，验血后却排除了疟疾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是肺部恶性肿瘤即将爆发的典型征兆，做一次肺部X光片就能一目了然，却不知为何医生一直无法确诊病源，很可能是因为顾准够不上做光片的“级别”。可话说回来，即使早几个月确诊，在这样凶险的癌症面前，任谁也是回天无力。

这期间他一直在埋头读和译格罗托的《希腊史》，同时写读书笔记——《希腊城邦制度》。四月底，他已经写到了第六章——“城邦希腊从盛极到衰亡——公元前5至4世纪的希腊”。从全文内容看，这一章应该是最后的一章，可高山流水，一泻千里般写到这里的他却“卡（了）壳”^{74.4.28}。

“V/9 开始重写 ch. 6 下午 fever（5月9日，开始重写第六章，下午发烧）。”^{74.5.9}

他没把发烧当回事，发烧在他是常事，商城、息县、清河都经历过，扛也得扛，不扛也得扛，否则就是“偷奸耍滑”，这个罪名在他眼里要比什么“右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之类的劳什子屈辱百倍，是万难忍受、情愿累死也不能接受的屈辱。因此他通常都是扛着，而能扛过去常常令他大受鼓舞，比如息县那会儿——

“休息一周，饭量甚至更大于劳动之日，最多一天吃过一斤七两，消化良好，肺炎后的严重消瘦逐渐有所恢复。惟晨间常仍发现铁锈痰。既然一不发烧，而饭量好，体重恢复，也就不去管它是怎么回事了。”^{70.2.28}

商城能扛过去，息县能扛过去，清河能扛过去，如今身在北京，当然更应该能扛过去。《希腊城邦制度》正写得如火如荼，这无疑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他怎么可能分出神来关心什么“发烧”、“感冒”的小事，就算是咳点血，那也是老情况了，管它呢。眼下“第六章”比什么都重要，只要还握得住笔，其它都“去它妈的”！

5月1日劳动节，他终于“结束（了）ch. 6（第六章）”^{74.5.1}，可十分忐忑，不满意，读来读去

就是不满意。5月2日，他“检讨 ch. 6, 开始读文献”^{74.5.2.}，读的是“公元前5-4世纪的文学”，没有具体的书名和作者，但根据前后日记分析，应该是C.A.H.（《剑桥古代史》）中的某些内容。同时做了一些摘译。

公元前5-4世纪中叶，是希腊的古典时代，前期是城邦的繁荣昌盛时代，后期则盛极而衰。古希腊最著名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对这“盛极而衰”的忧愤之作。当城邦的希腊最终走向崩溃之时，给她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为她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她哪里会知道两千多年后有位深爱她的辽远的异邦人，名字叫做顾准，也懂得她全部的美，懂得她的绝望、濒死和死亡并为这绝望、濒死和死亡心痛不已。

几天后他毅然决定“重写 ch. 6”^{74.5.9.}。

也就从这天起，他发烧严重起来，不是通常的低烧，而是忽冷忽热，像打摆子一样，骤寒骤热交替出现。学部医务室已经无法应付如此病情，他不得不去合同医院——协和医院就诊。日记中连续几天“就医”的记录说明这次病情不轻，可医院只做了简单的指血化验就排除了疟疾，病人在咳血，却没有做最应该做的血痰化验，更谈不上做癌细胞培养了。就这样，典型的恶性肺癌爆发期的症状被诊断为“支气管扩张”，直到病人吐血吐得瘫倒在床。

就在和所谓“疟疾”纠缠之际，他开始读那本冷僻的英文原著——英国人乔治·卡特林的《政治哲学家史话》，“开卷有益”就开在医院候诊的走廊里，往往“就医”二字之后就是“读 Catlin（卡特林）”，接着是一连几天的“同上”、“同上”。整个5月中旬，顾准的生活中就是两件事——“就医”和“Catlin”，拖着忽如在火窖忽如在冰窟的身子，他奔波在医生和“卡特林”之间，辛苦至极。

有一天的日记让人十分费解——

“V/16 就医, Immense”^{74.5.16.}

这是一则很难解读的日记。假如其中的英文单词是“Immensee”的笔误，那就很容易理解——病中的他再一次读了施笃姆哀而不怨的《茵梦湖（Immensee）》，但若不是笔误，就比较麻烦。

英文“Immense”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用作形容词，且有着两重主要意义——“巨大的”和“美好的”。在用作前一种解释时，它不强调事物的重量，只强调超过一般标准的体积、数量或程度等；在用作后一种解释时，它是口语化的，相当于“Great！”——真不错！真好！好极了！不过“Immense”用在肿瘤医生的嘴里可不大妙，常常是他们用来形容癌肿块的不可测量性和晚期巨大疼痛的口语性词汇。例如“The immense pain that accompanies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cancer（伴随着晚期癌肿的巨大疼痛）”、“Immense suffering（巨大的痛苦）”等等，精通英语的顾准很突兀地在中文“就医”一词后面用上它，除非笔误，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那么是什么东西让他产生这样的惊呼？是初读“卡特林”，被它带给自己的巨大开悟所震撼后的欢呼？还是他从医生的表情、病历的蛛丝马迹上领悟到了什么？

前者的可能性是有的——从这天起到陈敏之在上海惊闻五哥被宣布不治的噩耗还有五个多月，其间两兄弟还共同生活了半个月，无论是顾准日记还是敏之的回忆，都没有对五哥病情的严重程度有过任何记录。

但是读书万卷，“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顾准真的会为这本并不十分有名的书发出如此惊呼吗？除了初读《资本论》和黑格尔时他惊呼过，还没有发现他对其他书“一惊一乍”过啊。

这就不能不让人猜想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他认知自己的病况从那时起就开始了，而不是在五个多月住进协和医院之后。“Immense”是对Cancer（癌）的惊呼而不是对Catlin（卡特林）的欢呼。很可能从那天起顾准就已经模模糊糊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只是他不肯对人说起，连手足也不说，好友就更不说了。他也不肯对自己说起，尽量地淡化它，疏远它，甚至希望忘掉它。直到九月底，在北京和五哥盘桓了十多天的六弟离开北京，五哥还殷殷地把他送到北京站。初秋是北京阴雨连绵，五哥亲手把弟弟的行李在车厢里安排好才离开。实际上那时他就在咳血，都是背着六弟把浸透了鲜血的纸头扔掉，转脸做出神采奕奕的样子，就怕兄弟担心。

可冰雪聪明如他，怎么可能在持续的高烧-低烧-高烧，持续地就医却查不出原因，持续地咳血、吐血、肺部剧痛的情况下从不怀疑自己罹患癌症？一周后，此生他最后一次戒了烟——“V/24

Thompson: medieval, 再度戒烟”^{74.5.24.}，岂不说明了很多问题？

顾准不可能对自己的病一点预感都没有，相反，他可能什么都知道——是肺，而不是支气管出了问题，大问题。只是眼下，“第六章”重于一切，“卡特林”也不过是为了“第六章”而已，至于别的，先不管它！

五月底，他已着手翻译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中“罗马法与教父们”一节，这天的日记是“V/30 Catlin, 译基督教一段”^{74.5.30.}，所以这一段译文在日后收进《顾准文稿》时就被冠名为“基督教”了。这段文字的翻译他大概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坦率地讲译文是比较粗糙的，有些明明可以中译的词汇他可能懒得寻找合适的中文，就让它们素面朝天地摆在那里，例如“Trajan(图拉真)”、“Mithraism(拜日教)”、“Constantine(康斯坦丁大帝)”、“Mikados(日本天皇)”、“Voltaire(伏尔泰)”、“Goethe(康德)”等等；有些不大准确，例如很著名、很普及的教义警句——“Nulla Salus (教会之外无恩救)”，他译成了“在它之外没有安全”等。

明显这是一篇为译者自己翻译的稿件，他要用它，并且要得很急。他明知已经没有时间留给自己了。

和以往的习惯一样，在读、译《政治哲学家史话》的同时，他并排阅读和摘录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关于中世纪史的部分，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这些书在他的时代都没有中译，他读的都是英文原版。很可能这些书籍的线索很多是从卡特林《政治哲学家史话》一书而来，至少《利维坦》一书应该是的——在那段名为《基督教》的译文里，代表着专制制度恶魔的恐怖名号“利维坦”曾两次出现。

活过了五十九岁的他并不惧怕死亡。死神的马车已经渐行渐近，他站在人生最后的一个驿站上等候它的到来。他将腰杆笔直，健步上车，一派男子气概，绅士风度。他也不大忧虑身后事——尘世没有亏欠，良心没有缺损，人本来都是向死而生的，生如寄死如归，本是寻常事而已。可有一条，无论人生是什么，他就是不相信人生就是一场虚空。

他的内部存在现在更加不受打扰了。经历过丧失信仰的绝望，他已经重新获得了信仰。死在他的

面前是脆弱的，接近死亡反倒把光带进了生命，不可逆转地形成了生命中“某种宗教的经验”——那将是一个过渡，死亡不是生命的尽头，灵魂在延续，灵魂继续活着。死亡只是一个阶段，可能还是一个解放。

终其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与各种伪装的精神运动作着不屑斗争的他对于积极力量是那样地敏感，经由这种积极力量——书籍、知识、真诚的人们的恩惠，他的生存被温柔地赐下希望、美德、善良和一丝秩序。他已经学会把生命当做向死的实践，年轮为他找到了安详。面对死亡，一种对生命无比深刻的、处在生与死核心深处的永恒的悖论被破解了，在《圣经》中它是这样被描述的：

“那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圣经 马太福音 10:39》

3. 美拯救世界

深秋，北京刮起特有的带哨的大风，说不上是“呼啸”却真的就像老天爷在吹哨子一样。天立刻冷了下来。香山的红叶已经发黑，过江之鲫般的自行车大潮中已经有人穿上了棉猴，就是那种带帽子的棉大衣。人们开始盼望 11 月 15 日例行的暖气开放，尤其是老人、病人——这半个月是这两种人一年中最不好过的日子。

他，又跛又病的顾准，就要死了。

在写下最后一篇只有一个字——“**Macaulay**（麦考莱）”的日记后没几天，10 月 26 日，顾准开始大出血，一天要咳出一大茶缸鲜红的血，大约有 200-300CC，人体血液总量的十到十五分之一。这样咳下去，吐下去，要不了几天人就会像被吸血鬼吸干一样地倒下。

他已经去不了北图，连床都起不了，却住不进医院。“住院”是一种特权，普通人尚难住得进去，遑论一个还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一个时代的“首陀罗”——不可接触的贱人。他打算再用一次老伎俩——“扛”。扛得过去固然好，扛不过去，就“先倒下来再说”。这是他的秀教给他对付噩运的办法。六年前她自己没有扛过去就倒下死了，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说。

这一次自己扛不扛得过去，他一点把握也没有。可谁都看得出来，顾准这次是很难扛过去了。将死的老右派成了个烫手的山药，连军宣队也毛了，先是写信给他的幼子顾重之，让他回来照顾。孩子不肯回来，就又提出要顾准去上海，想把他推给唯一的亲人陈敏之。顾准坚决地拒绝了，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歪歪扭扭地给敏之写了封信，要他立刻来北京。信发出后又怕走得慢，11月2号又加发了电报。这一次，他清清楚楚地知道生命之路已经走到尽头了。

“……五哥咳血不止……因为没人照顾，不得已打电报给我，把我又招去北京。见面后第一件事，他便是表示想见见所有的孩子。五哥写了两个条子，一是表示他已宽恕了孩子，也希望孩子能宽恕他……” 陈敏之 《我与顾准》

然而五个孩子一个也没有来——他还是右派，是阶级的敌人，“人民”告诉他们要“大义灭亲”，为这“大义”，即使对一位将死的父亲也不能例外。

只有六弟来了，一分钟也没有耽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一张当天的沪——京车票，下了火车直扑五哥躺着的协和医院肺癌病房。这是老友骆耕漠动用了通天的关系才住进去的。

面对病床上刺瞎人眼的“Ca”（Cancer，癌）字样，面对目光游移、闪烁其词的医生，敏之什么都明白了。

人与死神劈面遭遇是最能检验人性的关口。对于死亡，顾准早有精神上的准备，如今是践行死亡的时候了。只是病榻前除了一个五十几岁的兄弟，连一个亲人也没有，这令他十分伤感，同病房的病友也有些看不下去了。和他一个病房、患着同样恶疾但有女儿陪侍在侧的焦菊隐先生十分同情孑然一身的顾准。顾准去世后他说这位病友“意志无比坚强，感情有些脆弱”，不愧大师眼光。顾准临终痛苦的“儿女情长”就连造成这种局面的“刽子手”们也看不下去了——无论是职业的还是自愿的，刽子手们也是人，胸腔里也有一颗肉长的人心。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到医院与顾准谈话。来人拿出一张预先写着：‘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这一类内容的认错书，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在上面签个名，就能马上完成摘帽手续，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来。” 陈敏之 《我与顾准》

面对最后的“政治勒索”，身体极端虚弱的顾准又一次挺直了腰身——“不签！就是不签！！”

“……顾准却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他觉得他不需要什么摘帽。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随便怎么劝说，坚决不同意签字，他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顾准实在不愿让自己临终再受一次灵魂的侮辱。” 陈敏之 《我与顾准》

摘不摘什么劳什子的“帽子”，让不让回到什么“队伍”，他健康的时候尚视如敝履，何况人将死，死尚不能惧之的时刻。

对一位将死之人如此“勒索”，实在是恶毒和愚蠢到令人不齿，可你又不得不承认执行的人们并非出于个人心理的邪恶，只是在“模子”中，以最高尚的名义做出最下流的举动是常态，人们都习以为常罢了。

可是……可怜……就算无敌大力士参孙也有最薄弱的致命之处啊。参孙的头发，顾准的软肋，就是那五个十指连心的孩子——三个仔仔，两个囡囡——稭头、小米、高粱、五五、小弟——多么好听的小名，都是爸爸起的，多厚多深的父母之爱都在里面了。他是个人，人的一切特征他都不缺乏。商城时候几乎饿死的他曾在日记中写下：

“我将潜伏爪牙忍受十年，等候孩子们长大。” 59.12.31.

十五年过去，他们都长大了，稭头早已“而立”，小弟也过“弱冠”，却一致视父亲为异类，敌人，形同陌路，他的“忍受”，他的“潜伏爪牙”还有什么意义吗？

“父子人伦”才是他临终之际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朋友们只得上前恳劝：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啦。顾准听到这话，深受震动，思考了片刻，才极其勉强地同意了。他颤抖着在这份最后认错书上签字时，由于内心倍感痛苦而流下了眼泪。他对骆耕漠、吴敬琏说：临终还在认错书上签字，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经济所党组织收到顾准的认错书后，派代表来病床前宣布了摘帽通知（但不恢复党籍）。” 陈敏之 《我与顾准》

他最后一次哭了，泪水不是从眼中而是从心底涌流而出。没有力量捶胸顿足，他只是泪飞如雨——“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 顾准临终语

为了能最后看一眼孩子们，这位父亲接受了最后的精神凌迟——写下被他视作奇耻大辱的“悔过书”。这是顾准一生唯一一次对“利害”的低头和对命运的屈服，它残酷地褫夺了顾准最后的尊严

和终极思考的权利，令他神圣的临终时光蒙羞。一颗如此高贵的灵魂在最需要安静的时候却被施以最后的酷刑，相比之下，在尚未点燃的火刑柱上一口拒绝写下悔过书后再庄严蹈死的贞德和布鲁诺都要算得上是幸运儿了。

然而孩子们还是一个都没有来。

多年后，一位编辑《顾准文集》的老编辑在论到顾准之死和父子悲剧时用了个惊秫的动词——“戕害”，那可真是伤口上撒盐，痛上加痛之痛。在外人眼中，一片肃杀中的他何其悲苦，拆骨为柴柴将尽，燃心作炬炬已干，前边就是油枯灯尽，无边无际的黑暗和空虚。

悲莫过于此！苦莫过于此！

可是读者，假如你能在夜深人静之际设身处地细细体味顾准之死，又会感觉实际情况并不是你我想象这般。这个人之死可能很幸福，何止是“很幸福”，简直是太幸福了——

一群由“发自内心的爱”而自发集合起来的人迅速地聚拢到他的病床边来了。这些人除了他亲爱的六弟陈敏之之外无一亲人，都是他最后的栖身之“所”——经济所的同事们：有年过花甲，自己还带着右派帽子的老经济学家，例如林里夫、陈易、徐雪寒；有曾经批判过他如今却对他崇敬有加的年轻学子，例如张纯音、吴敬琏、赵人伟；也有被他嘲讽，挖苦甚至批判过，如今却和他达到了一种心灵契合的老上司，老学人，例如骆耕漠。这群人不顾一切地想抓住他，拖住他，把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留在他们中间。只要能医治他，挽救他，这些人甚至连尊严，也就是读书人最爱惜的“脸面”都顾不上了。

六十六岁，已经失明，自己还戴着顶“叛徒”帽子的骆耕漠拄着拐棍，跌跌撞撞摸到多年不联系的新四军下级，如今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家里。当年他和顾准当“首长”时她还是个“红小鬼”。

“无论如何，同志，您得给个床位！”

得知西医已宣告不治，耕漠二话不说，提上装了八样点心的匣子摸上一位老中医的门，坚决要为老顾做最后一搏。年迈的老中医无车不肯出诊，他就拉下老脸，再摸索到眼下能调动汽车的部队老友家里求车。为了苦命的老顾，老骆算是豁出去了，“面子”和“身子”都不要了。

六十五岁的林里夫每天必去一趟协和，一生从未做过饭的他居然学会了煮粥，为的是能煮给顾准喝。陈敏之赶到北京后，里夫又怕日夜照顾一个危重病人把敏之累垮，就指派自己20出头的女儿皎皎和陈叔叔替换，护理和伺候顾叔叔。当年小女孩皎皎常常和妹妹一起跟着爸爸妈妈到顾叔叔、汪阿姨家串门。1957年顾准被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派往新疆执行任务后带回来一大罐葡萄干，汪阿姨大把抓给小姐俩的情景和葡萄干的美味，娇娇至今都忘不了。后来少女皎皎插队内蒙，因为受不了高原高寒偷偷跑回息县干校爸爸妈妈身边。是顾叔叔悄悄塞给爸爸20元钱，“孩子回来需要钱，拿去用吧”，解了一时竟拿不出能给女儿买张返程车票钱的里夫燃眉之急。现在能为亲爱的顾叔叔做点什么，皎皎当然愿意。自此，皎皎守白天，敏之和其他几个年轻人守夜晚。皎皎不时搀他起床走走，喂点吃的，陪他聊聊天。

此时的顾准还能阅读老友们偷偷为他带来的英文美共机关报纸《Daily Workers》(工人日报)，这也是他生前接触到的最后一点西方信息了。一天，看完报纸的顾准忽然百感交集地对皎皎说：“你父亲和我吃的都是草，挤出来的都是血”。还有一次，一老一少谈到了死亡，顾叔叔说：“我不想死，我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在一个阳光洒满了病房的下午，他忽然手指着皎皎说：“你就是我的女儿”。

到了十一月下旬，他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也没钱在医院买贵些的病号饭吃。皎皎妈妈——里夫夫人胡柏琴大姐就把全家的鸡蛋票、肉票都省下来，天天做点精致的小菜让皎皎带到病房伺候他吃下去。医院又硬又重的棉被他已经承受不起，林家又把全家的棉花票、布票搜罗起来，做了一床新棉被送到协和。里夫自己，必是天天要在老友身边坐一坐，握握他冰冷的手，擦擦他满头的冷汗才肯回家。

皎皎守白天，敏之和其他几个年轻人守夜晚。皎皎不时给他擦擦澡，翻翻身，喂点吃的，可如厕一事，顾准说什么也不许皎皎服侍。这是个把尊严看得比性命重要得多的人。皎皎不好勉强，只得扶他起来，然后在厕所边守着，完了再扶着几近瘫软的他回病房躺下。就连自己最后的病情也是他指使皎皎到护士站“偷出”病历才知道的。

张纯音，这位出身世家的大家闺秀，温文高雅的淑女，更是做好了向人下跪磕头的准备。“谁要

是能医治老顾，哪怕只是减轻痛苦、延缓性命，我就给他跪下，给他磕头”。顾准是她和女儿两代人的良师益友，谁要是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赴汤蹈火她也愿意，再也见不到老师，再也听不到他传授渊博如海洋般知识的恐惧折磨着她，她也果真在老师仙逝后大病了一场。

就是这么一群敬他、爱他的人，就是这么整天整天，整夜整夜地陪着他，和他一起煎熬着，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读者，请静思一刻。

古今中外，从大人物到芸芸众生，有几人能享受到如此这般的临终关怀？其逝，如山崩地裂者有之；其逝，令国民泪飞倾盆者有之；其逝，备极哀荣者更是不胜枚数。但那不都是身外物，身后事吗？像顾准这样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人，死在如此美丽，如此无边无际爱海中的，至少孤陋寡闻如我，只知道一个苏格拉底先生可以媲美。怪不得所有熟识顾准并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是面带微笑从容离去的。有人说他“意志无比坚强，感情有些脆弱”，有人说他“英雄肝胆，儿女心肠”，也有人说他“死不悔改”，可你将此话译作“虽九死其犹未悔”也是不错的。

遗嘱早已写好。11月15日，就在最后被“政治勒索”的前一天，他平静地口述，六弟记录了下来：

“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的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对于里夫和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伍佰元赠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

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水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1974 年 11 月 15 日下午口述，六弟纪录)

六弟记录完毕，他又嘱把第一句——“我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删掉，也许他不想让那些充满恶意的人起疑而给弟弟惹麻烦——“怎么？你还认为自己对政治‘有能为力’过不成？”。更大的可能，后面一句“我热爱生活”已经涵盖了一切，无需赘言了。

在肉体还没有死亡之前，顾准已经开始了跨进死亡的英勇历程——血还在流动，胃还在消化，心还在跳动，却已经在心理上做好了死亡的一切准备并经验到了死亡本身。他宽恕了一切人，包括欺辱、逼迫、残害过他，使他痛苦过的每一个人，也求一切人，也包括这些人的宽恕。这样，他也就宽恕了自己。

弥留之际的顾准，极致地展现了人性 (Human nature) 之美。他的从容与留恋，意志与感情，欢乐与痛苦，肝胆和心肠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见证，再多说一句都会显得苍白。但我无法不再说一次那位叫“咪咪”的女孩——顾准当年在息县劳改营认识的美丽、善良、纯洁的十四岁小姑娘，她是他五十九年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美的一抹阳光。

曾几何时，小姑娘听到这个人 and 妈妈多次说到虽有很多人都不对不起他，但他都宽恕他们，他也请求他们的宽恕；他跟她讲“宁肯天下人负我”也不要“我负天下人”的道理，讲《圣经》中耶稣教导门徒对人要“宽恕七十个七次”的故事，告诉她“为什么只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到你眼中的梁”是什么意思；他告诉小姑娘自己尤其推崇《圣经》十诫中的“不做假证”一条，要小姑娘记住这是中国道德律中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一条；在恶势力面前，十足骄傲的他骄傲地对小姑娘宣称“骄傲使人进步”，在卑污、猥琐的环境中以这样的方式教会小姑娘什么叫作“尊严”、“轩昂”、“正气”……

谁又能对这样一位可以作为“忏悔神父”的可敬可爱的伯伯背过脸去呢？

如今咪咪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身在兰州歌舞团做小提琴手。接到顾伯伯病危的消息，她哭得喉噎气岔，却怎么也请不下回北京的假来。强忍住泪水，压下抽泣，她写了一封信给顾伯伯，这信日后感动了无数人：

“……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我是顶讨厌个人崇拜的，但回想起来一生也就崇拜过一个人——这就是

你……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难道我不能代替他们吗？” 陈敏之

《送别》

上邪！咪咪何止仅仅代替了他们，她代替了整整一代人。年轻的央视主持人柴静在她 2009 年写下的文章《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末尾，不也深情地轻呼“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吗？这又是一代人，是可以做顾准孙辈的新生代。有他们的理解和渴望，一切都是值得的。

顾准留给咪咪最后的礼物是一本中英文双语的《新约全书》，他将最宝贵的物留给了最宝贵的人——他的下一代。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圣经 约翰福音 12：24》

醇懿、熟透的麦粒好沉、好重啊，麦秸已经不支，它就要落地了。

照顾了顾准 21 天的皎皎，这天因小小的感冒怕传染给他而未去医院。就在这天夜里她真真切切地梦见了亲爱的顾叔叔——

“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出去给他拿输液的吊瓶。可当我拿吊瓶回来时，床空了。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预感到他已离我而去。我竭力想忘掉这个梦，然而它如此真切，并真的在我完全清醒后成为了事实” 林皎皎口述。

初冬，1974 年 12 月 3 日，凌晨一时，他跨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河，安详而尊严，身内没有恨意，身外一片爱海，就在自己的学生身边——刚刚一小时前，他才按照老师最后的吩咐，支开陪护的行军床，在他身边躺下。一个高贵的灵魂以“我原谅一切人，也请一切人原谅我”的心绪和上帝，宇宙以及命运达成了最和谐的谅解与合一。

多好啊，多美啊——

爱琴海蔚蓝的海浪轻轻拍打着蜿蜒的海岸，一座座海岛峭壁嵯峨，傲然挺立。海岸上鲜花盛开，远处西坠的夕阳仿佛在呼唤：“到这里来，到这里来吧……”。这里的人们太好了，他们永远保持着童真，全部的，无尽的力量都被用来爱和用来缔造新的爱。一个奇妙的梦，一个人类无比高尚的迷梦，所有的幻想中最了不起的幻想，为了它很多人情愿献出全部的生命和力量。为了它，先知们去受苦受难，去死——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朽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接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吧！” 泰戈尔 《吉檀迦利》

这是人类对自己摇篮时期的记忆。

这一瞬抵得过一生。

生命美如斯，人性美如斯，美原是可以拯救世界的。

尾声 故事未终

1974-

我摆脱了无谓的幻想，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念：我的工作不会是徒劳的，我的作品矛头所向的那些人终于会垮下去；我的作品如肉眼见不到的潜流奉献给另一些人，而这些人终将会觉醒。

-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1. 治方之痛

1975年4月的一天，孙治方突然被释放，和被捕一样地没有前兆，没有理由，没有程序，没有解释。面对指望他唯唯诺诺、感恩戴德的权势人物，六十七岁的老人沉静地说：“我既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组织跟我谈话，那我就告诉你，我是一不改行，二不改志，三不改观点。”

这是他第二次坐牢，距上一次在上海的被捕已经时隔37年。那次他被国民党的监狱关了七天，这一次被自己党的监狱关了三百六十五个七天——七年，从六十岁到六十七岁。

要是有人写一本《孙治方在狱中》，那将是一本感人而有趣的书：

关于他用打腹稿的方式撰就数十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论》，每天默诵，修改，补充，每月一遍，复诵了近百遍的传奇；

关于他以写坦白交代的名义一再要求多发纸张，结果却写出四万字的《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坚持己见，死不悔改；

关于他读烂了一本俄文版《资本论》，全书遍布糖纸，草纸，牙膏皮划痕，指甲印这样的“书签”、注痕，此书现在无锡玉祁镇“孙治方纪念馆”。还有一套《马恩选集》四卷中文本也是他在狱中读的，其中一张“糖纸书签”是上海产品——陈皮梅糖。他的肝不好，很喜欢吃糖，尤其喜欢吃话梅糖，老妻克平总是千方百计从上海弄到手，再送入秦城；

关于他宁死不肯诬陷他人，把想逼疯他的人倒是逼得要发疯；

关于他在牢房中学习德语，终日喃喃地背单词，被监管人员以为发神经病，忙不迭通知老伴洪克平来探个究竟；

关于他在单人牢房里无师自通地练就一手太极拳——这可是真正的“一手太极拳”，因为一入狱裤带就被没收了，老先生只好一手提着裤子，一手行云流水地“白鹤亮翅”、“倒卷虹”，把个新来的狱卒看得目瞪口呆；

关于他对牛弹琴般向提审人员讲述他的经济学观点，也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耐烦不耐烦，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弄得提审他的人最终要向他告饶；

关于他以一个犯人之身关注中东战争爆发的原因，继而分析石油垄断的后果，还妄图呈文国家计委；

关于他不顾自己阶下囚的身份，写出批驳郭沫若违反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文章，还希图送达本人；

……。

整整七年，孙冶方可真是一天都没闲着。

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秦城监狱，犯人们照样饥寒交迫。法西斯式的审讯，精神和身体上的蹂躏是许多人根本无法活着走出监狱的原因，还有活着走出来的人却永远丧失了语言能力的极端个例。孙冶方没有死，没有疯，没有痴呆，保持着清醒的大脑和相对健康的躯体走出了监狱。

果然不出亡人顾准所料，出监后的冶方第一个打听的就是他的顾准老弟。骤然闻听人竟是走了，就在不到四个月前。相识相知近四十年，如今只差百来天却等不得最后的相揖而别，六十七岁的冶方捶胸顿足，老泪纵横。

子期走了，伯牙却并未摔琴。抹去老泪的冶方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把在狱中打了无数遍腹稿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写出来。家已经多次被抄，连纸张都没剩下，他就满大街去捡纸烟盒，翻过来就是上好的稿纸。

尚未从丧师的巨大哀痛中恢复过来的张纯音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带着女儿咪咪去探望这另一位老师。先让孩子打探清楚门口没有暗哨，她急步跨进孙家。高兴得话都说不出来的冶方，第一件事情竟是捧出厚厚一叠烟盒纸。这么多摞在一起，摊平并写满了字的纸盒烟令咪咪永生难忘。

冶方的家就在三里河畔。这是条人工河，源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出口在丰台永定河，宽不到二十米，由北向南，竖直穿过整个西北京，至今仍在。顾准的骨灰已经照遗嘱由六弟敏之亲手洒在了中国科学院，也是前经委大楼旁的三里河中。老友亡灵未远，足音犹在，冶方以待罪之身日日徘徊在小三里河旁——我写在纸烟盒上的字句，现在字字念给你听，你要争便争，要论便论，要骂便骂，

只别不啃声就好。

这刻骨的惆怅和心伤之痛，大概也只有顾准才读得懂。

接着就是 1976 年的喧嚣——4 月的乖戾、9 月的错愕、10 月的欢腾。那座广场，就算世界第一长阔，如何盛得下整整十年的怨怼和愤懑、压抑和难堪。这一次匠心巨手终归寂灭，“七八年来一次”、“你办事我放心”、“腥风血雨接班”……转瞬之间烟消云散，皆是臆想，皆是谵妄，皆是虚空，皆是捕风。

孙冶方的市场经济和利润价值理论终于被掌握国策的实践家们接受了。也是转瞬之间，他成了为国为民受苦受难砥砺前行的英雄。1980 年代伊始，“孙冶方”三个字在中国各大报刊出现的频率仅次于“周恩来”，甚至在他还活着的 1982 年，《光明日报》就开辟了一个“孙冶方颂”的专栏，用来刊登那些如雪片般飞来的赞美文章，以致沉疴中的冶方不得不专门致信光明日报和中宣部，坚求停止这样的报道。

学部（现在叫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组织了一个七人的写作班子帮助他回忆、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按孙冶方的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之事，却不料在资料齐全、条件优越的时空中，本应的通途成了天堑，怎么也走不通。来看看这个过程：

早在 1955 年，刚从苏联疗养回国的冶方继续挂衔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分管综合平衡，劳动工资和农业统计。是时国家统计越来越假、大、空，故事性愈来愈高，可信性愈来愈低，价值规律无人提起。忧心忡忡中，他起了写出一部相似于《资本论》的、教科书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想法。这年他去中央党校看望顾准，除了老朋友的关心和叙旧，还有个强烈的目的，就是说服会计学高手顾准参与这个庞大计划。

1956 年，冶方主持的全国统计会议正式提出农村经济统计中严重的失实问题，强调效益、效用、客观和价值规律的不容忽视。报告呈送到国务院，无人理睬。7 月他率团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访问，10 月即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价值规律和改进统计方法》，以“一个服装师把一块狐狸皮缀在一

袭完美的狐皮大衣上以增加服装店的总产值”，来说明不计成本追求总产值是多么愚不可及，指出“总产值指标”是个错误概念，不能作为国家计划的综合指标，向照抄苏联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起挑战，大声疾呼“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学也必须尊重价值规律！”

1957年，他坚决主张统计要以报表为主，典型调查为辅，统计必须独立，统计干部必须职业化。他给李富春写信，给谭震林上万言书，上下游说，喋喋不休，惹得大人物们厌烦透顶依然不肯住嘴。在得知老朋友沙文汉已经被划为右派，他搬出马克思“在科学的入口处”一说壮胆，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戴着顶比“右派”稍轻一点的帽子——“右倾”被调去科学院学部经济所作了所长——你不是爱唠叨吗？去“翰林院”唠叨吧，至少国务院的会议上让人眼不见心不烦，大家耳根子清静。

正值此多事之秋，顾准同学从党校毕业来到经济所。孙冶方、顾准一唱一和，各自出台了各自的“价值规律论”——“（我们）炮制出来的毒草……在我是《试论》，孙冶方则有二篇，一篇是《从总产值谈起》，一篇是《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再后来，就是顾准发配商城劳改，孙冶方孤军奋战——利用“翰林院”分院长的身份，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希图不受干扰地完成这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1962年顾准第一次摘去右派帽子，立即被他“招降纳叛”招纳到旗下，但只许他涉足“会计研究”领域——咱们可事先说好，大观园里你“祝妈”只管好竹子即可，至于田妈的稻子、叶妈的果树你可别碰，最要紧的是你万不可去指责王熙凤的总管理方针，免得你我一块惹祸上身。

到了1964年，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彻底理解他的“价值论”经济思想与现行体制的矛盾，研究根本无法做下去。孤岛时期，他写经济类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今社会主义了，写文章却变得异常艰涩，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他苦恼得要命，能一起讨论的，也只有顾准了，可这家伙好像早就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论》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写不成的，多次热潮冷讽，打击他研究和写作的热情，恼火之余的冶方又不得不承认这家伙说得有道理。

直到被内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发配周口店劳改，成书一事成了泡影，冶方仍然不

肯回头。再后来，人都被抓进监狱了，《社会主义经济论》总该寿终正寝了吧？可他哪里是个随随便便就肯认输之人？“翰林院”里搞不成的事我要在秦城搞成它，我打的是腹稿，你们横竖不能到我肚子里挖它出来胡批乱判！

牢中面壁七载，他日日苦思，夜夜冥想，将孙氏秦城版《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近百遍腹稿，自以为已经想通了所有关节，却没有想到如今只等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却赫然发现自己的所谓“第二价值规律”无法自圆其说——从孙冶方自己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氏理论的内在矛盾，那就是用等价交换原则去处理和调节生产单位和地区之间的关系，“把价值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只适用于存在商品交换、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假若大前提不承认中国是这样的社会形态，“价值”二字根本无从谈起；可若承认了，那中国还是“传统理论”下的社会主义吗？

巨大的悖论，令人绝望的死胡同。这不啻是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七年秦城囹圄、眼下肝癌的痛苦和它相比，都算不了什么了。多年后，孙、顾两人的学生吴敬琏先生这样说，“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术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吴晓波 《吴敬琏传 最后的孙冶方》

顾准和孙冶方，两个“生不逢时”的学问家，生逢“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经济学环境，都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却一个是一头要撞断不周山的共工，一个是一心要炼石补天的女娲。这不周山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补天石就是所谓“第二价值规律”，如此看来两人的价值观岂非南辕北辙？只是在“民生”这一庐天穹下，女娲与共工的价值观竟又是高度的一致——

“老所长孙冶方，是他，在极其恶劣的大环境中，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付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竭尽全力在经济所营造了一个能够研究和探讨经济学的小环境，得以开始对中国改革道路的最初探索。而顾准，则是指出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第一人。”《吴敬琏专集》

1982年2月，冶方死于肝癌。临终前他再一次郑重指明，50年代自己在中国提出价值规律是受顾准影响的。谢世前，他殷殷请求自己的两位学生吴敬琏和张卓元，将来在出版他的文集时一定要把发表于195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的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后记，因为那个后记上有这样一段话：

“还在今年年初，吴绛枫同志就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

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我在那时虽然感觉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要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个问题深入学习。此外那时在自己的认识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理论问题对统计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联系。”

这位吴绛枫就是顾准。治方毫不含糊地指明自己的经济观点是受顾准启发和影响，甚至对自己的秘书说过“我不过是拾人牙慧”。治方一生的道德文章都是这样写过来，写到“顾准”一章更是不会荒腔走板，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怀疑。

治方的遗嘱和顾准的非常相似——不留骨灰，尸体供解剖，仅仅多了一条，“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广为宣传，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孙治方全集 孙治方大事记》。

他的骨灰洒在了昆明湖，正是三里河的上游，老哥俩总算又能在一起了。

人，你不妨夜深人静时驻足一会儿今天还静静流淌在京城闹市的三里河，兴许你还能听到那一场“高山流水”的依依余韵。我为顾准，治方羡叹一声——人生得一知己如此，足以。

2. 无题

顾准文字的第一次正式、全面面世（出版）是中国国门洞开十五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元年）后的1994年，在他去世整整二十年之后。

不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那些写于古拉格集中营的恢弘作品，在地下势不可挡地流行了很久，才在苏维埃政权彻底崩溃后以俄文正式出版。顾准的文字在他去世后很长的时间里——至少在十几年间默默无闻，手稿大部分藏于六弟陈敏之手中，只有极少几个学生、亲人知道这些文字的存在，而他们在那些岁月里依然余悸重重，噤若寒蝉，手捧这些玃珠般的文字如火炭在手，日夜难安。

顾准去世两个多月后，1975年春节，陈敏之从吴敬琏手中拿到五哥最后的遗作《希腊城邦制度》，这是仅仅一个多月前弟弟遵照哥哥遗嘱，从众多文稿中检出交送给这位哥哥生前喜爱的学生的，现在他算是借阅。

五哥的十一万字，和着塞尔戈耶夫的《古希腊史》，敏之一口气读了下来。他掩卷伏案，长歌当哭：

“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我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象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我当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我瞩目于未来……”

为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所作的《后记》 陈敏之

未来还有多远？谁保证自己能活到“瞩目”的那一天？五哥这些用鲜血做墨水写下的文字，难道只有深锁抽屉，有一天和这抽屉、桌子一起化灰化烟的命运？

敏之心中开始有了一个计划，他要用余生来做一件事情——把五哥的文字，五哥的思想变成铅字，从很快就会永远消失的钢笔、铅笔字变成铅字，从薄如蝉翼的劣质稿纸变为一本书，一本能立言立德的书，一本能流传下去的书，哪怕只有一个人会去看它，理解它，会被它感动和激励，就算对得起五哥，对得起我自己。

今夜好月光，六弟决心把这个计划付诸行动。他开始抄写《希腊城邦制度》。

这是五哥 1974 年 2 月 12 日开始落笔的读书笔记，写到 5 月，想重写第六章时却因为对城邦希腊在极盛时发生自相残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衰亡痛心不已，不得不从另一种文明——基督教文明入手，希望能从中找出希腊民主制度的传承过程而将《城邦制度》住了笔。岂知此时多年受苦积下的肺疾开始总爆发，中心性肺癌很快夺去了他尚未活满一个花甲的生命，《希腊城邦制度》也因此成为未完成的绝笔。

眼下五哥死去刚刚两个月多一点，墨迹还未干，人踪还不远。万籁俱寂中，敏之打开那只紧锁的抽屉，拿出那一摞削薄的信纸。

一行行熟悉得无法再熟悉、半繁半简的漂亮钢笔小楷像一大群蓝黑色的小精灵，带着五哥的气味和体温，再一次扑面而来。“见字如面”四字，再也没有比眼下更名副其实了。五十五岁的陈敏之老泪纵横。这是哥哥去后第几次流泪，为弟的已经记不清了。

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敏之抄录完了《希腊城邦制度》，为的是早一天将手稿还给敬琏老弟。

“这份笔记《希腊城邦制度》是五伯的最后遗稿，是一份未完稿。为了便于今后可以随时翻阅，也为了留作一个纪念，决心抄存一份，这样化了二十余天，到了四月十五日才全部抄完，共计一百八十页。如果你对此还感兴趣，以后回家来可以给你看看。” 陈敏之写给女儿陈小嫣的信

敏之抄录完第二天就给远在武汉的女儿写了这封信去。至此，中国终于有了顾准文字的第一份拷贝件。

接下来，敏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亡兄生前陆陆续续寄给他的几十封信件，原都是通信式的笔记，有的一封信就是一次讨论、一个问题，有的一个问题、一次讨论包容在几封信中，他早就熟读，早就分门别类了。他再一次打开一个个信封，抚平一张张信纸。

字迹已经有些褪色，纸张也显得更加削薄了。纸是那个年头不用“介绍信”就能在北京文具店里买到的信纸——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有年份，甚至有批号，例如 1973.11. (1384)，目的十分明确——一旦出现反政权的文字，信纸就是好线索。它们薄如蝉翼，经不起长时间的存放。

这些文字不能沤烂在自己手里。五哥的文字不是写给我的，它们甚至不是私信，它们是公器，是写给人，写给人类的。一定要想办法让它们光明磊落地面世，我无权，也不可以再继续私存。

摊开同样削薄的信纸，敏之开始抄写，用和五哥几乎同样漂亮的小楷，只是比五哥的字还要小，为的是用尽可能少的纸张抄录尽可能多的内容。

都是书信体，没有标题，一个个字像一粒粒无稜的珍珠，就这么赤裸裸地任六弟抚摸，也任六弟去哀，去痛。这些书信在后来成书时，其标题并非是书写它们的人而是后人——六弟陈敏之、五哥的老友以及更后来的编者根据内容起的，如今这些标题已经为许多国人所熟悉，例如《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民主的终极目的》等等，总字数大约有一百六十万。

敏之用了他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抄录完毕。他再一次被刺痛、感动和激励，他坚信这些珍珠迟早有在世人面前大放异彩的一天。五哥临终前那种将要收获的喜悦对他感染至深，他也要早早就磨好镰刀，枕“戈”待旦。可现在不行，“守机待时”——五哥对敬琏老弟的嘱咐，六弟也能领会。

原稿和他的抄录稿被一起锁进抽屉，五哥的墨迹不再寂寞，六弟的拷贝来陪你，让我们一起等待

和迎接收获那天喷薄的日出。

1978年，顾准去世已经四载。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两年前，毛泽东的死终于宣告了荒诞狰狞的闹剧——文革的结束，也宣告了恐怖时代的结束，国人总算能均匀地呼吸了。敏之认为至少“收割早稻”的时机到了，敬琏老弟也是这样想的。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创办一份《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知识界准备在最敏感又最沉闷闭塞的领域——思想界打开一个通风孔。

创刊号的集稿中出现了顾准遗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由吴敬琏推荐，不过原稿肯定是陈敏之提供的。

还没有到编辑们仔细读毕进入审核讨论的阶段，编辑部里的喝彩声、编辑部外打进来的电话铃声就响成了一片。以孙冶方、徐雪寒、李慎之几位老经济学人为首，除了一、二位阶级斗争觉悟特别高的先生，人人都大声叫好——如此璧坐玳驰、徜徉恣肆的好文章，人们已经多年不见了。

不同于其余十二篇文章，编委会在该文文前附上了简短的说明，陈述了作者之死和他写作时的条件。他们希望引起讨论，并且隐隐约约意识到这篇文章可能会造成轰动，形成一个小小的“事件”。

1970年代就要结束了，1980年代还有两天就要到来。创刊号样书已经印出并分发到各“意识形态部门”，离预订正式出版时间只有十二天了。编辑们在兴奋中期待着。

12月30日，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大总管、一支笔，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指示传达下来：“作者在那样条件下写出此文确属不易，但也正因如此，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这样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想讲清楚，要做到根据可靠，论证周密是很困难的。顾准同志已经辞世，又不可能交换意见请他补充修订，还是调换其它稿件为好。”傅白芦《一篇顾准遗作的抽换及其他》

大总管同志的话外之音再清楚不过——“顾准同志要想把这个复杂问题讲清楚”何止是“很困难的”，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也确实讲得有问题嘛，譬如他说：

“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Marx（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生产不发展所苦’（《第一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

什么不同？’ ‘它苦恼我们是不是更为严重？’ 以及其他等等。” 文稿 327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要打倒资本主义，何来“为资本主义生产不发展所苦”？“无产阶级怎样异化而成”、“历史的异化是什么性质”又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还要怀疑和探讨我们早已钦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吗？

就这样，一个人，一句话，1980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没有了，顾准二字没有了。

其实这位中国意识形态大总管同志和顾准是老相识，早在1930年代，他便对将要去面见“职教”领导人顾准的徐雪寒说过：“你同顾准说话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还从此成为至交，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顾准去世，并在此后与陈敏之之间有140多封关于顾准的通信。倒是顾准与大总管同志基本上没有过什么交往。这位大总管同志还非常勤政，他是连社科类博士研究生考试，从出题到标准答案都要亲自制定的。由于他的忠实履职，由于他一言九鼎的指示，顾准这个名字在中国至少晚出现了十年。

下一个月，1980年2月，中共组织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双双为顾准做了不彻底的“平反”——改正两次右派结论，但1952年的灭顶之灾不在平反之列。

顾准、汪璧追悼会在北京小规模召开。

平反归平凡，文章却依然不能见光。创刊号上不能登载，第二期、第三期……照样不可以。

是时陈敏之自己的叛徒问题（十七岁时的一次被捕）也已经厘清并平反了。六弟顺势而为，展开了又一轮出版五哥遗作的拼搏。

不过敏之再勇，还没有胆大到公开要求出版顾准书信集、日记和读书卡片的地步。实际上，从1980年到1984年，敏之的全部努力都用在出版顾准未完成的专业著作——《会计原理》上。这是弟弟在哥哥死后才发现的残卷——计划写七篇才写了一篇就因为第二次右派之灾而中断。连带他还发现了那篇《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

年过六十的敏之聪明地采取了迂回战术，他要先从五哥的专业著作下手——这个领域可能比较“安全”，至少不“敏感”吧。

3. 一本会计学书籍对社会的威慑

然而敏之想错了。

就是这样一本纯管理学专业书籍的出版，让他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不堪回首——

先是顾准挚友，此刻已经被官方树立为“知识分子的榜样，中国的脊梁”的孙冶方出面，郑重将亡友遗著托付给上海人民出版社。人家不说出，也不说不出，就这么拖着，直到陈敏之忍无可忍找了过去，才以“内容陈旧，词汇不符现代习惯术语”的理由拒绝。真真的岂有此理！

尔后顾准立信的老学生，华东财委老同事将稿件送到北京财政部出版社。出版倒是真出版了，如果你能把无出版社署名，无书号，无装帧设计，无版权页，无定价的铅印件称作“出版物”的话。

手捧貌似“非法出版物”的《会计原理》，陈敏之大失所望，欲哭无泪，人家财政部副部长都发了话——“顾准的东西，只能出到这个份上。”

能到这个“份上”上，你除了表达感激的份儿还能说什么？

反过来再看看当年搞得“娜拉”顾准一气出走的“海茂尔”先生——中国现代会计学始祖乌潘序伦先生对此残卷的评价。1984年，《会计原理》终于得以在顾准五十七年前的“工作单位”——立信会计事务所的《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出版时，这位是年九十有一的老祖宗含泪写下如此序言：

“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编写方法也与众不同，以他一贯的严谨学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层层剖析，逐步深入，独创一格而不拘泥于习俗。例如主张利息不应列入成本，应从利润中支出；用数理矩阵方式来说明复式簿记恒等原理；对借贷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务实，均具有其独到的识见。”

骨灰级专业人士如此高度评价的一本纯工科专业著作，北京的专业出版社却拒绝出版，原因肯定不是编辑口中的那些托词，而是因为这篇专业文章残卷承载了太多“非专业”观念和术语，不是会计

学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式“政治”意义上的，虽然它开宗明义就说到：

“实际上复式记账法是一种纯数学的方法，方法本身并不包含什么阶级性的因素在内。”顾准《会计原理》

你说你的东西跟政治毫无关系，可人家恰恰就认为这么说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有关这“三百两银子”的细节、成色，此书前面的章节已有专门叙述，不再赘述。而此刻，就算再多专业会计界人士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对这本残卷看法——

“书中的许多观点、名词、术语、提法都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性”；“确有独特风格，独特见解”；“‘会计主体’一词堪称首创，用矩阵法解释复式簿记确是独创且独到”；“不仅解决了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开创了以数学方法解决会计先河”……却全都无助于它在财政部隶属的出版社正式出版。

无独有偶，这和近二十年前顾准莽莽撞撞将他翻译的《美国总会计师制度》送去出版社，被阶级斗争觉悟甚高的编辑一眼看出端倪，要不是孙冶方亲自出面说不定会闹到哪一步一事，何其相似乃尔。这次人家已经是大大地进步了，退稿而已，“政治”上嘛，就不追究啦。

但凡事关“政治”，再小也是大事。既然“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极笔语），那么“利用数学反党”，“利用物理、化学……会计学反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嘛。

此时已是1984年，顾准死去已经十年，毛泽东死去也已经八年，一篇纯管理学的专著居然还有如此威胁、震慑之力，哀哉！奇哉！壮哉！

4. 北枳南橘

相比于《会计原理》残卷的出版，《希腊城邦制度》的出版又似乎显得过于平淡无奇。

1982年，吴敬琏将《希腊城邦制度》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据说总编和编辑们捧读后简直如获至宝，立即投入精兵强将，从校勘、编辑到设计、装帧无不尽其最大努力，当年交稿，当年出版，第一版就印刷了5900册，好评如潮。

这两种可能性，一是该文全篇在谈历史——希腊史，而“言必称希腊”是一种罪过的年代已经过去，动不动给史家戴上“借古讽今”帽子的手段如今也不大行得通了；二是出版社和编辑们打心眼儿里喜欢这样的稿件，多少年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就算冒点风险也值得，大家一起担当吧。好在那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尚未开始。

比起财政部出版社，不能不说科学院出版社的阶级觉悟较低而文明程度较高。就算什么都不说，至少后者有肩膀，有担当。善哉，善哉。

陈敏之非常振奋，但也非常清醒——“好戏”还在后面。

五哥的《希腊》虽然精彩，可毕竟是在谈史，“政治”风险不大。他确实没想到《希腊》的命运竟比《会计》好上这么多。原是做好了拼搏抗争准备的六弟，顺境下丝毫不敢松劲，他立刻把这口不能泄的气转移到了最“刀刃”处——出版五哥和自己的通信集。这些杂文的犀利和敏感绝不在《希腊》之下。假如说鲁迅的《投匕集》投向的是敌人，五哥这些没有题目的杂文更像是投向每个人胸口的匕首，无敌无我，杀伤力也就特别大。

惟其如此，风险肯定也要比《城邦》大得多。

六弟和王元化先生——五哥的老部下，老朋友为这束信札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取自五哥1973年8月4日寄给他的那封专门探讨辩证法、神学、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等哲学问题的长信。其中最令他振聋发聩的一段话是：

“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文稿454

挑出这句精华中的精华做了题目，六弟松了口气。可就冲着这个标题，他也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多么艰险。他豁出去了。

于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有了最初的手抄本，陈敏之版。第一批读者，是我的传主的五位子女——稻头、小米、高粱、五五、小弟。

抄本在大女儿稻头——顾淑林的手里驻足了整整一年，至于女儿看了多少遍，那只有天上的父

亲能够知道。然后叔叔就收到了侄女那封如今许多“顾迷”都熟知的信：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致社会再做蠢事？……”

可是，这套准则难道是哪个部分“更新”就能了断的吗？它是以一整套集权专制的标准定制的模式，是夺去人的尊严、个性和人性的一整套规则，要避免愚蠢只有彻底否弃它这一条路可走啊。

手抄本开始了半地下的流行，只是流行的速度和范围极慢，极窄。这些文字毕竟不像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或者《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是许多普通人都能接受的小说体裁，而能够理解这些文字的人是个非常非常微小的群体——少数学者、学生与好友。

接下来的年份——1983年，又是个坏年份，“反精神污染”的冬风一夜吹遍祖国大地。

连“人道主义”，“异化”两个词是什么意思都还搞不清楚的全中国人民，须臾之间全部成了它们的批判者。比起17年前“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一回芸芸众生琢磨领袖意图要难得多，就连大批判的组织者也闹不清楚“Yi Hua”究竟是哪两个中国字^{顾骧}《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好在彼时国家意识形态大总管亲自掌握着斗争的大方向，上下逢源，左右开弓，“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还是老传统，琢磨什么？跟着批判就行了，报纸上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保证不会错。

而人道主义和异化，却正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最重要，最主要的内容。看顾准的“商城日记”，他在劳改时被批得最凶的也是人道主义。这种人写的东西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允许出版。

陈敏之沉下气，等待着这场新的闹剧收场。五哥从来不相信“多少事从来急”的浮躁之人会把事情办好，他再一次“守机待时”，竭力让自己安静下来。

闹剧果然不长，1966式的愚昧、狂躁很难再现，毕竟“人民”疲倦了，厌恶了，逆反了。

1984年年底，敏之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手里捧着的已经不是一团随时可能熄灭的火苗而是一块通红炽热的炭，再捂下去迟早会灼伤了自己。

通过一位弟兄俩共同的老友，书稿被送到了“北三联”——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从1930年代孤岛时期起，三联（生活、读书、新知）就是中国进步书刊出版的一面旗帜，也是顾准、孙冶方、陈敏之的精神家园，敏之对其充满期望。

编辑看了，激动不已。

“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见识……直抒胸臆，不讳权威……实乃不凡之作……真奇书也……。”

之后，万籁俱寂。

书稿在三联的某只抽屉里活活呆了一年多，1986年上半年又通过那位老友的手默默地退了回来。

陈敏之同样默默地接了过来，欲问还休，欲说还休，大家一起“却道天凉好个秋”吧。

六弟发了狠。“北三联”不出，找“南三联”，“南三联”再不出，找东三联西三联，就不信没天日了，就不信在这块国土上金子就真成粪土了！

可毕竟，敏之六十五岁了，老眼已经昏花，像十年前那样再抄录一遍，实在太困难了。他花钱请人再次誊录了一次，用的依然是那种削薄的，充满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信纸。须知彼时离眼下人们熟知的A4、B5这样毫无阶级斗争概念的白纸还有很远很远的时间距离。

敏之仔仔细细校对后找上了“南三联”——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他本身就是个老三联，老南三联，1934年就在上海生活书店，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如今为了能把五哥这些东西印出来，留下来，六弟豁出这张老脸摸上三联的门。不过这一次，他充分做好了碰壁的精神准备。

果然再次碰壁——泡沫加软牛皮之壁。绝不让你灰头土脸，头痛欲裂，可你心痛不痛我们不管，我们也管不了——

“东西非常好，我们不能出。”

就是这样。

这回敏之学乖了，连问“为什么不能出”的念头都没起，不必问，不能问，问了也白问。

无语不凝噎，一次次的打击也是一次次的锻造。六弟第一次起了把五哥的文字“送到境外出版”

的念头，既然南橘北枳，那就把这嘉果送到南方去吧。

寻寻觅觅中，一晃又是一年多过去了。彼时“境外”一词几与“敌特”同义，《秘密图纸》、《国庆十点钟》都还是热映的电影，境外出版哪里是那么好办的。

1987年，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申申读到了顾准。

这是一位老革命的后代，父辈和顾准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是一位知识分子革命者、新四军老战士，名字曾出现在《顾准自述》中：“华中联络部 陈同生……”，1968年惨死在红色恐怖的余波中，死时头上还戴着四顶帽子，其中一顶和顾准一模一样——“三反分子”，其余三顶则和国家主席一样——“叛徒”、“特务”、“走资派”，说实话，不丢人。临终留下的遗言是“毛主席：你知道许多跟你苦战几十年的干部被污蔑为‘走资派’、‘叛徒’，过着比罪大恶极的战犯还难受一千万倍的日子，比囚徒还苦，请你救救这些干部”。

年轻人读罢陈敏之手抄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激动不已，找上门去，向陈叔叔自报家门，一手包揽了出版事宜。他推荐的出版社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凭着这么好的东西，凭着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也凭着自己在社科研究方面的小小成就和知名度，年轻人信心十足，立时三刻向出版社发出激情四射的荐稿信。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者们的评介甚至比南、北三联还要高——

“……凝练晓畅，笔锋犀利，真知灼见，激荡人心，爱不释手……”，用的都是形容词的最高级。最后的断语是，“作者忠于革命，热爱人民文稿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并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从观点到语言都不超出学术范围，可以出版。”

陈敏之满怀感激，重新充满了希望，8月写出序言，转年春天就拿到了稿样。敏之再一次仔仔细细校清稿样交回出版社，下一步就等着看样书了。

可谁能料到，这年又是个坏年头。1989，唉，就不说了吧。好像凡事有关顾准，上帝总要多打磨一阵好拿出精品似的，这一打磨，又是三年过去了。

现在是1991年，手抄本已经变成了铅印本。毕竟文字处理器、电子计算机、复印机这些东西已

经掌握在普通人手里。不要小觑这些无生命的机械，正是它们把顾准的思想变成了铅字，撒播了出去。更重要的是陈敏之此时已经有了一帮青年同盟军，是这些年轻的生命在操纵那些虽无生命却同样年轻的机械。

是年夏天，一位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的青年人读到了一摞打印稿，是任职最后一次拒稿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好友从国内带出来的，正是最难将息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前边还有王元化先生的序言。好友告诉他，这部书稿，在文化界人称“什么书都敢出”的范用先生手里都未能出版，其尖锐和棘手可想而知。

至此《理想》已经流传到海外，许多读过的人也同时记住了顾准这个名字和他多舛的命运，无一不扼腕顿足，希望能为这个人的遗著出版尽一份力。在这种舆论境况中，在王元化先生的多次斡旋下，《理想》终于在1992年辗转流入香港。

1992年7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者——顾准。

从北到东，从东到南，中国版图上三个三联被《理想》——走过，终于在最南方的三联——香港三联，理想修成正果，北枳成橘。

可惜，这是只残缺的橘，是个残缺的《理想》。

就算身处自由之都，香港三联的编审们依然毫不留情地砍去了这只嘉果最华美的部分——《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和《民主与“终极目的”》两篇精华中的精华被无情地删了去。原因吗？和“南”、“北”两位三联两兄弟是一样的，请你不要问，我也不会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何必非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回头说那位留学夏威夷的青年学子，读罢顾准也是心潮难平。预感到这将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件称得上是“重大”的事件，他毫不迟疑提起笔来，洋洋洒洒地写下万字长文——《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命运——顾准和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于次年8月刊登在纽约的一家华文月刊上，成为海外最早系统介绍顾准其人其事的文字。

回头再说国内（当然香港也是国内，虽然彼时还没有回归）。

由于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希腊城邦制度》影响日益增大，顾准这个名字已经广为学界接受并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到了 1990 年代初，已经鲜有社科类专业人员还不知道这个名字和他的遗著的，那将是个小小的耻辱。在大学，顾准的名字也开始流传，和萨特，尼采，房龙，米兰·昆德拉的名字一起。

至此，我的传主的文字如若还不能出版一本国内版的《文集》，已经到了说不过去的地步。出版界已经同时有了“瑰宝”和“烫手山药”的隐约耳语，谁要是打算把这块炙炭再想捂下去，确实是在“自己找不自在”了。

5. 贵州故事

1994 年，顾准逝世 20 周年。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

天高皇帝远的贵阳。

不起眼的贵州人民出版社。

不知名的青年编辑杨建国。

有一天，杨编辑建国突然收到已经知名度很高的王元化先生的一封荐稿信。字不多，未对所推荐文稿作任何评价，只是希望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推荐的稿件。这部文稿就是陈敏之为之出版奋斗了二十年的《顾准文集》。

上个月，敏之才又刚刚经历了一次无情的“磋磨”和打击。

几个月前他和上海学林出版社谈好了出版《顾准文集》协议。这一次，事前说好了是自费出版，敏之准备好了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的个人积蓄，并且已经按照合同向出版社预付了第一笔款项。

和前几次一样，稿件被交口称赞，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顺利得他都有些害怕。果不其然，发排前夕，责编突然打来电话，说以前在香港出版时抽调的两篇文章这次也不能放

进去。

这个，敏之绝对无法容忍。这也是出版社的违约行为——交付书稿时必须保留所有篇幅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的。可是合同在“政治”面前算得上什么？连蚍蜉撼树都算不上。

敏之忍声吞气，一再磋商无果，愤而要求退稿退款。

怎么去责怪这些总编、责编、编辑们呢？身在模子中，当然要出落成模子规定的形状，你怎么能要求人人都做顾准呢？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十多年后，北三联当年负责人，连呼“奇书”却坚持退稿的责任人沈先生，在谈到拒绝出版《顾准文集》的不堪往事时这样坦承：

“我是一个怯懦者。有过应该允许‘跪着造反’的念头……感谢后来有同行将《顾准文集》印成书了……我所惭愧的只是，许多事没有按照列宁的教导认真去做。” 沈昌文《阁楼人语》

且不论跪着怎样造反，还要事前取得被造反者的“允许”，还只是自己自作多情地揣摩着他们“应该允许”，谁允许？列宁吗？“跪着造反”无非就是撒娇，撒娇在大多数情况下挨打会更凶，连小孩子都明白这个道理。人家对你说是“娘打孩子”，你请人家允许“跪着造反”，真是“民有与其相配政府”一语绝妙的注脚。

人性、人格被磋磨、压塑成这般模样，还有比这更悲凉，更滑稽的吗？

1994年，新的曙光初现了——王元化先生通过弟子胡晓明，胡晓明通过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弟弟，《顾准文集》辗转来到杨建国手里，又一颗“四万年结出的果实”，正正地、重重地砸在这位青年人头上。

建国对稿件的喜爱自不必说，十几年间七七八八哪家出版社也没有一个人对文稿本身说三道四过。建国的可敬可贵在于他几乎立刻就决定自己一身担当起来——这文稿太“各色”了，终审很难通得过。那边反正反正主要听我这个责任编辑的，我先满口称赞起来再说，关键地方就含含糊糊、云山雾罩、春秋笔法混过去，书先出了再说。大不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到时候再说吧。

就这样，没有费一点周折，贵州社就火速承诺出版此书并马上与陈敏之签了协议。依然是自费，

但是贵州方面说好假如销售情况乐观，出版社将以稿费或版权费的名义返还费用。

签字之前，经历了多次伤心和碰壁的陈敏之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已如实告诉对方这部书稿的全部遭遇和自己的底线——不允许任何未经同意的删砍，竟然还有这样的回答。接着就是很戏剧化的场景：

上海那边，陈敏之先生攥着电话听筒的手在颤抖：

“真的一字不删，一字不改？”

贵阳这边，杨建国先生毫不踟蹰，斩钉截铁：

“真的一字不删，一字不改！”

“真的吗？真的吗？”

“保证！保证！！”

陈敏之大喜过望，转身就把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汇了过去。贵州社也不含糊，12月就让投稿人看到了样书，那两篇最扎眼的——《清谈馆》和《终极目的》赫然排列其中，一字未删，一字未改，责任编辑：杨建国。

敏之，义弟也，建国，侠士也，美哉，壮哉。

书出来了。字数：354千字；开本：850X1168 1/32；印张：14.125；定价13.8元；1994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3000册。书是浅绿色封面，无图，装帧一般，用纸一般（反面的字可以清楚地正面看到，反之亦然），印刷一般。总之就书的本身而言，质量不高。

可在中国出版史上，它已命定是一本不一般的书，是一本可以入史的书，是一本罕见的优质书。正因为它的“一字未删，一字未改”，这本书至今都还在被盗版，其收藏价值早已大过书籍本身。来看看后边的故事。

《文集》第一次上订货会是在武汉，居然一本都没有卖出去。毕竟贵州偏远，贵社名气小，订货会很难引来北京上海的客户。可没多久，大买主来了，就是原来最先拒稿的北京三联书店。北三联开口就要300本，十来天后就要求添货。书商们说是也不知为什么，许多人今天买了明天又来买，一

次买好几本；北京著名的万圣书店，老板刘苏里一个电话打到贵州，坚决要求做北京地区的独家代理，一次就订货 4000 本。

从一开始的无人问津到倏忽间的洛阳纸贵，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此后贵州社发行部电话就没有断过，都是索要者和书商。库存很快告罄，只得不断加印。到了 1995 年 9 月，也就是一年之后，贵州社已经是第四次印刷《文集》，印数达 34000 册。

责任编辑杨建国，光是读者来信就收到一麻袋，大都是感谢他编辑出版了《顾准文集》。

那年那月，大城小城，尤其京城，一时间除了央视，没有不谈顾准的媒体。接着最有趣的故事来了。

先是出版社总编被召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开吹风会，局长指名道姓严词质问：

“请问贵州的老总，一本学术著作为何如此走红，畅销？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你从前见过这种情况吗？都是些什么人在热捧这本书？奥妙在哪里？”

一连串“义正言辞”的发问排炮般砸来，总编有点发懵，连规矩都忘了，不识趣地问道：“局长同志，《顾准文集》有问题吗？”

局长更加声色俱厉：“是我在问你，请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好，事情发生在 1994 年，不会有两个穿制服的人立刻就从旁门走出来将被质问的人“押下去”，反倒是局长有些底气不足，把原该在会议室里的话拿到电梯里说——

“回去就封存，不要再卖了”，“我可是在电梯里，不是在会上说的啊”。

聪明、机智加机灵，滴水不漏！

可你要真是以为就此不卖了，封存了事儿就了了，那就又太低估“专政”的威力。

北京这边和风细雨，贵州那边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先是图书处接到神秘电话：

“不要问哪里打来的，不要记录。通知有关《顾准文集》的两件事：1.不再发行；2.不再印刷”。

紧接着，三个穿便衣，腰别小枪的人找到责任编辑杨建国，整整谈了三天的话，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所有细节，所有涉及的人物名单。临了倒是宽慰杨建国，“你没什么大事，但这件事你不可

以说出去，更不能对媒体说”。

撂下这几句话便衣们就走了，至于小枪嘛，不必害怕，只是吓唬吓唬你，明知你一介书生是不经吓的。

这是发生在 1994 年的事情，距今仅仅二十来年。

最后的结果是，“你没什么大事”的杨建国先生职业生涯受到重大挫折，“政治上的不正确”导致了他“经济上的不景气”，名利双失——高级职称泡了汤，收入当然不会提高。近二十年后杨建国先生估计不会再有人“别着小枪”去找他谈话，这才把这些“不该说的话”也说了出来。

如今有些相关顾准的文章，很自豪地宣称自己转录顾准的文字来自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版。转录者的用意十分明显的——我用的是没有被阉割的正宗。反倒是晚至 2007 年出版的“市场版”《顾准文集》，编者依然在顾准最精彩的话语上动刀动斧，不信你可以去核对 1994 年版的“贵州版”和 2007 年的“市场版”，就能看出端倪。

如今 1994 年 9 月的“贵州版”即使在旧书市场上也已经绝迹，原价 13.8 元的书已经被叫价到 50 元依然有价无市，盗版者早就动作了。

- 全书终 -

后记

拜 1971 年 9.13 一声爆响给我辈送来的“无主义主义”，本人生平未着“政治”一道，也因此直到 2007 年还不知“顾准”为何方神圣，枉和他同时代了 20 多年。

读罢顾准，惊为天人。

1966 之前尚不敢说，但我辈亲历的“史无前例”还足音不远，尘埃未落。几亿人在集体癡症中不思不想，装疯卖傻，斯文扫地活了足足十年，几无一人置身事外。仅此一点在世界史上就是空前，至今也还是绝后的。亲历者绝大部分人还在，境迁事未过，曲终人不散，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段在中国史上显得特别突兀，特别诡异的小断代，其蹊跷乖张和莫名戾气，至今都无人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多少西方人文学者，他们几乎是艳羡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奇异的人性大展示，给史家和作家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研究创作的源泉。而咱自家，却宁愿臆断夏商、妄论唐宋、戏说明清，也不肯细究这个历史小切片加人性大展览。大家一起糊涂着，挺好。

可眼前突然就出来了个顾准。他是谁？他何以如此？他的故事又何以如是发生？

这事弄不清楚，不得安宁。可是如何下手？年近耳顺，退休多年，除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志愿者外，无任何“头衔”和“挂靠”，实在无处下手。

是孙冶方先生养女李昭大姐给了我徐方（咪咪）电邮地址，匆忙中还掉了一个字母。不想藉着错误的邮址，远在日本的她竟收到了我的邮件并立刻回复了。几天后我就见到了回京奔父丧的咪咪，我们多次面对面谈她的顾伯伯。不久她回日本，又有了数万字的通信，说到动情处我们甚至一起翻译索尔仁尼琴的《为俄罗斯母亲祈祷》。当然我的译文大大逊色于咪咪，她的英语可是陈翰笙老启蒙，钱钟书先生指导的。亲历者咪咪是这本书的“第一推动力”，美丽善良的她不愧顾准生命中最后、最明亮的一抹阳光。

之后我冒昧地把最初写下的“顾准印象”传给吴敬琏先生，问他是否“反感”。因为文中屡屡提到顾准受基督教的影响，很不合时宜。几天后老人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一点不反感，还顺带指出了一处年份的笔误，令我受宠若惊。

然后是张曙光先生。一说为写顾准，老夫妻立刻热情相约。听他们徐徐道来对顾准的回忆，连张家小儿女常常去讨顾爷爷“黑水”（咖啡）喝的趣事也在其中，温馨得宛如昨日。最重要的是，此书将顾准定位于政治哲学家就是受了张曙光先生的启发。

书的开篇要写主人公接受人生最初教育之处——“小姑私塾”，这就不得不追溯和考证“小姑教育”的奠基地——上海清心女中。恰恰我的忘年交，孙冶方先生的外侄女，也是我后来主内的姊妹，中央广播艺术团合唱团退休老艺术家洪慕莲女士 60 多年前就从那里毕业。是她和老同学陈梅珏——两位年近耄耋的老人千方百计为我找到在清心堂侍奉了一生的陈蓉生老牧师未经发行的回忆录《清心堂沿革》，助我顺利写完原以为会很困难的一个章节。

商城是顾准重头戏，写顾准当然要去商城。可是人生地不熟，敏感话题又无官方身份，谁会理你？抱着侥幸在网上搜索“铁佛寺水库”，居然真让我找到一位当年人物——商城共产主义小学学生杨敬之，“顾准名单”中杨静超就是他的校长。敬之也是一位教书先生，商城如今许多头面人物都是他的学生。就这样通过杨老师的帮助，仅仅凭着一个“志愿者”的身份，我看到了《商城水利志》、《县志》、

《人口统计》等肯定属于官方的文件。整个过程河南省教育学院青年教师李素立先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民间的“信阳事件”探索和研究者，书中所有大饥荒数字几乎都来自素立的资料库。

至于寻找当年和顾准一同在商城铁佛寺水库劳改的右派难友们，就更奇妙了。官方是绝不会对外提供这些信息的，信阳的朋友又都年轻，知不知道啥叫“右派”都很可疑。可年轻有年轻人的办法：两个 30 多岁的小伙子开上车一头闯进商城，看见街上坐着晒太阳的老人就问：“您老当年是右派吗？您老认识谁当过右派吗？”天呐，这在北京连想都不敢想的傻办法居然屡屡奏效。蕞尔小县当年右派成群，“小巷子两头一堵”，不几问就找到了三位“顾准名单”中人。登门拜访中的不胜感叹、不胜唏嘘都写在书中了。这里只想再说说宋一峰老人：临走前我给宋家老夫妇拍下合照，回京后在“喀嚓鱼”网上做好了送到老人家里。赵阿姨专程致电我，千恩万谢。不想这竟是 70 年白金婚老夫妻最后的合影——我走后不足半年，宋一峰老人溘然长逝。

再后来，写到顾准译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节，得知赵人伟先生也是顾准学生，莽撞地摸上门去向他讨借“绛枫（顾准）”译本。赵老翻箱倒篋找出上有顾准之子题赠和自己批注的珍贵版本，并嘱我读书不要全信中译，中译常常大谬。果然，绛译与新译常有差别，尤其在涉及经济学术语时。是精通英语的刘军宁先生辗转从外网宕下熊著原文送我，郑州独立学者邵晟东先生、山西大学王三义先生鼎力相助，才算是磕磕绊绊踩着顾准的脚印捋顺了“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议会制”、“政治家”等等概念。

息县也是顾准故事的重头，也就认识了一位地道的息县人——李玉。2005 年，在上海任职人民日报《大地》杂志采编的阿玉参与策划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团东岳寻访暨纪念顾准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亲历者和最早探索顾准的人们，如陈敏之、吴敬琏、徐友渔、高粱、咪咪（徐方）、高建国、罗银胜等 60 多人参与。阿玉为了帮助我与他们取得联系竭尽了全力。通过她，我采访到了高粱、宋德楠、陈小萍、陈小嫣，最后是顾家大姐顾淑林——一位极具理性的物理化学科学家，据说从不接受有关父亲的采访……。

叙述顾准 1957 年的《试论》，对我这个连经济学 ABC 都不懂的工科生不啻巨大难关，写作一时困顿不前。又是阿玉，在网上找到一位对顾准经济观点颇有心得的宁波学者“清华先生”，并把他博客地址转给我，我加了“纸条”。仅仅是“网友”且是初识的网友，清华竟立刻打来电话，不问我是何人，仅凭“顾准”二字，就开始掰开揉碎给我讲“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契约精神”、“计量经济学”、“凯恩斯与哈耶克”、“兰格计算机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劳动时间概念”等等等等。毕竟是长途电话，我说我打过去吧，他理也不理，继续讲下去。一年多我们通了无数次电话、短信，加了无数张“纸条”。可等我书写成，就再也找不到他了，电话无人接听，博客、短信都没有回答。至今我没有见过清华先生，不知他长什么样子。我永远记得他的一条短信——“记住，经济学基础的基础——契约精神，来自北欧海盗”。

在写到顾准对《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的剖析时，我迎头撞上了“黑格尔”这堵大墙。仅仅顾准反复阅读的《小逻辑》，一遍读下来就晕得头都大了。懊恼之际是爸爸提醒我“你干嘛不去请教咱家邻居王树仁先生？他是黑格尔专家呀”。我拨腿就奔了王家。老树老师给我讲黑格尔，讲异化，讲大小逻辑，讲海德格尔，讲维特根斯坦、罗素。听完后再顺着顾准的思路看这些大佬们，竟然不再头晕脑胀手脚冰凉。

长春老学者靳树鹏先生，对我亦步亦趋踩着顾准对庞然大物《自然辩证法》穷追不舍的脚印走下去，几次给予鼓励和支持。他是个双腿膝关节不好，连楼都下不了的老人，光是亲笔信就写了好几封，叫老伴拿到邮局发给我。北京学者，《炎黄春秋》原总编吴思先生更亲自下笔为我修改《顾准对〈自然辩证法〉的追索》，希望能够发表，终因“向既往方向追索得太远”而未果。假如没有这些前辈的支撑，仅仅这些书名就足以吓死我。

写到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又犯晕，还是爸爸提醒——“去找李真叔叔啊，他学的就是古希腊文，搞得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呀”。我当即致电邮给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的这位老叔叔并立刻得到了回应。本书关于古希腊罗马史研究在中国的状态叙述，就得益于多年从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老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古希腊语言学家李真先生的指点和帮助。谢谢李叔叔，谢谢刚

刚离世的爸爸。

陈乐波、陈申申两兄弟也是我最要感激的。他们的父亲陈同生就是当年“大片”《东进序曲》中由当年最帅的男演员李炎扮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原型，也是“顾准名单”中人物。陈家父子之大器和轩昂也和李炎的形象一样。我和兄弟俩素不相识，仅凭着克明君的介绍和一封求助的电邮，陈家兄弟就为我的书在上海召集了一次十多人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熟悉和研究顾准的前辈：孙恒志、晏小宝、朱学勤、朱小平、高建国……。他们给我的帮助和启发是巨大的。例如关于顾准1950年代初在上海实行“按率征税、按律办事”的普世意义，就受益于在美国做了多年执业会计师的申申的指点。申申也是当年最早推动顾准文字流布的年轻人，既理解他的思想又懂得他的专长。

上海独立经济学家朱小平先生，会后我们又有许多通信和一次会面。书中关于顾准与利澳·斯特劳斯在僭主问题上奇迹般的相通与契合、中国是否有过类似希腊的古代民主、为何中国无僭主僭政说、顾准当年读到的中国历史真伪问题以及有关“陈独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判”的陈述与观点，都极大地得益于小平君的指点和帮助。

还有许多“巧”事呢。

为了体会顾准所读乔治·格罗托《希腊史》的现场感，我在北图网络上搜索了很久才发现这套书已属典藏，不借阅更不出借。无奈之下只好上“孔夫子旧书网”碰碰运气。网络真是个好东西，三下两下就找到了同样年份、同样版本的《希腊史》，开价不菲。为了顾准，为了希腊，豁出去了。我立刻将钱打出，又追了一个电话过去确认。岂料对方得知我买书的原因，再三要免了邮费不说，还反送了我一本他刚刚译好出版的《香奈儿传》。原来沈占春先生也是个独立学者、翻译家，正在致力翻译顾准生命中所读的最后一本书——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名著《英国史》。“X/15 Macaulay”——这是顾准全部日记的最后一篇，写于1974年10月15日。就这几个字，我和沈先生立刻成了好朋友——素未谋面，网络好友，话题只有一个——“顾准——希腊——麦考莱”。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沈先生也终于完成了这部浩瀚英文名著的中译。下一步他打算要翻译的，正是乔治·格罗托的《希腊史》！

朱小平先生曾提醒我，“你要注意一位‘民间顾准’杨伟名”。可是当我在网络上查到此人时，才发现人物已经十分式微，连灯火阑珊处都不见人影了——曾经在二十多年前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已经改回“户县图书馆”，县志办人员压根就不知本县有过此人，电话打过去十分的不耐烦。意外的是在网上发现他的遗著《一叶知秋》竟出版过。这篇令毛泽东先生大光其火的文章在2004年即由卢跃刚先生编辑成书并写下了长篇序言，可惜早已断档。循迹找到跃刚先生，他立刻写来长长的电邮——“.....在更广阔的思想史、学术史和人类命运的背景下细读《商城日记》，不能不为顾准的原创经济学方法观察大饥荒（恰巧顾准置身于中国大饥荒的典型地区）——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的人为灾难的个案、机理，阐释大饥荒成因的胆魄、深邃所折服。他的贡献是全人类财富。”

是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先生从仓库翻出一本《一叶知秋》放在书店柜台上，专门等我去取。苏里君好像专门喜欢“囤积”这类书籍。中国第一版——贵州版《顾准文集》就被他一次购买了4000本，如今留在手里的都是珍藏。卢跃刚认为顾准和杨伟名都认识到了“短缺”和“匮乏”对专制制度的巨大助力和支撑，这也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著名的“短缺经济学”观点。而老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则更进一步认为，仅仅“短缺经济学”还解释不了中国1959-1962年人祸造成的大饥荒，能够解释的它的只有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著名的“饥荒理论”。顾准的《商城日记》早于森20年就有了这个理论的雏形——“餬口经济”、“白薯共产主义”，只可惜文字凌乱，未成体系。

这一切都极大地帮助我梳理了顾准的思想过程。

成书中我所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一套4本《顾准文存》，由于翻得太频繁开始掉页了。因为任何书店和网上都买不到，北图又只能馆阅不许复印，不得不厚着脸皮打电话给并不相识的、彼时的责编李丕光先生，希望能买到一套库存。丕光接到电话立刻寄来一套新书，无论如何不肯收费不说，还附亲笔信一封，热情鼓励我把书写下去。一位大出版社的大编辑（如今是总编辑）亲手写信给你而不是打字+签名，在互联网时代这可不就是文物嘛！

杨建国先生，第一个吃螃蟹——出版《顾准文集》的青年编辑，如今也年过半百了。这件事影响了他的前途和“钱途”，也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一次读书会上偶识的许医农先生向我提供了建国的

联络方式。素未谋面的杨老弟听说了我的出版困境，立刻向熟悉的出版社热情推荐。当我说我也想向你鞠一躬（不是因为他的推荐啊），建国幽默地说“不用啦，不用啦，很多人在信里都鞠过了，您就不用鞠啦！”

多年研究国际共运并独创性地提出“基因科学与新人性论”的郑州独立学者邵晟东先生，在认真阅读完全部书稿后提出了近二十处质疑、悬疑、错误、笔误和需要商榷之处。这对作者意味着什么，不是个中人很难理解，个中人的感激之情也很难表达。他挑出的硬伤，借一句顾准的话——“令我不胜汗颜”；同时他的鼓励，也借一句顾准的话——“令我不再‘怕教授’了”。谢谢，谢谢了，晟东君。

得知旅美画家李斌曾经画过一幅《上海的早晨》（作于2007年，中国美术馆收藏，见本书 页），画中年轻的陈毅、潘汉年、杨帆和顾准英姿飒爽、气势如虹。画作的蕴意在：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靠着这几位秀才的真才实学打动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稳固了政权变更后的世界超级大城——上海的国民经济，可惜不久他们一个个都被革命母亲吞噬。我迫不及待地从小朝姐那里得到了电子照片和李先生的电话，迫不及待地打给他，脱口而出“李先生，您能为顾准作一幅肖像吗？”李斌君一口答应，“好，你什么时候要？”“等找到出版社就告诉您”。后来我被朋友埋怨：“王晓林你知道李斌画作的市价吗？”天，我怎么这样冒失！忙怯生生再打电话过去，肖像事提都不敢提，只问《上海的早晨》要不要版权费。李斌君笑答：“我的作品使用的人越多我越高兴，谈何版权？更何况是顾准！我早就想画一幅他呢。别急，等我画完曼德拉系列就着手”，反倒弄得我抱赧不已。

李锐老为我的书题写了书名。年近百岁之人，一听顾准二字，双目发亮，敏捷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二话不说走进书房，挥毫泼墨，朱砂钤印——“《顾准和他的时代》九十九叟 李锐”跃然纸上，苍劲拙朴，力透纸背。老人动了情——“他只年长我两岁啊！”，一句话说出心中所以痛惜。临走，老人把桌上一份《文汇报》递过来，“这个也送给你”。三个整版的长篇报道《李锐畅谈养生之道——不要停止思考》，而我正是看了他多年前纪念顾准的文章——《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才认定了要请老人题写书名的。

要感谢的人还有那么多，王克明、姜红、陈瑞铭、楼肇明、蔡璋、刘志琴、金吾伦、吉晓蓉、宗丕钊、林皎皎、林明明、汪夕增、朱嘉明、柳红、邵敏、向继东、张晓波、肖涛、尚红科、孙牧云、岱峻、赵晓玲、穆军、柯大全、罗银胜、高粱、王砚峰、王迎新……，怎么也是写不过来的。可丁东先生却一定要写：在整个的成书过程中，我自始至终得到他的指点、鼓励、支持和帮助。是他推荐在“共识网”上刊登了我的《顾准与基督教文化》，向经济科学出版社推荐了我的处女作，虽然在签订了合同的情况下又被……。但正是他所做的给了我这个非学者、“圈外人”最初的信心。丁先生始终直言不讳地要求我去掉感性语言，抛弃“文艺腔”而留下“干货”，这一点令我受益匪浅。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首届“书香之家”的一位“家长”赵亚山先生曾经身为语文老师。亚山君在拿到文稿后为我逐字逐句修改错别字、错误标点和混杂的数字表述，自愿作了第一次校对工作。我非常感动，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六十万字的工作量，又没有任何报酬。

最难忘已经约好了马上就要在上海见面，却不打招呼就遽尔长游的徐志跃弟兄。我的处女作《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 薛明剑、孙治方兄弟评传》2010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邱红小妹是我的责编，她的丈夫，上海独立学者徐志跃是特约编辑。那时我已着手顾准，深受志跃翻译的奥地利裔美籍学者，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艾瑞卡·沃格林《自传性反思》的影响。2010年深冬，他带我参加了清华大学刘东教授主持的“沃格林研讨会”，启发至深。第二天他又和许志永君一起参加了我在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的受洗仪式，从此我们成为弟兄姊妹。几年间我和志跃弟兄关于科学、哲学与宗教，关于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家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我们几回在上海图书馆隔壁的“1984茶座”讨论沃格林和斯特劳斯，历史与秩序，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去年9月我们还在海淀的万圣书院，一边喝着伯爵茶，一边讨论维特根斯坦和罗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宗教大法官”，梅列日科夫斯基和他的《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并约好11月“1984”再见，重点讨论色诺芬的《希耶罗》和他一直想要重译的心理学名著《拒斥死亡》。可是突然，11月2日他就走了，竟是毫无“拒斥死亡”的意思！他的短信我还没回，我的电邮他也还没复，直教人痛彻心腑。把这本书献给他，全为的是让

自己能稍觉心安，但愿已荣入主怀的志跃弟兄能够接受。

……。

好像凡事只要关系顾准，总有人愿意帮忙，总有人想为此人做点什么。对那些想帮忙却又帮不上的人们——“我们很愿意出版此书，可是……”，我依然感激不尽，并相信总有一天大家是能够不说“可是”的。那就先不说了吧，反正在克明和津津姐姐的帮助下，有了大山出版社，有了蒙宪君，托顾准的福，功德圆满。

不过有件趣事，最后还是忍不住得说说。刚下笔顾准，我找一位号称在贵州一亩三分地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的江湖上朋友，请他帮忙买一本1994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顾准文集》，因为大家都说只有这个版本才是“真经”。这位小哥可犯了大难——半年功夫都没办成不说，最后号称动用了“铁的”关系才从贵州出版社仓库底下翻出一本，忙不迭给我寄来。可实际上我拿到手的还是个盗版的“第四次印刷”。不过我依然感谢他，虽然他听说实情后感觉特别没面子。

最后我要感谢七岁就同学、同桌的丈夫。虽然我写的东西他一个字也不看，可离了他我寸步难行——调电脑、配软件、开车找人、联系采访、安排行程，杂七杂八什么都帮我做了。“商城找右派”的传奇就是他托他的信阳小朋友们干的，搁我，别说右派了可能连爱派都找不着一个。自始至终，他支持我做这件事情，只不过时常敲打我——“老太婆，可千万别把自己真当成个作家啦，咱还是踏实做外公外婆的好。”

我记住了，放心吧。

王晓林 crosston@sina.com

2015-7-1